船长与大尉

上

卡维林 著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



船长与大尉

下

卡维林著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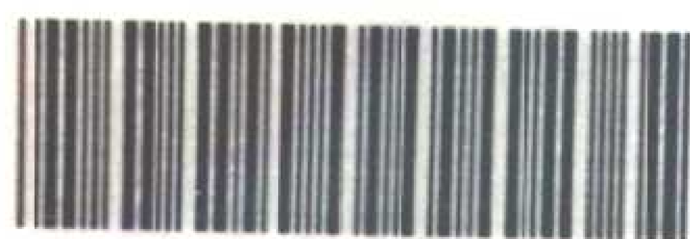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

〔苏联〕卡维林

船长与大尉

上

于 光译 陈文贺校



外国文学出版社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

〔苏联〕卡维林

船长与大尉

下

于 光译 陈文赏校





外国文学出版社

В·КАВЕРИН
ДВА КАПИТАНА

Гослитиздат, Москва, 1950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选收本世纪世界文坛上影响较大的优秀作品，暂定二百种。通过这些作品，读者可以了解二十世纪历史的变化、社会思想的演进以及各国文学本身的继承和发展。这套丛书的选题由外国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共同研究制订，并分别负责编辑出版工作。

船长与大尉（共两册）

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印刷三厂印刷

字数600,000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27 1/16　插页18
1982年8月北京新1版　1982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61,000

书号 10208·104　定价 2.60元

前　记

温尼阿明·亚历山大罗维奇·卡维林一九〇二年生于普斯科夫城一个音乐家的家庭，是苏联著名的老作家。

卡维林早年就对文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中学时代开始写诗。一九二三年毕业于列宁格勒东方语言学院，次年毕业于列宁格勒大学历史、语言系。一九二〇年，列宁格勒“文学之家”举办青年征文比赛，卡维林以他的第一篇小说“第十一公理”应征。这篇小说得到高尔基的赞赏，此后卡维林经常得到这位伟大作家的指导和帮助，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

卫国战争期间，卡维林一直在北方舰队工作，同时担任“消息报”的通讯记者，曾获得“红旗奖章”。

卡维林于一九二二年开始发表作品，早期写了不少幻想小说和侦探小说，如短篇“工长和学徒”(1923)、中篇“哈扎的末日”(1926) 等。此后，他笔下的主人公大都是知识分子，他们道德高尚、有一颗献身于人类公益事业的火热的心，有锲而不舍的顽强精神和高度的责任感，同时，作者也无情地鞭笞了那种思想腐朽、损人利己的假道学，如中篇“爱闹事的人”(1929) 反映学者的工作和生活，长篇“如愿以偿”(1934—1936) 描写从事历史和文学探索的学者的活动，三部曲“一本打开的书”(1949—1956) 叙述符拉森科娃在微生物学领域的成就和正直的科学工作者同背离科学原则的冒险家的斗争。六十年代初以来，卡

维林又写了中篇“七对魔鬼”(1962)、“学校演剧”(1968)、长篇“在镜子面前”(1971)和文学回忆录“在古老的房子里”(1971)等。

“船长与大尉”(1938—1944)是卡维林最著名的长篇小说，其中描写的是：十月革命前，俄国“圣·玛丽亚号”探险船、船长塔塔林诺夫和他率领的探险队在北极圈内不幸失踪，革命后，苏联空军大尉亚历山大·格利高里耶夫排除重重阻力，历尽千难万险，终于找到了这支探险队和船长的遗物，解开了三十余年来的一个哑谜。作者把现实主义原则同复杂曲折的惊险情节巧妙地结合起来，读来引人入胜，动人心弦。对于主人公亚历山大，作者着力刻划出他的坚强性格和高尚情操，在他身上概括了一代青年的英雄本色。对于反面人物，作者并不是简单粗疏地勾勒出他的丑恶脸谱，而是通过细节的安排，步步深入地发掘下去，最后把这个陷害船长，破坏探险事业，妄想骗取船长妻子的爱情的伪君子的肮髒灵魂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本书出版后受到热烈而持久的欢迎，被译成多种外国文字，荣获一九四六年斯大林文学奖金二等奖，先后重印过几十版，至今仍然是苏联国内外读者最感兴趣的作品之一。

译　者

目　次

第一部　童　年

第二部　应該好好想一想

第三部　旧　信

第四部　北　方

第五部 为了良心

目　次

第六部　青春常在

第七部　别　离

第八部 奋斗和探求

第九部 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第十部 最后一頁





第一部　童　年

1　信。捉青蝦

我还記得那肮脏，寬敞的院子，和被栅栏围繞着的一溜低矮的平房。院子紧靠一条小河，每逢春季，一旦潮水消退，院子里便滿是木屑，貝壳，时而还会有比这更有意思的东西。譬如有一次，我們就撿着一个装得滿滿的邮袋，而后，潮水又将那邮递員漂来，把他輕輕地放在岸上。他仰面朝天地躺着，两只手擱在額头上，仿佛是想遮住阳光。这个人还很年輕，头发金黃色，制服上的銅扣子亮晶晶的，——他在最后这次出发送信之前，大概还用白粉将銅扣子擦过吧。

邮袋被警察拿走了，里面的信件因为被水浸湿了，已經沒有絲毫用处，所以达莎阿姨便将它們收撿了起来。但是由于邮袋很新，又是皮子做的，同时鎖得也很严实，所以里面装的信件幷

沒有完全湿透。达莎阿姨每天晚上念一封信，有时她只念給我听，有时念給全院子的人听。这是一件十分有趣兒的事，甚至，那些常到司考伏罗得尼可夫家来玩"頂牛"①的老太婆，也扔下牌，凑到我們这兒来听。其中有一封，达莎阿姨念的次数最多，以至后来我簡直都将它背得烂熟了。此后虽然过了許多年，可是这封信从头到尾我还記得。

敬爱的瑪丽亚·瓦西里耶芙娜！

首先我要告訴您的，就是伊万·李沃維奇現在一切都好。我是四个月以前遵照他的指示，带領一支十三个人的队伍离开帆船的。我相信很快就能見到您，所以，現在就不准备詳細叙述我們随着漂流的冰山向佛兰兹·約瑟夫漂流的艰苦旅行。我們尝尽了許多令人难以置信的天灾人祸。我只想告訴您一点，就是我們一群人中，只有我一个人平安地（如果不算两条腿冻坏了的話）抵达弗罗拉海岬。塞多夫中尉探险队的帆船"圣·福嘉"号收容了我，并把我送到了阿尔汗格尔斯克。我总算是活下来了，不过，这样也許更糟糕，因为最近我就要动手术，手术以后，一切就只好靠蒼天保佑了。可是今后我没有腿怎样生活下去呢？我自己也不知道。以下就是我应該告訴您的。"圣·瑪丽亚"号还在喀拉海上就被冻住，自一九一三年十月便随着北极的冰山不停地向北移动。在我們离开时，这只船的緯度是82°55′。它静静地停在一片冰原上，或者，更确切一点說，自一九一三年秋，直到我离开为止，还停在那兒。今年它也許能解冻脫出，不过照我看来，等到明年，当它漂流到过去"佛兰姆"号解冻的地方，离开冰原的可能性就更大一些。留船人員的粮食还够用到明年十月或十一月。不管怎样吧，請您相信一点，我們之所以离船，并不是因为它的处境已經絕望了。当然，我必須执行船長的指示，但是，

① "頂牛"是一种骨牌游戏。——譯者注。

不瞞您說，他这次的指示也是符合我个人心願的。在我率領十三名水手离船的时候，伊万·李沃維奇托我带一件包裹給現已去世的水道測量局局长，带一封信給您。可是，現在就只剩下我一个人，为了珍惜这些說明自己行为正直的憑証，我不敢冒险經由邮局寄这个包裹和这封信，另外，我在此住院的时間最短也得三个月，因此，請您派专人或亲自来阿尔汗格尔斯克領取。我等待您的回信。謹致：
崇高的敬礼！

尊敬您的，准备为您效劳的远洋航海长

伊·克里莫夫

这封信的地址虽然已經被水泡得看不清了，但仍可以看出，这个地址是用同样又硬又直的笔法写在厚厚的，发黄的信封上的。

这封信对我来說，似乎成了一种祷告詞，——我每天晚上反复地念它，一直等到父亲回来。

父亲从碼头回来的时間很晚。現在每天都有輪船来，但是不象先前装載的是亚麻和粮食，而是一些沉甸甸的弹药箱和大炮零件。父亲是一个壮实的胖子，滿脸鬍鬚，戴着一頂呢制的小鴨舌帽，穿着一条防水布褲子。母亲总是唠唠叨叨說个不停，他却一声不响地吃飯，偶尔咳嗽两声，抹抹鬍子，然后就領着孩子——我和妹妹——上床去睡覚了。从他身上散发出一股大麻的气味，有时是苹果，粮食的气息，有时又是一种臭机器油味，我还記得，这种气味使我感到多么窒悶。

我記得好象就是在这一个不幸的晚上，我躺在父亲旁边，生来第一次有意識地估量着周围的一切。一間狹窄的小房子，低矮的天花板上面裱糊着报紙，窗下有一条很大的裂縫，从这兒透进来新鮮空气，吹进来河水的气息，这就是我們的家。地上放着两

只用麦秸装填起来的袋子，上面睡着一个披散着头发，肤色黑黝黝的漂亮的女人，这就是我的母亲。一双孩子的小脚伸在破烂被子的外面，这是我妹妹的脚。一个黑瘦的男孩，穿着一条肥大的裤子，打着哆嗦从床上爬下来，悄悄地走到院子里去，这就是我。

早就选好了一个适当的捉虾的地方，繩子也已經准备妥当，甚至引火的枯枝也在大缺口架起来了，現在只少一块臭肉就可以去捉大虾了。我們这条河的河底五顏六色，因此虾的顏色也各不相同——有黑的，有綠的，有黃的。这些虾可以用篝火引来，用小青蛙作釣餌，可是青虾只能用臭肉才釣得到；关于这一点，所有的小孩都是深信不疑的。昨天，总算是走运：我从媽媽那兒弄来一块肉，将它放在太阳下晒了整整一天。現在，甚至用不着拿手去摸，就可以断定它已經腐烂了……

我沿着河边迅速地跑到大缺口，那兒架着生火的枯枝。远处可以望見两个炮楼；河这岸是波克洛夫炮楼，河那岸是斯巴塞炮楼。战爭开始后，斯巴塞炮楼里修建了一座軍用皮革仓庫。彼其加・司考伏罗得尼可夫証据确凿地說，斯巴塞炮楼里从前有鬼，而且他亲眼看見它們从河对岸摆渡到我們这边来，过河后，凿沉了渡船，就到波克洛夫炮楼里住下了。他还說，鬼怪們都喜欢抽烟，喝酒，头是尖的，由于它們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所以很多都是跛子。近来在波克洛夫炮楼里鬼怪越来越多了，每逢晴朗的日子，就跑到河边来偷漁夫系在漁网上供水神的烟草。

总而言之，当我吹着微弱的篝火，看見围墙缺口处有一条細瘦的黑影时，我并沒有感到特别惊訝。

“小鬼，你在这兒干什么？”鬼怪完全和普通人一般地問我道。

縱使我当时能够說話，我也不会回答。我只是瞅着他，不住地打哆嗦。

这时，月亮从云端露出来，因此，可以看見河对岸繞着皮革仓庫走来走去的看守人。他是一个身材高大的胖子，背上的步枪向上面翘着。

“捉虾嗎？”

他輕巧地跳下来，坐到篝火旁边。

“你怎么不說話呢，傻瓜？”他厉声問道。

不对，他不是鬼！这是一个十分憔悴，沒有戴帽子的人，他拿着一根細手杖，不断地敲打着自己的脚。我沒有仔細看他的面貌，但是，我却发現他是光着身子穿了一件短上衣，只用一条围巾来代替衬衫。

“怎么啦，你不想同我談話嗎，賤胚子？”他用手杖戳了我一下。“喂，回答呀！回答呀！要不……。”

他沒有站起来，抓住我的脚，一把将我拖了过去。我不禁嚎叫起来。

“哎，原来你又聋又哑！”

他放开我，用手杖将炭火拨来拨去，坐了很久。

“好一座美丽的城市，”他又厌恶地說道，“家家院子里都有狗；警察都是些野兽。該死的吃虾鬼！”

他开始咒罵起来。

要是我当时能預知一个鐘头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縱然我一个字也告訴不了别人，我也会竭力記住他所說的話。他罵了很久，甚至咬牙切齿地对着篝火吐了一口唾沫。后来，他将脑袋往后一仰，抱着膝盖，沉默下来了。我瞧了他一眼；如果他不是那么討厌的話，也許我还会同情他呢。

突然，那人蹦了起来。几分鐘后，他已上了浮桥，——这座桥是不久以前兵士們架設的，——然后在河对岸一閃就不見了。

我的篝火熄灭了，不过，沒有火光我也看得很清楚，我已經釣了不少的虾，可是其中一只青色的也沒有，全是些最普通的，不大的黑虾，——这种虾在酒店里卖一戈比一对。

冷风从后面什么地方吹过来，直往褲脚筒里鑽，我开始感到寒气袭人。該回家了！当我最后一次投下挂着臭肉的釣綫时，我看見对岸的看守人沿着斜坡跑下来。斯巴塞炮楼高高地聳立在河上，从炮楼到河岸是一个滿布着石块的斜坡。皎洁的月光照射在斜坡上，一个人影也沒有，可是不知道为什么，看守人却一面跑着，一面把枪从肩上取了下来。

“站住！”

他沒有开枪，只是嘩啦一声扳动了一下枪栓。就在这刹那間，我看清了他在浮桥上所追赶的那个人。我之所以写得这样慎重，是因为到現在我还不敢肯定，他就是一小时前坐在我篝火旁边的那个人。可是我現在还仿佛看見这幅情景：靜靜的河岸，月光照耀着水面，反射出的一条蕩漾的光带，从我这兒一直伸展到浮桥下的駁船跟前，两条长长的黑影在浮桥上奔跑。

看守人跑得很吃力，甚至还停了一下，換了換气。不过跑在前面的人似乎更吃力，因为他突然在栏杆旁边坐下了。看守人跑到他跟前，突然叫了一声，身子往后一倒，——大概是冷不防被人从下面打了一下。可是他身子仍然靠在栏杆上，只是慢慢地滑了下去。这时，凶手已經隐沒在碉堡的围墙后面了。

不知道为什么这天夜里浮桥上竟沒有人巡邏；崗亭里空空的，周围沒有一个人，只有看守人側身躺着，两手向前伸着，在他身旁扔着一张很大的牛犢皮。我吓得打着寒战，走到他身前时，

只看見他緩緩地打了一个呵欠。过了若干年以后，我才知道，許多人在临死前都要打呵欠的。然后，他好象是輕松了一些似的，深深地吁了一口气。一切又归于沉寂。

我弯下腰看了看他，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就跑到崗亭上看看，——这时我才发現崗亭里沒有人，于是又回到看守人那兒。这时，我連喊都喊不出来了。这倒不是因为我那时候是个哑吧，而实在是因为吓坏了。就在这当兒，从岸上传来了人声，我連忙跑回原来捉虾的地方去；我从来也沒有跑得这么快，气都喘不过来了，甚至感到胸部作痛。我也来不及用草把虾盖住，等我跑到家里时，虾已丢掉了一半；这时哪里还顧得到虾呢！

我不声不响地把門微微推开，心兒剧烈地跳动着。在我家仅有的这一間房子里，黑洞洞的什么也看不見，大家都睡得很安稳，誰也沒注意到我出去和回来。又过了一会兒，我已經挨着父亲躺在原来的地方了，可是我許久不能入睡。在我眼前又出現了那座被月光照耀着的浮桥，和两条奔跑着的长长的黑影。

2 父　亲

第二天早晨，发生了两件令我十分懊丧的事。第一，是母亲发現了虾，并且把它們都煮熟了，因此我的二十戈比就宣告落空，买捕梭魚用的新釣鈎和假小魚① 的希望也化为泡影。第二，就是我的小刀子遺失了。其实，这把刀子原来是我父亲的，因为

① 是一种发光的金屬薄片，一般作魚形，下面带着魚鈎，引魚来吃魚餌，以便使魚上鈎。——譯者注。

刀刃坏了，父亲便将它贈送給了我。我在屋子里，院子里各处都找遍了，刀子竟象鑽到地底下去了一样，无影无踪了。

我这样直忙到十二点鐘該去碼头給父亲送午飯的时候。送午飯是我的职务，我感到十分光荣。

碼头現在是在河对岸，这边的河岸是一条两旁栽着菩提树的林蔭大道，这些菩提树一直到今天还是我們全城最喜爱的一种树。这一天，当我用一块包袱皮包着盛湯的小罐和一些土豆給父亲送去的时候，看見在这条林蔭大道上有許多为工人們搭的凉棚；在碉堡的围墙四周，象金字塔似地堆放着装粮食的草包和口袋；寬大的木板从駁船一直搭到岸上，搬运工人們不住地喊着："喂，小心点！"順着木板将滿載貨物的独輪車从船上推下来。我还記得碼头边那飄浮着一层五光十色油迹的河水，那磨損得很厉害的用来系纜繩的木桩，以及魚腥味、树脂味和草席味混杂在一起的气息。

我到碼头时，大家还在工作。有一輛独輪車陷在两块木板中間，从船上到岸上的交通頓时中断了。后面的人又吵又駡，两个推車工人伏在鉄棍上，用力想把陷下去的車子撬起来放回車轍中去。这时父亲不慌不忙地从他們身旁繞过来，說了一句什么話，弯下腰去……我永远都記得他当时的样子：圓圓的大脸上生着鬍子，肩膀寬闊，毫不費力地抬起那輛載重很大的独輪車。以后，我再也沒有看見他这样子了。

他一面吃着飯，一面老瞧着我，"怎么样，薩尼亚？"这时，碼头上出現了一个肥胖的警察长和三个警察。其中一人向"大叔"——大家都这样称呼工头——打了个招呼，对他說了几句話。"大叔"惊得啊哈一声，划了个十字，他們便一齐向我們走来。

“你是伊万·格利高里耶夫嗎？”警察长把馬刀按在背后，問道。

“是我。”

“把他抓起来！”警察长脸色涨得发紫，喊道，“他被逮捕了！”

大家騷嚷起来。父亲站起身，大家又沉靜下来。

“为什么？”

“你到我那兒去談吧！抓起来！”

警察走到父亲跟前，架住他的两只胳臂。父亲肩膀一挣，他們不禁倒退了好几步，一个警察連忙将馬刀抽出来。

“长官，这是怎么回事，”父亲問道，“为什么抓我？我又不是什么坏人，大伙兒都認識我。”

“不，老兄，大伙兒还不認識你哩，”警察长駁斥道，“你是强盗。抓起来！”

警察們又围攏到父亲跟前。

“你这个笨蛋，少用你那把臭刀来吓唬人吧，”父亲爱理不理地低声对那个抽出了馬刀来的人罵了一句。“长官，我是有家室的人，我在这个碼头上工作了二十年。我作过什么坏事嗎？請您告訴大家，讓大伙兒也知道知道，我究竟犯了什么罪被逮捕。要不然大家还以为我眞是强盗哩！”

“哼，你还装蒜充好人哩！”警察长喊道，“我还不認識你！哼！”

警士們似乎还在犹疑。

“喂！带走！”

“稍等一会兒，长官，我自己会走，”父亲說道。“薩尼亚……”他弯下腰跟我說道，“薩尼亚，快跑回去，告訴媽媽……

哎，我忘了你是……”

他想説我是个哑吧，但是又把話止住了。他从来不説哑吧这两个字，仿佛还希望我有一天能够説話。他沉默了一下，向周围看了看。

“伊万，待一会兒我带他回去，”工头説道，“你放心吧。”

“米沙大叔，劳駕去一下吧。还有……”父亲掏出三个卢布来交給工头，“請你轉交給她。好，再見了！”

大伙兒同声回答了他。

他撫摸着我的头，説道：

“不要哭，薩尼亚！”

不过，我自己还不知道我是在哭泣。

直到現在，当我回想起母亲知道父亲被逮走后的那种情形，还覚得恐怖。她沒有哭出来，可是“大叔”刚一走，她就坐到床上，紧咬着牙齿，使劲往墻上碰头。我和妹妹放声大哭起来，她連理也不理。她口里嘟嘟囔囔不知説了些什么話，不断地用头去撞墻壁。后来，她站起来，披上头巾便走出去了。

达莎阿姨替我們料理了一天家务。我們睡了，实际上只是妹妹在睡，我却睜着两眼躺在那兒想心思。首先是想到父亲，想他怎样和大伙兒告别。然后又想到那个肥胖的警察长，想到他那个穿水兵服的小兒子，我在省长花园里見过他，后来又想到他的三輪小脚踏車；唉，我要是有那么一輛小車就太好了！最后，当母亲回来时，我已經什么也不想了。她走进屋来，样子很悲切，消瘦了許多，这时达莎阿姨跑到她的跟前……

不知道为什么，我忽然好象覚得父亲已被警察砍死了。我一动不动地躺了好一会兒，悲伤得不省人事，他們在説什么我一个字也沒有听到。后来我才明白，父亲还活着，但是他們却不讓

母亲見他。母亲連說了三次，說父亲是因为杀人被逮捕的；夜里，看守人在浮桥上被杀害了。我当时就領会到，她所說的夜里——就是昨天晚上，看守人——就是那个看守人，浮桥——也就是那个看守人伸着两手躺在那兒的浮桥。我一下跳起来，扑到媽媽身上大声叫喊。她把我抱住；她一定是以为我吓坏了。然而我却是在“說話”……

如果我当时眞会說話該多好啊！

我想把所有的情形，原原本本地叙述出来：我怎样偷跑到沙河去捉虾，看見一个身份不明的人拿着一根棍子从碉堡围墙的缺口里走出来，他怎样咬牙切齿地駡，然后对着篝火吐了一口唾沫就走了。但是要一个勉强能含糊說出两三个字的八岁小孩来叙述这些事，这任务实在太艰巨了！

“孩子都給吓掉魂了，”达莎阿姨叹息道。这时我沉默了下来，望着母亲，心里想，現在一切都眞相大白了。

“不，他好象是有什么話要說。薩尼亚，你知道什么事嗎？”

唉！要是我会說話該多好啊！我重新开始講述，用手势比划……母亲一向比旁人更能了解我的意思，不过这一次我却完全失望地看到，就連她也一点都不懂得。也难怪呀，这个只穿着一件衬衫，急得在房里乱轉的黑瘦的孩子，他所企图描述的事多么不象在浮桥上发生的实际情景啊！他一会兒扑到床上，表示那天夜里父亲正在酣睡，一下又跳到椅子上，举起两只握紧的拳头，对着摸不清头脑的达莎阿姨。

最后，达莎阿姨給我划了个十字。

“街上那些淘气的孩子打了他。”

我搖搖头。

“他是在講父亲被捕的情形，”母亲說。“講警察怎样吓唬

他，对嗎，薩尼亚？”

我忍不住扑到她膝上放声大哭。她把我抱到床上，我躺了很久，听着她們談話，寻思着怎样才能把我这不平凡的秘密表达出来。

3 营　　救

要不是第二天母亲病了，我一定能設法把这件事表达出来。我一向覺得她是非常奇怪的人，但从来还沒有見过她象这次那么奇怪。

往常，当她突然在窗前一站几个鐘头，或是夜間从床上跳起来，只穿件衬衫通宵达旦地坐在桌前时，父亲就把她送回乡下的家里去休息几天，回来时就完全好了。現在父亲不在家，而且，即使現在眞送她到乡下去一趟，对她也不見得会有帮助！

她披散着头发，赤着脚站在門厅里，即使有人从她身旁走进屋子里去，她也不迴轉过头来看一下。她一直沉默着，只不过偶尔心神恍惚地說两三个字。

她仿佛是怕我似的。每当我“說話”时，她总是带着痛苦的样子掩住耳朵。她有时用手摸着眼睛，前額，似乎是在竭力回忆什么事。当达莎阿姨劝慰她时，她轉过脸来，皺着眉头，一声不响地用她那烏黑可怕的眼睛瞧着她……使得达莎阿姨不禁暗暗地划十字。

大概过了两个多星期，她的神智才清醒一些。虽然她还是精神恍惚，但已开始稍微說几句話，走到院子外面去，做些活兒了。現在，她愈来愈常說“营救”这两个字。这两个字最先是司

考伏罗得尼可夫老头兒說的，接着达莎阿姨也这么說，最后全院子里的人都这么說了。应該設法营救！我模模糊糊覚得，这两个字和塞尔吉耶夫大街"埃弗里克"玩具店里挂的鞭炮① 有着某种关系。

不过，很快我就了解到这完全是另一回事。

这一天，母亲領着我們——我和妹妹，带着上訴書到"法庭"去。"法庭"就在市場后面一座阴森的大厦里，前面立着高高的鉄栏杆。

我曾經有几次碰見职員在早晨去法庭上班。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会产生这么奇怪的想法，我总認为他們就留在法庭里，第二天清早，又是另一批职員去上班，到第三天再换另一批新的，每天如此。

在一条半明半暗，高高的走廊里，我和妹妹在一条鉄凳子上坐了許久。法院的工作人員手里拿着公文跑来跑去，房門砰砰地响着。后来媽媽回来了，牵着妹妹的手，我們就匆匆地走了。我們走进一間屋子，屋子中間被一道木栏墻隔开。虽然我沒有看見媽媽在和誰說話，对誰那么低三下四地行礼，但是我却听到一个人干澀的，冷冷的声音；使我大为惊訝的是，这个人所講的正是那全世界只有我一人能回答的秘密。

"格利高里耶夫·伊万……"这时，响起了翻动書頁的悉索声。"刑法第一千四百五十四条。預謀杀人。亲爱的，你还想說什么呢？"

"老爷，"母亲用一种生澀的，紧张的声調央求道，"他沒有罪，他从来也沒有杀过人。"

---

① 俄文"营救" хлопоты 和"鞭炮" хлопушка 两个詞很相似。——譯者注。

“这一点法庭会审理清楚的。”

我早就踮起脚尖，将脑袋向后仰得那么厉害，几乎头都要掉下了来似的，但我还是只能看見一只手；露在栏杆上面的手指又細又长，正拿着一副眼鏡在慢慢地摆弄。

“老爷，”母亲又說道，“我想給法院递一张呈子。我們全院的人都签了名。”

“呈子当然可以递，但要先交一卢布印花稅。”

“已經交过了，老爷。他們检到的不是他的刀子。”

刀子?!我乍听之下，还以为是听錯了。

“关于这一点，有被告自己的口供。”

“可能他的刀子已經丢了一个星期了……”

我从下面看到母亲的嘴唇在发抖。

“那早就該被人检去了，亲爱的！不过，法庭总会审問明白的。”

我再也沒有听見什么了。到这时我才恍然大悟，为什么他們逮捕了父亲。不是他，是我失落了这把刀子——这把已經用过很久的电工用的木柄刀子。这把刀子，就是惨案发生后的第二天我寻找了很久的刀子。这把刀子，可能是我在浮桥上弯腰瞧那看守人时，从我口袋里掉出来的。这把刀子，就是彼其加·司考伏罗得尼可夫用放大鏡聚光烙上了我的姓的那把刀子。

現在回忆起这些情节来的时候，我就知道当时那些坐在恩斯克法院阴暗大厅里，高高的栏杆后面的官老爷們，是根本不会相信我的話的，然而那个时候，我却不是这么想的！我愈想心里愈难受。就是說，因为我的过失，父亲被逮捕；因为我的过失，現在我們全家挨餓；因为我的过失，母亲将辛辛苦苦积蓄了一年才买来的呢大衣又卖掉了；因为我的过失，母亲不得不去法院，对那

个看不見的人，对那个用細长可怕的，干瘪的手指慢騰騰地摆弄着眼鏡的人，用那种生澀的声調談話，低三下四地行礼。

我从来还沒有象这次那么强烈地感到自己不会說話的痛苦。

4 乡　　下

最后一批木筏已經順着河流漂去。夜里，当我醒来时，再也看不到河上緩緩流动的小屋里閃閃的灯光了。河上空蕩蕩的，院子里空蕩蕩的，屋子里也是空蕩蕩的。

清晨，当我們还在睡覚的时候，母亲就去医院洗衣服了。我經常到司考伏罗得尼可夫家去，听那老头兒罵人。

他戴着一付鋼絲眼鏡，斑白的头发乱蓬蓬的。他坐在狹小阴暗的厨房里的一张矮皮凳上縫皮靴。他有时候縫皮靴，有时候織网，或者是用楊木来雕刻小鳥，小馬卖点錢。这种手艺叫作"閑扯淡"，他是从伏尔加学来的，他是那兒生的人。

他很喜爱我，——大約因为我是他談話的唯一对象，他从未听見这个对象反駁过他。他罵医生，罵官僚，罵商人。但被他罵得特别狠的是神父。

"凡人皆有死，可是一个人敢不敢因此而埋怨上帝呢？神父說：不敢。但是，我却說：敢！什么叫做埋怨？"

我不知道什么叫做埋怨。

"埋怨就是不滿意。可是，什么又叫不滿意呢？那就是你所希望得到的多于命中注定的。神父說：这可不行。为什么？"

我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你吃的是土里来的，到头来还要回到泥土里去’。”他苦笑着。

“可是泥土需要什么呢？它不需要比命中注定的更多的东西。”

我整天坐在他那兒。我什么都喜欢——无論是他說的那些莫名其妙的話，或是他那可怕的，使我听了不禁望着他出神的尖銳刺耳的笑声。

这样，不知不覺已是秋天了，前些日子成为我們家庭經济中的一項重要收入的大虾，現在也蟄伏在洞穴里，現在就是用小青蛙作餌它們也不来上鈎了。

我們开始餓飯，于是母亲最后决定将我和妹妹送到乡下去。

正由于上面已經說过的我那种出奇的呆气，所以，我也不大記得旅途的一切了。童年时期，我看什么东西和听什么話时都爱出神，对好多事情都不明白。最平凡的东西也会使我感到惊訝。我张着嘴惊訝地思索着眼前逐漸展开的世界……

这时我正出神地望着船上験票的小孩。两个星期以前有人称他明卡，他曾和司考伏罗得尼可夫·彼其加在我們院子里一起玩过击柱戏①。显然，他已經不認識我了。他穿着一件蓝上身，上面釘着海員服的鈕扣，戴着一頂綉有“海神”——船名——两个字的制帽，站在扶梯上，漫不經心地看着旅客。此外再沒有别的东西引起我的兴趣了。无論是那神秘的船长——兼舵机长，在舵机上方的那間小屋里可以看見他那张生着滿脸大胡子的脸，——还是机器发出的猛烈的喘息声，都沒有引起我的注意。明卡使我感到惊异，一路上，我目不轉睛地看着他。“海神”

① 击柱戏是俄国人常玩的一种游戏。玩时分两队人，用木捧击撞排成各种花样的小柱。——譯者注。

是一艘有名的輪船，我一直就渴望着能坐一坐这艘輪船。我們在河里游泳的时候，也常常希望它駛来，好乘势投入它所掀起的浪花中，被滚滚的波涛顚簸着多么好玩啊！可是現在什么都完蛋了。我象中了魔似的瞅着明卡，直到天色漸漸黑下来，直到兼舵机长的大鬍子船长用瘖啞的声音对着传声筒喊："停車，倒車"。船尾下面，河水翻起了滚滚的波浪，一个水手熟練地接过从船上撇給他的纜繩。

我从来沒有到过乡下，但是我知道父亲在乡下有一所房子，房子附近还有一个庄园！可是在我知道了"庄园"这两个字所指的，事实上只不过是一个野草丛生，中間长着几棵老苹果树的小菜园时，我是多么失望啊！

我的父亲繼承这份遺产时是十八岁。但是，他并沒在乡下居住，从那时候起，这所房子就空着沒有人住。这所房子旣然是父亲的，因此我覚得也应該象父亲那么肥壮結实。可是我完全想錯了！

这是一所矮小的房屋，不知什么时候被震歪了，現在还一直保持着傾斜的状态。这所房屋的屋頂是弯的，窗子全打破了，窗下的横木已經曲折了。俄罗斯式的爐子只是在我們沒生火以前看样子还不錯。几支被烟熏得漆黑的条凳順墻摆着，一个角落里挂着圣象，在那为煤烟熏黑了的象板上隐約地可以看出神灵的脸貌。

不管怎样吧，这終归是我們的家。于是我們打开行李，用麦秸装了草褥子，鑲好玻璃，就住下了。

但是母亲同我們在一起只住了三个星期左右，就又回城里去了。代她来照管我們的是我父亲的嬸娘，也就是我們的隔房奶奶彼得罗芙娜。虽然她长了些斑白的細鬍鬚，令人看不慣，但

她却是一位慈祥的老太太。不过倒楣的是她自己还需要人来服侍，真的，我和妹妹一个冬天都忙着照顧她，替她挑水，生爐子，幸而她那座比我們的稍好一点的小木房离我們不远。

这个冬天，我和妹妹很要好。她还沒有滿八岁。我們一家人的头发和皮肤都很黑，可是她却长得很白皙，生着一双淡蓝色的眼睛，卷曲的头发扎成小辮。我們一家人都不爱說話，特别是母亲，可是妹妹却是从早上一睜眼就說个不休。我从沒看見她哭过，但却可以为一点小事情就哈哈大笑起来。她和我都叫薩尼亚，我叫亚历山大，她叫亚历山得娜。达莎阿姨教她唱歌，因此每天晚上她都那么認眞地，尖着嗓子唱許多冗长的歌子，使人听来忍不住好笑。

她才七岁，但却多么善于料理家务啊！我們的家务事也很簡单：頂楼的一角放着土豆，另一角放着甜菜，白菜，洋葱和盐。面包是由我們自己到彼得罗芙娜家里去取。

我們两个孩子就这样住在这荒僻的，滿地积雪的乡村中一所空蕩蕩的木板房里。每天早上，我們踏出一条通往彼得罗芙娜家去的小路来。只是在夜間特别可怕：那样的寂靜，甚至可以听見輕微的落雪声，在这万籟俱寂的时分，寒风会突然在烟囱里叫嘯起来。

5 伊万·伊万內奇医生。我学說話

有一天，我們刚刚躺下，妹妹也刚刚住了嘴，——她总是要一直說到睡着了的时候为止。这时那种使人无限凄凉的寂靜来临了，随后寒风就在烟囱里咆哮起来，突然我听見有人在敲窗戶。

这是一个身材高大满脸翳鬚的人，穿着一件短皮袄，戴着一頂大耳风帽；他竟冻得那样厉害，在我点了灯，讓他进来时，連門都关不上了。我用手遮住灯光才看見他的鼻子都冻白了。他想把背包取下来，但是刚一弯腰，就突然坐在地板上了。

这人最初出現在我面前时就是这付模样兒，我現在能写这部小說也应該感謝这个人。他已經冻得半死，大概是爬到我們这兒来的。他坐在地板上，大声喘气，竭力把顫抖的手指放到口中。我开始給他脫短皮袄。他嘟嘟囔囔說了几句什么話，就側着身子倒下昏过去了。

我曾經看見母亲暈倒过一次，达莎阿姨对着她的嘴吹气。所以这一次我也如法炮制。我这位客人躺在暖爐旁边，虽然我拼命地对他吹气，以至把我自己都吹得头暈目眩了，但我这位客人还是躺着不动。最后，也不知道是什么力量救了他，不管怎样吧，他总算苏醒过来了，坐起来开始貪婪地烤火。他的鼻子的顏色也恢复正常了。当我倒給他一杯热水时，他甚至想試着笑一笑。

“孩子，这兒就只有你們俩嗎？”

薩尼亚刚說完：“就是我們俩”，他又呼呼睡去了。他居然能那么快就睡着，使我不免感到恐惧：莫不是死了吧？但他仿佛是回答我的疑虑似的，大声地打起鼾来。

他眞正苏醒过来是在第二天。当我醒来时，他和妹妹并排坐在暖炕上正在談話。妹妹已經知道他的名字叫伊万·伊万內奇，知道他迷了路，并且知道无論对誰也不要談他的事，否則他就会被人“抓去懲办”。說眞心話，我到現在也还不知道这句話的确切意思。不过，我記得，当时我和妹妹立刻就了解到有某种危险威胁着我們的客人，我們不約而同地决定：关于他的事，无

論如何不能向別人吐露一个字。自然，要我不說比起要薩尼亚不說来容易得多。

妹妹絮絮叨叨地講着，伊万·伊万內奇則将手垫在腿底下，坐在炕上静听。她把什么都說了：父亲被抓到监牢里去了；我們递了呈子；母亲把我們带到乡下来又进城去了；我是一个哑吧；彼得罗芙娜奶奶住在由井边数第二座房子里，她也有鬍子，只不过細少一些，而且是斑白的。

"啊，你們两个小宝貝兒，"伊万·伊万內奇輕捷地跳下暖炕，說道。

他的两眼烱烱有神，鬍鬚又黑又光。起先，我感到很奇怪，为什么他的手老是不閑着，做出許多不必要的动作，叫人覚得他就要把手伸到脑后去摸自己的耳朵，或者是去搔脚心似的。但很快我就对他习慣了。在談話的时候，他常突然随手抓起一件什么东西，象魔术家似的顚弄，或者是竪在手掌上。

第一天，他就給我們表演了許多有趣的玩意兒：他用火柴，树皮，葱头做了一个形似小猫的可笑的动物，用面包心做成一只小老鼠，小猫咪嗚咪嗚地叫着捕老鼠，活象眞猫一般。他还表演魔术：把表吞下去，再从袖子里掏出来。他还教会了我們用一根木签穿着土豆烤。总而言之，他在我們这兒住的这几天当中，我和妹妹都不感到寂寞。

"孩子們，我是个医生哩，"有一次，他这样說道。"你們誰有病？我立刻就可以治好。"

我們都很健康。村长的女兒有病，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他却不肯去治。

在这种情况下

我恐惧，害怕

那和尚告发
又将我把地獄下

他念完后就笑了起来。

我第一次从他那兒听見了詩歌。他仿照着土耳其人的姿势坐在火边，揚起眉头，象念詩一般地說着話，甚至唱起来，或者自言自語地低吟。

起初，他大概是很喜欢我什么事也不能問他，特别是在夜間，每当窗外軋軋的脚步声使他惊醒，他一連好久地躺在那兒，支着胳臂傾听的时候，或者是当他躲在頂楼上一直坐到天黑的时候，——过叶高里节①时，他就这样度过了一天，——或者是当他拒絕和彼得罗芙娜相識的时候。

但是过了两三天后，他就对我的不講話发生兴趣了。

"你为什么不說話呢？是不想說嗎？"

我默默地望着他。

"可是我告訴你，你应該說話。你既然听得見，那你就应該会說話。小弟弟，这是极少見的現象，你是个哑吧，但却什么都听得見。也許你是又聋又哑？"

我搖搖头。

"看，这就說明，你还是可以說話的嘛。"

他从背包里掏出了一些器具来。虽然这一天阳光很好，但他还是惋惜說光綫太弱了。随后他就把一件器具放到了我的耳朵里去，"耳朵正常，"他很滿意地說道，"和常人一样的耳朵。"

他走到屋角上去，低声說："傻瓜"。

"听得見嗎？"

① 叶高里节是每年的五月七日，按照俄国习俗，这一天人們都到郊外野游，类似中国的清明节。——譯者注。

我笑了。

“听得很清楚，和狗耳朵一样。”他对薩尼亚睞了睞眼，薩尼亚正大张着嘴望着我們。“听得清楚极了。亲爱的，你怎么不說話呢？”

他用两个手指夹住我的舌头往外拉得那么长，把我吓得哑着嗓子叫了起来。

“小弟弟，你的喉嚨太好了！跟夏里亚平①的喉嚨一样。眞不錯！”

他瞧了我一会兒。

“亲爱的，应該学习，”他很严肅地說道，“你能对自己說些什么話嗎，在心里說？”

他敲了敲我的前額。

“就是在脑子里說，明白嗎？”

我哼了一声，表示明白。

“喂，說出声来呢？你能說什么都說出声来吧。喂，說‘是’。”

我几乎什么也不能說。但是，总还是說了一声：

“是。”

“太好了！再来一次。”

我又說了一次。

“現在吹一下口哨。”

我吹了一下口哨。

“現在說‘烏’。”

我說了一声“烏”。

---

① 夏里亚平(1873—1938)，俄国的著名歌唱家。——譯者注。

“你这个懒家伙，原来如此！喂，跟着我說吧……”

他不知道，其实我在心里什么都說。毫无疑問，正因为如此，我才能这么清楚地記得前几年的事。但是，要从我这种无声的談話达到能够发出“叶”，“烏”，“呃”这些字母的声音，达到能够作出嘴唇，舌头，喉嚨所不熟悉的动作还很远，甚至最簡单的字音都会在我的喉嚨里卡住。我跟着他能够念出一些个别的声音来，主要的是母音，但是，要象他嘱咐我的那样，把这些声音联貫在一起，流暢地发出来，而不是“干嚎”，——这才是我的任务哩！

只有“耳朵”，“媽媽”，“爐板”三个詞一下就学会了，仿佛我曾在什么时候說过这几个詞，現在只要回想起来就成了。事实也正是这样：母亲常說，我两岁的时候就开始說話，可是自从害了一場什么病之后，就突然不說話了。

我的教师盖着短皮袄，把一个发亮的金屬东西放在草褥子下面，睡在地板上，我却翻来复去总也睡不着，一会兒喝水，一会兒从床上坐起来，望着冻上了各式花紋的窗戶。我在想一旦回家后，应該怎样同母亲和达莎阿姨說話。我回想起当我了解到自己不会說話，再不能說話时那頃刻間的情景：这是一个黄昏，母亲以为我睡着了，她脸色蒼白，身子挺得笔直，两条烏黑的辮子交义着搭在胸前，久久地望着我。那时，在我脑海里最初产生了那种前几年对我影响极坏的痛苦的思想：“我不如别人，我給她丢脸”。

幸福的感覚使我一直到黎明时还沒有睡着，我反复地念着“叶”，“烏”，“呃”。当薩尼亚叫醒我时，天已經大亮了。

“我都到奶奶那兒去了一趟啦，你还在睡覚，”她很快地說。“奶奶的小猫不見了，被穆耳加拖到鍋灶里去了。伊万·伊万

內奇在哪兒？”

草褥子仍然舖在地板上，还可以看出被压过的地方：头，肩膀，脚。但伊万·伊万內奇本人却不見了。他的背包是枕在头下的——背包也不見了。他盖的是短皮袄——短皮袄也不見了。

“伊万·伊万內奇！”

我們跑上頂楼，頂楼上一个人也沒有。

“眞的，我到奶奶家去时，他还在睡覚。我还瞅了他一眼，看見他正在睡，心想，我先去奶奶家一趟罢。薩尼卡，你看！”

桌上放着一根黑皮管，两端有两个小圓杯样的东西，一个扁而浅，比較大一些，另外一个稍稍小一点兒，但比較深一些。我們想起伊万·伊万內奇检查我的耳朵时，他曾經把这根皮管連同别的器具一块兒从背包里掏出来的。

他在哪兒呢？伊万·伊万內奇！……

此后，过了很多年。我在白令海上，在巴倫支海上飞行过。我到过西班牙。我观測过勒拿河及叶尼塞河流域間的地形。我始終都带着他掉在我們那兒的，也可能是留下作紀念的黑皮管，这不是迷信，而是由于对这个人的感恩。不久我就知道了，这原来是听診器，是医生用来診听肺部和心脏的一种极为普通的器具。可是在当时，这个听診器对我来說，就好象是伊万·伊万內奇本人，好象他的一言一动那么神秘和可爱。

“伊万·伊万內奇！”

他沒有告訴任何人，就这样失踪了，沒有下落了，离开了这兒。

我悲伤地走到院子里，围着屋子繞了一圈。脚印！他的脚印上已落上了一层薄薄的雪，这些脚印沒有經过旁边的大路，而是一直到田野里去的。脚印愈来愈稀，到一个小池塘边，在那条

娘兒們去冰窟窿洗衣服的小路上，漸漸消失了。

6 父亲的死。我不願意說話了

整个冬季我都在学說話。早上刚一醒，就高声念伊万·伊万內奇囑咐我每天要讀的那六个詞："母鷄"，"馬鞍"，"箱子"，"暴风雪，"喝酒"，"阿布拉木"①。这是多么艰难的事啊！妹妹說得多么好啊！跟妹妹的发音还差得多远啊！

但是我很有毅力。我每一天都要把这几个詞象念咒一样，反来复去地念上千把次，这几个詞大概对我很有帮助，作梦也梦見它們。我想象着有一个莫名其妙的人阿布拉木，他把母鷄放在箱子里，或是戴着礼帽从屋子里走出来，肩上扛着馬鞍。暴风雪，喝酒！

我的舌头不听从指揮，嘴唇也只能勉强动作。薩尼亚不由得常常要打趣我，我好多次都要揍她。夜間，我由于心情的苦悶常常惊醒，觉得不行了，再也学不会說話，永远都是一个残废人，就象有一次母亲說我的那样。但就在此时，我也試着說"残废"这个詞。我記得，最后还是說成功了，于是我幸福地重入梦乡。伊万·伊万內奇囑咐我，在学說話的时候，手不要动，才能改掉一般聋哑患者常有的那种习惯，而当时我的这个习惯已經很深了。因此我就把手插在口袋里，眼睛看着一件东西，看窗戶，看爐子，看水桶，一面响亮地，一个音节一个音节地讀这个詞。不知为什么，我总讀不好，直到現在我还常把重音讀錯……

① 阿布拉木是犹太人的名字。——譯者注。

有那么一天，我醒来后，沒有讀这六个神圣的单詞，这天是我一生中最痛苦的一天。

这一天，彼得罗芙娜很早就把我們叫醒了；单是这一件事就够奇怪了，因为，通常每天早上都不是她来叫醒我們，而是我們到她那兒去生爐子，烧开水。她拄着一根棍子咚咚地响着，走进屋里来，站在圣象前面。她嘟嘟囔囔了許久，不停地划着十字，然后招呼妹妹，吩咐她把灯点起来……

过了許多年后，我已經成年了，在一本兒童讀物里看見过一个老妖婆。这簡直就是彼得罗芙娜的化身：生着細鬍子，拱着背，拄着拐杖。不过，彼得罗芙娜是一个慈祥的老妖婆，在这一天……这天，她坐在凳子上，很沉重地叹着气，我甚至覚得泪珠兒正沿着她的鬍鬚滚下来。

“下来，薩尼卡！”她說道，“到我这兒来！”

我走近前去。

“你已經是大人了，薩尼卡。”她撫摸着我的头。“昨天你媽媽来信說伊万病了。”

她不住地哭泣。

“他在监獄里病得很厉害。他的头都肿了，还有脚。信上說，她还不知道他現在究竟是死是活。”

妹妹也失声哭起来了。

“有什么办法呢，这是老天爷的意思，”彼得罗芙娜說道，“天老爷的意思，”她带着憤恨的神情重說了一遍，重又抬起眼睛来望着圣象。

她仅仅說父亲病了，但是我傍晚在教堂里方才明白，父亲已經死了。这天傍晚，彼得罗芙娜带我們到教堂里去，說是讓我們去“求福”。

我虽然在乡下已經住了三个月，但是很奇怪，除了几个一起滑过雪的小孩之外，对誰也不認識。我因为自己不会說話觉得害臊，所以哪兒也不去。到現在，在这座教堂里，我才看到全村的人：一群和我們一样愁眉苦脸，默不作声，衣衫襤褸的妇女和老头。他們站立在幽暗的地方，只有前面，在神父拖着长声在那兒念經的地方才点着蜡烛。許多人在叹息，划着十字。

“主啊，慈悲吧，”神父无休止地重复着这句話。他口里冒着热气，手里拿着香爐不断地搖动，一縷青烟从香爐內升起。我仿佛觉得所有的人都和我一样，不是在祈祷，只是看着那香烟一縷縷地升起来，迴旋繚繞，向上飘去，向着蓝色的，結冰的窗戶飘去。这时我大約已經忘記了父亲。突然，彼得罗芙娜很生气地在我背上捅了一下——直到現在，我还不知道她为什么捅我，——这时我方才想起父亲，想到他已經死了。

因为他死了，所以大家在叹息，在祈祷；因为他死了，我和妹妹才站在这兒，站在教堂里阴暗的地方；因为他死了，彼得罗芙娜才那么火气地捅我；因为他死了，我們才在这兒“求福”。

彼得罗芙娜将妹妹带到她家去了，我一个人回到家中，也沒有点灯，独自坐了好久。奶奶为了招喜特意給我們送来的黑甲虫①，在冰冷的爐板上悉索作响。我一面吃着土豆，一面哭泣。

他死了，我再也見不着他了！他們正在把他从法院里抬出去，从我和母亲递呈子的那間屋子里抬出去……我一想到那冷冰冰的声音，和那只手指細长，干瘪的手慢騰騰地摆弄着眼鏡时，我就咬紧牙齿，停止了吃飯。等着瞧吧，我非跟你們算賬不可，

---

① 依照俄国人的迷信，黑甲虫出現在屋里是一种吉祥的征兆。——譯者注。

总有一天你也会向我打躬哈腰，那时，我也将同样回答你："亲爱的，法院会审問明白的……"他們正抬着棺材在走廊上走着，法院的工作人員拿着公文从旁边来回經过，誰也不去看，誰也不願意去看。只有达莎阿姨象个修道女似的披着长长的黑头巾从对面走来。她一面走，一面划十字，一面啜泣。我們站了下来，門边也有人站着，人們抬着棺材搖搖晃晃地放到地上……母亲弯着腰，我从下面看到她的嘴唇在顫动……

我一听到自己的声音便猛然惊醒了。大概我是在发烧，因为我說了一些毫不連貫的胡話，我罵自己，不知为什么，也罵母亲，并且記得还和伊万·伊万內奇談話，虽然我心里很清楚，知道他早已走了，甚至他的脚印也只在田野上保留了两天，后来就被积雪盖住了。

可是我說話了，說得旣响亮又清晰！我說話了，現在，我能够将那天晚上在浮桥上发生的事叙述出来了。我也能够証明那把刀子是我的，是在我弯下腰去看被害者时失落的。可是已經晚了！我这一生都赶不上了，現在一切都无济于事了！

我双手抱住头，躺在黑洞洞的屋子里。屋子里很冷，脚都冻僵了，可是我就这样一直躺到第二天早晨也沒有起来。我决意再也不說話了。为什么要說話呢？反正他已經死了，我再也見不着他了。

7 母　　亲

我不太記得二月革命的情形，在回到城里以前也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但是，記得当时我是把那种莫名其妙的激动，那些

难以理解的談話，和教会我說話的夜間客人联系在一起的。

每天晚上，当我一面用木签穿土豆的时候便会常常想起他，而且他对我是愈来愈神秘，愈来愈富有魅力了。他为什么这样突然失踪了呢？既沒有告别，也沒有說上哪兒去。他为什么要躲在頂楼上呢？为什么他不願意給村长的女兒曼卡治病，并且連彼得罗芙娜家也不去呢？現在他在哪兒呢？还会回来嗎？每当深夜我醒来时，便側耳諦听：有人敲窗戶嗎？是他嗎？沒有人敲。只有雪花輕柔地，以一种細微到几乎听不見的声音落在我們的房屋上，驟然間，寒风在烟囱里呼嘯起来。

关于他的事誰也沒有問起过我們。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相信現在一切定会不一样了。現在，他大約不必再躲在頂楼上了！現在，他大概也不会拒絕和彼得罗芙娜認識了！

我沒有注意春天是在什么时候結束，但是夏天却是从这么一天开始的：那天我們和媽媽从清早就在碼头上等候"海神"号輪船，后来，"海神"号鳴着汽笛，凶猛地开着倒車，停泊在碼头边了。

明卡戴着一頂有金字的帽子，穿着一件相当破旧的短上衣，跟往常一样站在扶梯上，神气十足而又滿不在意地不时瞟一瞟旅客。大髯子船长兼舵机长对着传声筒瘖哑地喊着："停車！向前！"和"停車！倒車！"甲板神秘地顫动着。我們要回城里去。今天母亲来接我們回家。她近来消瘦了，显得年輕了一些，穿着一件新外衣，戴着一条新的花头巾。

在这个冬天里我常常想，当她听見我說話时，将要怎样惊奇。然而她只拥抱了我一下，笑了笑而已。她这一冬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我从她臉上那种生动的表情一下子就看出来了。她一会兒默默地暗自伤心，一会兒又抿着嘴微笑。彼得罗芙娜

認为她是在发神經，有一次，她长叹了一声問起母亲，母亲笑了笑，說沒有的事。

彼得罗芙娜那时用树皮編鞋卖，有一天，我們到树林里去替她剝树皮。我永远都記得母亲这天的样子：烏黑的头发，健壮的身体，洁白的牙齿，头上戴着的花头巾，打了一个双十字結系在胸前。她弯着腰，敏捷地砍着小树，然后劈掉树枝，截去树根，一下子就把树皮剝下来了。她打算教我，但是毫无結果，我反而把手指割破了。

后来，我藏在灌木丛里，坐在地上沉思了很久，傾听着鳥兒啾啾爭鳴，我不时看母亲一眼，她正好背向我，越走离我越远。突然她唱起了歌：

貨郎来在后門外。
我卖了小馬，买香粉；
我卖了小牛，买胭脂；
我卖了奶桶，买眉笔。

太阳照射着灌木丛，她挺着身子，脸兒緋紅，一双眼睛閃爍着亮光。这里面有些兒蹊蹺！

她很少当着我們回忆父亲。但是，每当她十分慈爱地同我談話时，我就知道，她是在思念着他。至于妹妹，她可向来就是喜欢的……

在輪船上，她总是在思索——蹙着眉，搖着头，——大概她心里是在和什么人拌嘴。我也在不断地思索：我想象着我将大搖大摆地在院子里散步，毫不在乎地突然說上一句什么話，仿佛我向来就会說話似的。我看河水看得入了神，打起瞌睡来了，梦中我吓得几乎沒了命，我好象覺得自己又成了哑吧。

“媽媽，”我低声叫道。

她沒有作声。

“媽媽！”我吓得叫喊起来。

她这才轉过头来……

我們回来后，我感到我們的院子十分荒凉，凄惨！这一年来，誰也沒有通过一次阴沟，每家人的台阶下面都汙积着漂浮着木屑的污水。几座低矮的庫房經过一个冬天越发傾斜了。篱笆上的窟窿大到可以坐着馬車穿过去。司考伏罗得尼可夫屋后臭气熏天的骨头，兽蹄和零零碎碎的生皮子堆成了山。

老头兒在熬胶水。他坐在原来的那张皮凳上，罩着围裙，戴着眼鏡。汽爐子放在爐板上，汽爐子上面是一个鉄桶，桶里发出一陣陣可怕的恶臭，我在他那兒坐着心里一直想呕。

“大伙兒都以为这是普通胶水，”半个鐘头以后，等我想出去呼吸点新鮮空气时，他对我說道，“可是这种胶水是万能的，它什么都能粘，鉄啦，玻璃啦；要是哪个傻瓜想粘砖头，那么砖头也能粘在一起。这是我发明的司考伏罗得尼可夫特制牛皮胶，愈臭得厉害，粘性愈大。”

他疑心地从眼鏡上面瞅了瞅我。

“司考伏罗得尼可夫特制牛皮胶，”他又說了一遍，叹了口气。“要是能再向誰借七个卢布作广告，一定会顧客盈門。乡巴佬在市上买水胶都要花四十戈比一磅。这叫什么呢？簡直是明搶明夺。来，你也講点什么吧！”

我講了一点。他贊許地点点头。

“唉！我眞是可怜伊万，”他說。

达莎阿姨当时不在家，过了約摸两个星期她才回来。只有她因为我突然会說話了，才感到那样的惊喜欲狂。傍晚，我們坐在厨房里。她不断地問我，問我們在乡下的生活情形，一边問，

一边自己回答。

“你們怎么样？可怜的宝貝，出来进去就是你們俩，一定悶坏了吧？誰給你們做飯？是彼得罗芙娜嗎？彼得罗芙娜。”

“不，不是彼得罗芙娜，”我突然說，“是我們自己做飯。”

我永远也不会忘記說这几个字时，达莎阿姨脸上的表情。她张着嘴，搖晃着头，好象什么东西塞在喉嚨里說不上話来。

“也不悶，”我哈哈大笑說。“就是想你，达莎阿姨。你怎么不来看我們呢，嗯？”

她一把将我抱住。

“我的亲爱的，你是怎么回事呀？会說話了？我的宝貝兒，会說話了！怎么不作声，还假装不說吶，嗳，看你！喂，講一講吧！”

于是，我就把敲我們家窗子的，冻僵了的医生講給她听，說我們怎样把他藏了三天三夜，他怎样教給我“叶”，“嗚”，“呃”这几个字母的发音，怎样强迫我說“耳朵”。

“薩尼亚，你应該为他祈祷，”达莎阿姨郑重其事地說道。“他叫什么名字？”

“伊万·伊万內奇。”

“祷告吧，每天晚上为他祷告！”

不过，我既不会祷告，也不喜欢祷告。

8 彼其加·司考伏罗得尼可夫

达莎阿姨說我会說話以后变了許多。我自己也有这样的感

外
4
二

觉。去年夏天我总是迴避着小伙伴們，由于自己生理缺陷而引起的沉重心情使我非常拘束。我那时有一种病态的羞怯，整日无精打彩，郁郁不乐。現在这一点恐怕很难令人相信了。

經过两三个月后，我就赶上了同輩的兒童。十二岁的彼其加·司考伏罗得尼可夫同我很要好。他是一个細长个兒，长着棕黃色头发的，很有主意的小孩。

我在彼其加那兒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書籍。这些書是“古代战爭中猎人的故事”，“尤利·米洛斯拉夫斯基”和“尺牍”。在“尺牍”的封面上画着一个留两撇小髭子的漂亮小伙子，他穿着大紅衬衫，拿着一管鵝毛笔，在他头上有一个淡青色的橢圓，里面画着一个仙女。

在閱讀这本“尺牍”时，我們就开始要好了。在“亲爱的朋友”或“阿·弗閣下”这些称呼中有着某种神秘味兒，于是我想起了远洋航海长的信，并且第一次将这封信讀出声来。

我們坐在教堂花园里；从这里可以看見对岸我們的院子和房屋，它們很小很小，比实际的要小得多。那是达莎阿姨細小的身影，她走到台阶上，坐在地上洗魚。我好象看到那銀白色的魚鱗剝落下来，閃閃发光，落在她的脚边。那不是卡尔魯沙从河边走过嗎，他是城里的疯子，他不停地忽兒皺眉，忽兒傻笑，然后在我們的大門边停下来，大約是和达莎阿姨攀談起来了。

我在念信的时候，一直望着他們。彼其加聚精会神地听着。

“有趣，”他説道。“我从前也知道这么回事，可是忘記了。后来怎么样了？”

“就写了这些。”

“有趣，不知道这只船后来怎么样啦。可能遇救了。你讀过尼克·卡特尔写的故事嗎？”

“沒有。”

“那个故事里面也有这么一件事。一个百万富翁被人扔到了蓄水池里。他猜出是怎么回事，便把水門关上。这时园丁正打算浇水，心想：为什么不来水呢？就在这最后一刹那間，富翁遇救了。否則，他必定淹死在那里面。你背得挺熟啊。念了很久了嗎？”

“不知道。”

“我現在讀一段东西，你能够重說一遍嗎？”

他讀道：

复信謝絕

塞·勒先生閣下：

辱承垂爱，实深感激。唯因种种緣因，碍难应命，凡此种种均与閣下无关，故不拟贅述。此頌

大安

某某拜启

注：如复信謝絕某事，应力求簡短明要，除必要的客套外，文中不应有与此无关之事。

我逐字把这封信連同附注重背了一遍。彼其加有点不大相信的样子摸了一下鼻梁。

“眞行！”他說，“再看这一段怎么样。”

他不停地一口气又念完了下面一段：

給他或她的信

我引一段別人的話来开始这封信：“我本想将往事忘怀，但我留恋那逝去的一切：其中有曇花一現的幸福，还有着我的欢乐和悲伤。”你知道嗎？在你身上我找到了我最珍貴的（应指出是什么）。没有比你更好，更珍貴，更可爱的了。在我看来，你象（应該指出象什么）一

般的可爱。我回想起第一次的眼泪和你在我手上的初吻。我沒有和你在一起已經两天了(应說明,是快乐,是寂寞,是很好;或者談一点兒家常瑣事)。再見吧,吻你。

我稍微有点兒結巴地把这封信也背完了。

"太棒啦!"彼其加惊叹道,"你真是好記性!"

可惜我們很少能这样好好地消度时光。彼其加有工作,他"替中国人卖烟卷";在我們城里把这項重活是这样称呼的。当时住在普克洛夫屯的中国人装紙烟筒①,雇佣許多小孩替他們卖。就是現在,我还清清楚楚記得那些中国人里面一位姓李的,他是一个小矮个兒,皮肤又黑又黄,脸上皺紋之多是少見的,但为人十分和气。一般都認为姓李的給的"招待費"比別的中国人要多一些。"招待費"就是我們(因为后来我也开始作这行买卖了)净挣的錢,因为实际上我們对所有的人都招待:"請抽烟吧!"不过,好心的顧客接受了招待,必定要付現鈔。这就是我們的錢。烟卷每二百五十枝装一盒,有"奶酪"、"亚历山大三世"等牌子,我們把这些烟卷拿到車站上,火車上或林蔭大道上去兜卖。

一九一七年的秋天来到了。假如我想使別人相信,說我看見,或者感覚到,或者哪怕是稍微理解到这段时期对我,对全国,以至对全世界有着多么深远的意义的話,那么我就是在吹牛皮。我什么也沒有看到,什么也不明白。我甚至已經忘記了春天在乡下所体驗到的,那种模模糊糊的兴奋激情。我只是单純地日复一日地生活着;卖烟卷,捉大虾,其中有黄的,有綠的,有灰的,只是青色的一次也沒有碰到过。

但是我那逍遙自在的生活很快就宣告結束了。

---

① 这是指将烟絲塡在已經装好的紙烟筒里。——譯者注。

9　一划，一划，一划，五划，二十划，一百划……

大概还在我們回到城里以前，他就經常到我們家里来。全院子的人都知道他。也象他在司考伏罗得尼可夫家和达莎阿姨那兒所遭遇到的一样，大伙兒都抱着一种不十分明显的嘲笑态度来对待他。現在他几乎每天必来，有时候还带点东西来，不过，說良心話，我从来沒有吃过他一个李子，一顆炒豆，一块夹心糖。

他生着卷曲的头发，向上卷成一个个小圓圈的鬍子，一张大肥脸，只是身材还相当匀整。他那低浊的声音我認为实在是令人恶心。他正在治疗在他那烏黑的皮肤上非常显眼的粉刺。然而遺憾的是，母亲就偏偏看上了他，看上了他的粉刺，卷毛和沉浊得令人恶心的声音；若不是这样，他能这样每天到我們家里来嗎？是的，她看中了他。她在他面前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有說有笑，甚至也开始象他那样又臭又长地談話。有一次，我看見她独自坐在那兒微笑，我从她的脸上就猜到了她是在想他。还有一次，她和达莎阿姨談話，提到某人时說道："反常現象不胜枚举"。这是他常說的話。

他姓鉄木什金，但是不知为什么，他管自己叫卡耶尔① ·庫里。直到現在，我也不明白他这样作的用意何在。我只記得他喜欢对母亲說，"在生活中他是一个可怜的小丑"，"他象一片木屑受着生活的顚簸"。

---

① 卡耶尔即丑角的意思。——譯者注。

在說这話的时候，他作出一副含意深长的面孔，呆头呆脑，若有所思的样子瞧着母亲。

就是这个小丑現在每天晚上到我們家里来。有一天晚上是这样的。

厨房里的灯挂在墙上，我的蓬松的头影正好遮住練习本，墨水瓶和写字的一只手；这只手正費劲地在紙上移动着，鋼笔尖微弱地发出刷刷的声音。

我坐在桌边描笔划，由于用劲的关系，舌头頂着腮帮在描笔划；一划，又一划，三划，一百划，一千划。我描了不下一百万划，因为我的这位先生断定說，若是笔划“不吹直”①，絕对不能学下去。他坐在我身旁教导我，时而表示出一种不求全責备的样子瞧瞧母亲。他不仅教导我怎样写字，还要教导我怎样生活，他用一些无穷无尽的混蛋論調把我攪得头昏脑胀，所以我描出来的笔划大肚子的，細尾巴的，应有尽有，但就是沒有直的，沒有“吹直”的。

“每一个人都想捞到一块肥肉，”他說，“每一个人出于本性也应該这样想。可是在他得到这样一块肥肉以后，能不能就說是滿足了呢，这还是一个問題！”

一划，一划，一划，五划，二十划，一百划……

“譬如說我吧，从小境遇就很苦。我絲毫也不能依賴母亲的劳力。相反，当我們家业衰敗，父亲又因为被控偷了人家的馬，而被判处监禁的时候，除了我再沒有旁的人能賺錢来养家糊口了。”

一划，一划，粗的，細的，弯弯扭扭的，两头尖的，五划，二十

① 卡耶尔·庫里把“垂直”錯說成了“吹直”。——譯者注。

划，一百划……

"最叫人伤心的是，父亲从监狱里回来后便开始酗酒；一个人喝酒喝得越凶，他的家业也就越容易衰敗。后来催命鬼找上了門，沒有疑問，他是急病死的，因为他剝了一只死馬的皮，以后就突然死去了。"

我非常清楚我的这位先生的父亲死后的情形：他渾身浮肿，由于尸体較生前胀大了三倍，所以那副刚动工的棺材不得不赶忙重做。有一次我还梦見这种叫人恶心的死相……

一划，一划，一划……鋼笔尖刷刷地响着，一划，一个墨点……

"我們的祖房也空了。那时我才十一岁，可是我毫不悲观失望，也沒有仰仗母亲。"

我的先生盯着我。我那时仅十岁，坐在小凳上听到他这句話也感到心里很不是滋味。

"我到飯館里去打短工和跑堂，我从此再不依賴母亲挣錢，白吃飯了。"

毫无疑問，正是他这种出奇的表現手法給了我母亲一个极为强烈的印象。如果卡耶尔的話說得簡簡单单的，那么她一下子就会猜透他不过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一个愚蠢，懶惰而残酷的人。不过，关于他非常残酷这一点，不久之后母亲自己也認識到了。

母亲也坐在同一张桌前，仿佛着了迷似的听着他吹嘘。她在补衬衣；这是父亲的衬衣，我知道她是补給誰穿。我預感到要有什么灾禍发生，抬起眼睛来望着母亲蒼白的脸，望着她从中間对分的烏黑的头发，望着她的两只纖瘦的手。我又回头来描笔划……我很想在这一排笔划上加上即使一道长杠也好，那就会

成为一片絕妙的籬笆了。但是，这可不行呀！笔划必須“吹直”。

“可是我的母亲，”卡耶尔繼續說道，“竟然公开地作起善事来了。我当时怎样对付呢？我認識到这样对我的前途和发展无疑是不利的，所以就去找我永生不忘的尼基塔·朱耶夫舅舅，請他来开导开导她……”

关于他这位永生不忘的舅舅我已經听到不下一百次了；在我的想象中，这同样是一个长着滿脸粉刺的老胖子。他乘坐雪橇从乡下赶来，脫下黃皮袄，走进門来拍打拍打身上的雪花，向圣象划着十字。他把他母亲痛打了一頓，而小卡耶尔·庫里却站在一傍，冷眼看着别人打他的母亲。

一划，又一划……籬笆早已划成了，虽然我很清楚这样做会倒楣的，但是我仍然迅速地在籬笆上划了一个太阳，几只鳥兒和浮云。卡耶尔繼續講着，一面斜着眼睛看我，我慌忙用袖子遮掩太阳和小鳥兒。可是已經来不及了！他把我的練习本一把夺过去，竪着两道眉毛。我站在一边。

“阿克西尼亚·費多罗芙娜，您現在看看吧，看看您的宝貝兒子在干些什么！”

父亲在世的时候，我的母亲从来沒有打过孩子，这一次却揪住我的耳朵，按住我的头使劲往桌子上碰。

还有些晚上，我这位未来的繼父也偶而朗誦点东西，但是跟我和彼其加·司考伏罗得尼可夫在教堂花园里讀的迥然不同。卡耶尔念的老是那一本書：“豪杰日記摘录”。这本書的封面上印着一首詩：

看今朝，盖世英豪，
为保卫沙皇和祖国，
不惜血染沙場，

虽負五处重創，两处內伤，

但却狠狠地教訓了敌邦。

他讀这本書时那一脸教訓式的威胁的表情，就好象这位英勇的豪杰的一切不幸，其过都在于我似的。

我的課业从卡耶尔·庫里搬到我家来的那一天起就中止了。头一天晚上举行了結婚仪式。达莎阿姨借口生病沒有来。我記得在行婚礼时母亲打扮得艳丽而又可怕。她穿着一件剪毛鵝絨的白色上衣，这是新郎的礼物，头发梳得象个大姑娘似的，辮子交叉着盘在头上。她談話，喝酒，微笑，但有时带着一种奇怪的神情用手摸着脸。卡耶尔·庫里講了話，在講話中他把自己对这个穷苦家庭的功劳吹嘘了一通，他說"因为过去那个家长遺留下一个破烂的局面，所以这个家庭无疑地已走上毁灭的道路"，此外，他还提到他使我受到了"普通教育"，显然他对这个名詞的理解只限于"吹直"的笔划。

媽媽未必听了他这番講話。她低垂着眼挨新郎坐着，突然皺起眉头，神色茫然地直望着前方。

司考伏罗得尼可夫老头兒喝得醉醺醺的，走到她跟前，拍着她的肩膀，說道：

"嗳，阿克西尼亚，你又換了个……"

她慌忙地强笑了一笑。

結婚后，我的繼父在碼头管理处工作了約摸两个月。那时，我看到他回来把手脚一伸，一屁股坐在父亲过去坐的地方，使用父亲的湯匙和盘子吃飯时，虽然感到很难受，但总还可以躲着他，装聋作哑，或者待他睡后再回家去，这样勉强对付下去。但是，自从他因为某种不可告人的丑事被管理处撵出来以后，我的生活頓时就变得无法忍受了。他那顆糊塗的脑袋瓜里产生了一

个恶邪的念头——要专心致力于我們，就是我和妹妹的教育工作！从此我連一分鐘的自由时間都沒有了。

我現在想，他在年輕的时候一定当过奴才，要不然他施用到我和妹妹身上来的这一套可笑而又古怪的鬼把戏，是从哪里学来的呢！

他首先要我們每天早上去請安，虽然我們睡在地板上，离他的床不过两步远，但我們也只好去。可是任何力量也不能够强迫我說出"早安，爸爸"的話来。早上并不安，爸爸又非真爸爸。吃飯入坐的时候，不許比他先坐；要站起来的时候，須先經过他的允許。虽然母亲仍然和过去一样在医院里洗衣服，飯是用母亲和我掙来的錢由妹妹作的，可是我們还得向他道謝。我始終記得，当可怜的妹妹薩尼亚从桌旁站起来，按照他教导的那样很难看地屈膝行礼，第一次說"謝謝您，爸爸"的时候，我心里的那种憤不欲生的感覺，我恨不得将带着沒有吃完的稀飯的盘子对准他那张胖脸摔过去。直到今天，我还懊悔当时为什么沒有这样作……

我是多么恨他啊！我討厌他走路的样子，他的鼾声，他的头发，甚至还有他每天早上悶着劲兒亲自打磨的那双皮靴。每当夜間醒来时，我便憤恨地久久望着他那张熟睡中的胖脸。他沒有料想到自己是处在多么危险的境地。若不是达莎阿姨，我当时一定会将他杀死。

10　达莎阿姨

假如不是达莎阿姨那可爱的形象經常浮現在我眼前的話，

我也許根本不会去回忆这一段时間了。达莎阿姨——她是我初次有意識地去尊重和热爱的人。

我每次来到她家，虽是一句話也不說，但她就什么都明白了。她对我叙述她自己的一生經历来安慰我。我知道她还不到四十岁，感到非常惊訝！可是我总覚得她仿佛是我的亲祖母，特别是她每天晚上戴上眼鏡，讀那些被春潮冲到我們院子里来的别人的信件时（当时她还在讀这些信）。

她二十五岁时就守了寡：她的丈夫在日俄战爭开始时便牺牲了。在鋪着花边台布的橱櫃上，有两个浅蓝色，带螺旋花紋的玻璃花瓶，中間放着她丈夫的遺象。相片后面保存着一封信，自然，这封信我也是背得烂熟的。东西伯利亚第二十六步兵团行軍办公室通知达莎阿姨說，她的丈夫，曾因战功卓著膺获三級和四級战功勛章的列兵菲多尔·亚历山大洛維奇·菲得洛夫，在对日战爭中英勇殉国。英雄！很久以后，每当提到这两个字时，我似乎还看到一个头发剪得短短的，留着鬍鬚的男子，他坐在藤椅上，背后是白皚皚的雪山。

后来，有一个比她小十岁的演員爱上了她，但是，达莎阿姨并沒有再嫁。她拒絕了同他結婚。不过演員对她的爱情极为眞摯。他甚至放弃了剧团的工作，住到我們的城市里来。

虽然达莎阿姨用坚决的神情重复說了好几次，她拒絕他的求婚，但在当时，恐怕她也不反对他这种决心的。

她甚至还允許他永远留在我們城里，并且讓他到她家去玩。这是她最幸福的一段时期。难怪她現在談到这段时期时，还是眉飞色舞，似乎年輕了許多。

但是，不幸得很，这个演員出身于有錢的家庭，他的哥哥是彼得堡的一位大工程师，他出面来干涉这一段“姻緣”了。这是

达莎阿姨一生中最可怕的一天，这位工程师从彼得堡赶来，一开口就說給她五千卢布。

“我刚問他‘为什么？’时，眼泪就止不住流出来了。他一声不响地坐着抽烟，他的脸那么丰滿，鼻子上滿是血絲，領带上扣着一个鑽石別針。他突然說道：‘把我的兄弟还給我吧！（說到这里，达莎阿姨的声音开始抖起来。）把他还給我，您要什么都行。他还年輕，他有他的前程，他在这兒会毁灭的，省里不是他可呆的地方。假如您不忍讓我們年老的父亲因思念兒子而死去，假如您还有一点同情心的話，就請您还給我們兒子和兄弟吧。’我那时并不知道他說的全是謊話，事实上，他的父亲早死了。我当时只是哭个不停，因为我感覚到一切都完了。我們的爱情，我的生命和他的生命，一切都完了。”

这个工程师終于达到了自己的目的，达莎阿姨对他立下了千鈞重誓：在教堂里当着吉赫文①圣母象对他发誓，永不再見他的兄弟。她一直遵守着这一誓言。演員回彼得堡去了，但是沒过几天又回来了。无論他怎样哀求，哭泣，写什么样的信，所有这些都无济于事。达莎阿姨不願作一个违背誓言的人。她沒有回信，在街上碰見那个演員时，就閉起眼睛来，从旁边走过去。她再也沒去看过他。

只有那么一次，她允許他到她家里去，而且还是夜間摸着黑去的，这是为了不致破坏誓言。他們一直談到早晨，两人哭了一夜，到天刚一亮，就道別了，永远地离别了。“嗨，就这样我最后一次吻了他，我象是把整个的心都交給他了！……”

直到现在，我还不清楚这段恋爱故事中哪些是眞实的。达

① 地名，一五六〇年建成吉赫文僧院，成为教会区，現屬列宁格勒省一城市。——譯者注。

莎阿姨喜欢讀書，过了几年我重回恩斯克时，在她的藏書中发見了一本司湯达的“巴尔瑪修道院”。不过这也沒什么，司湯达所杜撰的故事，或者他听来的事，达莎阿姨也可能遭遇到呀。

难怪象她这样純朴的人也那么喜欢不平凡的故事。正象斯湯达的作品一样，在她的故事中，純朴和神秘并不彼此排斥，而是互相补充。不管怎样吧，我那时对这些事都深信不疑。所有这一切——演員的爱情也好，在圣象前的重誓也好，最后一次在黑暗中的幽会也好，我都認为是眞实的。

我上面說过，达莎阿姨还和过去一样繼續在讀那次春潮冲到我們院子里来的信件。

达莎阿姨每天晚上讀一封信，这似乎已經成了她生活中的一种仪式了。仪式的开始是达莎阿姨先按照信封上的住址揣測信的內容，但大多数信的地址都被水湿得完全看不清楚了。

然后，进行朗誦，只能說“进行”才恰当；她不慌不忙地，长吁短叹地讀，碰上模糊不清楚的字时，就嘟嘟囔囔埋怨一通。达莎阿姨讀信时随他人的欢乐而欢乐，同情别人的悲伤，对有的人她加以責备，对有的人她加以贊揚。总而言之，这些信就好象是寄給她的一样。她讀書时也同样認眞。在“祖国”杂志附送的小册子里，登載着許多王公貴族的故事，她对这些人物的宫庭內幕和个人艳史都了若指掌，就好象这些王公貴族是住在隔壁院子里一般。

“可是列男爵，”她很生动地說道，“我早就知道他要遺弃苏珊夫人的。一口一个亲爱的，到末了，还不是——去你的！好，就是这么一个宝貝！”

当我为了躲避卡耶尔·庫里常到她家去消磨晚上的时候，她已經快讀完这些信了，剩下的不到十五封。其中的一封我应

該在这兒把它記下来。达莎阿姨不明白这封信的內容。但是，在那个时候，我就覺得这封信和远洋航海长的信有着某种联系。

下面就是这封信（头几行达莎阿姨認不出来了）：

……我懇求你一点：不要相信这个人！可以大胆这样說，我們的一切失敗都应归咎于他。举这样一件事实就足够說明的了，他在阿尔汗格尔斯克卖給我們六十条狗，其中大部分在新地島就不得不射杀掉。他这种亲屬的帮助使我們付出了多么大的代价！不只是我，全探险队的人都在咒罵他。我們这次去冒险，知道一定会遇到危险。但是我們并沒有料到会有这样的打击。現在只好尽我們的力量去作了。关于我們探险的情形，我可以对你談的实在太多了！这些故事足可以給卡秋什加講一个冬天。但是天哪！这需要付出多大的代价！我不願意使你想到我們的处境已經沒有希望了。不过你們也不要过份期待……

达莎阿姨結結巴巴地讀着，一面用教訓的神色透过眼鏡瞅我。我听着她讀。我当时沒有料到經过若干年之后，我会十分苦恼地去回忆这封信上的每一个字。

这封信很长，共有七、八頁，詳尽地叙述了船被冰山封住以后緩緩向北移动时的情形。使我特别惊訝的是連艙房里都結了冰，他們不得不每天早上用斧头去砍冰。

我虽然可以用自己的話来叙述水手司卡其可夫在猎熊时怎样掉进冰縫里跌死的，講一講大伙兒为了看护生病的輪机員提斯怎样累得疲憊不堪。但是我能逐字記住的只有上面引录的十来行文字。

达莎阿姨仍旧在讀，一面不住地叹息。宛如一幅幻灯画呈現在我的眼前：白色的帐篷搭在白茫茫的雪地上，一群狗喘吁吁地拖着雪橇；一个身材魁梧的巨人穿着长筒毛皮靴，戴着高氈帽，好象一个披着毛皮法衣的神父迎着雪橇走来……

有一次，我到达莎阿姨家去时，碰見她在流泪。她坐在橱櫃前哭泣，橱櫃上放着她的丈夫——日俄战争中的英雄的相片。她一看見我，便把头巾从头上摘了下来。

“他居然敢这样对待我，这个吸血鬼，滿嘴胡說白道的东西。”她向我說話时的那种憤慨，使我不免十分惊异。“就是这样欺侮我！你以为孤兒寡妇，就沒人保护了嗎？有的是哩！”

“达莎阿姨！”

“有的是哩！”她重复了一遍，又哭起来了。“我再也不能忍受了。我要走，走了就沒有事了，哪兒都能去！”

她坐到床上，脫掉皮鞋往地板上一甩。

“讓鬼把你抓了去吧！”她洋洋自得地說道。“就是你这老鬼，放清楚点！你配得上我嗎？这样的事絕对办不到。”

我明白她是在駡司考伏罗得尼可夫老头兒，因此我問她，究竟那老头兒干出了什么事。但她只是摆了摆手。

我那时就覚得，她自己也不太清楚他是不是欺負她。不管怎样吧，他总是对她說了点什么特殊的事兒，所以到晚上，达莎阿姨又披上她那块花边黑头巾，上邻院占卦的茨岡女人家里去了。

她若有所思的回来了，靜靜的，也不再咒駡司考伏罗得尼可夫老头兒了；反而突然自言自語地道：“他还是个不喝酒的人哩。”

这一奇怪的举动一直延續到第二天。达莎阿姨坐在院子里正織毛衣，这时門口出現了一个生人，紅脸膛，身上穿着一件肮脏的帆布大衣，脚上穿着一双厚皮靴子。他向四周围看了看，就对着正在台阶上熬万能胶的司考伏罗得尼可夫走去。

“請問，是您要卖房子嗎？”

司考伏罗得尼可夫看了看他，又看了看达莎阿姨。

“是我，”他回答道，“因为要离开此地，所以打算出卖房屋和全部家具。”

达莎阿姨激动得先是口里不住地嘟囔，猛一下站起来，把椅子都弄翻了，而且和昨天那样，从头上摘下了头巾。

“带地皮嗎？”

“带地皮，籬笆以內的都是。”

达莎阿姨嘟囔的声音越来越大了。

“不卖！”她突然高声嚷道。“这所房子不卖！請走吧！”

司考伏罗得尼可夫老头兒带着狡黠的神色閉起一只眼睛来。

“你是房主嗎？”穿帆布大衣的人赶忙問他道。

“我是。”

“那么怎么样；卖，还是不卖？”

“人家說不卖嘛，”司考伏罗得尼可夫很得意地說道，接着便哈哈大笑起来。

彼其加也在場。他站在厨房門边，輕蔑地冷笑了一声。我什么也不明白，但是不久之后，一切便都得到解释了。

11　和彼其加的談話

当我还在“吹直”的笔划上下功夫的时候，就有逃跑的打算了。我在籬笆上画太阳，小鳥，浮云并不是毫无打算的！后来，我又忘掉了这个念头。但是，我感到回家这事是一天比一天难堪了。

我和母亲几乎見不着面。早上她出去的时候，我还在睡覺。

我每次夜間醒来，有时看見她坐在桌边，因为过于劳累，她的脸色蒼白得象白粉一般，她在慢慢地吃晚飯，就是卡耶尔遇到她那烏黑的蹙眉凝視的眼睛时，也有些胆怯。

我很喜欢妹妹。但話又說回来了，要是我不那么喜欢她也許还好一些。記得有一次，坏蛋卡耶尔因为她洒了一小杯素油竟将她打得半死，把她从飯桌上赶走，但我偷偷地送了些土豆給她。她一边吃着，一边慟哭，突然想起了在挨打的时候，花玻璃片該不会丢掉了。玻璃片找着了，她又破涕为笑，吃完了土豆以后，她又放声哭了……

大概是秋天到了，所以我和彼其加才在教堂花园里閑溜躂，赤着脚踢落叶玩。我們坐在一座小山上，小山下面有一条古老的地道，彼其加撒謊，說这条地道从花园里穿过水底一直能通到河对岸，并且他自己有一次似乎都走到地道的半中腰了。

“我走了一夜，”彼其加煞有介事地說道。“在那里面，每一步都会遇到骷髏。”

从小土山这兒可以看見白色的波克洛夫修道院聳立在高高的河岸上。修道院被一道带瓦檐的低低的围墙围着，后面是一片草地。微风吹来，草地的顏色不断地变化，时而綠油油的，时而黄橙橙的，好象海洋一般。

不过，我和彼其加那时都很少想到大自然的美丽。我們趴在小山上，去吸吮一种极为苦澀的草莖，可是彼其加却偏說这草是甜的。

記得这次的談話是从談老鼠开始的：地道里有沒有老鼠？彼其加說，有，他亲眼見过，而且老鼠和蜜蜂一样，也有一个雌鼠王。

“每逢閏年它們都要死光，”他补充說，“不过雌鼠王照样繁

殖。她长得很大，象一个母兎。”

“你撒謊！”

“撒謊不是人，”彼其加滿不在乎地說道。

我們之間好象是有默契，对某些事可以撒謊，对某些事又不能撒謊。那时候我們还是小孩子，但已經能够互相尊重了。

“不过，在土耳其斯坦却沒有老鼠，”彼其加沉思地又补充說，“那兒有跳鼠，草原上有田鼠。不过这已經完全不是什么鼠了，因为它們同兎子差不多，吃的是青草。”

他常常談起土耳其斯坦，照他的話說来，这是一个城市，在这个城市里，梨树，苹果树，橘柑树就生长在大街上，可以随意采摘，想要多少就要多少，也絕对沒有人象咱們这兒果园里的园丁那样，你摘他两个果子吃，他就用大量盐粒作子弹往你背上射击。在那兒，人們露天睡在地毯上，因为那兒沒有冬天，只消穿一件单褂子，所以皮靴，大衣根本就用不着。

“那兒住的是土耳其人。他們全都有武器。弯馬刀是鍍銀的，腰間带着匕首，胸前挂着子弹带。我們到那兒去好嗎？”

我以为他是在开玩笑。但他这回并不是开玩笑。他的脸色变得有点兒白了。他突然轉过身去站起来，激动地望着远处的河岸。那兒一位熟識的漁翁正守着釣竿在打盹，釣竿插在紧靠水边的小石子里。我們沉默了一会兒。

“你爸爸呢？他能放你走嗎？”

“我才不去問他哩。他現在顧不得我了。”

“为什么？”

“因为他要結婚了，”彼其加輕蔑地說道。

我不禁大吃一惊。

“和誰？”

“和达莎阿姨。”

“胡說！”

“他对她說，假如她不肯嫁給他，他就要卖掉房子，自己挨村去替人补鍋。她起初不肯答应，可是后来还是同意了。还不就是爱上了他唄，”彼其加又輕蔑地添了一句，同时吐了一口唾沫。

我乍听他的話还不太相信。达莎阿姨！改嫁！嫁給司考伏罗得尼可夫老头兒？嫁給她自己曾經那么罵过的人？

“你怎么样？”

“关我啥事！”彼其加說道。

他显出很不高兴的样子，把話扯到别的問題上去了。两年前，他的母亲去世的时候，他哭得象个泪人兒似的，不顧一切地从院子里跑出去，跑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后来大家費了好大劲才把他找回来。我記得别的孩子还因为这件事打趣过他。

我們又談了一会兒，然后仰面朝天躺在地上，双手摊开，看着天空。彼其加一口咬定說，如果这样不眨眼地躺上二十来分鐘，那么白天也可以看見星星和月亮。于是我們就这样躺着看。天空晴朗，辽闊。高处，白云互相追逐着疾馳。我的眼里已經充滿了眼泪，但还是竭力忍耐着不眨眼。月亮仍然看不見，更不要說星星了，我立刻就明白了，这是彼其加瞎吹牛。

什么地方响起了隆隆的馬达声。起初我还以为是碼头上軍用卡車行駛的声音，因为碼头就在下面，在碉堡围墻下。但是隆隆的响声越来越近了。

“飞机！”彼其加嚷道。

一架飞机，灰白色的机身在太阳照耀下閃閃发光，好象是一只美丽的飞魚。飞机迎着风在飞行，白云向它涌去。

最初使我感到惊奇的是飞机越过浮云时那种轻松自在的姿态！转眼间，它已飞过了波克洛夫修道院，十字形的黑色投影紧随着它在河对岸草地上疾驰。飞机早已消逝得无影无踪了，可是我总觉得在那遥远的天边仿佛还可以看见它小巧的银灰色的机翼。

12 卡耶尔·库里在敢死营

彼其加有一个亲叔叔住在莫斯科，因此，我们的全盘计划都寄托在他这位叔叔身上。他叔叔在铁路上工作，彼其加肯定说他是司机，可是，我想他大概是司炉。因为过去彼其加一直称呼他是司炉的。这位司机兼司炉五年前就在莫斯科到塔什干线的火车上服务。我这样确切地说是五年，是因为他叔叔已经五年没有来信了。但是，彼其加说这没有什么关系，因为他叔叔向来就不爱写信，现在他还是在那条线的火车上工作，何况他最后的一封信是从萨马拉寄来的。我们一块儿看了看地图，的确，萨马拉正好在莫斯科和塔什干之间。

总而言之，只要找到这位叔叔就行了。彼其加知道他的地址。即使不知道地址，也随时可以根据姓名找到人。至于他姓什么，这一点我们丝毫没有怀疑，当然也是司考伏罗得尼可夫，和彼其加的姓完全相同。

在我们想象中，路程的后半段是这样的：只要他叔叔把我们安置在机车上从莫斯科带到塔什干就行了。可是怎样去莫斯科呢？

彼其加并没对我进行说服工作，只是板着面孔听我畏畏缩

縮地提出相反的意見。他沒有答理我，他一切都明白。但是，我只知道一点，要不是卡耶尔，我哪兒也不会去。而現在，卡耶尔突然要走了，只要他肯走，那我就可以留下来。

这是値得紀念的一天。他穿着一身軍服，一双嶄新发亮，走起路来咯吱咯吱发响的皮靴，歪戴着軍帽，一綹波浪式的卷发露在帽子外面。他回到家里，就将二百卢布往桌子上一摔。

在那个年代，二百卢布是一笔聞所未聞的款子，因此母亲情不自禁地流露出一种貪婪的神色，用手将这些錢捂住。

但是，使我和彼其加，以及全院的小孩感到惊訝的并不是金錢，完全不是！而是别的东西。那就是在他制服袖子上綉着一副骷髏的头骨，和两只交叉的脛骨。繼父参加了敢死营。

諸位讀者无疑已經記不得敢死营是怎么回事了。在那个时期，在各种大会上，在經常有人散步的地方，不論哪兒，只要人多的地方，往往会突然出現一个身背銅鼓的人。他一敲起銅鼓，大家就安靜下来。这时，另外一个人，多半是軍官，也象我繼父一样，袖子上綉着骷髏和脛骨的，便开始講話了。他代表临时政府邀請大家参加敢死营。虽然他再三强調說，报名参加的人除了能領旅差費外，每月还有六十卢布，外加制服一套，但是誰也不願替临时政府卖命，因此参加敢死营的人主要是那些同我繼父一样的地痞流氓。

但是这一天，当他穿着新制服，一臉严肃阴森的神色，拿着二百卢布回家时，誰也沒有感覚到他是一个流氓。甚至一向憎恨他的达莎阿姨也走了出来，很不自然地向他点了点头。

晚上，他邀請了一帮客人，还发表了演說。

"上級所規定下的一切規程，"他說道，"都有限制穷叫化子鬧革命的自由，因为这些穷叫化里面，絕大多数都是犹太人。他

們和布尔什維克正在进行卑鄙的投机活动，无疑問的，这将使得現时制度的一切成果蒙受灾难。对于我們——自由的捍卫者說来，解决这个慘局的办法很簡单。把武器拿在自己手里，使那些为了个人目的爭权夺利，侵害革命和自由的人倒楣！自由的代价是昂貴的，我們決不将自由廉价出售！这就是目下时局的概况。”

母亲这天晚上显得十分快乐。她穿着一件非常合身的天鵝絨短上衣，拿着一瓶葡萄酒周旋于宾客之間，每干一杯之后便接着給大家又斟上。繼父的朋友，一个殷勤的矮胖子，也是敢死队員，他站起来，恭恭敬敬地請大家为母亲的健康干一杯。在繼父講話的时候，这个矮胖子真誠地笑着，可是这时，却一本正經起来，高举起一只滿斟着葡萄酒的高脚杯，同母亲碰了一下，簡短地說了一声“万岁！”

大家跟着喊“万岁”。她显出很不好意思的样子，脸上微微一紅，走到屋子中央，按照旧規矩深深地答了个礼。

“眞是个美人兒啦！”胖子高声說道。

随后，司考伏罗得尼可夫老头兒致答詞。他喝得醉醺醺的，因此說話中間常常停頓好久，这时大家都鴉雀无声。

“每一个人都应該懂得死的意义，”他声色俱厉地說道。“尤其是还有一些人，他們白白活在世上只知道醉生梦死，对于这样的人只有一条路，那就是参加你們的敢死营。但是，象我这样的人，却休想用白面包来引誘我。这話怎講呢？因为我不願意为你們的‘自由’去卖命。你們的自由——就是作买卖。你們的敢死营——同样也是作买卖。为了二百卢布出卖自己的性命。对不住，要是我不死怎么办呢？是不是还把錢交回去？”

他还講了些关于資本家部长的事，就坐下了。繼父趕紧筝

头走到他身前。这个欢乐的日子眼看着要很不愉快地結束……但是那个矮胖子（在听老头兒致答詞的时候，他也是那么眞誠地笑着）赶忙跳起来，搶到他們两人的中間。当他劝解繼父的时候，司考伏罗得尼可夫故意踩得皮鞋得得作响地走出去了。

这么一来，这个欢乐的日子也就灰溜溜地收場了。

13 送　葬

大約是在深夜三点鐘，我早已睡着了，突然被一声尖叫惊醒。烟草的青烟凝聚在桌子上空，一动也不动。大家早已走散了，繼父摊开手脚睡在地板上。尖叫声又重复了一次，我分辨出这是达莎阿姨的声音，我急忙跑到窗前去。一个女人躺在院子里，达莎阿姨正对着她的嘴大声吹气。

"达莎阿姨！"

达莎阿姨仿佛沒有听見我在喊她，不知为什么跳起来繞着我們屋子跑了一圈兒，然后又敲起窗子来。

"彼得·伊万內奇！快拿水来！阿克西尼亚倒在这兒了！"

我急忙把門打开，她一进屋就去喊繼父。

"彼得·伊万內奇！嗳，看你呀，天哪！"繼父只是哼哼两声。"薩尼亚，应該把她抬到这兒来，她大概是在院里跌倒碰伤了。彼得·伊万內奇！"

繼父閉着眼睛坐起来，馬上又躺下去了。就这样，我們一直沒有能叫醒他。

我們通夜忙着照顧母亲，快到黎明的时候，她才苏醒过来。这虽說是一般的休克，但是在她跌倒时，头又碰到了一块石头

上，更不幸的是我們直到第二天傍晚才从医生口中知道这件事。医生囑咐放冰。但是大家都覺得花錢买冰是一件怪事，因此，达莎阿姨就决定用湿手巾来代替冰。

我还記得薩尼亚怎样哭着，一趟一趟地跑到院子里去，一边用手擦眼泪，一边往水桶里浸毛巾，然后再拿回来的情形。母亲安静地躺着，脸色和往常一样的蒼白。她一次也沒問起过繼父（他第二天就搬到他的敢死营去了）。然而却一步也不讓我們——我和妹妹——离开她。她老是想呕吐，老是眯縫着眼睛，好象是在用力仔細观看什么似的，不知道为什么，达莎阿姨非常不喜欢她这付样子。她一直病了三个星期，后来似乎已經开始好轉了，但沒想到又突然恶化了。

有一次，我天沒亮就醒来了，看見她坐在床上，两只光光的脚垂在地板上。

"媽媽！"

她紧蹙着眉头望了望我，于是我突然明白了，她看不見我。

"媽媽！媽媽！"

我想扶着她睡下，但是她总是带着那种一心在注意着什么似的严肃的表情，将我的手推开……

从这天开始，她絕食了。医生囑咐要强行喂她鷄蛋，奶油。这个建議当然很好，但是我們沒有錢，而城里旣沒有鷄蛋，也沒有奶油。

达莎阿姨急得直哭，罵她，可是母亲只是将黑辮子交叉放在胸上，漠不关心的，阴郁的躺着，一句話也不說。只有一次，达莎阿姨急得沒有办法說，她知道母亲为什么不吃飯，因为她不想活了，所以才不吃飯，这时母亲才喃喃地說了两句什么話，眉头一皺，便轉过身去了。

母亲自从生病以后，对我非常亲热，她疼爱我的程度甚至不下于疼爱薩尼亚。她常常很久很久地看着我；是那样专心一意，好象有点惊奇的样子。她在病倒以前从来沒有哭过，而現在却整天地哭。我懂得她为什么哭，她是在后悔以前不够爱我，懊悔自己忘記了父亲；还可能为了自己改嫁卡耶尔，为了他对我們的种种虐待而請求寬恕。但是一种茫然的感覚支配着我。我感到束手无策，我甚么也懶得作，甚么也沒有想。我們最后的一次“談話”是这样的：我們两人誰都沒有說一句話，她把我叫到她跟前，拉着我的手，搖着头，很吃力地抑制着她那顫抖的嘴唇，……我明白她是想和我告别，但是我却象块木头似的低着头站着，固执地望着脚下的地板。

第二天，母亲就死了……

繼父全副軍装，肩上背着一杆步枪，腰間挂着手榴弹，在門厅里号哭，但是不知为什么大家都不去理睬他……

我和妹妹坐在院子里，无論是誰，只要是来的人都要在我們身边停下，千篇一律地說道：“你們舍不得媽媽吧？”或者說：“現在，就剩下你們一对沒爹沒娘的孩子了嗎？”常到司考伏罗得尼可夫家玩“頂牛”的老太婆一到我們家就把門关起来，过了一会兒，她們象是洗了地板似的，挽着袖子，提着裙子把水桶提了出来，还有达莎阿姨为了什么“路签”跑来跑去，这是一套极为恐怖的仪式。我覚得只要这一套仪式不結束，我們就必須坐在院子里。我們就这样坐着，等待着。

过了許多年以后，当我讀到巴尔扎克說的“灾难可以使人的观察能力变得敏銳”这句話时，便立刻回忆起給母亲穿寿衣，入殮和殯葬的那些日子。无論是自己的，或者是旁人的一句話，一个动作，我都牢牢地記在心里。我明白为什么在第一天母亲躺

在桌上，叉着手捧着一个圣象时，大家当着她談話的声音那么低，后来声音却越来越大，最后就用通常的声調交談了。这是因为他們，司考伏罗得尼可夫，繼父，还有达莎阿姨，对于她的死已經习慣了！我也非常惊訝地覚察到連我自己也突然开始去想别的事情了。

难道我也习慣了么，难道我是在想那很久以前彼其加送給我的裝着鉛弹的骨球，由于母亲死了，我便无心去玩这个骨球了！于是，我立即怀着悔恨的心情强使自己去想念媽媽。

出殯那一天也是如此。

薩尼亚因为头痛，大家就把她留在家里了。繼父一早被召回敢死营，沒有赶上起灵，我們足足等了他两个鐘头，才跟着灵柩出发。这里所說的我們，就是司考伏罗得尼可夫老头兒、达莎阿姨和我三人。

他們跟在車后步行，达莎阿姨抓住車把，恐怕掉队。我則被安置在小車上。

回想起自己在路上的表現实在是慚愧。当熟識的小孩停下来，目送我們的行列經过，或者有人尾随着我們走上几分鐘，詢問我們葬的是誰时，我居然会有一种驕傲自得的感覚。但我馬上就責备起自己来。我們越走越远，对什么事情都漠不关心的馬車伕戴着一頂小帽，穿着一件肮脏的长衫，昏昏沉沉地不时吆喝着那匹瘦馬。这时我的思想真是天曉得又飞到哪兒去了，怕早已远远地离开这用一块破白布勉强盖着的棺材了。

走到城墙根了；城墙各处的缺口都有木板堵住，以免沒买票的人混进夏园里去。除了我和彼其加之外，誰也不知道倒数第二块木板可以挪开，只消把木板一挪开，你就可以暢暢快快地进花园玩了！想听音乐就听音乐，想折花就可以到花圃里偸偸摘

几朵紫罗兰，待散場后卖給听众，——五戈比一束！

走到士官学校大楼了；院子里停着滿載褥垫的大板車，許多不知是軍官，还是学員的人穿着灰色軍大衣，不知为了什么在忙着搬褥垫去堵塞二楼上的窗戶。走到阿房尼那山崗了，城里传說这是一座被掩埋的教堂，每逢复活节的夜晚，这兒还可以听到地下传出来的歌声。有人在阿房尼那山崗上走动，我定神看了看，原来是那些穿浅色軍大衣的人在堆积的树枝間时隐时現。

我頓时恍然大悟。我想到刚才在我們經过市場广場时，看到法院門前站着卫兵，鉄栏杆后面的花园里有一些身穿便衣的人匆匆忙忙地来回走着，其中有一个人还拖着一挺机关枪。商店都关着門，街上空蕩蕩的，走完了塞尔吉耶夫大街我們也沒有碰到一个人。发生了什么事情嗎？

穿着一身脏衣服的馬車伕不断地用鞭子抽打着馬兒，急急忙忙地赶路。达莎阿姨和司考伏罗得尼可夫老头兒勉强能跟得上。我們向着皮薩荒地（这是指近郊与市区之間一片空曠污秽的地方）走去，往前是一个陡坡，通到河岸，再往前是磨坊桥……远处不知是什么声音短促地响了一陣，車伕慌张地四面望了望，迟疑不决地举起鞭子。达莎阿姨追上了我們，破口駡道：

“你疯了嗎？这又不是运木头！”

“在打枪呀！”車伕滿肚子不高兴地說道。

通到河岸上去的陡坡已平出了一条道来，我們在上面走了几分鐘，可是两旁什么也沒有看到。有一个地方在放枪，但是枪声已經越来越稀了。我在那兒釣过好几次梭魚的磨坊桥已經在望。車伕突然欠了欠身，揮起鞭子来……馬兒撒腿便跑，我們沿着河岸飞也似地往前馳去，将司考伏罗得尼可夫和达莎阿姨远远地抛在后面了。

这大約是流弹，打在灵車的車輪上，頓时木屑四散飞迸，一块木屑正落在我的脸上。我用手扶着的一根雕花車桩松动了起来，吱吱軋軋地响个不停，突然間，一次猛烈的顚簸，車桩便掉到路上去了。我听見司考伏罗得尼可夫在后面叫喊，达莎阿姨用哭泣的声音在叫駡。

車伕往下拉了拉小帽，举起鞭子在头上搖着，赶着馬直往桥上跑，仿佛沒有看見桥头已被一堆木梁，木板，磚头堵塞住了似的。說时迟，那时快！馬兒被挡住了，它左冲右突地掙扎了几下，最后終于停下来了。

从木堆后面跑出一群人来，我認識其中一个排字工人。去年夏天，他曾經租过我們邻院算命女人的房間。他拿着一支步枪，穿着普通大衣，大衣外面系着一根样兒十分奇特的皮带，皮带上插着左輪枪。他們都有武器，有的还佩带着馬刀。

車伕下了車，扯了扯长衫，将馬鞭插在皮靴筒里，破口駡道：

“难道你們沒有看見人家在出殯嗎？差点兒把馬打死了！”

“我們沒有放枪呀，你是碰上士官生了，”排字工人辯解道。“你这个傻瓜，难道你沒有看見障碍物嗎？”

“你姓什么？”車伕嚷道。“你答复我吧！誰出錢修理？”他繞着灵車轉了几圈，一面摸着被打坏了的地方。“你們把我的車輻也打断了！”

“傻瓜，”排字工人又說道，“不是告訴了你，不是我們放的枪，我們朝棺材放枪干嗎？傻瓜！”

“孩子，葬的是誰呀？”一个戴着毛皮帽，帽上束着一条紅綠带当帽徽用的中年人輕声問我道。

“母亲，”我很吃力地回答道。

他摘下了毛皮帽，向大家招呼道：

“同志們，安靜些，这是出殯的。是一个小孩送母亲安葬。总之这样不大好。”

大家看了看我。大概当时我的脸色不太好，因为等一切都弄妥当了，达莎阿姨哭喊着追上我們，我們一块兒穿过磨坊往桥上走的时候，我发現在我的小褂口袋里多了两块白糖和一片白面包。

安葬以后，我們順着沙河彼岸疲憊不堪地回到家中。

这时城里火光冲天，是紅色雅尔斯克团的营房在燃燒。司考伏罗得尼可夫老头兒在浮桥边和一个他認識的守兵打了个招呼，便刺刺不休地談起来。他們談的什么我一点也不了解：某个地方的道路被誰破坏了，一个騎兵軍正向彼得格勒挺进，車站被敢死营占領了。“克倫斯基”的名字不断地提到。我强打起精神站着，达莎阿姨不停地呻吟和叹息。

我們回来时，妹妹已經睡着了。我沒有脫衣服，靠着她坐在床上。

不知道为什么，只留下我和妹妹两个人的第一个夜晚，达莎阿姨却沒有住在我們家里。她給我送来了稀飯，但是我并不想吃，因此她就把盘子放在窗台上了。放在窗台上，不是放在早晨媽媽躺过的桌子上。那是早晨，可是現在是夜晚啊。薩尼亚睡在媽媽的床上，就是那天媽媽額上放了一个圣象，手里拿着“路签”躺过的床上。那时我还不知道这一张卷成筒状的紙就叫路签。

我起身走到窗前。院子里一片漆黑，可是河上却被火光映得通紅，一股股黑烟夾着火苗升起来又熄灭了。

营房还在燃燒，不过它們在鉄路后面，离我們很远，完全是在另一边！我回想起母亲怎样拉着我的手，搖着头，竭力忍着不哭的情形。我为什么一句話也沒对她說呢？她当时是那么迫切

地等待着我，哪怕是說一个字也好哇。

外面大概是起风了，河里的小石子不断地滚到岸上来，雨也落起来了。在很长的一段时間里，我什么也不想，只注視着那沉重的大雨点沿着玻璃往下流，开始是慢慢地，后来就愈流愈快了。

我梦中覚得有人推开門，跑进屋子里来，脱下大衣扔在地板上。我一下子沒有覚察到这根本不是梦。原来是繼父正在滿屋乱轉，一边走一边脱去身上的制服。他呲牙咧嘴地往下脱，可是衣服粘在背上很不容易脱下来。他只穿了一条褲子，光着身子跑到他的箱子跟前，从里面掏出了一个背包来。

"彼得·伊万內奇！"

他瞟了我一眼，什么也沒回答。他渾身毛茸茸的，一身臭汗，匆匆忙忙把衣服从箱子里拿出来装到背包里去。他把被子卷起来，用一只膝盖压着捆上一条皮带。两片嘴唇不时恶狠狠地咧开，因此可以看見两排咬得紧紧的牙齿，又长又大，簡直是滿口獠牙。

他往身上一共穿了三件制服，第四件放在背包里。他大約是忘了我沒有睡着，要不然他从挂衣釘上将媽媽的天鹅絨上衣取下来放进背包里时，大概也会感到于心有愧的。

"彼得·伊万內奇！"

"住嘴！"他把头一揚，說道。"見他媽的鬼！"

他換好了鞋，穿上了大衣，突然看見袖子上的骷髏头和脛骨。他連咒带駡地又脱下大衣，用牙齿撕起骷髏头和脛骨来。他把背包背在肩上就跑了；从此一去十年，我沒有再見到这个人！他只是在地板上留下了一些污秽的痕迹，以及他用来装袖釦和花别針的一个"酸羊乳"牌空白鉄烟筒。

这一切到第二天就眞相大白了。革命軍事委員会宣布在城

里建立苏維埃政权。敢死营和义勇軍起来反对，最后都被打垮了。

14 逃跑。我没有睡，我假装在睡

不知道彼其加从哪兒听来的，說現在所有的鉄路都可以免費乘車了。大概是免費坐电車的流言传到他的耳朵里，就被渲染成这样了。

“成年人需要护照，”他确切地說道。“但是我們什么也不需要。”

他再也不沉默了。他劝我，刺激我，責备我胆小，輕蔑地嘲笑我。人世間无論发生什么事，都会使他的信心增强，使他深信我們一分鐘也不能耽擱，应該插翅飞到土耳其斯坦去。司考伏罗得尼可夫已公开宣布自己是布尔什維克，并且吩咐达莎阿姨把圣象拿掉。彼其加又馬上把这件事向他認为有利的一方面去解释，并且証明說，反正現在全院的人誰都不会有房子住了。

“老娘兒們恨不得咬他的肉，”他黯然說道。“我現在眞替他担心。”

革命軍事委員会命令搗毁所有的烧鍋①，把酒倒到沙河里去。这件事似乎也有助于我們的計划。

“非把魚全給醉死不可，”彼其加象个大人似的冷冷說道，“反正是一样，逼着大家自己釀私酒唄。不行，应該走！”

如果达莎阿姨和司考伏罗得尼可夫不在家庭会議上決定把我和妹妹薩尼亚送到保育院去的話，我自己也不知道彼其加最

① 土法釀酒的作坊。——譯者注。

后是否能說服我。达涉阿姨很能干，縫衬衫，作灯罩，样样都行。但是現在誰还要她的灯罩呢？在改嫁司考伏罗得尼可夫时，她可能还指望改善一下自己的經济状况。但是現在老头兒一心去搞政治活动，連自己的万能胶都放弃了，因此生活便干脆沒有着落了。

她含着眼泪說，以后每天都要去保育院看我們，只送我們去住一个冬天，等到夏天一定接回来。保育院里管吃管穿，还教我們念書。每人发一双新皮靴，两件衬衫，一件带帽子的大衣，还有袜子和衬褲。記得当时我还問过她：

"衬褲是什么？"

我們認識保育院里的一些孩子。他們个个脸色蒼白，穿着灰色夹克和皺得一塌糊塗的灰色褲子。他們善于用弹弓打鳥，然后在保育院花园里把打来的鳥烧熟大家分着吃。这也就是保育院里的所謂"管吃"！总之，他們都是些"小犯人"，我們还同他們打过架。現在，要我也去当"小犯人"嗎？

因此，当天我就去告訴了彼其加，說我同意他的計划。我們的錢很少，只有十个卢布。我們把母亲的皮鞋拿到破烂市上卖了十个卢布。一共是二十个卢布。我們十分小心地把被子从家里偸出来，但又同样小心地把它送了回去，因为我們要的价錢虽然很低，好象只要了四个半卢布，可是誰也不买。当我們抱着被子在市場上兜售时，不多不少又吃了四个半卢布。因此一共只剩下十五个半卢布了。

彼其加还打算拍卖他的旧書。幸亏沒有人买。我之所以說"幸亏"，是因为現在这些書都摆在我的藏書室里最显著的地方。不过有一本書，大約是"尤里·米罗斯拉夫斯基"还是卖掉了。因此一共有十六个卢布。

我們認为这些錢足够到达叔叔那兒。到那时候，就将开始最有趣兒，最美妙的火車生活了。記得当时最令我們焦灼不安和引起許多爭論的便是武装問題。彼其加有把芬兰刀，他管这把刀叫作匕首。我們用旧皮靴給匕首縫了个皮套。但是只携带一件不能开火的武器上路，这未免太不够味兒了。到哪兒去弄一支手枪呢？

我們曾一度希望革命軍事委員会发給我們每人一支左輪枪。后来我們断定大概不会給了，便到破烂市上去。說不定会有逃兵把武器卖給我們？

我們寻找了很久，終于找到了我們所需要的东西。

这是一支雕花木柄的大五輪手枪。的确是五輪的，我一点也沒說錯。五膛可以同时装弹，每射击一发，就得用手将枪輪轉动一次。毫无疑問，这是世界上最原始的手枪之一。后来我在博物館里曾經看到过这样的手枪。但是，当时我們非常喜欢这支枪。正因为是五个枪膛，才使我們感到稀奇。用这傢伙打响才过癮哩！卖这支手枪的不是逃兵，而是一位老将軍夫人，这一点也是使我們肃然起敬的。总之一句話，要不是在我們去取錢的当兒，将軍夫人和她的手枪一块兒不見了的話，那么我們的十六个卢布最后恐怕連三个半卢布也剩不下。

現在我才認識到，我們毕竟还是走运的。如果我們要眞买了这件武器，并且拿它来試驗試驗的話（我們連火藥都准备好了），那么，恐怕我們所走的路綫就不会是恩斯克——莫斯科——塔什干，而是从我們家里径直走进斯巴塞墓場里去了。

这样一来，我們就决定只用不能开火的武器了。

其余的一切事都完全办好了：皮鞋很結实，大衣完整无損，彼其加的大衣甚至还带着海狸皮的領子，每人两条褲子。

我在这一天很难过，达莎阿姨安慰了我好几次。可怜的达莎阿姨！要是她知道，我們之所以延期出走，只不过是在盘算她的烤餅时，她該怎样难过呀！明天，她就要送我和薩尼亚到保育院去了，因此她整天都在作烤餅，給我們带去吃。她烤了整整一天，不断地摘眼鏡，不断地擤鼻涕。

她要我遵守許多清規戒律：不偷东西，不抽烟，不闖禍，不偷懶，不酗酒，不罵人，不打架，簡直比新旧約全書中的戒律还要多。妹妹这时也十分忧郁，达莎阿姨送給她一条非常漂亮的，古色古香的絲带。

自然，我們这次完全可以直接了当地从家里跑掉，溜之大吉。可是彼其加却認为这太不够味兒了，因此他制訂了一个相当复杂的，神秘得使我大为惊异的計划。

第一，我們必須进行一次"友誼的歃血盟誓"。誓言如下：

"誰若违背这个神圣的誓言，除非是他能数清海里有多少沙粒，森林里有多少树叶，天上落下多少雨点兒，他永远也不会得到寬恕。要想往前，咒他向后；想要向左，咒他向右。誰若是破坏这个誓言，只要我把帽子往地上一摔，他立遭五雷击頂。奋斗，探求，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我們依次讀完了誓詞，互相握握手，随即把帽子摔在地上。这一切手續是出走的前一天在教堂花园里作的。誓詞我是背的，彼其加是照着紙上抄的念的。然后他用別針将手指刺破，蘸着血在紙上签了"彼·司"两个字，意思就是"彼得·司考伏罗得尼可夫"。我費了很大的劲才塗上了"亚·格"两个字，意思就是"亚历山大·格利高里耶夫"。

第二，我必須在十点鐘的时候躺下假装睡觉。其实，我是眞睡还是假睡，这一点誰也不会感觉兴趣。到深夜三点鐘的时候，

彼其加应該在窗下吹三声口哨。这是約定的暗号，意思是一切都妥当了，路上通行无阻，可以逃跑。

我們这样一搞，倒比在白天逃跑危险多了；因为白天才眞是一切妥当，路上通行无阻，而且誰也不会发覺我們逃跑了。同时，这时城市正处于戒严状态，警犬都松了鍊子，放在河边一带，夜間我們就很可能被巡夜的抓住。但是旣然彼其加这样命令，我也就只好服从。这天晚上来到了，这是我在自己家里度过的最后的一个晚上。

达莎阿姨坐在桌边給我补衬衣。保育院虽然也发內衣，但总还是多带一件以防万一的好！在她面前点着一盞灯，灯上盖着天蓝色的灯罩，这是媽媽結婚时达莎阿姨送的礼物。現在連这个灯罩也显露出一副局促不安的样子，——仿佛它在我們空蕩蕩的家中也不好受似的。屋角上黑洞洞的，茶壶挂在爐板上，可是照出来的影子却不象茶壶，倒象是什么人的一个倒悬的大鼻子。一股淸新凉气从窗戶下的縫隙中透进来，令人聞到了河上的气息。达莎阿姨边說边縫。在她伸手到桌上拿东西的时候，天花板上的光圈也就随着开始顫动起来。十点了。我开始假装睡覺。

“薩尼亚，你可要記住，什么事都得听哥哥的話，”达莎阿姨向妹妹說道。“你是个姑娘，应該依靠他。我們向来都是依靠男人的力量。他决不会讓你吃亏。”

我心里很难过，但是我尽量不去想薩尼亚。我是想我們到达莫斯科了！彼其加的叔叔在車站上接我們。他和司考伏罗得尼可夫老头兒很相象，只是年輕一些，活泼一些。机車停在很远的綫路上，一个烏黑的人正往鍋爐里加煤，火星从烟囱里冒出来，接着又熄灭了。我們疾馳前进，树木在一傍閃过，电話綫一起一伏地波动着。現在是我和彼其加在往鍋爐里加煤，热烘烘

的，快活得很；要是探头往車外一看，风就在耳边呼呼地响。

“你呢，薩尼亚，”达莎阿姨对我說，这时我看見眼泪从她眼鏡后面流下来，落到我的衬衣上，“也要爱护妹妹。你們将被分在不同的班里，不过我去請求他們准許你每天去看她。”

“好吧！达莎阿姨。”

“主啊，我的上帝！要是阿克西尼亚还活着該多好……”

她剔了剔油灯，穿上綫，叹了一口气，又开始工作了。

十点半了。我沒有睡，我假装在睡。我看見一片白花盛开的果树，在树蔭下，在朵朵鮮花的下面，舖着蓝色的，綠色的，淡青色的地毯。我們到了土耳其斯坦了。滿街都是橘子树。我們动手摘起橘子来，开始时只是偸偸地摘，往后胆子就愈来愈大了。沒有地方可以再装了，彼其加就从袋子里掏出两条备用的褲子来。他把褲口扎住，就往褲管里扔。有一个長鬍子老头兒把我們領到一間白色的小屋里去。墙上挂着各式武器——匕首，五輪手枪，鍍銀馬刀。“好嗎？”他問我們道，并且請我們每人选一柄匕首，一支手枪和一把馬刀。

“他們还能教会你們念書，写字，”我在睡梦中听到达莎阿姨在說話，心想：“她怎么会在这兒呢？”“說不定你还能作出一番大事业来。也許你还要来感謝我們啦。”

我沒有睡，我假装在睡！十一点半，十二点。达莎阿姨站了起来。这是我最后一次，最最后的一次看她那被灯光从下面照耀着的慈祥的面容了。她用手遮着灯罩，用口一吹，屋子里頓时漆黑了！她在黑暗中，为我們画了个十字就躺下了；她今天睡在我們家里。

不想睡覚而又假装睡覚的滋味多好哇！我使劲睜着眼睛。几点鐘了？到三点鐘还早着哩。河上飄来醉汉的歌声。河里的

小石子兒不断地冲到岸上来。可是总听不見暗号的声音，只有滴答滴答均匀的鐘摆声，以及达涉阿姨唉声叹气，躺在床上翻来复去的声音。

我恐怕真的睡着，便坐起来，将头放在膝盖上。我假装在睡觉。可是，这么一来，等我听見哨声时却怎样也醒不来了。

后来彼其加告訴我說，待我听到口哨声时，他簡直象茨崗人一样嗓子都吹哑了。但是在我穿鞋，穿大衣，往口袋里放烤餅的工夫，他一直在打口哨。他的样子很生气，莫名其妙地命令我把大衣領子提起来，我們就这样逃跑了。

一切經过都十分理想。誰也沒有来找我們的麻煩，旣沒有碰到狗，也沒有遇見人。不过，为防万一起見，我們沿着城墻多繞了三維尔斯特① 的路。路上我試探着問彼其加，他有沒有把握肯定現在所有的鉄路都可以免費乘車。他回答說是有把握，万一不行，我們可以躲在凳子下面坐到莫斯科。蹲两夜，就能到莫斯科，快車五点四十由这兒开出。

我們繞过崗哨，在距車站半維尔斯特的地方跳过栅栏，到五点四十分鐘的时候，站上却什么車也沒有。黑黝黝的，潮湿的鉄軌暗淡地发着光，搬道机上黃色的灯光暗淡地閃耀着。怎么办呢？在車站呆一夜嗎？不行，可能被崗哨抓走。回家嗎？

就在这时，一个滿面鬍鬚，渾身上下沾滿了机器油的接鈎工人从一列貨車下面爬出来，踏着枕木朝我們走来。

“大叔，”彼其加鼓起勇气，問他道，“从这兒去莫斯科怎样走——向左还是向右？”

接鈎工人看看他，又回头看看我。我不禁凉了半截，心想：“糟糕，他要送我們到軍事代表那兒去了。”

① 維尔斯特系俄里名称，一維尔斯特等于1.067公里。——譯者注。

"小家伙，上莫斯科去有五百维尔斯特呐。"

"大叔，你只要说，是往右还是往左吧？"

接钩工人笑了起来。

"往左去。"

"谢谢您，大叔。萨尼亚，往左走吧！"

15 奋斗，探求，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凡是躲在车座下面，几个月都不洗一次脸的十一、二岁的小旅行家所作的旅行，一般说来都是大同小异的。只要你看过几本描写流浪儿生活的书，就很容易相信这一点。因此我不准备来描写我们自恩斯克到莫斯科旅行的情形了。

达莎阿姨的七条戒律很快就被忘得一干二净。我们骂人，打架，抽烟，有时为了暖和一下身子，竟连干马粪也抽过。我们还撒谎：一会儿说我们的姑姑去奥伦堡买盐时，在路上把我们丢掉了，一会儿又说我们是去莫斯科投靠奶奶的难民。我们假装是两兄弟，这一着特别能感动人。我们不会唱歌，但我在火车上朗诵过远洋航海长的一封信。记得有一次在维什尼·瓦洛乔克车站，一个头发斑白，面貌却很年轻的海员还硬要我把这封信重背了两遍。

"真奇怪，"他用严峻的灰色眼睛直盯着我的脸，说道，"中尉塞多夫的探险队？真奇怪。"

但我们毕竟还没有沦落为流浪儿。我们象阿特拉斯船长一样不断前进（关于阿特拉斯船长的故事，彼其加对我讲得那么详尽，就连儒勒·凡尔纳① 本人也要点头称是）。我们前进，不只

是因为土耳其斯坦有面包，这儿没有；我们前进，是为了去发现一个新的国度——阳光普照的城市，自由的乐园。因为我们是彼此起了誓的。

这个誓言对我们起了多大的作用啊！

有一次快到旧露斯城时，我们走错了路，在森林中迷失了方向。我躺在雪地上闭着眼睛。彼其加用狼来吓唬我，骂我，甚至打我，但都不起作用。我一步也迈不动了。这时，他摘下帽子往雪地上一摔。

"萨尼卡，你是发过誓的，"他说道，"奋斗，探求，不达目的，誓不罢休。这么说，你现在甘心当一个违背誓言的人了？你自己说的——违背誓言的人永远得不到宽恕。"

我哭了，但还是站了起来。到了深夜我们才走到一个村庄，这个村庄里的人是信奉旧教的，不过有一个老婆婆还是收留了我们，给我们吃饭，甚至还给我们洗了一次澡。

就这样我们从一个村庄到一个村庄，从一个车站到一个车站，终于辗转来到了莫斯科。

一路上我们将自恩斯克带出来的东西差不多全部卖光，换光，吃光了。甚至连彼其加那柄用旧皮靴作的刀鞘套着的匕首也卖掉了，记得就只换了两块肉冻。

只有彼其加叔叔的地址，和我们用血签着"彼·司"及"亚·格"的宣誓书没有卖掉。

叔叔！我和彼其加谈他谈得太多了！最后，他在我的想象中成了一个机车神：胡须迎风飘着。烟囱里吐散着浓烟，水蒸汽从锅炉里向外喷射……

---

① 儒勒·凡尔纳(1828—1905)，著名的法国科学幻想小说作家。阿特拉斯是他著的"阿特拉斯船长历险记"一书中的主人公。——译者注。

終于到了莫斯科！在二月里一个严寒的夜間，我們蹲在火車的厕所里挨过了最后的一站路，就从厕所的窗戶里爬出来，跳到軌道上。这时一片漆黑，根本看不見莫斯科城是什么样子，其实我們对莫斯科也不感兴趣，它只不过就是莫斯科罢了，而叔叔却在莫斯科商业区第七机务段修車厂。我們在枕木間瞎轉了两个鐘头，交叉的路軌时而分开，时而汇合，把我們弄得暈头轉向。天快亮了，我們才找到第七机务段，这是一座阴森森的建筑物，有着許多黑洞洞的椭圓窗子，一扇高大的拱門，門上挂着一把大鎖。叔叔不在，甚至找不着人打听他的消息。到了早上，我們才从第七机务段委員会打听到他已經上前綫去了。

一切都完了！我們走出来坐在煤台上。

永别了，那长滿橘树的街市！永别了，那可以露宿的夜晚！永别了，腰刀和鍍銀的弯馬刀！

彼其加为了碰碰运气，又回到段务委員会去問叔叔結婚了沒有。沒有，叔叔是个单身汉。原来他从前住在車厢里，后来也就随着这个車厢上前綫去了。

天色已經大亮，现在可以看清楚莫斯科了：房子，成片的房子（我还以为这些都是車站哩），巨大的雪堆，稀稀落落的电車。再看又是房子，接連不断的房子。

怎么办呢？

最糟糕的日子就这样开始了。在这个期間，我們什么活兒都干过！我們在配給食物的行列中値过班。因为当时国家頒布了“义务劳动”法令，所以我們便被有錢的人雇去代他們清扫屋前便道上的积雪。我們打扫过教堂馬厩里的馬粪。我們曾經在門洞里，墓地上，頂楼上过夜。

突然間一切都变了样……

記得那次我們大概是順着教堂街走，心里只是想望着一件事：能在什么地方碰上一处火堆才好；那时候庫兹涅茨街經常有人生火。可是沒有，这次却沒有看見！有的只是积雪，黑暗，寂靜！严寒的夜晚。举目四顧，家家戶戶的大門都緊閉着。我們打着哆嗦，默默地走着。彼其加这回又該往地下摔帽子了！正在这时候，从我們刚走过去的門坎縫里传来了醉汉的声音。彼其加走进院子里去，我坐在道旁台阶上，冷得牙齿不住打战，把冻得发抖的手指放到嘴里去取暖。彼其加回来了。

“来吧！”他快乐地說。“答应了！”

16 第一次飞行

头上能有一块屋頂护庇着睡覚眞舒服呀！在零下二十度的严冬，偎着洋鉄爐，劈着柴拌兒往火上加，直加到烟囱里呼呼地响，这有多么幸福呵！但是，在我們称盐或称面时，一想到他們答应带我們去土耳其斯坦作为我們工作的代价时，心里可就更高兴了。我們这次是落在一帮残废投机商人的窝里。这个窝的老板是一个波兰瘸子，滿脸烫伤伤疤，他答应带我們去土耳其斯坦。这时我們才知道，原来这地方不是一个城，而是一个国家，首都是塔什干，也就是我們的这群残废者每隔两三星期就要去一趟的那个塔什干。

我們被这些无賴雇来包装食品。不給工薪，只管吃住。不过，就这样我們也很欢喜了。

要是沒有瘸子投机商人的老婆——老板娘的話，生活倒滿不錯的！我們对这位老板娘眞是討厌透了。

她是个胖婆娘，瞪着两只大眼睛，走起路来肚子不住地颤动，常常到我們包装食品的庫房里来檢查，看东西是否完整无損。

“呀呸！呀呸！你們怎么敢这样作！”

不管敢不敢吧，可是实际上，这活儿作起来可并不那么簡单，譬如称猪油时，連一小块也不准碰掉。方块糖常常会自己跑进衣袖和口袋里。但我們总还是忍耐着不动这些东西。嘿！如果我們早知道，反正我們看不到土耳其斯坦，就好象人看不到自己的耳朵一样，那么这老妖婆大概就会发現东西不够数了！

有一次，——这时我們在这个窩里工作已經两个多月了，——她只穿了一件罩衫跑来，手里拿着夜間鎖庫房的鎖，瞪着两只眼睛停在門口，东張西望，臉色慘白。

“不要打，也不要敲，”她低声說道，急忙把头抱住。“别叫嚷！不要作声！”

我們还沒有来得及弄清楚这是怎么一回事，只听見她沉重地喘着气，将庫房門插上閂，挂上鎖，就走了。

这件事来得这么突兀，所以我們起初也眞的一声沒有响。后来，彼其加忍不住叫罵起来，躺下睡在地板上。我也跟着躺下去。因为庫房門下面有一条窄縫，我們开始向外張望起来。

起初，外面一点儿声音也沒有；院子里空蕩蕩的，逐漸融化的雪地上留着一些积存着水的黄色脚印。后来，出現了許多穿着結实的黑靴子的生人：一双，两双，三双。这些脚穿过院子向厢房走去。其中的两双脚不見了，第三双脚站在台阶上，脚旁垂着枪托。

“抓人！”彼其加悄声說道，立即跳了起来。

黑暗中他的头撞了我一下，我把舌头咬痛了。但这时已經顧不得舌头了！

“应該逃跑！……”

如果这次我們带了繩子的話，說不定我的生活会循着完全另外一个途径演变。庫房里的繩子有的是，但我們上了頂楼以后，才想起繩子来。庫房是石头砌的，上面有頂楼，屋頂只有一个斜面，后墻上有一个向邻院开着的小窗口。

彼其加把头探到窗口外面，向周围看了看。当我們在黑暗中摸索着打开天花板的板盖时，彼其加不小心擦破了脸頰，这时他不断地用拳头去抹血。

“跳下去怎么样？”

不过要在五六公尺高，光溜溜的墻壁上，从一个不大的窗口里往外跳并不那么容易，这和往水里跳不同，那只消将头朝下就行了。而現在却要将两只脚先伸出去，坐好，使劲弯腰，再全身向后一挺，就落下去了。彼其加照这样作了。当我还在考慮是否要回去取一根繩子的时候，他已坐在小窗口上了，他扭不过头来，只說道：

“沒有关系，薩尼亚，胆大一点兒。”

接着他就不見了。我的心象掉下去了一样，赶忙跟过去，目送着他掉下去。沒有什么，籬笆在这个地方正好距仓庫很近，他幸运地落在籬笆那边一堆潮湿的雪上了。

“跳呀！”

我爬出窗口，把腿弯起来坐下。邻院的一切現在都一覽无遺：一个小姑娘順着古老的圓柱房子在滑芬兰式的小雪橇，一只烏鴉栖在排水管上。小姑娘停下来，好奇地看了看我們。烏鴉也看了看我們，但漠不关心地又掉过头，把头縮在翅膀下面了。

“跳呀！”

院子里除了小姑娘和烏鴉以外还有一个穿皮大衣的人。他

站在我們的厢房和另一家人的院子相連的地方。我看着他抽完了烟，扔掉烟头，便稳稳当当地向我們走来。

"跳呀！"彼其加着急地叫道。

我用两只手往后面輕輕地一推，周围的一切突然都动了起来。烏鴉振了振翅膀飞走了，小姑娘吓得往后打了个倒退，彼其加仓皇地向門外冲，穿皮大衣的人紧跟在他后面追。在这一霎那間，我全明白了。但是已經晚了，我飞一般地落下来了。

这就是我的第一次飞行，从五公尺的高处不用降落伞垂直下来的。我不能說这次飞行很成功。我的胸脯撞在篱笆上，刚一爬起来又跌倒了。我最后看到的情景是彼其加連蹦带跳地逃到了大街上去，砰地一声将篱笆門关上，险些兒碰着穿皮大衣的人的鼻子。

17 閑扯淡

既然我們什么錯誤也沒有犯而要逃跑，这自然是非常愚蠢的举动。我們自己并沒有投机倒把，只不过是在奸商家里干活兒。所以他們不会把我們怎样，頂多过过堂就放了。但是現在后悔已經晚了。穿皮大衣的人将我的手牢牢地抓住，我們这是往哪兒去，大概是进监獄吧。我虽然被捉住，可是彼其加却逃掉了。現在就剩下了我孤孤单单一个人。太阳西沉，眼看已是傍晚了，寒鴉在沿斯特拉斯大道的树木上空緩緩飞翔……虽然我沒有哭，但看脸色大概很泄气，所以那个穿皮大衣的人把我仔細打量了一番之后，就将手松开了：他知道我不会逃跑。

他将我带到了尼基塔門一座大厦，走进六层楼上一間寬敞

而明亮的大厅里。这是人民教育委員会的收容所，我在这兒度过了最值得紀念的三天……

当我看到屋里这些冻成了紫紅色的脸孔时，我的心都沉下去了。有些人蹲在泥爐旁边玩牌，有些人正在从很高的窗戶上拆窗檐木，拆下来立刻就投到火爐里去，还有几个人在睡覺，另有一些人却在用屋角上乱七八糟堆着的一些旧画框和旧画布搭房子。等到夜間，当收容所里比室外还冷时，这些房主就生着汽爐，收容那些願意进屋子里来的人；有的以两支烟卷作报酬，有的以一块面包为代价……在这間乱七八糟的房子中間，几个高高的台座上屹立着希腊神阿波罗，狄安娜，赫拉克勒斯的石膏象，他們用白色的盲人般的眼睛冷漠地凝視着。

只有这些希腊神的脸孔还象人脸。天亮以前，我冻醒了，牙齿不住地打战，我畏怯地不时瞧瞧神象。也許他們正在这样想：“傻瓜，唉，你这傻瓜！干嗎要从家里逃出来呢？你想想吧，住保育院春天就能回去，就可以帮帮家里老人們的忙，工作也能找到啊！可是現在就剩下你一个人了，你若是死了，誰也不会去想你的。只有彼其加踏遍莫斯科在找你，还有达莎阿姨沉重的叹息而已！老弟，还是請求发給衣服，快点飞回家去吧！”这时人民教育委員会里正在换衣服，把旧的烧掉，另发給衬褲和衬衣。許多流浪兒故意混进来，借机会把破烂的衣服换掉。

整整三天，我沒有說話。这对于一个才学会說話不久的兒童說来是一点也不困难的。而且去和誰說呢？每次送新的流浪兒进来时，我不由得就要看看其中有沒有我的彼其加。沒有。沒有也好！我坐在一旁，一句話也不說。

由于飢餓，寒冷和寂寞，我开始玩起泥人来了。在这間过去的繪画雕刻室里，有很多造型用的白色粘土。有一次，我拿了一

块来用开水泡开，放在手里捏来捏去。不知不覺忽然捏成了一只癩蛤蟆，我給它作了两个大鼻孔，和两只鼓出的眼睛。随后我又試着塑兎子。自然这个塑象作得还很不好。但当我猛然看到用这团不成形的粘土作成双叉的小兽头时，一个念头在我思想里閃了一下。我牢牢地記住了这一霎那：这时誰也沒有看見我在玩泥，一个不知走了什么运才落到收容所里来的慣賊，正津津有味地講他們怎样在車站上搞双人配合。我靠着窗子站着，屏住呼吸，看着这一小团翘起两个兎耳的泥块，我不明白为什么我感到十分激动……

后来，我又塑成了一匹鬃毛很粗但梳得整整齐齐的馬兒。“閑扯淡”！啊，司考伏罗得尼可夫老头兒的馬就是这个样子！这就是“閑扯淡”，不过这是用粘土而不是用木头作的。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新的发現使我高兴。我愉快地睡着了。我好象是期望着“閑扯淡”能拯救我，保佑我离开此地，帮助我找到彼其加，帮助我回到家里去，帮助他到土耳其斯坦。帮助在保育院里的妹妹，在火綫上的彼其加的叔叔，帮助那些夜晚还徘徊在飢寒交迫的莫斯科街头上的人們。我这样祈祷着，不是向上帝祈祷！不是！我是向用一张破报紙遮盖着放在窗台上晒干的癩蛤蟆，馬和兎子祈祷。

要是換另外一个小孩，不是象我这样不信神的人，也許就会成为一个偶象崇拜者，永远信奉癩蛤蟆，馬和兎子。因为它們帮助了我！

第二天，人民教育委員会的一个工作組到收容所里来了，于是收容所从此永远取消了。

盜犯被送进了监獄，无业游民送到了移民大队，乞丐就被遣散了。在繪画雕刻室这間寬敞的大厅里現在只留下阿波罗，狄

安娜，赫拉克勒斯几个希腊神象了。

"这是什么？"工作組的一个委員問道。这个委員大家簡称他作舒拉，是一个头发乱蓬蓬的，髯子也不刮的青年。"伊万·安德烈耶維奇，您看多好的塑象啊！"

伊万·安德烈耶維奇也是一个头发乱蓬蓬的，不刮髯子的人，只不过年龄大一些。他戴上夹鼻眼鏡，仔細研究起"閑扯淡"来了。

"典型的，謝尔吉耶夫鎮的俄罗斯小玩意兒，"他說道，"有趣。这是誰作的？是你嗎？"

"是我。"

"你姓什么？"

"格利高里耶夫·亚历山大。"

"想学习嗎？"

我瞧着他沒有回答。几个月来飢寒交迫的街头流浪生活大概把我折磨得够嗆，所以这时我的脸孔突然歪歪扭扭的变了相，眼泪，鼻涕一齐都流出来了。

"他想学习，"舒拉委員說道，"我們把他往哪兒送呢？伊万·安德烈耶維奇。"

"我看，把他送給尼古拉·安东內奇吧，"那人回答道，一面小心翼翼地把我的兎子放回窗台上。

"对！尼古拉·安东內奇是重艺术的。喂，格利高里耶夫·亚历山大，你願意去尼古拉·安东內奇那兒嗎？"

"舒拉，他还不認識尼古拉·安东內奇啦。最好記下来。格利高里耶夫·亚历山大……你几岁了？"

"十一岁。"

我多說了半岁。

“十一岁。写上了嗎？送到塔塔林諾夫那兒，到第四学校公社去。”

18 尼古拉·安东內奇

人民教育委員会一位有点兒象达莎阿姨的胖姑娘，把我一个人留在一間半暗的走廊形的屋子里，說是一会兒就回来，便走开了。这是衣帽間。空空的衣架仿佛是一些头上生角的瘦子，停立在敞开的衣橱中。順着墙全是一扇一扇的門。其中有一扇是玻璃門。自从离开恩斯克以后我还是第一次看見自己。竟然成了这样一副模样兒呀！一个脸色蒼白，圓脑袋上的头发剪得精光的小孩垂头丧气地望着我，他的个兒很小很小，比起我自己所想象的来瘦小得多。溜尖的鼻子，绷紧的嘴唇！在人民教育委員会的澡堂里，虽然他們用搓澡石給我擦洗过一次，但身上有些地方还留着斑斑点点的污垢。制服肥大得可以在我身上再繞一周，褲子长得拖到大皮靴下，每走一步路，脚都会滑到皮靴外面来。

胖姑娘回来了，我們便到尼古拉·安东內奇那兒去。这是一个脸色蒼白的胖子，禿头頂上几根稀疏的头发往后梳着。口里鑲有一顆金牙，閃閃发光，由于我的老毛病，所以一发現这顆金牙，就目不轉睛地对着它看起来。

我們等了相当久，因为尼古拉·安东內奇有事。他正在和一群十六岁上下的孩子談話，孩子們把他团团围住，爭先恐后地搶着說什么事。他一边听他們談話，一面活动着肥大的手指，我覚得这些手指很象一种毛虫——大概是卷心叶虫。他的样兒是那么不慌不忙，謙虛忠厚，神气十足……

“孩子們，安靜点，别一块兒說，”尼古拉·安东內奇說道。“喂，依果，你先說吧。”

他站起来，拥抱了一个戴眼鏡的黑皮肤的小孩，这个小孩长着鬈曲的头发，紅潤的脸庞，頰上和鼻子下面长着黑黑的汗毛。

“尼古拉·安东內奇，”依果的脸一紅，郑重地說道。“我們向列多夫实科中学提出抗議。我們决定参加十三联合社，同时提出抗議。要是伙食标准不变而成員却增加，这还成一个什么公社？柯拉布略夫說这次斗爭是为了稀飯。但是，我們却認为这是原則問題。如果我們代表公社，那么，我們就应該自己决定是不是吸收新社員。列多夫实科中学我們不能吸收。与其这样，那我們还不如吸收柏尔若佐夫斯卡雅女子中学。”

他說得那样激昂慷慨，仅仅在大家哄笑时，他才略微停頓一会兒。

“总而言之，我們坚决抗議柯拉布略夫的誣蔑，并且要求把这个問題提到校务委員会上去。”

“那你們就会成为少数了，”尼古拉·安东內奇反对說，同时向我們点了点头。

我們走上前去。

“流浪兒嗎？”

“不是。”

“人民教育委員会送来的，”胖姑娘解释說，一边将介紹信放在桌上。

“格利高里耶夫，你是从哪兒来的？”尼古拉·安东內奇一面看着介紹信，一面使人深为感动地問道。

“从恩斯克。”

“怎么会到莫斯科，到这兒来了呢？”

“路过，”我回答説。

“原来如此，亲爱的！那么，你是去哪兒呢？”

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什么話也沒有説。人們这样問过我已經不下一百次了：你是誰？往哪兒去？

“好吧，我們以后再談。”尼古拉·安东內奇在人民教育委員会給我的介紹信反面写了几个字。“你不会逃跑嗎？”

我相信，我一定要逃跑的。但是为了愼重起見，还是説：

“不会。”

我們走了出来。走到門口，我又回头看了看。依果一脸不耐煩的輕蔑的神情，在等待着我們談話結束，他很快地説着什么話，但是尼古拉·安东內奇沒有听他説話，只是若有所思地目送着我走出来。他在想什么呢？不过有一点可以相信：他万万沒有想到命运之神会附在这个滿头污垢，脚上穿着一双大得不着边兒的大皮靴，細瘦的脖子伸在制服外面的，面黃肌瘦的小孩身上；就在这一天，厄运降临到他头上来了。



第二部　应該好好想一想

1　听講故事

我什么打算也沒有，一心只惦着：“等到春暖立刻就走”。待严寒的冬天过去便远走高飞，兒童教养院里从此休想再見到我的影兒了！但是結果却完全两样，我并沒有逃跑。讀書这事把我留住了……

我們每天早晨去面包房取面包，然后学习。虽然我們当中某些人按年龄来說已經該上六年級了，可是我們还算是一年級。

教我們的是一位上了年紀的女教师塞拉菲瑪·彼得罗芙娜。她到学校来时，肩上总是挂着一个背包……說老实話，我甚至很难說出她究竟教了我們些什么东西。

記得有一課講水鴨，一下子就連上了三門課：地理，自然和

俄語。上自然課时，把水鴨当作一只鴨子来研究：它的翅膀什么样兒，蹼掌什么样，它怎样凫水等。上地理課时，就把水鴨当作地球上的一种生物来研究：要在地图上指出什么地方出产水鴨，什么地方不出产。上俄語課时，塞拉菲瑪·彼得罗芙娜就教我們写"水鴨"，并且念了布列姆[1]描写水鴨的作品。她順便告訴我們水鴨在德語中怎样說，在法語中又怎样說。似乎当时这就叫做"綜合教学法"。总之，一切都是出于"順便"。很可能是塞拉菲瑪·彼得罗芙娜把这种方法搞錯了。她是一个有些上了年紀的人，胸前用別針別着一个珍珠壳小怀表，所以我們回答問題时总是看几点鐘了。

可是每天晚上她都讀書給我們听。从她那兒我第一次听到伊万和阿辽露絲加的故事[2]。

烈日高照，

水井迢迢，

溽暑熏蒸，

汗如雨澆。

在那羊兒站立的地方，

湧現出清水湯湯。

使我特別惊奇的是阿利·巴巴和四十大盜的故事。"开門吧！蛇山！"許多年以后，我讀了"一千另一夜"的新譯本，发現原来"蛇山"应該讀作"西姆—西姆"，并且这是一种什么植物，大概是芝麻吧。这时我感到很扫兴。蛇山——这是一个絕妙的富有魔力的詞兒。在我知道了这只不过是什么芝麻的时候，我簡直

---

① 布列姆(1829—1884)，德国动物学家和旅行家。——譯者注。

② 伊万和阿辽露絲加是俄国童話中的兄妹，被妖怪作弄，阿辽露絲加因耐不住飢渴飲了水，而变成了一只小羊。——譯者注。

失望极了。

可以毫不夸张地这样說，我当时被这些故事深深地感动。我这时惟一的希望就是学会象塞拉菲瑪·彼得罗芙娜讀得那样好。

一般說来，我还很喜欢兒童教养院。这里面很暖和，不受风吹雨打，旣管吃飯，还教給念書，并且不寂寞，最低限度是不太寂寞。同学們待我都很好，——大概因为我个兒矮小的关系。

一来这兒，我就結識了两个小流氓，所以我們从沒有讓空閑的时間白白过去。

我的一个新朋友名叫罗馬什卡。他是一个干瘦的小孩，頂着一个大脑袋，脑袋上长着乱蓬蓬的野猫般的黄头发。他的鼻子是扁的，眼睛圓得极不自然，下顎是四方形，——这实在是一副十分可怕的，令人看了不起好感的嘴脸。我和他是由于猜字謎的关系交了朋友；我猜字謎很准，他对我这一点佩服得五体投地。

另外一个是瓦尔加·朱可夫。这是一个計划非常多，而人却很懶惰的小孩。他一会兒想到动物园去学习馴獅子的本領，一会兒又想去干消防队。到了面包房就想作面包师，从戏院里出来就坚决要当一个演員。尽管如此，但他也有一些很精彩的想法。

“那么，如果……”他沉思地說道。

“如果把地球凿穿，从那一边鑽出来，”罗馬什卡接上去挖苦他说。

“那么，如果……”

“如果把一个活老鼠一口吞下去……”

瓦尔加很喜欢狗。公园凱旋路一带的狗对他都很亲暱。

但是，瓦尔加終究只是瓦尔加，罗馬什卡只不过是罗馬什

卡，他們两个人比起彼其加来都差得太远了。

我无法說出不和彼其加在一起时，我感到多么的寂寞。

我走遍了从前我們流浪过的地方。我向許多流浪兒打听过他，我在收容所，兒童教养院里值过班，可总是沒有找着他。他是不是躲到国际列車的哪一个箱子里，跑到土耳其斯坦去了呢？他是不是离开了飢餓的莫斯科徒步回家去了呢？誰知道他呢？

只有在現在，从日复一日飘泊的生活中我才認識和爱上了莫斯科。它是神秘而庞大的，被积雪盖复着，被飢餓和战火籠罩着的一座都市。广場上挂有一幀地图，在庫尔斯克和哈尔可夫之間逼近莫斯科的地方，有一根系有小旗的絲綫从这里通过。摊販市場是长长一排低矮的，塗得花花綠綠的木板房子。未来派的艺术家在这些木板房的墻上画了一些奇奇怪怪的宣传画，画的是綠脸的人和塌了頂的教堂，在提維尔大街高大的围墻上也裝飾着这类宣传画。商店的玻璃窗上挂着俄罗斯通訊社的标語：

你吃吃鳳梨，

嚼嚼松鶏！

你的末日到了，

資产阶級！

这是我自个兒讀完的第一首詩。

2 学　　校

我在前面似乎已經提到过，照人民教育委員会的意見，我們的兒童教养院相当于一个培养少年天才的地方。人民教育委員会認为，我們在音乐，美术，文学方面的天才是超乎常人的。因

而我們在課后想作什么就可以作什么。这样就算是我們在自由地发展我們的天才。我們也的确是在发展自己的天才。有的人到莫斯科河上去帮助消防队員从冰窟窿里捕魚。还有的人跑到苏哈里[①]閑逛，瞅見主人不注意，就順手牵羊摸点东西。

可是我呆在家里的时候越来越多了。我們住在学校下面，比他們低一层楼。因此整个学校生活的演变我都亲眼看見了。这是一种难以理解，神秘而又复杂的生活。我伙在一伙高年級同学中間，听他們談話。接触到的是新的关系，新的思想和新的人物。这一切与在恩斯克迥然不同，正好象恩斯克之不同于莫斯科一般。我在很长的一段时間里什么也不明白，不加分析地对一切都感到惊异。下面就是第四劳动学校給我留下的印象。

柏斯托夫中学不久前还在公园凱旋路一所紅色的大楼里。校內附設一个小小的兒童教养院，这就是我們的兒童教养院。公元一九一九年冬，柏斯托夫中学与列多夫实科中学合并，可是到了春天，又和柏尔若佐夫斯卡雅女子中学合并了。

諸位讀者沒有在革命前的中学里上过学，因此，毫无疑問，已經不記得中学生和实科中学学生之間那种相互蔑視的情形了。我不知道这种仇視的根源何在，但是，当我在恩斯克时，就听到一些有趣的传聞，比方什么冰場上的激烈械斗，中学生是高貴的勇士，以及卑鄙的实科中学学生用人道所不容許的“鉛弹”作战等等。現在，我在莫斯科就亲眼看見了这一切。

柏斯托夫中学的学生是全莫斯科最不堪救藥的淘气鬼，——无怪乎被别的中学开除的学生都可以免試进这个学校。相

---

① 苏哈里是当时莫斯科摊販市場所在的地方。——譯者注。

反的在列多夫实科中学里学习的学生主要是高級官員、工程师、教育家們的有教养的子弟。因此，这种仇恨不仅由于学校的性質，而且是帶有社会性的。待到人民教育委員会明令公布在这两家世仇中間放上一个柏尔若佐夫斯卡雅女子中学以后，这种仇恨更是倍上加倍了。

有多少相互爭吵，共同密謀，彼此誹謗的借口啊！有多少会議上的发言，多少解釋的信件，又有多少明爭与暗斗啊！我們兒童教养院站在局外，誰也不注意我們。但是不难猜到，誰是我們心目中的英雄，那就是柏斯托夫的学生！我們連戴帽子都竭力模仿他們——向右边歪戴着。

后来第四学校公社出了不少著名的，受人尊敬的人物。我自己在許多方面都得感謝这个公社。不过在一九一九年，这簡直是一鍋稀飯！說到这里，不禁使我想起真正的稀飯来了——有时是玉米粥，有时是小麦粥，当时它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决定着列多夫学校的，也决定着柏斯托夫学校的利益。稀飯盛在一口大鍋里，包裹得严严密密的象个老太婆似的放在雪橇上运来，然后就連雪橇一块兒抬到礼堂里。代表經济委員会的瓦蓮阿姨，——大家都这样称呼这位扎着一条粗大的辮子，面色紅潤的胖姑娘，——手里拿着一把大勺子，在案台后面走来走去。大家排好队，不論穿什么制服，不論年龄和出身，每人領一勺异常甘美，冒着泡的热气騰騰的稀飯。

发稀飯是在大休息① 的时候。因为当时上不上課都可以，所以整个学习日就等于是一次大休息。

有一次，我碰上五年級同学在开会，討論要不要上課的問

① 指較长的課間休息。如一般每节課后休息五分鐘，两、三堂課后可有一次大休息。——譯者注。

題。一个头发乱蓬蓬的柏斯托夫学生在发言，大家向他呼喊："好哇，柯維奇加！"他正在发表議論，說在任何情况下也不上課。上学应該是自願的，分数应該用表决的方法来决定。

"好哇！柯維奇加！"

"对！"

"同学們，总而言之，問題在教員身上。对于那些只有极少数的人去上他們課的教員怎么办呢？我建議，規定以五人为标准。如果上課的人数少于五人，就不发給教員这天的口粮。"

"对！"

"傻瓜！"

"去他的吧！"

"好极！"

大概这番話不是指所有的教員，而是針对一个人說的，因为这时大家开始在东张西望，窃窃私語，你推我一下，我推你一下促起注意。原来門口站着一个高个子，年紀不算老，唇上留着毛茸茸的鬍子的人，他交叉着手，注意地听演講者的发言。

"他是誰？"我問瓦蓮阿姨道。她手里拿着勺子在走廊上走来走去，等着送稀粥来。

"小弟弟，他嗎，就是鬍子。"瓦蓮阿姨答道。

"怎么叫鬍子呢？"

"嘿，你还不知道啊！"

我很快就知道在第四学校里管誰叫"鬍子"了。

这是全校痛恨的地理教員柯拉布略夫。因为第一，他的来路不明，——既不是列多夫的，也不是柏尔若佐夫斯卡雅的，又不是柏斯托夫的教員，第二，根据大家的看法，他是个啥事不懂的大傻瓜，第三，他每天来上課，哪怕教室里只有三个人，他也一定坐

完規定的时間。显然这是最引起大伙兒憤慨的决定性原因……

“同学們，現在这样吧，”柯維奇加繼續說道，他正說得忘其所以，企图以大演說家的姿态伸手去扣大衣，但是衣服上連一个扣子都沒有。“在校务委員会里，五年級的代表只有我一个人，这是不对的。我一个人很难为五年級利益作斗爭。人家把我們看成低年級生。可是大家看看第一百四十四校学生会的主席是誰吧？穆霍維罗夫。他是哪一年級的呢？五年級的。总之，如果眞要那样的話，就应該首先証明我們是低年級生，然后再講。我們应該象高年級那样有两个代表。我是一个，另外一个我提議由菲尔柯維奇担任！”

“格拉基里奇科夫。”

“涅多达耶夫。”

“加拉雅。”

我看了看柯拉布略夫。大概是我的眼睛瞪得太大了，所以他突然摹仿我的样子，瞪了我一眼，——不过不很惹人注意。我好象覚得他鬍子底下漏出一絲微笑。但是柯維其加又講开了。柯拉布略夫从我身上移开了他那狡黠的眼光，开始异常注意地听着他講。

3　恩斯克来的老太婆

这一天我記得特别清楚：出着太阳，不时有一陣春天的过云雨。这天，我在庫德林广場上遇見一位瘦小的老太婆，她穿着一件綠天鵝絨的旧式大衣，一只手提着滿滿一籃子各式各样的蔬菜——土豆，酸模，洋葱，另一只手拿着一把大伞。显然，这只籃

子对她說来是够沉重的，可是她仍然精神十足地走着，有着滿腹心思的样子，不住地嘟嘟囔囔算着。我听到的是：半磅蘑菇——五百卢布；蓝靛——一百五；甜菜——一百五，牛奶一杯——一百五；祈祷费——七百六十卢布；三个鷄蛋——三百卢布；忏悔費——五百卢布。当时的錢就是这样不值錢。

最后她輕輕地叹了一口气，将籃子放在一块干燥的石头上歇息。

"老奶奶，讓我来帮你拿吧。"我对她說道。

"走开，騙子！我知道你們！第三个檸檬[1]我都拿不到家了。"

她向我恶狠狠地发了一陣凶，把籃子提了起来。

我走开了。但因为我們走的方向相同，所以过了不一会兒，我們又走在一起了。老太婆大概想要躲开我，但是提着这样一个籃子对她来說确是有些困难的。

"老奶奶，要是你認为我要偷你的东西，"我說道，"那只好請便，我帮助您并不要任何报酬；憑良心說，我实在是看到你那么吃力感到过意不去。"

老太婆大发起脾气来。她一只手抱紧籃子，一只手拿着伞，象驅赶蜜蜂似地对着我揮舞。

"可不是嗎，我就是相信了别人。第三个檸檬又被拿走了。我知道你！"

"随您的便吧。您的东西一定是被流浪兒拿走的，可是我是兒童教养院的。"

"兒童教养院的也一样是强盗。"

---

① 苏联革命前后，由于貨币貶值，大家便用一些名詞来代替較大的錢数，檸檬是一万卢布的代称。——譯者注。

她看看我，我也看看她。她的鼻子稍稍向上翘起，显得很果断的样子，人也是那么慈祥，果断。大概，因为我有点討得她的喜欢了，所以她突然停止了揮伞，严厉地問道：

“你是誰家的？”

“誰家的也不是。”

“那么你是从哪兒来的呢？是莫斯科人嗎？”

我立刻就明白，如果我說是莫斯科人，她定会将我赶开。大概她以为是莫斯科人将她的檸檬扒走的。

“不，我是恩斯克人。”

原来她也是恩斯克人。她的一双眼睛开始发出光来，面貌也显得愈发慈祥了。

“你撒謊，小騙子。”她生气地說道。“有个人也对我这么說过，說他不是莫斯科人，可是等我一轉眼，檸檬就沒有了。要是你眞是恩斯克人，那么你住在哪兒呢？”

“在沙河旁边，市場后面。”

“完全是撒謊。”

她已經看出我不是撒謊了。

“沙河可不止一条。别的地方也可能有这样一条河。我不記得你。”

“您大概早就离开了，我那时候还小哩。”

“不，并不早，不久以前才离开的。好吧，提着籃子的一只把手，我提这一只。可不要拽。”

我們提着籃子，一面閑談。我告訴她，說我和彼其加想跑到土耳其斯坦去，后来却在莫斯科留下了。她很感兴趣地听着。

“你这个小精灵鬼！要想跑江湖了！眞是走南闖北呵！想得眞妙！”

到了凱旋路，我把我們的学校指給她看。

“可不就是同乡嗎，”老太婆莫名其妙地説道。

她住在特維尔·雅姆二路一所小巧的砖房里面。这是我熟悉的一所房子。

“我們的学监住在这兒，”我説道，“您也許知道他——尼古拉·安东內奇。”

“原来是这么回事！”老太婆説道。“喂，他怎么样，是个好学监嗎？”

“再好不过了！”

我不明白她为什么笑。我們走到二楼上，停在一扇洁净的，用漆布裱糊过的門前。門上有一块小牌，我沒有看清楚上面用花体字写的这家人的姓氏。

老太婆嘴里嘟囔着，从大衣里掏出鑰匙来。我正想要走，她把我留住了。

“老奶奶，我这不过是帮忙，不要报酬。”

“你坐一会兒，这也不要报酬。”

不知道为什么她要踮着脚尖走进小前厅里去，灯也沒有开，就去脱大衣。她脫下大衣，脫下絲繐的披肩，大坎肩，又脫下一条小一点兒的披肩，头巾等等。然后撑开伞，再就沒影兒了。刚好这时有一个小姑娘打开厨房門，出現在門口。我还以为刚才的老太婆象个魔术师似的变成了一个小姑娘。但就在这个当兒，老太婆又出現了。原来她走到衣橱后面去挂披肩和坎肩去了。

“她是卡杰琳娜·伊万諾夫娜，”老太婆說道。

卡杰琳娜·伊万諾夫娜約莫有十二岁，不会比我大。可是我們之間簡直是天渊之别！我見了人哪敢象她那样驕傲地昂着

头，用烏黑而灵活的眼睛正視別人呢。她梳着小辮，头发卷成渦卷兒，額上的头发也是卷成了圈兒的。她的臉色紅暈，但是很严肃，象她姥姥一样也生着那么一个果断的鼻子。总而言之，她是一个十分漂亮，然而却非常傲慢的姑娘，这是一眼就可以看出来的。

“恭喜你，卡杰琳娜·伊万諾夫娜，”老太婆还在脫衣服，一面說，“檸檬又叫人給扒走了。”

“所以我說，应該放在大衣里，”卡杰琳娜·伊万諾夫娜埋怨道。

“唉！放在大衣里！就是从大衣里給扒走的。”

“姥姥，可見你又是只顧嘴里数算去了。”

“我哪里算什么来着。你瞧，还有一位小伙子給我保鏢哩。”

小姑娘看了看我，大概她一直到現在都沒有发覚我。

“是他替我把籃子提回来的。你媽媽怎样啦？”

“現在就量，”小姑娘沉靜地端詳着我，說道。

“哎呀，你眞不得了！”老太婆突然惊慌地說道，“怎么搞到这样晚呢？医生不是囑咐在十二点量体温嗎。”

她急急忙忙走出去了，只留下我和小姑娘两个人。我們沉默了两三分鐘。然后她皺了皺眉头，很严厉地問道：

“你讀过‘叶林娜·魯濱孙’嗎？”

“沒有，”

“‘魯濱孙飘流記’呢？”

“也沒有。”

“为什么？”

我差一点兒沒說，我学会念書識字总共才不过半年哩。但

又馬上忍耐住了。

“我沒有書。”

“你在哪一班？”

“哪一班也不在。”

“他是旅行家，”老太婆刚好回来，說道。“三十七度二。他要徒步走到土耳其斯坦去。卡佳，你別欺負他。”

“怎么徒步？”

“就是这样甩手迈脚，开步走。”

前厅里鏡子下面摆着一张小桌。卡佳将一把椅子挪到桌前坐下，坐好后，一只手托着下巴，說道：

“喂，講講吧。”

我不願意对她講，她实在太驕傲了。如果我們眞的到了土耳其斯坦，那又是另外一回事。因此我很客气地說道：

“沒有什么意思，懶得講。下一次講吧。”

老太婆把夹着果子酱的面包塞給我吃，我拒絕說：

“說过不要报酬，就是不要报酬。”

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心緒很乱。我不仅沒有对卡佳講，并且向門外走去，卡佳脸都紅了，我这时甚至感到一陣痛快。

“得啦，别生气，”老太婆送我出門时說道。“你叫什么？”

“格利高里耶夫、亚历山大。”

“好吧，再見，亚历山大·格利高里耶夫。謝謝你。”

我在門外的台阶上站了好久。仔細辨認着門上小木牌上的姓。卡扎林諾夫——似乎又不是卡扎林諾夫……

“尼·安·塔塔林諾夫，——我突然念出来了。”

原来是这么回事！塔塔林諾夫，尼古拉·安东內奇。我們的学监。这就是他的住宅。

4 这可是要好好想一想的

我們在銀松林过了一个夏天，住在一所旧式的荒蕪的房子里。房子的楼梯走廊非常狹小，天花板上雕刻着花飾，走廊全被一堵一堵的死墻陡然隔断。房子里的一切都吱吱軋軋地发出声响：門有門的声音，百叶窗有百叶窗的声音。有一間大屋子封閉得很严实。可是就在这里面也时常有什么东西发出吱吱軋軋，或者刷拉刷拉的声音，有时忽然又会象大鐘里的小銅錘敲在鈴边上，发出一陣很有节奏的当当声。頂楼上生長着小菌子。地上到处乱扔着一些脫了頁的，沒有封面的外文書。

革命前，这所房子是一个老茨岡伯爵夫人的。茨岡伯爵夫人！这可真够神秘的。据传說她在临死前将財宝埋藏起来了。罗馬什卡整个夏天都在寻找这批財宝，他拖着一个虛弱的身子，頂着一顆大脑袋，拿着一根棍子，在屋子里走来走去，一面敲，一面听。他甚至夜間也敲，非等到年紀大些的人来揍他一頓，他是不停止的。这时他才十三岁，可就下定决心要发横財。每当他談到金錢时，他那沒有血色的耳朵就燒得通紅。这是一个天生的探宝者——一个极端迷信，貪婪的人。

頹塌的小亭子周围茂密地长滿了波斯紫丁香花。綠蔭小径的两旁立着許多雕象。这些雕象和希腊神象全然不同。希腊神是冷漠的，眼睛慘白，象瞎子一样。而这些雕象却是和我們一样的人。

有一座雕象唇上生着胡子，很象柯拉布略夫，另外有一座是个十岁左右的普通的小女孩。她穿一件长到脚跟的內衣，伸着

懶腰，在用拳头揉眼睛，好象是刚才起床。

我試图将她塑下来，然而一点也不象。塑成的只是象卡杰琳娜·伊万諾芙娜那个翘鼻子姑娘的卷圈兒头发的辮子和卷曲的額发，大概鼻子也很象。但是塑人象毕竟不象塑癞蛤蟆，兎子那么簡单。

只有夏初我們刚到銀松林时的一段时間有这样美好的生活。后来生活差了，伙食也几乎停止供給了。兒童教养院改为“自給自养”。我們每天下河摸魚，捉虾，开运动会时就到运动場上去卖紫丁香花，有时趁人不防备，也順手摸点东西。傍晚我們經常在花园里架起劈柴生着篝火来，将这一天猎获的东西燒着吃。

有这么一个晚上，——其实所有的晚上都是一样。

我們围坐在篝火旁边，又疲乏，又飢餓，又恼火。木架，挂在架上的軍用水罐，以及我們的脸和手都被烟熏得烏黑。我們仿佛是那些准备要吃掉船长庫克① 的印第安人，一声不响地看着烈火。火苗驟然爆发，四外迸射；深紅色的黑烟象一个旋轉着的帽子扣在火焰上。

我們是一个“公社”。全兒童教养院分为若干“公社”。单枪匹馬是很难找到“給养”的。每一个“公社”有自己的主席，自己的火堆，自己的存粮，——这指的是因某种緣故当天沒有吃完，留到第二天吃的东西。

我們的主席斯乔普加·伊万諾夫，是一个十五岁，面貌頗为丰潤的少年，也是大家所畏惧的一个貪饞鬼，无賴……

“玩阿什契卡② 嗎？”斯乔巴懶洋洋地說道。

---

① 庫克(1728—1779)，英国航海家，完成过三次环球航行。——譯者注。

② 是一种用羊拐投擲的游戏。——譯者注。

大家都不吭气。誰也不想玩“阿什契卡”。斯乔巴自己吃飽了，所以想玩。

“好吧，斯乔巴，不过天已經黑了，”罗馬什卡說道。

“你知道哪兒黑了嗎？站起来！”

我們的主席頂爱玩“阿什契卡”。誰都知道他的骰子有鬼。可是除了我和瓦尔加之外，别的人，特别是罗馬什卡，都奉迎他。罗馬什卡为了不至于受斯乔普加欺負，甚至故意輸給他。

諸位不要以为我們是用劈柴火烧什么甘美的野味。在那只經过一番战斗，才从厨房里夺来的軍用水罐里面經常煮着一鍋湯。这是眞正的“灌腸棍子湯”，和去年冬天塞拉菲瑪·彼得罗芙娜給我們講的那个故事里面的一样。它們的区别，大概只是在于那是用老鼠尾巴煮的湯，而我們的湯里，却应有尽有，——有时甚至把青蛙的脚掌也放进湯里。

这时我們房門开了，一个戴寬边帽的矮胖子走到露台上来。

“彼佳大叔，到我們这兒来！”

“这兒来，彼佳大叔！”

这是我們的炊事員彼得·安得烈維奇·洛普霍夫。他走路搖搖晃晃的，——不是因为喝水太多的关系，——低声哼着歌剧的插曲，巡視各个“公社”。在每个鍋里尝一尝，一边啐唾沫，嫌恶地說道：

“啊！有毒。”

他是个音乐迷，也就是說是一个音乐和唱歌的爱好者。所有的歌剧他都能背出来。对于他来說，沒有比表演“叶甫盖尼·奥涅金”或是“黑桃皇后”中的一个場面更为愜意的了，至于我們，也沒有比一面听他表演，一面贊美更为愉快的了。

“太好了！眞不亚于夏里亚平！彼佳大叔，你为什么不去作

演員呢！”

“我害怕。”

“怕什么，彼佳大叔？”

“陷进去就拔不出来了。”

他停在我們的篝火旁边，尝了尝，又吐出来，就滔滔不絕地講起过去，很久很久以前，百年甚至二百年以前的人怎样吃东西的故事来。他不仅是个音乐迷，而且是个历史家，是个通晓古代肴饌，兎子汁和鹿排的行家。

“柯罗烈夫煎鷄蛋，”他神秘地低声說道，“取十八个鷄蛋，只要蛋黃，同餅干粉攪拌在一起，加上苦杏仁，奶皮，白糖，然后用油那么一煎。吃过嗎？”

我們齐声回答：

“沒有吃过！”

“罗罗！糖烧苹果。将苹果削去皮，掏出核，塡上葡萄干，滚上一层所謂酥皮，放在爐子里烘烤，然后塗上蜜汁。吃过嗎？”

“沒有吃过！”

“罗罗。”

可是在所有这些菜餚之中，他自己却只喜欢一种叫作“喝伏特卡酒”的菜。在一九二一年夏天，他是我們惟一的領导人。塞拉菲瑪·彼得罗芙娜这时早已张皇失措，自顧不暇，所以誰也沒有去注意她。教养院里还有一些教养員在鬼混，他們和这位大司务是針鋒相对的，不知道为什么大司务发給我們干粮会对他們不利。总之一句話，要是沒有这位大司务，我們兴許早就跑光了。

就这样，他站在我們的篝火旁边，叙述着古时候的人怎样吃东西。有时他打断了自己的話，插上几句有关医藥方面的說

明。

“梭魚并不是对所有的人都是补品。它能使胃扩张。”或者說：

“鯉魚順气和血。这是一种很补养的魚。”

他取下我們的水罐，聞着冒出的蒸气。有时他聞了一聞以后不說“有毒”，而說“死尸坑”，就把一鍋湯潑入矮树丛中。这一回他要說什么呢？他聞了聞，抬起眼睛来看着天，默不作声……

“有毒！”

于是七顆脑袋一齐伸到罐子上面，七把湯匙挨次探到湯里去。我們一个劲兒的大吃！

只靠吃这种口粮，很难說我們的身体到秋天就能够养好。除去斯乔巴象只駝鳥似的，任憑什么东西都能消化而外，我們都瘦了，都染上了病，感到身体很不舒服。

然而这毕竟是一个美好的夏天。我永远不会忘記它，这倒不是因为我們吃得特别坏的关系。若說是不习慣吧，但在这以前，我生来就沒有吃过什么好东西。不是的，这个夏天給我留下了很深印象的完全是另外的原因，就是我开始尊重自己了。

这件事发生在八月底我們回城以前不久，恰好也是在篝火旁边我們做晚飯的时候。斯乔巴突然宣布吃东西的新办法。在这之前，我們是輪流吃的，你一匙，我一匙。斯乔巴是主席，由他开始，然后是罗馬什卡，就这样順次吃下去。現在他却要大伙兒趁湯沒有冷的时候一拥而上，看誰搶得快。

誰也不喜欢这个新办法。当然罗！同这样的主席在一起准吃亏。他只要三下，就可以将一罐湯喝光。

“这可不行！”瓦尔加坚决地說。

我們齐声噪噪起来赞成瓦尔加。斯乔巴慢騰騰地站起来，拍拍膝盖上的土，照准瓦尔加脸上打了一下。他这一下打得太狠了，瓦尔加頓时满脸流血，大概血流到眼睛里去了，所以象瞎子一般地揮起手来。

“哼，”斯乔巴慢声慢气地說道，“誰还想討打？”

我是我們公社里最小的一个，他一只手就能将我按倒，但是我不顧一切，还是打了斯乔巴。斯乔巴突然踉蹌了几步坐倒在地上。我不知道打中了他的什么地方，他翻着白眼露出一副发楞的样子呆坐在地上。固然他很快就清醒了，便一头向我扑来，但这一回我的小伙伴們并沒有讓我吃亏。斯乔巴象落水狗一般被大伙兒打倒了。趁他躺在火堆旁边哀号时，我們連忙另选了一个新主席，这就是我。自然，斯乔巴沒有参加选举。但是不管怎样吧，他只是少数，因为大家一致通过了我。

我可以先說在这里，我是一个不算坏的主席。飢餓的时期度过了，我們冬天参加了少年先鋒队。我們这个“公社”成了全校最好的一个小队。第一个英勇战斗的“恰巴耶夫小队”。

多么奇怪。这次打架居然成了我的第一次社会活动。我风聞同伴們这样議論我：“他虽然身体很弱，可是很勇敢。”哈，我是勇敢的人！总之，我是怎样一个人呢？这可是要好好想一想的。

5　雪里有沒有盐？

在这一年当中，我們学校里什么变化也沒有发生。过去列多夫学校的学生和过去柏斯托夫学校的学生照样地爭吵。稀飯

还是照样包裹着象一个老太婆似的放在雪橇上运来。柯拉布略夫每天早晨照旧是十点鐘到校。

他总是穿着一件长长的秋大衣，戴着一頂大綠帽，进了校門后，先对着鏡子不慌不忙地梳鬍子，然后去上課。

不过現在已不能象去年柯維奇加提議的那样断絕他的口粮了，因为現在上他的課的人数已不止五个人。他旣不抽問誰，也不留堂下作业。他只是单純地講，要不就是讀。原来他还是一个周游世界的旅行家。他曾經在印度看見过变魔术的僧徒；他們埋在地里整整一年，过后又苏醒过来，象常人一样，若无其事。他在中国吃过最鮮美的中国菜——松花蛋。在波斯他曾亲眼看見人們怎样过沙赫西·瓦赫西——伊斯兰教的歃血节。

几年后我才知道，其实他連俄罗斯的国土从来也沒出过。他所說的一切全是憑空瞎謅的，不过，这終究是十分有趣啊！虽然現在还有很多人一口咬定說他是傻瓜，但已經不能說他啥也不知道了……

我們的学监尼古拉·安东內奇仍旧是第四中学的头号人物。什么事情都得由他决定，什么事他都干預，什么会議他都参加。高年級同学常常到他家里去"搞清关系"。列多夫和柏斯托夫两校学生之間发生糾紛，他只消十分鐘就能解决，就連最調皮的学生也是毫无异議地表示唯命是从。从一年級到毕业班，任何一个学生都可以到他那兒談談个人的私事。"我要告訴尼古拉·安东內奇"，"这是尼古拉·安东內奇吩咐我的"，"尼古拉·安东內奇派我来的"，——在我們学校里常常听到这类的話。

最后我居然也說起这样的話来了。

在我作学生的头一天，兒童教养院举行了"甄别試驗"，我被

編入二年級。我心里正思索着应該怎样对待这件大事，——是不是要跑到莫斯科河或者麻雀山去一趟，——我正在礼堂里徘徊思索。这时教員休息室的門开了，尼古拉·安东內奇用一个手指头招呼我过去。

“格利高里耶夫，”他稍微思索了一下說（他因能叫出全校学生的姓名而博得大家的贊仰），“你知道我住的地方嗎？”

我回答說知道。

“你知道什么叫做測乳器嗎？”

我回答說不知道。

“这是一种标示牛奶里含水量多少的仪表。”尼古拉·安东內奇伸出一个指头来，“大家都知道卖牛奶的人在牛奶里摻水，但是把測乳器放到摻水的牛奶里，就可以看出含牛奶多少，含水多少。明白嗎？”

“明白了。”

“那么你就去給我拿来吧。”

他写了一张便条。

“你可要注意别打碎了。这是玻璃作的。”

“不会打碎的。”我热心地回答道。

他囑咐我把便条交給尼娜·卡比丹諾芙娜。

我沒有料到这就是恩斯克的那位老太婆。不过給我开門的却不是老太婆，而是一位不認識的，穿着黑連衣裙的纖瘦的中年妇人。

“孩子，你有什么事嗎？”

“尼古拉·安东內奇派我来的。”

这位中年妇女显然是卡佳的媽媽，老太婆的女兒。她們三个人都有着同样果断的鼻子，同样烏黑而灵活的眼睛。只是外

祖母和外孙女的神情看起来比較愉快些，而女兒却是愁容滿面，心事重重的样子。

"測乳器？"她看完了便条，迷惑不解地說道。"啊，是了。"

她走进厨房里去，随后就拿着測乳器回来了。我不禁大为失望。原来这只不过是一个稍微大一点兒的温度計罢了。

"不会打碎嗎？"

"您这是怎么說的，"我带着輕蔑的神气說道，"我还会打破……"

我記得很清楚，在那位我所推測的卡佳的媽媽关好門以后大約两分鐘，我脑子里就产生了試驗雪里有沒有盐的这个大胆的念头。

我把仪表紧紧握在手里，把手放在口袋里，刚走下楼梯，就站住了。雪里有盐还是彼其加說的。測乳器能不能測出所含的盐份呢，是不是彼其加撒謊？这倒是个問題。应該試驗一下。

我选定仓房后面靠污水坑的一个僻静地方，在行人踩实了的雪地上有一个用砖垒起来的小屋子，从里面伸出一根黑綫，拴在一些小木棍上，一直拉到仓房后面；我心里想："这准是孩子們玩野外电話搞的玩意兒。"我沒来由地对着測乳器呵了一口气，心里砰砰地剧跳着，把它插在小屋傍边的地里。过了一会兒，我拔出測乳器，发現上面什么变化也沒有，于是又把它插进去，这次是头朝下。諸位可以想見我的脑子当时糊塗成什么样子了。

附近有人哦喲尖叫了一声。我回过头去看。

"快跑，看把你炸死！"仓房里有人嚷道。

这一切发生在两秒鐘以內。一个穿着大衣敞着怀的小姑娘从仓房里飞奔出来，气急敗坏地冲着我跑来。我当时心里在想：

"嘿，原来是卡佳这丫头"，同时为防万一起見，又伸手去取仪表。可是卡其加抓住我的一只手，拖着就跑。我极力挣扎不肯走开，我們都跌倒在雪地上。轟隆！砖头碎片飞到空中，身后的雪花象白霧似的升起，洒落在我們身上。

我曾經碰到过一次打枪，那是給母亲送葬的时候。不过这次却可怕得多！在污水坑旁边，什么东西經久不息地轟隆轟隆响着，連續地爆炸，我每次抬起头来，卡其加就震顫一下，問我道："厉害吧？嗯？"

我終于蹦了起来。

"我的測乳器呀！"我号叫着，拼命向着污水坑那边跑去。"它在哪兒呀？"

原来插着我的測乳器的地方，已經变成了一个深坑。

"炸毁了！"

卡其加还坐在雪地上。她脸色苍白，眼睛閃閃地发着光。

"傻瓜，这是爆破瓦斯，"她輕蔑地說道。"你現在最好走开，因为馬上警察就要来，他已經来过一次了，他会把你抓起来的。我反正能跑掉。"

"測乳器，"我又拼命地喊了一声，感覚到嘴唇也不听話了，脸上的肌肉也开始抖动起来。"这是尼古拉·安东內奇派我来取的，我把它放在雪里了。它在哪兒呀？"

卡其加站了起来。院子里很冷，她沒有戴帽子，烏黑的头发从正中分开，一条辮子塞在嘴里。当时我幷沒有去看她，这都是以后想起来的。

"我救了你的命，"她沉思地翕动了一下鼻子，說道。"要不然你也許死了，也許背上受了重伤。你应当感激我救了你的性命。你在我的爆破瓦斯旁边搞什么名堂？"

我什么也沒有回答。我气得說不上話来了。

“不过，你要知道，”卡其加郑重其事地补充說，“如果刚才是一只小猫跑到我的爆破瓦斯旁边，我也一样会救它。我对誰都是一視同仁的。”

我一句話也沒有說，便离开了院子。但是到哪兒去呢？現在很明显，回学校是不行的

卡其加在大門口追上了我。

“喂，你去找尼古拉·安东內奇！”她喊道，“到哪兒去？告狀去嗎？”

我轉过身来。啊！我照着她的脖頸多么痛快地打了一下喲！为了这一切，为了已經牺牲了的测乳器，为她那翘起的鼻子，为了我不能够回到学校里去，为了誰也沒有求她，她却来救我——为了凑在一起的这种种原因我打了她。

不过，她也不客气。她倒退了一步，照准我的腰眼打来。我只得揪住她的辮子，把她的脸按在雪里。她一蹦又跳了起来。

“你不应該用絆子腿，”她很不服气地說道。“要不是用絆子腿，我刚才一定狠狠地收拾你一頓。我們班里所有的男孩子都打不过我。你在几年級？帮助姥姥提籃子的是你嗎？在二年級嗎？”

“二年級，”我非常煩恼地答道。

她看了看我。

“温度計打碎了，这有什么了不起的！”她輕蔑的說道。“如果你願意的話，我就說是我打碎的。我沒有关系。等一等。”

她跑开了，过了几分鐘又回来了，这时她戴上了帽子，辮子上扎着发带，态度矜持，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姑娘。

“我告訴姥姥說你来过了。她正在睡覚。她問你为什么不进去，她說測乳器打碎了也好，要不然，每次都要把它放在牛奶里，

实在是麻烦。反正它也测不准。这都是尼古拉·安东內奇出的鬼名堂，而姥姥只要尝尝味道，就知道牛奶好不好……”

我們走得离学校愈近，卡其加便愈摆起架子来。她昂着头走上楼梯，毫不在乎地眯縫眼睛。

尼古拉·安东內奇还在教員休息室里刚才和我談話的地方。

“你不要說，讓我自己来說。”我低声对卡其加道。

她輕蔑地从鼻孔里哼了一声；她的一条辮子弯弯地翹在帽子外面。

我在下一节里要叙述的那些令人猜測不透的事情就是从这次談話以后开始的。

事情是这样。这位我們已經习惯認为是第四学校的絕对統治者的尼古拉·安东內奇，那位架子十足，貌似宽厚的尼古拉·安东內奇在卡其加一跨进門时便立刻不知消失到哪兒去了。另一个尼古拉·安东內奇在强作欢笑地和她談話，站在桌子那边哈着腰，睜着眼，揚着眉，就好象卡其加談的是不知有多么了不起的事情一般。难道他怕她嗎？

“尼古拉·安东內奇，是您派他去拿測乳器的嗎？”卡其加滿不在意地用眼光望着我，問道。

“是我派他去的。卡秋莎。”

“对。可是我把它打碎了。”

尼古拉·安东內奇的脸色变得严肃起来。

“她撒謊，”我哭丧着脸說道，“是炸坏的。”

“我一点也不明白。格利高里耶夫，你少說話。卡秋莎，你講一下，是怎么一回事。”

“沒有什么事，”卡其加傲慢地仰着头，答道，“我打坏了測乳

器，事情就是这样。”

“唔，唔，唔。不过，好象我是派这个小孩子去取的，对嗎？”

“因为我把它打碎了，所以他沒取来。”

“撒謊，”我又說道。

卡其加严厉地瞪了我一眼。

“好的，卡秋莎，就算是这样吧。”尼古拉·安东內奇温和地閉起了嘴唇。“不过，你看，牛奶送到学校里来了，我压着早飯暂时不开，想确定一下这种产品的質量，再根据它的質量决定我們今后是否要买我們貨主的牛奶。这么一来，我是白等了。更重要的是：这么一来，一件貴重的仪器竟打碎了，加之原因尚且不明。現在，格利高里耶夫，你談談，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这眞是无聊！那我走了，尼古拉·安东內奇！”卡其加說道。

尼古拉·安东內奇看了看她。不知道为什么，我这时感到，他心里很恨她。

“好吧，卡秋莎，你走吧。”他和藹地說道。“我和这个小孩再談談。”

“那么我也等一会兒。”

她坐下来，我們談話时，她一直很不耐煩地咬着辮子。要是她眞走了的話，很可能談話不会这样和平地結束。測乳器的事情得到了寬恕。尼古拉·安东內奇甚至还提起，我是被当作未来的雕塑家送到他的学校里来的。卡其加很感兴趣地听着。

从这天以后，我就和她成了朋友。她很喜欢我既沒有讓她担当这次事件的过失，而在我叙述的时候，又巧妙地使自己摆脫了事件的責任，并且关于爆破瓦斯的事一个字也沒有提起。

“你以为我这下子会闖祸，是吧？”当我們从学校里出来的时候，她这样問道。

“可不是。”

“不見得。你到我們家来吧，姥姥叫你的。”

6 作客去

我一早醒来时就想，去呢还是不去？有两件事使我很难为情：褲子和尼古拉·安东內奇的問題。褲子的确不象話，說长不长，說短不短，膝盖上都打着补釘。至于尼古拉·安东內奇的問題，那誰都知道，他是我們的学监，也就是說，是一个相当令人生畏的人物。他万一問起我为什么，干什么来的，那怎么办呢？但是不管怎样吧，下課后，我还是把靴子刷得干干净净，头发上弄了点兒水梳成分头。作客去！

我感到自己是多么不自然，多么拘束啊！該死的头发老是直挺挺地竪着，沒法子，只得用唾沫将它粘住。尼娜·卡比丹諾芙娜正对我和卡佳講一件什么事情，突然厉声命令我道：

“把嘴閉上。”

原来是我看她看得出了神，忘記了閉嘴。

卡佳把全部住房指給我看。一間是她自己和媽媽住着，另外一間是尼古拉·安东內奇住着，还有一間是吃飯的地方。尼古拉·安东內奇的書桌上放着一套文具，卡佳对我說，这是用勇士伊里亚·穆罗美茨[①]的“身体”作的。的确，墨水瓶是个长着鬍鬚，戴着鋼盔的人头，烟灰盒是一付交叉着迭在一起的古俄罗斯手套，还有其它一些别的东西。头盔下面盛着墨水，尼古

① 伊里亚·穆罗美茨是俄国传說中的一个英雄，他象征着伟大俄国人民的勇敢，刚毅，純朴等优秀品質。——譯者注。

拉·安东內奇要蘸墨水就得将鋼笔尖伸到勇士的头顱中去。我觉得这实在是古怪。

在两个窗戶中間摆着一个書架；我从来沒有看到过这样多的書放在一起。書架上挂着一个航海者的半身相片，寬大的前額，紧縮着的下巴，灼灼生光的，灵活的灰色眼睛。

我发現在餐厅里也有这样一幅象，只是略微小一点兒。另外还有一幅更小的，挂在卡佳屋里的小床上面。

“这是我父亲，”卡佳皺着眉看了看我，說明道。

我原先还以为尼古拉·安东內奇是她的父亲。不过她不会連教名父名一起称呼自己的亲生父亲的。“繼父”，我轉念一想，但立刻断定，不是。我尝过繼父的滋味。不，不象！

后来，卡佳又指給我看航海罗經，这是一件很有趣的东西，是个带架的銅箍，中間搖搖摆摆地有个小杯，在杯子的玻璃罩下面有一根指針。不論你将小杯轉到什么方向，哪怕底朝上翻过来，指針上带錨的一端摆来摆去，最后总是指着北方。

“有了这样的罗經，无論碰見什么样的风暴都不在乎。”

“你从哪兒弄来的？”

“父亲給我的。”

“他在哪兒？”

卡佳脸上显出很难过的样子。

“不知道。”

“是抛下母亲离婚了，”我立刻这样断定。我知道有这样的事。

我发現这所住宅里有許多画片，照我的眼光看来，都是很好的。其中有一张特别妙：画的是花园里一条寬闊笔直的道路，和阳光照耀着的松树。

"这是列維坦[①]，"卡佳仿佛大人似的随便說道。

那时候我还不知道列維坦是一位画家的姓，以为这是画上画的那地方的名称哩。

后来，老太婆将我們叫去喝糖精茶。

"亚历山大·格利高里耶夫，看你，"她說道，"把測乳器也打碎了。"

她要我講講恩斯克的情形，甚至还問到信件的事。

"你說說，信件是怎么回事？"

后来因为我不知道有这么一家姓布宾其可夫的人家，她发开了脾气。

"犹太教会旁边的花园！你怎么就沒听見过呢！可是你呀，大概都去偸过几百次苹果了吧。"

她叹了一口气。

"我們离开那兒很久了。我本来不想搬家。眞是不想搬！都是我們那位尼古拉·安东內奇。他到我們那兒去說，現在你們等不等他反正都是一样。只要我們留下地址，有人要找的話，也会找到我們的。东西全卖光了，余下的就是这一丁点兒，都搬到莫斯科来了。"

"姥姥！"卡佳厉声說道。

"姥姥怎么啦？"

"你又要干嗎？"

"不說了。算了！我們在这兒也挺好。"

我一点不明白，她們說等誰，为什么現在反正都是一样。可是問題很清楚，我不能再追問下去，更何況尼娜·卡比丹諾夫娜

① 列維坦(1861—1900)，俄国杰出的画家。——譯者注。

自己也把話題轉到别的事情上去了呢……

我就这样在特維尔·雅姆二路我們学监的住宅中把时間消磨过去了。

分别的时候，我从卡佳那兒借了一册“叶林娜·罗宾逊”，答应她，保証不将封面折坏，不把書弄脏。

7 塔塔林諾夫一家

塔塔林諾夫家里沒有女佣人，因此尼娜·卡比丹諾芙娜，特别是在她这样的年紀，实在是够劳累的。我經常帮助她。我們一块兒生爐子，劈柴，甚至刷洗食具。她是蠹虫最可怕的敌人，往往无緣无故地突然将东西都挂到院子里去曝晒，而这件工作沒有我也不行。我从附近荒地上搬了一些砖头来，把餐厅里漏烟的爐子修好。总之一句話，老太婆招待我吃的几頓鱒魚和小米稀飯，我都用加倍的工作偿还了她。其实，我又何尝需要吃她的飯呢！我只是因为在她們家里感到好玩。对我說来，这所屋子仿佛是阿利·巴巴的宝窟一般，里面有珍宝，有无数的危险和难解的謎。对我来說老太婆就是珍宝，瑪丽亚·瓦西里耶芙娜就是难解的謎，而尼古拉·安东內奇就代表危险和煩恼。

瑪丽亚·瓦西里耶芙娜是个寡妇，也許又不是寡妇，因为有一次，我听見尼娜·卡比丹諾芙娜提到她时唉声叹气地說：“既不是寡妇，又不是有丈夫的妻子”。更奇怪的是，她因思念丈夫而感到极度的痛苦。她象修道女似的总是穿着黑色連衣裙。她在医学院里学习。当时我覺得这件事非常奇怪，因为根据我的理解，作母亲的人是不应該上学的。她有时会突然停止和别人交

談，哪兒也不去，既不到学校里去，也不上班工作（她也在工作），只是盘着腿坐在躺椅上拼命地抽烟。这时，卡佳就說："媽媽很煩恼"，于是全家互相嗔怪生气，悶悶不乐。

我很快就弄清楚了，尼古拉·安东內奇根本就不是她的丈夫，而且也沒有結过婚，虽然他已經四十五岁了。

"他是你的什么人？"我有一次問卡佳道。

"什么人也不是。"

自然，她是在撒謊，因为她和她媽媽与尼古拉·安东內奇同一个姓。他应当是卡佳的伯伯；不过不是亲的，是远房的。

不管怎样吧，他究竟是位远房伯伯，可是他們对待他却不太客气。更叫人納悶的是相反地他对每一个人都非常关切，甚至有些过分。

老太婆喜欢看电影，从不漏过一部片子，尼古拉·安东內奇經常陪她去，甚至預先就买好电影票。晚飯时，她津津有味地叙述着影片的內容（这时的她簡直和卡佳相象极了）。尼古拉·安东內奇虽然刚同她从电影院里回来，却也不厌其煩地听着。

不过，她仿佛也很可怜他。有一次，我看見他搭拉着头，坐在那兒用紙牌算命，心事重重地用指头敲着桌子，她用怜憫的眼光瞧着他。

对他毫不怜憫的人是誰呢？这就是瑪丽亚·瓦西里耶芙娜！尼古拉·安东內奇对她眞是无微不至。常常把戏票送給她，自己却留在家里。又常向她贈送鮮花。我听見他怎样請求她保重自己，把工作辞掉。他对待她的客人同样也十分关切。只要一有人来拜訪瑪丽亚·瓦西里耶芙娜，他就立刻出場应酬，作出十分高兴和愉快的样子，尋找話題和客人长时間地攀談，瑪丽亚·瓦西里耶芙娜却往往坐在躺椅上，悶悶不乐地皺着眉抽烟。

在柯拉布略夫来时，他显得特别殷勤。无疑問的，他認为“大鬍子”是他的客人，所以馬上就把他拉到自己房中，或是到餐厅里去，不讓他談正經事情。总之，柯拉布略夫一来，大家都活跃起来，特别是瑪丽亚·瓦西里耶芙娜。她穿着一件白領的新連衣裙，亲自摆餐桌，张罗着，变得越发漂亮了。有时候，她看到柯拉布略夫在鏡子前梳完鬍子，开始說說笑笑逗老太婆欢喜，她也禁不住要笑起来。尼古拉·安东內奇似乎也在笑，但脸色变得蒼白。他有这么一种怪毛病，一笑脸就发白。

他不喜欢我，我很久都沒有覺察到这一点。起初，他碰見我时只表示很惊奇，后来就皺起眉来，好象很不舒服地用鼻子往里吸气。再以后就开始教訓我了：

“你刚才是怎么說的，‘謝謝’？”他有一次听見我因什么事向老太婆道謝。“你知道什么叫做‘謝謝’嗎？你要記住，根据你是否知道这一点，是否明白这一点，就可以决定你一生是走这条道路，还是走另外一条道路。我們生活在人类社会中，推动这个社会的动力之一就是感恩戴德的心情。也許你已經知道，我过去有一个堂弟。在他的一生中，我曾經不止一次地在精神上和物質上帮助过他，而他却是一个忘恩負义的人。結果怎样呢？他的命运遭到了可怕的报应。”

一听他談这些話，我就象看見了自己褲子上的补釘。的确，我脚上穿的是質量很坏的皮靴，我又小又脏，而且太穷。我屬于一类人，他們塔塔林諾夫家又是一种人。他們有錢，我却是个穷鬼。他們都是聪明而有学問的人，我却是个傻瓜。这个問題是应該好好想一想的。

順便說一下吧，尼古拉·安东內奇不仅是和我談他的堂弟。这是他喜欢的話題。他强調說，从他堂弟在亚速海岸的盖尼切

斯克童年时代开始，他就关心他。堂弟出身于一个貧寒的渔民家庭，要不是尼古拉·安东內奇，那他仍旧要象他父亲，象他爷爷，象他祖宗八代那样作一个臭漁夫。尼古拉·安东內奇“发覚这个小孩才能出众，酷爱讀書”，就将他从盖尼切斯克带到頓河的罗斯托夫去，为他奔走，讓他考进了航海学校。冬天的时候，他每月給他“补助費”，夏天的时候，他介紹他到往来于巴士姆和新俄罗斯之間的船上作水手。在尼古拉的直接参与之下，堂弟作了海軍志願兵，并且考上了旗手。后来尼古拉·安东內奇又費了很大的力气，帮他解决投考海軍学校的問題，当堂弟在海軍学校毕业需要訂制新制服时，他又資助他金錢。总而言之，他为堂弟作的事太多了，所以不难理解，他为什么这么喜欢回忆他。他講得非常慢，非常仔細，妇女們都带着一种聚精会神的尊敬态度听着他講。

不知道怎么回事，我覚得此时她們仿佛感到自己对他欠了一笔債，一笔因为他为堂弟作了很多事而无法償付的債。

不过，她們也确实欠了一笔債，也确实是无法償付的債。因为这位被尼古拉·安东內奇时而称为“已故的”时而称为“失踪的”堂弟是瑪丽亚·瓦西里耶芙娜的丈夫，所以也就是卡佳的父亲。这所房子里所有的东西过去是屬于他，現在都成了瑪丽亚·瓦西里耶芙娜和卡佳的了。还有一些画，照老太婆的話来說，是“特列嘉柯夫繪画陈列館① 会給大价錢的画”，此外，还有一张值八千卢布的巴黎銀行的“保险单”。

对于大人的这些复杂的事情和关系，最不感兴趣的只有卡佳一个人。她有自己的更重要的事情。她正在和两个留在恩斯克的女朋友通信。她的信件丢得到处都是，所以只要不偷懶的人，

① 苏联最大的造型艺术陈列館，在莫斯科。系莫斯科的艺术收藏家特列嘉柯夫(1832—1898)所創立。——譯者注。

甚至客人都可以看到她的信。她写給女朋友的信和她們写給她的信完全一样。比如女朋友信上写道：她作了一个梦，似乎丢了小皮包，突然米什加·庫普錯夫（你还記得嗎，我写信告訴过你的）从对面走来，小皮包恰好就在他的手里。于是卡佳給女朋友的回信也是作了一个梦，她仿佛也丢了东西，不过不是小皮包，而是一支鋼笔杆或者一条緞带，可是舒尔卡·戈卢宾采夫（你还記得嗎，我写信告訴过你的）撿到拿来了。女朋友写信說看过电影。卡佳即使是呆在家里，也回信說看过电影。我后来猜想，她的女朋友年齡大概比她大，所以她就处处摹仿她們。

但是，她对待同班的同学却相当厉害。特别是她常常命令一个自称为琪玲的小姑娘，——塔塔林諾夫家的人也都这么称呼她。卡佳因为琪玲不喜欢讀書很生气。

"琪尔加，你讀过'杜布罗夫斯基'① 嗎？"

"讀过。"

"撒謊！"

"撒謊你啐我。"

"那么你說，为什么瑪莎沒有嫁給杜布罗夫斯基呢？"

"嫁給他啦。"

"好說！"

"我讀过的，她嫁給他了。"

当我把"叶林娜·罗宾逊"还給她时，她也要同样考查我。可是这次就大不一样了！随便挑哪个地方我都可以接下去背誦出来。她平常不喜欢表現惊訝的神情，因此只是說：

"你这是和八哥兒一样，死記的。"

---

① '杜布罗夫斯基'是普希金写的一部小說。——譯者注。

可以这样来推断，她以为自己并不亚于叶林娜·罗宾逊，她自信在那种絕望的情况下，她能同样的勇敢。不过照我的看法，一个人如果准备碰上那种非同寻常的命运，就不該老是站在鏡子跟前照来照去，尤其是在荒島上，根本就不可能有鏡子。可是卡其加却老是离不开鏡子。

在我开始到塔塔林諾夫家串門的那个冬天，卡佳正热中于爆炸的玩意兒。她的手指經常是烏黑烏黑的，带着烧伤的疮疤，她的身上和彼其加有个时期一样，經常发散出弹葯的气味。她借給我的書本的折縫里，常夹着氯酸鉀粉末。后来卡佳突然不玩炸葯了。她埋头讀起“百年来的新发現”。

这是一本很好的書，是十五，十六世紀的著名航海家和征服者克里斯多芬·哥倫布，費迪南多·科尔特斯[1]等人的传記。

这本書是怀着对伟大人物衷心庆賀的心情写成的。我仿佛現在还看見他們那以远方快帆为背景的椭圓相片。

在一个地球仪的前面画着亚美利哥·維斯普其[2]的象，美洲就是用他的名字命名的。他拿着圓規，放在一本摊开的書上，他生着滿脸鬍鬚，样子愉快而机灵。瓦斯柯·努尼叶斯·巴里波[3]穿着鎧甲，戴着头盔，盔上插着羽毛翎，站在沒膝的水中。我好象覚得这就是我們俄国那位到过太平洋的瓦西加。不用說卡佳，就連我也被这本書迷住了！她讀这本書讀得簡直发了狂。她老是迷里迷糊的，就是清醒的时候，也好象只是为了向人們报导“科尔特斯带着特拉克斯卡兰人的祝福走上征途，日內即将到

① 費迪南多·科尔特斯(1485—1547)，西班牙人，曾征服南美，占領墨西哥，对当地印第安人大肆屠杀。——譯者注。

② 亚美利哥·維斯普其(1451—1512)，意大利航海家。——譯者注。

③ 瓦斯柯·努尼叶斯·巴里波(1475—1517)，西班牙航海家和殖民者。——譯者注。

达人烟稠密的云基族的首都”。

在她讀了“百年来的新发現”以后，把以前叫做瓦西娜的小猫也改名为墨西哥的一个山峰名称依普达克丘胡阿特尔了。

她还想給尼娜·卡比丹諾芙娜也取一个山峰的名字，叫波波卡捷别特尔，但是沒有成功。除了称呼“姥姥”之外，尼娜·卡比丹諾芙娜一概不答应。

总而言之，如果卡佳眞对什么事有过遺憾的話，那么她所遺憾的无疑問只是因为墨西哥不是她夺取来的，因为秘魯不是她发現，不是她征服的。但是一切还有待于将来，我知道她向往的是什么。她想作一个船长。

8 学校剧团

表面看来，我和他們認識似乎除了好处之外該不会有别的了吧？然而还不到半年，我就被人赶出来了……

这件事是因学校剧团引起来的，而学校剧团的事又是因有一天柯拉布略夫来上班，宣布即将要在大礼堂演剧引起来的。

柯維奇加在五年級班会上提議抵制可恶的“大髭子”的时代早已过去了。我們地理教員的长腿，他的精細，甚至連他那尽人皆知的“爱管閑事”的脾气也不再惹人发火了。一方面，因为他在印度看見过活的行者，另一方面，还因为他在中国吃过松花蛋而原諒了他。現在他又想出了一件新鮮的玩意兒，組織学校剧团。

剧团需要导演，演員，美术設計，道具，服装，現在却突然发現，原来这些行道的代表人物都在我們学校里学习。甚至还找到一位詩人兼剧作家，就是娜司嘉·謝卡柴娃。

很可惜，我已經不太記得我們剧团首届演出的悲剧“时間到了”的剧情。大意好象是一位沒有子女的男爵夫人收了一个养子，但不知道他是犹太人。可是保姆——反派角色，一个慣于訛詐的家伙，却知道这件事，她想借此索取錢財，于是威胁說，她要把这件丑事宣揚出去讓大家都知道。这时养子已經成年，正打算結婚。悲剧就这样开始了。

多少有点兒令人納悶的是：伊万·巴甫雷奇（柯拉布略夫的名字和父名）将戏中所有較好的角色全分配給了那些早已沒人管理的同学。“时間到了”中养子这个角色——善良的主角，正面人物——由格里什卡·法伯尔担任。他过去是教員的死对头，第一号会出調皮主意的家伙。他演得很好，只是嗓門太高。观众一連叫他謝了十一次幕。他站在后台上，渾身都湿透了，象只老鼠似的兴奋得发抖，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可是观众一次又一次地叫好。他成名了。后来这位成了名的演員变得异常傲慢，但却不再調皮了。

总之，这个剧团在第四学校中产生了出人意料的影响。柯拉布略夫說过，这些到学校里来的孩子，“与其說是来念書，还不如說是来吃飯”，这时他們却突然結成了一种“劳动关系”。

我想順便說一下，也不是特别吹嘘这个剧团，这的确是一个优秀的剧团。我們甚至还到其它的学校去巡迴演出过。我們每天到柯拉布略夫家（他住在領子街）去听我們的演員排演。只要有格里什卡·法伯尔参加排演，滿可以不必进屋，在院子里听就行了。总之，这回事实在是有趣极了。起初我作张貼戏报的工作，后来就逐漸画起戏报来了，其中有一张画着綠鸚鵡的，画得十分成功，甚至柯拉布略夫还要了去留作紀念。

全莫斯科都开始談論第四学校，而在学校里就談論柯拉布

略夫。他是总导演，同时又是总化装，还是道具兼布景。現在，高年級的女同学居然发現柯拉布略夫也很漂亮了。不是漂亮，而是潇洒！这有什么呢！他也的确是很潇洒，特别是穿着那套灰色新服装，身材削瘦匀称，口里衔着一个长烟嘴，笑嘻嘻地用一个手指摸弄着鬍子的时候。

我不知道别的教員是不是喜欢我們的剧团。尼古拉·安东內奇却是在每次初演的时候都坐在头排，鼓掌时比别人鼓得都要响。大概他是喜欢的。但是他对于柯拉布略夫的名字現在在学校里这么吃得开，心里似乎不太舒坦，例如人們常說"我要告訴伊万·巴甫雷奇"，"伊万·巴甫雷奇派我来的"等等。也許言者无意，但老是有人对着尼古拉·安东內奇談柯拉布略夫，說他原来是一个好人。

尼古拉·安东內奇津津有味地听着，掰动着手指头，一面笑着，脸色逐漸变白了。

这时突然一幕慘剧发生了。

9 柯拉布略夫求婚。教育的責任

这是个星期日，午前，塔塔林諾夫家等待着客人。卡佳在画"百年来的新发現"中的"西班牙人和印第安人初次会見"的插图，我則被尼娜·卡比丹諾芙娜弄到厨房里去工作。她有点兒心神不安的样子，老是在傾听什么，并且不时对我說：

"嘘，嘘，門鈴响了。"

"这是街上的响声，尼娜·卡比丹諾芙娜。"

但是她仍旧在側耳傾听。

最后她到餐厅里去了，終于認了听門鈴。我把門打开。进門来的是柯拉布略夫，他穿着一件浅色的单大衣，戴着浅色的礼帽。我还是头一次看見他穿着得这样整齐。

他問瑪丽亚·瓦西里耶芙娜是不是在家的时候，声音微微有些发抖。我回答說："在"，他还呆呆地站了几秒鐘，沒有馬上脫掉大衣。后来，他就走到瑪丽亚·瓦西里耶芙娜那兒去了。我看見尼娜·卡比丹諾芙娜輕手輕脚地从餐厅里回来。为什么她要踮着脚尖走路呢？为什么她显得那么激动，那么神秘呢？

从这会兒开始，我們的事兒糟糕透了。尼娜·卡比丹諾芙娜削着馬鈴薯皮，刀子却从她手里掉了下来。她跑到餐厅里去似乎是要拿什么东西，可是回来时却仍然空着两只手。她每次回来，都另外拿一个馬鈴薯来削，因此現在籃子里已經有相当多的只削了半边的馬鈴薯。当尼娜·卡比丹諾芙娜撿了一个这样的馬鈴薯切成小块，滿脸心事的样子将馬鈴薯放到湯里去的时候，我眞不知道如何是好。她一定有什么心事。可是有什么心事呢？很快我就知道了；她不是个善于保守秘密的人。

起先她回来时一句話也不說，只作着各种莫名其妙的手势，这些手势大致可以理解为："天哪，我的上帝啊，会出什么事呢？"

后来她就自言自語嘟囔起来，再后，她叹了口气，就嘮叨开了。原来是件惊人的新聞。柯拉布略夫是来向瑪丽亚·瓦西里耶芙娜求婚的。什么叫做"求婚"，这个問題自然我是知道的。他想和她結婚，因此来問她是不是同意。

她究竟同意不同意呢？假若我不在厨房里，尼娜·卡比丹諾芙娜也同样会和她那些鍋兒罐子开討論会的。她是不能够保持沉默的人。

"他說，我的一切，我的全部生命都交付給你，"不記得是第

三次还是第四次她从餐厅里回来时，传着說道，“我不惜一切。”

我謹慎地說道：

“眞的嗎？”

“我不惜一切，”尼娜·卡比丹諾芙娜又郑重地說了一遍。“我看到了您的生活，您的生活是不好的，看見您这样我感到很痛苦。”

她正要拿馬鈴薯，但是立刻又出去了，回来时眼睛是湿潤的。

“他說，他一直在向往着有一个家，”她传达他的話說，“我是孤孤单单的一个人，除了您，我什么人也不需要。我早已把您的痛苦当成了自己的痛苦。他說的大都是这一类的話。”

“大都是这一类的話”是尼娜·卡比丹諾芙娜自己加上的。过了約摸十分鐘，她又出去了，回来时带着一种很作难的样子。

“我和这些人纏够了。”她眼睛一眨一眨地說道。“他們妨碍我工作。您知道我这是指的誰。請相信我，他是个可怕的人。”

尼娜·卡比丹諾芙娜叹了一口气，坐下了。

“不，她不会嫁給他。她已經沒有这种心緒了，他也上了年紀了。”

我不知道該怎样回答，还是謹愼地說道：

“眞的嗎？”

“請相信我，他是个可怕的人，”尼娜·卡比丹諾芙娜沉思地又說了一遍。“或許是——天哪，可怜可怜吧！也許是！”

我規規矩矩地坐着。午飯也沒有按时开。白色的水珠兒在爐板上滚动，煮着馬鈴薯的水不断地沸騰……

老太婆又出去了，这次在餐厅里呆了十五分鐘左右。回来

后，眯縫着眼睛，拍了一下手說道：

"不嫁了，已經拒絕了。天哪，可怜可怜吧！多么好的一个男人。"

瑪丽亚·瓦西里耶芙娜拒絕了柯拉布略夫，她大概自己也不知道应該喜欢还是难过。

我說道：

"可惜。"

尼娜·卡比丹諾芙娜惊异地看了看我。

"为什么呢，也可以改嫁嘛，"我又加了一句說。"她还很年輕。"

"别胡說……"尼娜·卡比丹諾芙娜气忿忿地刚要說下去。

突然她作出庄重矜持的样子，一搖一摆地走出厨房，在門厅里会見了柯拉布略夫。他的脸色惨白，瑪丽亚·瓦西里耶芙娜站在門边，默默地看着他穿衣服。从她的眼睛上可以看出她刚哭过。

"可怜的人，可怜的人。"尼娜·卡比丹諾芙娜好象是在自言自語地說。

柯拉布略夫吻了吻她的手，她吻了吻他的前額；为此她不得不踮起脚尖来，他也不得不弯下腰去。

"伊万·巴甫洛維奇，您是我的朋友，也是我們的朋友。"尼娜·卡比丹諾芙娜庄重地說道，"您要知道，您在我們这兒永远象在亲人的家里一样。我知道您是瑪莎最好的朋友。这一点瑪莎也知道。"

柯拉布略夫默默地行了个礼。我很可怜他。我簡直不能理解，为什么瑪丽亚·瓦西里耶芙娜要拒絕他。照我的眼光看来，

他們实在是很相称的一对。

老太婆大概等待着瑪丽亚·瓦西里耶芙娜叫她，把柯拉布略夫怎样求婚，她是怎样拒絕的經过告訴她。可是瑪丽亚·瓦西里耶芙娜并沒叫她，相反地，却把自己反鎖在房間里，可以听見她在里面从一角到那一角来回走动的声音。

卡佳画完了“西班牙人和印第安人初次会見”的图画，想給她看看，但是她連門也沒有开，只是在門里回答說：“等一会兒，好孩子。”

总而言之，柯拉布略夫走后，家里就变得沉悶起来，等到兴致勃勃的尼古拉·安东內奇回来，并且宣称要来吃午飯的还不止他所計算的三个客人，而是六个客人以后，家里就更加沉悶了。

願意也吧，不願意也吧，尼娜·卡比丹諾芙娜这时也只好認真地干起活兒来。連卡佳也被請来用杯子将面切成作面片湯用的小圓片兒。她很起劲地动手做起来，脸都胀得通紅通紅的，面粉弄得滿身都是，鼻子上，头发上都是。但是不大一回兒她就作厌煩了，于是决定不用杯子，改用旧墨水瓶来切，这样好切出一个一个的小星星来，不再是一些小圓片兒了。

“姥姥，这样更好看，”她悬求地对尼娜·卡比丹諾芙娜說道。

后来她又把这些小星星揉和到一起，說是她要自己单独烤餡餅。总而言之，她实在帮不了什么忙。

六个客人！都是誰呢？我从厨房里向外张望，一面数着。

第一个来的是教务主任魯席切克，綽号叫“高尙的法德捷”。我不知这綽号是从哪兒来的，誰都知道他究竟有多么高尙！繼他而来的是教員李和，这是个禿头胖子，头长得可笑。在他来

后又到了一个什么人，都是教育工作者。后来那个德国女人来了，她同时又是法国人，因为她教德語和法語。我們的教員，胸前挂着小表的塞拉菲瑪也来了。令人意想不到，最后进来的是八年級学生沃兹契可夫。这位沃兹契可夫是个典型的“列多夫学生”。他穿戴整洁，甚至还扎着扣上有 MPУЛ 字样的皮带，意思就是“莫斯科列多夫实科中学”。他是高年級学生在校务会中的代表。

总之，整个校务会的人差不多都在这里了。請校务会所有的人来吃飯，这是頗为奇怪的事。

我坐在厨房里，听他們談些什么。門敞着。先是李和談“食品”問題，說現在快要出新鈔票了。今天一磅奶油值一千四百万，明天就要同战前一样只要二十戈比。今天賞看門的人一千万，明天只要給十戈比，“他还会向你点头哈腰，感激不尽哩”。

“嘿，我多么傻，刚刚把桌布卖了二亿三千万，”塞拉菲瑪·彼得罗芙娜叹了一口气，說道。

后来他們就談起柯拉布略夫来了。唉呀！原来他是个討好苏維埃政权的人。他为了“造成个人势力”，眞是煞費苦心，連胡子都染紅了。他搞剧团这种为害匪浅的玩意兒，只不过是为了“贏得个人声望”。他以前結过婚，老婆被他断送了性命。开会时，他流的原来是“鰐魚式的眼泪”。

我不知道什么叫做“鰐魚式的眼泪”，但是在听見这句話时，我脑中浮現出了柯拉布略夫从瑪丽亚·瓦西里耶芙娜屋子里走出来的神情：他的脸色慘白，胡子往下垂悬着，象是粘上去的。于是我明白了，剧团的事也好，妻子的事也好，“鰐魚式的眼泪”(不管这句話是什么意思)也好，他們說的全是謊話。他們是他的仇敌，这些人正是他今天刚刚对瑪丽亚·瓦西里耶芙娜所說的那

些人："我和这些人纒够了，他們妨碍我工作"。

在說"鰐魚式的眼泪"之前，还有一番談話。但这时我听見尼古拉·安东內奇的声音，我明白了，这不是談話，而是密謀。他們想把柯拉布略夫赶出学校去。

尼古拉·安东內奇拐弯抹角地开始說道：

"教育工作必須注意方式方法……"

然后他把話題轉到柯拉布略夫身上，并且首先"对他的才能給予应有的估价"。至于"他妻子死的原因"和我們并沒有絲毫关系。我們感到重要的只是"他影响兒童的办法和影响的程度"。使我們感到不安的是伊万·巴甫洛維奇把学校推向一个有害的方向。因此我們必須按照教育者的天职，"忠誠的苏維埃公民的天职"給我們指出的那样来对待这件事。

这时，因为尼娜·卡比丹諾芙娜把空盘子弄得嘩啦嘩啦的响起来，所以我沒有听清楚尼古拉·安东內奇所說的教育者的天职給他指出的是什么。等到尼娜·卡比丹諾夫娜将第二道菜送到餐厅里去以后，我才从整个談話中了解到了他們想干什么。

第一，在下次校务会議上，准备建議柯拉布略夫"講地理时，不能超出提綱的范围"。第二，他的活动将被認为是把"劳动教育的思想庸俗化"。第三，解散学校剧团。还有第四，第五等等。这么一来，柯拉布略夫一定会負气走掉。象高尙的法德捷所說的那样——"揚长而去"。

这的确是一个卑鄙的計划，我奇怪尼娜·卡比丹諾芙娜竟能忍耐住，不插一句嘴。但是很快我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大概从上第二道菜开始，她就在惋惜瑪丽亚·瓦西里耶芙娜拒絕了柯拉布略夫。她别的什么事也沒有想，所以什么話也沒有听

見。她嘴里嘟嚷着，不时地聳着肩膀，有一次甚至大声説：

"看吧！現在作母亲的人算得了什么呀？"

她准是在抱怨瑪丽亚·瓦西里耶芙娜，为什么在拒絕柯拉布略夫以前沒有和她商量。

客人都散了，而我还不能决定应該怎么办？

这眞是太不走运了，柯拉布略夫恰好就在这一天跑来求婚。他要是呆在家里就好多了。那我就可以把我所听来的全盘告訴給瑪丽亚·瓦西里耶芙娜。可是現在就不合适了，甚至不可能：因为她沒有出来吃飯，反鎖着門，誰也不讓进去。卡佳坐下来准备功課，尼娜·卡比丹諾芙娜突然説她脚都站不住了，想睡覚，説完便立刻躺下睡着了。我叹了一口气，便告辞回去了。

10 "复信謝絶"

兒童教养院的值班員，跛子雅飞已經来过两次，探視我們是在睡覚还是在吵鬧，是不是都躺下了。

走廊上的过夜灯亮了。瓦尔加·朱可夫睡着的时候，眼皮不住地哆嗦，象狗的眼皮一样；他是不是眞的梦見他的狗了？罗馬什卡呼嚕呼嚕地鼾声大作。只有我沒有睡，仍然在想事情。

想法一个比一个精彩。我这时仿佛是在全校大会上发言反对尼古拉·安东內奇，并且当众揭露他們要把柯拉布略夫赶出学校去的卑鄙計划。我这就写信給柯拉布略夫……我开始拟信稿，随后就睡着了……

很奇怪，我刚一醒来（比旁人都早），就恰巧从昨天晚上終止的那个地方繼續向下拟信稿。这时，彼其加的尺牍大全总該

对我有些用处了吧！我于是回忆起我們念过的那些信。“复信謝絕”：“辱承垂爱，实深感激……”这不合适！“答友人盛情款待書”和“請償付債务書”同样不合适。“鰥夫致淑女書”我又忘了。而且这也不相当，因为我旣不是鰥夫，柯拉布略夫也并非淑女。

最后我打定了主意。

这时天色还早，才八点鐘，外面如同夜間一般漆黑。当然，这是阻止不了我的，跛子雅飞想要拦住我，但是我挣脫开身，从后門跑掉了。

柯拉布略夫住在領子巷的一所带百叶窗和門廊的木房里，很象是在住别墅。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当时深信他沒有睡覺。很清楚，一个昨天遭到瑪丽亚·瓦西里耶芙娜“謝絕”的人是睡不着的。他的确沒有睡。屋子里点着灯，他站在窗前，凝視着外面，——是那样聚精会神，眞是天知道，好象外面发生了什么稀奇的事情一般。那样聚精会神，以至我在窗根底下对他作手势，他也半天沒有发現我。

“伊万·巴甫雷奇。”

但伊万·巴甫雷奇眯縫眯縫了眼，搖了搖头，便走开了。

“伊万·巴甫雷奇，請开門，是我呀！”

过了一会兒功夫，他披上大衣回来，走到門廊上。

“是我，格利高里耶夫，”我怕他忘了我，所以又重复說道。他有点奇怪地看着我。“我来找您，告訴您一件事。他們想解散剧团，想把你……”我似乎沒有說“赶走”。也許是說了，因为这时他突然清醒了过来。

“进来！”他簡短地說了一声。

他家里一向是很整洁的，書放在書架上，床上舖着洁白的被

单，枕头上盖着罩布。一切都有条不紊。今天不整洁的恐怕只有主人自己。他的眼睛一会兒眯縫着，一会兒瞪得挺大，仿佛他眼前的一切都在向四处扩散。沒有疑問，他这一夜都沒有睡。以前我还沒有看見他这样的疲倦过。

“哦，薩尼亚，”他恍惚地說道，“怎么回事？”

“伊万·巴甫雷奇，我本来想写信給你的，”我热心地回答說，“一句話，問題就在学校剧团身上。他們說你的妻子是被你折磨死的。”

“慢着！”他笑了笑說。“誰說我把妻子折磨死了？”

“大家都說。‘他妻子死的原因和我們并沒有絲毫关系。思想的庸俗化，这是使我們最为憤慨的’。”

“我一点也不明白，”柯拉布略夫严肃地說道。

“是的，庸俗化，”我肯定地重复了一遍。

从昨天开始，我就反复地念着这几个字：“庸俗化”，“声望”和“忠誠天职”。現在“庸俗化”已經說了，还剩下“声望”和“忠誠的天职”了。

“‘开会时，他流的是鱷魚式的眼泪’。”我急促地繼續說道。“‘他搞这种为害匪浅的玩意兒，不过为了贏得个人声望’。不錯，是‘声望’。‘他是个討好苏維埃政权的人’，‘我們应該尽到我們忠誠的天职’。”

有些話也許被我搞乱了。但是把我昨天听到的話照样背一遍，对我来說，究竟比用自己的話講要容易一些。不管怎样吧，柯拉布略夫总算听懂了我的意思，他很清楚地理解我了。他的眼睛突然消失了方才那种迷惘的神气，两頰微微紅了起来，疾速地在屋里走了一轉。

“这很有趣，”他低声自言自語地說道。虽然实际上他一点

也不感觉有趣。"那么意思是説，同学們不願意剧团解散娄？"

"很清楚，大家是不願意的。"

"那么，你是因为剧团的事来的？"

我沉默了一会兒。也許是因为剧团的事，也許是因为沒有柯拉布略夫，学校里会变得消沉起来，也許是不喜欢他們那么卑鄙地暗中商量把他赶出学校……

"啊！这些世界上最无聊的混蛋！"他突如其来地説道。

他紧紧地握了握我的手，又开始沉思地从这一个角落到那一个角落来回地踱着。他这样走着走着就走到外面去了，大概是到厨房里去了，一会兒提了开水来，泡上茶，从壁厨里取出茶杯。

"我本来想走的，可是現在决定留下了，"他声言道，"我們将进行斗爭，对嗎，薩尼亚？暫且讓我們来喝一杯茶吧。"

我不知道校务会議究竟举行了沒有，在这个会議上，柯拉布略夫是应当因"将劳动教育的思想庸俗化"而受到严厉清算的。显然，这个会沒有开，因为他沒有被清算。每天早上"鬍子"若无其事地在鏡子前梳他的鬍子，然后去上課……

过了几天，剧团宣布了新剧目："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格里什卡·法伯尔扮演智者。照原角色，他应該在二十五岁上下。但他却宁願扮一个禿头，鑲金牙的中年人。同尼古拉·安东內奇一样，他老用指头敲桌子，总之，要是他不那么拼命地喊叫的話，可以説是演得很好的。

从共青团区委会来了两个黑色鬈发的少年，倡議在我們学校里組織团支部。瓦尔加立即問道，兒童教养院的可不可以报名，他們回答説可以，不过由十四岁开始。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几

岁。依我算該快滿十三岁了。为防万一起見，我还是說自己十四岁。不过，大家总是不相信。大概因为当时我的个兒太矮小了。

教員中参加这个会的只有柯拉布略夫和尼古拉·安东內奇。柯拉布略夫講的話相当严肃，他先簡略地祝賀我們团支部的成立，接着就因为我們不好好学习，調皮搗蛋，把我們訓了好久。尼古拉·安东內奇也講了話，講得滿漂亮，他先向区委会的代表，年輕的一代致敬，最后还朗誦了一段涅克拉索夫的詩“綠色的树林在喧嚣”。奇怪的只是他在講話时突然把手指捏得喀巴喀巴的响，好象是要把手折断了似的。这时他的臉色显得很快乐，甚至还微笑。

散会后，我在走廊上碰見他，說：“您好，尼古拉·安东內奇！”可是不知为什么，他不答理我。

总而言之，一切都很好。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先是打算去塔塔林諾夫家，后来突然又决定不去了，最好等明天在街上遇見卡佳时，就在街上把馬鞭和粘土給她，这是她向我要的东西。还沒有过半个小时，我的想法又变了。

給我开門的是老太婆，我正想进去，不知道为什么她却握住門鍊，好象是在考虑讓不讓我进去。后来她把門敞开，在我耳边迅速地低声說：“到厨房里去”，同时輕輕地在我背上推了一下。

我迟疑了一下，只是感到納悶。就在这一瞬間，尼古拉·安东內奇走进了門厅，看見了我，便把灯打开了。

“啊……啊！”他用一种从喉嚨里挤出来的声音說。“你来啦。”

他使劲抓住我的肩膀。

“忘恩負义的告密鬼，无赖，奸細！今后，你的脚再也不要踏到这兒来！听見了嗎？”

他恶狠狠地咧了一下嘴，我看見了他嘴里的金牙閃閃发光，这就是我在塔塔林諾夫家最后看見的东西。尼古拉·安东內奇一手开門，一手把我象小猫似的扔在楼梯上。

11 出　走

兒童教养院空了，学校里也冷清清的。今天是星期日，大家都出去了。只有罗馬什卡在那些空无一人的屋子里轉来轉去，不断地在計算着，大概是在計算他未来的財产。炊事員在厨房里一面做飯，一面唱歌。我在爐灶后面找了一个較暖和的角落思索起来。

这准是柯拉布略夫干的。我原来想帮助他，可是他却这么卑鄙地对我恩将仇报。他到尼古拉·安东內奇那兒去把我出卖了。

他們原来是正确的。不論尼古拉·安东內奇，还是德法两个国籍的女人，还是說柯拉布略夫在开会时流“鰐魚式眼泪”的李和，都是正确的。他是个卑鄙的小人。而我反而因为瑪丽亚·瓦西里耶芙娜拒絕了他而对他表同情哩。

“彼佳大叔·什么叫做‘鰐魚式的眼泪’？”

彼佳大叔从鍋里捞出了一块热气騰騰的白菜来。

“大概是一种酱油。”

不，这不是酱油……我正想說，这不是酱油，但这时彼佳大叔突然拿着他为了知道菜湯是否煮好而用牙齿尝过的白菜，围

着我慢慢地，一摇一晃地兜了一圈兒。我的头感到一陣发暈，叹了口气，就到寢室里去了。

罗馬什卡在寢室里的窗子旁边坐着，口里正在計算着。

"現在十万将来只等于一戈比了，"他向我說道。"如果把廢币收集起来，到一个大家还不知道币值改革的地方去全买了东西，回来卖成新币。我算了一下，一个金卢布可以賺四万倍。"

"再見吧，罗馬什卡，"我回答他說，"我要走了。"

"哪兒去？"

"土耳其斯坦，"我說，虽然一分鐘之前，我还沒有想到土耳其斯坦。

"瞎說！"

我一声不响地从枕头上取下枕头套，把我的全部家当——衬衣，褲子，第四学校全体同学合演"馬拉"[①]的戏报，和医生伊万·伊万內奇留給我的黑皮管都塞在里面。所有的蛤蟆，兎子都被我摔碎，扔到垃圾箱里去了。連那个前額上的头发卷曲着有点象卡其加的泥女孩也扔进去了。

罗馬什卡很感兴趣地注視着我。他还是在低声数着，不过沒有刚才那么带劲兒了。

如果一个卢布能賺四万，那么一百卢布……

再見吧，学校！我再也不念書了。干嗎还要学习呢？已經学会了写字，讀書，演算，这就行了，这样就够好的了。我走了以后誰也不会怀念我。也許瓦尔加会回忆一次半次的，不过将来也要忘記的。

---

① 讓·保罗·馬拉（1743—1793），十八世紀法国杰出的資产阶級革命家，雅各宾党人的領袖之一。——譯者注。

“那么一百卢布就能赚四十万，”罗馬什卡嘟嘟囔囔說，“一百卢布是百分之四十万的利。”

不过我还要回来。到那时候，我还要去找尼娜·卡比丹諾芙娜，把錢扔給她，并且說：“把我在你們家吃的东西的錢都拿回去吧。”还有那位柯拉布略夫，到那时候，人家已經把他赶出学校了，他跑来向我訴苦，悬求我原諒他。哼，决不原諒！

忽然，我回想到他站在窗前的情景。在我到他那兒去的时候，他非常忧伤，稍有几分醉意的样子，聚精会神地望着外面。得了吧，这会是他干的嗎？他干嗎要出卖我呢？相反他应該不露声色，假装一点兒也不知道这次秘密会議的样子。我不应当罵他。这不是他，那么又是誰呢？

“啊！瓦尔加！”我突然对自己說道，“从塔塔林諾夫家回来后，我不是将一切都告訴了他嗎。这是瓦尔加！”

但是記得那时瓦尔加連話都沒听完，就呼呼睡着了。而且瓦尔加决不会作出这种事情来的。

也許是罗馬什卡？我瞟他一眼。他的面色蒼白，耳朵通紅，坐在窗前老是乘来乘去的計算着。我仿佛覚得他象一只鳥兒似的，他用一只滚圓扁平的眼睛偸偸地监視着我。不过他并不知道啊……

現在，我肯定了这事不是柯拉布略夫干的时，似乎是可以留下来了。不过我那时头痛得很厉害，耳朵里老是嗡嗡的响，并且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覚得，既然我已經告訴了罗馬什卡要走，那么就不能再留下来了。我心里感到一陣凄凉，最后一次向周围看了看。那是白色的灯泡，在熄灯后的黑暗中我常常长久地注視着它，那是有放衣服格子的墻壁，那是我的衣服格子，旁边是瓦尔加的。再就是床，床……

我叹了一口气，提起包裹，向罗馬什卡点了点头，就走出来了。大概我那时烧得很厉害，因此走到外面时，我还奇怪为什么外面那样冷。但尽管这样，我走到学校的大門口时还是把制服上身脫掉，把大衣穿在衬衣的外面。制服上身决定卖掉，照我的估計，可以卖一千五百万左右。

虽然我在苏哈里摊販市場上轉了整整一天，但因为头痛发烧，所以記不十分清楚在那兒作了些什么。我只記得曾經站在一家小卖店門口，从門里发出陣陣炒葱的香味，我拿着制服上身，声音微弱地叫卖着：

"誰买……"

記得当时我还因为自己的声音这般微弱而感到奇怪。記得当时在人丛中还发現一个身材高大，穿着两件皮大衣的男子，一件穿在身上，另一件(要卖的)披在肩上。非常奇怪，无論我带着我的貨物走到什么地方，总是撞見这个人。他呆呆地站着，身材高大，長着滿脸鬍子，穿着两件皮大衣，对于那些弄弄衣襟，摸摸領子的买主們連看也不看一眼，阴沉地說着價錢。

記得在市場上游蕩了整整一天，我拿衬衣換了一块胡蘿卜餡餅，但只咬了一口就不想吃了。

我找了一个地方取暖，虽然身上已經不感覺到寒冷了，可是却发現指头仍然发青。我把餡餅藏到枕头套里去，記得当时我总是不断地去看餡餅挤碎了沒有。大概我已經覺得自己是生病了，很想喝点水。我几次决定拉倒不卖了，要是再过半小时还卖不掉，就到茶館里去換一杯热茶喝。但是这时我似乎又覺得买主就要出現，于是我又决定站半小时。

記得当时聊以自慰的是，那个身材高大的男子同样也是怎样也卖不掉他那件皮大衣……

要是抓点雪吃下去也許能好些，但苏哈里摊販市場地下的雪太脏，到馬路上去罢，路又太远。然而我終究还是去吃了。很奇怪，我覺得雪挺暖和。大概我是呕吐了，也許并沒有。只記得我坐在雪地上，有人扶住我的肩膀，因为我跌倒了。最后他們不再扶我了，我又躺下去，舒舒服服地把两条腿伸开。有人在我跟前說話，似乎是說："癲癇病，癲癇病……"后来他們想把我的枕头套拿去，我听見他們劝我說："眞是个怪物，給你枕在头下呀"，但是我紧紧抓住枕头套不放。穿两件皮大衣的男子慢吞吞地从我身边走过，突然抛下一件皮大衣来盖在我身上。但这些都是烧得太厉害时的胡思乱想，我很明白，自己是烧糊塗了……有人还拉了一下我的枕头套。我听見一个女人的声音：

"包裹他是不肯給的。"

接着是一个男人的声音：

"連小包裹一起放上去就是了。"

后来又是一个男人的声音：

"这显然是恶性流行性感冒。"

迷迷糊糊，什么事也不知道了……

就是現在，我只要稍微有点发烧，就会立刻迷糊起来。烧到三十八度我就要說胡話，把亲戚朋友們吓得要死。但是象这次害恶性流行性感冒那么舒舒服服的发迷糊却还是第一次。我象是在一間寬敞，明亮的房間里，眼前現出一幅瀑布的景色。流水从险峻的峭壁上飞泻而下，流到一条狹窄的乱石河床上。好极啦！水波在阳光下閃耀，河底的綠石眞有說不出的美妙！

我象是坐在臥橇上到什么地方去，身上蓋着老羊皮。天渐渐黑下来，但是我还能看見雪在臥橇下两条粗壮的滑木之間飞速

地倒退。仿佛我們是停着不动，而是雪在奔跑；只是从垂悬在臥橇旁的盖着膝盖的毡子划出的黑迹才能看出我們是在不断地前进。我感到那样的舒适，那样的暖和，似乎再也不需要什么了，只要这样坐着雪橇在冬天里走一生就行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么美好的幻覺。我当时是掙扎在死亡的边緣上，我曾經两次被当作不治的病人把我用屏风和别的病人隔离开来。我生的是萎黃病，患这种病的人必死无疑，除了一个医生之外，别的医生都对我搖头，他們只是每天早晨惊奇地問道：

“怎么，他还活着？”

这一切都是在我苏醒过来以后才知道的……

不管怎样吧，我总算沒有死。相反地，我恢复健康了。有一次，我睜开眼睛，还以为是在兒童教养院，正想从床上跳起来……一个人的手把我按住了。一个已經忘記了，但却又非常熟悉的面孔貼近我。諸位愛信不信，这原来是伊万·伊万內奇医生。

“医生；”我叫了一声，由于高兴和虛弱禁不住流下泪来，“医生。暴风雪！”

他瞪着眼睛直看着我，大概以为我还是在說胡話哩。

“馬鞍，箱子，暴风雪，喝酒，阿布拉木，”我一口气地說道，同时感覚到眼泪順着脸一直流到口里。“是我呀，医生。我是薩尼卡。大夫，您还記得在乡下嗎？我們掩护过您。您教过我。”

他又把我端詳了一下，然后鼓起腮帮，大声吐了一口气。

“啊呀！”他說，并且笑了起来，“怎么能不記得呢？你妹妹在哪兒？你怎么成了这付样兒？那时候你只会說‘耳朵’，而且还是

干嚎呀。学会說話了，是吧？怎么跑到莫斯科来的？怎么忽然想起来要寻死呢？”

我本来想說，我根本沒有打算死，而且恰恰相反，但他突然用手堵住了我的嘴，另一只手赶忙掏出手絹，把我的脸和鼻子擦干淨。

“小老弟，躺着别动，”他說道。“你还不能說話。哑吧就哑吧两天吧。鬼晓得，你已經死过去多少次了，現在究竟怎样还不知道呢，如果突然說太多的話，那可就要了！那可眞是再也見不到你了。”

12 严肃的談話

諸位也許会以为旣然我曾有一次苏醒过来，那么就会漸漸复原了吧？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恶性流行性感冒刚好，我又患了脑膜炎。伊万·伊万內奇这回同样不肯甘心說我的小命已經交代了。

他常常接連几小时地坐在我的病床旁边，研究我的手和眼睛所作的种种奇怪的动作。最后，我終于又活过来了，虽然还白眼朝天地躺了很久，可是已經脫离危险了。就如同伊万·伊万內奇所說的那样：

“脫离了死亡的危险，然而还沒有脫离終生成为白痴的威胁。”

我总算幸运，沒有成为白痴，而且病好了以后，甚至感到比从前还聪明了些。事实上也的确是如此。不过这和生病沒有关系。

不管怎样吧，我在医院里还是住了半年多。在这个时期中，我經常，大約每隔一天，就同伊万·伊万內奇見一次面。但这些会面并沒有什么意思。当我日漸恢复健康时，他差不多已經不常到医院里来了。不久他就离开了莫斯科。到哪兒去了，去干什么，等下面我再講。

奇怪的是他在这几年里变化很少。他仍旧和从前一样爱哼两首詩。有一次，他听診完了以后，我听見他用不很滿意的声音低低地吟唱：

男爵格村瓦里都斯先生，
这位英勇的豪杰，
仍保持着原来的姿势，
巍然坐在石基上。

有些大学生常常到我們病房里来，这时候他首先用他那明亮，灵活的眼睛把他們打量一下，就牵住一个人的袖子講起課来，他一会兒把这人的袖子放下，一会兒又牵起来。我和他都回想起了"旧时代"。他感到十分惊奇的是，我还記得他用面包的軟心及其它一些别的东西作小猫和小老鼠的事，以及猫捕老鼠，咪嗚咪嗚地叫着，象真的一般。

"伊万·伊万內奇，自从你走了以后，"我說道，"我和妹妹整整一冬都用小木签叉着馬鈴薯烤着吃。"

他笑了，随后又陷入沉思中。

"小弟弟，这是我被罰作苦役的时候学会的。"

原来他过去是被流放的犯人。一九一四年，他因为是布尔什維克党党員，被流放作苦役，后来又判处終身流放。我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逃跑的，不过他流放的地点却是在很远很远，在巴倫支海附近。

“从那兒，”他笑着說道，“就一直跑到你們村子里了，我差一点兒冻死在路上。”

这时，一切眞相大白，知道他那时为什么夜間总不睡覺。黑皮管——听診器——原来是他留給我和妹妹作紀念的。話逼到嘴上，我不得不把我是在什么时間，因为什么緣故逃出兒童教养院的一字不漏地告訴他。

他很注意地听着，不知为什么总是对着我的嘴看。

“眞是太好了，”他沉思地說道，“簡直是稀罕事兒。”

我以为他想的是从兒童教养院里逃跑这件事是稀罕事兒，正打算辯解說这一点兒也不稀罕，但是他又說道：

“不聋，能听話的哑吧，也就是不聋的哑吧，Stummheit ohne Taubheit①。起初連‘媽媽’都不会說，可是現在呢，說实在的，簡直成了个大演說家了！”

他把我的情况对其他的医生講了。

我有点兒失望，关于迫使我从兒童教养院里逃跑的事，医生連一个字也沒有提，甚至好象故意装作沒有听見的样子。但是我想錯了，因为后来，在一个天气清朗的日子，我們病室的門开了，一个护士进来說道：

“格利高里耶夫，有客人找。”

柯拉布略夫进来了。

“你好，薩尼亚！”

“您好，伊万·巴甫雷奇！”

全病室的人都好奇地望着我們。大概因为这个緣故，他开始只談我的健康狀况。但是等到大家忙起自己的事情来了以后，他

① 德語。即不聋的哑吧。——譯者注。

就开始駡起我来了。嗨呀！他把我駡得眞够受！他好象是照着写好的稿子一般，把我过去对他的想法都講了出来，并且声言，如果我認为他是一个卑鄙的小人，当时就应該去找他，向他說：“伊万·巴甫雷奇，您是一个卑鄙的小人。”而我沒这样作，因为我是一个典型的个人主义者。后来他和緩了一些，因为我很沉痛地問他：

“伊万·巴甫雷奇，什么叫作个人主义者？”

总之，他駡我一直駡到会客时間終了才罢休。然而在分别的时候，他却紧紧地握住我的手，說他以后还要来。

“什么时候？”

“最近几天。我还要同你作一次認眞的談話，現在你可以先考虑一下。”

可惜他沒有說要我考虑什么，所以我只好想到哪里就算哪里。我回忆起恩斯克，司考伏罗得尼可夫老头，达莎阿姨，并且决定病一好，就馬上写封信到恩斯克去。彼其加回去了嗎？我常常想到彼其加。我們这間病房的窗戶向着花园，因此可以看見被风吹着搖搖摆摆的树梢。晚間大家都入睡了的时候，我听着树木颯颯的喧嚣声，仿佛覚得彼其加也和我一样躺在什么地方的白色病床上，一面想着，一面傾听着树木颯颯的喧嚣声。現在他在哪兒呢？也許他不喜欢土耳其斯坦，又跑到秘魯什么地方去了吧？彼其加会忽然到了秘魯。象瓦斯柯·努尼叶斯·巴里波那样，身披鎧甲，手持宝剑，屹立在太平洋之濱。他不見得能够这样。不过，当我这个宝貝在兒童敎养院的期間，究竟誰知道他到过什么地方呢？

在下一次会客的日子，瓦尔加·朱可夫来了，把他的刺猬对我大談了一通。他不知在什么地方弄到一只刺猬，在自己的床底

下給刺猬盖了一間小屋。一般的刺猬到了冬天都要冬眠，可是这只刺猬却不知为什么不睡覚。总而言之，这是一只奇特的刺猬，連它怎样搔痒瓦尔加都很感兴趣。

"它跟狗一样！"他兴奋地說道。"甚至会象狗那样用爪子敲地板。"

总而言之，整整两个鐘头，瓦尔加都在談他的刺猬。只是在临别时，他才忽然想起說柯拉布略夫向我問好，他日內就要来。

我立刻明白，这也就是要有一次認真的談話。眞有意思！我当时深信，我又要挨一頓教訓了。果然沒猜錯。

談話开始时，柯拉布略夫問我将来想作什么。

"不知道，"我答道。"也許作艺术家。"

他皺起两道眉毛，駁斥道：

"你干不了。"

說实話，我还沒考虑过将来要作什么。在我內心的深处，我願作一个象瓦斯柯·努尼叶斯·巴里波之流的人物。但是伊万·巴甫雷奇却那么有把握地說："你干不了"，我感到非常憤懣。

"为什么？"

"有很多原因，"柯拉布略夫断然說道。"首先，因为你意志軟弱。"

我大吃了一惊。我脑子里还沒有想到过自己的意志軟弱。

"沒有的事，"我垂头丧气地反駁道。"是坚强的。"

"不对，是軟弱的。假使一个人不知道一小时以后他将作什么事，这能算什么意志呢？如果你的意志很坚强，那么你就应該学习得很好。可是你学习得不好。"

“伊万·巴甫雷奇，”我着急地說道，“我只有一門‘不及格’呀。”

“是的，很不好。其实你是能够学得很好的。”

他等了一会兒，看我还要說什么。但是我一声也沒有响。

“你的自負多于你的理解。”

他又等了一会兒。

“总之，你現在应該好好想一下，你是怎样的一个人，为什么活在世界上！你刚才說想作一个艺术家。亲爱的朋友，如果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应該完全成为另一个人。”

13 我在想

說起来容易：你应該完全成为另一个人。但是怎样去作呢？我不同意說我学习很坏。也无非是算术一門“不及格”罢了，而且这还是因为有一次我擦了靴子，魯席切克把我叫了去說道：

“格利高里耶夫，你用什么油擦靴子？用臭鷄蛋拌煤油嗎？”

我答話得罪了他，自此以后，他就再不給我“及格”分数了。不过我总覚得柯拉布略夫的話还是对的，我应該完全成为另一个人。要是我的意志眞是軟弱怎么办呢？应該加以检驗。应該决定作一件事情，而且一定要完成它。开始我决定讀“猎人笔記”，这本書我去年曾經讀过一些，后来，因为我覚得它非常枯燥，便半途而废了。

眞奇怪！我这回从医院图書館里借来“猎人笔記”才讀了四、五頁，就感到这本書比过去讀时还要加倍的枯燥。我这时在世

界上唯一的希望就是如果沒有这个决定就好了。但是我对自己已經許下了諾言，甚至在被窝里还念叨过，旣是諾言就应該遵守。

我讀完了“猎人笔記”，断定柯拉布略夫是瞎說。我的意志很坚强。

自然，最好是再检驗自己一次，假定說吧，每天清早作完早操后，用冷水冲洗身体，或者是在这一年之中保証算术得“优秀”。但所有这一切我都把它推延到回校以后再說，目前只是想，不断地想。

“你的自負多于你的理解”。他为什么这样說呢？也許是因为我夸过塑造的本事？这实在太冤枉人了。卡其加才是自負的人呢！要不就是柯拉布略夫对这个字的理解不一样？要是他再来，我一定問問他。但是他沒有来，过了一两年以后，我才知道这个字并不只是“自負”① 的意思。

“你是怎样的一个人，为什么活在世界上？”我一面讀报紙，一面想着这个問題。进医院后，我开始讀报了。眞有趣。要是沒有这么多的外来語就更好了！我在这些字眼里也找到了“庸俗化”和“鳄魚式的眼泪”。

伊万·伊万內奇終于最后一次診察了我的病，并且叫我出院。这一天天气非常好。我們告别了，他給我留下了地址，叫我到他家里去。

“不过，你注意，要在二十号以前来，”他很愉快地說道。“要不然，小老弟，你就要找不到我了……”

我拿着小包裹走出医院，才走过一个区，便坐到路旁一块石墩上休息。唉，还是这么虛弱。但是眼前的一切多么好啊！莫

① 俄文 воображать 有“幻想”和“自負”两种意思。这里薩尼亚把“幻想”誤会成“自負”了。——譯者注。

斯科多大呀！我都快把它忘掉了。街道上多么热鬧啊！我感到头暈起来，不过我知道現在不会再倒下去了。我身体很好，一定能活下去。我的病已經好了。别了，医院！你好，学校！

学校里的人对我这次归来竟然那么冷淡，說实話，这眞使我有点兒扫兴。只有罗馬什卡問道：

“好了嗎？”

他那付神情仿佛是因为我沒有死掉，而感到有些遺憾。

瓦尔加是眞的感到高兴，不过他这时沒心思顧我，因为他的刺猬丢了，他疑心尼古拉·安东內奇吩咐炊事員把刺猬扔到污水坑里去了。

“早知如此，我还不如把它卖了的好，”瓦尔加伤心地說道：“有人出二十五戈比。嘿，我眞是个傻瓜，沒有卖。”

在我住院期間，新币——銀币和金币——发行了。

兒童教养院里一切照旧，只是塞拉菲瑪·彼德罗芙娜調升到高年級去了，代替她的是一个男教养員苏特金。瓦尔加說他是一个拍馬屁的家伙。他拍尼古拉·安东內奇的馬屁，拍德国人的馬屁，拍魯席切克的馬屁，还拍同学們的馬屁。

不过在这半年中，学校里也发生了一些較大的变动。第一，学校縮小了一半，一部份高年級同学轉到别的学校去了。

第二，学校大事油漆粉刷了一番，簡直認不出这就是从前的那些窗戶阴暗，天花板漆黑的骯脏房間了。

第三，大家都在談論共青团支部。現在的支部書記是瓦蓮阿姨，就是經济委員会的那位姑娘，她在一九二〇年时，手里还拿着大杓子煞有介事地在走廊上走来走去。大概她是一位很好的書記，因为我回来以后发現共青团支部那間小屋成了我校最有趣的地方。

我那时还不是共青团員，但是从医院里回来后的第三天，我就接受了瓦蓮阿姨交給我的一項任务，画一架在云端里飞翔的飞机，并且在飞机的上面題上："青年們，参加空軍友协去！"

我的指头这时好象还不是我自己的，然而我还是抱着极大的热忱去作这件工作。

总而言之，学校里比从前好玩了千百倍，我立刻参加到各种小組活动里去，并且对于集体讀报感到极大兴趣，完全忘記了伊万·伊万內奇医生，也忘記了他請我在五月二十号以前到他那兒去的这回兒事。

14 一枚五十戈比的銀币

在我終于决定到他家去的那一天，我們那兒一大清早就乱糟糟地吵成了一团，瓦尔加的刺猬找到了。原来它爬到頂楼上去了，后来不知怎么又掉到旧白菜桶里。

也許是它想起自己冬天沒有睡覚，也許是因为在桶里悶坐了两个礼拜以后身体虛弱了，所以它的神色不怎么好。无論怎样吧，应該設法赶快把它卖掉，因为它那付样子好象就要咽气了。触动它的鼻子时，它也不再藏起嘴巴，卷縮成一团了。它嘴巴周围紅褐色的鬍鬚萎靡地垂了下来。总而言之，这只刺猬完全不行了，只有把它送到大学里去，因为大学里有一个实驗室收买刺猬。瓦尔加用一条旧褲子把它包好便去了。过了一个小时，他一脸凄伤的走回来，坐到床上。

"他們要解剖它，"他对我說，为了不致哭出来，他的脸抽搐得很难看。

“怎么解剖?”

“很簡单,就是切开肚子,在里面搗騰。眞可怜。”

我們之間发生了一点兒爭論,是不是所有的刺猬的內脏都在一个地方。

“算了吧,管他呢,”我說。“另外再买一只。給了你多少錢?”

瓦尔加一声不响地松开了拳头。因为刺猬已經奄奄一息,所以只卖了二十戈比。

“我有三十戈比,”我說,“我們凑起来买一条折叠式的魚竿吧。”

我故意用折叠式的魚竿来安慰他。折叠式的魚竿是一种在小輪子上纏着长釣綫的,可以折叠起来的魚竿,因此可以把釣餌投到距岸四十公尺的地方。我还是在恩斯克看見过这玩意兒的,恩斯克的警察署长曾用折叠式魚竿釣过魚。

我們把錢凑起来,甚至还把我們所有的十戈比和五戈比的銀币拿去換了一块新的,五十戈比的銀币。我还沒有見过五十戈比的銀币,不知道为什么,这种銀币很难碰到。

由瓦尔加的刺猬而引起来的这些事耽擱了我不少时間,当我脫开身去医生那兒时,天已經黑下来了。他住在牙齿大街,离我們很远,加之現在坐电車要付錢,不象一九二〇年那样了,但我还是白坐到了那里。

在牙齿大街花园深处的一座带圓柱的白色大楼里,只有一个窗口还有亮光,我断定这是医生房間里的灯光。可是我猜錯了。原来医生住在三楼,有灯光的是在二楼。八号房間,就是这間。房間号碼下面用粉笔写着粗大的字:

“此处住的是巴甫洛夫,不是列溫松”。

巴甫洛夫就是伊万·伊万內奇医生的姓。

給我开門的是一个抱着小孩的女人，她不时嘘嘘的，怕我大声講話，問我干什么。我說明了来意。她仍旧嘘嘘不絕地說，医生在家，不过似乎已經睡了。

“你最好还是去敲一敲門，”她低声說道。“大概还沒有睡。”

“我沒有睡！”医生从什么地方喊道。“誰呀？”

“一个小孩。”

“讓他进来。”

我是第一次到医生这兒来，屋子里那么杂乱，使我感到十分惊异。在地板上，皮手套，古怪而漂亮的毛皮靴，茶叶包和烟草乱放在一起，敞开盖子的皮箱和背包堆滿了一屋子。伊万·伊万內奇医生手里拿着一个三角架，站在这一摊乱七八糟的东西中間。

“啊，薩尼亚！”他愉快地說道。“你来啦。喂，怎么样？还活着？”

“活着。”

“好极啦！咳嗽嗎？”

“不。”

“你眞行！老弟，我把你的事情写了一篇文章。”

我心里想，他是在开玩笑。

“啞吧中少有的現象。”他說道。“你可以自己看看‘医学报’第十七期，患者格某。老弟，那就是你。这下子你算是出名了。当然，暫时还只是以患者的資格而出名。但是一切还在将来哩。”

他唱起了：“一切在将来！一切在将来！”——忽然，他扑到

最大的一只箱子上去，砰的一声盖上箱盖，坐在上面，使箱子盖得紧一点。

医生大概是打算离开莫斯科。我本想問他到哪兒去，但是又一轉念，便决定先了解一下，为什么他的門上写着此处住的是他，不是列温松。

“伊万·伊万內奇，为什么您的門上写着住在这兒的是您，不是列温松呢？”

医生笑了起来。

“因为这兒住的是我，”他說。“列温松是住在隔壁房子里的。他的房間号碼是八号，我的也是八号。可是大門是公用的。明白了嗎？”

“明白了。”

医生这天談了許多話。我从沒有看見过他这样的高兴。忽然，他决定要送我点东西，就把一付皮手套送給了我，手套虽旧，但是还很好，腕口上扣着小皮带。我說不要，可是他不容分辯地把手套硬塞給我，說道：

“留下，不要声张。”

本来我应該謝謝他送我手套的，但是我沒有道謝，却說：

“您准备到哪兒去？离开这兒嗎？”

“离开这兒。”医生說道，“到最北边去，北极圈外。听說过嗎？”

我模模糊糊地想起了远洋航海长的信。

“听說过。”

“好的。老弟，我的未婚妻在那兒哩。你知道什么叫做未婚妻嗎？”

“知道。”

“撒謊。就算是知道，你也不明白。”

我开始仔細观察他要带走的一些五花八門的奇怪的东西：后档上縫着三角皮子的毛皮褲，有皮带的金屬鞋底，等等。医生一面整理东西，一面不停地談話。有只箱子怎么也盖不起来，他把箱子盖揭开，把东西都倒在床舖上，这时，一张大相片掉在我的脚旁。这是一张相当旧的，发了黄的相片，好几个地方已經折坏了。相片的反面用粗大的渾圓的字体写着：“圣·瑪丽亚全船人員合影”。我仔細观看这张相片，使我吃惊的是卡佳的父亲也在上面。一点兒不錯，就是他！他坐在正中間，双手交叉着放在胸前，和在塔塔林諾夫家餐厅里挂的那张相片一模一样。可是在这张照片上我却沒有找到医生，因此便問为什么照片上沒有他。

“老弟，因为我沒有在‘圣·瑪丽亚’号帆船上航行过，”医生呼赤呼赤喘着粗气，一面扣着箱子上的皮带，答道。

他从我手上把相片拿过去，斟酌了一下，考虑把它放在什么地方好。

“这是别人留下作紀念的。”

我想問这个人是誰，是不是卡佳的父亲，可是，这时他已經把相片夹到書里，書又收到背包里去了。

“喂，薩尼亚，”他說道，“我該走了。你以后写信来，告訴我你都作些什么，感覚怎么样。老弟，你要記住，你是一个有趣的标本！”

我記下他的地址，我們就分别了。

我步行回家，途中繞道到提維尔大街去听广播。这是莫斯科的第一个扩音机。这台扩音机非常有趣，只是声音太响，不禁使我想起了演悲剧“时間到了”的格里什卡·法伯尔。

当我走到兒童教养院时，已經快十一点鐘了。我有点惴惴不安，怕大門关了。結果却不然！大門还开着，所有的窗戶里都有灯光，是出了什么事嗎？

我象枪弹一般飞奔到宿舍里去。空空的！床舖都已經舖好，大概是准备睡覺了。

“彼佳大叔！”我看到炊事員便喊道，这时他穿了一身新衣服，手里拿着帽子，正从厨房里出来。“出了什么事嗎？”

“請我去开会。”他很神秘地小声說道。

“什么会？在哪兒？”

“全体教职学員大会，”炊事員还是那样神秘地說道。

他大概已經喝得烂醉了，所以每說一个字，就閉起眼睛歇很久。等他刚开始向我解释，說既然他被邀請去开会，那么就应該穿戴得象个人样的时候，我已經跑上楼，回学校了。

礼堂里挤得水泄不通，还有很多同学站在門口，站在走廊上。但我还是挤进去了，挤到紧靠舞台前的第一排坐下，不过不是坐在椅子上，而是坐在地上……

这是瓦蓮阿姨主持的一次庄严的大会。她的脸兒涨得緋紅，坐在主席团里，手里拿着一枝鉛笔，不断地将掉到脸上的一綹头发掠到耳后去。她是第一次在这样的大会上担任主席，因此很可以理解，为什么她会那样紧张。支部里的其他同学坐在她的两旁，用心地在写着什么东西。在他們头上，在主席团桌子上方，在整个礼堂上面，挂着我的宣传画。我惊喜得气都喘不上来了。这是我的宣传画——翱翔在云端里的飞机，并且在飞机上面題着：“青年們，参加空軍友协去！”可是把我的宣传画挂在这兒有什么作用这一点，我很久都沒有弄明白，因为发言的人都是講什么最后通牒的事。等到柯拉布略夫一講話，这才什么都

明白了。

“同学們，”他的声音并不大，但却很清晰。“苏維埃政府收到了最后通牒，一般說来，大家对这份外交文件的意义估計很正确。根据大家的看法，这份文件的作者就是地道的帝国主义分子。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如果以为他們自己并不知道这一点，或者認为从你們口中才第一次听到这种說法，那就完全錯了。不，我們应該用另外一种办法来回答这个最后通牒！我們应該在我們学校里建立空軍友协分会！”

大家热烈地鼓掌，后来柯拉布略夫每說一句話，大家都要鼓掌。并且，最后他还指了一下我的宣传画。我感到很光荣，全校的人都看着我画的翱翔在云端里的飞机，都念着上面的題字：“青年們，参加空軍友协去！”

随后尼古拉·安东內奇也講了話，講得也很漂亮。后来瓦蓮阿姨宣布共青团支部全体加入空軍友协。願意参加者可以在明天早上十点至晚上十点到她那兒去报名。她临时倡議为苏維埃空軍募捐，把募得的款項寄給“真理报”社。

我这时大概很激动，因为离我不远，大約隔三个人的地方，也坐在地上的瓦尔加带着惊奇的神气看着我。我掏出那个五十戈比的銀币給他看了看。他明白了。他正想問什么話，大概是想問折叠式漁竿的事，可是立刻又忍住不說了，只是点了点头。

我跳上舞台，把銀币交給了瓦蓮阿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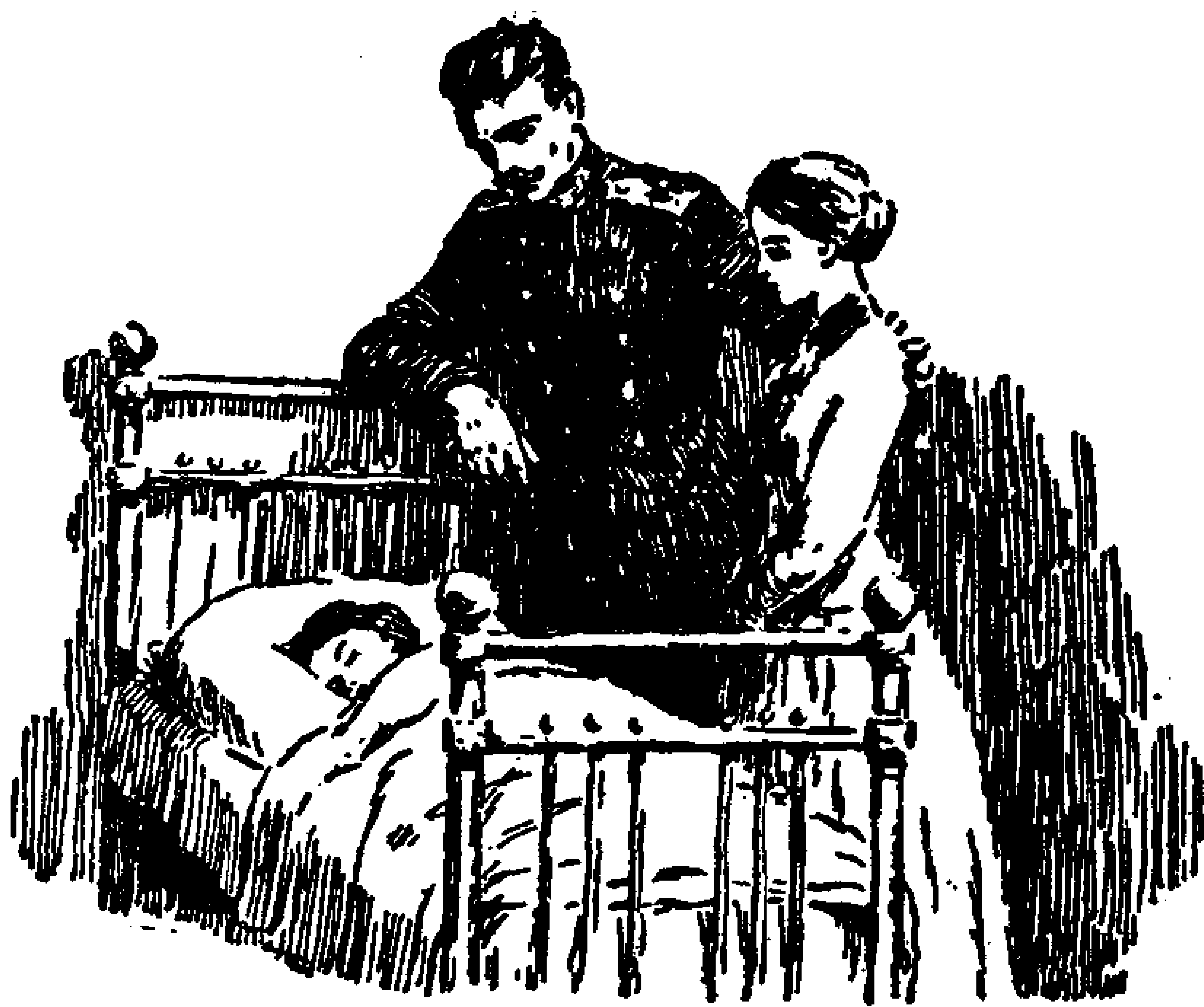
“伊万·巴甫雷奇，”我問柯拉布略夫道，他正站在走廊上，用一根挺老长的烟嘴吸着烟，“考飞行員要几岁才行？”

他一本正經地看了看我。

“不知道，薩尼亚。不过象你这样兒，大概还不行吧……”

不行？我想起了和彼共加在教堂花园里互相許下的誓言：

“奋斗，探求，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不过我并沒說出声来，反正柯拉布略夫也不懂得这句話。



第三部 旧 信

1 四年間

我象是在看一場无声电影，脑海里想象着一座大时鐘，不过这座时鐘的长針指示的是年。轉了整整一圈兒——我看見自己在三年級了，和罗馬什卡坐一张書桌，柯拉布略夫正在上課。我和罗馬什卡打賭，讓他用小刀割我的手指，我絕不嚷痛，也不縮手。这是意志的考驗。根据“意志鍛炼規則”，我应該学会“不暴露自己的感情”。每天晚上我都要复习这些規則。終于有了这个好机会，我可以考驗一下自己了。

虽然今天的課很有趣：講楚克奇人的风俗习慣。可是全班誰也沒有听柯拉布略夫講課，大家都在注視着我們。

“割吧，”我对罗馬什卡說道。

这个坏蛋就用小刀狠心地割我的手指。我一声都沒有叫。可是不由得縮了縮手，因此就算我輸了。

有人吓得惊叫起来，窃窃私語声传遍了每一张書桌。鮮血不断地向外流，我故意縱声大笑，表示我一点也不痛。突然，柯拉布略夫要将我赶出教室去。我把手插在褲袋里，向外走。

"你可以不必回来了。"

但是我回来了。这一課很有意思，我坐在門边地板上听課。

意志鍛炼規則！我整整鍛炼了一年。我不仅試驗着"隐藏自己的感情"，并且"不理睬你所輕視的人的意見"。我不記得这两条規則中哪一条最困难。也許是第一条，因为那时我有什么样的感情和思想，脸上就一定有什么样的表現。

"睡眠应尽可能减少，因为睡眠时不能控制意志"，——对于象我这样的人，这一条也不是太困难的問題。由此我体会到"一日之計在于晨"，我一生始終遵守这条規則。

至于最主要的規則"記住自己生存的目的"这一条，我并不需要經常复习，因为生存的目的在那时我就已經很清楚了……

大时鐘的长針又轉了整整一圈兒——这是一九二五年冬天的一个早晨，我比誰都醒得早，但还躺在那兒，不知道是在睡呢，还是已經眞醒了。我好象是在梦中，眼前出現了我們的恩斯克：碉堡的围墙，浮桥，傾斜的河岸上的房屋，卡耶尔·庫里，司考伏罗得尼可夫老头兒，带着訓誡的神气在讀别人書信的达莎阿姨，我——又矮又小，头发剪得短短的，穿着一条肥大的褲子。得啦，这难道是我嗎？

我似睡非睡地躺着在想。恩斯克連同别人的那些書信，卡耶尔以及达莎阿姨一起逐渐隐退了。我想到塔塔林諾夫一家

人……我已經两年沒有到他們家里去了。尼古拉·安东內奇始終忌恨我。我的姓不带嘶音，可是，他念我的姓时却带着嘶音。尼娜·卡比丹諾芙娜仍旧很喜欢我，不久以前，她还托柯拉布略夫向我"致意問好"。也不知瑪丽亚·瓦西里耶芙娜怎样了？还是坐在沙发上抽烟嗎？卡佳呢？

我看看鐘，快到七点了。該起床了，因为我对自己許下了諾言，要在起床鈴以前起来。我踮着脚跑到盥洗室里，站在敞开的窗子前面作早操。天气很冷，雪花飘进窗子里来，旋卷飞舞，落在肩膀上便融化了。我把上身擦洗一番，便开始讀書，讀一本絕妙的書——阿姆生[①]著的"南极"。我这已經是讀第四遍了。

南生[②]完成有名的航行时，阿姆生才十七岁，作者叙述了自己欢迎南生归来时的心情，他这一整天都在装飾着彩旗的街道上，在欢呼着的人群中走着，热血在太阳穴里冲击，青年人的理想在內心里激起了极大的波动。

寒气透过我的肩膀，我的脊背，我的腿，甚至連肚皮上也起了一层鷄皮疙瘩。我繼續讀着，生怕漏掉一个字。厨房里传来喧嘩声，姑娘們一面談笑，一面端着食具到飯厅里去，可是我还是在讀。我的脸发烧，热血在太阳穴里冲击，但我仍然怀着激动和兴奋的心情讀着。我知道，我永远也会記着这一刹那……

大时鐘的长針又轉了整整一圈兒——我看見自己在一間早就熟悉的小房間里，这三年来差不多每一个黃昏都是在这兒消磨的。我受共青团支部的委托，第一次領导了集体讀报小組。第一次——这太可怕了。我知道"目前形势"，"民族政策"，"国际問題"。然而，我更知道得清楚的是飞行高度，續航力，航程的世

① 卢阿尔·阿姆生(1872—1928)，挪威极地旅行和探險家。——譯者注。

② 弗里蒂奧夫·南生(1861—1930)，挪威海洋学家，北极探險家。——譯者注。

界紀录。可是万一有人問起减价的事情就糟了！不过，一切都很称心。有一个小姑娘請我講講列宁的生平；說到列宁的生平，那我可太熟悉了。

共青团支部会場里的人愈来愈多。柯拉布略夫站在門口，聚精会神地听我講。他用手指拈着髯子，太好了，这表示他很滿意。快乐和驕傲的感覺充滿了我的全身。我一面講，一面惊訝地想："啊，我講得多好哇！"

如果不算在篝火旁边推翻斯乔巴·伊万諾夫的領导那一次的話，这是我第一次公开演講。这次演講大概是成功的。第二天，政治教員把我叫了去，要我重講一遍列宁的生平，并且說："如果我生病，就由薩尼亚·格利高里耶夫代替我。"

大时鐘又轉了整整一圈兒——我这时十七岁了。全校的人都聚集在礼堂里。一张大紅桌子后面坐着法庭的审判員。左手是辯护人席，右手是公訴人席，被告席上坐着一名被告。

"被告，你叫什么名字？"审判长問道。

"叶夫根尼。"

"姓什么？"

"奥涅金。"

这是値得紀念的一天。

2　叶夫根尼·奥涅金的审判

起初，学校里对演戏这玩意兒誰也不感兴趣，但等到我們剧团里的一位演員建議将"叶夫根尼·奥涅金的审判"改編成話剧化装演出以后，这事很快就传遍了全校。

外8六

主角是专門邀請在戏剧学校已經学习了一年的格里什卡·法伯尔来担任的。他由于念旧的关系，偶尔也来看看我們初次上演的戏。公証人由我們自己的演員扮演，只是拉林娜家保姆的衣服沒有找到，所以只好解释，說普希金时代保姆穿的衣服和我們現在的一样。辯护工作分給瓦尔加担任，公訴人由我們的教养員苏特金扮演，审判长由我担任……

犯人戴着假发，穿着青色燕尾服，打着蝴蝶結的便鞋，长及膝盖的高筒袜，坐在被告席上，用一只断头鉛笔漫不經心地剔着手指甲。他傲慢地，同时又有些迷惘地不时看看观众和审判員。照他看来，大概叶夫根尼·奥涅金在那种情况下是这样的。

老太婆拉林娜同她的几个女兒和保姆坐在証人室（过去的教員休息室）里。她們反而很紧张，特别是保姆，以她的年龄而論，她显得太年輕，太漂亮了一点。辯护人也很紧张，不知为什么，他一刻不离地老拿着一个沉甸甸的文件夹。物証——两只旧式手枪，放在我面前桌子上。在我背后可以听到导演輕微而急促的提詞声……

“你承認自己犯了罪嗎？”我問格里什卡道。

“什么罪？”

“以决斗的方式进行謀杀。”导演悄声說道。

“以决斗的方式进行謀杀，”我說完后，看了看公訴状，又补充道，“謀杀十八岁的詩人符拉基米尔·連斯基。”

“永远也不承認！”格里什卡傲慢地答道。“你們应該分清楚，决斗不等于謀杀。”

“既然如此，那么我們开始訊問証人，”我宣布道。“女公民拉林娜，关于这件事您有什么可供的？”

在排演时，这一段很生动，可是到这时，大家不由得感覺到

要演不好。只有格里什卡如魚得水一般，他一会兒掏出小梳子来梳弄他的鬢髮，一回兒用一种責难的眼光看着审判員，一会兒傲然仰着头，蔑視地微笑。当証人拉林娜老太婆說奥涅金在她們家里就同亲人一般时，格里什卡用一只手遮住眼睛，另一只手放在心口上，表示他是多么难过。他演得妙极了，我发現女証人，特别是达吉雅娜和奥尔加簡直是目不轉睛地瞧着他的。达吉雅娜倒还沒有什么，因为根据故事，她是愛上了他。可是奥尔加呢，她就跟角色完全不符合了。观众也同样只是看格里什卡，我們是不被人注意的。

我叫女証人拉林娜老太婆退席，喚达吉雅娜出庭。哎呀，她放連珠炮似地都說了些什么呀！如果不是她的名字也叫达吉雅娜，以及她那鬈曲的鬢发披到了肩上，那么她和普希金的达吉雅娜就沒有絲毫相同之处了。在我問她是否認为奥涅金犯了謀杀罪时，她驴唇不对馬嘴地回答說奥涅金是个利己主义者。

我讓辯护人发言。从这会兒开始，一切都弄得顛三倒四了，一方面因为辯护人胡說白道乱講了一通，另一方面是因为我看到了卡佳。

四年来她的变化自然是很大的。不过搭在胸前的辮子仍然卷成許多小圈圈兒，額上的头发同样也是鬈鬈曲曲的。她仍然带着那种凛然不可侵犯的神情眯縫着眼睛，鼻子还是那样的果断，就是再过一百年，大概我也能从这个鼻子上認出她来。

她聚精会神地听瓦尔加辯护。把辯护工作分配瓦尔加担任，这是最大的錯誤，因为他在世界上所感兴趣的只有动物。他一开始便极荒謬地断定：动物界也有决斗，可是沒有人認为那是謀杀。然后他又講到嚙齿动物，講得那么津津有味，簡直不能想象他怎样才能回到为叶夫根尼·奥涅金辯护的本題上去。可是卡

佳却津津有味地在听。根据前几年的經驗，我知道她咬辮子就是表示感兴趣。女孩子当中，只有她絲毫也不去注意格里什卡。

瓦尔加突然結束了辯护，下面由公訴人发言。这可眞是乏味极了。公訴人整整講了一小时，証明連斯基虽然是被十九世紀初叶的地主官僚社会杀死的，但叶夫根尼·奧涅金总应該負这次謀杀的全部責任，“因为任何决斗都是杀人，只不过是带有預謀性罢了”。

总而言之，公訴人認为叶夫根尼·奧涅金应判处十年徒刑，并沒收其財产。

誰也沒有料想到会有这样的一个建議，因此引起了一陣哄堂大笑。格里什卡傲慢地蹦起来……我准許他发言。

据說演員能感受到观众的情緒，格里什卡这时大概是感受到了大家的情緒，所以他一开口便拚命地嚷。后来他解释說这样做是为了“鼓舞会場”。然而他当时并沒能眞正“鼓舞会場”。他的講話有一个缺点，就是使人无法了解他是代表自己，还是代表叶夫根尼·奧涅金在講話。叶夫根尼·奧涅金大概不致于說什么“連斯基自高自大”，或者“就是現在，为了刺中符拉基米尔·連斯基的心脏，他的手也不会发抖”。

总而言之，当他十分自得地擦着前額坐下的时候，大家才輕松地舒了口气。

“法庭变成討論会了。”

“快一点，小伙子們！”

“眞沒有意思。”

“拖得太久了。”

这些話說得都很对，我們也不約而同地决定赶快把会开完。使我感到十分惊訝的是大多数审判員都同意公訴人的意

見，十年徒刑并沒收其財产。很明显，这不是因为叶夫根尼·奧涅金的关系。十年徒刑是大家准备給格里什卡判的，因为除了达吉雅娜和奥尔加两个女証人外，大家都討厌他了。但是我說，这是不公平的，因为格里什卡毕竟还是演得很好，要不是他，那更是一点兒意思也沒有了。最后大家一致同意判处他五年徒刑。

“起立！判决开始！”

大家站起来，我宣讀了判决書。

“不对！”

“应該宣告无罪！”

“滚开！”

“好吧，同学們，”我很丧气地說道。“我也認为不对。我認为叶夫根尼·奥涅金应該宣告无罪，对格里什卡应表示感謝，誰贊成？”

大伙兒哈哈大笑，一齐举手贊成。

“一致通过。会議到此宣告結束……”

我心里非常懊丧，我答应担任这个角色是吃力不討好。也許当时应該将审判这場戏变成开玩笑。不过应該怎么办呢？我觉得这次大家都看出了我是多么不善于随机应变，多么迟鈍。

我怀着这种郁郁不乐的心情往更衣室走去，刚好碰見卡佳。她刚取出大衣，正往出口附近人少的地方挤。

“你好！”她微微笑了笑，說道。“帮我拿一下大衣。你們这算什么审判！”

她說这話的样子，就好象我們昨天晚上还見过面似的。

“你好！”我沒精打彩地答道。

她很有兴趣地看了看我。

外
4
六

"瞧你变成什么样了！"

"什么样？"

"驕傲样唄。喂，去把大衣拿着，我們一块兒走！"

"到哪兒去？"

"哼，見鬼，到哪兒去！到街上拐角的地方也行。眞不懂事。"

我沒穿大衣，陪她往外走，可是走到楼梯口，她就讓我回去。

"天太冷，风也很大……"

我在提維尔大街和公园凱旋路口的地方赶上了她，我永远也忘不掉她当时的样子。

她戴着灰色的遮耳帽，沒有系上耳遮，等我跑回学校一趟，她額上的卷发已挂上了一层霜。风吹开了她的衣襟，她身子微微向前傾，站在那兒，一只手抓住大衣。她的身材不高不矮，非常勻称，也許还很漂亮吧。我所以說"也許"，那是因为我当时并沒有想到这点。当然，在我們学校里沒有哪个女孩子敢这样命令說："去把大衣拿着，我們一块兒走！"

但是要知道，这可是我揪住辮子，将鼻子向雪里按的卡其加。她到底是卡其加呀！

她在我們那兒呆了两个鐘头，对我們学校的一切事情就都知道了。她很惋惜大家所敬爱的图画教員布罗特曼去世了。她知道大家都打趣那个德国女人，笑她上了年紀还把头发剪得短短的，而且抹口紅。她对我講了我們即将出版的一期壁报的內容。原来这一期是"叶夫根尼·奥涅金的审判"特刊。有一幅漫画已經被大家传遍了。画上画的是瓦尔加，他口里喊着"动物界中也有决斗"，一面忙着劝解几只打架的狗。画上的格里什卡·法伯尔手里拿着小梳子，懶洋洋地注視着証人达吉雅娜和奥尔加。

“喂，为什么大家叫你船长呢？你想进航海学校，是吧？”

“暫时还不知道，”我說，虽然我很久很久以前就已經知道自己要进航空学校，而不是进航海学校。

我一直送她到我所熟悉的那座房子門前，她請我进去坐坐。

“不方便。”

“为什么？你和尼古拉·安东內奇关系不好与我有什么相干。姥姥常常想到你。进去吧，好嗎？”

“不，不方便。”

卡佳冷冷地聳了聳肩膀。

“好，随你的便吧！”

我在院子里追上了她。

“卡其加，你这个傻瓜。我跟你說——这样不方便嘛。咱們最好还是一块兒到别的地方去，好嗎？到冰場去怎么样？”

卡佳看了看我，突然把鼻子一翘，这是她童年时代常有的动作。

“讓我想想看，”她很神气地說。“明天四点鐘左右挂一个电話給我。嘿，好冷，連牙齿都結冰了。”

3 在冰場上

还在我崇拜阿姆生入了迷的那几年，我脑子里便有一个幼稚的想法：要是阿姆生是坐飞机去南极，那一定要快很多倍。他日复一日地在茫茫无边的冰天雪地中前进实在是太艰难了！他跟着狗走了两个月，到最后这些狗都互相残食了。他如果坐飞机，只要一昼夜就能到达南极。假如要用他的朋友和熟人的名

字来給这次飞行中所能发現的山峰、冰川和高原命名的話，那么他們的名字就会大大地不够用了。

我每天都要从北极旅行記中摘录很多材料。我把报紙上关于早期在北极飞行的消息剪下来貼在一本旧帐簿上。这本帐簿的第一頁上写着阿姆生的船名“前进”。他給它取名“前进”，自己也的确是在努力前进，这是南生对阿姆生的評論。因此，前进就成了我当时的座右銘。我想象自己坐着飞机，跟着司考特，雪克尔頓，罗伯特·比利等人飞行，飞遍了每一条航綫。既然有飞机供我駕駛，那么，也应該学学它的构造。

按照我的第三条規則，——“决定了就作”，我念完了“飞机制造原理”。唉呀，这真是活受罪！不过，凡是不明白的地方，为防将来万一用着起見，我都把它們死背下来了。

我每天都要拆卸我想象中的飞机。研究它的发动机和螺旋桨。我用最新式的仪表来装备它。我对它了如指掌。現在只有一件事我还不知道，就是怎样駕駛着它飞行。但这也正是我想要学会的。

我这个决心对任何人，甚至对柯拉布略夫，都是严守秘密的。在学校里大家都認为我的精力太分散，可是我不願意别人說我学飞行是“新的兴趣”。这不是兴趣。我还在恩斯克时，有一天我和彼其加躺在教堂公园里，把手攤成十字，想要在白昼看見月亮和星星，有一架灰色的，象飞魚般的飞机輕巧地繞过浮云，消失在沙滩湾那边，从那时起我就决定作一个飞行員了。当然，这只是我覚得而已。不过，这架飞机能給我留下这样深刻的印象总不是偶然的。大概我当时的确已經开始考虑現在占据了我全部思想的这个問題了。

就这样，我对所有的人一直保守着自己的秘密。可是有一

次，我突然把这个秘密泄露了。向誰泄露了呢？向卡佳。

这一天，我們約定一早就去冰場，可是总有一些事情来妨碍我們。不是卡佳耽擱了，就是我有事。最后好歹收拾妥当去了，可是，滑冰也不順利。第一：冰場被积雪封住了，冰場上正在扫雪，所以只好在严寒中等候了半个鐘头。第二：滑第一圈时，卡佳的冰鞋后跟就脫落了，只好用我带着的那根备不时之需的皮带将冰刀綁上。但倒霉的还不止此。我的那条皮带老松开，所以只好回到存衣室，把皮带交給那位怒气冲冲的紅脸修理匠，他正在一块肮脏的圓磨石上軋軋刺耳地磨着冰刀。他刚把扣带修好，皮带又断了。这是一条猪皮带，諸位不妨試試在严寒中将冻得曲扭了的猪皮带扎扎看，就知道要扎好是多么困难了！最后一切都弄好了，但雪又下起来了。我們手牵手地，一步左，一步右地滑了很久的大半圓圈兒。这种花样叫做荷兰步法。

下雪对优秀的滑冰家是有妨碍的，可是，看見冰場上忽然下起雪来也是令人十分高兴的事！在冰場上，雪花从来不会平平稳稳地落下来。因为人在冰上旋轉而带起一陣陣的风，所以雪花便不停地旋轉，并且，当它們还沒有落在洁亮的冰面之前，总是忽上忽下浮沉飘舞。这种景色非常美丽，使我感到世界上一切都很可爱。我知道，虽然那条硬得象生鉄般的猪皮带甚至已經磨破了卡佳的脚，可是她也感到世界上一切都很可爱，并且因为下雪，因为我和她在滑着瀟洒的荷兰式步法而感到快乐。

后来，我站在花样溜冰場的界繩旁边，看卡佳滑双八字的花样。起初，她总滑不好，生气說这完全是鞋跟不好的关系，后来突然滑好了，滑得非常出色，使得旁边一个正在努力滑圓圈的胖子也不禁哇哇叫起来，对她喊道：

“好啊！”

我听見她向他埋怨說鞋跟坏了。

的确是好！我冻得象条狗一样，于是我向卡佳揮了揮手，跑了两大圈暖和一下身子。

后来我們又溜荷兰式步法，然后坐到乐池前，卡佳突然把她那兴奋得热烘烘的，长着一双灵活的黑眼睛的緋紅的脸湊近我。我以为她想对着我的耳朵說什么話，所以便大声問道：

“什么？”

她噗嗤笑了一笑。

“沒什么，就这样。热得很。”

“卡其加，”我說道。“你知道嗎？……你不会告訴别人吧。”

“誰也不告訴。”

“我要进航空学校。”

她眨了眨眼睛，接着便默不作声地盯着我。

“决定了嗎？”

“嗯。”

“完全决定了？”

我点了点头。

乐队突然奏起音乐来，她一面揮着連衣裙上的雪花，一面說話，我沒有听清楚她說了些什么。

“我听不見！”

她拉住我的手，我們跑到冰場的另一边，靠兒童冰場的地方去。这兒漆黑漆黑的，一点兒声音也沒有，冰場上积滿了雪。滑坡两旁栽植着松树，冰場四周也是些小松树，我們仿佛置身在郊外树林里。

“能考上嗎？”

“是航空学校嗎？”

“是呀。”

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問題。我每天早上都按照安諾亨法作柔軟体操，按照謬勒尔法洗冷水浴。我摸着自己的肌肉，想：“万一考不上怎么办？”我检查过眼睛、耳朵、心脏。校医說我很健康。可是健康程度也不一样呀，而且，他并不知道我是准备进航空学校的。万一我的神經有毛病，万一还有什么别的毛病怎么办？还有体高！最該死的是体高！这一年中，我只长了一公分半。

“一定会考上，”我肯定地答道。

卡佳好象很敬佩地看了看我……

我們离开了冰場，这时已經熄灯了，穿毡靴的冰場看守人尖声吹起口哨，拿着一把扫帚向我們走来。他走在冰面上的样子显得很古怪，虽然是用平常的步子走着，可是移动得非常緩慢。

我們在空无一人的存衣室里脱下了冰鞋。小食店已經打烊了。可是卡佳走到女售貨員跟前，叫了她一声“姆媽”，那位售貨員便心軟了，卖給了我們每人一个面包，一杯凉茶。我們一边吃着，一边談。

“你多么幸福，已經决定了，”卡佳輕声叹了一口气，說道，“我还不知道将来怎么样哩。”

在我說了要进航空学校以后，我們談的全是一些正經事，主要的是談文学。她很喜欢革拉特柯夫的“水泥”，我因为还沒有讀过这本書，挨了她一頓批評。总而言之，卡佳比我讀的書多得多，特别是文艺方面的書。

后来，我們又談到爱情，并且一致認为恋爱是瞎胡鬧。起初我还不大相信这种論調，可是卡佳很决断地說：“当然是瞎胡鬧”，

并且还举了革拉特柯夫書里的一个例子。于是我就同意了。

我們順着夜間漆黑的小胡同回家，这些小胡同是那样的黑暗，神秘和幽靜，仿佛我們走的不是桌布胡同和刀兒胡同，而是在月亮上，走在异乎寻常的月光路上。

4 变　化

我和卡佳沒有談到她家庭里的事。我只是問了問瑪丽亚·瓦西里耶芙娜怎么样，她回答說：

"謝謝，沒有什么。"

"尼娜·卡比丹諾芙娜呢？"

"謝謝，沒有什么。"

也許眞是"沒有什么"吧，不过，我想事情是不好的。否則卡佳也不必考虑是去冰場，还是去坐电車了。問題还不只是在于金錢上。我还記得很淸楚，在恩斯克当卡耶尔·庫里成为我們家的全权主人，我和妹妹必須称呼他"爸爸"的时候，我也是不願意回家的。照我看来，卡佳現在也有类似的感覚。到了一定要回家时，她的脸便立刻沉下来。她們家里是不和睦的。不久我遇見瑪丽亚·瓦西里耶芙娜，更是彻底証实了这一点。

我們是在剧院里看"屠兰多公主"时遇見的。卡佳买了三张票，有一张是給尼娜·卡比丹諾芙娜的。可是，尼娜·卡比丹諾芙娜不知为什么沒有去，所以这张票就給了我。

我常到剧院去看剧。但文娛活动是一碼事，今天，有了瑪丽亚·瓦西里耶芙娜和卡佳又是一碼事。我向瓦尔加借来小翻領的衬衫，向罗馬什卡借了領带，这个坏蛋还要了押金。

"万一你丢了呢?"

我只好留下一个卢布作押金。

我們不是从一个地方去的，卡佳几乎迟到。当收票員正要关門时，她才飞也似地跑来。

"媽媽呢?"

媽媽已經坐在剧院里。我們在黑暗中摸索我們的座位时，不小心踩了誰的脚，她招呼了我們一声……

在我們学校里，关于"屠兰多公主"大家談得很多，甚至还打算排演这个戏。格里什卡·法伯尔認为这个戏里所有的男角好象都是专門为他写的。第一場我沒有功夫去細看瑪丽亚·瓦西里耶芙娜，我只覺得她仍然和从前一样非常漂亮，甚或比从前更加漂亮了。她换了一种发式，因此整个高大白净的前額看得非常清楚。她笔直地坐着，目不轉睛地看着舞台。

但是在休息时，我可将她仔細看了看，頓时心里不禁感到很难过。她瘦了，老了。她的两只眼睛变得特别大，并且特别阴沉。我想，誰若是第一次看到她，一定为她这阴沉的眼光吓一跳。

我們談到"屠兰多公主"，卡佳表示她并不怎么喜欢这个剧。我自己也不知道究竟喜欢还是不喜欢，所以也同意了卡佳的意見。可是瑪丽亚·瓦西里耶芙娜却說这个剧美妙极了。

"你和卡佳还是小孩，根本不懂。"

她問起我关于柯拉布略夫的情形，他的生活怎么样，我說：

"似乎很好。"

我发現在我說了这句話以后，她的脸有点兒紅。

实际上，柯拉布略夫生活得并不怎样好。刚交冬时，他大病了一場。我認为在刚才的情况下，即使柯拉布略夫感到自己很不舒服，他也同样会回答她說"很好"。当然罗，他并沒有忘記，

她曾經拒絕过他的求婚。

可能現在她也有点后悔了，否則关于他的事，她决不会問得这么詳細。他教哪些班次？大家对他的态度怎么样？她对这些事情都感到兴趣。

我总是簡单地回答，最后她生气了：

“哼，薩尼亚，多一个字从你口里都問不出来。总是‘是’和‘不是’，就象把舌头咽下去了似的，”她憤憤地說道。

沒有經过任何話的引介，她突然談起了尼古拉·安东內奇来。眞是奇怪。她說她認为尼古拉是一个非常好的人。我一句話也沒有說。

休息終了，我們进去看第二幕。但在第二次休息时，她又談起了尼古拉·安东內奇，我看到卡佳紧蹙着眉。她的嘴唇抖了抖，想說什么話，可是又抑制住了。

我們在剧院休息室繞着圈兒来回地走着，瑪丽亚·瓦西里耶芙娜不断地談着尼古拉·安东內奇。这眞叫人难以忍受。同时使我惊訝和納悶的是，我想起了她以前对他那种态度。

居然滿不是这么一回事！他原来是一个少有的慈善而高尙的人。他这一生都关心着他的堂弟（我第一次听見瑪丽亚·瓦西里耶芙娜称呼她已故的丈夫为万尼亚），而且，那时他自己手头也很拮据。为了供应他最后一次不幸的探险旅行，他牺牲了自己全部財产。

她热情地說，尼古拉·安东內奇相信他。

所有这些事情，我从尼古拉·安东內奇本人口中都听到过，而且也是同样的說法。从前瑪丽亚·瓦西里耶芙娜是不講他說过的話的。这里面有些蹊蹺。尤其是她講这些話虽然是自願，甚至很热情，可是我总好象覚得这是她想使自己相信，事情的确

是如此：尼古拉·安东內奇是一个不平凡的人，她已故的丈夫应該感激他。

整个第三場中，我都在想着这件事。我决定向卡佳問清楚她父亲的事。在我的想象中突然出現了这位海員的形象，寬大的前額，紧縮的下巴，和一双明亮灵活的眼睛。他沒能带回来的那个探险队是一个什么探险队呢？……

散場以后，我們停留在半明半暗的剧場里，等候存衣室里的人稍微散一散。

“薩尼亚，你怎么总是不到我們家去呢？”瑪丽亚·瓦西里耶芙娜問道。

我含含糊糊地应付了两句。

“我想尼古拉·安东內奇早已忘記了那次的糊塗行为了，”瑪丽亚·瓦西里耶芙娜繼續認眞地說道，“要是你願意的話，我去和他談談。”

我根本不希望她去請求尼古拉·安东內奇允許我到她們家里去，我差一点兒沒有对她說：“謝謝，不必要”。

可是，这时卡佳却說，这跟尼古拉·安东內奇沒有絲毫关系，因为我是去找她，并不是去找他的。

“不，不！”瑪丽亚·瓦西里耶芙娜吃惊地說道。

“这是为什么呢？也来看我，也来看姥姥嘛。”

5 卡佳的父亲

它是一个什么探险队呢？卡佳的父亲是一个什么人呢？我只知道他是一个航海家，并且已經去世了。他眞死了嗎？卡佳

从来沒有称她的父亲是"去世的"。总而言之，除了尼古拉·安东內奇特别爱用这个詞以外，塔塔林諾夫家里的人平常很少提到他。每一个房間里都挂着他的象片，可是大家說起他的时候并不特别多。

我最后也懶得去揣測了，况且这問題可以直接了当地問問卡佳：她父亲在哪兒？是活着还是死了？于是我問了。

下面就是她講給我听的。

那时她才三岁，但是却很清楚地記得父亲动身的那一天。他身材很魁梧，穿着蓝制服，两只手很粗大。一天大清早，当她还在睡梦中的时候，他走进房間，到她床前弯下腰，輕輕摸了摸她，說了两句什么話，大概是說："瑪莎，你瞧她一点血色也沒有。答应我，以后讓她多到室外去活动活动，好嗎？"卡其加这时微微睜开眼睛，看見媽媽正在啜泣。但是她沒有显露出自己已經醒了，她覚得假装睡着了是很快活的事。后来他們坐在敞亮的大厅里的一张长桌前，长桌上餐巾堆得象白色的小山一般。卡其加只顧出神地看起这些餐巾来，沒有注意到媽媽已經离开了她，在媽媽的座位上現在坐着姥姥。姥姥不断地叹息，而且說着"主啊"。媽媽却穿了一件从沒見她穿过的新奇的衣服，肩上挂着小珠子，和父亲并排坐在一起，远远地向卡其加挤眼。

餐桌上显得非常愉快，人很多，大家高声地在談笑。但是等到父亲举着一杯葡萄酒站起来时，大家立刻安靜下来。卡佳沒有听懂他講的什么話，但記得他講完后，大家都鼓掌欢呼"烏拉"。姥姥又低声說："主啊"，并且叹了一口气。大家同父亲及其他的海員道別。在分別的时候，他把卡其加高高地向上拋起，然后用他那两只慈爱的大手把她接住。

"喂，瑪申加，"他向媽媽說。他們两个人便来回地吻起

来……

这是在恩斯克車站举行餞别晚餐和欢送塔塔林諾夫船长的情形。一九一二年五月，他回到恩斯克和家人辞别，这年六月中旬，他就自彼得堡乘“圣·瑪丽亚”号帆船启程赴海参崴……

起初一段时間仍和从前一样。只是在生活中出現了一件十分新鮮的事，这就是爸爸的来信，“等着吧，爸爸的信就要来了”。信果然来了。偶尔一两个礼拜也会沒有信，不过后来終究还是来了。最后一封信是从尤戈尔·沙尔来的。眞的，这是最后一封信，不过媽媽并不怎么特别忧虑，甚至还說，这是应該的，因为“圣·瑪丽亚”号所走的地方沒有邮局，甚至除了冰块和积雪以外什么也沒有。

这是应該的。爸爸自己也这样說过，以后不再有信了。但这毕竟是令人很愁悶的，媽媽一天一天变得更沉默，更忧郁了。

“爸爸的信”——这实在是再好不过的东西了。譬如說吧，爸爸来信后，姥姥总要烘点心。可是現在呢，代替这使得大家快乐的再好不过的东西，就是生活中出現了老是說来說去的令人煩悶的話：“这是应該的”，或者“暫时还不会出什么事”。

这些話每天反复地說着，特别是在傍晚，当卡其加已經躺下睡觉的时候，媽媽和姥姥还說了又說。卡其加就在一旁听着。她老早就想說：“大概是狼把他吃掉了。”可是她知道，这样媽媽一定会发怒，所以便沒有說。

爸爸老是在“过冬天”。恩斯克早已是夏天了，他还是在“过冬天”。这实在是令人納悶，但是卡其加什么也沒有問过。有一次她听見姥姥对隔壁的女人說：“我們总是說他在过冬，可是他是不是还活在人世呢，这眞是天知道。”

后来媽媽写了一份“上陛下書”。这时卡其加已經长大了，

所以書的內容她記得特别清楚。塔塔林諾夫船长的妻子請求装备一支救生队，去援救她不幸的丈夫。她指出，“探险的主要动机，无疑問是为了全民的驕傲和国家的荣誉”。她期待着“最仁慈的陛下”不要讓这位英勇的，随时准备献出自己生命为民爭光的探险家陷于孤立无援的絕境……

卡其加当时以为“陛下”是一种类似宗教行列的东西：前面走着戴紫紅色帽子的主教，后面跟着許多人。后来才知道这就是沙皇。沙皇很久沒有答复，所以姥姥每天晚上都要罵他。后来从他的侍从室来了一封信。侍从室很委婉地建議媽媽去找海軍大臣。但是找海軍大臣是不会有什么效果的。这事已向海軍大臣报告过，他却說：“可惜塔塔林諾夫船长沒有回来。否則，他这样輕率地对待国家財产，我要馬上把他送法院法办。”

后来，尼古拉·安东內奇到恩斯克来了，于是家里便出現了新的說法：“毫无希望”。他把这話悄悄地告訴了姥姥。可是不知怎么还是被姥姥的亲戚布賓其可夫家和卡其加的女朋友們知道了。除了媽媽以外，大家都知道了。

毫无希望。他再也不会回来了，再也不会講什么逗乐的話了，再也不会同姥姥爭辯說：“飯前喝一杯伏特卡酒很有益处，即使无益，至少也无害，如果无害，那就痛快了。”他再也不能因为上剧院去看戏时媽媽穿衣服的时間太久而打趣媽媽了。誰也听不到他每天早上穿衣服时唱的“我們的生命是什么？生命如兒戏！”的歌声了。

毫无希望！他留在遙远的地方，留在北极的边沿，留在冰天雪地里，他的探险队中一个人也沒有回来。

尼古拉·安东內奇說这是爸爸自己的錯誤。因为探险队的准备非常充足。仅面粉一項，就多达五千公斤，澳大利亚肉罐头

一千六百八十八公斤，火腿二十只，斯柯利科夫[1]湯粉七十公斤，还有那么多的面包乾，通心粉，咖啡！有一間大艙房被隔成了两半，乾面包便裝了半間。甚至还带了四十公斤龙鬚菜。还有果酱、乾果。所有这些东西都是花尼古拉·安东內奇的錢买的。另外还挑选了八十只頂好的狗，以备遇险时用它們駕着雪橇回来。

归根結蒂，如果爸爸罹难了，那么毫无疑問，这是因为他自己的錯誤。很容易想象这样的情形，譬如說，在某个地方应該等一等，而他却着急赶路。照尼古拉·安东內奇的看法，他这个人总是急急忙忙的。不管怎样吧，他是留在北极了。誰也不知道他是活着还是已經死了，因为探险队三十个人中一个人也沒有回来。

然而在他們家里，在大家的心中，他还活了很久。說不定，忽然間門一开他走进来了呢！他仍旧和最后在恩斯克車站那天一样：穿着蓝制服褂，洁白的硬衬領，敞着口。这种样式現在已經不时兴了。他还是那么快乐的样子，两只手还是那么粗大。

家里还有好多事情和他有着連系。媽媽抽烟，大家都知道，她是在他失踪后才抽起烟来的；姥姥总是攆卡佳到室外去，这也是因为他吩咐要卡佳多到室外活动；窄狹的玻璃橱里放着許多名称古怪的書，这些書誰也不讓讀，因为这是他的書。

后来，他們搬到莫斯科尼古拉·安东內奇的房子里来住，因此一切都改变了。現在誰也不再盼望房門会突然敞开，他会突然走进来的事了。因为这是别人的房子，他从来也沒有在这兒住过。

---

① 斯柯利科夫是俄国的名厨师。——譯者注。

6 更多的变化

若不是卡佳答应把船长的書和地图給我看，大概我是不会去塔塔林諾夫家的。我看了一下航綫，原来这就是摸索了三百多年的，有名的“东北通道”。最后，在一八七一年，一个瑞典的探险家諾登塞尔特[1]穿过了这条通道。沒有疑問，这件事并不是那么簡单，因为一直过了二十五年，才有第二位探险家維尔基茨基重走这条航路，所不同的只是他由相反的方向走的。总之，这一切都非常有趣，于是我决定去了……

塔塔林諾夫家的房子里并沒有什么改变，只是东西显著少了。

同时，那张我曾經非常喜欢，画着花园里一条笔直寬闊的道路和太阳光照耀着的松树的列維坦的名画也不見了。我問卡佳这幅画到哪兒去了。

“送人了，”卡佳簡短地答道。

我沒有作声。

“送給尼古拉·安东內奇了，”卡佳突然带点諷刺的口吻补充說，“他崇拜列維坦。”

大概送給尼古拉·安东內奇的还不只是列維坦的画，因为餐厅里好象完全空了。不过那只航海用的罗經还依然如故地放在原来的地方，指針仍旧指着北方。

誰也不在家，瑪丽亚·瓦西里耶芙娜不在，老太婆也不在。

---

① 諾登塞尔特（1832—1901），瑞典人，北极探险家，在一八七八年第一个經由东北通道从大西洋到达太平洋。——譯者注。

后来老太婆回来了。我听見她在門厅里脫衣服，一边向卡佳抱怨說什么东西都涨价了：白菜十六戈比，小牛肉三十戈比，祈祷費四十戈比，鷄蛋一卢布二十戈比。

我笑了起来，走到門厅里去。

“尼娜·卡比丹諾芙娜，檸檬呢？”

她莫名其妙地轉过身来。

“野孩子沒把檸檬扒去嗎？”

“薩尼亚！”尼娜·卡比丹諾芙娜把手一拍，惊喜地說道。

她把我拉到窗戶跟前，前后左右仔細打量了一番，显出不滿意的神气来。

“还是不高，”她惋惜地說道。“你怎么不长个兒呢。”

她跑到厨房里，把牛奶放在打汽爐上，过了一会，又回来了。

“你又想起檸檬的事来了，”她說完也笑了。“这又能怎么样呢！現在还不是要扒！”

她显得十分蒼老，背也駝了，人也瘦了。那件我熟識的綠天鵝絨大坎肩披在她的身上，两只瘦肩膀高高地聳着。不过她的精神仍然和从前一样健旺，样子看来，总是在想什么心事，但却显得較以前愉快了。我眞沒有想到她会那么喜欢我。

“人家說应該吃生荞麦，”她很有把握地說，“吃生荞麦就能长个兒，从前在我們恩斯克有一个小牧师，就那么一点兒高！他成天吃生荞麦。”

“长高了沒有呢？”卡佳很正經地問道。

“沒有长高，可是他的声音变粗了些。以前他說起話来是尖声尖气的。”

她笑了，突然想起了牛奶来。

“哎呀！牛奶跑出来了！”

她自己也跑出去了。

我和卡佳把船长的書和地图看了很久。这兒有南生写的“在冰雪和黑夜的国度里”及“喀拉海的水路图紀”等等。总之，書虽不多，可是每一本都很有趣，我很想借几本来讀，但我十分明白，这显然是很不好意思开口的。正因为如此，所以当卡佳突然对我說：

“你想看嗎？拿几本去吧。”我不兔感到十分惊訝。

“可以嗎？”

“可以，”卡佳連看也不看我地回答道。

我沒有浪費时間去寻思，为什么独独对我这样信任，便立刻着手选择書籍。我巴不得把所有的書都借了去，但这样作是不可能的，于是我便挑选了五、六本。其中也有一本船长自己写的小册子：“格里尔探险队罹难的原因”。

我故意躲避着尼古拉·安东內奇，所以这次是在通常开教务会議的时間来到塔塔林諾夫家。可是，这次会議大概是更改了时間，所以他回来了。我和卡佳談得那么热烈，連門鈴声都沒有听見，就突然听見隔壁房間里的脚步声和威严的咳嗽声。卡佳皺起眉头，砰地一声把門关上。

几乎是在同一时間，門又开了，尼古拉·安东內奇出現在門边。

“卡秋莎，我跟你說了几千次，你不要把門弄得这么响，”他說道。“你現在也到了应該改掉这些习惯的时候了。”

当然，他立刻就看到我了，但是他一句話也沒有說，只是微微地眯縫起眼睛来，点了一下头。我也点了点头。

“我們生活在人类社会中，”尼古拉·安东內奇继續温和地說道。“推进这个社会的动力之一就是互相尊重的精神。你本

来也知道，卡秋莎，我忍受不了猛烈的关門声。我只能認为你是故意这样作的，不过我不願意这样想，是的，不願意……”

諸如此类的話他还説了許多。

我立刻明白了，他罗罗嗦嗦地説这一篇鬼話，不过是为了激怒卡佳。可是我想到从前他根本就不敢和她这样談話呀。

他終于走开了，但我們已經沒有兴致再看船长的書了。并且，在尼古拉·安东內奇講話的时候，卡佳始終背向着放書的桌子站着。他什么也沒有发覺。不过我倒明白是怎么回事，原来是不便讓他知道她讓我拿这些書！

总而言之，兴味被破坏了，我于是准备回家。可惜我沒有立刻就走！我和卡佳辞別时，稍微迟延了一会兒，結果尼古拉·安东內奇又轉回来了。

“卡秋莎，你可能是生气了。”他重又开始説道。“这样可沒有道理！毫无疑問你很淸楚，不論是从一个普通人的角度，或者从一个教育者的身份来説，我都是希望你好的。”

他向我瞥了一眼，把眉头一皺，很厌恶地用鼻子吸了吸气。

“假使你和我的关系完全是路人，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可是你是我死去的亲爱的堂弟的女兒。你是我为他牺牲了一切，不只是全部家財，也可説連自己生命的人的女兒。”

我想，尼古拉·安东內奇为他死去的堂弟所牺牲的东西怎么一年比一年多了。过去还只是説“精神上和物質上的”援助，現在他竟然連自己的生命都交給他了。

“所以，”尼古拉·安东內奇繼續説道，“卡秋莎！什么事情我都总是不厌其煩地反复对你説。我經过一天劳动之后已經够累了，有权利要求休息，可是，你看，現在还要我来同你説話，尽力开导你。其实，从你的年龄或是从你的发育上来看，这些道理

你都应該自己領会到了。”

卡佳一声不响。

我看出她是多么难受！但是她的意志是很坚强的。

他沒有講完以前，我是不便走开的。况且，要走就只好不带書走。所以我就坐下来。我根本沒有想到这是侮辱他，只不过是因为我站累了。可是他却恼怒起来。

“卡秋莎，我提醒你，”他用一种平静，柔和的腔調継續說道，“有一句有名的罗馬俗話說：‘观其友而知其人’。假如你認为可以和这种人交朋友，他脑子里从来沒有想过在坐下时要請师长先坐，那么……”

尼古拉·安东內奇作出一付莫可奈何的神情将手一摊。

正是因为我这样作时，根本沒有想到要侮辱他，因此我感到很难为情。可是这时卡佳却再也忍不住了。

“我爱和誰交朋友这是我个人的事！”卡佳迅速地頂撞了一句，脸都气紅了。

可以这样說，尼娜·卡比丹諾芙娜一定就在近处，甚至就在門外边。因为卡佳刚說完这話，她馬上就走了进来，张罗着打圓場：牛奶开了，問尼古拉·安东內奇要不要咖啡？其实她刚才从市場上回来，而且这时距午飯时間还早……好象她已經不是头一次来打断这类爭吵了！卡佳固执地低着头听她講。尼古拉·安东內奇显出很有礼貌，但似乎很迁就的样子……

我等到他們全都走了以后，才和卡佳道别。我怀着沉重的心情回去了。我很可怜她們，可怜瑪丽亚·瓦西里耶芙娜，可怜老太婆和卡佳。塔塔林諾夫家的这些变化太不合我的心意了。

7 批語。瓦尔加的嚙齿动物。老相識

这是在学校里最后的一年，老实說，这时本来应該加紧学习，不应該上冰場或者去串門了。有几門功課，譬如数学和地理，我学得还不錯。可是，另外几門，譬如文学，却相当差。

教我們文学課的是李和，他是一个笨头笨脑的人，全校都称他为李和驢。他总是戴着一頂庫班帽子，于是我們就在黑板上画一頂这样的帽子，帽子里用投影画法画着驢耳朵。李和不喜欢我有这样一些原因。第一，有一次在默写时他把"抽象地"說成了"袖象地"。我給他糾正了，我們爭吵起来，我提議去問科学院，因此伤了他的感情。

第二，大多数的同学作文都是抄書本和抄别人的文章，念过一篇評論就抄下来，可是我不高兴这样作。我是先作文再讀評論。这也正是李和所不喜欢的！他批道："标新立議。极劣！"显然，他是想說"立异"的。誰能标新立議呢？总之，我害怕这一年的文学課要得"劣等"了。

最后的"毕业"作文，李和給我們出了几个題目，我覚得其中最有意思的是"十月革命后文学中之农民"。我怀着很大的热情开始写这个題目，可是这种热情不久就凉了下来，这可能是由于卡佳給我的这些書的关系。讀了这些書之后，我开始感到自己的作文太乏味了。

这些書岂止有趣！而且这是卡佳父亲的書，是和弗兰克林，安德萊等人一样在冰天雪地里失踪的北极船长的書！

我一生从来沒有这么慢地讀过書。这些書上几乎每一頁都

有批注，有些行的下面画了綫。空白处画着問号和惊叹号。有时船长“完全同意”，有时“完全不同意”。他居然和南生爭辯，这使我很惊訝。他責备南生，說他只差那么四百公里沒能到达北极，就回到大陆了。在南生書中所附的地图上，南生航路最北的一点用紅色鉛笔圈着。看起来这个問題是船长非常关心的。所以在其它書里的空白处，他不止一次地提到这最北的一点。有一頁書上順写着：“冰原本身会解决这个問題”。我翻过这一頁，突然一张发了黃的紙片从書里掉出来。这张紙片上也用同前面一样的笔迹写滿了字。下面就是这张紙片上所写的：“在这个問題上，人类用去了多少聰明才智，尽管以往大多数探险家在北极找到的只是残酷的坟墓，但解决这个問題已成了国际間热烈的竞賽了。在这一竞賽中，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有人参加，只是沒有俄罗斯人。其实，远在罗蒙諾索夫时代，俄罗斯人已經兴起开发北极的热潮，而且这热潮直到今天仍然沒有减退。阿姆生希望无論如何要为挪威保持开拓北极的荣誉，可是我們今年也决定要去，并且要向全世界証明，俄罗斯人是能够建立这种功勛的”。

这大概是篇报告書中的一段，因为反面写着“航务总局局长鈞启”，日期是“一九一一年四月十七日”。

可見，这就是卡佳的父亲希图去的地方！他想效法南生，随着漂流的冰块尽可能地向北走，然后駕着狗拖的雪橇到达北极。我照自己的老习惯計算了一下，他要是坐飞机飞到北极可以快多少倍。

只有一个問題不明白：一九一二年夏天，“圣·瑪丽亚”号帆船是从彼得堡揚帆去海参崴的，可是这兒却干嗎提到北极呢？

第二天，还在开早飯前，我就跑到門房里去挂电話給卡佳：

“卡其加，难道你父亲是去北极的嗎？”

她大概沒料到会有这样的問題，所以我听見一种惊奇的，好象还在睡梦中似的哼哼的回答声。后来她才說：

“不—不是，怎么啦？”

“沒有什么，他想从南生到过的最北点，用狗拖着雪橇到达北极。唉，你呀！”

“什么‘唉，你呀’？”

“連自己父亲的这些事都不知道。你今天有空嗎？”

“同琪尔加去动物园。”

呃，去动物园！瓦尔加很早以前就邀我到动物园去看看他的嚙齿动物，眞糟糕，我直到現在还沒有去！

我告訴卡佳說我在門口等她。

琪尔加就是以前讀过“杜布洛夫斯基”，并且証明“瑪莎嫁給了杜布洛夫斯基”的琪玲。她現在已經变成一个纒着金色的发辮的大姑娘了。她还和从前一样老是呆呆地看着卡佳的嘴，傾听着卡佳說的每一个字，只不过偶尔用哈哈大笑来代替反駁。她笑得那么突然，那么响亮，大家不禁为之毛骨悚然。这时卡佳便用她那习慣了的表示忍耐的动作将耳朵堵住。

我和瓦尔加約定，要他在門口接我們，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他沒有来。旣然他夸口說可以免票带我們进去，如果現在又去买票，那就未免太儍了。

后来他終于来了，当我介紹他同姑娘們認識时，他的脸都臊紅了。他嘟嘟囔囔地說，恐怕“你們对嚙齿动物不感兴趣”。卡佳很有礼貌地不同意說，如果根据他替叶夫根尼·奥涅金作的辯护詞来推測嚙齿动物的話，相反的这倒是很有趣的。于是我們規規矩矩地走过看守人身旁。瓦尔加对看守人連說了三遍，說

他是动物实験室的工作人員，这些人都是来"看他"的。

那时的动物园和現在不一样。許多館都封閉着，此外就是最普通的，披复着白雪的露天平地。瓦尔加說这上面住着北极狐，它們还有洞穴等等。可是我們除了白雪之外，什么北极狐也沒有看見，甚至根本什么也沒有。所以只好姑且相信瓦尔加說的話。

他急切想讓我們看他的嚙齿动物，所以連老虎、大象等别的有趣的动物也不許我們多瞧，就带着我們穿过全动物园，走到一間十分污秽的屋子。在这間屋子里养着瓦尔加的嚙齿动物。我不知道我們每一个人是怎样理解这个名詞的，但等我們看了之后，便都装作似乎早就明白，原来嚙齿动物就是普通的老鼠。

瓦尔加带着得意的神气向我們說明，老鼠非常之多，而且都被感染了某种病。他說，他管理的嚙齿动物之中还有蝙蝠，并且他用手喂它們虫子吃。一般說来，虽然屋子里臭得厉害，但这还是相当有趣的。瓦尔加講来講去老也講不完。

我們带着欽佩的神情听他講，特别是琪玲。后来她突然打了一个冷战，說她討厌老鼠。

"傻瓜，"卡佳輕声对她說道。

琪玲笑了起来。

"眞的，脏得要死。"她說道。

瓦尔加也笑了。我看出他因为自己的老鼠挨了罵而感到伤心。我們謝过他，又向前走了。

"多沒意思！哪怕看看猴子也好哇，"琪玲这样建議。

于是我們便去看猴子。

那兒这么臭喲?!就連瓦尔加的嚙齿动物还沒有这么难聞

哩！琪玲說她简直不能呼吸了。

"唉呀，瞧你！这兒的看守人該怎么办呢？"卡佳說道。

我們都瞅了瞅看守人，那人傻里傻气装模作样地站在鉄籠旁边。

这是卡耶尔·庫里！乍見之下，我还不敢相信，因为我已經十多年沒有見着他了。然而这时他走上前来，用他那低浊討厌的声音說：

"狐猴……"

是他！

我盯着他看了看，但他已不認識我了。他已經老了，鼻子长得象个鴨嘴似的。鬈发也不似从前那样，而是变得稀疏，肮脏，斑白了。过去那个雄糾糾的卡耶尔·庫里，現在只剩下脸上的卷圈兒胡子和粉刺了。

"在这种动物的胸部和腹部，"卡耶尔带着那种我极为熟悉的威吓人的教訓神气繼續說道，"諸位可以看到它們的乳头，就是大家都知道的奶它們小孩的器官。"

是他，是他！我感到好笑。卡佳問我笑什么。我湊近她的耳边低声說：

"你瞧他。"

她看了看他。

"你知道，他是誰嗎？"

"你說吧。"

"我的繼父。"

"瞎說！"

"实話。"

她不相信地揚了揚眉毛，然后眨了眨眼睛，又繼續听下去。

“在下一个籠子里，諸位可以看見一种类人的长臂猿。这种长臂猿和人类极其相似。这种长臂猿有时也会感到煩悶。这时，他就象发疯似地在籠子里乱窜。”

可怜的长臂猿啊！我想起从前，当这个坏蛋打开他那无休止的話匣子时，我是多么“煩悶”。

我向卡佳和琪玲瞥了一眼。她們一定以为我是发了神經病！如果我要放过今天这样的机会，那可是連我自己也要瞧不起自己了。

“笔划必須吹直，”我声音不高地說道。

他斜着眼看了看我，但我装作正在用心看长臂猿的样子。

“在下一个籠子里，”他繼續講道，“諸位可以看到直布罗陀出产的无尾猿。她的发育很象小孩。它口里有一个肉袋，通常用来儲藏食物中甘美的东西。”

“好啦，明白了，”我說。“每一个人都想捞到一块肥肉，可是在他得到这样一块肥肉以后，能不能就說是滿足了呢，这还是一个問題。”

我自己都沒有料到还能把这些鬼話背出来。琪尔加噗嗤一声笑了。卡耶尔不再說下去了，他用一种傻里傻气但是疑虑的神情把我打量了一下。大概一种蒙朧的回忆在他那猪头里閃了一下……不过他还沒有認出是我来。一定的！

“我們保管它們吃飽，”他换了另外一种低沉的一本正經的腔調說道。“它們每天狼吞虎咽地吃个不停。若是換成人的話，决不可能象这种畜牲吃得那么多。”

他忽然察覚話扯得太远，便收住了口。

“諸位看看它們的臀部，”他繼續說道，“就可以看見它們这一部分紅得很不正常。这并不是肉皮，而是一种类似茧子的硬

皮。”

“請你告訴我，”我很正經地問道。“有沒有会說話的猴子呢？”

琪玲不禁笑了起來。

“沒有听說过，”卡耶尔不敢肯定地說道。他不知道，我是在逗乐还是說正經話。

“有人同我講过一个猴子，它以前在輪船碼头上工作，”我接着說道，“后来被开除了，这个猴子就开始来教育小孩子。”

卡耶尔勉强笑了笑。

“誰的小孩子呢？”

“别人的。这个猴子用脚踏板打他們，”我繼續說着，感到旧日的回忆使我的心剧烈地跳起来，“特别是打小女孩，因为它怕男孩会照样对付它。”

我的声音愈說愈高。卡耶尔张大着嘴在听。他突然惊駭地将嘴閉上，眼睛不住地霎着。

“孩子們吃过飯还得向这个猴子謝謝，”我掙开了慌慌张张拉住我手腕的琪尔加。“这个卑賤的猴子虽然不工作，可是还依賴别人生活下去，只是从早到晚擦它那双該死的皮靴。后来它参加了敢死队，因此得了二百卢布和一套新制服。它还发表过談話哩！”我这时大概恨得咬起牙来了。“这支敢死队被打垮了以后，猴子逃出了城，并且把这个家里所有的东西都席卷一空。”

大概当时我的声音嚷得很高，所以卡佳突然站到了我和卡耶尔的中間。

卡耶尔嘴里囁嚅着不知說了些什么，把身子靠在鉄籠上。他認出是我来了。他的嘴唇也在歪来歪去的。

"薩尼亚！"卡佳用命令的口吻說道。

"别急，"我推开她。"这只猴子跑掉了，总算是它的运气。要不然我一定把它……"

"薩尼亚！"

記得当时使我惊奇的是他突然尖叫了一声，双手把头抱住。我冷静了下来，很不好意思地强笑着看了看卡佳。因为我对自己这样大声叫嚷不免感到慚愧。

"走吧，"她簡单地說道。

我們在动物园里走着，大家都不作声。我看到琪尔加惊駭地眨着眼睛，而且总是离我远远的。卡佳在她耳边低声地說了些什么話。

"坏蛋，"我嘟囔着說。

我一直不能够鎮靜下来。

"今天就通过瓦尔加轉告动物园，問他們为什么收留这样一个坏蛋？他是一个白匪。"

"我現在实在怕你，"卡佳說道。"你原来是个疯子。你瞧，嘴唇都气白了。"

"因为我想杀死他，"我說道。"算了，去他媽的！讓我們来談談别的事吧。你們喜欢长臂猿嗎？"

8 舞　　会

我們学校附設了一个木工厂，我每天晚上在厂里作工，正好在这个时候我們收到了大批訂貨，是給农村小学校作教具，因此可以好好地掙几个錢。

"十月革命后文学中之农民"已經写完，是我一气之下花了一夜的功夫将它写完的。不过我还欠了一些債要还，例如我不喜欢的德文。所以，在学期末尾，我和卡佳只去过一次溜冰場，而且还沒有溜冰。冰場被划損得太厉害了：冰球队从一早就在冰場上練习。我們仅在小食店里喝了点茶。

卡佳問我关于繼父的事写了报告沒有。

"沒有，还沒有写。不过瓦尔加說他反正已經不在了。"

"那他在哪兒呢？"

"鬼知道他。逃跑了唄。"

我看出卡佳想問我为什么那么恨他，可是我很不願意回忆这个坏蛋，所以沒有作声。她終究还是問了。我只好簡簡单单地講了一遍：我們怎样在恩斯克居住，父亲怎样死在监獄里，母亲怎样嫁給卡耶尔。卡佳听說我还有个妹妹后感到很惊訝。

"她叫什么名字？"

"也叫薩尼亚。"

当她知道我自从离开恩斯克以后，还沒有写过一封信給妹妹时，她更加感到惊訝。

"她几岁了？"

"十六岁了。"

卡佳气憤地看了看我。

"猪仔！"

这的确太不象話了，我发誓說一定写封信到恩斯克去。

"等毕业后就写。現在有什么可写的呢！？我已經写过好儿次了，还不是你好，我好……眞沒有意思。"

这是寒假前我們最后一次的会見。随后又是学习，学习，讀

書，讀書。我早上六点鐘起床，接着便讀“飞机制造学”，晚上在木工厂工作，有时一直工作到深夜……

这个学期終于完了。放十一天假！我所作的第一件事是打电話給卡佳，請她到我們学校里来参加化妆舞会。布告上写着晚会的性質是破除迷信。可是同学們对这种意图都不关心。只有两三个人的衣服符合破除迷信的主題。如舒拉·柯乞涅夫。大家要同他这样逗唱：

午夜十二点

白菜头① 从寢室里走出来，

他今天化装成个波兰天主教神甫，样兒非常带劲！黑法衣和寬边帽正适合他那頎长的身子。他带着一副凶恶的样子走来走去，使得大家都感到恐惧。他扮演得很逼眞，所以逗得大家都好笑。还有一些同学拖着法衣哈哈大乐。

卡佳来得相当晚，我都想挂电話去叫她了。她冻得脸兒通紅，象个糖蘿卜似的。一迈进存衣室里，当我給她去存大衣和套鞋时，她就赶忙跑到火爐旁边去烤火。

“眞是冷啊，”她說道，将脸凑近火爐，“零下二百度！”

她穿着一件青色天鹅絨連衣裙，花边領子，辮子上打着蓝色大蝴蝶結。

这个蝴蝶結和青色連衣裙，还有頸上的一条細珊瑚項鏈，配在她身上多么調和！她是那么丰满，健康，同时又是多么窕窈，匀称。礼堂里舞会已經开始，我刚和她走进去，我們学校里跳得最好的舞迷們都撇下自己的女伴向她跑来。我有生以来这还是第一次悔恨自己不会跳舞。但是沒有法子！我假装一点也

---

① 柯乞涅夫这个姓是白菜头这个名詞轉化来的。——譯者注。

不在乎的样子，走到后台化妆室里去看演員。他們正在准备出場，姑娘們把我轟了出来。我又回到礼堂里去。正好这时华尔兹舞完了。我把卡佳招呼过来，我們坐下聊天。

“那是誰？”她突然惊惧地問我道。

我看了看。

“在哪兒？”

“那不是嗎，紅头发的。”

沒什么希奇的，这原来是罗馬什卡！他穿得很漂亮，系着那条我曾經用押金借过的領带。在我的眼光中，他今天并不怎么难看。可是卡佳却厌恶地看着他。

“你怎么不覺得——他实在可怕，”她說。“你已經习惯了，所以覺不出来。他就象尤利亚·希普①。”

“象誰？”

“象尤利亚·希普。”

我装作知道烏里亚·吉浦是什么人，意味深长地說：

“哦——哦。”

但是，要想騙过卡佳并不那么簡单！

“唉，你連狄更斯的書都沒有讀过，”她說道。“你还算是知識淵博的人哩！”

“誰說我是知識淵博的人？”

“大家。我有一次同你們学校里的一个女孩子講話，她就說‘格利高里耶夫是最杰出的人材’。哼，就是这样的人材！連狄更斯的作品都沒有讀过。”

我想对她解释，狄更斯的書确实是讀过，只是沒有讀到过

① 英国作家狄更斯作的“大卫·科波菲尔”中的坏蛋。——譯者注。

关于烏里亚·吉浦的。可是这时音乐又演奏起来了，我們大家都簡称他为哥沙的体育教員請卡佳伴舞，于是又只剩下了我一个人。这一次我被人請到演員那兒去了，并且还分配了我工作：給一个女孩子化妆犹太教的神甫。这个任务可不輕松。我整整替她弄了一个半鐘头，当我回到礼堂时，卡佳还在跳舞，現在是和瓦尔加跳。

这的确是一个很有趣的場面：瓦尔加目不轉睛地看着自己的脚，鬼知道，就好象这双脚是多么有趣的东西似的。卡其加带着他，很生气地一边跳一边教他。但不知为什么我感到非常寂寞。

有人在我鈕扣上挂了一个号碼作传信的游戏，我象个囚犯似的胸前挂着号碼坐在那兒发悶。突然一下子送来了两封信：一封上面写道："不要再装蒜了。坦白地說吧，您喜欢誰？回信交一四〇号。""坦白"写成了"且白"。另外一封信沒头沒尾地写道："格利高里耶夫是杰出的人材，連狄更斯的書都沒有讀过。"我向卡佳作了恫吓的样子。她笑了起来，撇下瓦尔加到我身边坐下。

"你們这兒很快乐，"她說道。"只是太热。怎么样，現在要学跳舞嗎？"

我回答說不想学，我和她到我們的教室里去了。这兒布置成一个休息室的样子；周围房角上放着演悲剧"时間到了"时用的道具——靠背椅，灯泡用紅、蓝紙包扎着。我們坐在我的書桌上——右边一排最后一张。不記得我們当时談些什么，談的很正經的事，——似乎是談有声电影。卡佳对这玩意兒很怀疑，我給她举出了声和光的相对速度的一些实例作証明。

我們头上是一盏蓝色的灯，照得她全身都是蓝的，大概正因

为如此我才那么大胆。我早就有心吻她了，当她刚进来，脸蛋兒冻得紅紅的，将腮靠近爐子烤火时，我就想吻她一下。不过那时是不可能的。可是現在，在蓝色的灯光下，这就可能了。我說了半句話就沉默了下来，閉起眼睛，在她的脸頰上吻了一下。

哦喲，她发了好大的脾气呀！

“这是什么意思？”她厉声問道。

我沒吭气，我的心怦怦地跳着，我恐怕她要說“我們根本不認識”，或者这一类的話。

“眞不应該！”她憤怒地說道。

“不，这不是不应該，”我不知所措地辯解道。

我們沉默了一会兒，后来卡佳請我弄点水来。我把水拿回来以后，她就对我講了一大篇道理。她象二加二等于四一样地証明，說我对她是漠不关心的，“只不过是我这样感觉”。同时，假如刚才是别的女孩子在她的地位的話，我也会吻她的。

“你不过是在竭力想使自己相信这一点，”她确定不移地說，“可是，事实上滿不是那么一回事兒！”

后来她同意了我并不是想欺負她，——本来也是如此。不过我毕竟不应該这样作，因为我只是欺騙自己，事实上什么感觉也沒有……

“一点爱情的味兒也沒有，”她沉默了一会兒又說，我感觉到她的脸紅了。

我握着她的手来代替回答，用她的手撫摸我的脸，我的眼睛。她沒有把手縮回去，我們就这样默默地在昏暗的教室里，在我的書桌上坐了一会兒。在这个教室里，教員曾經抽問我，我胡乱地回答过，我曾站在黑板前証明过几何定理，在这张書桌里面，还放着瓦尔加考試时揉皺的夹带。这一切多么奇怪，但又多

么美妙啊！我簡直不能形容出这当兒我心里是多么舒服……

后来我发現墻角有人在大声喘气。我回过头去看，原来是罗馬什卡。我不知道他为什么那样大声喘气。他的样子异常卑鄙。自然他立刻就知道我們已經发現他了。他自言自語嘟囔着，强装着笑脸向我們走过来。

“格利高里耶夫，你怎么不給我介紹介紹呀？”

我站了起来。大概我当时的表情特别不客气，所以他畏惧地眨眨眼，一溜烟走了。这的确好笑，他一下子就怕成那付样子。我們俩忍不住放声笑起来，卡佳説他不只是象烏里亚·吉浦，而且还象只猫头鷹，紅头发，鈎鼻子，圓眼睛。她算是猜对了，在我們班里，大家有时开罗馬什卡的玩笑，就叫他“猫头鷹”。我們又回到了礼堂里去。

舒拉·柯乞涅夫在門口遇着我們，很幽默地表示大吃一惊的样子。我把他介紹給卡佳，他象一个眞正神甫一般向她祝福，甚至还把抖动的手放到唇边。

跳舞已經完了，接着游艺节目开始。我們剧团演出“欽差大臣”中的一段。

我和卡佳坐在第三排，可是我們什么也沒有听。至少我是沒听。我想她也是如此。我附在她的耳边低声对她説：

“回头我們再談一談好嗎？”

她很严肃地看了看我，点了点头。

9　初次幽会。　失眠

这在我説来已不是第一次了，生活原来順着一条道路前进；

假定說吧，是順着直綫前进，突然一个大轉弯，便开始“横滚”和“英麦曼”①。

当我还是一个八岁小孩的时候，我把小刀丢在浮桥上被害的看守人身边时的那一次是这样。在人民教育委員会收容所里，因为无聊而塑起“閑扯淡”的那一次也是这样。我成了反对柯拉布略夫阴謀事件的偶然見証人，后来忍辱被赶出了塔塔林諾夫家的那一次是这样。現在我又被赶出来的这一次也是这样，——这次是永远被赶出来了。

这次轉折是这么开始的。我和卡佳約定在兵工街白鉄厂前面会面，但她沒有来。

在这失意的一天，甚么事都不順利！我沒上第六堂課就偸跑出来了，这一著实在是不高明，因为李和說过課后发堂下作文。我想把要和卡佳談話的內容思索一番。可是在外面哪兒还顧得上思索問題呢。过了不一会兒我就冻得象条狗一样，唯一能作的只是拚命跺脚，把耳朵和鼻子一起捂住。

然而毕竟是太有意思了！从昨天开始，一切变化多大呀！例如，昨天我可以說：卡其加是个傻瓜！可是今天就不会說了。昨天我会因为她迟到而罵她，今天就不会了。然而一想到她就是以前問我念过“叶林娜·罗滨逊”沒有，她就是因弄炸了測乳器而挨了我一耳光的卡加时，就覚得更加有意思。这眞是她嗎？

“是她！”我愉快地想道。

不过現在她已經不是那个她，我也并非旧日的我了。

这时已經过了整整一个鐘头。胡同里非常寂靜，只有一个

① 一种高級飞行特技。——原書注。

小矮个兒，大鼻子的白鉄工人从作坊里出来了好几次，带着畏縮狐疑的神情看我。我轉过身去背向着他，这大概只有更增加他的怀疑。我走到街那边去，可是他依然站在門口一团一团的蒸气中，好象恩斯克大教堂天花板上的圣象一样。我只好順路往下走到提維尔大街去……

我回到学校的时候，午飯已經开过了。我走到厨房里去烤火，挨了厨子一頓申斥，但却得到一盘热土豆。我默默地吃完了土豆就去找瓦尔加。可是瓦尔加到动物园去了。李和把我的作文发給了罗馬什卡。

我心緒非常乱，所以沒有注意罗馬什卡碰見我时那付紧张的神色。我走进我們习惯在那里备課的图書館时，他更是坐立不安了。

他无緣无故地笑了好几次，急急忙忙地把作文給了我。

“李和驢眞是李和驢。”他討人欢心地說道。“要我是你的話，我一定要告他。”

我掀开作文一看，每一頁都划上一条大紅杠子。最后批着：“唯心主义。极劣。”

我滿不在乎地說了一声：“笨蛋”，闔上作文本便走出来了。罗馬什卡跟着我跑了出来。他跑到我的前面，看我的脸色。奇怪，他今天怎么这么討好！他大概是因为我的作文不及格在幸灾乐祸。这时我脑中根本沒有想到他这种行为的眞正原因。

“这个李和驢，”他老是反来复去地說着。“舒拉·柯乞涅夫把他形容得好：‘他的脑瓜象个椰子，外表硬，里面稀。’”

他令人憎厌地笑了起来，又跑到前面去。

“去你媽的，”我咬着牙說道。

最后他落在后面了……

同学們出去参加文娛活动还沒有回来，我就已經鑽到被窩里了。不过，也許我不該这么早躺下。我刚闔上眼，翻了一下身，睡意便完全消失了。

这还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失眠。我靜靜地躺着想心事。想什么呢？大概把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想过了！

想到柯拉布略夫，我明天要把作文交給他請他看看。想到那个把我当作小偷的白鉄工人。想到卡佳父亲的書“格里尔探险队罹难的原因”。

然而不論我想什么，到头来总要想到她！我开始打瞌睡了，但突然又那么甜蜜地想起她来，甚至呼吸都感到困难，心房跳动得緩慢了，跳的声音也大了。我仿佛看見了她，比起她在我身边时看得还要清楚。我感覚到她的手就在我的眼前。

“得啦，——恋爱就恋爱唄。老兄，暫时还是先睡覚吧，”我对自己說道。

現在虽然有点兒想睡，可是心里那么甜滋滋的，睡覚未免可惜。直到快天亮，彼佳大叔在厨房里吆喝我們的小猫瑪赫美特的时候，我才睡着了。

10　不愉快的事

第一次的幽会和第一次的失眠，这終究还屬于以往的美好的生活的范疇。但是到第二天，不愉快的事便发生了。

早飯后我挂电話給卡佳。眞倒楣，接电話的是尼古拉·安东內奇。

“誰找她？”

“她的朋友。”

“哪一位？”

我沒有吭气。

“喂，誰呀？”

我挂上了听筒……

十一点的时候我呆在蔬菜舖里，从这兒可以看見整个提維尔—雅木斯大街。这次誰也不把我当作小偷了。我假装打电話，买蜜餞苹果，若无其事地站在門边。其实我是在等尼娜·卡比丹諾芙娜。根据前几年的經驗，我知道她什么时間从市場上回来。她終于出現了：瘦小的身躯，弯着腰，穿着她原来那件綠色天鵝絨旧式大衣，在这样的大冷天手里还打着一把伞！带着她那一时也离不了手的小口袋。

“尼娜·卡比丹諾芙娜！”

她严峻地看了我一眼，一句話沒有說，便朝前走去了。我感到十分惊异。

“尼娜·卡比丹諾芙娜！”

她将口袋放在地上，直起腰来，憤怒地看了看我。

“原来是这样，我的小乖乖，”她很严厉地說道。“我看在过去的情份上，不生你的气。不过以后再也不希望看到你，听到你說話了。”

她微微摇动着头。

“你要是走这边，我們就走那边！不要再写信，不要再打电話来了！我眞沒有想到！看来是我錯了！”

她提起口袋，砰地一声，小便門就在我的鼻尖前閉上了。

我张大了口，目送着她进去。我們俩到底是誰发疯了呢？

是我还是她？……

这是第一次不愉快的談話。接着是第二次，第二次以后又来了第三次。

我回到家里去的时候，在大門口碰見了李和，这时实在不是去和他談我的作文的时候！

我和他一起走上楼梯；他象往常一样昂着头，傻里傻气地撫弄着鼻子，这时我产生了一种可怕的，想用脚踢他的欲望。

“李和同志，我已經領到作文了，”我突然說道。“您批着：‘唯心主义’。这根本不是分数，这是批評，首先要有証据。”

“我們以后再談。”

“不，我們現在就談。”我反对道，“我是一个共青团員，可是您竟批評我唯心主义。您什么也不懂。”

“你說什么？”他問道，立刻皺起眉头来。

“您根本就不懂什么是唯心主义，”我繼續說道，我很高兴地发現，随着我說的每一个字，他的脸色愈来愈难看了。“您不过是因为不知道怎样給我扣帽子，所以写上个‘唯心主义’。难怪大家說您……”

我稍微停頓了一下，感覚到馬上就要說出最粗野的話来。后来还是脫口說出来了：

“說您的脑瓜象个椰子：外表硬，里面稀。”

这事发生得那么出乎意料，我們两个人都不禁一怔。后来他鼓起鼻孔，恶狠狠地簡短地說：

“啊！？”

便迅速走开了。

这次談話以后，正好过了一个鐘头，我被叫到柯拉布略夫那

兒去了。这是一个不祥的預兆：柯拉布略夫很少把人叫到他那兒去的。

我很久沒看見他发这样大的脾气了。他低着头，在房間里踱来踱去，当我走进門时，他带着厌恶的神气閃到一边。

“哼！”他的鬍子突然凶狠地抖了一下。“你干下的好事！我倒很乐意听一听！”

“依万·巴甫雷奇，我現在就向您說明这一切，”我竭力鎮靜地申辯道。“我不喜欢批評，这是实話。但这也說不上什么唯心主义呀！其他的同学都抄袭批評家的話，这是他所喜欢的。讓他先証明我是唯心主义者。他应該知道，这对我是一种侮辱。”

我把作文本遞給柯拉布略夫，但他連看也不看一下。

“你应該到教务会議上去解释你自己的行为。”

“可以！……伊万·巴甫雷奇。”我突然問道，“您很久沒有到塔塔林諾夫家去了嗎？”

“什么事？”

“沒有什么。”

柯拉布略夫盯着我的脸看了看。

“喂，老弟，”他很平靜地說道。“我看你是有意挖苦李和的。坐下来談談吧。喂，只是不准撒謊。”

即便是我的亲生母亲，我也不会对她說我爱卡佳，并且想了她整整一夜的事。这是不可能的。不过我很早便想把塔塔林諾夫家的变化，那些我非常看不慣的变化告訴柯拉布略夫。

他一面听着我講，一面从房子的这一角走到那一角来回地踱着。他不时站下来，带着凄傷的神情向周围看一看。总而言

之，我的叙述大概使他很伤心。他有一次甚至用手抓头皮，不过立刻就发覺这样不对，便連忙裝作用手去摸前额的样子。

“好吧，”当我請他給塔塔林諾夫家挂电話，了解一下是什么緣故时，他説道。“我一定这么办。你一个鐘头以后再来。”

“伊万·巴甫雷奇，过半个鐘头以后吧！”

他忧伤而和藹地微微一笑……

我在礼堂里消磨了这半个鐘头。礼堂里的拼花地板是用樅木砌成的，当我从窗子跟前向礼堂門口走去时，暗的木条好象是亮的，亮的又好象是暗的，阳光尽情地照耀着，寬大的窗子跟前細小的尘埃緩緩地飞舞着。这一切是多么美好，但又是多么不好啊！

等我回来时，柯拉布略夫坐在沙发上抽烟，肩上披着在他心情不舒服时常穿的綠毛絨的制服上身，敞着衬衣軟領。

“喂，老弟，你求我挂电話可算是上当了，”他説道。“現在你的秘密我都知道了。”

“什么秘密？”

他看了看我，好象初次見我似的。

“有秘密就应該会保守，”他繼續説道。“可是你却不会。譬如説，你今天追求一个姑娘，明天就搞得全校都知道了。而且，如果只是全校那还算好的哩。”

大概我当时的样子很愚蠢，所以柯拉布略夫不由得微微一笑，不过几乎看不出来。这时至少有二十种想法立刻在我脑中閃过。“这是誰干的？罗馬什卡！我要揍死他！原来因为这样卡佳才沒有来！因为这样老太婆才赶我走！”

“伊万·巴甫雷奇，我爱她。”我坚决地説道。

他把双手一摊。

“我不在乎，讓全校去議論这件事好了！”

“嘿，全校，那倒也就算了，”柯拉布略夫說道，“但这是瑪丽亚·瓦西里耶芙娜和尼娜·卡比丹諾芙娜說的，你可就不能不在乎了吧，是不是？”

“不，也不在乎！”我激情地說道。

“且慢。但是好象你曾經被人从家里轟出来过？”

“从誰的家里？那不是她的家。她只等毕业就离开这个家哩。”

“且慢，且慢，这是什么意思？你打算結婚嗎？”

我稍为冷静了一点。

“这和旁人无关！”

“当然罗，”柯拉布略夫赶忙說道。“可是你要明白，我怕不那么簡单吧！总还得問問卡佳。也許她还不打算出嫁。不管怎样吧，只好等她从恩斯克回来再說了。”

“啊，”我很鎮靜地說道，“他們把她送到恩斯克去了？太好了。”

柯拉布略夫又看了看我，这次却带着毫不掩飾的好奇的神情。

“她的姨媽病了，她去看望姨媽的病，”他說道。“她去几天，开学前就回来，为了这样一点事似乎还不值得着急吧！”

“我沒有着急，伊万·巴甫雷奇。可是关于李和的事，如果您願意的話，我就向他道歉。不过也請他收回他那种認为我是唯心主义者的說法。”

好象什么事也沒有发生过，好象卡佳沒有被送到恩斯克去，好象我沒有决定要打死罗馬什卡，我們心平气和地討論我的作

文，討論了約摸有十五分鐘。然后我告辞說如果可以的話我明天再来，便走了。

11　到恩斯克去

揍死罗馬什卡！我毫不怀疑，事情是他干的。不是他还有誰呢！因为我吻卡佳时，他正坐在休息室里，所以看見了。

我在宿舍里憤恨地不时看看他的床和小桌子。等了他半个小时，后来我写了一张条子，要他解释，并且威胁他說，不然的話，我就当着全校的人叫他下流坯。后来我又把这张条子撕了，便到动物园去找瓦尔加。

当然，他总是在他那群嚙齿动物那兒！他穿着一件肮脏的褂子，耳朵上夹着鉛笔，腋下夹着一本很大的笔記簿，站在籠子旁边，用手喂那些飞鼠。他一面喂它們小虫子吃，一面十分得意地輕輕吹着口哨。

我叫了他一声。他犹犹疑疑地回过头来，很生气地摆了摆手說道：

“等一会兒！”

“瓦里亚！一分鐘！”

“别忙，你把我攪乱了。八，九，十……”

他在数虫子。

“眞是个好吃的家伙！十七，十八，二十……”

“瓦尔加！”我恳求道。

“我把你赶出去！”瓦尔加急速地說道。

我十分憎恶地看了看蝙蝠。它們头朝下悬着，寬大的耳朵，

一张古怪的，差不多象人一般的脸。討厌鬼！毫无办法，我只好等它們吃飽了再說。

好歹算是完事了！可是瓦尔加一面用肮脏的手指摸弄自己的鼻子，又在学习本上写了半个鐘头，我这份罪才算受完了。

“見你的鬼去吧！”我对他說道。“你的心思都用在这些畜牲身上去了。你有錢嗎？”

“有二十七个卢布。”瓦尔加很神气地回答道。

“都給我。”

这实在残酷。我知道瓦尔加积蓄这些錢是准备买一种蛇的。可是有什么法子呢？我只有十七个卢布，而票价正好两倍于这个数字。

瓦尔加輕輕地眨起眼来，然后很严肃地看了看我，便把錢掏了出来。

“我要走了。”

“到哪兒去？”

“到恩斯克去。”

“干什么？”

“等回来的时候再告訴你。現在暫且告訴你一件事：罗馬什卡是个下流坯子。你和他要好，那是因为你还不知道他是一个多么下流的东西。如果你知道这点还和他要好，那么你自己也是个下流坯子。話就說到这里。再見。”

我一只脚已經迈出門去了，这时瓦尔加又喊了我一声。他的声音那么奇怪，因此我立刻轉回来了。

“薩尼亚，”他訕訕地說道，“我并沒有和他要好。总之……”

他沉默了一会兒，又开始摸弄起他的鼻子来。

“是我錯了，”他坚决地声称，“我本想早告訴你的。你記得柯拉布略夫的那件事吧？”

“我怎么会忘記了呢！”

“那好！就是他干的。”

“是他？”

“他把所有的事都对尼古拉·安东內奇談了。”

“你胡說！”

我立刻回想起那天晚上，从塔塔林諾夫家回来以后，我把他們反对柯拉布略夫的阴謀都告訴瓦尔加了。

“慢着，但我只对你一个人說过呀。”

“不錯，可是罗馬什卡偸听去了。”

“那你为什么不吭气呢？”

瓦尔加低下了头。

“他要我人格担保，”瓦尔加喃喃地說道。“并且还恐吓我，說他在夜里要盯住我看。你知道如果有人在夜里盯着我，我簡直受不了。現在我明白了，这完全是瞎扯。这是因为有一次我睡醒了，发現他在盯着我的緣故。”

“你簡直是个傻瓜，原来这样。”

“他記在小本子上，然后去向尼古拉·安东內奇密告，”瓦尔加很难过地継續說道。“他故意刺激我。他密告了以后还講給我听。我把耳朵堵住，他还是講。”

三年以前，学校里传說过罗馬什卡睡觉时总是睜着眼睛。这是眞的。我有一次亲眼看到他睡觉，他的上下眼皮中間清清楚楚露出一綫眼珠来，白不白，蓝不蓝，的确有点怕人……这种似睡非睡的样子，令人看了很不舒服的！罗馬什卡說他从来不睡觉，这显然是吹牛，其实是因为他的眼皮太短。然而偏有那么一

些同学相信他。他們因为他能不“睡覚”而尊敬他，也有点害怕他。大約瓦尔加的恐惧心理也是这样产生的，因为他和罗馬什卡已經床靠床并排着睡了五年。

所有这一切在我脑中乱紛紛地閃过。“傻家伙，”我心里想道。“你还算自然科学家呢！”

“唉，你这个飯桶！”我說道。“我現在沒功夫和你多談，不过照我看，关于他往小本上記东西这件事你应該写份材料交給团支部。老实說，我沒有想到他把你拴得这么紧。你給了他多少次‘人格’担保？”

“不記得了，”瓦尔加喃喃地答道。

“算一下吧。”

他伤心地看了看我……

我从动物园出来就上車站去买票，再从車站回到学校里。我有一套很好的制图仪器，我决定带着它，万一手头不方便时，可以把它卖掉。

就在我干这些傻事情当中，又加了一样傻事情，而且后来我为这一件事付出了加倍的代价。

当我走进寢室时，里面已有十来个人，我們班的女同学丹娘·薇莉琪珂也在。

大家都有事，有的讀書，有的談話。

舒拉·柯乞涅夫在摹仿我們新来的数学教員。他举起两只手奔到假想的黑板前面，然后慢慢地派头十足地坐下。周围的人都哈哈大笑起来。总之，誰也沒注意到罗馬什卡跪在我的床前翻弄我的箱子。

这又一次的卑鄙行为使我大为吃惊。我感到一股热血冲到头上来，但我仍旧以平靜的步伐走到他跟前，以平靜的声調問

他道：

"你找什么？罗馬什卡。"

他惊惧地抬起眼睛望着我，虽然我已經十分激动，但我还是注意到他这时非常象一只猫头鹰。他的脸色白得出奇，一双大耳朵烧得通紅。

"找卡佳的信嗎？"我繼續說道。"你想把信交給尼古拉·安东內奇嗎？这兒就是。拿去吧！"

我照着他的脸狠狠地踢了一脚。

我刚才的話說得都很輕，所以誰也沒意料到我会踢他。大概我还踹了他两三脚。要不是丹娘·薇莉琪珂在場，我一定把他踢死了。当时男孩子們都张大了嘴站在一旁，只有她勇敢地冲到我們两个人中間，拉住我，把我推开，她使出那么大的劲兒，我不由得坐到了床上。

"你发疯了！"

我象是透过一层烟雾看到了她的脸，她流露出憎恶的神情在看着我。我立刻清醒了过来。

"同学們，我把一切事情都向你們解释清楚。"我心虚地說道。

但是他們沉默着不說話。罗馬什卡揚着头躺在地板上，也不吭气。他的頰上有一块青色的瘀伤。我提起小箱子便走出来了……

我怀着沉重的心情在車站上徘徊了三个多鐘头。我在极不愉快和厌煩的心情下讀报紙，研究行車时間表，在三等車的小卖店里喝茶。我想吃点东西，可是又觉得茶既沒味，夹心面包也难以下咽，口里的那种滋味，就好象是吞了瓦尔加喂給蝙蝠吃的虫子一般难受。經过这一幕之后，我感到心里非常窝囊。唉，

不該回学校去的。什么制图仪器！它对我有什么鬼用？难道我在达莎阿姨那兒还不能弄点回来的車票錢嗎？

12 故乡的家

这次沿着我和彼其加・司考伏罗得尼可夫曾經流浪，偷窃，討飯度日的地方旅行，給了我一种异常自在的印象。

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买票坐火車。我可以坐在靠窗的位置上，可以和邻座的人閑談，如果我会抽烟的話，我也可以抽烟。查票員来时我也大可不必鑽到座位底下去，可以满不在意地繼續談着話，把車票递給他。这是一种极不平凡的感覚，虽然車厢里相当拥挤，可是心里还感覚到非常松快。这种感覚使我心情舒暢，忘記了罗馬什卡的事，开始想起恩斯克，想到妹妹，想到达莎阿姨，想到我要象雪花落在头上一样，突然落到他們身边，而且他們将会不認識我了。

我这样想着便睡着了，我睡了那么久，使得邻座的人都担心起来，以为我可别是死了吧？然而諸位知道，我并沒有死。

回到闊别了八年的故乡，这是多么令人兴奋的事啊！什么都熟悉，又似乎什么都不熟悉。难道这就是省长公署嗎？从前我曾經覚得它是十分高大的。难道这就是城墻根嗎？怎么会这样狭窄弯曲？难道这就是洛普亨林蔭大道嗎？不过这条大道还給了我些安慰：在菩提树后面，沿着那条主要的林蔭路，新修了一片华丽的大厦。蒼黛色的菩提树宛如画在一片雪白的背景上。菩提树的黑影斜斜地落在白色雪地上，眞是太美了！

我迅速地走着，每走一步，我不是辨認旧的景物，便是惊奇新的变化。这是达莎阿姨曾經打算把我和妹妹送去的保育院；它已經塗成綠色，墻上有一块极大的刻着金字的大理石板，上面写着："公元一八二四年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維奇·普希金曾寓于此"。我看了以后有点兒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見鬼！普希金曾經在这所房子里住过！要是保育院的人知道这件事，他們一定会把鼻子翘得高高的驕傲起来呢。

这是"法庭"，就是我和媽媽递过呈子的地方！現在这兒已經毫无"法庭"的气味了，窗上古老低矮的鉄栏杆已經拆掉，門旁挂着一块小牌子，上面写着："文化宫"。

这不是碉堡的围墻嗎，我的心脏剧烈地跳动起来。一条花崗石的河堤呈現在我的眼前，我簡直难以認出这就是我們从前那条寒傖的歪歪斜斜的河堤。使我更加感到惊异的，就是从前我們住的地方已經开辟成了一个小花园，一些保姆象圣象一般抱着裹得严严实实的嬰兒坐在椅子上。这眞是出乎我的意料。我在碉堡围墻上站了好久，暗自惊訝地望着小花园，望着花崗石河堤和那条我們曾經在旁边玩过击柱戏的林蔭大道。在过去一排排杂貨店后面的荒地上，現在巍然屹立着一座灰色大楼，楼門前一个穿皮大衣的卫兵来回踱着。我走到他的跟前，指着楼房問他这是什么机关。

"这是恩斯克发电厂。"他很神气地答道。

"您可知道司考伏罗得尼可夫家在哪兒嗎？"

"法官嗎？"

"不是。"

"那不知道。我們这兒只有一个司考伏罗得尼可夫，他是法官。"

我走开了几步。也許司考伏罗得尼可夫老头兒眞作了法官？我回过头去，又看了看那所修建在原来是我們破房子的地方的华丽大厦，于是我断定，这是可能的。

“这位法官什么样子？身材高大嗎？”

“很高大。”

“有鬍子嗎？”

“不，沒有鬍子，”卫兵好象是在替司考伏罗得尼可夫抱屈，連忙分辯道。

唔……沒有鬍子。希望不大。

“这位法官住在什么地方？

“果戈理大街，从前馬尔庫兹的房子。”

我知道这所房子是全城最好的房子之一，門口两旁各有一个獅子象。听他这一說，我更蒙头了。可是又沒有別的办法，我只好向果戈理大街走去，不过对于司考伏罗得尼可夫老头会刮去鬍子，成为大法官，而且住在那么富丽堂皇的大厦里这一点，却是抱着很小的希望的。

半个小时以后，我已走到果戈理大街馬尔庫兹的房子跟前了。这八年来獅子的相貌也衰老了，然而还是那么雄糾糾，气昂昂的样子。我迟疑不决地站在上面有很寬的屋檐的大門前。按不按門鈴呢？还是問問人民警察問事处在什么地方吧？

窗戶上露着达莎阿姨所喜爱的細紗窗帘，我突然决定按一下門鈴。

給我开門的是一个十六、七岁的姑娘，她穿着一件蓝色法兰絨連衣裙，头发从中分开，梳得很光亮，皮肤黑亮亮的。这一点可把我哄住了。

“司考伏罗得尼可夫家住在这兒嗎？”

“是的。”

“那么……达里亚·嘉芙里洛芙娜在家嗎？”

“她很快就回来，”姑娘含笑答道，一面好奇地打量着我。她微笑的样子和薩尼亚完全一样。可是薩尼亚的皮肤是白皙的，辮子是弯曲的，眼睛是天蓝色的。不对，她不是薩尼亚。

“可以在这兒等一等嗎？”

“請吧。”

我把我的小箱子放在前厅里，脱下大衣，她領我走进一間十分明亮軒敞的房間，房間里收拾得非常洁净，甚至可以說摆設得很华丽。房間里最显著的地方放着一架大鋼琴——这可就不象达莎阿姨的地方了。但是在那两只浅蓝色的玻璃花瓶中間的相片，那张以雪山为背景，坐在藤椅子上的英雄的相片，就等于說明达莎阿姨本人在这里一样了。

我这时那付东张西望的表情可以說是有些傻里傻气的，同时又是喜不自禁的，所以这位姑娘瞪着眼睛望着我。忽然她把头微微一低，眉梢向上一揚，簡直和母亲一模一样。我明白了，这一定是薩尼亚。

“薩尼亚？”我不很自信地喊道。

她吃了一惊。

“嗯。”

“等等，你以前不是很白的嗎？”我带着顫抖的声音繼續說道。“怎么回事？我們以前在乡下住的时候，你是非常白的。可是現在却变得这么黑了。”

她发呆了，連嘴都张大了。

“在什么乡下？”

“父亲死的时候，”我說道，并且笑了起来，“嗨，你忘了。全忘了！連我都記不得了！”

大概是由于欢喜过度，我連話也說不清楚了。我本来就很爱她，八年沒見，她竟长得这么象母亲了。

“薩尼亚？”她終于說道。“天哪！我們还以为你早就死了。”

她把我拥抱了起来。

“薩尼亚，薩尼亚！眞是你嗎？可惜达莎阿姨不在。快坐下吧，站着干嗎？你从哪兒来？什么时候到的？”

我們并排坐下，但她馬上又跳起来，跑到前厅里去取我的箱子。

“等一会兒吧！你跑到哪兒去？先講講你的生活怎样，达莎阿姨的生活怎样。”

“你自己怎样呢？为什么連一封信也不写？我們整天在打听你，还在报上登过啓事呢。”

“沒有看到报，”我很懊悔地說。

現在我才充分認識到自己的行为是多么可耻；居然忘掉我还有这么一个好妹妹，一个好到絕頂的达莎阿姨，就象刚才薩尼亚說的那样，甚至不能把我回来了的消息告訴她，否則她会欢喜死的。

“还有彼加也找过你，”她接着說道。“不久前他还写过一封信到塔什干去。他还以为你住在塔什干哩。”

“彼其加？”

“是呀。”

“司考伏罗得尼可夫？”

“除了他还有誰！”

“他在哪兒？”

“在莫斯科，”薩尼亚答道。

我感到十分惊奇。

“很久了嗎？”

“从你們跑了以后。”

彼其加在莫斯科！我惊奇得好半天想不过来。

“薩尼亚，我也在莫斯科。”

“是嗎？”

“眞的。他怎么样？作什么？”

“沒有什么，很好。他今年毕业。”

“嘿，見鬼！我也是一样！你有他的象片嗎？”

我发覺在問她相片时，她有点兒不好意思。她說了一声“就来”便出去了。她回来得那么快，就好象彼其加的相片是从口袋里掏出来的。

“喂，你看他多漂亮，”我說完不禁哈哈大笑起来，“还是紅头发？”

“紅头发。”

“嘿，見鬼，太好了！老头兒呢？老头兒怎么样？难道是眞的？”

“什么眞的？”

“当了大法官！”

“咳！他已經作了五年法官了。”

我們什么都問，不时打断对方的談話，然后又問。后来薩尼亚跑到厨房里去了，我也跟了去，并且說我不能沒有她。这是神圣的眞理；沒有她，我立刻感到寂寞。

我們燒起了茶炊，生好爐子。随后就听到前厅里响起了低哑的門鈴声。

“达莎阿姨！”

“你留在这兒，”薩尼亚附在我耳边小声說道，“我去給她作点思想准备工作。眞的，她的心脏不很好……”

她出去了，我听見隔壁房間里响起了下面这样一番对話。

“达莎阿姨，請你不要兴奋。我有一个非常好的消息，所以你不要太兴奋，相反地，要冷静。”

“好的，講吧，毛丫头。”

“达莎阿姨，你今天不是打算不烤点心了嗎，可是現在却不能不烤了。”

“彼加回来了嗎？”

“彼加是彼加，但是你还沒有完全猜中。达莎阿姨，你不会兴奋吧？”

“不会。”

“說的是实話嗎？”

“看你！怎么不是实話呢。”

“你看这是誰回来了！”薩尼亚把厨房門推开。

妙极啦。达莎阿姨一眼就認出我来了。

“薩尼亚，”她悄声地說道。

她一把抱住我。然后坐下，閉起眼睛来。我握住她的手。

“我的宝貝兒！眞是你嗎？”

“是我，达莎阿姨。”

“我不是在作梦吧？”

“不是的，达莎阿姨。”

看样子达莎阿姨还不相信我，所以她重又閉起眼睛来，好象眞是睡着了一般。

“我的宝貝兒！你还活着？你到底是在什么地方来着？我

們把全世界都找遍了。”

“我知道，达莎阿姨。我錯了。”

“錯了！天呀！人回来了，还說錯了，我的亲爱的！你长成一条多大的汉子了。多么漂亮的一个小伙子啊！”

在达莎阿姨眼里，我总是漂亮的……

达莎阿姨沒說了半句話便跳起来，一脸惊慌的样子附在薩尼亚的耳边低声問道：“給他吃过飯了沒有？”我看見飯桌上摆满了各式各样的食品，但听到她們說这只不过是“飯前小吃”，便不禁捧腹大笑起来。除此而外，还有什么要回忆的呢？关于这一次永远忘不掉的聚会还有什么可講的呢？

从这一会兒开始，大概我所作的事就只是吃东西。我一面講，一面吃。后来达莎阿姨說我身上太脏，所以我只好到澡盆里去洗了一个澡。白天就这样过去了。

傍晚我洗得干干净净，吃得飽飽的坐在餐厅里，薩尼亚和达莎阿姨分坐在我的左右两側，那么亲切地看着我，使我感到眞是于心有愧；这是良心話！后来大法官回来了。

那个卫兵沒有撒謊，这老头兒的确把鬍子刮掉了。他好象年輕了十来岁，現在已經难以想象他曾經熬过什么牛皮胶，并且对这种胶寄托了那么大的希望。

他已經知道我回来了，薩尼亚打电話告訴了他。

“嘿！浪子回家了，”他說完便把我拥抱了起来，“你——不怕我把你的脑袋揪下来嗎？你呀，眞是个不守本份的人！”

我能用什么話来为自己辯护呢？我只有懊悔和唉声叹气的份兒。

夜深了，只剩下我和他两个人。老头兒希望知道我离开恩斯克以后作了些什么，生活怎样。他眞的象法官一样，毫不放松地

盘問我关于学校的和私人的一切事情。

我說我想作一个飞行員，他沉默了半晌，一双眼睛从又长又粗的浓眉下边注視着我看了很久。

"空軍的飞行員嗎?"

"北极飞行員。必要的話，也作空軍飞行員。"

他半晌沒有說話。

"很危险，但也是一件很好的，很有意思的事情，"他說道。

只有一件事我沒有告訴他。我沒有說自己是追随着卡佳回恩斯克来的。我簡直对他說不出口来。若不是因为卡佳，也許我还要再过相当的时間才会回到故乡，回到自己的家园来。

13 旧 信

有人微微推开了通餐厅的門，輕声說道："他还在睡。"这时我就醒了。隔壁湯匙碰着杯子輕輕地发出响声，我明白这是薩尼亚怕把我惊醒，在厨房里吃早飯。我决定立刻起床，也仿佛是起来了。然而不知道又过了多长时間，我并沒有起床，还是睡着，而只是在梦中責駡自己为什么不起来。

总而言之，我一直睡到十一点。薩尼亚早已上学校去，老头兒也上班了。达莎阿姨象她告訴我的那样，已經"开始做午飯了"。

用茶点时，她看見我不吃什么东西，感到十分惊奇。

"你們能吃到什么，"达莎阿姨憤慨地說道。"就連茨岡人的馬也比你們吃的好一些，可結果有的还是死了。"

"达莎阿姨，我昨天吃得太飽了！說良心話，肚子到現在还痛。达莎阿姨，我还到那个老地方去找过你們，房子拆掉了嗎？"

"拆掉了。"达莎阿姨叹了一口气，說道。

我們又談到邻居的情形。原来从前那个引起我許多幻想的明卡，現在已成了"屠格涅夫"号——过去的"海神"号的船长了。搬运工会的工头，米沙大叔在去年死了。他的兒子現在是本城苏維埃主席。我把卡耶尔·庫里的事情告訴了达莎阿姨。她連連地感叹惊异不置。

"达莎阿姨，你知道布宾其可夫家嗎？"

布宾其可夫是尼娜·卡比丹諾芙娜的亲戚，所以我毫不怀疑卡佳是到她們那兒去的。

"开除出教的那家人嗎？誰不知道她們！"

"为什么开除出教？"

"神甫开除了她們。"达莎阿姨說道。"她們驅逐过神甫。所以神甫就把他們开除出教了。这是很早很早，还是革命前的事了。你那时候还小哩。你問这个干嗎？"

"莫斯科有人托我向她們問好，"我信口撒謊說。

达莎阿姨将信将疑地搖了搖头。

"哦，旣然是問好……"

我知道地点：犹太教堂旁边的一座私人住宅。不过現在教堂已經沒有了，而且城里什么都变了，所以要找布宾其可夫家是相当困难的。最后我在一道四門紧閉的高围墙前停住了脚步。墙上挂着一块小牌子，上面写着："拉普金胡同八号，布宾其可娃·瑪·葛、勒·葛、欧·葛寓所"。

便門关着，我輕輕地将它推开，便进到一座寬广的花园里。

花园的深处有一幢旧式的小房子，木头圓柱門檐上雕着花飾。从門口到里面只有一条很普通的，新近压过的小径；一只山羊在这条小径上走来走去。我以輕松的心情順着小径向那幢小房子走去。

这一切就是如此，也就是这样簡单吧。我还記得我走进花园时，曾因花园里竟然那么美丽而感到惊奇；整个的花园盖复着一层白雪，被太阳光照耀得閃耀刺目。我走进了花园，就沿着小径向山羊走去。山羊"咩咩"地叫了起来。突然，好象在神話中一般，一切都变了。什么地方的房門砰地响了一声。我听見有人叫喊。接着便看見一个拿着手杖的老太婆从房子里跑出来。她拿的也可能不是手杖而是一根拨火棍。

"瑪申卡，瑪申卡！"她喊道。"是自己人，自己人！"

听見别人說我是自己人心里眞舒服。然而高兴得未免太早了一点兒。从房子里又走出来了一个老太婆，微微呲着牙朝我跑来。她手里拿着一个带軲轤的地毯刷子。毫无疑問，她是想用这个刷子来打我。

"瑪申卡！"第一个老太婆喊道。"是自己人！"

但山羊大約是不相信她，所以声音愈叫愈高。我想向布宾其可娃作一番自我介紹，甚至把第一句話都准备好了，但在眼前这样的局面下，我覚得这是不可能的。我稍微捱延了一会兒，为了保持尊严，便慢慢回身向門口走去。

滿脸瘟气的老太婆恶狠狠地嘟囔着，尾随我走了几步才折回去了。

这事兒眞窝囊！回到街上时我覚得好笑，大概連她們也听見我笑了。这眞出奇，她們甚至也不問問我是誰，要干什么。大概她們以为我是誤入她們的花园里的。同样奇怪的是外面吵吵

鬧鬧搞了这么一陣，卡佳竟沒有出来。总之，一切都是那么奇怪！

达莎阿姨看到我回来得这么快，非常惊奇。

"达莎阿姨，薩尼亚回来了沒有？"

"她三点鐘才回来。今天她有六堂課。"

我向达莎阿姨要来了信封和信紙，开始写信，写封信給卡佳，由薩尼亚送去。她們也許不会那么冷酷地接待她。

我写上了"卡佳"两个字之后，就寻思起来。通常在这样的时候，我总是自然而然地想起彼其加的尺牍文选来："余伤丧偶之痛已久，而今得遇賢卿备具亡妻之一切美德，窃以为与卿永結絲罗之好，且为兒女輩謀一良母，此实敝人应尽之天职也。"

我突然哈哈大笑起来，把达莎阿姨吓了一跳。

"卡佳，"我写道，"我曾打算找你，但因为遇見山羊和两个老太婆这道突不破的障碍，所以只好退回来了。現在我在恩斯克，很想看見你。請你四点鐘到教堂花园来。这张便条由——你猜猜是誰？——我的妹妹交給你。亚·格利高里耶夫。"

"达莎阿姨，过去彼其加不是有好些有趣的書嗎？这些書在哪兒？你們的書一般都放在哪兒？"

彼其加的書是在薩尼亚的書架上找到的。这些書大概并不特别受尊重，所以才在書架的最下一层和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放在一起。当我取下"恐怖之夜——頓河哥薩克高加索山地奇遇記"时，不禁触景伤情，鬼晓得我那时候是一个多么弱小，多么不幸的孩子啊！

我劲头十足地把書搬出来，专心一意地寻找那本尺牍文选，这时，一个用发了黃的褪色旧报紙包着的小包落到地板上。这

是那些旧信！我一下子便認出来了。这就是装在邮袋里被大水冲到我們家院子里来的信。我想起达莎阿姨朗誦这些信时的漫长的冬夜，深夜讀信給我的感覚多么美妙，多么奇异啊！

这是别人的信！誰知道这些写信的人現在在哪兒呢？就拿这个发了黃的厚信封里的信来說吧，也許还有人长夜不眠，一直在盼望着它哩。

我无意識地打开信念了几行：

敬爱的瑪丽亚·瓦西里耶芙娜！

首先我要告訴您的，就是伊万·李沃維奇現在一切都好。我是四个月以前遵照他的指示，带領一支十三个人的队伍离开帆船的……

我讀着，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是那封我曾經背得烂熟的，航海长写的信，这封信我曾經在由恩斯克去莫斯科的火車上背誦过！然而使我大吃一惊的还是另外的一件事。

"'圣·瑪丽亚'号，"我往下讀道，"还在喀拉海上就被冻住，自一九一三年十月，便随着北极的冰山不停地向北移动。"哈，"圣·瑪丽亚"号！塔塔林諾夫船长的帆船不正是这个名字嗎。我翻过信来，又从头念道：

"敬爱的瑪丽亚·瓦西里耶芙娜！"——瑪丽亚·瓦西里耶芙娜！——"首先我要告訴您的，就是伊万·李沃維奇"——伊万·李沃維奇！卡佳不是叫卡杰林娜·伊万諾芙娜嗎！

达莎阿姨認为我神經失常了，因为我突然短促地惊叫了一声，便开始以惊人的速度翻弄起那些旧信来。

不过我自己心里可是明白自己在干什么；达莎阿姨还給我讀过另外一封信，信里叙述他們在冰上的生活，講到一个水手怎样摔死的，講到他們怎样在船艙里砍冰块。

"达莎阿姨，所有的信都在这兒嗎？"

“天哪！出了什么事啦？”

“沒有什么，达莎阿姨！这里面还应該有那么一封东西。”

我再沒听見自己說些什么話了。下面就是这封信：

亲爱的瑪申卡，我的亲人，我的朋友：

自从上次在尤戈尔·沙尔通过电訊队給你发了一信，到現在轉眼已經两年了。我实在无法告訴你两年来經过了多少变化。我們开始沿着預定的航綫順利前进，可是从一九一三年十月，我們便随着北极的冰山徐徐向北移动。这么一来，也說不上願不願意了，我們只好放弃了最初沿西伯利亚海岸到达海参崴的打算。不过，塞翁失馬，焉知非福！現在我的脑子里完全是另外一种想法了。我希望你不致象我的某些同伴那样，把这种想法認为“幼稚”或是“輕率”……

第一頁到此为止。我将它翻过来，可是反面被塗抹更改得仅仅残留着几个毫不連貫的字，除此而外，什么也看不清楚了。

第二頁从形容船上的情形开始：

……进入一些相当深的地方。在一块这样的冰原中間停泊着我們的“圣·瑪丽亚”号，冰雪一直堆到船沿上。冰霜結成的花环不时脫离繩索，带着輕微的沙沙声撒落下来。瑪申卡，你看，我現在倒因为痛苦而成詩人了。不过我們这兒也有眞正的詩人，就是我們的炊事員柯尔巴可夫。他眞是一个从不泄气的好汉！他整天唱着自己創作的詩。我現在写四行給你留作紀念：

在俄罗斯母亲的旗帜下，
我們跟随船长踏上征途。
乘着我們美丽的长舟，
要繞过西伯利亚的海岸。

我一面写，一面反复讀我这封写不完的信，然后又写，并且发現，

我簡直是在和你嘮叨了，不过还有許多重要的事情需要和你談。我托克里莫夫寄了一个小包交水道測量局局长。这是我的观測記录，公事信件和彙报，彙报中詳述了我們航行的經过。为防不測起見，我也把我們的新发現告訴給你：自泰麦尔半島往北，在地图上沒有标識出任何陆地。然而在緯度79°35′子午綫八十六和八十七之間格里尼奇以东，我們发現了一条刺目的銀白色长带微微冒出地平綫。四月三日，这一条长带变成了一块和月亮顏色差不多的，朦朦朧朧的盾状的东西，第二天，我們看見一些奇形怪状的浮云，宛如籠罩着远山的霧气，我断定这是陆地。可惜我不能为了去勘探这块陆地，把处在极其艰苦情况下的帆船丢下不顧。不过一切还有待于将来。暫时我把这块陆地冠以你的名字，这样你在任何一张地图上都将找到这种最亲切的問候，它是你的……

到此第二頁的反面也完了。我放下第二张拿起第三张。头几行給水冲掉了。下面是：

……一切本来都可以完全不至于这样的，想到这里我便感到十分沉痛。我知道他会辯解，也許还会使你相信一切都是我一个人的过錯。我恳求你一点：不要相信这个人。可以大胆这样說，我們的一切失敗都应归咎于他。举这样一件事实就足够說明的了，他在阿尔汗格尔斯克卖給我們的六十条狗，其中大部分在新地島就不得不射杀掉。他这种亲屬的帮助使我們付出了多大的代价！不只是我，全探险队的人都在咒駡他。我們这次去冒险，知道一定会遇到危险。但是我們并沒料到会有这样的打击。現在只好尽我們的力量去作了。关于我們探险的情形，我可以对你談的实在太多了！这些故事足够給卡秋什卡講一个冬天。但是天哪！这需要付出多大的代价！我不願意使你想到我們的处境已經沒有希望了。不过你們也不要过份期待……

好象一道閃电倏然照射着森林里的一角。模糊的景象驟然

改变了，你甚至可以看見树梢的綠叶，这些树木在一分鐘以前叫人看到还不知是野兽还是巨人哩。这次我讀了这些信的感覚也是如此，我突然一切都明白了；連那些好象永被忘記了的細节，我也記起来了。

我現在明白了尼古拉·安东內奇在談到他死去的堂弟时的虛伪面貌。我明白了尼古拉·安东內奇脸上那种伪善的，含意深长的表情，当他談到他的堂弟时，总是严肃地皺起眉来，好象是說，对于所发生的一切事情，你們也有几分錯誤。我明白了这个假装高尚而驕傲的人，明白了他的卑鄙行为的全部底細。信里虽然沒有指出他的名字来，但这一定是他！我絲毫也不怀疑这一点。

我激动得喉嚨都干了，我那么大声地自己对自己講話——不是开玩笑，倒眞把达莎阿姨吓坏了。

“薩尼亚，你怎么啦？”

“不怎么，达莎阿姨。哪兒还有这些旧信？”

“全都在这兒了！”

“不会的！你还記得你曾經讀过这封信給我听吧！这封信很长，一共有八頁。”

“不記得了，乖乖。”

紙包里再多一张也沒有找到，八张中只剩了三张。不过就是这儿张也够了！

我把写給卡佳的便条上的“四点鐘来”改为“三点鐘来”。后来又改为“两点鐘来”。然而这时已經两点鐘了，因此我又改为三点。

14 教堂花园相会。不要相信这个人

作孩子的时候，我到教堂花园来过千百次，但那时候我脑子里从沒有想到过花园里这样美丽！花园高处在沙河与靜河合流处的一座山上，四周有碉堡围墻，保存得很好。可是炮楼却較上次我和彼其加在这兒“歃血盟誓”的时候小了一些。

积雪很厚，可是我还是攀登上了馬尔登长老那个炮楼的最高一层：应該好好看一看依林洛夫斯克草原，尼古拉学校和皮革厂都变成什么样子了。一切都还在原来的地方，只是遍地皆雪，一直綿延到地平綫的尽头……

卡佳和薩尼亚終于来了。我看見薩尼亚穿着她那件黃皮袄，活象个老祖母，她把手一撇，仿佛說：“这就是教堂花园”，接着用一种很神秘的表情点点头，立刻就告辞走了。

“卡佳！”我喊了她一声。

她吓了一跳，看見我便笑了……

我們互相埋怨了半个鐘头：我埋怨她沒有把她要走的消息告訴我，她埋怨我沒有等到她的信就来了。后来我們俩猛然想起还沒有把最重要的事情告訴对方。原来尼古拉·安东內奇和卡佳进行过談話。他用“亡弟的名义”禁止卡佳和我見面。他声泪俱下地講了一大套話。

“薩尼亚，”卡佳很严肃地說道，“你也許不相信我，可是我憑良心說，的确是亲眼看見他哭的。”

“是啊！”我把一只手放在胸部說道。

塔塔林諾夫船长的信用一张向达莎阿姨要来的油紙包着，放在胸前一边的口袋里。

"卡佳，你听我說，"我毅然說道，"我想給你講一个故事。大致是这样：假定你是住在河边，在一个晴朗的日子里，河岸上发現了一个信袋。当然这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被大水冲来的。邮递員淹死了！这些信件就落在一个爱好閱讀的女人手里。在她的邻居中有一个八岁的小孩子，非常喜欢听故事。有一次她給他讀了这样一封信：'敬爱的瑪丽亚·瓦西里耶芙娜……'"

卡佳突然打了一下哆嗦，惊愕地看了看我。

"……首先我要告訴您的，就是伊万·李沃維奇現在一切都好，"我迅速地接着背下去。"我是四个月以前遵照他的指示……"

我一口气把航海长的信背完了。虽然卡佳有好几次那么惊訝地拽我的袖子，我也沒有停住。

"你看过这封信嗎？"她脸色蒼白地問道。"写的是父亲的事嗎？"她又問我道，仿佛这里头还有什么值得怀疑似的。

"是的，不过这还不算完！"

我告訴她，达莎阿姨有一次还发現了一封信，信里講到这只被冰冻結，徐徐向北移动的船上的生活情形。

"'亲爱的瑪申加，我的亲人，我的朋友：……'"我开始背誦，但又停住了。

我背上起了一层鷄皮疙瘩，喉嚨也梗住了。宛如是在作梦，在我眼前突然出現了瑪丽亚·瓦西里耶芙娜愁苦蒼老的面容，和額下那双忧郁的眼睛。当他給她写这封信的时候，她和現在的卡佳差不多，而那时的卡佳还是一个只会等"爸爸来信"的小毛

了头。现在她总算是等到了！

"总而言之，就是这样，"我从口袋里掏出那封用油紙包着的信，"你坐下来看吧，我走了，等你讀完我再回来。"

自然我哪兒也沒有去。在她讀信的时候，我一直站在馬尔登长老炮楼下面望着她。我很同情她，当我想到她时，心里便愈来愈感到温暖；然而当我想到她讀到这些信会感到多么可怕的时候，我心里又打起寒战来了。我看到她怎样用一种毫无意識的动作去理弄妨碍她讀信的头发，以及好象是为了辨認那些难認的字从长凳上站起来。我过去还不知道收到这样的一封信是痛苦还是快乐！但現在看見她，我就明白这是极其痛苦的！我明白了，她从来沒有失去希望！十三年前，她的父亲在北极的冰原上失踪了，在北极沒有比死于飢餓和寒冷更容易的事了。但是对于她来説，只是到現在他方才死去！

当我回来时，卡佳的眼圈兒紅紅的，她坐在长凳上，手里捏着信，两手放在膝盖上。

"冻坏了吧？"我問道，我不知道应该从什么地方談起。

"有几个字我看不清楚……你看，这几个：'我恳求你……'"

"啊！这几个字！这兒写的是：'我恳求你，不要相信这个人……'"

这天晚上卡佳在我們家里作客，但是我們絲毫沒有提到那些旧信，这是預先説好了的。只有达莎阿姨由不得講了一些投递員被淹死的事。原来他不是偶然淹死的，照她的解释，他是由于"失恋"而投水自杀的。他爱过一个姑娘，可是这个姑娘嫁給别人了。

"哪怕把这些信送到也好啊！"达莎阿姨惋惜地説道。

卡佳这天晚上悶悶不乐。大家都格外照料她，特别是薩尼

亚很快和她亲热了起来，只有她們姑娘們才能够作到这样。后来我和薩尼亚一直把她送到那只山羊跟前，山羊仍旧站在小径上，不过这次它沒那么歇斯底里地咩咩叫，只是气虎虎地摆捩着髫鬚。

我們回来时老人家們还沒有睡。法官有点放馬后炮似的在責备达莎阿姨，怪她沒有将这些即便是稍稍可以識辨出地址来的信发送出去，說她只能这样解释，那就是以为这是十年前的老事了。达莎阿姨又談起卡佳，照她的看法，我的姻緣已經定了。

“还不錯，挺討人喜欢的，”她叹了一口气說道。“长得可眞漂亮，就是有点兒愁眉不展的样子。身体也滿健康。”

我向薩尼亚要了张北极地图，指出塔塔林諾夫船长自列宁格勒出发到海参崴应走的路綫。这时我才想起了塔塔林諾夫的新发現。泰麦尔半島北边是一块什么陆地呢？

“等等，”薩尼亚說道。“那不是北地島嗎！”

“見鬼！这是一九一三年維尔基茨基中尉在八十六和八十七子午綫之間，緯度79°35'所发現的北地島。太奇怪了！”

“不对，同志們，”我这时大概脸有点发白了，所以达莎阿姨惊惧地看着我。“我全明白了！起初，这是冒出地平綫的一条銀白色长带，四月三日这条长带变成了一块朦朦朧朧的盾状的东西。四月三日！”

“薩尼亚……”达莎阿姨惊虑不安地刚要开口說話。

“不对，同志們！四月三日。可是維尔基茨基是在秋天，我不記得是哪一月哪一天，但是，是在秋天，九月或者十月才发現北地島的。在秋天，那已經晚了半年了！在秋天，这等于說他

什么也沒有发現，因为这块陆地早已被人先发現了。”

“薩尼亚！”法官也忍不住叫道。

“先被人发現了，并且已命名为瑪丽亚·瓦西里耶芙娜，”我将手指牢牢地指在北地島上，仿佛害怕还会有什么錯誤似的繼續說道。“为了紀念瑪丽亚·瓦西里耶芙娜，这块陆地已被命名为瑪丽亚地或瑪丽亚什么島了。現在請大家坐下，我把这一切情形說給大家听！……”

經过了这样的一天之后怎么能睡得着呢？我不断地喝水，翻来复去地看地图。餐厅里挂着恩斯克的一些写生画，我对着这些画看了很久，这时我还不知道是薩尼亚画的，不知道她在学繪画，并且渴望将来进美术学院。我重又翻开地图来看。我想起这些島屿还是不久前才开始称为北地島的，維尔基茨基过去把它們叫作“尼古拉二世洲”。

卡佳的父亲真可怜！他也太不幸了。沒有一本地理書上提到过他，世界上誰也不知道他所作的事。

深切的同情和过分的喜悦使我感到身上一陣发冷，这时是清晨六点鐘，街上已經有人在刷啦——刷啦地扫街了，我便躺下去睡。但还是睡不着。船长信中断断續續的一些話使我痛苦不安，我仿佛听見达莎阿姨讀信的声音，仿佛看見她戴着眼鏡，一面叹气，一面結結巴巴讀信的样子。在我想象中曾經出現过的一幅景象——搭在雪地上的白帐篷，駕着雪橇的一群狗，一个穿着长筒毛皮靴，戴着高毡帽的巨人，——重又回到了我的脑海里来。我很希望这一切都发生在我身上：是我在这只船上，随着漂流的冰山，冒着死亡的危险慢慢地向前移动，我就是写这封与妻子訣別書的船长，千言万語，总也写不完。“我把这块陆地冠以你的名字，这样你在任何一张地图上都將找到这种最亲切

的問候，它是你的……”

这句話会怎么結尾呢？……忽然有一絲兒印象緩慢地，非常緩慢地，就好象是极不情願似地在我脑中掠过，我赶忙在床上坐起来，我簡直不敢相信自己，覚得我馬上就要发疯了——馬上就要发疯了，因为我想起来了：

“你的鷹爪蒙哥其瑪献給你的，你曾經这样称呼过我。天哪，这是多久以前的事了！可是我并不想訴苦……可是我并不想訴苦，”我繼續思索，一面嘟囔着，顛来倒去地，又想起了一个字，又一个字，下面呢——忘記了，想不起来了。“我并不想訴苦。我們会再見面的，到那时一切都好了。不过，有一种思想，有一种思想始終使我非常苦恼！”

我一下跳起来，开了灯，連忙奔到放着鉛笔和地图的桌子跟前去。

“这是很痛苦的，”我这时在地图上写着，“現在認識到一切本来可以不致于搞成这样，这是很痛苦的。我們接二連三地碰到一些倒楣的事，最倒楣的就是我錯把探险队的給养装备工作委托了尼古拉。現在不得不每小时，每分鐘为此付出极大的代价。”

尼古拉？眞的嗎？对，是尼古拉！

我停下了，因为再往下想，思路就象是到了一个悬崖断壁，再也接續不起来了，可是再往后的事我又記得很清楚——是講一个掉到冰縫里跌死的水手司卡其可夫。但这些已經完全是另一碼事了。这只是信的內容，而不是原文，除了几个零星的字句外，关于信的原文我再也想不起什么来了。

这样我一直沒有睡着。法官在七点多鐘起床时，看見我只穿了一件內衣坐在北极地图前面，感到非常惊訝。在这张地图

上，我已經能够道出“圣·瑪丽亚”号帆船遇难的一切細节，如果塔塔林諾夫船长能回来的話，也会为此吃惊的。

昨天晚上我們約好去参观市博物館，因为薩尼亚想带我們去看看这座圣城引以为荣的博物館。博物館設在过去一个商人巴甘肯的府邸中。彼其加·司考伏罗得尼可夫从前說，在这座大厦里堆滿了金子，巴甘肯本人就隐居在这大厦的地窖里，誰要是到地窖里去，他就立刻把誰掐死。的确，窖門紧紧地封閉着，門上挂着一把大概是十二世紀的大鎖。但窗戶却是开着的，脚夫們就从窗口里把木柴投到地窖里去。

三楼上是薩尼亚的老师，画家图夫的作品展覽室，她首先把我們带去看这些画。在这些画里就有画家自己的相：小矮个兒，穿着一件托尔斯泰式的絲絨短外衣，笑眯眯的，一头蓬松的黑发，黑发中間摻杂着几絲閃閃发光的白发。他的作品倒不坏，只是太单調了一些，画的尽是恩斯克：白天和夜晚的，月下和阳光照耀下的，古代的和現在的恩斯克的景物。不过我們还是一味地贊美这些作品，因为这位图夫画家实在太可亲了，薩尼亚望着他时的神情真是虔誠崇敬到了极点！

她大概猜到我和卡佳要个别談談，所以找了一个无所謂的借口，向我們告罪，便一个人留在展覽室里了。于是我們下楼走进一間大厅，大厅里摆着許多古代的武士象，这些武士穿着护胸鎧，鎧下露出鎖子甲，好象衬衣露在背心外面一般。

問題很明白，我这时是急于想把昨夜的新发現告訴卡佳。但是話从哪兒开头呢？倒是她自己先开口了。

“薩尼亚，”她說道，我們在一座样兒有点象柯拉布略夫的，斯杰方·巴托里时代的战士塑象前停住了脚，“我考虑过他說的‘不要相信这个人’所指的是誰。”

"你說呢？"

"我断定，这……不是指的他。"

我們沉默了好大一会兒。她不轉眼地望着战士象。

"不对，是指的他，"我很不高兴地反駁道。"还有，你的父亲发現了北地島。就是你父亲，而不是什么維尔基茨基。这个問題我已經查明白了。"

但是，这个若干年后曾使全世界地理学家为之震惊的消息，这时却并沒有在卡佳身上发生什么特别的影响。

"为什么你認为，"她有点兒吃力地繼續說道。"这指的是他……尼古拉·安东內奇呢？信上并沒有什么地方明指出来啊。"

"明指出来的地方有的是。"我感到生起气来了。"第一，关于狗的問題，是誰經常吹嘘說他給探险队买了最好的狗？其次……"

这时薩尼亚走了来，我們便住口了。我們一竅不通地看"古俄罗斯貴族生活方式"，看"資本主义制度下恩斯克农民沒有烟囱的茅屋"，薩尼亚为我們講解，可是我們并沒有听，至少卡佳沒有听。她一脸心神錯乱的样子不时地瞧瞧我，仿佛是在問我："你相信是这样嗎？"我也是在默默地回答："我絕对相信。"

后来薩尼亚告辞走了，我們在恩斯克博物館阴暗的大厅里又逛了很久。

"其次呢？"

其次，昨天晚上我又想起了信里面的一段。是这样的。

我便从"鷹爪蒙哥其瑪"开始把这一段讀了一遍，我象朗誦詩歌一般，讀得那么清晰宏亮，卡佳睁大了眼睛，严肃得象一座石膏象似的听着我讀。突然，一种冷淡的神情在她眼睛里閃了

一下，我覚得她不相信我。

“你相信我嗎？”

她脸色变得蒼白，輕声答道。

“相信。”

关于这件事，以后我們就再沒有提了。我只問过她是否知道“鷹爪蒙哥其瑪”这句話从哪兒来的，她說不記得了，——大概是从古斯达夫·爱瑪尔[①]的書中来的。后来她說我不会了解这个消息对媽媽有多么可怕。“一切比你想象的要复杂得多，”她完全象另一个成人似的，很伤感地說道。“媽媽現在的生活已經够沉重了，至于她內心的痛苦，那就更不用說了！可是尼古拉·安东內奇……”

卡佳說了半句就不說了。但是后来，她还是对我說明白了这件事情的究竟。这也是一个新发現，也許比起塔塔林諾夫船长发現北地島这件事来还显得突然。原来尼古拉·安东內奇早就爱上了瑪丽亚·瓦西里耶芙娜！去年在她患病的时候，他接連几个昼夜衣不解带地看护她，甚至还請了一个护士，虽然当时根本用不着这样小題大作。病好了以后，他亲自护送她到索奇城；虽然住疗养所要便宜得多，可是他却讓她住在李維叶拉旅館里。尼娜·卡比丹諾芙娜說这“簡直是发了疯”。春天他去列宁格勒，給瑪丽亚·瓦西里耶芙娜带回来一件十分昂貴的带飞翼式袖子的皮上衣。瑪丽亚·瓦西里耶芙娜不在家时，他从不先睡。他劝她不要讀大学，因为她又工作又讀書是很困难的。然而最令人惊异的一件事是发生在这年冬天：瑪丽亚·瓦西里

---

① 古斯达夫·爱瑪尔(1818—1883)，法国作家，曾游南、北美，非洲及高加索等地，写过許多游記和印第安人反抗白种侵略者的小說。——譯者注。

耶芙娜突然説她再也不願看見他了。他就眞的不見了，就穿着一身衣服走了，一連十多天沒有回家。誰也不知道他住在哪兒，大概是住在旅館里。这时尼娜·卡比丹諾芙娜出来調解，説这是“一种地獄式的刑罰”，便亲自把他領回家来。不过，瑪丽亚·瓦西里耶芙娜还是整整一个月沒有和他說話……

尼古拉·安东內奇会由于爱情而发疯，这簡直是不可能的事！尼古拉·安东內奇那样一个胖手指，鑲金牙的老家伙决不会这样！然而我一面听卡佳講，一面設想其中錯綜复杂而又折磨人的关系。我想象到瑪丽亚·瓦西里耶芙娜是怎样度过了这漫长的岁月。她本来是一个那么漂亮的美人兒，而在二十岁上就剩下了她孤零零的一个人。“既不是寡妇，又不是有丈夫的妻子！”她是靠着对丈夫敬爱的回忆强使自己生活下去的！我想象到尼古拉·安东內奇怎样甜言蜜語，百般忍耐，十年如一日地欺騙她，服侍她，暗中同她周旋。他能够使她——还不止是她——相信只有他一个人了解并且敬爱她的丈夫。卡佳説得对，这封信对于瑪丽亚·瓦西里耶芙娜説来是一个可怕的打击。把这封信仍然放在薩尼亚房里的小書架上，放在“鐘王”和“頓河哥薩克高加索山地奇遇記”两書的中間岂不是更妥当些嗎？

15 散步。扫墓。布宾其可夫。离别的一天

在恩斯克的一个礼拜过得并不怎么特别愉快，甚至还很忧悶。不过这个礼拜在我的一生中留下了多少美妙的回忆啊！

我和卡佳每天在一块兒散步，把我旧日喜欢的地方指点給她看，对她敘述我的童年。我記得曾經在什么書上讀到过，説

考古学家从一块残存的銘文中可以推断一个民族的历史和风俗习惯。我也是这样，从旧日恩斯克残存下来的某些角落，可以回想起我們昔日的生活来向卡佳叙述。

不过，現在我自己也需要对这个美丽的城市加以重新估价。小孩子的时候，我并沒有去留心这些座落在山上的花园，傾斜的街道，从"鉄栏杆"（沙河和静河汇流的地方，現在还是这样叫法）开始分开的两道高陡的河岸，这些风景究竟美妙在什么地方。

我只有一天沒有和卡佳在一块兒。这天我到墓地去了。不知道为什么，我覺得經过这些年，母亲的坟墓恐怕連个影兒也沒有了。但我最后还是找着了。坟墓周围圈着傾頹的木栏杆，歪倒了的十字架上还可以隐約辨認出上面的題字："主啊……不要忘記你的奴隶的灵魂。"这时是冬天，当然所有的坟墓都盖着雪，但总还可以看出母亲的这座坟墓是荒蕪着沒有人照管的。

我在小路上来回走了許久，想起母亲的一切，不禁悲从中来。她現在該有多少岁了呢？四十岁，这还很年輕嘛。她本来現在也可以象达莎阿姨一样幸福地生活着，我想到这里便不覺心如刀絞。我想起她那疲憊迟鈍的眼光，想起她那双給人洗衣服弄裂了口的手，想起她因过度的疲劳，晚飯都吃不下的情形，这种过度的疲劳几乎和死亡毫无差别。她本来多么聪明！就是那个坏蛋卡耶尔·庫里蠱惑了她，而且害死了她！

我回到墓前，仿佛是和她訣别。后来我找着看墓人，他正在一个半倒塌的小礼拜堂里震天价响地砍木柴。

"老大爷，"我对他說道，"你們这兒有位阿克西尼亚·格利高里耶娃的坟墓。就在这条路上，拐角旁边第二个墓。"

他装作似乎知道我說的是哪一个坟墓的样子。

"能不能将它收拾一下？我可以付錢。"

看墓人到路上去看了看就回来了。

“这个墓有人管，”他說道。“現在是冬天，看不出来。别的坟才是沒有人管的，不是十字架拔出来了，就是什么东西坏了。这座坟可是有人管。”

我給了他三个卢布便走了。

归途中我想着卡耶尔·庫里，想着媽媽。她怎么会爱上这样一个人？我不由得又想起瑪丽亚·瓦西里耶芙娜来，我認为我一輩子也不能理解女人的心理……

我和卡佳每天見面，但直到要走的前一天，我才得空問了問她关于布宾其可夫家几个老太婆的事，問她們是不是眞的被开除出教的？卡佳感到十分惊訝。

“眞的嗎？我还不知道吶，”她說道，“不过这也很可能，因为她們都是无神論者和虛无主义者。你讀过‘父与子’嗎？”

“讀过。”

“你記得那里面有一个虛无主义者巴扎洛夫嗎？”

“記得。”

“那好，她們就是和他一样的虛无主义者。”

“算了吧，算了吧！要知道那是什么时候的事啊？”

“这有什么了不起呢！她們都是老年人。山羊不过是有点神經質。她們喝山羊奶，还劝我喝，我可不喝。山羊发神經的时候出的奶也不好。”

“你簡直是在拿我开心，”我沉吟了一会兒，說道。

“不，这是实話。”卡佳急忙分辯道。

一只神經質的山羊，三个虛无主义者伺候着它。眞是活見鬼，无論如何这总是一件十分怪誕的事！

最后分别的一天終于来到了！达莎阿姨从早晨六点鐘就在

烤点心，我刚睡醒，便聞到蕃紅花的香气，和一种噴香甘甜的面团的味道。后来她走进我睡覚的餐厅，样兒很忧愁，戴着眼鏡，身上沾滿了面粉，一手捏着彼其加来信的一角。

"应該把薩尼亚叫醒，"她严肃地說道。"彼其加来信了。"

彼其加来的信，果然象法官所說的那样，虽然簡短，可是很"适当"。他首先解释为什么不回来过寒假，因为他到列宁格勒参观去了。其次，他奇怪我会在恩斯克出現，因此表示衷心的喜悅。接着他就狠狠地罵我旣不写信又不找他，就如同"一匹沒有良心的馬一样"。最后，信封里还附了一封給薩尼亚的信，她很不自然地笑起来，說道："这个傻瓜，写在一起不就得了。"可是显然他是不能将两封信写在一起的，薩尼亚拿了信就跑到自己房間里一气讀了三个多鐘头，直到后来我闖进她房間里，她才不讀了，我要她赶快去阻止达莎阿姨，因为她想烤个长寬足有一公尺那么大的点心給我在路上吃。

拉普金胡同八号的房子里大約也和我家一样，所以卡佳这天沒有能够出来。就仿佛她是去北极一般，她們不仅給了她許多吃的东西，而且还給她装备了許多衣服：三位虛无主义者从未使用过的旧式嫁妆——土耳其花边，带褶肩的条紋天鵝絨上衣，带衬里的沉甸甸的連衣裙。

最妙的是薩尼亚順便到布宾其可夫家去了一趟，回来时誤了午飯。她的神情有些兒困惑，說那兒太有意思了。三个老太婆都在一个劲兒地縫，縫了一件很漂亮的連衣裙。卡佳穿着很合身，她穿着却不好看。不过帽子給她戴着正好，她也一定要作一頂那样的帽子。

"总而言之，我們什么都量过了，"薩尼亚笑道。"头都攪昏了。"

法官从机关里回来，陪我吃最后的一餐飯。他带回来一瓶葡萄酒，我們把它喝光了，然后他講了一番話。这次講得很好，比起那次在祝賀卡耶尔参加敢死营的宴会上講的話好多了。他将我和彼其加比作山鷹，并且希望我們以后能常常回到老窠里来。他虽然很願意以自己能培养出这样的下一代而夸耀一番，但不能这样說，因为是我們的国家沒有讓我們墮落，把我們培养成了人。他的話說得这样动人，达莎阿姨听到这里，不禁潸然落下泪来，好象是想重提旧事，說她自己願意担負教育我們的責任，并不想仰仗别人的帮助……

我站起来謝謝法官。我不記得講了些什么話，但也講得很好，大致是說暂时我們还沒作出什么值得夸耀的事。

这一頓飯吃了那么长的时間，我們差一点兒誤了車。我們坐着馬車到車站去。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这么闊气地走路：坐在馬車上，脚前擱着小提籃。要不是达莎阿姨这天老是当着我的面往籃里装点心，我敢說自己根本还不知道这个小提籃是打哪兒来的哩（我是空着两手回恩斯克来的）。

我們到車站时，卡佳已經站在車厢的扶梯上了，布宾其可夫家的三个老太婆你一句我一句地爭着囑咐她，要她在路上别受凉，不要叫人把东西拐了去，半路上不要下車到站台上去乱跑，到了家就赶快拍电报来，代她們問好，多写信。

我不知道，也許她們眞是虛无主义者吧，但在我眼里看来，她們只不过是几个紧裹着狐皮大衣，带着用細繩系着的，又大又可笑的暖手筒的老太婆罢了。

我的座位是在另一个車厢里，所以我們只好远远地向卡佳和布宾其可夫家的老太婆們打招呼，卡佳对我揮了揮手，老太婆們却高傲地对我們点了点头。

第二遍鈴响了！我拥抱了薩尼亚和达莎阿姨。法官請我去看看彼其加，我答应到达后第二天就去看他。我邀薩尼亚到莫斯科来，她答应春假一定来，原来她和彼其加早已約好了。

第三遍鈴响了！我已經进了車厢。薩尼亚在空中写了几个什么字，我胡乱写了“好吧！”两个字答复她；达莎阿姨低声地抽泣起来，最后我看到薩尼亚从她手中将手絹拿过来，笑嘻嘻地替她擦眼泪。火車慢慢地移动，可爱的恩斯克車站向后倒退着。車愈走愈快！那几个虛无主义者从我身边閃过去了！一分鐘以后，月台走尽了。再見吧！恩斯克。

車到下一站时，我和一位可敬的先生交換了座位，他占了我的下舖，我就搬到卡佳的車厢里，一来这兒比較亮一些，二来这是卡佳的車厢。

她在这兒把一切都安排好了：小桌上舖着洁净的桌布，窗上挂着窗帘，好象她在这兒已居住了一百年似的。

我們倆都刚吃过飯，不过还是想看看究竟老人家們給我們提籃里装了些什么东西。

一般說来，卡佳的提籃比我的还略胜一筹。籃里有苹果——自家果园里长的特别鮮美的冬苹果！我們一人吃了一个。又招待邻坐一个小矮个兒，沒有刮脸，肤色青黑，戴着眼鏡的男子吃了一个。他一味地在揣測我們究竟是什么关系，是兄妹吧，样兒不象！是夫妻吧，未免过早！

已經两点多了，沒有刮脸的伙伴将一只捏得紧紧的小拳头放在鼻子下面，一夜鼾声不絕。我和卡佳一直站在过道里談話。我們在結了霜花的玻璃上用手指写字，起初写的是姓名的第一个字母，后来又写一些单詞的第一个字母。

“跟‘安娜·卡列尼娜’書里描写的一样，”卡佳說道。

可是我觉得，这和“安娜·卡列尼娜”一点也不相似，总之和什么也不相似。

卡佳和我并肩站着，她仿佛变成了一个新的人。她的头发梳得和成人一般从中笔直分开，在她那可爱的黑发下面露着“新”的耳朵。当她笑的时候，露出来的牙齿也是“新”的。从我和她認識以来，她的头还沒象現在这样灵活，同时又十分矜持地轉动过，就象一个眞正的美妇人一般。她的一切都是新的，簡直成了另外一个人了。我感到我在狂热地爱着她，胜过爱世間的一切！

突然，窗外一起一伏的电綫可以看清了，复盖着积雪的黑鴉鴉的田野逐漸开朗起来。我不知道我們是用多大的速度在行駛，大概每小时不会超过四十公里，可是我覚得我們仿佛在神話中那样騰云駕霧一般地疾馳，一切都在将来！我不知道将来什么在等待着我。可是我肯定地知道一点：我們的关系将是永远的，卡佳永远是我的，我也永远是她的。

16　在莫斯科什么等待着我

諸位請設想一下，当你回到曾經度过了半生光阴的老地方，而大家却突然惊异地望着你，好象你是走錯了地方似的那幅情景吧。当我从恩斯克回到学校以后，就体驗到了这种感觉。

还在更衣室里，我碰到的第一个人就是罗馬什卡。他看到了我以后，作了个鬼脸，繼而微微一笑，幸灾乐祸地說道：

“欢迎你回来！啊嚏！祝你健康！”

这个坏蛋有点得意的样子。

因为这是开学前最后的一天，一个同学也不在。于是我便

走到厨房里去，想問候問候彼佳大叔。彼佳大叔对待我的态度也非常怪。

“沒有关系，老弟，免不了有这样的事，”他低声說道。

“彼佳大叔，发生什么事了？”

他就象沒有听見我的話似的，往鍋子里撒了一把盐，一声不响地站在那兒。他在聞鍋里冒出来的热气。

柯拉布略夫在走廊里閃了一下，我連忙向他跑去。

“您好，伊万·巴甫雷奇！”

“啊！是你？”他很严肃地答道。“到我那兒来一趟。我要和你談一談。”

柯拉布略夫桌上放着一个年輕女人的相片，我一时沒有認出这是瑪丽亚·瓦西里耶芙娜来，实在长得太漂亮了！我近前仔細一看：她的頸上也有一条珍珠項鏈，正是卡佳到我們学校参加晚会时所戴的那条項鏈。我看到这条項鏈感到更加高兴，就象卡佳在向我問好……

柯拉布略夫来后，我們就开始談話了。

“伊万·巴甫雷奇，是怎么回事兒？”

“是这么一回事兒，”柯拉布略夫不慌不忙地說道，“打算把你开除出校。”

“为什么？”

“你还不知道嗎？”

“不知道。”

柯拉布略夫严厉地看了看我。

“我就是不喜欢这样。”

“伊万·巴甫雷奇！这是实在話！”

“因为你擅自离校十天，”柯拉布略夫屈指一款一款地数着

說道，“因为你侮辱师长李和，因为你打架。”

“啊！原来这样！太好了，”我很鎮定地申辯道。“不过在沒有开除以前，請您听听我的解释。”

“你講吧。”

“伊万·巴甫雷奇，”我郑重其事地开始說道。“你想知道我为什么要踢罗馬什卡的狗脸嗎？”

“不要說‘狗脸’，”柯拉布略夫說道。

“好，就不說‘狗脸’。我踢了他的狗脸，因为他是一个坏蛋。第一，他把我和卡佳的事向塔塔林諾夫家講了。第二，他偸听同学們議論尼古拉·安东內奇的話，再向他密报。第三，他未經許可，乱翻我的箱子。这等于是一种搜查。同学們都看見我是当場抓住他的，一点不錯，我打了他。我承認这是不对的，特别是用脚踢，但我也是人，不是石头。我心里忍受不了。任何一个人都会这样干的。”

“唔，还有呢？”

“关于李和的事，您早已經知道了。請他首先証明我是唯心主义者。您看了我的作文吧？”

“看了。不好。”

“就算不好吧，可是文章里面并沒有潛藏什么唯心主义，这点我可以担保。”

“就算是这样吧。繼續講下去。”

“下面还有什么呢？都講完了。”

“不，还沒講完。你知道我們通过人民警察局寻找你的事嗎？”

“伊万·巴甫雷奇……，这是实在的。我眞的对瓦尔加說过。好吧，就假定这也不算数。但我是在假期中离校的，到哪兒去

呢？到我八年沒有回去过的故乡去了，难道因为这件事就要把我开除出校嗎？"

当柯拉布略夫提到人民警察局时，我就知道这一回不大发一場"雷霆"是过不去的。果然，我猜得不錯。

在四年級时，柯拉布略夫曾經喝斥过我一次。那是因为依西卡·格魯曼洗澡时脚碰在石头上碰破了，我便用日光浴替他治疗，后来不得不把两个脚趾头割掉。那一次的"雷霆"可眞怕人。这次他又发作了。他的眼睛鼓得象要爆出来似的，对着我喊叫，我只是偶尔畏縮地說：

"伊万·巴甫雷奇！"

"你給我住嘴！"

他自己也沉默了一会兒，这只不过是为了换一口气……

这么一来，我漸漸認識到了自己确有好些不对的地方。但难道眞要把我开除嗎？那么世界上的一切都完了！航空学校也完了！生活也完了！

柯拉布略夫終于靜了下来。

"簡直糟糕透了！"他說道。

"伊万·巴甫雷奇，"我感到有点发抖，更确切一点說，是声音在打抖，"虽然您說的好多地方都不是实情，但是我現在不打算和您辯駁。怎么都成。不过您不也是不願意他們把我开除嗎？"

柯拉布略夫沉默着。

"姑且假定这样吧。"

"那么，請您告訴我，我現在应該怎么办。"

"你应該向李和道歉。"

"好吧，只要他先……"

“我已經和他講过了！”柯拉布略夫恼怒地斥責道。“他已經把‘唯心主义’勾掉了。不过分数还是照旧。”

“就算分数照旧吧。不过把我的作文評为‘极劣’总是不对的。这样的分数根本就沒有，劣还带负号，这算是什么？”

“第二，”柯拉布略夫継續説道，“你应該向罗馬什卡道歉。”

“这可絕对办不到！”

“这是你自己説的：‘我承認这是不对的’。”

“是我説过。但我宁可被开除，也不向他道歉。”

“薩尼亚，你听我説。”柯拉布略夫很严肃地説道，“我費了很大劲才爭取到讓你出席教务会議。現在我倒后悔自己为这件事瞎操心了。要是你出席会議时説：‘絕对办不到，我宁可被开除！’无疑你是会被开除的，你完全可以相信这点。”

从他説这些話时脸上那种特殊的表情，我立刻就明白他暗中指的是誰。尼古拉·安东內奇那张彬彬有礼，一絲不苟的胖脸忽然閃現在我的面前。原来是他在想尽一切办法要开除我呀！

“我覚得你沒有权利为了一点兒自尊心就拿自己的前途冒险。”

“这不是什么一点兒自尊心，这是名誉。伊万·巴甫雷奇！”我激憤地継續説道。“您想要我怎么样呢？要我把罗馬什卡的事敷衍过去嗎？因为这事干系着尼古拉·安东內奇，干系着那个决定开除我或不开除我的人。您想讓我去作那么卑鄙的事嗎？决不！我現在明白了，他为什么坚持要开除我！他想除掉我，讓我离开，以后再也看不見卡佳。問題不就是这样嗎！我要在教务会議上把这些事全都説出来。我要説罗馬什卡是个下流的家

伙，只有下流胚子才会向他道歉。"

柯拉布略夫沉思了一会兒。

"等一等，"他說道。"你刚才說罗馬紹夫偷听同学們关于尼古拉·安东內奇的議論，然后向他密报，关于这一点你有什么証据？"

"我有証明人瓦尔加。"

"哪个瓦尔加？"

"朱可夫。他一五一十地对我說过：'罗馬什卡用小本子記，然后向尼古拉·安东內奇密报，說有人在背后議論他。密报了以后，还講給我听。我把耳朵堵住，他还是講。'我这也是一五一十地轉告給您。"

"哼！有意思，"柯拉布略夫神气活現地說道，"那么瓦尔加为什么不吭声呢？他不还是你的好朋友嗎？"

"伊万·巴甫雷奇，他受着罗馬什卡的轄制。瓦尔加最不能忍受的就是罗馬什卡夜間盯着他看。并且关于这些事也不是随便講給他听的，而是先要他起誓人格担保。当然，瓦尔加是个傻瓜，答应了他人格担保，可是既然人格担保了，他当然就不应該吭声啊！对嗎？"

柯拉布略夫站起来，走了一轉，掏出梳子，先梳起髭子来，梳了髭子梳眉毛，梳了眉毛梳髭子。他在思索。我的心怦怦地跳着，但我再也沒有說什么話。讓他去想吧！我甚至連呼吸也尽量放輕了些，害怕妨碍了他。

"好，就这样吧，薩尼亚，反正你是不会耍滑头的，"柯拉布略夫終于說道。"那么在教务会議上，你就把現在和我說的話一五一十完全講出来好了。不过，有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伊万·巴甫雷奇？"

“不能激动。比如你刚才說，尼古拉·安东內奇要开除你是因为卡佳的关系。这一点在大会上就不应当說。”

“伊万·巴甫雷奇！难道这点我还不明白嗎？”

“你明白是明白，不过你太容易激动……这样吧，薩尼亚，我們約好。我把手这样放在桌上，手心向下，你就放心地講下去，同时要时时看着我的手。如果我用手輕拍桌子，那就是說你太激动了。如果不动，就是沒有激动。”

“好吧，伊万·巴甫雷奇。謝謝您。什么时候开教务会呢？”

“今天三点。不过，叫你出席的时候要晚一些。”

他要我把瓦尔加叫到他这兒来一趟，于是我們就分别了。

17 瓦尔加

我竭力使自己不要太激动，把自己的东西收拾好，准备万一被开除，可以立刻就走。后来我讀了墻报，关于我的事上面一个字也沒有提，这样看来，我的問題还沒提到校团委，要不然就是寒假期中一次团的会議也沒开过。

想到他們不仅要把我开除出校，还会开除我的团籍，这眞可怕极了。眞会这样嗎！同学們关于这件事知道些什么呢？为什么我撞入寝室，把罗馬什卡飽打了一頓之后，沒有告訴任何人就到恩斯克去了呢？当然我玷汚了共青团員这个称号。我当时应該解释一下自己的行为。唉，晚了！

整整一天我都忧悶地想着这些事。共青团支委办公室关着

門。支委中只有林加·謝涅曼在家。我不喜欢她，也不想和她談这样的事情。我認为她是个傻瓜。

我等待着瓦尔加，时間一分一分的过去，可是他还沒有回来，不用說又是在动物园！我怕半路上錯过，給他留下了一张字条表示悵然，随后我就乘車到普列斯娅街去了。

这次我沒有能很快地找到他。

"朱可夫在教授那兒，"一个年紀十五岁左右的小孩告訴我說。他和瓦尔加有些相似，也长着那么一张善良的，多少带点兒神經質的脸孔。

"教授在哪兒？"

"在巡視。"

我又問了一遍。

"在公园里巡視！"

在这以前我以为只有在医院里教授才巡視病人。可是这个小孩很耐心地对我解释，不仅是在医院里，在动物园里也同样，这兒教授所巡視的自然不是病人，而是野兽。

"不过动物有时也会害病。"他想了想以后，又說道。"当然，比起人来要少些。"

这就是瓦尔加整天說的那位有名的尔教授。我立刻就知道是他，因为他也象瓦尔加，不过是象老瓦尔加：生着一个大鼻子，架着一付大眼鏡，穿着一件长皮大衣，戴着一頂高高的羔皮帽。

教授站在猴子栏旁边，周围聚集着相当多的人，他們在大衣外面都套了白罩衫。所有这些人好象都想和他接近，每个人都想和他說什么話。可是，他只听瓦尔加一个人說話，为了听这位瓦尔加說話，他甚至把他那满是皺紋的大耳朵从皮帽里掏了出来。

我远远地止住了步。可以看出，瓦尔加非常兴奋，眼睛一眨一眨的。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暗自想："小家伙眞行。"

他講得相当长久，教授一直在听着，眼睛也开始一眨一眨的，聚精会神地抽吸着鼻子。有一次他张开口，大概想要反駁，可是瓦尔加果断地，气冲冲地搶到他面前，于是老教授又顺从地閤上了嘴。

最后瓦尔加說完了，老教授遮好耳朵，开始沉思起来。他突然喜出望外地拍了拍瓦尔加的肩膀，声音完全象馬似的嘶叫起来；所有的人都高声交談着走开了。只剩下瓦尔加一个人，带着一付喜不自胜的神气呆呆地站在那兒。这时我才喊了他一声：

"瓦尔加！"

"啊，是你！"

我还从来沒有見过他这样的兴奋。他的眼睛里甚至滚着泪珠兒。他不知所措地微笑着。

"你怎么啦？"

"什么？"

"你哭了嗎？"

"你胡說什么！"瓦尔加回答道。

他用拳头将眼泪擦乾，快乐地深深喘了一口气。

"瓦尔加，出什么事了？"

"沒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我最近在研究蛇，我成功地証明了一件有趣的事。"

"什么事？"

"毒蛇的血液是随着年龄变化的。"

我不禁非常惊訝地看了看他。是因为蛇的血液随着年龄的变化高兴得流泪了嗎？这实在使我无法理解。

“祝賀你，”我說道。“我要和你談談，怎么样，行嗎？”

“行。”

我們走到老鼠那边去。

“你知道他們想把我开除出校嗎？”

瓦尔加大概已經知道这个消息，不过他完全忘了这回事，因为他先是大睜着眼睛，然后拍了一下自己的前額說道：

“是啊！我知道！”

“校团委討論过沒有？”

这时我的声音也有点兒啞了。瓦尔加点了点头，說道：

“决定等你回来以后再說。”

我这才放了心。

“关于罗馬什卡的事你給支部写了报告沒有？”

瓦尔加把眼光移开。

“你看，”他嘟嘟囔囔地說道，“我还沒有写，我只告訴他，如果他还要糾纏，我就写。他說再也不了。”

“原来这样哇！那么你对于要开除我学籍这事是毫不在乎的了！”

“为什么？”瓦尔加惊恐地問道。

“因为只有你可以証明我不只是为了私人的緣故打他。可是你是个胆小鬼，你这种胆小的行为可能变成卑鄙的行为。你是怕替我說公道話！”

对瓦尔加說这样的話是过火了些。可是我实在太恨他了。我說罗馬什卡是害群之馬的典型，誰都应該和这种人斗爭。

“我今兒晚上就交上去，”瓦尔加放低声音說道。

“好吧！”我冷冷地答道，“不过你要明白，我不是祈求你这样作。我只是認为作为共青团員，这是你应尽的責任。柯拉布略

夫現在要你到他那兒去一趟。”

“什么时候去？”

“馬上就去。”

他懇求我稍稍等一会兒，哪怕一刻鐘也好，讓他喂一下他的什么花斑蛤蟆。我沒有理会他，給他披上大衣，就帶着他到柯拉布略夫那兒去了……

过了半个小时以后，他气呼呼地走过来，用一个手指摸弄着鼻子，哼哧哼哧喘了一陣子气，原来柯拉布略夫問他是不是眞不喜欢夜里有人盯着他看。这使他大为惊异。

“我不明白他是从哪兒知道的！是你这个畜牲告訴他的吧？”

“不，不是我。”我撒謊道。

“更主要的是，他問我：‘要是有人用充滿爱情的眼睛看着你呢？’”

“你怎么說的？”

“我說，‘那我可不知道了……’”

五点半的时候，一个校工来找我。

“格利高里耶夫，請您出席教务会議，”他很有礼貌地說道。

18 破釜沉舟

这是在我們窄狹的教員休息室里开的一次最普通的会議。会議桌上舖着繐子破旧了的蓝絨台布。我覚得大家都帶着一种神秘莫測的表情望着我。塞拉菲瑪今天穿着套鞋，使我恍惚覚

得这也是一个謎。当我走进去的时候，柯拉布略夫在笑，我也認为这是“故意的”!

“喂，格利高里耶夫，”尼古拉·安东內奇温和地开始説道。“你当然知道，我們为什么把你叫到教务会上来。你使我們很痛心。不只我們，可以説是我們全校。你使我們痛心的是你那为人类社会所不齿的野蛮行为，我們生活在这个社会里，就应該尽自己的一切力量和可能来推进它的发展。”

我説道：

“有什么問題請直接提出来吧!”

“尼古拉·安东內奇，請允許我先説两句，”柯拉布略夫赶忙插嘴説道。“格利高里耶夫，請你説一説你从学校里偸跑以后的这几天都是在哪兒过的?”

“我不是偸跑，是去恩斯克了。”我沉着地回答。“那兒有我八年沒見面的妹妹。司考伏罗得尼可夫法官可以作証，我住在他家里，——果戈理街十三号，从前馬尔庫茲的房子。”

如果我直截了当地説这九天是和卡佳·塔塔林諾娃一块兒过的，她被送到恩斯克去是有人存心不讓我們見面，至少在寒假期間不能見面，那么我的話对尼古拉·安东內奇就不会发生这样大的影响了!他的脸色立刻刷白，眼睛开始一眨一眨的，温和地将头偏到一边。

“为什么你离开时不告訴誰一下呢?”柯拉布略夫問道。

我回答説我承認自己的錯誤，违犯了校規，并保証今后决不再犯。

“太好了，格利高里耶夫，”尼古拉·安东內奇説道，“这样的回答太好了。只希望你能同样令人滿意地解释你的另外几件行为。”

他和藹地看着我。他有惊人的自制力。

“現在把你和伊万·維塔里耶維奇·李和之間发生的事情告訴我們吧。

直到現在我还不明白，为什么当时我叙述关于李和問題的經过时沒有提起“唯心主义”的事。大概我以为李和既然收回了他的批評，那么关于唯心主义的事也就沒什么可談的了。这是一个极大的錯誤。同时还不应該提到我的作文不需要“批評”。这点使得大家都不高兴；柯拉布略夫紧皺眉头，将手放在桌子上。

“这么說来，你不喜欢批評？”尼古拉·安东內奇温和地說道，“你对伊万·維塔里耶維奇說的什么話？照样重說一遍。”

当着教务会議上的全体人員要我把对李和說的話再重复一遍！这是不可能的！如果李和不是一个傻瓜的話，他自己就会把这个問題岔开了。然而他只是神气十足的望着我。

“往下說吧！”尼古拉·安东內奇庄严地宣告。

“尼古拉·安东內奇，讓我說一句，”柯拉布略夫不同意，說道，“他对伊万·維塔里耶維奇說的話我們都已經知道了。現在想知道的就是格利高里耶夫对自己的行为怎么解释。”

“对不起，对不起。”李和說道。“我要求他重說一遍！我就是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学校发育不健全的兒童口中也沒有听見过这样的脏話。”

我一声不响。如果我会遙測別人的思想，那么，这时从柯拉布略夫的眼中我一定能猜出：“薩尼亚，說呀，說你是因为‘唯心主义’的批語受了委屈。”可是我不会遙測別人的思想。

“說吧！”尼古拉·安东內奇寬容地重复道。

“不記得了，”我喃喃地說。

这样回答真是蠢到了极点，因为大家立刻就明白我是撒謊。李和从鼻孔里哼了一声，說道：

“今天他可以因为我打分太少而辱罵我，明天兴許就要害我哩，簡直是十足的流氓行为！”

同那次在楼梯上一样，我这时又想用脚踢他，自然我当时还是忍耐住了。我咬紧牙关，一声不响地看着柯拉布略夫的手。他抬起一只手，輕輕地拍了拍桌子，又靜靜地放回原地方去。

“当然，作文是不好，”我尽力使自己不要太激动，并且憤恨地盘算着应該怎样使自己摆脱这种尴尬的处境。“但还不至于‘极劣’吧，因为根本沒有这样的分数，不过，我認为这也沒有什么。要是教务会議决定要我道歉，好，我就道歉。”

显然，这話也說得太愚蠢，弄得全場嘩然，好象我說了什么莫名其妙的話，所以柯拉布略夫带着毫不掩飾的失望的神情看了我一眼。

“好吧，格利高里耶夫，”尼古拉·安东內奇不自然地微笑着說道。“可見你是准备着如果教务会議根据这件事作出了决定，你才向伊万·維塔里耶維奇道歉，換句話說，你并不承認你自己犯了錯誤。那有什么法子呢！我們保留这一情况作为参考，現在我們来談另一个問題。”

“……为了一点兒自尊心就拿自己的前途去冒险，”我又想起了这句話。

“請您原諒我，”我轉臉向着李和很不自然地說道。

可是尼古拉·安东內奇又开始說話了，李和也装作沒有听見的样子。

“你說，格利高里耶夫，你为什么要野蛮地毆打罗馬紹夫，用脚踢他的脸，使他受了重伤，显然影响了你的同志罗馬紹夫的

健康。你对于在我們学校里这种前所未聞的行为又作何解释呢？”

我覺得，我这时最痛恨的便是他这种轉弯抹角，冗长的談話。不过这时柯拉布略夫的手举在桌面上，示意很明显，于是我止住了激动。

“第一，我不承認罗馬紹夫是我的同志。这样的同志对我簡直是一种耻辱！第二，我只打了他一次。第三，暂时还沒有什么迹象可以看出他的健康受到了損害。”

大家激憤得喧嚷起来。只有柯拉布略夫略微点了一下头。

“我的行为可以这样来解释，”我愈来愈沉着地繼續說。“我認为罗馬紹夫是一个最卑鄙的家伙，在任何时候，我都可以証明这一点。当时是不应該打他，应該組織公审，并且召集全校的人旁听。”

尼古拉·安东內奇想阻止我，可是我沒有理他。

“罗馬紹夫是一个典型的投机份子，他口里講的只是金錢，心里想的也只有一件事：怎样可以发財！是誰一天到晚搞抵押貸款的勾当？罗馬紹夫。是誰卖扑粉和口紅給姑娘們？——罗馬紹夫！他买来一盒扑粉，再一撮一撮地卖出去賺錢，这是典型的害群之馬，他敗坏了我們全校的名誉。”

我一直用这种方式講下去，就好象我真是在法庭上以公訴人的身份在发言。我講話中个别句子和以前卡耶尔·庫里講的相似，但是我当时也沒有时間来考慮这些相似的地方了。

“但是还不仅如此！我肯定地說，罗馬紹夫还从心理上影响着一些比他軟弱的同学，把他們掌握在自己手中。如果需要举例的話——对不起！瓦里亚·朱可夫便是一个。罗馬紹夫利用瓦里亚的神經衰弱，胡言乱語地吓唬他。他怎样对待瓦里亚呢？

首先，他要他人格担保，然后把自己的卑鄙的，見不得人的事告訴他。当我知道了这件事以后，簡直惊訝万分。一个共产主义青年团員，竟随便答应别人人格担保，决不告訴任何人。告訴什么事呢？連他自己在答应以前都不知道！这叫做什么呢？問題还不仅是这些！"

柯拉布略夫早已用手心輕輕地拍起桌子来了。可是我已經不再考慮自己激动不激动了。我覚得自己絲毫都沒有激动。

"問題还不仅是这些！我請問諸位，"我大声說道，并且轉过身去向着尼古拉·安东內奇。"如果罗馬紹夫沒有后台老板的話，他这样的人能在我們学校里站住脚嗎？不能！因此他是有后台老板的！至少我知道有一个，这就是尼古拉·安东內奇！"

这句話講得相当厉害！我自己也沒有料到，我能講得这样大胆痛快！大家都不吭气了，整个教务会議上鴉雀无声，都在等待什么事就要发生。尼古拉·安东內奇勉强笑了笑，脸色頓时变白了。不过，他笑的时候，脸色总是有点兒白的。

"怎样証明这一点呢？很簡单。尼古拉·安东內奇一向很'关心'我們校里大家对他的議論。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这样！不过为了这个目的，他豢养了罗馬紹夫却是事实。我之所以說'豢养'，是因为罗馬紹夫从来不作无代价的事。罗馬紹夫受他的豢养，所以才偷听校里大家对他的議論，向他密报。可是后来他要朱可夫人格担保，把自己密报的事情講給他听。諸位也許会問我：那么你为什么不早說呢？这是因为我在临行前一天才知道，并且，朱可夫当时已答应把这件事写成書面材料交給团支部，但他拖延到今天才把这件事作了。"

我住口不說了。柯拉布略夫把手从桌子上拿下来，很有兴

趣地轉脸望着尼古拉·安东內奇。不过只有他一个人能够这样泰然自若。别的教員都好象有点忸怩不安。

“格利高里耶夫，你解释完了嗎？”尼古拉·安东內奇儼然无事的样子，仍旧用那么平淡的声調說道。

“是的，講完了。”

“也許，还有什么問題吧？”

“尼古拉·安东內奇，”柯拉布略夫很客气地說道。“我認为可以讓格利高里耶夫走了，現在是不是可以叫朱可夫或者罗馬紹夫来。”

尼古拉·安东內奇解开了背心上面的一个鈕扣，将一只手插在怀里。他的脸色愈来愈白，梳到脑后的稀疏的头发突然掉下来垂在額前，他往椅背上一仰，閉起了眼睛。大家連忙跑到他的跟前去。会議就这样結束了。

19 老朋友

全校都在談論我在教务会議上的发言，使我忙得不可开交起来。要說我覺得自己这下子成了英雄，那未免有些夸张。但附近几个班的姑娘們总是跑来瞧我，声音相当大地議論我的外表。我的矮个子有生以来第一次受到别人的原諒。弄来弄去，甚至說我有点象查礼·卓别林了。一向受到全校爱戴的丹娘·薇莉琪珂走来对我說，她在假期中曾經不断地发言攻击我，可是現在也認为我踢了罗馬紹夫的狗脸是对的。

“不过你当时先說明他是典型的害群之馬就好了，”她很有道理地說道。

总归一句話，使我感到极为扫兴和惊訝的是，团支部在我名声大震的时候，却給了我严重警告处分。由于尼古拉·安东內奇生了病，所以教务会議沒有再举行，不过柯拉布略夫告訴我，可能要我轉学。

这是令人不很愉快的事，更主要的是有些不公平！团支部的决定我是同意的。可是要我轉学！这是为什么？是因为我指出罗馬紹夫是个卑鄙的小人嗎？是因为我揭穿了尼古拉·安东內奇庇护罗馬紹夫嗎？我怀着极不愉快的心情坐在图書館里，这时門口有人声音并不低地悄声問道：

"哪一个？"

我看見門边站着一个长着火紅色头发的高个子青年，以詢問的眼光看着我。

紅头发的人都喜欢留发，但是这位青年的头发，就象地理教科書里原始人长的头发那么不順馴。眞有趣，我脑子里起初只想着他的头发，后来才恍然大悟，他是彼其加——彼其加·司考伏罗得尼可夫的大駕站在我們图書館的門口，带着惊詫的神气看着我。我跳起来，撞翻了椅子，向他扑过去。

"彼加！"

我們彼此握了握手，后来想了一想，才立刻拥抱在一起。

"彼加！你怎么样？身体好嗎？我們怎么一次也沒有碰見过呢！"

"这得怨你的不是，傻小鬼！"彼加回答說。"我找遍了全世界。原来你却藏在这兒！"

他非常象薩尼亚給我看的那张相片，只不过相片上的头发梳得很整齐。我多么高兴呀！就好象和自己的亲兄弟会面一样，我沒有絲毫拘束不安的感覚。

“彼其加！眞見鬼！你眞行，竟然找来了！我这兒有你的信！”

我把信交給了他。

“你怎么找着我的？是恩斯克写来的信吧？”

“嗯！我早就等着你来了。心里想：这个混蛋还不来。家里老人怎么样？”

“老人家都很好。”我回答說。

他笑了。

“我还以为你住在土耳其斯坦呢。你怎么搞的？到底沒有走到哇。”

“你呢？”

“我到过了，”彼其加說道，“我不喜欢那地方。你知道，那兒热极了，总是想喝水，我被关到监獄里去了，我悶得发慌，就回来了。要是你准会死在那兒。”

我带他到寢室里去，同学們把我們团团围住，直看着我們，因此我們突然觉得，在我們校里簡直沒有談話的地方。

“到外面去吧，”彼其加建議道。“天气很好，为什么不蹓躂蹓躂呢？要不然就到我那兒去？”

“你一个人住嗎？”

他伸出两个手指来表示两个人。

“你結婚了嗎？”

他举起拳头来，象要打我的样子。

“和一个同学。”

我們每人拿了一大块恩斯克餡餅，边吃边穿衣服，口里塡得滿滿的，談着話走下楼来。就在这当兒发生了一件奇遇。

在一楼楼梯口歇脚的地方，靠近地理研究室，站着一个穿白領子皮大衣的妇女。她站在栏杆边望着下面，望着楼梯把手的

空隙。——起初我还以为她打算跳楼呢，她紧閉着眼睛，在栏杆旁边摇摇晃晃。大概因为我們惊动了她，她才迟疑不决地向門口走去。这是瑪丽亚·瓦西里耶芙娜；虽然她的样子有些兒和往常不一样，可是我一眼就認出是她来了。如果当时就是我一个人的話，她很可能要和我談話的。但是，我和彼其加走在一起，再加上我这时正在吃餅，所以当我很不好意思地向她打招呼时，她只默默地点了点头，便轉身走了……

她比我上一次看見她的时候更加清瘦了，脸上毫无表情，阴沉沉的……我一边想着这件事，一边往外走，和彼其加去散步了；又是我們俩，又是冬天，在莫斯科久别重逢了！

令人惊奇的是彼其加的遭遇和我的极为相似！我怀着感伤的心情听他叙述，象是在回忆一本童年时代曾經熬着极大的痛苦和不安讀过的書。眞奇怪！我似乎覚得那时我們更有經驗，更老練些……我們好象是两个小老头兒。

彼其加在塔什干是出名的鴨子閻王，——当然不是指的野鴨子，而是家鴨子。他把鴨子赶上岸来，然后活生生的擰断脖頸，就在兒童教养院的花园里架起火烤着吃。他終于因此被抓进监牢里去了，在那兒不論早飯，午飯，或晚飯都吃杏子，所以經过这次以后，他終生对杏子都极端憎恶。后来他被释放了，回莫斯科时，在喀山車站又遭逮捕。他进学校比我晚一年，直到去年跳了一級，才赶上了我。

"你还記得：'呀呸！呀呸！你們怎么敢这样作！'吧？"

"对了！你还記得：'誰若违背誓言，他将永远不能得到寬恕，除非等他数清了森林里有多少树木，天上落下多少……'吧？"

我把誓詞一口气背到底。

“太好了！”彼其加高兴地說道。“眞是好誓詞！奋斗，探求，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你还記得嗎？……”

“你还記得，我們是怎样寻找你叔叔的嗎？”我打断了他的話头說，“那么他現在在哪兒？你找到他了嗎？”

原来叔叔在前綫患斑疹伤寒死了。

“你还記得嗎？……”

我們就这样不断地說着“你还記得嗎……”，我們也不知道为什么走得那么快。空中飘舞着雪花，林蔭道上有許多小孩在那兒玩，一位年輕的保姆看了看我們，忍不住笑了。

“等一会兒，我們干嗎这样跑？”彼其加問道，于是我們放慢了脚步。

“彼加，我有个建議。”当我們走够了，坐在提維尔大街一家咖啡店里的时候，我說道。

“說吧！”

“我去挂一个电話，你先在这兒坐一会兒，好好喝咖啡，什么話也不要說。”

他笑了笑說道：

“可笑！”

我发現他非常喜欢說“可笑”和“傻小鬼”。

电話离我們的座位很远，在一进門的地方，因此我故意高声說話。

“卡佳，我很想介紹你認識一个人。你来吧，好嗎？你在作什么？还有，我需要和你談談。”

“我也是这样。但是我們家里的人都病了，要不我就来了。”

她的声音显得很忧伤，因此我突然迫切地想看見她。

怎么会都病了呢？我刚才还看見瑪丽亚·瓦西里耶芙娜的。

“在哪兒？”

“她到柯拉布略夫那兒去过。”

“哦！哦！”卡佳用一种奇怪的声調說道：“不是，姥姥病了。”

“她怎么啦？”

“从凳子上摔下来了，”卡佳懊丧地說道，“她不知爬到書桌上去找什么，咕咚一声滚下来了，現在腰还疼！她眞是倒霉！一分鐘也不肯躺着……薩尼亚，我把那些信交給她們了，”卡佳突然压低了声音說道。我不由得把听筒往耳朵上貼得更紧一些。“我說你在恩斯克和我在一块兒，随后我就把信交給她們了。”

“結果呢？”我也同样低声問道。

“事情很不好。我以后再告訴你，很不好。”

她不說話了，我从电話里听到了她輕微的呼吸声。

我們說完再見以后，我怀着一种似乎很对不起她的感覚回到桌边。我心里感到惆悵，并且有点兒惶惶不安，彼共加好象一眼就看明白了。他故意用别的話打岔說：

“喂！关于进航校的事你和我父亲商量过嗎？”

“商量过了。”

“他怎样表示的？”

“贊同。”

彼共加沉默下来。他伸出两条长腿坐着，沉思地用手指撫摸着自已脸上按年岁說来已經是应該长胡鬚的地方。

“我也需要和他談談，”他吞吞吐吐地說道。“你知道，我去年想进美术学院。”

"眞的嗎？"

"可是今年又不想了。"

"为什么？"

"万一沒有天才怎么办呢。"

我不禁笑了起来。但他却是一本正經，滿腹心思的样子。

"总而言之，要是眞的那样，你进了美术学院，那才奇怪呢。我总覺得，你应該成为一个旅行家，或者是一个船长！"

"当然，这更有趣一些，"彼其加犹豫不定地說道。"可是如果我有天才又怎么办呢？"

"你的作品給別人看过嗎？"

"給……夫看过。"

他說了一位名画家的姓，我沒听清楚。

"他說怎么样？"

"他說还好。"

"那就得啦唄！应当学下去！老兄，如果你在这方面有天才，还去上什么航空学校，那眞是傻瓜！你这样說不定会把未来的列宾① 給葬送掉。"

"說哪兒的話，不見得。"

"万一呢？"

"傻小鬼——你在开我的玩笑，"彼其加恼怒地說道。"这是正經問題！"

我們付了賬走出来，在提維尔大街上来回蹓躂了半个鐘头，乱談了一陣，从恩斯克談到当时刚被国民革命軍攻占的上海。又从上海談到莫斯科，談到我的学校，再从我的学校談到彼其

① 列宾（1844—1930），俄罗斯名画家。——譯者注。

加的学校。我們彼此都竭力想向对方証明，我們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并不是那么平凡的，而是有一定的目标。

“阿尔斯”电影院正在上演“罗曼諾夫王朝顚复記”。我們停下来，看了看电影画片，那些侍从武官都很象沙皇。沙皇坐在一輛大得可笑的汽車上，笑容可掬的样子，这輛汽車很象敞篷的双人馬車。

“見他媽的鬼，”彼其加叹了一口气，說，“事情眞难办！”

“讓我亲眼看看你是不是有这份天才。”

“你懂得什么！”

“我当然懂得啦！”

于是我們就到他住的地方去了。

去年以前，彼其加和我一样住在兒童教养院里。后来他走了运，結識了一位工农专科学校的学生，那人在跑狗場有一間房子，他們便搬在一起住，这位工农专科学校学生姓赫費茨，当我們到他家时，他已經睡了。

“看吧，”彼其加取下挂在床头上的电灯，房間里的墻壁十分污脏，滿墻挂着画，彼其加把灯照着其中的一张。我起初沒有憑借地用眼睛看，然后眯縫起眼来从拳头縫里看。

这是一张画象，我立刻就猜出了是誰的象：彼其加的朋友赫費茨。他这时恰好为移动的灯光照醒了，他睜开眼叹了一口气，用手遮住脸又睡了。这张象画得很入神：一双眼睛充滿了沉思和稚气，果断的前額上生着两道笔直的，几乎連成了一条綫的眉毛。

“用墨画的嗎？”

“墨汁稀得差不多成水啦。”彼其加抑郁地說道。

这张画象是用淡墨画的，但黑白对照，叫人感到十分自

然！

"眞不錯，"我不由得表示欽佩。"喂，还有什么，再給看一看！"

其余的画都是画的我妹妹薩尼亚。薩尼亚在一叶輕舟上，薩尼亚在爐边，穿烏克兰花衣的薩尼亚，象个老祖母似的穿着她那件黃皮袄的薩尼亚。

我不由得想起当我問薩尼亚有沒有彼其加的相片时她那副怪不好意思的神情，她很快就把相片拿来了，准是一跨出門便从口袋里掏出来的。这有什么呢！正象法官所說的，他們是很相当的一对兒。难怪薩尼亚也打算进美术学院哩。

应該給彼其加一个公正的評价——他并沒有把薩尼亚画得比她本来的样子更好。但是却画出了她脸部所具有的那种蒙古人的特征：細細的眼睛，寬大顴骨，东方式的，韃靼人的眼神。这也許就是她在某些画面上那么特别象母亲的原因吧。

有几张画薩尼亚的画比起画赫費茨的差一些。不过那张"薩尼亚在爐边"的画实在太妙了！特别是爐子：爐板上罐子里煮的东西仿佛都煮沸了，白色的小团子正在翻滚沸騰。

"喂，老兄，毫无办法！"

"怎么？"

"是有天才呀！"

彼其加叹了一口气。

"算个什么画家！"他說道。"我坦白地告訴你，我甚至并不喜欢繪画。过去喜好过，可是現在一点也不喜欢了。"

"儍家伙，这眞是怪事！"

"怎么是怪事？"彼其加生气地反駁道，"你那么想作飞行員是因为你有兴趣。可是我覚得繪画沒有意思。"

“輕点兒，你要把他吵醒了。”

“哼！吵醒他，”彼其加怒气冲冲地看着工农专科学校的学生說道。

“你同他商量过嗎？”

“他說我是病号。”

我笑了起来。

“可是也有这样的事呀，”彼其加說道。“例如契訶夫。他是医生又是作家。”

“有是有的。要我处在你的情况，你猜我怎么办？”

“怎么办？”

“先去作飞行員，飞它二十来年。然后再从事繪画。”

“那就再也拾不起来了，全忘了。”

我在彼其加那兒坐到深夜，赫費茨一直也沒有醒。我們打算叫醒他，可是他只是象小孩子一般，在睡梦中笑笑，翻一下身又睡着了。

20　本来可以不至于弄成这样

过去，如果我們在十点鐘以后回校，就不得不提心吊胆地从严厉的雅飞身傍繞过。他穿着一件寬大的皮大衣，坐在校門口的小凳上打着瞌睡——假如他是睡着的，那敢情好了。現在，这样的时期已經过去，我已經毕业了，我們願意什么时候回去就什么时候回去。

不过，这天我回去得还不算太晚——将近十二点鐘。同学們还在乱吵嚷。瓦里亚蜷着腿坐在床上写东西。看見我便說

道：

“薩尼亚，伊万·巴甫雷奇說，如果你十二点鐘以前回来，就請你去一趟。現在几点了？”

“十二点半。”

“快去吧！”

我披上外套，向柯拉布略夫那兒跑去……

这是一次很不平凡的，我永远也忘不掉的談話，——我应該很冷靜地把談話的內容写出来。我不应該激动，特别是現在，已經过了这許多年了。显然，一切本来都可以不至于这样，假使我当时知道我的每一个字对于她有着多大的意义，假使我能預料到在我們談話之后会发生什么事……然而这些“假使”是沒有止境的。我倒不是为自己开脫，我不需要辯白，我也毫无过錯。下面就是这次談話的情形。

我到柯拉布略夫那兒时，瑪丽亚·瓦西里耶芙娜正在他家里。她在他那兒坐了一个晚上。但她幷不是来找他，而是来找我的，的确是找我的，所以她一开口就对我講明了这种意思。

她伸直了腰坐着，板着面孔，不时用她那瘦削的手去理一理头发。桌上放着葡萄酒和点心。柯拉布略夫不断給她和自己斟酒，可是她只是輕輕地抿一口，所以那杯酒始終也沒有喝尽。她不断地抽烟，到处撒着烟灰，連膝盖上都是。她頸上戴着那条为我熟悉的珊瑚項鍊，她几次将它輕輕地松一松，仿佛項鍊窒息着她似的。当时的情景就是这样。

“那个航海长写道他不敢冒险将这封信从邮局里寄。”她說道，“可是这两封信却在一个邮袋里，你对这个問題怎么解释呢？”

我回答說不知道，如果航海长还活着的話，这应当去問他本人。

瑪丽亚·瓦西里耶芙娜搖了搖头。

“如果他还活着那就好了！”

“也許他的亲人知道。”我突然灵机一动，說道。“还有，瑪丽亚·瓦西里耶芙娜，航海长是被塞多夫中尉的探險队救起来的。那他一定能知道。我相信，航海长把所有的事都告訴他了。”

“唔，也許是的。”瑪丽亚·瓦西里耶芙娜答道。

“还有，这个小包是送交水道測量局的。如果航海长是經邮局把信发出去的，他大概也会把小包經邮局寄走。应該了解一下。”

瑪丽亚·瓦西里耶芙娜又說道：

“对的。”

我住嘴不說了。老是我一人在說，柯拉布略夫还沒有参加談話。我說不出他是用怎样的表情看着瑪丽亚·瓦西里耶芙娜。他突然从桌子后面站起来，把双手交叉着放在胸前，踮起脚尖，开始在屋里踱来踱去。他这天晚上的神情显得很奇怪——象是长了翅膀似的，有些飘飘然，給人那种感覚，好象他的鬍子馬上就要随风吹散了。我不喜欢他这个样子。不过我了解他：他为尼古拉·安东內奇原来是那么一个坏蛋而感到高兴，他为自己早就預言过这种情况而感到驕傲；他有点畏惧瑪丽亚·瓦西里耶芙娜，同时他也因为她的痛苦而痛苦。不过，主要的他还是在高兴，我不知为什么非常厌恶这一点。

“你在恩斯克都作了些什么？”瑪丽亚·瓦西里耶芙娜突然問我道。“你在那兒有亲戚嗎？”

我回答說是有亲戚，妹妹在那兒。

“我很喜欢恩斯克，”瑪丽亚·瓦西里耶芙娜对柯拉布略夫說道，“那兒太美了。多么好的花园！自从离开恩斯克以后，我就再沒有到花园里去过。”

她突然談起恩斯克来了。不知怎么講到她有三个姨媽住在那兒，她們都不信上帝，并且以此自傲，其中有一个曾在海德尔柏尔格大学哲学系毕业。她过去从来不象今天这样健談。她脸上毫无血色，但却非常漂亮，一双眸子晶瑩发光，坐在那兒不断地抽烟。

“卡佳說，你还記得那封信里的一些話，”她突然象是忘掉了姨媽，忘掉了恩斯克似的說道。“可是，我从她口里怎么也問不出是几句什么話。”

“是的，記得一些。”

我等着她会立刻要求我把这些話告訴她。可是她一声不响，仿佛是駭怕听我說出这些話来似的。

“喂！薩尼亚，說吧，”柯拉布略夫用一种假装振作的腔調說道。

于是我就說了：

“那封信是在‘它是你的……’地方結尾的，对吧？”

瑪丽亚·瓦西里耶芙娜点了点头。

“下面是这样：‘你的鷹爪蒙哥其瑪……’”

“蒙哥其瑪？”柯拉布略夫詫异地又問了一遍。

“是呀，蒙哥其瑪。”我毫不犹豫地重复說。

“‘鷹爪蒙其哥瑪’，”瑪丽亚·瓦西里耶芙娜改正道，她的声音开始微微发起抖来。“我曾經这样称呼过他。”

將塔塔林諾夫船長称作“鷹爪蒙其哥瑪”，現在看来也許不

免可笑。特别是我感到可笑，因为关于他的事，我比地球上誰都知道得多。但是，当时却一点也不感到可笑，因为她一直保持着的平静的声音突然发起抖来。

这个名字原来并不是我和卡佳所想的那样，是什么古斯达夫·爱瑪兒的著作里来的，而是从契訶夫的書里来的。契訶夫有一篇短篇小說，这篇小說里有一个紅头发的小孩，他一直把自己称作鷹爪蒙其哥瑪。

“好吧，蒙其哥瑪，”我說道。不过我好象記得“是蒙哥其瑪……‘你曾經这样称呼过我。天哪，这是多久以前的事了！可是我并不想訴苦。我們会再見面的，到那时一切都好了。不过，有一种思想，有一种思想始終使我非常苦恼’。‘有一种思想’重复了两次，这不是我在重复，原信上就是如此——重复了两次。”

瑪丽亚·瓦西里耶芙娜又点了点头。

“这是很痛苦的，”我带表情地繼續背道，“現在認識到一切本来可以不致于搞成这样，这是很痛苦的。我們接二連三地碰到一些倒楣的事，最倒楣的就是我錯把探险队的給养装备工作委托了尼古拉。現在不得不每小时，每分鐘为此付出极大的代价。”

也許，我不应当把尼古拉这个詞讀得那么重。因为瑪丽亚·瓦西里耶芙娜脸色本来就够蒼白的，这时越发蒼白了。可以說已不是蒼白，而是一种慘白了，她坐在我們面前，不断地吸烟。后来她說了一些非常奇怪的話——只是在这个时候我才头一次想到她有点神經失常。可是我对于这件事并沒怎么重視，因为我覺得柯拉布略夫这天晚上也有点神經失常。其实他，唯有他应当了解在她身上所发生的变化呀！可是他这时已完全失掉了理智。他大概还在作梦，以为明天瑪丽亚·瓦西里耶芙娜

就会嫁給他呢。

"那次会議以后，尼古拉·安东內奇就病倒了，"她对柯拉布略夫說道，"我劝他請医生看看，他也不肯。关于这些信的事，我沒有对他談过。况且他現在心緒十分乱。暫时还不必提，对嗎？"

她竭力抑制着自己，忍受着內心的哀痛，可是我仍然什么也不明白。

"啊，怎么不必呢，"我反对道。"那么好，我自己来干。我抄一份信給他。讓他看看。"

"薩尼亚！"柯拉布略夫仿佛猛然醒悟过来似地喊道。

"不，伊万·巴甫雷奇，我一定要講，"我繼續說道。"因为这件事使我憤慨。探险队由于他而罹难这是事实。这是历史事实。人們要控告他这种严重的罪行。我認为如果瑪丽亚·瓦西里耶芙娜眞是塔塔林諾夫船长的妻子的話，那她就应該亲自对他提起控訴。"

其实她这时已不再是塔塔林諾夫船长的妻子，而是他的寡妇了。她已成了尼古拉·安东內奇的妻子。这样一来，她就必須控訴自己的丈夫了。但是这点我幷沒有想到。

"薩尼亚！"柯拉布略夫又怒声喊叫道。

但我已經不說話了。我已經再也沒有什么話可說了。我們的談話虽然还在繼續，可是再也沒有什么可談的了。我仅仅說，信中所提到的大陆就是北地島，所以北地島应該說是塔塔林諾夫船长发現的。不过在这个地方，在这間屋子里，在这个时候来說什么"經度，緯度"这些地理名詞，令人听起来未免刺耳。柯拉布略夫仍然在屋子里不安地踱来踱去，瑪丽亚·瓦西里耶芙娜繼續不断地在抽烟，在她面前的烟灰缸里，象一座小山似的堆滿了

染有口紅的烟蒂。她呆呆地，沉静地坐着，只是偶尔将頸上的珊瑚項鍊輕輕地松一松，好象这条寬大的項鍊使她窒息。北地島与她現在的思想之間实在相距太远了！

談話的全部經过就是这样。我在告别的候时又唠叨了几句話，柯拉布略夫苦丧着脸直冲着我走来，因此我不知怎么的就已經站在門外了。

21 瑪丽亚·瓦西里耶芙娜

使我最惊奇的是瑪丽亚·瓦西里耶芙娜关于卡佳的事只字未提。我和卡佳在恩斯克盘桓了九天，可是瑪丽亚·瓦西里耶芙娜对于这件事竟一句話也沒有說。

她这种沉默很令人費解，我夜里沒有睡着，早晨出早操的时候，上社会科学課，特别是在上文学課的时候，我都在想这件事。

在上文学課的时候，本来我应該多想一些有关果戈理和他的不朽史詩"死魂灵"之类的事情（当时我們正在講"死魂灵"）才对。我应該当心一点兒，特别是因为在上次教务会議以后，李和总是想尽办法向全校証明，我即便不是唯心主义者，但知道的东西，无論如何絕不比"极劣"的評語应得的更多。

不过这次我不知为什么沒有料到他会叫我。当他高声喊我的名字时，我甚至吓了一跳。

"听說某些高談闊論的人竟敢侮辱有功勛的人士，"他說道。"我們倒要看看，究竟他們有沒有这种权利。"

他接着問我，讀过果戈理的"外套"沒有；好象这样就可以解

答刚才这个問題似的。

虽然"外套"是我們在初小学的，但这也沒有什么。可是当現在講"死魂灵"的时候却偏要問"外套"，这眞是蛮不講理。不过我还是心平气和地回答他。

"讀过。"

"那很好。应該怎么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我們都是从果戈理的"外套"中出来的'这句名言呢？"

我解釋說，虽然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說，但是事实上，不可能眞有东西从"外套"里出来的。不过后来在文学中，在社会上又出現了完全另一新派。"外套"是对現实的妥协，而文学，例如，列夫·托尔斯泰，却是和現实作斗爭。

"你是反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罗？"李和鄙夷地冷笑着問道。

我回答說是的，我反对，可是反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并不等于唯心主义。

全班哄然大笑起来，李和的脸頓时涨成了猪肝色，看样子他是想馬上給我打个"不及格"。他甚至气得双手打战，可是到底这样作还有些不便，为了面子起見，他又問了我一个問題：

"你講一講果戈理写的人物中，哪些人可以算作只空談不作事的典型？"

我回答說，果戈理所写的人物，除了塔拉斯·布里巴这个人物总算还按着自己的理想作了一些事之外，其它全是只空談不作事的典型。但这并不能归咎于果戈理，因为当时的生活就是这样。

李和擦了擦汗，給我打上了个"不及格"。

"伊万·維塔里耶維奇，我要求科学院考問我，"我坐下的时候說道。"我們的文学观点有分歧。"

李和哇啦哇啦刚想說話，下課鈴就响了。

同学們認为我这次答得完全正确，李和沒有权利因为我不贊成陀思妥耶夫斯基，或者因为我認为果戈理所写的人物都是些只空談不作事的人，而給我“不及格”。瓦里亚指出果戈理自己焚毁的“死魂灵”下卷中，还有一个正面的典型人物——地主科斯坦若格罗，不过，我反对这种說法，旣然果戈理自己将它焚毁了，所以也就沒有什么可談的了。并且，地主就不可能是正面人物。在这当兒我突然看見彼其加来了。

这眞想不到在——在大休时間，彼其加到我們学校里来了！

“彼加，你干什么？”

“我有点事，”彼其加微微一笑，說道。

“什么事？”

“各种各样的事。正想和你談談。”

“談什么？”

“关于列宾的事。你昨天講了一番鬼話。列宾不能不繪画，而且如果你敢再向他建議进航空学校的話，你知道，他会把你送到哪兒去嗎？”

我睁大了眼睛望着他。

“看，你果然是这样！”

“是怎么样？”

“是一个病号。”

彼其加苦丧起脸来。

“不，”他很懊恼地說道。“我是很正經地問你。”

“我也是很正經地問你：你为什么不到学校里去上課？”

“我今天是逛大街，”彼其加迅速地說道。“我需要很好地想一想，学校里不能够想事情，总有人打扰。”

大休息結束了，但他說在“紅角”等我下課；我們今天只有四堂課。

他眞的沒有走。他把头仰着靠在椅背上，双手插在口袋里，閉着眼睛。

“你說当飞行員，”他說。一个鐘头以后，当我回来的时候，发現他还是原来那副姿势坐在原来的位子上。“可是也許你根本沒有絲毫可以作飞行員的条件呢？你可記得一生中哪怕有一件可以說明你能够成为飞行員的行为嗎？”

我想起了自己到恩斯克追卡佳时那种坚定的、当机立断的决心。

“有的。”

“能举例說明嗎？”

“那么我就告訴你吧。”

“就算是有吧。可是你这种选择是合乎邏輯的，还是一时冲动？”

“很清楚，是合乎邏輯的。”

“是出于理智呢，还是出于爱好？”彼其加的脸微微有些发紅地問道。

“不，是出于爱好。”

“撒謊。譬如說，有的人想当飞行員，就一天到晚搞模型啦，作滑翔机啦。”

“这算得了什么呢。我还知道飞行原理呀。”

我本来还可以这样来反駁他，說我每年都努力想在我們学校里組織滑翔小組。但是因为同学們对演剧特别感觉兴趣，所以这些小組都垮台了。除了我和瓦里亚以外，大家都想作演員。并且有好多人已經成为演員了，例如格里沙·法伯尔就是其中的

一个。

“可是我認为，”彼其加沉默了一会兒，說道，“你知道，一个人应該选择什么职业嗎？应該选择一种你自己覺得能够发揮全部精力的职业。这句話是从書上看来的，但是說得很对。我就相信，作一个画家我会发揮全部精力。那么說来你是有这种自信的罗？”

“我相信。”

“那算你有福气。”

到吃午飯的时候了，但这一次談話很有趣，我决定把彼其加送到家。

“你要知道，照我看来，你也不能不繪画，”我說，这时我們已走出学校，站在領子胡同拐角的地方了。“不信試上一两年，你定要留恋，还想再搞下去。总而言之，照我看来，你以为自己干什么也不成，这样想还是好的。”

“为什么？”

“因为这是一种‘怀疑’。”

“怎么‘怀疑’。”

“很簡单。真正的艺术家应当有所怀疑。他或者对这一点不滿意，或者对那一点不滿意。很好，你也在怀疑，”我热心地說道。“不，彼其加，問題很清楚：你应該进美术学院。”

他叹了一口气，搖了搖头。但看样子我的“怀疑”論投合了他的心意。

我們就这样在領子胡同边談边走。記得我們在戏报前面停下来一次，我一面听着彼其加談話，一面无意識地讀着戏剧名称，这时，从拐角后面突然跑出一位少女，迅速地穿过街去了。

这样的大冷天，她不戴帽子，穿一件短袖的連衣裙在街上

跑！大概因为如此，所以我沒有立刻認出是她来。

"卡佳！"

她回头看了一下，沒有停住脚步，只是揮了揮手。我追上了她。

"卡佳，你怎么沒有穿大衣？发生了什么事？"

她想說話，可是牙齿打起哆嗦来，她必需咬紧牙齿，克制自己，然后才說出話来：

"薩尼亚！我找大夫去，媽媽情况很不好。"

"她怎么啦？"

"不知道。我想她是服毒了……"

常有这样的时候，这时生活突然改变了速度——一切都开始飞奔，飞奔，变化之快，簡直使你来不及去观察。

当我听見："我想她是服毒了"这句話以后，一切都变化的快得来不及观察了，因此这句話有时在我心灵的深处可怕地重复着。

彼其加什么也不知道，可是什么也沒有問，他和我們一块兒跑到比明諾夫斯基胡同一个医生家里，后来又到另外一位住在从前汉若可夫电影院楼上的医生家里，我們三个人一块兒闖入他那宁靜的，收拾得很整齐的寓所，寓所里家具都蒙着罩布，还有一个很不討人喜欢的老太婆也仿佛是蒙在蓝色的罩布里。

她听我們說明了来意，不以为然地搖着头走开了。她順便还从桌子上拿走了一些东西，怕被我們偷去。

过了几分鐘，医生出来了。他是一个矮个子，紅脸膛的人，头发已經斑白，留着平头，口里銜着一支雪茄烟。

"怎么啦，年輕人？"

在他穿衣服的时候，我們一直站在門厅里，一动也不敢动，

蒙着罩布的老太婆也站在那兒，虽然門厅里已經实在沒有什么东西可以拿走了，但她还是不断地瞧我們。后来她把拖布拿来，擦抹我們的脚印，其实只有彼其加的套鞋淌下了一滩水，其它什么脚印也沒有。虽然卡佳的脸色那样着急，使我几次想和她說話又都不敢，可是医生还在慢騰騰地穿衣服。后来，彼其加只好留下来督促这位总是在穿衣服的医生快穿。彼其卡留下后，我們便先走了。

走到街上，我一句話沒說便将大衣披在卡佳的身上。她的头发散乱了，她一面走着，一面把头发綰住。可是一只辮子又掉了下来，她賭气把它塞到大衣下面。

急救車停在門前，我們不禁吓得止住了脚步。护士用担架抬着瑪丽亚·瓦西里耶芙娜从楼梯上走下来。

她躺在担架上，脸露在外面，脸色同昨晚在柯拉布略夫那兒时一样的蒼白，不过現在更象是用象牙雕刻的那样沒有人色了。

我紧貼着楼梯栏杆，讓担架过去。卡佳凄惨地叫了一声“媽媽”，便跟着担架走了。但是瑪丽亚·瓦西里耶芙娜并沒有睜开眼睛，也沒有动弹一下。看她那死人一般的样子，我就明白她是准死无疑了。

我怀着极为悲痛的心情站在院子里，看着担架被放进急救車里去，老太婆用两只顫抖的手将她的脚盖好，一个和大家同样口里冒着热气的护士从什么地方掏出一个小本子，請尼古拉·安东內奇签字，尼古拉好象生了病的样子，从眼鏡底下瞧着在本子上签了字。

“不是这兒，”护士恼怒地一甩手，然后将小本子放进工作服的大口袋里去。

卡佳跑到屋里穿上自己的大衣，把我的大衣留在厨房里就

回来了。她也坐上了急救車。这时車門关上了，里面躺着可怕的，已經变了样的，脸色惨白的瑪丽亚·瓦西里耶芙娜，急救車猛地一起动，就象一輛最普通的卡車一般往医院的急診部駛去了。

院子里就剩下尼古拉·安东內奇和老太婆两个人。他們一声不响地佇立了許久。后来尼古拉·安东內奇轉过身去，机械地迈着脚步，象是怕摔倒似的，首先走回屋子里去。我从来还沒有看見过他这个样子。

老太婆請我去迎一迎医生，告訴他不要来了。我連忙跑去，在凱旋广場一个香烟攤旁边碰見了医生和彼其加。医生正在买火柴。

"死了嗎？"医生問道。

我回答說沒有死，用急救車送到医院里去了，并且又說，如果需要出診費的話，我可以代付。

"不用，不用。"医生嫌恶地說道。

我答应彼其加明天把所有的事都告訴他，便和他分别了。当我再回到提維尔·雅姆路时，老太婆正坐在厨房里啜泣。尼古拉·安东內奇已經不見了，他到医院里去了。

"尼娜·卡比丹諾芙娜，"我問道，"也許你需要我給你作点什么事吧？"

她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哭了好久。我始終站在一旁等着。最后她請我帮她穿好衣服，我們便乘电車到急診部去了。

22 夜　　里

夜里，黑暗中我虽然躺在自己的床上，但仍然感覺到那种耳

畔呼呼作响的疾馳的速度，仍然在往什么地方飞奔。我恍然大悟，瑪丽亚·瓦西里耶芙娜昨天晚上还在柯拉布略夫家里时，就已經决定自杀了。

問題显然已經决定了，所以她才能那样鎮靜，那样猛烈地抽烟，和說那么一些极为奇怪的事。她有她自己那令人揣摸不透的思想过程，关于她的这个思想过程我們昨天是一点也不知道的。她所談的一切都和她所采取的决定有关。她并不是在問我，而是問她自己，然后又回答自己。

也許，她曾經希望是我記錯了，信里面談的是另外一个人。也許，她还指望我想起的那几句話，也是卡佳有意不告訴她的那几句話对她不至于那么可怕。也許，她还期待着那个为她死去的丈夫作了許多事，因而只能改嫁給他的尼古拉·安东內奇不至于有那么大的罪过，或者說不至于那么卑鄙无耻。

可是我这方面呢？我究竟干了些什么呢？

我感到一陣热，一陣冷，接着又是一陣热，于是我把被子掀开，开始深深地呼吸，以便定下心来冷靜地思索。我把这次談話在脑海里重新加以分析。我現在才懂了它的意思了！每一个字仿佛都在我的眼前緩緩地轉过，我又从另一面，秘密的一面看到了它們。

“我喜欢恩斯克，那兒太美了！多么好的花园！”她在这个时候去回忆回忆自己的青春年华，心中是甜蜜的。她仿佛是想和恩斯克訣别，因为現在一切都已經决定了。

“鷹爪蒙其哥瑪，我曾經这样称呼过他。”她的声音顫抖着，因为誰也不知道她曾經这样称呼过他，同时这也是无可置辯的証据，証明我沒有把話記錯。

“关于这些信的事，我沒有对他談过。况且他現在心緒十分

乱。暂时还不必提，对嗎？"这些話我昨天听来还覺得奇怪，可是現在它們的意思又多么清楚啊！他是她的丈夫，也許是她在世界上最亲近的人。她实在不願意使他苦恼，她知道，今后他的悲哀还多得很哩。

我早已忘記深深地呼吸了，我赤着脚老是坐在床上想来想去。她也想和柯拉布略夫訣別——原来如此！因为他爱过她，甚至也許比所有的人更爱她。她想和那种他們之間虽未达到，但她大概曾想望过的生活訣別。我一向認为她对柯拉布略夫是抱有幻想的。

早就該睡覺了，何况明天还有一次重要的测驗，何况想起在这不幸的一天中所发生的事又十分不愉快呢。

我仿佛是睡着了，但只是一会兒功夫。突然有人在我身旁低声地說道："她死了。"我急忙睜开眼睛，可是什么人也沒有；大概是我自己說的，不过沒有說出声来，是在心里說的。

这一来，我的脑子又不听話了，又回忆起了我和尼娜·卡比丹諾芙娜到急診部去的情形。我极力想睡，但我对自己实在是沒有办法，所以只好回忆下去。

……我們坐在門旁的一张白色长凳上，我当时并沒料到瑪丽亚·瓦西里耶芙娜的担架就在隔壁屋子里，离我們那么近。

这时有一位中年护士走出来問道：

"你們是来看塔塔林諾娃的嗎？不要入門証可以进去。"

她匆匆忙忙亲自給老太婆穿上白罩衫，并且系好了扣。

我心里打了一个寒噤，立刻就明白了，假如入門証都不要了，那就是說她的情况很不好，——接着心里又打了一个寒噤，因为那位中年的护士走到一位正在登記病号的年輕些的护士身边，年輕的护士問了她一些什么話，中年护士回答說：

“恐怕不行了。好歹才抬到这里来。”

随后我就等起来了。我向着白色的房門里张望，似乎瞧見他們——尼古拉·安东內奇，老太婆和卡佳都围在瑪丽亚·瓦西里耶芙娜的担架周围。后来里面走出来了一个人，房門敞开了一会兒，我才看見滿不是那么回事，里面什么担架也沒有，只看見一个黑头的白东西躺在一张矮沙发床上，在这个黑头的白东西前面有一个也穿着白衣裳的人跪在那兒。我还看見一只裸露的手臂从沙发床上垂下来。这时門砰的一声关上了。随后传出了一声嘶哑的尖叫；正在登記病号的护士停下笔来，沉默了一会兒，接着便又开始登記和对人解释。我不知道自己当时是怎样理解所发生的这一切事情的，不过我知道刚才是尼古拉·安东內奇在叫。他的声音会那么尖？尖得象小孩子的声音一样？

中年护士从門里走出来，带着一种做作的忙碌的样子和一个手里搓揉着帽子的青年談起話来。她向我看了一眼（因为我是和尼娜·卡比丹諾芙娜一块兒来的），但赶忙就将目光移开了。于是我明白瑪丽亚·瓦西里耶芙娜已經咽气了。

后来我又听見护士同一个人說：“眞可惜，多么漂亮的一个女人。”不过这时候已經完全象是在作梦，也可能說这話的不是她，而是卡佳和老太婆从瑪丽亚·瓦西里耶芙娜去世的那間屋子里走出来时，另外一个人說的。

23 恢复旧規。不是他

这是非常令人伤心的几天，所以我不願意詳細地去記述它，虽然每一次談話，每一次会面，甚而差不多每一个念头我都記得

很清楚。这些忧伤的日子象是一个巨大的阴影籠罩着我的生活。

瑪丽亚·瓦西里耶芙娜殯葬以后，我便立刻埋头到工作中去了。我感到自己在頑强地工作和学习时，便能产生一种自我克制的力量，能使自己什么也不去想。假如这时彼其加再問我，在我的生活中，有沒有一件行为可以断定我能够成为飞行員时，我仍旧会回答他說"有"——而且这一次更有根据了。

这些事的确叫人不好受，特别是想到在瑪丽亚·瓦西里耶芙娜出殯的时候，我走到卡佳跟前，她却轉过身去不理睬我。

直到现在，想起这一点还不免激动。諸位可以設想我当时的感覚，所受的刺激和不安的心情。

事情的經过是这样。瑪丽亚·瓦西里耶芙娜出殯时，出乎意料地来了許多人——她的同事和她在医学院的同学。她生前似乎一直是有点孤僻，但是結果情况却并不是这样，很多人都認識她，喜欢她。棺材总不見抬出来，一群陌生的人低声交談着，对着大門望了許久，在这些人中間站着柯拉布略夫，他的眼睛显露出疲憊不堪的样子，浓密的鬍子在又瘦又老的脸上显得格外的多。

我很久以前就注意到，亲人总是陪伴棺材一块兒出来的，站在門口照料殯仪的都是一些外人。但这次却不一样，大概是因为亲人中沒有可以抬灵的。

尼古拉·东安內奇低着头站在一傍，尼娜·卡比丹諾夫娜牵着他的手。虽然他站得挺直，但使人感到她是在扶着他。布宾其可夫家的三个老太婆也在場，她們穿着旧式的拖着长后襟的黑衫，很象是几个修女。

卡佳站在她們旁边，两眼执拗地望着大門。她的辮子大約沒有縮好，所以帽子有时滑到前額上。从她理弄帽子时那种不耐煩的动作，也能看出她內心的悲痛。但是不管她多么悲痛，她的

脸还是紅潤紅潤的。

大家已經等候了半小时，棺材还沒有抬出来。这时我突然决定走到她跟前去。

我并不知道在这种时候走到她跟前去可能是很不恰当的。可是我当时实在希望同她談話，哪怕是談一句話也好。

“卡佳。”

她看了我一眼，就把脸扭过去了……

我整天埋头在書本中。我又恢复了自己的旧規：每天六点起床，用冷水洗澡，在敞开的窗子前面作早操，按日程表工作。我从前制定的“意志鍛炼規則”現在又用上了，特别是“隐藏自己的威情，至少要不暴露威情”这一条。虽然我的心情一天比一天沉重，但是我沒有暴露出来。我上面說过的那个巨大的暗影仿佛更加向我逼近，起初我是远远地看到它，后来便越来越近了。

这是我在学校里的最后半年了，我希望各科都能“及格”。这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特别是文学課。

有一次，虽然李和还是唉声叹气，躊躇再三，但終究还是給我評了个“及格”。毕业作文我倒不害怕，只消大笔一揮，便可立即写成一篇作文，并且完全符合这个笨蛋的要求。我知道，他为了自己的面子起見，也会給我最高分数的。

我这时在全班中已經名列前茅，只有瓦尔加在我前面。不过他是因为有突出的才能，此外，还比我聪明得多。

暗影越发逼近了。柯拉布略夫碰見我时那付勉强的样子，好象他看見我就很难受似的。尼古拉·安东內奇不到学校里来了，虽然已經沒有人再提我們在教务会議上冲突的事，可是大家却时时以一种責难的眼光看我。仿佛他在教务会議上感到不舒适而暈倒和这次瑪丽亚·瓦西里耶芙娜的逝世这两件事，已經

将他完全洗乾净了似的。

所有的人見着我就露出难过的样兒。我从沒有这样的孤独过。

不过这时我还不知道一个打击在等待着我。

有一次，在瑪丽亚·瓦西里耶芙娜死后两星期，我到柯拉布略夫那兒去，想請他同我們一块兒去地質博物館（我那时担任少先队輔导員，同学們請我带他們去参观这个博物館）。我們在低年級时曾經同柯拉布略夫去过一次，我記得那是很好玩的。

可是他出来見我时样兒显得异常激动，并且請我改日来。

"甚么时候呢，伊万·巴甫雷奇？"

"不知道，以后再說吧。"

前厅里挂着皮大衣和皮帽子，小桌上放着褐色的毛織围巾，这条围巾老太婆以前曾經当着我的面織过。这是尼古拉·安东內奇到柯拉布略夫家里来了。

我走了，无精打采地拿起"空軍的回顧与前瞻"这本書来——我記得当时正在讀这本書。但讀不下去——心不知飞到哪兒去了，因此每讀一頁，都得按照"意志鍛炼規則"提醒自己一次。尼古拉·安东內奇到他这兒来干什么？他已經快四年沒有到柯拉布略夫家来过了。柯拉布略夫为什么这样激动呢？

当我回到他那兒时，尼古拉·安东內奇已經不在了。我現在还記得，当时爐子里升着火，柯拉布略夫穿着带口袋的寬大的絨衣，这件衣服常常是他在微醉或者身体不适时穿的，他坐在爐边，望着爐火。我走进屋子里时，他抬起头来說道：

"你搞些什么呀，薩尼亚！我的上帝，你搞些什么呀！"

"伊万·巴甫雷奇！"

"我的上帝，你搞些什么呀！"柯拉布略夫拼命地重复道。

"这本来不是他，不是他呀！他有憑有据，无可爭辯地証明了这幷不是他。"

"我不明白，伊万·巴甫雷奇。您說的是誰？"

柯拉布略夫站起来，又坐下，繼而又站起来。

"尼古拉·安东內奇来过我这兒。他向我証明，說船长信里面所指的不是他。是另外一个尼古拉。一个工厂主維什米尔斯基爵士。"

我感到非常惊訝。

"伊万·巴甫雷奇，这是謊話，他完全是撒謊。"

"不，这是实情。"柯拉布略夫說道。"这是一件大事情，詳情我們一点也不知道。其中涉及到許多人，有商人，有供应人員，船长从一开始就知道这些事情。他知道探险队的装备很差，所以曾經写信告訴尼古拉·安东內奇，我亲眼看見了这些信。"

我听着他說这些話时，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不知为什么，我过去一直認为我在恩斯克找到的信是惟一的信。因此，一听說船长还有一些信被保存着的消息，我感到极为惊訝。

"其中有許多倒楣的事，"柯拉布略夫繼續說道。"在临出海前，有个船主把船員都撤走了，費了好大劲兒弄到手一部无綫电报机，又因为找不到电报員，所以又不得不把它丢下。还有其它的一些事，这何尝都是尼古拉·安东內奇的錯誤呢？問題本来很清楚，我的上帝！可是我……我曾想到这点……可是我……"

他还沒有說完，我突然看見他在哭泣。

"伊万·巴甫雷奇，"我竭力不去看这幅难以令人置信的情景——柯拉布略夫在哭鼻子。"那么，这就是說他沒有錯，而是一

位什么‘爵士’在里面搗的鬼。既然这样的話，为什么尼古拉·安东內奇过去总是一口咬定，說这件事是他領导的呢？請您問問他，探險队带了多少肉羹粉，多少通心粉，面包干和咖啡。为什么以前他从沒有提到过这位‘爵士’呢？”

柯拉布略夫用手絹擦干了眼睛和鬍子。从壁厨里取出伏特加酒，手顫抖着斟了半杯，又倒回去了一点。他一口将酒喝尽，便坐了下来。

“算了，現在橫竪都是一样了。”他把手一甩。“我簡直是瞎了眼睛，瞎得太厉害了！”突然他絕望地說道。“我当时应該开导开导她，說明这是不可能的，不可置信的，縱令眞是尼古拉·安东內奇，那么也不能把这么大的一件事业的失敗归咎于一个人。我本来可以告訴她，說你坚持認为是他，那是因为你恨他。”

我一声不响地听他說。我过去一直很爱他，养成了尊敬他的习慣，所以看到他这副可怜相感到很不愉快。他象个婆娘一般哭鼻子，头发和鬍子也弄得乱蓬蓬的。

“关于我是不是恨他，”我很鎮定地說道。“这一点与問題本身沒有絲毫关系。我不明白，你說这話是什么意思。你說我是故意坚持，那也就是說我是出于一种卑鄙的私人的动机罗？”

柯拉布略夫沒有作声。

“伊万·巴甫雷奇！”

他仍然沒有作声。

“伊万·巴甫雷奇！”我怒声喊道。“你以为我有意攪到这件事情里面来是为了报复尼古拉·安东內奇。所以您才說即使眞是他，而不是某一位‘爵士’，反正也不能把这么大的一件事业的失敗归咎于一个人。您認为全是我的錯？您說呀！是嗎？您是这

样看法嗎？”

柯拉布略夫一声不吭。我眼前一陣发黑，听見我的心剧烈而迟緩的跳动声。

“伊万·巴甫雷奇，”我声音顫动着，但是很坚决地說道。“現在我即使是死，也要証实我是对的。我一定要証明这一点，我今天就去找尼古拉·安东內奇，請他把这些文件和書信給我看看。他能說服您，使您相信信里說的不是他，而是某一位‘爵士’。那么讓他也把我說服吧。”

“随你的便吧，你願意怎样就怎样好了。”柯拉布略夫垂头丧气地說道。

我走了。他一动也沒有动，疲憊地坐在爐边，陷于极端絕望之中。我們两个人都感覚到悲观失望，但是我除了悲观着急之外还有一种抑制着的憤怒，而他却处在絕望的疲憊中，孤零零的一个老人留在空虛、冷清的寓所里。

24 誹　謗

話說起来是容易的：我去找他，請他把这些信給我看看。我甚至想着这件事都覚得討厌。他眞会同我談話！他要是把我从楼梯上赶下来，那就一切都完了。我是不会和他打架的。他終究是个病号，而且是个上了岁数的人。

我本来不想去了。可是有一种思想使我不能不去，这就是卡佳的問題。

当我想到她送殯时扭头不理我的那种冷酷的样子时，脑袋就痛起来。現在我才明白她为什么这样作。原来尼古拉·安东

內奇使她相信了这一切的錯誤都在我身上。

我想象着他和她談話的情形，心不住地跳动。他一定这样說："哼！你那个朋友的記忆力眞不錯。为什么他去恩斯克以前一次也沒想到过这些信呢？"

其实我怎么会忘記了这些信呢？我这个从小就被这些信所深深感动的人能忘記嗎？我这个曾經在恩斯克到莫斯科的火車上背誦过这些信的人能忘記嗎？怎么能忘記这些仿佛是从遙远的星星上落到我們小城里来的信呢？

我只有一个解释，請諸位自己判断一下这个解释是不是正确。

当卡佳对我講起她父亲时，当我从那些旧相片上仔細端詳穿着白制服上衣，佩着肩章，戴着海軍帽，帽上套着后面翘起的白帽套的他父亲的相貌时，当我讀他的書时，我总覺得这是很早很早以前的事，至少是在我离开恩斯克以前多少年的事了。可是这些信件却是我小时候的事，也就是說，完全是另一个时期的事。我根本就沒有想到，这两个完全不同的时期会前后貫穿在一起。这不是記忆的錯誤，而完全是另一种錯誤。

我把那位"爵士"想了千百次。那么塔塔林諾夫船长写的："全探险队都在咒駡他"这句話是指的他罗。那么"我們的这一切失敗都应归咎于他"的这句話也是指的他罗。可是柯拉布略夫却說什么，这么件大事业的失敗不能够归咎于一个人。可見船长并不是这样想的。

"他这种亲屬的帮助使我們付出了多大的代价"，那么这也是說的他罗。可是老实說，这位某"爵士"憑什么要对塔塔林諾夫船长这样帮助呢？能够对他这样帮助的是他这位闊气的堂兄，我听他說过多少次关于这样帮助的事，他并不是无緣无故才說的。

总之一句話，一直到二月二日晚上，当我穿了一件講究的青色夹克，来到塔塔林諾夫家，对給我开門的一个陌生的女郎說，我想見尼古拉·安东內奇时我还沒有一个行动計划。

从敞开的門中，可以看到餐厅里正在用茶。尼娜·卡比丹諾芙娜在低声說話，我看見她围着一块条花披肩坐在茶炊旁边。

不知道尼古拉·安东內奇走到門口看見我以后脑子里都想了些什么。他打了一个寒战，稍微往后退了退。

"你要干什么？"

"我想和您談一談。"

他沉吟了一下。

"进来。"

我想到他的書房里去，但是他說道：

"不，到这兒来。"

事后我才猜到他这是有意这样作的：他把我誘到餐厅里去，为的是当着众人的面整我。

我随着他走进餐厅时，大家都有些吃惊。我根本沒料到会在这兒看見布宾其可夫家的三个老太婆，她們同时跳起来。在恩斯克赶过我的那个老太婆把茶匙掉到了桌子上。卡佳正好从另一边走进餐厅里来，一下子便在門口呆住了。

我含含糊糊地低声說道：

"也許这兒不太方便吧？"

"不，这兒很方便。"

本来在一进門时，我就应該先向大家問好，可是現在已經晚了一些，或許就用不着了。不过我还是鞠了一躬。誰也沒答礼，只有尼娜·卡比丹諾芙娜隐隐約約地点了点头。

“要談什么？”

“您对伊万·巴甫雷奇說，塔塔林諾夫船長曾写信給您談过一位維什米尔斯基爵士。我需要知道这个問題，否則，好象我只是为了使您下不了台，才故意要瑪丽亚·瓦西里耶芙娜相信我的話的。比如說，柯拉布略夫，还有另外一些人就是这样認为的。总之一句話，我請您把这些信給我看看，因为您想利用这些信来証明探险队的罹难是一位維什米尔斯基爵士的錯誤，而……（我把这个名字咽下去了）的死，以及其他的一切都是我的錯誤。”

这是一番相当長的話，不过因为我事先有准备，所以很流利地說完了。只是在說到瑪丽亚·瓦西里耶芙娜的死，以及后来說到“另外一些人”时，因为想到卡佳才有点兒結巴。卡佳仍然屏着呼吸直挺挺地站在門口。

在講这番話的时候，我才发现尼古拉·安东內奇变得很老了。他象一只長着鈎鼻子的老鳥，两腮深深地陷下去，就是連以前那顆使得他满面生光的金牙也黯然失色了。

他喘着粗气听着我說話，似乎不知道該怎样回答我才好。但正在这时，布宾其可娃第二惊訝地問他道：

“他是誰？”

他換了一口气才說起話来。

“他是誰？”他从牙縫里低声重复了一次問話。“这就是我和你們常常談到的那个卑鄙的，造謠生事的家伙。”

“尼古拉·安东內奇，假使您想罵街……”

“这就是杀死了她的那个家伙，”尼古拉·安东內奇又重說了一遍。他的脸抖动起来，并且开始扭手指，“这就是那个憑空捏造出最可怕的謠言来誹謗我的家伙。可是我还活着！”

“誰也沒有認为你死了。”我正想这样告訴他。但他又咆哮起来：

“我还活着！”

尼娜·卡比丹諾芙娜拽住他的手。他挣脱开。

“我本来可以依法控告他，讓法院审判他的一切……审判他为陷害我而干的一切勾当。不过还有另外一种法律，另外一个法庭，依据这种法律，終有一天他会了解到自己所干的一切的。他害死了她，”尼古拉·安东內奇說到这里，眼泪扑簌簌地落了下来。“她因为他才死的。讓他苟活下去吧，只要他能够……”

尼娜·卡比丹諾芙娜推开椅子，架着他，仿佛害怕他馬上就会摔倒似的。他恍恍惚惚地看了看她。这是我对自己过去的看法是否正确这一点也动搖了的一分鐘。不过仅仅只是一分鐘。

“由于誰？我的上帝！由于誰？”尼古拉·安东內奇繼續說道。“由于这个下流的乳臭小鬼，他居然这么无耻，还敢回到她去世的这个屋子里来。由于这个血液不純的小鬼……”

我不知道，他說这話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他的血液就一定比我的純洁。不过这也沒有关系！我一声不响地听着他說。卡佳站在墻边，身子挺得笔直。

“……还敢回到我曾經把他象毒蛇一样扔出去的屋子里来。这是什么命运，我的上帝！我整个生命都交給了她，凡是一个人为自己所爱的人能作到的我都为她作了，可是她却因为这个卑鄙无耻的毒蛇断送了性命，因为这条毒蛇对她說，我，其实幷不是我，一直在欺騙她，說我害死了她的丈夫，害死了我自己的堂弟。”

他那样不顧一切，全然忘記了自己的說白使我深深惊訝。我感到我的脸白得厉害。不过这也沒有关系！我知道該怎样回

答他。

“尼古拉·安东內奇，”我竭力使自己不要激动，然而却发觉我的舌头不很听話。“我不打算回答您的这些形容詞，因为我了解你現在的心情。您的确把我赶出来过，但是我又来了，并且将来还要来，直到証明在瑪丽亚·瓦西里耶芙娜服毒的这个問題上，我絲毫沒有錯誤才算完事。如果有人錯了，那无論如何也不是我，而是另外的什么人。不錯，您掌握着已故船长塔塔林諾夫的一些信，您利用这些信使柯拉布略夫相信，显然也使所有的人相信，是我誣蔑了您。請您把这些信給我看看，好讓大家都能相信，我的确就是您刚才所說的那条卑鄙的毒蛇。”

这一番話掀起了一陣极大的騷动。布宾其可夫家的三个老太婆还是不明白出了什么事，争先恐后地乱嚷：

“他是誰?!”

但是誰也沒向她們解释我是誰，她們越嚷声音越高。尼娜·卡比丹諾芙娜也对着我喊叫，要我出去。只有卡佳一句話也不說。她站在墙边，一会兒看看尼古拉·安东內奇，一会兒看看我。

突然大家都靜了下来。尼古拉·安东內奇推开老太婆，跑到了自己的屋子里去。过了一分鐘，他手里抱了一大包信回来。不是两三封，而是一大包——約摸四十来封。我并不認为这些都是塔塔林諾夫船长写的信，确切一点說，是各类不同的人写的各种不同的信——有关探险队的書信或材料。他把这些信对着我的脸擲过来，繼而又对着我的脸啐了一口，然后倒在安乐椅上。几个老太婆蜂拥到他的跟前去。

假使他这口唾沫眞的啐到我的脸上，那我很可能会揍他，甚至打死他；从来还沒人敢啐过我，我可以不顧自己的一切意志鍛

炼规则为这件事情打死人。不过他沒唾上，信也沒有擲到。

很明显，我是不会去拾这些信的，虽然有一刹那，我差点兒撿起其中一封上面有一个很大的“圣·瑪丽亚”火漆印的信来。我沒有去撿它們。我是最后一次到这家人家了。卡佳紧咬着牙齿，按着胸口，靠着安乐椅站在我們中間，安乐椅上面躺着尼古拉·安东內奇。我正对着她的眼睛，看了看她，因为这是最后一次看她了。

“算啦，”我說。“我不想看这些您朝我脸擲来的信。我想别的办法。我不相信探险队会无影无形地失踪，我一定要找到探险队，到那时候再来看看，我們两个究竟誰对。”

我本来还想和卡佳道别，并且告訴她，我永远也不会忘記她母亲出殯时，她轉过脸去不理我的事。可是，这时尼古拉·安东內奇突然从安乐椅上站起来，于是又掀起一陣可怕的騷动。布宾其可夫家几个老太婆全向我拥过来，抓起什么东西朝我的背上打，打得我的脊背生痛生痛的。我把手一甩便走了。

25　最后一次約会

我从来沒象这样孤独过。我更加頑强地鑽到書本中去了。我变得好象完全不会思索了。这样也很好，最好能不思索。

我突然想到自己可能会因为健康条件不合格考不上航空学校，因此，便开始作体操，各种跳跃运动，燕式平衡，“桥”式动作，倒立。我每天早上都要摸摸肌肉，检查检查牙齿。特别使我揣揣不安的是这該死的身高。我覺得由于許多不如意的事，使我的身材好象最近又变矮了一些。

然而在三月底，我还是把証件准备好，寄到了国防航空化学建設后援会去。我在証件上附了一个要求——希望能送我到列宁格勒空地勤航空学校去。

关于我为什么想离开莫斯科的問題大概不需要再解释了。

彼其加也打算去列宁格勒。他已經最后决定进美术学院。薩尼亚也抱着同样的目的。

我曾經捏塑过男爵克洛德的馬兒，所以我对列宁格勒的概念也和桥上的那些奇妙的馬有着联系。我以为在列宁格勒是一步一个紀念塔，一步一座大理石建筑物。彼其加建議我讀讀"青銅騎士"，所以我更加渴望能瞻仰一下这座美丽的城市。不过，他們当然也可能将我留在莫斯科，也可能把我送到塞瓦斯托波尔去。

我和彼其加在春假期間回恩斯克去了一趟，而且仍然沒有买票，因为我們想把錢攢起来到"出校后"使用。

不过这一趟旅行完全非同昔比，同时我自己在这半年里也完全变成另一个人了。达莎阿姨看見我不禁哎喲一声叫了起来，法官却說这样一副模样兒应当依法受审，并且他"将采取一切措施，弄清'被告'之所以精神失常的原因"。

不过关于这些原因"被告"一点也沒有告訴他。被告滿怀抑郁在教堂花园，在鉄栏杆一带的河岸上，在他不久前曾經指給那个梳着辮子，戴着沒有放下遮耳的灰色絨帽的"原告"看过的地方往返徘徊。

关于这件事我只告訴过彼其加，而且还很簡单，只講了同柯拉布略夫的談話，講了尼古拉·安东內奇如何对待我。然而彼其加却从令人意想不到的角度来看待这件事。他听完了我的叙述以后，用鼓励的口气說：

"听我說，万一你会突然找到呢！"

"找到什么？"

"探险队。"

"我会突然找到的，"我暗暗地想道。

好象有一些小虫子从我脸上爬过，我感到又是喜欢，又是恐怖。"我会突然找到的"。好象在遙远的童年时代，曾經在我脑子里想象过的那一幅幻灯画又呈現在我的眼前：白色的帐篷搭在白茫茫的雪地上，一群狗喘吁吁地拖着雪橇。一个身材魁梧的巨人，穿着长筒毛皮靴迎着雪橇走来，我也穿着长筒皮靴，戴着大皮帽子，銜着烟斗；站在帐篷的門口。

彼其加在恩斯克的举动可以說是很奇怪的。他的情緒总是很好，难怪法官在每次午餐时都对我挤眉弄眼，并且把談話引到早婚的益处上。薩尼亚这时脸羞得緋紅，彼其加則是一脸迷迷糊糊的样子听着他講，不停地吃着……看到他那副样兒，我便推测到自己在寒假时大概也是这样的：吃得很多，对于别人跟我說的話，总是了解得迟鈍一些。不过我現在却感到他們的关系也沒什么大了不起的。

我在恩斯克无时无刻不想念着卡佳。我在薩尼亚的書里找到一本"牛虻"，我讀着这本优秀的小說，发現主人公"牛虻"的經历和我的非常相似。我現在也和"牛虻"一样遭到了誣蔑；他心爱的姑娘离开了他，同样我心爱的姑娘也离开了我。我想象着我們經过了十四年以后重逢的情形，她那时已經不認識我了。我要象牛虻那样，指着自己的相片問她：

"我可以冒昧請問这是誰嗎？"

"这就是我告訴过您的那个朋友童年的照片。"

"就是您害死的那个人嗎？"

她打了一个寒噤，認出是我。于是我将把証明我是正确的一切証据擲在她的面前，拒絕同她和好。但是这样的会面希望太小了！我內心里深信自己是正确的。不过有时，特别是当想到那位可詛咒的某“爵士”时，我心里就打寒战。在我到恩斯克以前不久，柯拉布略夫告訴过我，尼古拉·安东內奇曾經把塔塔林諾夫船长讓尼古拉·伊万內奇·維什米尔斯基爵士办理探险队一切事务的委托書給他看过。

“你錯了，”他簡截了当，毫不顧情面地說道……

我一个人回到莫斯科去，彼其加因为感冒了，所以留在恩斯克多住几天。我有这么一个印象，觉得他是故意感冒，无論怎样吧，至少他是滿意这場病的。

我在恩斯克非常寂寞，我有一个感觉，好象只要回到莫斯科，拿起書本来，我就会沒时間感到寂寞了。然而时間总是有的。寂寞的时間依然有。我整日沉默寡言，滿腹怨气經常在校园里踯躅躑躅……

就在这些日子里，我和同班的瑪尔登諾娃打了一架。我因为她作賊打了她一記耳光：她偸了丹娘·薇莉琪珂的自来水笔，后来还企图誣賴瓦尔加，另外，多多少少也因为她是个毛丫头。

第二天，团支部把我叫去問是怎么一回事兒。我們和毛丫头是同志关系，然而和她們打架，特别是在最高班，这总是說不过去的。我說因为瑪尔登諾娃是个卑鄙的家伙，至于她是个毛丫头这一层并不重要。如果我打了毛小子一記耳光，支部会不会把我叫来呢？

同学們想了想，就同意說不会的。

有一次，我从外面回来，在校門口邮递員給我們放信件的桌子上发現有一封用邮箋写的信：“九班亚·格利高里耶夫收”。

我把信拆开，上面写道：

“薩尼亚，我希望和你談談，如果你有功夫，請在今天七点半到凱旋路街心花园来。”

回想起来眞是可笑；我刚一看完了这封信，好象一切頓时都改变了。我在楼梯上碰見李和时，給他敬了个礼，中飯时我把我的古里耶夫粥[1]全給了瓦尔加，甚至瑪尔登諾娃也不再使我感到那么下賤了——或許不該打她一耳光，何况她毕竟是个毛丫头呀。

已經六点鐘了。六点半。七点。七点鐘我就到了街心花园。七点一刻。七点半。天色漸漸黑下来，路灯还沒亮。各种各样可笑的想法在我脑子里盘旋着：“要是路灯不亮，我就認不出她来……要是灯亮了，而她不来呢……路灯不亮，她也認不出我来……”

路灯豁然亮了，眼前是我所熟悉的花园，我和彼其加曾經打算到这兒来卖香烟，春天里我曾經千百次地在这兒啃过書。花园里这样嘈杂，只有十七岁的年輕人才能够在这兒啃書。这是一座古老的花园，我們的学校，还有第一三四和第二八两个学校的人常常在这兒幽会。这个花园仿佛在逐漸改变，变成了一座剧院。我們就要会面了。那不是她嗎！

我們互相問过好就沉默下来了。这天是四月二日，天气很暖和，但一会兒忽然飘起雪来了，仿佛是有意要使我終生記住这一天。

“卡佳，你来了我很高兴。我也是早就想和你談談。那天在你們家里我什么話也不能說，因为尼古拉·安东內奇大吵大

① 古里耶夫是苏联城市名。古里耶夫粥是一种加上切碎的水果和糖煮成的粥。——譯者注。

鬧的那种場面，根本談不到解释什么問題。当然，如果你相信他……"

我怕說完这句話，因为：如果她相信他，那么我就应当离开这个街心花园。在这个花园里，我們脸色蒼白，严肃地坐着談話，避免去看对方；在这个花园里好象除了我們两个人以外再沒有旁人了，虽然情况并不是这样，每一张椅子上都有人坐着，还有那个矮小的，恶狠狠的看守人也在园中小径上一瘸一跛地走来走去。

"我們不要再談这件事了吧。"

"卡佳，我不能不談这件事。总而言之，要是你相信他，那么我們也就沒有什么可談的了。"

她滿脸忧伤，完全象个成年人那样看着我，她比我老練得多，懂事得多。

"他說一切都是我的錯。"

"你的錯!?"

"他說，旣然我最先相信了爸爸信里說的就是他这种不近人情的想法，那么一切就都是我的錯。"

我回想起有一次柯拉布略夫对瑪丽亚·瓦西里耶芙娜提到他时說"請相信我，这是个可怕的人"。我想起船长信里写到他时說"我恳求你，不要相信这个人"。而这个人現在竟使卡佳相信一切都是她的錯，是她害死了自己母亲，是她夺去了他在世上唯一的幸福，所以她对他是有罪的，并且使她相信，只有他一个人知道，在她犯了这样的罪行之后現在应該怎样来安排她自己的生活……，我想到这一切不禁感到毛骨悚然。这一切都是慢慢地，日积月累形成的。他那些又臭又长的話，使人听了就要头昏。

我掙扎在絕望和恐怖中。

"現在他还可以嘮叨十五年，說你有过錯，使你最后也象瑪丽亚·瓦西里耶芙娜那样相信他。你难道不懂得这是一桩把柄嗎？如果你承認有过錯，那么他就会抓到可靠的把柄来要挾你，他要你作什么，你就得作什么。"

"我要离开这兒。"

"到哪兒去？"

"还不知道。我决定申請到地質勘探队去，毕业后就走。"

"到那时候你哪兒也去不成了。現在也許你还能走，可是四年以后……我担保，你哪兒也去不成了……他会把你說得团团轉。瑪丽亚·瓦西里耶芙娜不是相信他是一个慈善而高尙的人，并且，最主要的是相信自己受他的百般关怀而对他負了債嗎。他为什么又来纏你呢！他不是說过一切都是我的錯嗎。"

"他說你簡直是个凶手。"

"唔。"

"說把你枪斃了，他也覚得沒有什么。"

"好哇，除了他以外别人都有錯兒。不过我告訴你，他是个最卑鄙的人。世界上居然有这种人，想起来都覚得可怕。"

"不要再說这件事了……"

"好吧。現在你談談，在这些胡說白道之中你相信他哪点吧？"

卡佳沉默了許久。我又挨着她并肩坐下。我怕得很，不过还是握住她的手，她沒有避开，也沒有把手縮回去。

"我相信你并不是故意說那是他。因为你的确認为是他。"

"現在还这样認为。"

"不过你不应該劝我也相信，更不該劝說媽媽。"

"但那是他呀……"

卡佳把身子挪开一点兒，想把手縮回去。

"不要再說这件事了吧。"

"好吧，不說了。总有一天我会証明是他，哪怕我会为这件事費去一生的光阴。"

"不是他。如果你不想要我离开这兒，那就不要再說这件事了。"

"好吧，不說了……"

我們再也沒談这件事。她問我过春假的情形，問我在恩斯克怎样度过的，問我薩尼亚和老人家的生活怎么样。我轉告她說老人家和薩尼亚向她問好。可是我一点兒也沒有告訴她自己在恩斯克沒有她是多么寂寞，特别是一个人在我們共同到过的地方徘徊的时候；我沒有告訴她彼其加吃得特別多，而且总是非常兴奋；也沒有告訴她說我覚得他們的关系也沒有什么大了不起的。我現在不知道她是否还爱我，虽然我时刻想問她，但在这个当兒，却不能問。現在当我們脸色蒼白，很严肃地坐着談話的时候，当卡佳那么酷象她母亲的时候，甚至連說一句这样的話也是不行的。我只是回忆上次我們从恩斯克回来时，我們怎样用手指在結冰的玻璃窗上写字，窗外怎样突然展現出一片盖滿了雪的昏暗的原野。从那时候起一切都变了。我們現在已經不能象过去那样互相对待了。但是我多么想知道她現在是爱我，还是决定以后再不爱我了。

"卡佳，"我鼓足了勇气，突然問道，"你还爱我嗎？"

她打了一个寒噤，詫异地看了看我。后来她的脸突然一紅，把我拥抱住了。她拥抱了我，我們閉着眼睛互相吻着——至少我的眼睛是閉着的，不过大概她也是閉着眼睛的，因为后来我們

是同时睜开的眼睛。我們在凱旋路的街心花园里，在莫斯科的中心接吻，在这个街心花园里有三个学校——我們的学校，一四三和二八学校可以看見我們。但这是辛酸的一吻，这是别离的一吻。虽然分别时我們約定了以后再見面，但我感觉到，这一吻是永别的一吻了。

卡佳走了以后，我还独自留在花园里，怀着忧伤的心情久久地徘徊在园中小径上，坐在这张椅子上，走了又回来。我摘下帽子，我的头象火烧一样，心里十分痛楚，十分煩悶。我不忍离去……

我回到家里时，床前小桌上放着一个大信封，上面盖着国防航空化学建設后援会的关防，信封上又粗又大地写着我的姓，名字和父名。我有生以来还是第一次受到别人这样連名和父名一起称呼我。我用发顫的手撕开信封。国防航空化学建設后援会通知我，說我的材料已經审查合格，应在五月二日到航空学校体格检查委員会去参加入校检查。



第四部　北　方

1　航空学校

一九二八年夏天。我手里提着一个小包裹出現在列宁格勒街头。包裹里放着“出校补助品”。兒童敎养院的学生在毕业后都可以領到一份“出校补助品”，包括一把湯匙，一个茶缸，两套內衣和“初出校住宿必需品”。我和彼加住在我校的一位老校友，当时在电力厂当鏇工的西瑪·金斯布尔格家里。西瑪的母亲很怕房屋管理員，因此我每天早上把“初出校住宿必需品”拿走，到晚上再搬回来，装作是刚来的样子。我們在食堂里吃飯；每逢双日花十五个戈比买第一道菜吃，逢单日花二十个戈比买第二道菜吃。我們常常在这个寬闊，舒暢的城市里，沿着寬闊的涅瓦河河岸漫步，彼加在列宁格勒覺得自己象是回到了家里一

样痛快，他給我講“青銅騎士”的故事，可是我心里却在想“能不能考上？”的問題。

先后要通过三个委員会——体格检查委員会，資格审查委員会和学科考試委員会。心脏，肺，耳朵，又是心脏！我的名字叫什么？生在哪兒？曾在什么学校上学？为什么想作駕駛員？

我是不是眞有十九岁？是不是虛报了年龄——看样子似乎是小一些！为什么在区委員会的介紹信上签字的也是格利高里耶夫？这人究竟是誰？是我的哥哥，还是同姓？

决定命运的一天終于来到了！我站在航空博物館前，我們就是在这兒进行考試。这是座落在罗沙里大街上的一幢大楼，門前摆着石獅子。彼加說这些石獅子就是“青銅騎士”書中所描写过的，叶夫根尼仿佛就是騎在这些獅子身上脫离水灾的，——直到現在，我还不知道这話是不是眞的。我这时已經沒心思去研究什么普希金了。獅子瞧着我，那副神气就好象也要問我：叫什么名字？生在哪兒？是不是眞有十九岁？

然而眞正可怕的时刻还是在我走上二楼，在黑暗的橱窗中找那张航校录取名单的时候。

我念着：“符拉索夫，沃罗諾夫，戈洛布，格里布柯夫，杰尼夏克……”我眼前一陣发黑：我沒有考上！我重又念道：“符拉索夫，沃罗諾夫，戈洛布，格里布柯夫，杰尼夏克……”我沒考上！我鼓足了劲兒尽量吸了一大口气，以便能够沉着地讀完名单：“伏拉索夫，沃罗諾夫，戈洛布，格里布柯夫，杰尼夏克……”我看着这张名单；这张名单上仿佛除了沒有我的姓，全世界所有的姓都有了，我不禁感到如同不想再活下去时那样的苦恼。

我冒着傾盆大雨回到家中。“符拉索夫，沃罗諾夫，戈洛布……”幸福的戈洛布啊！

当我念着这个姓时，眼前出现了瓦斯柯·努尼叶斯·巴里波的形象，一个宽肩膀，粗面皮的大汉。当然嘛！我怎么能行呢！这个該死的身高！

彼加給我开了門，看見我渾身淋得透湿，脸色惨白，不禁吓了一跳。

“你怎么啦？”

“彼加，榜上沒有我。”

“你騙人！”

西瑪的母亲飞也似跑到厨房里来，問我碰見管理員了沒有。我沒有答話。我坐在厨房里的一把椅子上，彼加低着头，忧伤地站在我面前。

第二天早上，我們两个人一道去航空博物館，在榜上找到了我的姓。原来是在另一栏里，这一栏里也还有几个姓是“格”字起头的，甚至格利高里耶夫就有两个——一个是伊万，一个是亚历山大。彼加認为我昨天沒找着名字是因为太紧张了的原故……

时間飞也似的前进，轉眼間，我已在我們举行考試的那个航空博物館閱覽室里了。經过資格审查委員会和体格检查委員会选拔出来的十三个人站好了队伍，校长，一个大个子，褐紅色头发，性情愉快的人走出来对我們說道：

“飞行学員同志們注意！”

嗬！飞行学員同志們！我是飞行学員！我的背上不禁一陣发凉，好象是先被人抛到滚水里，然后又抛到冷水里一般。我是飞行学員！我将要飞行！我再也听不进校长在講些什么了……

时間飞也似地前进。我們从工厂下了班直接就到課堂里听課；西瑪·金斯布尔格为我在电力厂找到了一个鉗工助手的工作。

我們每天听构造，航空原理，发动机等課程。在工厂里干了八个小时的活以后实在想睡覚，可是我們还要听构造，航空原理，还有发动机，只有米沙·戈洛布（他和我一样也是一个小个子）有时倚着我的背，輕輕地呼嚕呼嚕打起鼾来。随后越喘声音越大，于是我就按着他的头很小心地往桌子上碰……

虽然說我們是在航空学校学习，然而那时的航校哪里能和現在所称的航校相比呢！我們旣沒有发动机，又沒有飞机；旣沒有校舍，也沒有錢。不錯，在航空博物館里放着几架残缺不全的老飞机，你要是願意的話，当然也可以把自己想象成“哈維兰”偵察机的飞行員，或者是国内战时期使用过的“紐波兒”歼击机的飞行員。不过，要用这种功德圓滿的“棺材”来学飞行那可是学不成的。

我們东拼西凑地装配发动机。根据国防航空化学建設后援会的一紙堂皇命令，我們有充分的权力从别人墻上取走飞机的任何机件。我們走遍了列宁格勒的“紅角”。有时候，这些机件不是挂在“紅角”的墻上，而是放在房产管理委員会一个航空愛好者某某会計的案头。我們便把这些机件沒收带回飞机場去。这个工作有时很順利，有时却不免費些口舌。我和机械师到縫級工人俱乐部跑过三趟，向俱乐部主任反复說明，放在他們走廊上的那部旧发动机根本沒有宣传意义。

当这些生了銹的破烂机件終于落到我們手里的时候，我們費了多大的劲兒去摆弄它們啊！我們洗了又洗，擦了又擦。最初半年，我們的工作差不多就只是擦洗和拼湊发动机。我們这兒几乎尽是鉗工和司机，所以我作这項工作比起其他的人来更加感到困难。但我故意选最难的活兒干。我一生永远也忘不了我們用来学习飞行的那架“У-1”式飞机的左机翼。这是飞机上

最脏的地方，发动机里的滑油就从左机翼下面噴出来。我和别人打賭，我每天擦这个地方，直到毕业为止。我躺在地上，先用木片刮净那些脏东西，然后用刷子刷，再用抹布擦，脏水流得滿身都是，蓖麻油的臭味眞使人噁心……

显然，我們这副模样兒并不太象未来的駕駛員，尤其是每天深夜我們从机場回家，全电車的人都要搜索这股恶臭气味的来源，以嫌恶的神情瞧我們。不过我們并不因此感到难堪。米沙打趣說：

“哪兒发出来的这股蓖麻油臭味呀？呸！”

于是故意把鼻子堵起来。

我們的工作日开始得很早，从早上七点开始。十点以前，我們装配发动机，輪流給万尼亚·格里布柯夫講解什么是天地綫。当时，我們有这么一位万尼亚·格里布柯夫，全校的人都給他講什么是天地綫。以后飞行教官来了，大家便开始飞行。

我的教官，他同时是校长，兼机务主任和事务主任，是国內战爭时期的老飞行員。这是个大个子，性情愉快的人，一个奇聞軼事的愛好者，他能一連几小时講述这些故事。他爱发脾气，但并不記恨人，十分勇敢但又頗为迷信。他对自己的教官职責理解得非常簡单：就是罵我，离地面越高，罵得越凶。終于有一次不罵了，这是半年来第一次！……这簡直太体面了！我怀着一种洋洋得意的心情飞行了約摸十分鐘。他今天不罵我，我是怎么啦，大概是駕駛得太好了吧！尽管发动机声十分嘈杂，但我却感到仿佛是在万籟俱寂的太空中飞行——这可是反常的情况呀！

不过我很快便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了：原来是机內通話器脫了綫，話筒悬在座艙外打秋千。我拾起通話筒，馬上听到了最

后一句罵人的話：

“笨蛋！您最好还是不要飞行，到卫生車上去干活吧！”

我的教官罵得最凶的时候，总是用最有礼貌的称呼“您”。

当我回忆起在列宁格勒的第一年时，我的眼前又出現了另外一个人的形象，他就是每天到可尔布斯机場上来的契同志。他在这兒有一点兒簡单工作，就是用一架破旧的，摔过不止一次的飞机带旅客飞着玩。我們都了解他是怎样的一个人，远在我們全国知道他，热爱他之前，我們就已經知道他，爱戴他了。我們都知道飞行員們集会在航空博物館时經常談論的人是誰。那几年航空博物館就和我們現在的俱乐部差不多。校长总是用平静的男低音把应該讀成“阿”音的“奥”仍拖长讀成“奥”說道：“喂，怎么样？大坡度盘旋飞好了嗎？但是絕对不准撒謊！嗯！”我們知道他这是摹仿的誰。

在这个人作完惊人的飛行特技返回机場时，我們都拼命地向他跑去，我們这些爱好高級特技的，嫩得象刚冒出土的青草似的飞行学員对他差不多佩服得五体投地，他沒有戴风鏡，坐在座艙里看着我們，这是一位山鷹托生的，感覚銳敏的飞行員。

我无論到哪里，总是随身携带着伊万·伊万內奇医生留給我作紀念的听診器和这位飞行員的相片。他这张相片不是在列宁格勒我作学員的时候送給我的，而是后来很久，若干年后在莫斯科时送給我的。在这张照片上有他的亲笔題字：“永远作一个出类拔萃的人”。这是他的誓言……

在列宁格勒艰苦而又美好的一年就这样过去了。这一年是艰苦的，因为我們的工作超过我們的力量，我們每月領四十六个卢布的助学金，飯是哪兒碰上就在哪兒吃，有时兴許根本吃不上。我們名义上虽然是在学习飞行，但是四分之三的时間花費

在擦洗和拼凑旧发动机的工作上。然而这也是最美好的一年，因为这是充滿了幻想的一年，它彷佛是一条虛綫勾画出了我未来的生活，因为这一年我感覺到我能够把自己的生活造就成所希望的那种样子。

尽管这时我几乎沒有一分鐘的空閑时間，但我还是写一种类似日記的东西——思想和印象杂記。可惜这本东西沒有保存下来。不过我还記得在第一頁上摘引了克劳塞維茨[①]的一段話："小步比大步容易。但是要跨过一条寬闊的壕沟，我們却不能先跳半步，跳到沟里去。"

这就是我在列宁格勒时的主导思想：永远前进，不作半步的跳跃。

时間飞也似的前进，只是在一九三〇年八月底的一天停下来了。这天我坐在一张富丽堂皇的大桌子前，这是一张用几十张形状高矮各不相同的桌子拼凑攏来的大桌子。高大的窗戶，玻璃的屋頂。这是摄影艺术家别列什金的摄影室，我的妹妹薩尼亚就在他家租了一間屋子。

2 薩尼亚的婚礼

每逢假日我都到薩尼亚那兒去，我老实說（虽然这样說自己的妹妹未免有点奇怪），我是愈来愈喜欢她了。她是那样天眞快乐，灵敏活泼，同时又十分精明能干。

---

① 克劳塞維茨（1780—1831），普魯士的将軍，資产阶級軍事理論家。——譯者注。

她入美术学院后，就在兒童出版社找到一个工作。她租了一間很精致的房間，摄影家一家人簡直把她宠爱得不得了，当然她也为他們作了一些事。她經常关心彼加和我的事情，并且按时代我們給家里老人写信。这时她在学校的工作很多，虽然她沒有彼加那种雄劲豪迈的气概，但画得还是很好。她喜爱工笔画，現在，我們的艺术家們几乎已不大从事这种繪画了，象她那么細致地描繪人物的面部和服装实在是不多見的。她还和小时候一样喜欢談話，当什么問題涉及到她或者引起她的兴趣时，她就象放連珠炮似的那么快地說起来，竟至使我听到末了还不明白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总而言之，这实在是一个再好也沒有的妹妹，現在她就要出嫁了。

不难猜到她是和誰結婚，虽然这天晚上聚集在摄影家摄影室里的青年朋友当中，彼加是最不象新郎的一个。他沉思地坐在一个尖鼻子的青年旁边默不作声，这位青年不停地对他攻击，似乎想用自己的尖鼻子把他鑽个洞似的。我低声問薩尼亚尖鼻子是誰，她肃然起敬地回答道：

"伊兹亚。"

但不知为什么，我却不喜欢这个伊兹亚。

总之，这是一次奇怪的婚礼。来宾們为了一条乳牛爭吵了一晚上——画家菲里波夫画一条乳牛是不是眞的花了两年半的时間。他仿佛是将一条牛分成許多小方块，然后再一块一块分开来画。我正想說这簡直是病态，然而这时伊兹亚已經从这条牛身上演繹出来了一大套理論，甚至还把他这套理論加上了"主义"两个字。至于新郎新娘，倒沒有人去注意。

我怀着欢庆的心情去参加薩尼亚的婚礼。自己的亲妹妹出嫁，不管怎样說吧，这究竟不是常有的事！这天早晨，我們收到

了达莎阿姨和法官拍到两个不同地址的長电报：一封給新郎新娘，一封給我。我花了一个月的时間，为他們俩安装了一个小收音机。可是这些艺术家却什么也不介意。他們这一夜都在爭辯牛的問題。

不过新郎新娘看样子还是很高兴的，特别是彼加，他口里不时說着“可笑！”而且带着很滿意的神色四处观望。薩尼亚非常忙碌，因为盘子不够，客人只好分两批吃。

她的脸胀得通紅，到处张罗着，好容易才坐下来呆一会兒，她穿着一件綉花边的連衣裙，不知道为什么，这件衣服使我想起了恩斯克和达莎阿姨。我趁这个机会站了起来。

“大家注意，有人敬酒！”伊兹亚好奇地看了看我招呼道。

大家頓时安靜下来。

“同志們，首先，我建議为新娘干一杯，”我說道，“虽然她是我的妹妹，不过，旣然来宾中誰也沒有想到无論如何总应該为新娘干一杯，所以就只好由我来动議了。”

大家一齐欢呼“烏啦！”和薩尼亚碰杯。

“其次，我建議为新郎干杯，”我繼續說道，“虽然按道理說，他应該先为我干杯。为什么呢？因为是我証明了他不应該作飞行員，而应該成为一个艺术家。可能我这是泄露了他的秘密，不过他曾經想当飞行員这是事实。关于这个問題，有一次我和他爭吵了整整一天，他要我相信他根本不喜欢繪画。他担心他作画家不能把內在的力量全部发揮出来。”

大家哈哈大笑起来，我用湯匙敲了敲杯子。

“为什么我那时就断定他应該作一个画家呢？很簡单：因为他把他的画給我看过。我可以作証，那时使他感到兴趣的题材只有一个。这个題材就是刚才我們为她干杯的姑娘。”

这时我指了指薩尼亚。

“憑良心說，他完全是撒謊，”彼加嘟嘟囔囔地說道。

“这个题材用各种不同的形式表現出来：蕩舟，拥爐，坐在門口小凳上，坐在花园里的小凳上，穿大衣的，沒有穿大衣的，穿烏克兰小褂的，穿天蓝色罩衫的。在那个时候就使人不难預測到：第一，彼加将会成为画家，第二，总有一天我們会聚集在一张桌子前面，为我們的新郎新娘干杯，因此我現在建議干杯。”

我和薩尼亚，彼加碰过杯，便把酒一飲而尽。

然后他們为我干杯，然后又为伊茲亚干杯，这一着实在是失策，因为伊茲亚在致答辞时，发表了一大篇議論，用一些只有他一个人发笑的俏皮話，大肆攻击画家菲里波夫。彼其加很滿意的听他講，不断地說：“可笑！”可是后来突然脸胀得发紫，說伊茲亚是“典型的俄罗斯革命艺术家协会的庸人”。他想了想又加上了一句說：“并且是一个毫无才能的庸人。”

伊茲亚不同意說他是个毫无才能的庸人。这时若不是薩尼亚的教授来了，我真不知道这場爭論将会怎样結束。这是一位令人尊敬的，留着黑色美髯的教授。大家都跑去迎接他，爭論就此打断了。

实在說来，我有生以来还是第一次看見真正的教授。我很喜欢他。他一气喝了个够，对我說，还在一九一四年战爭时期，他就一直想作一个飞行員。他抱住薩尼亚吻了好久，以这样一位有着一把可敬的美髯的教授而言，吻得未免过份久了一点。后来他就躺倒在沙发上呼呼睡着了。

总而言之，在薩尼亚的婚礼上，大家都很高兴，然而在我的心灵深处却感到一种自己不願意承認的凄凉。

我总觉得艺术家有点与众不同。但这也很容易理解，因为我有另外一种生活，另外一种兴趣的圈子。同时他們也和我一样，似乎也是这样想的，——我在致辞时已經感觉到了这点。

不过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使我伤感。这个原因被薩尼亚猜到了。此时教授已經醒来，在大声疾呼地宣布説，他禁止薩尼亚在进行毕业答辯以前結婚。大家正围着他哈哈大笑，薩尼亚悄悄地向我招了招手，我們便溜到厨房里去了。

“有人向你問好……你知道是誰嗎？”

我立刻就明白是誰了，但我故作鎮靜地説道：

“不知道。”

“卡佳。”

“眞的嗎？謝謝。”

薩尼亚不高兴地看了看我，她甚至恼得脸都有点兒发白，她生我的气了，——她看得很清楚，我是在装蒜。

“一点兒不説实話，”她急速地説道。“你瞧，好一个查尔德·哈洛德！[①]不許对我撒謊，特别是今天我結婚的时候。我要写信告訴她，説你向我求了一天，要这封信，可是我沒給你。”

“我甚么也沒向你要。”

“你心里在要。”薩尼亚肯定地説道，“表面上却装作滿不在乎的样子。总之，我可以把这封信給你看看，不过最后的一张你不要看，好嗎？”

她把信塞到我手里就跑了。当然，我把信都看了，而且最后一頁还看了三遍，因为这一頁上提到了我。卡佳根本沒有請她

① 查尔德·哈洛德是英国詩人拜倫写的“查尔德·哈洛德游記”中的主人翁，他鄙弃資产阶級貴族社会的庸俗和愚蠢，对人生抱消极悲观态度，后来，他的名字，就成了性格孤僻，情緒消极，不滿現实的典型人物。——譯者注。

向我問好，只是簡单問了問我的情况，問我什么时候毕业。表面上看来，这是一封很普通的信，实际上却是一封非常抑郁的信。譬如，里面写得有这样的地方：

现在才四点鐘，我們这兒已經黑天了，我突然睡着了，醒来时簡直自已都不明白何以遇到了这样的好事情。原来是我梦見了恩斯克，仿佛姨媽她們在帮我穿衣服，备准上路……

我把这个地方念了好几遍，一生也忘不掉的、我們离开恩斯克时的情形又浮現在我的眼前。我回想到姨媽們怎样紧跟着离站的火車大声囑咐，回想到后来我怎样搬到了卡佳的車厢里去，以及我們看老人家放在我們提籃里的东西时的情景。一位沒有刮脸的小矮个兒总在揣測我們究竟是什么关系，卡佳却偎依着我站在走道里。她偎依在我的身边，我看着她和她談話。現在，当她是这么远不可及的时候，这些事兒是多么难以想象啊！

薩尼亚回来我都沒有听見。

“看完了嗎？”

“薩尼亚，請你写信告訴她，說一切都很好，我在十月間毕业，至于以后……还不知道到哪兒去。我准备申請去北方。”

“你現在就坐下来，自己写封信把这些事情告訴她！”

“不，我不写。”

“不写，我就不放你走！”

“薩尼亚！”

“我馬上就把彼其加叫来，”薩尼亚声音很严肃地說道，“把所有的人都叫来，我們給你下跪，劝你写这封信，因为我們認为你作得太不近人情了。”

“薩尼亚，去你的吧！你真是喝醉啦！喂，我走了。”

“你到哪兒去？你发疯啦？”

“沒有，我走了。已經很晚了。明天还要早起。总而言之……”

我沒有説“总而言之”怎么样，不过她已經明白了，分别时她很表同情地吻了吻我的脸頰。

3 給伊万·伊万諾維奇医生写信

我生了卡佳的气。我在离开莫斯科之前，想和她辞别，写了封信給她。可是她旣沒有回信，也沒有来，虽然她明明知道我这一去时間很久，而且可能再也見不到面了。自然，我就再也沒有給她写信了。不用說，大概尼古拉·安东內奇已經說得她相信了我“用最可怕的，人类想象不到的謠言誹謗了他”，我是一个“血液不純的小鬼”，而她的母亲就是由于我这个血液不純的小鬼而丧命的。

算了，一切有待于今后啦！当我想到这一幕情景时，覺得头都暈了。

可是，象現在我在列宁格勒这样，每天从八点鐘到五点鐘在工厂里干活兒，又从五点鐘到夜間一点鐘在航校里学习，——在这种情况下，又能作什么呢？

这年冬季，外場飞行以前，我們都在航空博物館的閱覽室里上課。有一次，我問博物館館長知不知道有关塔塔林諾夫船長的一些材料，图書館里有沒有这类的書，或者船長自己著的書“格利里探险队罹难的原因”。

我不知道为什么館長对这个問題感到极大的兴趣。顺便說一下，館长还是我們航校的組織人之一，所以飞行学員們經常去跟他談一些个人的問題。

“塔塔林諾夫船长？”他惊訝地又問了一遍。“哦！太有意思了！你为什么对这件事感覺兴趣呢？”

要認眞回答这个問題，就只有把諸位前面已經讀过的那些事重新向他叙述一遍，所以我回答得很簡短：

“我一向喜欢讀关于探险方面的書籍。”

“不过眞不凑巧，关于这次探险的情况一点也不清楚，”館长說道，“来，我們到图書館里去看看吧！”

当然，要是沒有他，我什么也找不到，因为这都是报章杂志上的一些零星論文，書呢，只有一本二十五頁的小册子，書名叫做“海上妇女”。原来塔塔林諾夫不仅写过有关格利里探险队的書。

这是一本怎样的書呢？我讀了它两遍，認为这是一本很有趣兒的書。特别是回想到这是一位海軍軍官写的。那是什么时候！是一九一〇年沙皇时代。

这本書論証妇女可以作海員，并且引証了亚速海漁民生活中的一些事例。妇女在惊险的情况下，表現得并不亚于男子，甚至更勇敢些。船长深信：和流传的迷信刚好相反，“不讓妇女航海”，只是給那些被迫把家屬留在岸上，过着长期分居生活的海員們带来許多不幸。他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就能在海船上看見“女輪机員，女航海員，女船长”了。

当我讀这本小册子的时候，不禁想起船长对南生探险所作的边注和他在一九一一年去北极探险的报告摘要。我这才第一次認識到，他不仅是一个勇敢的航海家，同时，是一个头脑非常

清晰，对生活看法开闊，思想进步的人。

不过有些論文的作者显然是抱着另外一种看法。譬如“彼得堡日报”一位記者根据国务会議“否决塔塔林諾夫船长关于調拨必需經費的申請”这件事来反对这次的探险。这篇文章还是用这样的文体写成的：“……据有关官署証明，实現該探险事业之各种条件均缺乏根据，同时，塔塔林諾夫船长筹画之探險队亦欠周密考虑，国务会議認为，政府应通过海运部門之代表駁回此一建議。”

在另一家报紙上，我发見了一幀引人注意的照片：一条美丽的白色的海船。我覚得它很象“百年来的新发現”書中所画的西班牙快船。这就是“圣·瑪丽亚”号帆船。这条船看起来十分小巧玲瓏，要从彼得堡出发，沿西伯利亚海岸去海参崴未免过于小巧玲瓏了。

在同一家报紙的下一期刊登了一张更引人注意的照片：全船人員合影。自然在这张照片上很难辨認出什么来；不过，人象的位置，和坐在中間，双手交叉着放在胸前的船长，——这一切对我說来还是很熟悉的。我在什么地方看見过这张相片呢？沒問題，是在塔塔林諾夫家，在卡佳給我看的那些老相片里面。但我繼而又一想，不对，不是在塔塔林諾夫家！而是在伊万·伊万內奇医生那兒。不錯，我正是在那兒看見过这张相片的！

这是一九二三年我出院后，到他家去告别的那一次。他刚好要出发到北方去，在装箱子的时候，把这张相片抖落出来了。我拾起来仔細地看了看，并且問他为什么在全体船員当中沒有他，他回答說：“因为我沒有在‘圣·瑪丽亚’号帆船上航行过。”然后他就把相片拿过去，补充說道：

“这是一个人留給我作紀念的……”

这人究竟是誰呢？

一个单純的，同时也是一个了不起的想法突然在我脑子里閃了一下。这个想法只有伊万·伊万內奇医生能够証实它是否正确。我当时就决定写封信給他。虽然他离开莫斯科已經将近七年了，可是我不知为什么完全相信他还健在，并且还是那样爱朗誦柯茲瑪·普魯特可夫的詩歌，还是那样一面和人談話，一面就順手从桌子上抓件东西，象魔术师似的一抛一接的。

下面就是我写給他的信：

敬爱的伊万·伊万內奇：

这封信是您过去治好的一个有趣的患者写給您的。您曾經診断这个人患的是“哑而不聋”症。您还記得我嗎？您临去北方的时候，曾經囑咐我把自己作的事和自己的感覚写信告訴您。現在，經过了七年以后，我終于来履行諾言了。我覚得自己身体很好。現在，我已經是一个飞行学員，在国防航空化学后援会办的航空学校里学习，希望有一天能坐飞机来看您。此外，我写这封信給您还有一件事，就是我在莫斯科到您那兒去的那一次，看見您有一张“圣·瑪丽亚”号帆船全体船員合照的相片，船长是塔塔林諾夫，这只船于一九一二年五月从彼得堡起航，一九一三年秋在喀拉海上失踪。您还記得嗎？您曾經对我說过，这张相片是一个人留給您作紀念的，可是您并沒說这人究竟是誰。知道这个人是誰，对我来說是非常重要的。当然，您有权利問我为什么对这个問題感到兴趣。我簡单地回答道：凡是有关塔塔林諾夫船长的事，我都感到兴趣。因为我認識他的家屬，把他生和死的眞情实况提供給他的家屬，这对我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您能够回信，我将感謝不尽。

回信交：罗沙里大街十二号航空博物館，国防航空化学后援会航

空学校。致

敬礼！

亚历山大·格利高里耶夫

我能指望收到回信嗎？也許医生早已回莫斯科去了？也許他迁移到更遙远的北方去了？或者乾脆已經忘記了我，因此現在看到这封信时，也不会明白什么相片，哪一个格利高里耶夫。

4 收到回信

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过去了。我們学完理論課，便全部搬到柯尔布斯机場去了……

一九三〇年九月二十五日，这是机場上一个"重大的日子"。直到現在，当我們回忆起这一天时，还是这样称呼它。这一天和往常一样，早晨七点鐘，我們已經坐在我們那一堆"可以利用的废物"前面。有的人正在試探着使米沙·戈洛布感到"吃惊"，因为他对任何事情从来都不覺得惊奇。万尼亚·格里布柯夫又在向別人請教什么叫做天地綫了。

"就在那兒，在天和地相联的地方。明白了嗎？"

"那么，为什么在我飞行的时候，就不銜接了呢？"

最后，万尼亚·格里布柯夫終于明白什么叫做天地綫了。但是，他所找到的天地綫却总在那一个地方——在普吉罗維茨后面的海湾的上空。他就老向那兒飞，刚一起飞，便"往天地綫迫近"，就这样一直"迫近"到降为机械兵为止。

九点鐘的时候教官来了，于是发生了下面几件事：第一，教

官带来了一位穿斜領衬衣，戴金边眼鏡，威风凛凛的大叔，大家很快就知道了，这是区委書記。書記看了看飞机，又看了我們用装飞机的大箱子改建的修理厂，說道：

“喂，我的亲爱的。我們首先应該整頓一下保卫工作。这簡直不象話，机場上总是不断有一些形迹可疑的人蕩来蕩去。”

“哪兒？”敎官問道。“啊，这些人嗎？他們是我們的飞行学員。”

第二，我們刚打发走了客人，敎官就冲着我們发作起来了，說我們洒了汽油。他的脸脹成了猪肝色，和他那头发的顏色十分相似。这已經不是第一次了，所以，我們心里想，讓他喊叫一陣也算了。

可是他却蹲下来，用一个手指往汽油桶旁的几个小坑里掏来掏去。坑里本来是水，但他却說是汽油。

“不，是水！”戈洛布反駁道。

“我說是汽油！”

“水！”

“汽油！”

“好——好——好，就算汽油吧，”戈洛布同意道。

敎官用手指往另一个小坑里插了一下，聞了聞便站起来了。他恶狠狠地皺起眉头，又聞了一次。

“是水，”他低声自言自語說道，因此我們都笑得前仰后合，坐到地上了……

第三，……說到第三件发生的事，那就得講得詳細一点兒。

这一天，我和敎官飞了好几次，他老是注視着我，但和往常

相反，沒有罵我。

“来，”他終于說道。“現在你一个人飞吧。”

这时我的样子大概很紧张，所以他用一种恳切的，善意的表情看了我一会兒，然后检查了仪表是否正常，并且将空了的前座艙里的皮带扣好。

“作一个正常的圓圈飞行。离陆后，爬高。一百五十公尺以下不許轉弯。轉弯，四方航綫，然后着陆。”

我将飞机滑到起飞綫，举起一只手，請求准許飞行。当时我感觉好象不是我，而是别人在作这些事情。起飞信号員揚起白旗，表示可以起飞。我加大油門，飞机就順着机場滑跑了……

当我第一次升到空中，尝到飞行滋味原不过如此时，不免产生了一种幼稚的失望的感觉；現在，这种感觉早已不記得了。以前我总覺得自己将来飞行时会象鳥兒那样飞，可是我現在坐在座艙椅上却覺得完全同在地面上一样。我坐在椅子上沒有功夫考虑地面或者空中的事，只是到第十次或者第十一次单飞时，才注意到地面的形状和地图完全一样，我們生活在一个几何形状十分精确的世界上。我很喜欢那些疏疏落落投布在地面上的浮云的影子，总之，我領会到世界是异常美丽的……

我就这样第一次单独一个人飞行着。教官座艙里空空的。第一个轉弯。教官座艙里空空的，可是飞机在飞行。第二个轉弯。我怀着自由自在的美妙的感覺单独一个人飞行着。第三个轉弯。应該进入着陆了。第四个轉弯。注意！我开始收油門。地面愈来愈近，眼看就在飞机下面了。我慢慢地带桿，滑跑，停車。

这些动作作得似乎还不坏，所以連我們那位爱发脾气的教官也不禁贊許地点了点头，米沙·戈洛布站在他背后，伸出一个

大拇指来对我比了比。

“薩尼卡！你眞行。”当我們在小山坡上坐下来抽烟时，他說道，“我說的是实在話！这兒还有你一封信。我今天到航空博物館去了一趟，看門的人說：‘您可以把格利高里耶夫的一封信轉交給他嗎？’”

他遞給我一封信。“这是伊万·伊万內奇医生写的。

亲爱的薩尼亚！知道你的身体很好，我心里很高兴。不过，你說我治好了你的“哑而不聋”症是不恰当的。老弟，这样的一种病根本沒有。說“不聋的哑吧”这就对了。我等着你駕着你的飞机来，要不然我們只得老是坐狗拉的車。至于相片的事是这样的。这张照片是“圣·瑪丽亚”号航海长伊万·德米特里耶維奇·克里莫夫送給我的。一九一四年他被送到阿尔汗格尔斯克，两条腿已經完全冻坏了，后来因为患敗血症死在市立医院里。他死后，遺留下两本笔記簿和一些信件，这些信相当的多，据我估計，約摸有二十来封。显然，这是他从船上帶来的信件，也可能有几封是在路上写的，因为他是被塞多夫中尉的探险队中途收容下来的。他死后，院方将这些信件都按地址发走了，可是笔記簿和相片却留在我这兒。旣然你認識塔塔林諾夫船长的家屬，并且打算“把他的（当然不是家屬的，而是船长的）生和死的眞情实况”提供出来，当然会对这两本笔記簿感到兴趣的。这是两本最普通的小学生用的草稿本，里面写滿了鉛笔字，可惜，写得太了草，我曾多次試探着去讀，但結果还是放弃了这个念头，我所知道的大概就是这些。这是一九一四年底，世界大战刚刚开始的时候，所以塔塔林諾夫船长探险的事誰也不感兴趣。笔記簿和相片現在还保存在我这兒。你来吧，噢，对了，应該說，你飞来吧，只要你有耐心，你就来讀吧。我的地址是：北地城，基洛夫大街二十四号。

希望你写信来，有趣的患者。

你的医生伊·巴甫洛夫

……妹妹近况如何？你們还用木签烤土豆吃嗎？

我也是这么想！相片是航海长留下的。医生亲眼看見过这位航海长！就是那个署名“尊敬您的，远洋航海长伊·克里莫夫！”的人，就是那个用了“緯度”，“帆船”，“弗兰姆”一些奇异的字眼兒和“首先我要告訴您……”“相信不久就会見到您”等一些非常客气的話，而使我一生都感到惊訝的人。就是那个航海长，我从他的信里才知道 экспедиция ① 不仅是发送邮件的肮脏的地下室，而且还有远程航行，船长，漂流的冰山等內容。

我决定等航校毕业后立即到北地城去讀他的笔記簿。医生“放弃了这个念头”。要是他希望在这两本笔記簿里哪怕找到一个字証明他是正确的，要是有人对着他的脸啐过唾沫，要是卡佳認为是他杀害了她的母亲，那么医生就不会放弃这个念头了。

大概我把話說出声来了，所以坐在小山坡上的米沙·戈洛布流露出那种神色，仿佛他終于也要吃惊了似的。

“米什加，”我問他，“航校毕业后，到北方去吧。”

“去吧。可是为什么呢？”

“需要。”

“如果需要，那就去吧！”

“那么决定了？”

“决定了。”

其实，这是早就决定了的。不过我眞正到北方还是在三年以后。

---

① экспедиция 的意思很多，如收发室、探险、传达室等等。——譯者注。

5 三　　年

少年时代不是在哪一天結束的，而且这一天也不可能在日历上标志出来："今天我底少年时代結束了"。它是不知不覚地，甚至使你来不及和它道别便逝去了。昨天你还是年輕漂亮的小伙子，可是轉眼間，在电車上已經有少年先鋒队队員称呼你"叔叔"了。你往模模糊糊的电車玻璃窗上照一下，自己也不禁詫异地想道："眞的呀，是小叔叔了！"少年时代結束了，可是，是在什么时候，在哪一天，在哪一小时？却并不知道。

我的少年时代就是这样結束的。不过有这么一天，从这一天起，我明白了自己已經开始在用完全另一种眼光来看过去一切的憧憬和希望。这一天，我記得很淸楚……

我由列宁格勒被派到巴拉紹夫，刚从一个航校毕业，又轉到另一个航校去学习，不过这一次是向名符其实的教官学习，是在眞正的飞机上学习。

我不記得在我的生活里还有什么别的时期这样勤奋的工作过。

"你知道你飞得怎么样嗎？"还在列宁格勒时，校长对我說道，"笨得象一只木箱子。但是北极需要头等的駕駛技术。"

当暮色刚一降临到起飞綫的时候，我便开始学习夜間飞行，爬高时的那种感覚，就仿佛是在漆黑的甬道上摸索行进。下面机場上T形的着陆信号鲜明地放射着亮光，黑色的大地被点点鲜明的紅灯画上了两条整整齐齐的虛綫。鉄路岔道上隐隐約約閃

爍着信号灯，这些岔道在夜間是那么异常整齐的排列着，和在白昼多么的不相同啊。漆黑的太空，看不見的大地。远处忽然現出一片火光，又过了几分鐘，才发現这并非火光，而是一座城市，正是万家灯火，五光十色的，各式各样的……多么美妙的一幅幻景啊！

我学会了盲目操縱飞机，当周围的一切都被白色的迷霧籠罩起来的时候，你就好象飞过了几百万年往另一个地質时期飞去。你仿佛不是坐在飞机上，而是坐在时間的飞輪上不断地向前疾馳。

我認識到一个飞行員应該象优秀的水手熟悉水性一般了解大气的特性，了解它的一切傾向和脾气……

在这以前，北极圈仿佛还是那么遙远，仿佛是誰也不需要的一大片冰山雪地，可是这几年来，它开始被我們注意了。初期的几次伟大的飞行就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注意。

我們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飞行員的理想，我們爭执不休，証明阿同志比列同志飞得好，而契同志又比他們两个人都强。一个被自己左手压坏了心脏的美軍上校平·艾尔逊的遺体用国旗裹着剛由飞行員斯同志运回美国。不知为什么，这一次飞行激起了我們許多幻想。不，这个时候还是少年时期！

报紙上每天都出現一些关于北极探险队的文章——海上的和空中的，我怀着激动的心情讀着这些文章，整个的心都馳往北方去了。

有一天，我要作一次很困难的考試飞行。我已經坐在飞机上了，但一看見教官手里的报紙，看見报上的消息，便忍不住脫下飞行帽，取下风鏡，从飞机上跳了下来。

“向順利完成北冰洋直航任务的探险队員致以热烈的敬礼

和祝賀”——这是用大号字登在第一版中央的消息。

我顧不得去听教官惊异不置地对我講話，又向这頁报瞥了一眼，想一眼将它讀完。“伟大的北方航路开辟了”——这是一篇文章的标題！“‘西伯利亚人’一号在白令海峽”——这是另一篇文章的标題！“向胜利者致敬”——这是第三篇文章的标題。全是关于“西伯利亚人”这次有历史意义的远征的消息，自有航海史以来，这是第一条用一个航行期通过北方海路的船，这条海路也就是塔塔林諾夫船长打算乘“圣·瑪丽亚”号帆船通过的航路。

“你怎么啦？病了嗎？”

“沒有，教官同志。”

“高度二千二百公尺。大坡度盘旋，两个向左，两个向右。四个下滑倒轉……”

“是，教官同志。”

我当时激动得那样厉害，几乎想請求改期飞行了……

这一天我无时无刻不在想着卡佳，想着去世的瑪丽亚·瓦西里耶芙娜，想着船长，想着他的一生是多么奇怪地和我的生活交織在一起。不过現在我对他們的想法和从前不一样，現在我是更加心平气和地来看待我所受的委屈了。自然，我什么事都沒有忘記。我沒有忘記和瑪丽亚·瓦西里耶芙娜最后一次的談話；在她的談話中，每一个字都有着神秘的涵义——和青春，和生命訣別。我沒有忘記第二天我和老太婆坐在急診部里的情景：門开了，我看見一个黑头的白色东西，还有一只裸露的手臂从沙发床上垂下来。我沒有忘記出殯时卡佳把脸扭过去不理我的情形，也沒忘記我的幻想——若干年后，再遇見她，把証明我是正确的憑据扔給她。我沒有忘記，尼古拉·安东內奇曾

經朝我脸上吐过唾沫。

我突然感到所有这一切就好象是一出戏，直到現在为止，戏中的主角还只是在談話中涉及到，他要在最后一幕才出場。大家都在談論这个人，他的相片挂在墙上——是一张航海家的相片，寬大的前額，紧縮的下巴，两只眼睛深深地陷在眼窝里。

不錯，他就是这故事的主角。如果說我的少年时期在这个故事中显得那么重要，这也只不过是因为最有趣的念头是在血气方刚的十八岁少年的脑子里产生的。他是一个伟大的探险家，但为世所埋沒。他的事迹远远超出了私人或者家庭关系的范围。他的事迹就是开拓伟大的北方航路。他的意向就是用一个航行期內直航北冰洋。他所景仰的就是那些解决了摆在人类面前已經有四百年的問題的人。他和他們的地位是完全等同的。

而我的幻想，我的希望，我的心願又怎能和他的一切相提并論呢！我想望的是什么？我为什么要作一个飞行員呢？我为什么爭取到北方去呢？

就象我所想象的那出戏一般，这一切突然各按自己的位置摆布开来：一方面是我脑子里产生的关于将来和事业的单純的想法，而另一方面则是我所知晓的許多关于北极飞行員艰苦的生活。于是我想象着种种情形：北极圈外綿綿半年的长夜；一連好几星期疲憊不堪地等待着天气；在白雪皚皚的丛山峻岭上空飞行，眼睛总是不由自主地到处寻找可以迫降的地方；在連自己的机翼都看不清楚的暴风雪中飞行；在零下五十度的天气苦恼地忙碌着起动发动机。我想起了一位北极飞行員对北极飞行所立的公式："什么叫作北极飞行？那就是暴风雪的摧残加上

烧热水。"我想起了关于北极暴风雪的可怕的故事，人只要离开房屋两公尺，就有被暴风雪埋葬的危险。

但是，难道"西伯利亚人"号的船員就被这些困难和危险吓唬住了嗎？沒有，他們的破冰船虽然失掉了螺旋桨，但仍张上帆駛到了白令海。

还是彼加說得对，应該选择一种你能够发揮全部精力的职业。我爭取到北方去，希望作一个北极飞行員，因为这个职业要求我最大的忍耐，果敢和对祖国，对自己事业的热爱。

誰能知道，說不定我也有那么一天被人們列入那些可以和塔塔林諾夫船长等同地位的人中去呢？

我把脑子里产生这一思想的一天牢牢記在心里，这是一九三二年十月三日。

在巴拉紹夫航校毕业的前一月，我就写报告申請把我派到北方去。可是学校沒有放我走。我又留在巴拉紹夫整整作了一年教官。我不敢說自己是一个很好的教官，不过，我能教人飞行，同时我一点兒也不想动不动就駡人。我很了解自己的学員。比如說，我完全清楚为什么一个学員刚下飞机，就忙着要抽烟，而另外一个在着陆时却假装着高兴的样兒。不过我天生就不是一个作教員的人，我对于千百次地向别人講解自己早已知道的东西感到非常乏味。

一九三三年八月，我得到一次休假便到莫斯科去了。我的免費乘車証是經列宁格勒到恩斯克的。在列宁格勒和在恩斯克都有人等待我。但我还是决定到莫斯科去，虽然那兒并沒有人在等我。

我到莫斯科有事。第一，我要去北极航务总局談談把我調到北方工作的事；第二，我想見見瓦里亚·朱可夫和柯拉布略

夫。总之，我有許多事，我很快就給自己找到了理由，我必須去莫斯科一趟……

当然，我本来根本沒有打算給卡佳挂电話，特別是这三年来我仅仅从薩尼亚信中得到她一次問候，一切都早已結束和忘却了。一切都結束和忘却了这样长的时間，以致我又决定打电話給她时，为了妥善起見，我还預先想好了第一句无所謂的客气話。可是当我拿起听筒时，我的手不知为什么发起抖来，我意外地要了另一个号碼，柯拉布略夫的电話号碼。

我沒有找到他，他休假去了，一个陌生的女人的声音告訴我，說他要到下一学年开学时才能回来。

"他的学生向他問好，"我說道。"請您轉告他，是飞行員格利高里耶夫給他来的电話。"

我放下听筒。这是在旅館里，所以要先接通市內电話，然后再要你所需要的号碼。我悶悶地看着电話机，沒有撥动它，我不住地在思索。我对她說什么呢？我不能象对一个陌生人那样同她談話。

我决定先挂电話到动物园給瓦里亚。

可是瓦里亚也不在莫斯科。对方很有礼貌地告訴我說，朱可夫助教現在在北极，半年內不見得能回到莫斯科来。

"請問您是誰？"

"請您向他問好，"我說道。"我是飞行員格利高里耶夫。"

我在莫斯科再沒什么人可以打电話的了，除非給民用航空局秘書挂个电話。可是我現在沒有心情找秘書。我取下听筒說道：

"接市里。"

市內电話局答話了，我要了号碼。

尼娜·卡比丹諾芙娜接的电話，我一下就听出了是她那和藹，果断的声音。

“可以找卡佳嗎？”

“卡佳？”尼娜·卡比丹諾芙娜詫异地反問了一句。“她不在。”

“是不在家嗎？”

“不在家，也不在城里。誰找她？”

“格利高里耶夫，”我回答道。“您可不可以把她的地址告訴我。”

尼娜·卡比丹諾芙娜略为沉吟了一会兒。毫无疑問，她并沒有辨別出是我的声音。世界上姓格利高里耶夫的人多着哩！

“她实习去了。地址是：特罗伊茨克城，莫斯科大学地質調查队。”

我謝了謝她，便挂上了听筒。

我再也不能冷清清地一个人呆在这愁悶的房間里了，但是距北极航务总局秘書接見我的时間两点鐘还早得很。我走出旅館，漫无目的地在莫斯科蹓躂起来。

任何时候也別独自去逛那曾經是你俩去过的地方。莫斯科市中心一个普通的街心花园，也好象成了世界上最令人伤心的地方。一条不太热鬧，在莫斯科随处可見的，相当骯脏的街道都会使你触景伤情，使你不禁感到自己年紀大了許多，而且精明得多了。

我仿佛是在心平气和地回顧自己的內心世界，对往事加以估价：在处理許多与世界上最宝貴的东西——人心紧紧关联着的問題上，我表現得过份急躁，而在有些問題上又缺乏自信，这或許是因为我小时候不会說話，世界对我說来又是无法解释的

那么复杂，所以，这种对自身不信任的感觉就开始糾纏着我了。現在我好象觉得在自己身上还残留着一些哑吧的迹象。譬如說我在爱情上不善于充分表白自己的感情，甚至連最关紧要的話也沒有說。我感到，我的爱情沒有成功的原因，就是因为极端复杂的情况从四面八方把它紧紧包围住了，这和从前我还是一个茫然不知所措的哑吧孩子时，面对着复杂問題时的情形完全一样。

不，現在我心里的一切都起了变化，我感觉到了这一点！我再也不是个一时也等不得，巴不得立即証明自己是正确的急性的小孩了。我現在才知道，我最需要的是冷静的头脑和坚毅不拔的精神。

我怀着悲伤和怜憫自己的感觉想着我少年时代和学童时期的爱情。少年时代已告結束，爱情也不是那样的爱情了。不过和从前一样，一切有待于将来，我怀着比以前更大的希望注視着将来。

我在莫斯科沒有逗留多久。北极航务总局和民航局对我都很客气。可是，他們对我說，除非是巴拉紹夫航校肯放我走，否則，去北方工作的事趁早休想。

仅只过了半年，我就得到去北方工作的委任了，不过这是一个极其偶然的机会。我在列宁格勒認識了一位老北极飞行員，他很想回內地工作，因为他的年龄已不适合于北方那种艰苦的飞行。我們互相調換了一下。他到我的工作崗位上工作，我則被任命为北方某一条长途航綫上的副駕駛。

6 在医生家里

……要找这所房子幷不困难，因为整条街就只有一座房子，其它的房子还只存在在北地城建筑家們的构思中。

我敲医生家的門时，已經黑天了，窗戶正好开着，只見一个人影在思索着从窗帘后面走过去。很久沒有人来給我开門，于是我便自己輕輕地推开沉重的門，走进一間洁淨寬敞的門厅中。

“主人在家嗎？”

沒有应声。屋角上放着一把扫帚，我用它扫了扫毡靴，因为外面的雪一直沒到了膝盖。

“有人在家嗎？”

一个人也沒有。只有一只棕黃色的小猫从衣架下面跳出来，惊惧地瞧了瞧我便跑掉了。随后医生在門口出現了。

从医学的观点看来，也許这是难以令人置信的。他在这几年中，非但沒有变老，反而更加年輕了，又同那个在乡下教我和妹妹用木签叉着土豆烤的，高个子的，滿脸鬍鬚的，快乐的医生一模一样了。

“您是找我的嗎？”

“医生，我想請您去看一个病人，”我急速地說道。“一个很有趣的病例：不聋的哑吧。这个人什么都听得見，但是連‘媽媽’也不会說。”

医生慢騰騰地把眼鏡推到了額角上。

“很抱歉……”

“我說有一个很有趣的病例。”我一本正經地繼續說道。“这

个人只会説六个詞：母鷄，馬鞍，箱子，暴风雪，喝酒，阿布拉木。患者格某。杂志上曾經刊載过。”

医生走到我跟前来，他的那副神气就好象是又要夹住我的舌头，察看我的耳朵一般。但他只是簡短地叫了一声：

“薩尼亚！”

我們互相拥抱了起来。

“終于飞来了！”

“飞来了。”

“眞能干！成了飞行員？眞能干！眞能干！”

他摟着我的肩膀，引我到餐厅里去。餐厅里有一个約摸十二岁的男孩子，面貌很象医生。他向我伸出手来，把“奥”音讀得特别浊重地自我介紹道：“沃洛嘉”。

这兒比門厅里更加明亮，于是医生又把我渾身上下仔細打量了一番，这一次，似乎他費了很大的劲兒才忍耐住沒有眞的察看我的耳朵。

“咳，眞能干，”他又重复説了許多次。“妹妹呢？她在哪兒？也会飞嗎？”

“妹妹衷心地問候您，”我説道。“她現在是画家，已經出嫁了，住在列宁格勒。”

“已經出嫁了？带着小辮子嗎？”

我笑了起来，原来薩尼亚小时候是留着辮子的。

“啊，我已經是老头兒了，”医生叹息道。“想不到从前那个又瘦又小，穿一条肥大的破褲子的男孩子，現在竟然当了飞行員。那个留着两条小辮子的小姑娘居然成了画家，出了嫁，住在列宁格勒。”

“伊万·伊万內奇，説实在話，您沒有变样兒。眞叫人惊奇。

甚至还年輕了一些!”

他笑了。他听我这样說,心里很高兴,因此这一晚上我不断地重复說他年輕了一些,或是說他至少沒有变样兒。

我們坐下来喝茶,这时医生的妻子安娜·斯切潘諾芙娜来了。她是一个又高又胖的女人,穿着北方民族习惯穿的翻毛上衣,长統毡靴,我覺得她象个北极神。她脫去皮上衣,換下长統毡靴,仍然是那么高大,就連高个子的医生比上去也显不出怎么高来,更不用說我了。她的面貌很年輕,和这所洁凈的木房子,黃色的地板以及乡下地毡都很相称。在她身上有着一种古俄罗斯的情調,就如同在北地城中存在着的情調一样,虽然这完全是一座新城市,建設起来只不过五六年的光景。后来我才知道她是白海一带的人。

我們談論起北地城来,我这才知道这座人行道用木板作成,桥也用木板作成,总之,一切都是木头建筑的,甚至地基都是用木屑塡起来的奇异的城市的历史。

“只要雨一停,就好象在屋子里走路一样。”安娜·斯切潘諾芙娜說道,“到处都是地板,地板。連公路都是木头筑的。”

原来医生是搭乘第一只船到北地城来的,他亲眼看着整个城市修建了起来。

“一九二八年这兒还是原始森林地带,”他說道。“就在現在我們坐着喝茶的地方,曾經打过野兎。”

“可是現在却修起了一座房子,”安娜·斯切潘諾芙娜說道,“这条街一直准备要修,但总也不动工。”

“可是,你能說戏院不好嗎?”

“戏院是不錯哇。”

“去年莫斯科艺术剧团到我們这兒来过,”沃洛嘉說,他的

脸都胀紅了。“我們献花欢迎他們，他們感到很奇怪，不知道我們从哪兒弄来的花，其实，我們这兒的花要多少有多少。”

大家都看看他，他的脸愈发紅了。

“沃洛嘉喜欢看戏，”安娜·斯切潘諾芙娜說道，“他还喜欢……”

“媽媽！”

医生笑了。

“媽媽！請你出来一下行嗎？”沃洛嘉用威胁的口吻說道，說完就出去了。

安娜·斯切潘諾芙娜也笑了，跟着他走出去。

“他在写詩，”医生低声說道。“是哇，現在要是回想起来，的确也很有意思，”他又接着說道。“这眞是了不起！在兴建第一个木材厂的时候，报紙的日期都不印了，都印成距木材厂投入生产还剩多少天。二十天。十九天。最后，只有一天了！第一批飞机到来了！它們受到多么热烈的欢迎啊！您呢？”医生忽然想起来了，說道。“您怎么样？打算干什么？”

“打算飞行。”

“飞哪兒？”

“还不知道。計画很庞大，不过暂时往紅雅尔斯克运毛皮。”

“那么計划是新航綫罗？”

“是的……伊万·伊万內奇，”当桌上的东西都已吃光，我們开始喝起一种十分可口的自制的黃莓酒时，我說道，“您还記得我在列宁格勒时我們来往的信嗎？”

“記得。”

“关于那位航海长的事你写了一封很有意思的信給我，”我繼續說道。“我首先想知道他的稿本还保存着沒有。”

“保存着。”

“那太好了。現在請您听我說。这件事情說来話长，但我仍然要把它告訴給您。大家都知道，我是您教会說話的。我应該报答您。”

于是我便从达莎阿姨念給我听的那些别人的信开始談起，把所有的事都講給他听了。关于卡佳的事我仅仅說了几个字——用的是报导的方式。可是医生偏偏在这个地方不知为什么笑了笑，但立即作出毫不在意的样子。

“……这是一个过于劳累的人，”他的意思是指那个航海长，“实际上，他并不是因坏血病死的，而是因疲劳过度死的。他为了逃避死亡，耗費了过多的力气，因此沒有給自己留下活下去的力量。他給人的印象就是如此。”

“您和他談过話嗎？”

“談过。”

“談的什么呢？”

“我总覺得他是在談南方某个城市，”医生說道，“談的不是苏胡姆，就是巴庫。这是他当时的一种执拗不变的思想。那时候，大家都在議論战爭，因为战爭刚刚开始。可是他談的却是苏胡姆，說那兒多么美好，多么暖和。大概他是生长在那地方的人。”

“伊万·伊万內奇，这些日記都在您这兒嗎？在这个房子里嗎？”

“在这兒。”

“請您拿来看看吧。”

我把这几本日記想得太多了，最后給我形成了一种感覚，以为它們一定是几本厚厚的，黑色油漆布面的本子。但是医生去

了几分鐘之后，拿回来的却是两本窄窄的小練习簿，很象学生用的外文生詞本。我随便翻开一本来看时，不由得深深激动起来。

航海长伊·德·克里莫夫：

根据您和下列諸位的意願，我建議您和他們一同离船去寻找有人烟的大陆……

"医生，他的笔迹不是很清楚嗎！我讀起来毫不費力呀！"

"不，这很清楚的笔迹是我的，"医生說道，"你讀的一段是我已辨認清楚了的，在有些地方，我把認清了的字写成紙条夹在中間。至于其它的那些——你自己看看吧！"

于是他打开練习本的第一頁。

我也曾看見过一些不易辨認的笔迹，例如瓦里亚·朱可夫写的字；他的字使得教員很久都疑心他是故意捉弄人的。可是象这样的笔迹，我还是初次看見。这不是字，簡直是一些杂乱无章布滿在紙上的大小和針头差不多的釣魚鈎。

前面几頁已經被油浸透了，在黃色透明的紙上勉强可以看出鉛笔的笔迹。下面是写几个字又被抹掉的乱七八糟的一团，再往下画着一幅地图草稿，以下又是乱七八糟的一团，任何一个大書法家也无法辨認出来。

医生滿意地看了看我。

"祝你成功，"他誠恳地說道。

当我在他家里閑談的时候，外面刮起暴风雪来了。在北地城如果遇見暴风雪是不应当出門的，同时这时天也黑了，所以我便留在他家里住宿。安娜·斯切潘諾芙娜用行軍床在沃洛嘉

的房間里为我搭了一个鋪。临睡前，我对沃洛嘉端詳了好久，他側身躺着，两只手叠着摆得一般齐放在腮下面。沃洛嘉在熟睡中的模样簡直就是一个小医生，只不过沒有髭鬚。我坐在行軍床上正打算脫皮靴，突然这张床咯吱咯吱大声响起来。他睜开了两只淡蓝色的大眼睛眨了眨，睡梦中不知嘟囔了些什么。

7 讀日記

我并不承認自己是一个沒有耐心的人。不过要讀完这两本日記，大概只有最耐心的圣人才行！这些日記毫无疑問是在歇息的时候写的，是在昏暗的海豹油灯下，在零下四十五度用那冻僵了的，疲憊的手写成的。在有些地方，还可以看出笔迹脫开原字滑到下面，划成一条长长的，无可奈何的，沒有意义的直綫。

但是我一定要把它們讀完！

我又搞起这种苦恼的工作来了。每天晚上(在不飞行的空閑日子就从早上开始)，我手里拿着放大鏡，坐在桌前，便搞起这种把釣魚鈎变成人类文字的紧张而迟緩的工作来，这些字有时悲观失望，有时又充滿希望。最初我只是盲目地硬干——坐下来就讀。但后来找到了一个窍門，我就不象过去那样一个字一个字地去讀，而是整頁整頁地讀下去。

在翻閱这些日記时，我发現有几頁写得比較清楚，譬如医生誊写过的一个命令就是如此。根据这些地方我把所有的字母从"阿"到"雅"抄写下来，編排成"航海长字母表"，同时把他的各式

各样的笔迹絲毫不差地描摹下来。这样靠了这本字母表，工作进行起来就快得多了。只要依据这本字母表准确地猜出一两个字母，那么别的字母也就迎刃而解了。

我就这样一天一天地来辨認这些日記。

远洋航海长伊·德·克里莫夫的日記。

五月二十七日，星期三。

启程較晚，六小时內仅走了四維尔斯特。今天是我們离船一月的紀念日。我們算了一下，离船后共走了一百維尔斯特。当然，一个月走这么一点兒路并不算怎么多，但道路却意想不到的坏。我們很隆重地庆祝了我們的周月紀念日：用干黑莓煮了一鍋湯，为使湯味甜美，又加了两罐炼乳。

五月二十九日，星期五。

假若我們能够到达海岸，就讓这些人——我不想举出他們的姓名来——永远記住五月二十九日吧。这是我們从死神手中逃出来的一天，讓他們年年紀念这个日子吧！不过人虽然是救出来了，但双銃枪和养育着我們的厨房用具全沉到水中去了。因此昨天我們只好吃生肉，喝凉水冲的牛奶。唉！但願上帝能把我們这群天涯浪子平安送抵岸边！

五月三十一日，星期日。

下面就是正式文件，根据这份文件我必須率領一支队伍出发。

航海长伊·德·克里莫夫：

根据您和下列諸位的意願，我建議您和他們一同离船去寻找有人烟的大陆。本計划于本年四月十日开始执行，并应携带雪橇，上載皮筏和足供两月食用的粮食。离船后，应向南前进，直到看見陆地为止。发現陆地后，可根据客观情况适当行动，不过最好能爭取到达佛兰兹·約瑟夫群島間的不列顛运河。因为这是极有名的地方，沿着运

河可以到达弗罗拉海岬，我認为在这个地方可以設法找到給养和房屋。之后，如果时間和条件允許，应取道去斯匹次卑尔根①。到达斯匹次卑尔根以后，摆在你們面前的一个最艰巨的任务——就是找到当地居民，因为我們現在还不知道他們居留的地带。但我希望您在該島南部即使找不到岸上的居民，也能找到一条商船。自願与你同行者共十三人。

"圣·瑪丽亚"号船长伊万·塔塔林洛夫

一九一四年四月十日于北冰洋

上天明鉴，把他留在艰苦的，几乎是絕望的环境中，我却离开，这是多么难过啊！

六月二日，星期二。

离船前，輪机員柯尔涅夫为我們作了四付眼鏡，不过这些眼鏡并不頂用。玻璃片是用"杜松子"酒瓶作的。穿着雪橇走在前面的是我們的幸运兒"睜眼人"，跟在他們后面拖拖拉拉往前走的是閉眼的"瞎子"，他們只是偶尔透过睫毛看一下道路。眼睛被那使人痛苦难受的光綫刺得疼不可当。我永远也不会忘記我們的行路图：我們很整齐地合着脚步，同时又东倒西歪地向前走着，用胸膛压着纜繩，一只手抓着皮筏的側舷。我們緊閉着眼向前走。右手里的滑雪杖象机械那样准确地滑到前面，偏往右方，又慢慢地落到后面去了。滑雪杖尖端下面的积雪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多么清脆，多么单調啊！使你情不自禁地就要去傾听这种嘎吱嘎吱的声音，并且仿佛清晰地听見說："远啊，远——远啊。"我們仿佛是在失掉了知觉的狀态下行进，机械地迈着脚步，用胸膛压着纜繩……今天我覚得自己好象是在炎热的夏天在高楼大厦的蔭影里沿着海滨行进。在这些高楼大厦里儲藏着亚洲水果，大門敞着，可以聞到新鮮水果和干果芬芳郁馥的香气。橘柑，桃子，苹果干和丁香熏人欲醉。波斯商人正在向晒軟了的瀝靑人行道上酒水，我隐約听見他們說話的那种平靜的喉音。

① 挪威北部的一个島屿。——譯者注。

天啊，多么浓郁的香气，多么沁人心脾的凉爽啊！……这时我被自己的雪杖絆了一下，神志立刻清醒了，我抓住皮筏吃惊的停住脚——原来眼前是雪，雪，目之所及尽是白茫茫的雪。太阳依然耀眼地照射在雪地上，眼睛依然被刺得疼不可当。

六月四日，星期四。

今天，跟在杜那耶夫后面行走时，我看到他在吐血。检查牙床——是坏血病。最近几天来，他一直在抱怨脚不听使唤。

六月五日，星期五。

伊万·李沃維奇的影子始終离不开我的脑子：当他送別我們，向我們致辞的时候，突然不說話了，紧咬着牙关，带着无可奈何的惨笑向周围看了看。他还在生病，我把刚从病床上起来的他丢下了。我的上帝，这实在是一个极大的錯誤！可是現在已經不能再回去了！

六月六日，星期六。

莫列夫从三号起就一直糾纏着我，說他从冰山頂上看見了一片仿佛"平川"的地方，也就是說他看見了一块向南伸展很远的十分平坦的冰原。"航海长先生，这是我亲眼看見的！平川光滑得連兽蹄都站不住"。今天早上，他就不在帐篷里了。他没有穿滑雪板就走了，在薄而坚硬的雪层上隐約可以看出他的毡靴的印迹。我們呼喊，打口哨，鳴枪，整整寻找了他一天。他要是听見了，总該会回答我們，因为他随身带着連发步枪和十二、三顆子弹。可是一点兒声音也没有听見。

六月七日，星期日。

用皮筏，滑雪板，滑雪杖結成一根高約五沙繩①的旗竿，綁了两面旗子，将竿子立在小丘上。如果他还活着，他一定会看見我們的信号。

六月九日，星期二。

又走上征途。只剩下十三个人了，这是一个不吉利的数字。究

① 沙繩，俄国长度单位，一沙繩合2.134公尺。——譯者注。

竟什么时候才能到达大陆，哪怕是一块荒漠的不毛之地也好，只要它能留在原地不动，只要我們在上面不致时时刻刻担心它載着我們向北漂去！

六月十日，星期三。

今天傍晚，又产生了一次幻觉，恍若看見了南国的城市，海滨，和夜咖啡店，店里坐着戴白色巴拿馬草帽的人們。是苏胡姆嗎？又聞到了新鮮水果浓郁芬芳的香气，又产生了一些痛苦的想法："我为什么要到这酷寒的海上来航行呢？假如在南方航行多舒服！那兒气候温和，只消穿一件单衣就行了，甚至还可以光着脚，可以吃到許多橘子，葡萄，苹果。"眞奇怪，为什么我过去会不喜欢吃水果？不过巧克力糖也是好东西，就着黑面包干一起吃，就象我們現在午休时的吃法也很好。只可惜我們領的巧克力糖太少，一块巧克力分成許多小块，每次只領得一小块。要是有一盘烘焦的黑面包干摆在面前，手里拿着整块的巧克力糖，想吃多少，就吃多少，該有多好啊！可是距离这样的可能还有多少維尔斯特，多少小时，多少天，多少个星期呢?!

六月十一日，星期四。

道路极坏，雪很深，雪下面到处是水。时有冰渊挡住我們的去路。今天走了不到三維尔斯特。整天看見的都是浓雾和那刺得眼睛剧痛的蒙朧的白光。我現在仿佛是透过一层薄纱在看这本笔記簿，热泪順着腮帮直往下流。明天到特罗伊察。今天要是在"那兒"，在南方某个地方該多好啊！但是在这兒，在这靠近北緯82°，到处被冰山和冰渊分割开的浮冰上又是多么不舒服呀！在你眼前，冰原每分鐘都在挪动，一条冰渊消失了，另一条又露出来，就好象两个巨人在一张大棋盘上走象棋一般。

六月十四日，星期日。

这是一个新的发現，关于这件事我对同伴們什么也沒說：我們正从陆地旁边漂过。我們今天已經到达佛兰兹·約瑟夫島所在的緯度，而且还在繼續向南移动，可是連島屿的影子也沒有看到。我們正

从陆地旁边漂过。不論是根据我那毫无用处的天文鐘，不論是根据恒风向，或者根据投入水中的繩子的方向，我都看到了这一点。

六月十五日，星期一。

我把他这个病人丢下，使他陷于悲观絕望的境地，这种悲观絕望的心情只有他才能够隐藏着不表露出来。想到这些事，我就失掉了能够得救的信念。

六月十六日，星期二。

索提金也病了，他的牙床肿胀，冒血。現在我带領的人当中患坏血病的已經有两个了。我的治疗法就是派他們穿上滑雪板去找路，晚上給他們一片奎宁吃。也許这个治疗方法很残酷，不过在我看来，如果一个人还没有完全失掉精神力量之前，这也是惟一的治疗法。最严重的一种坏血病我还是在伊万·李沃維奇身上看見的，他患这种病将近半年，只是用了一种非人力所能及的毅力才使自己痊愈了，也就是干脆不讓自己死掉。可是現在，一个有着这种毅力，这种淵博的、广闊的智慧，这种飽滿的銳气的人終于遭到了不可避免的灭亡。

六月十八日，星期四。

緯度81°，向南漂流之快，不能不使人感到惊奇。

六月十九日，星期五。

四点左右，在我們宿营地东南方向，我看見了一点东西。这是紧挨在天地綫上的两片粉紅色的浮云，它們的形状一直没有改变，直到浓雾将它們遮住。我們好象从来还没有象現在被这么多的碎冰包围过。数不尽的鈴鴨和尖声鳴叫的白鷗在飞翔。啊，这些該死的海鷗！夜里它們常常不讓我成眠，围繞着扔在冰上的死海豹的內脏忙碌，爭吵。它們好象一些恶魔在嘲弄我們，它們疯狂地哈哈大笑，吱吱地尖叫，凄厉地呼嘯，它們等于是在咒駡我們。我将永久地記住这“雪白的海鷗的叫声”，这些在帐幕里的不眠之夜，还有那照透了帐幕帆布的不落的太阳！

六月二十日，星期六。

在駐营的一星期中，我們随着冰块向南漂流了整整一度。

六月二十二日，星期一。

傍晚，我按照慣例爬到一块小冰山上去，眺望地平綫。这次我在东方看見了一样东西，使我激动得在冰山頂上坐下来，匆匆忙忙地揉眼睛和擦抹望远鏡。这是一条細小的光带，好象是誰用毛笔在天蓝色的原野上整整齐齐地抹上了一笔。起初我認为是月亮，可是不知为什么这个月亮左边的半个弧逐漸晦暗，右边的半个弧却愈来愈明显了。夜里我出来了五、六次，用望远鏡眺望，每一次都在原来那个地方找到这一小块月亮。我惊訝的是我的伙伴們竟然什么也沒有看見。我費了好大的劲兒才忍耐住不走进帳幕去，不大声喊叫說：“你們为什么象稻草人一样呆在这兒，你們怎么还在睡？难道你們沒有看見我們正在向大陆漂去嗎？”但是我不知为什么要保持沉默。有人認为也許这就是海市蜃楼。我不是曾經发生过錯覚，看見自己在南国的城市里，在海滨上，在炎热的夏天，在高楼大厦的阴影里嗎？

（第一本写到这一句就結束了。第二本从七月十一日开始。）

七月十一日，星期六。

打死了一只海豹，从它身上积了两湯盆血。用这些血和鈴鴨作成了甘美的羹湯。在烹茶或是煮湯时，我們一般不喜欢开玩笑。今天早上，我們吃了一桶羹湯，喝了一桶茶；午飯，吃了一桶羹湯，一桶茶；現在晚飯的时候，我們每人吃了一磅多肉，正迫不及待地等待着我們的茶快些兒煮沸。可是我們的桶很大，形状象一个截头圓錐体。要是能够再煮一桶羹湯，痛快地吃它一頓，大家倒也并不反对，不过我們不好意思了，因为应該“节約”。我們的胃口已經不能拿狼来形容，而是比狼的还要大得多；这有点兒不正常，有点兒病态。

現在我們終于坐在一个島上了，在我們身子下面不再是两年来形影不离的冰块，而是泥土和苔藓了。一切都好，就是有一种思想仍然使我不安：船长为什么不和我們一块兒走？他不願意丢下船，他不

能“空着两只手”回去。——“如果我空着两只手回去，他們会把我当落水狗打的。”还有那个幼稚的，輕率的想法：“要是絕望的环境迫使我丢开船，那么我就到我們发現的陆地上去。”我覺得最近一段时期，他想我們一九一三年四月发現的那块陆地想得有点发狂了。

七月十三日，星期一。

在东南东方向，海洋直到天边都沒有結冰。啊！“圣·瑪丽亚”，亲爱的，你若是在这兒就好了！你在这兒可以連机器都不要，就能一帆风順地迅速駛去！

七月十四日，星期二。

今天索特金和卡洛里可夫走到海島的尽头时，发現了一件非常可貴的东西。他們在离海不远的地方看見了一个不大的石头堆。石头堆的端端正正的形状使他們感到惊异。他們走近一看，发現不远的地方有一个英国啤酒瓶子，瓶口上盖着带专利字样的有螺絲口的瓶盖。两个伙伴立刻扒开石头堆，很快就在石块下面找到了一个鉄罐。鉄罐里有一面保存得很好的英国国旗，旗下也有同样的一个瓶子。瓶上貼着一张紙条，写着几个人的名字，瓶里是一张英文写的字条。在我和尼利斯共同努力之下，好歹才弄清楚，原来是英国北极探险队在杰克逊率領下，于公元一八九七年八月由弗罗拉海峽来到麦利·哈尔姆斯渥尔特海峽，将这面旗子及字条留在此地。末尾說在“温德渥尔德”号船上一切都很平安。

我的一切疑問都意想不到地解决了，原来我們是在麦利·哈尔姆斯渥尔特海峽。这是亚历山大島的西南端。預計明天我們可以轉到島的南岸，然后向弗罗拉海峽前进，到大名鼎鼎的英国人杰克逊的領地去。

七月十五日，星期三。

离开了营地。摆在我們面前有两条道路須要选择：是大伙兒在一起，带着行囊，順冰河而下呢，还是分作两队，其中一队穿滑雪板沿冰河前进，另一队的五个人乘皮筏順冰河航行。我們选择了后一种

前进的办法。

七月十六日，星期四。

馬克西姆和尼利斯一早就将皮筏划到距我們营地較近的地方，尼利斯被激流冲开很远，只好派两个人去搭救他。我用望眼鏡看見尼利斯怎样把桨收起来，一籌莫展地望着那只前去搭救他的皮筏。尼利斯病得很厉害，不然我是无法解释他这种行动的。总之，他最近变得有些古怪：走路不稳，常常独自坐在一旁。今天吃晚飯我們燉了两只鈴鴨，一只綿鳧。

七月十七日，星期五。

天气恶劣。繼續在格兰塔海峽等候从岸上行进的那一队人。夜里天色轉晴朗。前方，在西北西方向似乎不太远的地方，在綿延不断的冰原后面，可以看見乱石嶙峋的島屿。难道这就是弗罗拉海峽所在的諾尔德布魯克嗎？現在已經到了弄清我这样急急忙忙向这个海峽赶路是否正确的时候了。二十年——这是个漫长的时期。經过这段时間，杰克逊在那兒的建筑物也許連点痕迹也沒有留下呢？但是又有什么別的办法呢？繞一个大湾嗎？那么我的这些衣衫襤褸，渾身是油垢和虱子，身患重病的不幸的同伴們还能支持得了嗎？

七月十八日，星期六。

如果明天天气好的話，我們就繼續前进。不能再等待了。尼利斯勉强能走，卡洛里可夫也比他好不了多少。杜那耶夫虽然也在訴苦說腿不好，但是在他身上还看不出象尼利斯和卡洛里可夫那样使我惊惧的冷漠的神情和体力衰弱的表現。什么事情使步行的人耽誤了时間呢？我不知道，不过要在这兒再呆下去，那就必死无疑了。

七月二十日，星期一。

柏尔島。当我們从皮筏里走出时，便相信尼利斯已經不能再走路了；他跌倒了下去，努力用手脚爬着走。我們作了一个类似摊床的东西，把尼利斯抬了进去，用我們仅有的一条被子把他盖起来。他

老想往什么地方爬，但后来就安靜了。尼利斯是丹麦人，在“圣·瑪丽亚”号船上服务的两年中，他的俄国話已經学得很好了。可是从昨天开始，他便忘了俄国話。最使我吃惊的是他那双茫茫然充滿了恐怖的眼睛，这是失掉理智的人的眼睛。我們燉好了肉湯，給了他半碗。他喝完以后便躺下了。失掉这样一个非常聪明勤奋的优秀水手眞可惜。大家都躺下睡了，我带了一支步枪，到一块峭岩上去眺望弗罗拉海峽。

七月二十一日，星期二。

尼利斯在夜里死了。連我們給他盖的被子也沒有掀掉。他的遺容很安詳，并沒有因为临死前的痛苦而变得难看。两小时以后，我們将这位长眠的同志抬出来，放到雪橇上。地面冻得十分坚硬，所以墓穴并不深。我們誰也沒有为这远方的孤坟洒下一滴眼泪。这个人的死亡并沒使我們感到特别惊奇，仿佛是发生了一件最普通的事情似的。当然，这并不是冷酷无情。这是面对着那降临到我們每一个人头上的死亡而产生的一种变态的迟鈍。我們現在好象又怀着敌意地看了看下一个“候选人”——杜那耶夫，我們心里暗暗猜測：“他是不是在走到以前就要离开我們呢。”一个同伴甚至仿佛恶意地吆喝他道：“喂，你干嗎坐着？你这个落湯鷄！你是想跟尼利斯一块兒去嗎？走，找浮木去，活动活动吧！”杜那耶夫順从地走了以后，有人还在追着他喊道：“看你跌跌撞撞的，快走！”他們这样作不是怨恨杜那耶夫，何况現在，浮木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他們是怨恨那攫走我們同志生命的疾病，是号召我們和死亡斗争到底。当腿象是痳痹了要弯下来的时候，那就是壞血病的明显症候。随后就是舌头开始不听使喚了。病人努力想說几句話，但是可以看得出来，怎样努力也不成，好象是惊慌失措，說不上話来的样子。

七月二十二日，星期三。

三点鐘出发到弗罗拉海峽。又想起伊万·李沃維奇。我再也不怀疑，他为我們所发現的那块陆地弄得有点兒发狂了。最近他經常

責备自己没有派一队人到这块陆地上去勘察。他在送别辞中也提到过这块陆地。我永远也不会忘記这次的别离，不会忘記他那张振奋人心的蒼白的脸和他的眼光的远大。这和过去那个紅光滿面活力充沛的人，会編笑話和滑稽故事的人，我們全队的偶象，对任何一件最艰巨的工作都是处之以詼諧的人还有什么共同之点呢？他講完話以后，誰也没有离开。他閉着眼睛站着，聚精会神地仿佛准备說两句送別詞。然而，送別詞还没有說出，却迸出了一声微弱的叹息，眼角上涌出了閃閃的泪珠兒。他說話时起初断断續續地不連貫，随后便愈来愈平靜了，說道："在送別两年来在斗爭和工作中朝夕相处的朋友时，我們每一个人都很难过。可是我們应該記住，虽然我們探险的主要任务没有完成，但我們总算作出了不少的成績。俄罗斯人的劳动已在北极探险史上占了最重要的篇幅——俄罗斯可以因此而驕傲。我們担負着重大的責任，就是要不愧为俄罗斯北极探险家的后繼者。如果我們牺牲了，我們的发現却不应随着牺牲。讓我們的朋友回去轉告世人：我們这个探险队用自己的劳动給俄罗斯增添了一片广闊的陆地，我們已把这块陆地命名为'瑪丽亚島'。"——他沉默了片刻，然后拥抱了我們每一个人，并且說："我想对你們說的不是'别了'而是'再見'。"

七月三十日，星期四。

現在我們仅仅剩下八个人了：四个人在皮筏上，四个人在亚历山大島上某个地方。

八月一日，星期六。

今天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我們距弗罗拉海峽只有两三浬时，剧烈的西北风刮起来了，风势迅速增强，半小时后，就象从管子里吹出来的一样猛，掀起了险恶的巨浪。在弥天大霧中，載着杜那耶夫和卡洛里可夫的第二只皮筏不知不覺地看不見了。在这样的巨浪中要和狂风，激流对抗簡直是不可能的，我們連忙背着风向一座較大的冰山靠岸，我們爬上冰山，把皮筏也拉了上去。我們登上冰块以后，便在

山頂上竪起一根杆子，升了一面旗子，希望杜那耶夫看到后能猜到我們的意思，也爬到一座冰上去。这时天气十分寒冷。我們都疲乏了，便决定躺下睡覚。我們穿上皮衣，脚对着脚地躺在冰山頂上，馬克西姆的脚伸到我的皮衣里貼着我的背，我的脚伸到馬克西姆的皮衣里貼着他的背。我們就这样安靜地睡了七八个鐘头。我們醒来时是一个极其恐怖的場面。我們被天崩地裂的一声巨响惊醒了，感觉得身子飞一般的往下沉，頃刻間双人睡眠袋就灌滿了水，我們正在向水里沉沒。我們互相用腿蹬，用脚踢，絕望地掙扎，想从这出卖了我們的睡眠袋里鑽出去。我們好象是被人投入水中要把我們淹死的猫一般。不知道这次掙扎繼續了几秒鐘，不过我感到持續了很久。在我脑子里，随着得救与死亡的思想而俱来的，是我們旅途中的各种情景：莫列夫，尼利斯和四个步行者的死亡。現在輪到我們了，无論是誰永远也不会知道这一切的。就在这一瞬間，我的脚碰到馬克西姆的脚，彼此一蹬，便退出了睡眠袋，又一会兒功夫，我們渾身湿淋淋的站在陷入了水中的冰山“山麓”下，沒命地将漂浮在周围水中的皮靴，帽子，被子，手套往冰上扔。皮袄变得异常沉重，我們两个人合力才能撈起一件来，被子終于沒有抓住，沉到水里去了。現在我們怎么办呢？我絞尽了脑汁也沒有用处。我們岂不要冻僵了嗎！仿佛是回答我們的問題似的，我們的皮筏从冰山頂上跌落到了水中，也許是风吹下来的，也許是象我們身下的冰一样，皮筏下面的冰也碎了。現在我們知道該怎么办了！我們擰干自己的袜子，短外衣，再把它穿上，把剩下的东西全部扔到皮筏上，坐进去就开始搖桨！我的天哪！我們是怎样拼死命地在划船！我認为正是这样剧烈的运动我們才得幸免于难。六个来鐘头以后，我們就到达弗罗拉海峽了……”

在航海长刚离船后所写的笔記中，我找到了一张有趣的地图。地图的式样很旧，因此我覚得它和附在南生乘“佛兰姆”号探险記上的地图很相象。

但是使我大吃一惊的还是发現它是“圣·瑪丽亚”号自一九一二年十月至一九一四年四月的漂流綫路图。这次漂流的地点正好在所謂彼得曼島。現在誰不知道这块陆地根本不存在呢？但是誰又知道这件事实却是塔塔林諾夫船长乘“圣·瑪丽亚”号第一个証明的呢？

这位在任何一本地理書上都沒有提到的船长究竟作了些什么呢？他发現了北地島，他証明了彼得曼島实际不存在。他校正了北极地图，但还始終認为他的探险队是失敗了……

不过最主要的，就是这本日記我已照我的抄本反复讀了五遍，六遍，七遍了（因为閱讀过程不再使我感覚困难了），我对于船长如何对待自己的发現的一段很注意。笔記上說：

> 最近他經常責备自己沒有派一队人到这块陆地（即北地島）上去勘察。
>
> ……如果我們牺牲了，我們的发現却不应随着牺牲。讓我們的朋友回去轉告世人：我們这个探险队用自己的劳动給俄罗斯增添了一片广闊的陆地，我們已把这块陆地命名为“瑪丽亚島”。
>
> 要是絕望的环境迫使我丢开船，那么我就到我們发現的陆地上去。

航海长居然还說这种思想是幼稚的，輕率的。

幼稚和輕率！达莎阿姨曾經把船长的最后一封信讀給我听过，在那封信里就有这两个字眼兒。

> 也說不上願不願意了，我們只好放弃最初沿西伯利亚海岸到达海参崴的打算。不过，塞翁失馬，焉知非福！現在我的脑子里完全是另外一种想法了。我希望你不致象我的某些同志那样，認为这种想法是“幼稚”或者“輕率”……

这一頁写到这两个詞結束，下面的一张却沒有了。現在我

知道这个想法是什么了：他想离开船到这块陆地上去。探险——他生活的主要目的——沒有成功。他不能“空着两只手”回去，他迫切地希望到自己所发現的陆地上去。所以我很了解，如果說他的探险队的遺迹还在什么地方保留着的話，那么就得到这块陆地上去寻找。不过，这一点也許只有我才了解吧？也許我之所以能了解得这么清楚，是因为我認識一个女人，这块陆地就是以她的名字命名的，我曾看着她怎样死去。我急于想找到这个探险队的遺迹，更想向卡佳証明我爱她，并且永远也不会不爱她。

一九三五年三月的一个深夜，我抄完了这本日記的最后一頁，我所能識辨出来的最后一頁。

在我当时所住的区执行委員会那座宏大的双层楼房里，所有的人都早已入睡了，只有我的窗戶里透出一絲灯光，落在路旁盖着一层白雪的孱弱的小树上。我的头，眼睛都有点兒疼痛。我穿上衣服走了出来。

这时，万籟俱寂，寒气逼人，可是并不太黑！满天星斗，同时在西方还有一点兒微弱的北极光。过去我在巴拉紹夫机場所体驗过的那种令人怀念的感觉又涌上了我的心头。

仿佛在剧院里突然开了电灯，我看見和我并排坐着的人正是刚才在舞台上的人！难道这是眞的嗎？似乎在一分鐘以前还不能說他們是否是一些眞人，或者只是在演戏。这出戏在現实思想的亮光照耀下就要黯然失色以至消匿无踪，但是灯亮了，却什么也沒有消失。相反地，我异常清晰地看見了在我周围的这些带着恐怖和疾病，悲观絕望，充滿了幻覚和抱着极大希望的活生生的人們。当他們离开船的时候，船停在距海岸一百七十公里的地方，可是他們在荒凉的冰天雪地中却跋涉了将近两千公里，因为他們从陆地旁边漂过去了。虽然船长不在他們这群人

当中，可是在这本惊心动魄的日記里却处处提到他，到处有他說的話，充滿了对他的热爱，和大家对他的生命的担忧！送別辞是用鉛笔写的，鉛笔深深地划到了紙里面去，所以这是全部日記中最容易識辨的地方。“然而，送別詞还沒有說出，却迸出了一声微弱的叹息，眼角上涌出了閃閃的泪珠兒。……”

仿佛是船长在托付我，要我說明他的生活經历和牺牲經过，我能完成这个委托，知道他的生死事迹嗎？他是放弃船去研究他所发現的陆地了呢？还是同他的伙伴們一起由于飢餓而牺牲了呢？还有那冻結在雅馬尔岸边冰块中的帆船“圣·瑪丽亚”号，这些年来，它是不是載着死去的船員沿南生到格陵兰的路綫漂去了呢？或者是在一个旣沒有星星，也沒有月亮，更沒有北极光的暴风雪的奇寒的夜里被冰块挤碎了呢？那时檣桅，帆桁随着一声轟然巨响飞速地倒下来，打碎了甲板上所有的东西，砸死了人，船身在临毁前的痙攣中喀嚓一声碎裂了。两小时以后，狂风卷着大雪盖住了出事地点。

或許在北极某一个人烟絕迹的小島上还住着“圣·瑪丽亚”号的人員呢？他們一定能够說出这只船的命运，叙述船长的命运。以前不是也有过六个俄罗斯水手在斯匹次卑尔根島上一个荒凉的角落里住了几年嗎？他們打死熊和海豹，吃它們的肉，穿它們的皮，把兽皮舖在他們用冰雪砌成的窝棚的地面上。

不，哪兒会有这样的事呢！說丢开船到瑪丽亚島这一思想是“幼稚的”，“輕率的”这句話到現在已經过了二十年了。他們是不是去这个島了？走到了沒有？

8 医生的家

整整一个冬季我都在辨認这些日記，不过我在北地城的生活还是按部就班的。我按时把供給木材厂用的工具运到紅雅尔斯克，最后还将这一条航綫的飞行时間縮短到八小时半。我把勘察队运送到諾里尔斯克，把許多教員，医生，党的工作人員运送到偏僻的涅涅茨民族区。我曾經同一位著名的飞行員姆同志到过迪克逊。我曾經沿着叶尼塞河的支流——庫列依卡河和下通古斯河飞行过。

但是我每次回到北地城总是馬上到医生家里去，自然是理了发和洗了澡之后才去。

我对医生和他的家庭很留恋，所以他們似乎也很喜欢我。說来实在可笑，医生对我的态度就象是对待自己的作品一般；他有时甚至眯縫着一只眼睛，仿佛总不太相信我就是那个穿着一条肥大的褲子，瘦弱不堪的黑头发小孩，有一个时期这个小孩只会反来复去地說“母鷄，馬鞍，箱子”。当然，現在我覚得他已不象在我童年时代，在乡下那么神秘莫測了。不过，就是現在也絕叫人猜不到他下一分鐘会作什么。比方說，在談話的时候他会突然把自己的椅子抛給你，而你一定要将它接住再扔回去。經过几分鐘这样的体操之后，医生又仿佛若无其事地坐在这把椅子上繼續談起話来了。他喜欢給涅涅茨人朗誦柯茲瑪·普魯特可夫的作品，他在涅涅茨人中有許多好朋友。

他們常常到他家里来，黑皮肤，黑头发，寬脸膛，穿着玻璃珠綉花鹿的皮袄。他們坐下来談个不休，套在高大的雪橇上的灰

鹿睁着哀怨的眼睛，久久立在台阶前。

医生会説涅涅茨話，涅涅茨人常来找他商量事情——有时是商量很重要的事情。他們生活在嶄新的社会主义制度中并不是对所有的事物都清楚的，他們还不太信任一个什么瓦斯加主席，冻土带苏維埃公認为的集体农庄問題的首席专家。譬如，有一次他們来征求医生的意見，問他应該怎样处理盗匪：由他們自己打死呢？还是解交給政府？又有一次他們来了解医生对汽爐子的看法，問这种机器在家庭中是否适用。

医生用了很长的时間来說明：盗匪应該解交給政府，汽爐子在家庭中是适用的。涅涅茨人带着严肃而天眞的表情默默地傾听着。不久以后，我也遇上一次机会对涅涅茨人作了一大篇关于汽爐子的演説，詳細情形后面再談。

不管怎样吧，这是一种很巩固的友誼。医生告訴我説，这种友誼是他在哈巴罗沃屯成立"寄生虫驅虫站"之后才开始的。这是医学上一件眞正的大事。医生被大家称为"驅虫大师"，他的声名因此传遍了冻土带……

在他的家里有許多动物：大公猫費尔卡，烏龟，刺猬，猫头鷹。猫头鷹住在桌子下面，每当大家坐下吃飯时，它就"啊！啊！啊！！"地叫个不停。所有这些都是沃洛嘉的家当，——还有两条叫卜西卡和托加的狗。他在教練这两条狗拉車；涅涅茨人送給他一付用猛獁皮装璜得十分美丽的套头。我很喜欢沃洛嘉不夸耀自己写的詩。这是他的秘密，在整个冬天，我只有一次听見过他朗誦詩。他起先嘰哩咕嚕地低声念了很久，并不知道我在隔壁房間里，并且全都能听見。后来他就带着表情，高声念起来了：

通古斯小孩乔加尔放学回家，

微笑象月牙兒閃耀在他那小眼中。

他迅速地跳下雪橇，欢欢喜喜地揮着手，——

孩子的活泼和快乐流进了窝棚……

后来他又开始低声地咕嚕了。

我对他叙述了塔塔林諾夫船长的事迹，并且向他講解了已去世的克里莫夫的日記对于这件事情有什么意义。所以，每次当我又辨認出一頁日記，来到医生这兒的时候，沃洛嘉随着也就出現了。他听着我們談話，脸色那样激动，医生就不禁要同我交換一下眼色，然后爱撫地拥抱他的肩膀。毫无疑問，他为了这支探险队不止写过一首詩，这么一来，塔塔林諾夫船长的一生就不仅仅是被描写在散文中了。

医生对航海长所写的病状很感兴趣，首先是腿脚失灵，然后是发音不清，最后是原因不明的暴死。于是沃洛嘉联想到司各特船长的伙伴欧文斯就是患这种病死的。

"司各特写道，这种病能使最强壮的人丧命，"沃洛嘉紅了紅脸，說道。"他想这是一种神經病。"

不过特别使他惊奇的还是我的推测：这条帆船載着已經死去的船員，还可能停在某一个荒島附近的冰雪中。他刚想問什么話，可是又不說了，只是孩子气地张着嘴，脸上，頰上甚至脖子上都兴奋得起了一层鷄皮疙瘩……

这家的主要人物自然还是安娜·斯切潘諾芙娜。大家都听她的話，就是連什么人的話也不听，見着医生总是带着責备的神情叫喊"啊，啊，啊"的猫头鷹也听她的話。难怪涅涅茨人对医生說："啊，有那么个大婆娘眞好。"她能令人肃然起敬。不仅仅是在家里，就是全城的人都听她的話。

她出身于一个有名的航海家庭。她的父亲，叔叔，几个兄弟

都在海船或是江船上作船长。有时在喀拉季——北地城称八九月为喀拉季，因为到这个时期，我們的破冰船就要引导苏联和外国的輪船通过喀拉海，——这些兄弟和叔叔們就到他們家里来。他們也都和安娜·斯切潘諾芙娜一样，身材高大，結实，大脸，大鼻子，滿脸鬍子。

安娜·斯切潘諾芙娜对于塔塔林諾夫船长的事件是从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角度来看的。

“女人眞是不幸！”虽然談話中并沒有关于妇女的事，可是她却說道。“今年盼，明年盼，也許他早就死了，連一点痕迹也沒有留下，可是她們还是在等待着，在期望着：也許会回来的！这些夜晚都是睡不着覚的！还有孩子噢！怎么对孩子們說呢？然而这些痴情都是沒有指望的，倒不如自己死了的好。不，你們甭对我說了，”安娜·斯切潘諾芙娜使劲說道，“这些事我都亲眼見过。这样的人假若回来了，当然是英雄罗，还有什么好說的。那么她呢，当然也就成了女英雄了！”

9 “我們仿佛見过面……”

沃洛嘉在早上七点鐘駕着雪橇来接我，睡梦中听見他在下面喝斥他的两只拉前套的狗卜西卡和托加。昨天晚上我和他約好一起去国营动物农場，他突然建議坐狗拉的雪橇去。

“它們只是还不会轉弯，”他一本正經地說道，“拉是拉得很好的。到了轉弯的时候，我自己下来轉弯。”

我起先反对，認为毕竟穿滑雪板更好一些，可是沃洛嘉却为自己的狗对我見怪了，我也就只好同意。

“媽媽可以作証，”他很严肃地說道，“走直路时，它們拉得很好。”

我們坐上了雪橇后，他象个道地的涅涅茨人一般，精神勃勃地吆喝了一声“海斯！”——狗就狂奔起来。哦呀，碎雪直往脸上打，眼睛刺得生痛，气也喘不过来了！雪橇在雪堆上顚簸起来，我一把抓住沃洛嘉，但他詫异地回头看了看。我只好放开他，便开始在几根小皮带上一起一落地跳起来；这几根皮带在我看来，实在是勒得太松了。

我心里想，最好是走慢一些，但这哪能行！根本沒有考虑的余地！沃洛嘉威胁地举起木棒，大声地吆喝着他的狗，因此它們奔跑得愈来愈快了。当然，我完全可以招呼沃洛嘉，讓他稍微把狗勒一勒，不过这样作等于是要他永远瞧不起。也許我还是喊他一声的好吧——这該死的雪橇在雪堆上顚簸得实在太凶了！但就在这当兒，沃洛嘉回头看了看我，他的脸那么紅潤，幸福，大耳帽雄糾糾地歪在一边，于是我决定把身子趴下去，任他摆布了。

突然！狗就象被釘住了似的站下了，連我自己也不知道会在雪橇上坐得那么稳沒有摔下来。什么事兒也沒有发生！原来是到該轉弯去普罗托卡的地方了，所以沃洛嘉勒住了狗，准备改变方向。

我記不起一路上发过多少次誓，以后再也不坐狗拉的雪橇了，——大概到国营养兽場那个島轉了多少个弯，我就发了多少次誓。可是沃洛嘉却高兴到了极点。

“眞的，好极啦，是嗎？”

我只好承認“好极啦”。

普罗托卡終于到了！我們鑽过灌木丛，从岸上滑下去，一蹦

一跳地在冰上奔馳。現在我完全相信沃洛嘉的狗在走直路时的确拉得很好。它們每一分鐘都在适应着道路的情況，躲开冻实了的不平的冰块；沃洛嘉吆喝着，咒罵着，喉嚨几乎都要喊破了。幸而对面河岸很陡，所以狗自然也就跑得慢下来了。

但是經过普罗托卡时狗又加快了速度，开始汪汪地叫起来，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好象是在互相呼应，突然从樅树林后面传来一陣不协調的嚎叫声，这声音开始很远，后来便愈来愈近了。这是一种拖得很长的粗野杂乱的嚎叫声，听到这种声音，不禁心都要收縮起来。

“沃洛嘉，打哪兒来的这么多狗啊？”

“这不是狗！这是狐狸！”

“它們为什么也会叫呢？”

“它們同狗一模一样！”沃洛嘉回过头来，嚷道。“它們会叫！”

当然，我也曾見过玄色的狐狸，可是沃洛嘉却說这个养兽場养着銀黑色的，說这完全是另外一种。全世界上再沒有哪兒有这种狐狸了。一般認为白尾梢就很好看了，可是这个养兽場还在尽力培养連一根白毛都沒有的狐狸。

总而言之，他的話确实引起了我的兴趣，十五分鐘以后，我們到了养兽場門前，肩上荷枪的警卫員告訴我們說，养兽場不开放，因此，我感到十分懊丧。

“那么是干什么用的？”

“供科学研究工作用的。”警卫員开导說。

我差点兒沒有說我們就是来研究科学的，但我看了看沃洛嘉，就及时地忍住口不再往下說了。

“可以見場长嗎？”

"場长外出了。"

"誰代理他？"

"专家組长，"警卫員說話的那种神气，好象他自己就是专家組长一样。

"好极了，我們就是要找他！"

我把沃洛嘉留在門口，便自己进去找专家組长。

显然农場的人并不太多，所以在复盖着白雪的寬大的院子里，仅有一条狭窄的小径通到警卫員指給我看的那座房屋。从老远看見这座房屋，就使我想起了瓦里亚·朱可夫曾經把他的嚙齿动物指給我們看，想起了莫斯科动物园里那所肮脏的綠色实驗室，只不过那所实驗室比較大一些。这种相似的感觉是那么的强烈，我甚至覚得已經聞到那种令人作呕的老鼠气味了。我抖掉了毡靴上的雪，推开門，走进了一間大而低的屋子，这間屋子又通着一間更大的屋子。在那間更大的屋子里，有一个人坐在桌边。我甚至覚得这个人就是瓦尔加，——虽然在最初的一刹那間因为雪耀得眼睛发了花，还不能看清楚他，同时又因为他一看見我就背着窗戶站起来了。我覚得这个人看我时的那种神情和瓦尔加完全一样，也是那样善良和稍微有点兒神經質的样子，覚得他的額上也有象瓦尔加那样的黑絨毛，只不过更密更黑一些罢了。我并且覚得他馬上就要用瓦尔加的口吻問我："您有什么事？"

"瓦尔加！"我叫道。"眞是你嗎？瓦尔加？"

"什么？"他不知所措地問道，并且象瓦尔加一样把头歪在一边。

"瓦尔加，畜牲！"我說，我感覚到自己的心开始剧烈地跳起来。"你怎么啦！眞的不認識我了嗎？"

他犹犹疑疑地笑了笑，把手伸給我。

“不，哪能，”他的声音有点做作，說道。“我們好象見过面。”

“好象！我們好象見过面！”

我拉着他的手，把他拖到窗戶跟前。

“好好看看！你这条牛！”

他看了看，犹疑不定地笑了。

“見鬼，难道你眞認不出来了嗎？”我惊异地說道。“这是怎么回事呢？也許是我弄錯了？”

他眼睛一眨一眨的。随后，脸上那种疑惑不定的神气便消失了，这下子可眞变成了瓦尔加，那个眞正的瓦尔加了，决不能再把他和世界上别的人弄錯了。同时我大概也更变得象我了，所以他終于認出了我。

“薩尼亚，”他大喊了一声，气都喘不上来了。“是你嗎？”

我們接了吻，立即拥抱着走出来，走到門口，他又吻了我一下。

“原来是你？眞見鬼！好小伙子！你什么时候来的？”

“我不是来的，是住在这兒的。”

“是住在这兒？”

“很簡单，我住在这兒已經半年了。”

“慢一点兒，这是怎么的？”瓦里亚喃喃說道。“对了，我很少进城，要不然也就会碰見你了。噢，半年！眞有半年了嗎？”

他把我带到另一个房間；这个房間和我們刚才所在的那个房間毫无区别，只是这个房間里有一张床，墻上还挂着猎枪。那

是办公室，这是寝室。附近还有一个实驗室，关于这一点是不难从屋子里的那股气味猜到的。这种动物的气味和瓦里亚，和他那失神的眼睛，和他那蓬松的头发，和那額上的絨毛这样調和，使我不禁感到好笑。瓦里亚的身上总有一股味兒。

在这一套有三个房間和一个厨房的大屋子里就住着他一个人。因为他是专家組长，照編制他应該有这么一套使他不知怎么办才好的空蕩蕩的大房子。

我忽然想起沃洛嘉还在大門口等着，瓦里亚派了个专家助理去找他。这位助理的年紀却比瓦里亚大了足有三十岁，是一个留着鬍子的，鼻子特大，气派十足的男子。不过他給沃洛嘉的印象显然很好，所以半小时后他們亲热地談着走来，沃洛嘉說巴維尔·彼得罗維奇——这个男人的称呼——答应带他去看狐狸的厨房。

“喂的也是狐狸的飯，”巴維尔·彼得罗維奇說道。

“我們今天都有什么？”

“番茄和麦片粥。”

“带他去看看‘热带的丛林’，”瓦里亚說道。

沃洛嘉脸紅了，他听見这句話以后，好象呼吸都停止了。当然啦！“热带的丛林”是多么令人神往的地名喲！

“巴維尔·彼得罗維奇，我可以先到‘热带的丛林’去嗎？”他低声問道。

“不，先到厨房去，要不然我們就会錯过早餐了！”

他們走后，剩下我和瓦里亚两个人。他忙着款待我，沏了茶，又从厨房里端出点心来。

“这是我們食堂里作的！不坏吧？”

点心也带着一种野兽的气味，我尝了一口，便模仿过去我們

兒童教养院的炊事員彼佳大叔的口吻說道：

“啊！有毒！”

瓦里亚幸福地笑了。

“他們現在都在哪兒？丹卡·薇莉琪珂在哪兒？格里沙·法伯尔呢？伊万·巴甫雷奇在哪兒？他怎么样？”

“伊万·巴甫雷奇还不錯，”瓦里亚說道，“我曾經去过他那兒。他还打听过你呢。”

“啊？”

“我說不知道。”

“是啊，你当然不知道罗！可是在莫斯科的时候誰給你挂电話来着？他們轉告你了嗎？”

“轉告我了。可是他們告訴我說是个飞行員，我那时候还不知道你是飞行員。”

“你尽撒謊！你怎么到这兒来了？”

“我嗎，——你是明白的，我想出了一种很有意思的东西，”瓦里亚說道，“用这种东西能使它們长得很快。”

“使誰？”

“狐狸。”

我不禁笑了起来。

“又是血液随年龄而变化？”

“什么？”

“毒蛇的血液随年龄而变化唄，”我郑重其事地又說了一遍，“这也是你想出来的玩意兒。見鬼，我見着你眞是高兴极了！”

我的确是很高兴，从心眼兒里高兴！我和瓦尔加向来很要好，可是我們那时幷不知道，經过了若干年之后，当昔日的生活

似乎已忘掉了大牛的时候，我們会突然意想不到地会面——这是多么快乐的事啊！

我們談到了柯拉布略夫，但这时瓦里亚想起他应該去給小狐狸吃葯了。

"你吩咐别人去吧！"

"不行，你是明白的，我得自己去，亲自去喂，"瓦里亚放心不下地說道，"这是一种軟骨病，因伺傻病而引起来的，你等我一会兒好嗎？我很快就回来。"

我不願意和他分开，于是我們便一块兒去了。

10 晚　安！

天色已經暗下来了，沃洛嘉才从"热带的丛林"回来，原来这是养兽場里划出来的一块森林区，野兽在这兒可以自由地生活。最使沃洛嘉惊奇的是狐狸居住的那些小房子。

"眞了不起呀，"沃洛嘉說，竭力不显出他兴奋到了頂点的样子。"它們的生活完全和人一样。吃早飯，飯后休息，休息以后小家伙作游戏，大的就各处去串門子。"

瓦里亚劝我留在他那兒住宿，我們就挂电話告訴医生，讓沃洛嘉一个人先回去……

北地城是个嘈杂的城市。城內交通虽然不算拥挤，只是偶尔有几輛汽車，鹿車，馬車和狗拉的車同时在街上竞相奔馳，但总还是嘈杂的城市。声音最吵鬧的是木材厂里的电鋸。这种一声比一声紧的吼叫声日以繼夜地縈繞在耳边，最后你就不去注意它了，然而脑子里总覺得远处有一个电鋸不断的响着。

可是在国营养兽場这兒却非常幽靜。我們在林子里散步，遇見了巴維尔·彼得罗維奇；他正在安置捕鶺鴒的网子，我們便和他閑談起来，談到森林，談到喀拉季，談到天气，談了很久。

“瓦連金·尼古拉耶維奇①，您怎么样，今天夜里把唐·卡尔劳斯带到您那兒去嗎？”他問道。这样一位上了年紀的，可尊敬的大鼻子男人居然称呼瓦里亚为瓦連金·尼古拉耶維奇，而且那么恭謹地和他說話，就好象是同一位真正的专家組长談話一般，这实在很可笑，也很使我高兴。唐·卡尔劳斯是一只小狐狸的名字，这小家伙很怕冷。

后来我們又回到瓦里亚的屋子里，每人喝了一小杯酒。他对我說，的确他这半年来差不多沒有出过养兽場一步。他有一項很有趣的工作：他正在解剖黑貂底胃囊，研究它們吃什么。有几个胃囊是他自己的黑貂身上的，另外二百来个是承某禁猎区的盛情供給他使用的。他发現了一件十分有趣的事：制作小型皮毛时，应該珍惜金花鼠，因为黑貂主要就是吃金花鼠的。

我一声不响地听他說。在这空蕩蕩的房子里就只我們两个人。这个房間也是非常空，单身汉住着一个大而无当的房間。

“是呀，很有意思，”等瓦里亚說完了以后，我說道。“这是說，黑貂吃金花鼠。了不起！可是对你来說，你知道最需要什么嗎？你知道你迫切需要什么嗎？結婚！”

瓦里亚眨了眨眼，接着笑了。

“你为什么这样想呢？”他犹豫不决地說道。

---

① 瓦連金·尼古拉耶維奇是瓦里亚的名字和父名在一起的称呼。通常对年长，比較有威望的，或不太熟識的人才将父名連在一起称呼。——譯者注。

“因为你这种生活，簡直同狗差不多。你知道你需要一个什么样的老婆嗎？应該是一个能够将夹肉面包給你送到实驗室里，同时并不十分要求你对她关心的女人。”

“看你說的，”瓦里亚低声說道，“这有什么呢！时候到了，我自然会結婚的。我所需要的只不过是作好論文答辯，然后我就輕松自由了。我現在不是很快就要回莫斯科了嗎。可是你呢？”

“我怎么？”

“你为什么不結婚？”

我沉默了一会兒，然后回答道：

“唔，我是特殊的一类。我的生活情况不同。您想，象我这样的人，今天这兒，明天那兒，天南海北沒有一定归宿，我不能結婚。”

“不，你也需要結婚了，”瓦里亚反駁道。“喂，”瓦里亚突然兴奋地說道，“你記不記得，你們有一次到动物园来找我的时候，卡佳是和她的女朋友一块兒来的吧？她叫什么来着？那个身材高高的，留着两条辮子的姑娘。”

他的脸色显得那么善良，天眞。我瞧了瞧他，不由得笑了起来。

“怎么能不記得呢！琪玲！很漂亮，是不是？”

“很漂亮，”瓦里亚說道。“很漂亮。”

他想讓我到他的床上睡，可是我沒有讓他这样作，就睡在地板上了。虽然这兒空床有的是，不过我向来就喜欢睡在地板上。高高的草褥子一响，我叫了一声：“啊喲”，瓦里亚立刻不安起来，以为我不舒服。其实我很舒服——从下面往上看可以看見天空，天空是那样的幽靜，仿佛周围也是森林，也鋪滿了白雪。一

面仰視着天空，一面談話多么愜意，簡直不想睡覚了。

我們什么都談到了！我們甚至回忆起了瓦里亚那个以二十戈比卖給大学的刺猬。后来我們又回到柯拉布路夫身上。

“你知道，”瓦里亚突然說道，“当然，也可能是我錯了，我覚得他是有点爱上了瑪丽亚·瓦西里耶芙娜。你認为怎么样？”

“也許。”

“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有一次我到他那兒去，看見桌上有一张她的相片。我是去問他一件事情的，因为刚好我准备第二天到塔塔林諾夫那兒去，所以他便突然談起她来了。后来他沉默下来了，但脸上的表情是那样……我断定这里面有点兒不妙。”

“瓦尔加，去你的吧！”我气憤地說道，“說实話，我眞不懂，你是住在天上，还是住在什么地方。哼！他是有点爱上了她！他沒有她就活不下去！这事的全部經过不都是你眼看着发生的嗎？唉，也难怪，你那时正在研究毒蛇，这倒也是可以理解的。”

“你說什么！原来他是一个可怜虫！”

“不錯，他是一个可怜虫。”

我們沉默了一会兒。过后我問道：

“你常常到塔塔林諾夫家去嗎？”

“不常去。去过两三次。”

“他們的生活怎么样？”

瓦里亚用手肘撑着抬起身来，似乎是想在黑暗中仔細看看我，虽然我說这話时声調十分平靜。

“沒有什么。尼古拉·安东內奇現在当教授了。”

"哦，这样！ 他教什么呢？"

"教育学，"瓦里亚說道。"請你相信我的話，他是一位很受尊敬的教授……总之……"

"总之什么？"

"据我看来，你把他看错了。"

"眞是这样嗎？"

"是的，是的，"瓦里亚深信不疑地說道，"你把他看错了！ 比如說，你看看他是怎样对待自己的学生吧。他簡直准备为他們赴湯蹈火。罗馬什卡对我說，去年……"

"罗馬什卡？ 这家伙又从哪兒来的？"

"怎么哪兒来的？ 就是他带我到塔塔林諾夫家去的。"

"这么說，他也常常去塔塔林諾夫家娄？"

"他？ 他是尼古拉·安东內奇的助教。他每天都到那兒去。总而言之，他是他們家里最亲近的人了。"

"慢着，你說什么？ 我不明白。是說罗馬什卡嗎？"

"是呀，"瓦里亚說道，"不过现在誰也不这样叫他了①。并且照我看来，他打算和卡佳結婚。"

仿佛什么东西对着我的心口撞了一下，我盘着腿坐了起来。瓦里亚也从床上坐起来，瞅着我直发楞。

"什么事？"他問道。"唉！ 活見鬼！ 我完全忘了！"他嘟嘟囔囔地說道，然后张惶失措地向周围望了望，从床上爬了下来。

"并不是打算……"

"别这样，你最好还是把話說完，"我完全心平气和地說

① 因为罗馬什卡是罗馬紹夫的卑称。——譯者注。

道。

“怎么說完！？”瓦里亚嘟嘟囔囔地說，“我什么也沒有对你說。只不过这么想，但是我想的事多着呢！有时候，我脑子里产生的某些想法，連我自己都感到惊异。”

“瓦里亚！”

“我眞不知道，”瓦里亚急的不得了的样子說道。“你糾纏我干嗎！我只不过是感覚，可是有时候，鬼才知道我感覚些什么。你可以不必相信我——这不就得啦！”

“你是感覚罗馬紹夫想和卡佳結婚？”

“不是，你这个鬼家伙！我对你說，不是！根本不是那么一回兒事！他現在穿戴講究起来了，不过就是这样罢了。”

“瓦里亚！”

“我向你发誓，再我什么也不知道了。”

“他和你談过嗎？”

“談是談过。譬如，他說过他从十三岁就开始攒錢，可是現在想不到半年以內都花光了——照你看来，这也有关系，是不是？”

我再也沒有听見他說些什么了。我躺在地板上，仰望着天空，我覚得我是躺在一个可怕的深渊里，全世界的人都在我头上喧嚷，交談，而我却一个人躺着，沒有人对我說一句話。天空仍然漆黑，星星还在眨着眼睛，不知从哪兒射来了一縷微弱的，遥远的亮光，我想，我們已經談了一夜，这下子总算談出个名堂来了！

“晚安！”

“晚安。”我机械地答道。

我眞不如同沃洛嘉一起走了的好！一个什么东西堵塞住了

我的咽喉，我很想起来到外面去走一会兒，但我还是躺着，只翻了一下身，用手捧着脸趴着。啊，原来这样！这是难以令人相信的，不过这件事已經是一分鐘也叫我忘不下了。难以令人相信的只是罗馬什卡这个人，我不能想象他和卡佳在一起的情形。可是为什么我会以为她直到現在还惦記着我呢？我們不是很多年沒有見面了嗎！

我躺着，脑子里想啊，想啊，什么都想到了，总之，不只是想这一件事。我想起瓦里亚不喜欢夜里有人盯着他，有一次，柯拉布略夫同他开玩笑，問他："要是有人用充滿爱情的眼睛看着你呢？"后来我才覺得，原来我又在想卡佳，我突然那么眞切地回想起——不是回想起她，而是想到当我看見她时常常感受到的那种微妙的心情。这时，我在世界上最大的希望就是赶快睡着。可是我不但不能闔上眼，甚至不能把眼光从天空移开，眼巴巴望着天空慢慢地，但总算是开始放亮了。

瓦里亚睡着了，我要是出去的話，也許他会醒来。但是我不想再和他多談話，因此我趴了好半天，然后又仰过来躺着，然后又用手捧着脸趴下。

后来，大概已是早上七点鐘左右，电話鈴响了，瓦里亚跳起来，睡意犹浓的样子，拖着被子，跑到隔壁房間里去了。

"喂，是我！"过了一会兒，他回来說道。"是找你的。"

"找我？"

我披上大衣，跑到电話机旁。

"薩尼亚，"这是医生在講話，"你跑哪兒去了？我現在在州执委会。我現在讓別人和你說話。"

"好的，我听着，"我說道。

"格利高里耶夫同志嗎，"换了另一个人的声音，这是內务

部人民委員会駐北地城的全权代表。"有一件急要的事。請您馬上同巴甫洛夫医生飞到万龙坎屯去。你知道列德可夫嗎？"

誰不知道他呢！他是州执行委員会委員，是北方最受人景仰的一个人。誰都知道他。

"他受伤了，需要急救。您什么时候可以起飞？"

"一小时以后，"我回答說。

"医生，您呢？"

我沒听見医生是怎样回答的。

"工具都妥当嗎？那太好了，一小时以后，我在机場等您。"

11 飞　　行

三月五日早晨，我們从北地城起飞，航向东北，乘飞机的人員是：样兒挺着急的医生，他戴着黑眼鏡，大大地变了样子；我的机械員卢利，他无論是在北地城，或在其他任何地方，只要呆上那么三、四天，就会成为最受欢迎的人物之一；最后还有我。

这是我在北极的第五次飞行！但飞到从未見过飞机的地方去这还是第一次。万龙坎屯是皮亚辛河支流上的一个非常偏僻的地方。不过医生到过皮亚辛河，他說要找万龙坎屯并不困难。

州执行委員会委員受了伤。这事是发生在打猎的时候，不过也可能不是在打猎的时候。总之內务部人民委員会全权代表請我們，也就是請我和医生，查明这件事是在什么情况下发生的。我們应該在三点鐘左右，即天亮的时候飞到万龙坎。为了防备不虞起見，我們携带着够三个人吃三十天的粮食，汽爐子，信号枪和信号弹，步枪及子弹，鏟子，帐篷，斧头。

关于天气情况方面，我只知道一点，就是北地城的天气很好。可是航綫上的天气怎样我就不知道了。至于"詢問"天气的工作，現在既沒有时間，这兒也沒处可問。

就这样，一切都妥当了，我們从北地城起飞，航向东北。所謂一切都妥当了，是說我再沒有去想昨天晚上从瓦里亚那兒听到的事。下面是叶尼塞河——一条广闊的銀白色的带子夹在白色的河岸中間，沿岸森林綿延，时而向河岸逼近，时而又远远地离开。因为昨夜失眠，我的头稍微有点兒疼，有时还发生耳鳴。这种不正常的声音只是在耳朵里响，发动机工作还是好的。

后来我离开河流飞行，冻土带便开始了——平坦无边，白茫茫的雪地上沒有一个黑点，沒有任何能吸引住視綫的东西……

我再沒去想这件事了，虽然我現在的思想里不住地想动弹，就如同作噩梦想醒过来的时候一样。为什么我这样自信，認为不可能有这样的事呢？上次她請薩尼亚向我問好时，我就应該写封信給她。但在我尚未能証明我在她面前沒有任何錯誤的时候，我不願意对她表示任何讓步。然而一个人无論什么时候决不能过于自信，以为别人爱着你，以为别人无論怎么样都总是在爱你，甚至再过上五年或者十年，仍然会不变心地爱着你。

无論向哪里望去都是一片茫茫的白雪。前方有云，我連忙爬高，鑽入云层。在这无边无际的，凄凉的，白茫茫的，破坏了远景眞实的背景上空与其說是飞行，还不如說是盲目飞行更好一些。

虽然我对罗馬什卡幷沒有什么特别的仇恨，不过，如果他現在在这兒的話，我还是会把他揍死的。我不特别地仇恨他，是因为我覚得，这样一个头上生着獺猫般蓬松的头发，通紅的耳朵，从十三岁起就想发財，攢錢，成天数算着金錢的人会和卡佳在

一起是不可能設想的！他这种妄想就如同他想要变成另外一个人——不是他自己，而是象卡佳那样正直和秀丽的人同样的荒謬。

我們穿过这块云层，飞进另外一块正在落雪的云里去，下面有一个地方在太阳照射下閃閃发光，但烏云遮住了太阳，使我們看不見它。

我的脚冻僵了，我后悔沒有穿那双較寬大的飞行靴，偏是穿了这双小的。

这么說，决定了，我要去莫斯科。不过須要事先通知她一下說我要去。我应該給她写封信，使她看了以后再也忘不了的那么一封信。

我們飞出了烏黑的云层，同平常飞出云层时一样，覚得太阳特别光耀刺目，——可是我始終不能决定怎样开始写这封信，开头只簡单地写"卡佳"呢，还是写"亲爱的卡佳"。

"我們很久沒有通信了，卡佳，当你看見这个签名时，大概会感到詫异。你生活好嗎？因为我想你还在生我的气，所以很久也沒有給你写信。当然，你沒有錯，我們很久沒有見面，这是我的不对。我从恩斯克回来就应該到莫斯科看你，不应該象我十八岁时那样在你家門前徘徊……"

忽而我又忘了写信的事。我那次应該乾脆把她带走；因为我很清楚，她不应該留在那个充滿虛伪的不幸的家庭里，和她信任的那个可怕的伪君子尼古拉·安东內奇攪在一起。

前面是山！这些山突出在云层之上，享受着阳光的照耀，有的光禿禿的，有的复盖着刺目的白雪。我从鏡子里看見卢利举起一只手，好象是向它們問好，并对医生大声喊叫，医生无动于衷地点了点头。他的样子很可笑，仿佛是一个滚圓滚圓，十分滑稽

的大动物。

在疏疏落落透过云层的光綫照耀下，可以看見地面的峽谷，长长的，蜿蜒在地面的峽谷眞是美丽极了，我无意中想到，要是在这兒迫降那可是准死无疑的。后来又开始思索写信的事，一直考虑到我不得不去作另外的，更急要的事情时为止。

当最初几块庞大的，带雪的烏云离开了山峰，翻滚着愈升愈高的时候，仿佛还沒有什么风意。

驀然間，鏡子——我刚刚在里面看見医生和卢利的鏡子变暗了，結上了冰。又过了十来分鐘，情况就变得不可想象了，很难想象我們的头上刚才还是太阳和晴空，現在却旣看不見地面，也看不見太阳，又看不見天空了。一切都变了。狂风追上了我們，起先是从左面扑来，然后又迎面扑来，然后又从左面扑来，所以我們一下子就被抛到了一边。这兒也有大霧，同时还下着碎小而坚硬的雪花，打在脸上十分疼痛，雪花很快就粘在衣服的折縫里。接着天就黑了，我再看那面鏡子时，里面什么也沒有了。周围什么也看不見，我在无底的黑暗中駕駛着飞机飞行了一些时間，疾风从四面八方吹来，风助雪威，形成了一堵一堵眞正的雪墙，我就象是在往这些风雪构成的墙壁上硬撞。有时我穿过它們，有时避开它們，有时我又穿过它們，有时又落到它們下面很远的地方。飞机突然那么向下猛落一、二百公尺。这是十分可怕的事，因为我不知道这些山究竟有多么高，不知道为什么在我的地图上沒有这些山的标高。我現在唯一所能作的，就是来一个一百八十度轉弯，飞回叶尼塞河去。一看見河岸，就沿着陡高的河岸飞，这样我們就可以繞过暴风雪，或者迫不得已时返回北地城。

轉弯！說起来倒容易。当我蹬左舵的时候，飞机竟无緣无

故地突然震动起来，于是我們又被抛到了一边去，不过我还是繼續轉湾。似乎我还对飞机說了几句什么話。就在这个时候，我感覚出发动机有点不妙，不幸的是下面正巧就是已經远远落到我們后面去了的，刚才还引起过我的戒心的那种峽谷。它們一閃就不見了，后来又一閃，这下子可就綿綿不断，使人感到毫无希望了。如果我們摔在这里，誰也不会找到我們，永远也不会有人知道这件事是怎样发生的。应該赶快离开这些峽谷，飞机在空中忽兒被掂起来（該死的暴风雪仿佛在考虑怎样捉弄我們，）忽兒又随心所欲地晃蕩着乱飞一通。我終于飞离了峽谷，但发动机的情况还是有点不妙，所以不得不降落。着陆的时候必須尽量的慢，随时注意轉弯傾斜仪，不可带有任何傾斜，随时考虑下面的陆地；因为陆地虽說是在下面，但并不清楚在什么地方，是什么样子。这些注意事項象个鐘表似的不断地在我脑子里敲着，我大声和自己，和飞机說話。但我这时并不害怕。我只記得，当一大块什么东西紧挨着在飞机旁边掠过去的刹那間，我急出了一身大汗，我連忙閃到一旁躲过了它，机翼差一点儿擦到地面上。

12 暴风雪

我不准备叙述我們在离皮亚辛河岸不远的冻土带度过的那三昼夜了。这是我一生中最痛苦的回忆之一，而且最主要的是，这是一种千篇一律的回忆。这一个鐘头和另一个鐘头相似，另一个鐘头又和第三个鐘头相似；所沒有重复的只是最初几分鐘，因为这个时候我們必需想办法把飞机固定起来，不然它就会被暴风雪卷跑。

諸位不妨也試一試在沒有一草一木的冻土地带，风力达到十級的时候把飞机固定起来的滋味吧！我們沒有关閉发动机，使机尾向着风。也許我們能够把飞机埋起来吧，可是只要鏟子一动，雪就立刻被风卷走了。飞机繼續猛烈地搖晃着，风势愈来愈猛，应該赶快想出一个妥善的办法来，否則再过半小时就晚了。这时我們就作了桩很簡单的工作（建議北极飞行員作参考）：我們把繩子拴在机翼上，然后再把滑雪板，皮箱，装着东西的箱子，甚至漏斗——总而言之，所有能使雪迅速堆积起来的东西拴在繩子的另一端。十五分鐘以后，在这些东西周围就积成了雪堆，而在机身下面其它的地方，雪依然被风不断地卷走。

現在我們除了等待之外，就再沒有别的事兒了。等待是件很不愉快的事，然而这是留給我們唯一可作的事。等待，等待，可是等多久呢，誰也不知道！

我上面已經提到过，所有供强迫着陆后需用的东西我們都带得有。可是，如果就連从座艙里爬出来一下都那么困难和痛苦，一天只能出来一次，而且只是因为一天里不得不爬出座艙一次的緣故，那么你还想作什么其它的，比如說搭帐篷之类的事那怎么成呢。

蒙布上的繩子还沒能解开，手指已經冻疼了，因此只好分三回来解它。风刮得使人一步也迈不动，因此，我們只好創造出一种特殊的走路方法——作四十五度的弯腰，頂着风走。

第一天这样过去了。身上的热量减少了一些。我們更想睡覚了，为了不致于睡着，我想尽各种办法消磨了許多时間。不过这些办法作用都不大。例如，我試着点汽爐子，又命令卢利点噴灯。这些任务真是够困难的！当你每一分鐘都感到自己从头到脚渾身的皮肤似乎都暴露在外面的时候，当你的耳朵深处也突

然寒冷起来，鼓膜似乎要冻僵了的时候，当雪花轉瞬間就扑滿了脸，很快就結成一个冰面罩的时候，要点起汽爐子来实在是困难。卢利想講点笑話，可是在零下五十度連笑話也結冰了，他沒有别的办法，只好把自己会在任何場合，任何时候說笑話的本領拿来当作笑柄了。

第一夜这样过完了。热量又减少了一些，更加想要睡覺了。雪仍然从我們身旁扫过，最后甚至令人覚得，仿佛全地球的雪都从我們身旁飞过去……

在我們所謂"蟄居"于皮亚辛河畔的这些日子里，我对医生有了进一步的認識。

感到自己完全无能为力，意識到逃出絕望的境地已經毫无可能，这是最可哀的事了！如果我的身体不是那么健康和結实，心情似乎还会輕松一些。这些感想同另一种不愉快的想法——沒有完成这次責任重大的任务的想法摻杂在一起，再加上和第三种与誰也不发生关系的感情——自尊心受了侮辱和委曲的感情攪合在一起，这就是我当时的情緒。在这样的心情下，吃东西也沒滋味了，老实說，就是冻死也不是那么可怕的事了。

这些情况医生都明白，也都看出来了！我有生以来不曾受到过这样精細的照料。他对我的每一种想法和感情都能对症下葯，甚至对于那种和誰也不发生关系的感情似乎也有葯方。

第三天。很想睡覚。热量愈来愈少。皮袄愈发潮湿了，你只要一想到这种潮气可能冻冰，立刻就神經过敏地感覚有种寒冷直透骨髓。

我們不得不时常将皮袄里面的冰敲掉，这样也許倒好一些，因为只是那么枯坐着，胡思乱想，沒止境地胡思乱想实在太苦悶了。后来身上的热量愈来愈少（毫无办法，冷风不断地吹去热

气)，我于是把飞行手套穿在脚上，然后再套上飞行靴。最主要的是坚持不要睡觉。最主要的是别讓空勤机械員睡着，他在我們当中样子最壮健，但实际上却是个草包。医生不时地拍一拍他，讓他振作振作。后来医生自己也打起瞌睡来了，現在只好由我不时很客气地，但毫不放松地推一推他，讓他振作振作。

"薩尼亚，沒有的事兒，我根本不想睡，"他用力睁开眼睛，喃喃地說道。

不过我却是再也不想睡了。风吹着雪在耳边呼嘯，有时又是片刻的寂靜，而这种顫动的寂靜似乎比那阴惨的，令人难以忍受的空嚎更为响亮。在遙远的地方，迪克逊，北地城的无綫电报务員正在談論着我們：

"他們在哪兒？飞过某地了沒有？"

"他們沒有飞过。"

枯坐靜候，等待这場暴风雪結束，这是非常无聊的。最后，我想起我还有一本書。我把皮袄捆在膝盖稍上一点兒，連头带手一起鑽了进去。这間"小屋"实在太狹窄了，不过，如果左手拿着手电筒举到耳根以上，右手拿着書，还是可以讀的！我的手电筒是带小发电机的，要它发亮就需用手指不断地工作；不过手指不断地工作是不可能的。只要我一松手，立刻就冷清起来，一切仍然恢复原状，我又开始感到雪花透过座艙縫隙吹在我的身上。

若干年后，当我讀了斯梯芬逊著的"好客的北极"之后，我才明白这么久不睡觉是錯誤的。不过那时我还是个沒經驗的北极飞行員，所以会以为在那种情况下睡觉就等于送死。

我大概終究还是睡着了，或者是沒有睡着产生的一种幻觉。我觉得自己是在一个十分狹小的箱子里，在地下很深的地方，因为我清晰地听到了上面街市的嘈杂声，电車的鈴声和轟隆轟隆

的声音。这些幻覺并不很可怕，但我总感到很懊恼，因为我現在躺在这兒，手脚都不能动弹，然而我連一分鐘的空閑时間也沒有，須要赶紧飞到某个地方去。后来我又糊里糊塗地到了街上，站在灯光輝煌的一家商店的窗前，看見卡佳在商店里迈着均匀安詳的步子来回走着，可是她竟連看也不看我一眼。毫无疑問，这是她。虽然我有点害怕不是她，或者虽然是她，但却有人来妨碍我和她說話。于是我赶忙向商店里跑去，但是刹那間什么都沒有了，黑洞洞的，只見玻璃門上写着“閉店”两个字。

我睁开眼睛，但是因为覺得刚才看到的事情那么甜蜜，所以又忙把眼睛閉上了。这时暴风雪已經平息。雪静静地躺在大地上，也不再使我們头昏目眩了。在白皚皚的雪地的上空是太阳和蓝天，天空如此辽闊，只有在海洋上和冻土带才能看到。在这万里晴空和茫茫雪地上，距离飞机二百步左右站着一个人。他手里拿着一条赶鹿用的长竿子，背后，站着几头套在雪橇上的牡鹿。远处可以看見两座陡峭的小雪山，仿佛是用笔勾画成的，但并不十分明显。毫无疑問，那是涅涅茨人的窝棚，就是在着陆时吓了我一跳的那一大块黑东西。現在这些窝棚都被积雪埋起来了，只有上面开着口的錐頂黑糊糊的露在外面。窝棚周围站着一些人，大人小孩都有，他們一动也不动地站在那兒看着我們的飞机。

13 什么叫汽爐子

我从来沒有想到在爐灶旁边烤一烤冻僵了的腿也是一种幸福。然而这是真正的，什么也比不了的幸福！你能够感覺到暖

气怎样顺着身体上升，愈升愈高，終于不知不覺地，緩緩地温暖了你的心。

我再也沒有感覚到什么，再也不想什么。医生在我的背后念叨了些什么，可是我沒有听，他囑咐我用酒精擦腿，我根本沒有理会。

爐灶上繚繞着冻土带特产的灌木的烟气，好象燃着的湿松枝冒出来的烟；我討厌这种刺鼻的烟味，不过只要暖和就行。我会感到暖和，这几乎是令人难以相信的事！

涅涅茨人盘着腿围坐在火旁，瞧着我們。他們脸上的表情很严肃。医生用涅涅茨話向他們解释什么事情。他們专注地听着，仿佛很懂的样子不断地点头。后来才知道，其实他們什么也沒有明白，医生恼恨地把手一甩，开始模仿一个受伤的人和一架前去救他的飞机。这情景实在是很好玩的，如果我能哪怕再支持一分鐘不睡就好了。他一会兒捧着肚子躺下，一会兒又举起双手，蹦起来向前猛扑。突然他回过头来很詫异地对我説道：

“怎么样！他們居然全知道。他們甚至知道列德可夫伤在哪兒。这是謀杀事件。他被人打了黑枪。”

他又講起涅涅茨話来了，我在睡梦中听到他是在問涅涅茨人知不知道刺杀列德可夫的人是誰。

“他們説：开枪的人跑回家去了。回家想去了。想一天，想两天，不过总是会回来的。”

現在不睡覚已經是不可能的事了。眼前的一切忽然浮动起来，我感到好笑，因为我欣喜自己終于睡着了……

当我醒来的时候，天已大亮，帐篷上的皮子被人掀开了一块，从这个亮得刺眼的三角洞往外看去，可以看見医生在一个地

方站着，涅涅茨人蹲在他的周围。再远一些还有一架飞机，这一切結合在一起使我想起一个熟悉的电影鏡头，我甚至恐怕这个鏡头会一閃而过。但这不是电影鏡头。这是医生，他在問涅涅茨人万龙坎在什么地方。

“是那兒嗎？”医生一手指着南方，着急地問道。

“在那兒——在那兒，”涅涅茨人随声附合着說道。

“是在那兒嗎？”他指着东方。

“在那兒。”

后来涅涅茨人一致地指着东方，医生便在雪地上画了一幅巨大的北冰洋沿岸地图。但这也无济于事，因为涅涅茨人对于看地图就象看艺术作品似的一竅不通。他們之中有一个很年輕的人，为了表示他也会繪画，便在地图旁边画了一只鹿。……

首先应該作的一件事就是把飞机从雪里刨出来。要不是涅涅茨人帮助我們，我們永远也不能胜任这件工作。我生来还沒有見过这样不象雪的雪！我們用斧头，鏟子去砍，用刀去剥。終于把最后一块雪砖剥碎了，抛到一边去，我推荐給北极飞行員的固定工事土崩瓦解了。所有的鍋子和水壶里都烧上了水，好用来起动发动机。那个在雪地上画鹿的年輕人現在被請来作我們的領航員，指引我們到万龙坎去的道路。他正在和哭得十分伤心的妻子告别，这位年輕的妻子也穿着鹿皮褲子，和男人不同的只是辮子上多了点花絨布条，这倒是很有趣兒的事。太阳从高架云层中鑽了出来，这是好天气的征兆。医生正在給人点眼藥，我告訴他該“完事”了。这时卢利跑来告訴我說我們不能飞了。

起落架的一个支柱折断了。无疑問是在着陆时，我为了躲避窝棚猛然閃到一边去时弄断的。起落架这部份是由涅涅茨人从雪里刨出来的，所以我和卢利事先沒有发現。

从北地城起飞已經整整四昼夜了。不用說，大家已經在寻找我們；虽然暴风雪把我們刮到預定航綫以外，可是最后他們还是会找到我們的。不过，誰又敢說他們一定能找到我們呢？說不定現在飞到万龙坎去已經迟了，或者飞去也只是运尸首了吧？

这是我在北极的第一次"战斗洗礼"。我突然恐慌起来，怕自己完不成任务，空着两只手回去。或者要象个无依无靠的小狗似的，被人在冻土带一架孤立无援的飞机旁边找到，那就更加可怕了。怎么办呢？

我招呼医生，請他把涅涅茨人都集合起来……

这是在窝棚里的一次难忘的盛会，大家围着火，更确切一点說，是围着烟坐着，这烟从我們头上的一个圓洞里冒出去。簡直不能理解，在一个窝棚里怎么能够容納下这么多的人！涅涅茨人为了欢迎我們特别宰了一头牡鹿。他們生着吃；把肉銜在嘴里用一只手拉着，然后极其熟練地将肉切断。怎么他們用刀子就不会把鼻子尖削掉呢！

我并不是一个有洁癖的人，不过总还是尽量不去看他們把生肉条在盛着血的碗里蘸一蘸，津津有味地咂着，送到嘴里去的样子……

"事情很糟糕，"我这样开始說道，"我們要去救一个受了伤的人，大家爱戴的人，可是我們在这兒已經蹲了四天了，我們絲毫也不能帮助他。伊万·伊万內奇，請譯吧！"

医生譯完了。

"不过更糟糕的是現在时間过了这么久，而我們距万龙坎还很远，甚至不能肯定应該向哪兒飞——向北还是向南，向东还是向西。"

医生譯完了。

“还有更糟糕的是我們的飞机坏了。飞机坏了，沒有你們的帮助，我們就沒法把它修复。”

涅涅茨人立刻齐声講起話来，但医生举起一只手，他們便鴉雀无声了。我在白天就发現他們对医生非常尊敬。

“要是沒有你們，我們是很糟糕的，”我繼續說道。“沒有你們，我們兴許已經冻死了，沒有你們，我們就会对付不了埋起来的飞机。伊万·伊万內奇，請譯吧。”

医生譯完了。

“不过我們还有一个請求。我們需要一块不大的，但很結实的，长約一公尺的木头。这样我們就能修复飞机，繼續向前飞，去搭救那位可尊敬的人。”

我竭力把話說得就象是先在脑子里从涅涅茨語譯成俄語那样簡单。

“当然，我也明白，木头在这兒是非常稀有而又貴重的东西。我本想为这块一公尺长的，結实的木头付給你們許多錢。但是現在我沒有錢。不过我可以向諸位推荐一个汽爐子。”

卢利立刻从皮袄里掏出汽爐子来，把它高高地举在头頂上。——这是我們預先約好的。

“当然，諸位知道汽爐子是什么东西。这是一种可以烧水，煮肉，熬茶的机器。生一次劈柴火要多少时間呢？半小时。可是汽爐子只要一分鐘就能点着了。在汽爐子上甚至可以烤点心，总而言之这是一件极好的东西，住家过日子有很大的用处。”

卢利加足了煤油，用火柴一点，火焰轟地一下冒起来，差点兒冲到棚頂上。可是該死的汽爐子好象故意过不去似地老是点不着，我們只好裝作似乎应該这样来点火，不一下子把它点着。

不过这个花招兒也不容易要好，因为我刚才說过生汽爐子毫不費力的。

“送我們一块一公尺长的結实的木头，我們就送給你們这个汽爐子。”

我有点担心涅涅茨人会因礼物菲薄而見怪，但他們并沒有見怪。他們默默地，認眞地看着这个汽爐子。卢利不停地打汽，爐心烧得通紅，紅色的火苗在爐心上竄来竄去。說实話，在这一刹那間，在这荒凉遙远的冻土带，在涅涅茨人的这座窝棚里，我甚至也覚得这个汽爐子忽然成了一个有生命的，燃烧着的，呼呼响着的宝貝了！大家怀着眞摯的敬意默默地看着它。

后来有一个老头兒，銜着长烟袋，系着一条女人头巾，虽然如此，但絲毫也不影响他保持着异常尊严的态度。他站起来用涅涅茨話說了一通，我覚得他講的是一句长而又长的句子。他虽然是向着医生講，但却是在回答我的話，伊万·伊万內奇把他的話翻譯了出来，原来是：

“对付烟的办法有三种：堵住迎风那面的烟孔，火势就会更加旺起来；可以把当作房門用的兽皮掀开；也可以在門的上方再作一个孔，以便出烟。不过，在我們这兒接待客人的办法只有一个：他想要什么就給他什么。现在我們就要吃鹿肉，睡覚。随后我們把窝棚里能找到的木头都給你送来。至于这个名貴的汽爐子，那么你願意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14 旧黃銅矛鈎

刚把一只生鹿連头、带耳朵和眼睛一起吃光，涅涅茨人就把

他們所有的木头东西都給我們拉来了。木头凿的盘子，吊鍋子用的挂鈎，紡織机上的一个配件——两側有圓洞的木板，雪橇的滑木，滑雪板。

"不合用嗎？"

他們很惊訝。

"不过木头是很結实的，一百年也用不坏。"

上帝才知道怎么落到这冻土大地上来的一张椅背也被他們拉来了。我們未来的領航員拖来一个神象——一个披戴着各种顏色絨布条的眞正木偶，尖脑瓜，在常人肚臍的地方釘了一顆釘子。

"不合用嗎？不过木头是很結实的，一百年也用不坏。"

应該承認，当我看見这位涅涅茨人很严厉地向他那可怜的，哭哭啼啼的妻子說了几句什么話之后，搬出来了一个包着洋鉄叶子的木箱子，这无疑是他們窝棚里唯一的装飾品，这时我眞是为自己的汽爐子感到慚愧。他很滿意地走到我面前，把木箱子放在雪地上。

"把木箱子拿去吧，"医生翻譯道。"有四块很結实的木板。我是共青团員，什么也不需要。你的汽爐子对我沒个屁用。"

我不知道他是眞这样說呢，还是医生把最后一句話譯走了样。但无論怎样說吧，这是很动人的場面，因此我誠心誠意地握了握这位共青团員的手。

不知你們有过这样的感覚沒有，当你滿脑子里只有一个想法，甚至奇怪世界上居然还有别的願望和想法的时候，突然間那些别的願望和想法象暴风驟雨似的闖进了你的生活，使你在一剎那間忘記了刚才你还全心所追求的东西。

当我看見一条黃銅的旧矛鈎毫不出奇地放在雪地上几根搭窝棚用的竿子中間的时候，我这时的感覚正是这样。

当然，今天什么事都不同于往常。从一开始，在我大談汽爐子时，涅涅茨人一本正經地在听着，而我們之間却象在梦境中一般，相隔着一条笔直的，仿佛是灰色长鏈作成的迷蒙的烟柱，这样的情景可說是罕見的。

飞机周围的雪地上摆着一些居家用的木头物件也可說是一件怪事。使我感到奇怪的还有一个六岁的涅涅茨孩子，他居然嘴里銜着烟斗，并且以命令的口吻对一个給我們拿来一块海象骨头的老太婆說話。

不过，最叫人奇怪的还是这条矛鈎。大概全世界上再沒有比它更奇怪的东西了。

这时卢利从座艙里向外探望了一眼，喊了我一声，我从极远的地方，从这条矛鈎突然把我带去的那个遙远的世界里回答了他一声。

这究竟是一条什么矛鈎呢？其实也沒有什么特别的！一条旧黃銅矛鈎。不过在这年深日久的，生了綠锈的黃銅上非常清晰地鐫着："'圣·瑪丽亚'号帆船"的字样。

我向周围看了看：卢利还在座艙里往外张望，他毫无疑問就是留着大鬍子的卢利，我天天都要嘲笑他这把大鬍子。他留鬍子是为了摹仿一位有名的北极飞行員弗同志的，不过他的鬍子和他那年輕活泼的面孔却极不相称。

医生伊万·伊万內奇被許多涅涅茨人围着，站在远处地头上的一个窝棚旁边。

一切都在原地沒动，同一分鐘以前絲毫不差。但在我的面前摆着一条刻着"'圣·瑪丽亚'号帆船"字样的矛鈎。

“卢利，”我很鎮定地叫道，“到这兒来。”

“合用嗎？”卢利在坐艙里喊道。

他跳出座艙，走到我跟前，困惑不解地凝視着矛鈎。

“念念上面的字！”

卢利念了一遍。

“是一只什么船上的，”他說道。“是‘圣·瑪丽亚’号帆船上的。”

“不可能是！不可能是，卢利！”

我撿起矛鈎，象抱小孩似地双手捧着它，卢利大概以为我神經失常了，他嘟囔了几句，便撒开腿跑去找医生。医生走来用他那微微发顫的手不安地摸了摸我的头，对着我的眼睛看了好久。

“同志們，你們眞是見鬼！”我气憤地說道，“你們以为我神經失常了嗎？沒有的事！医生，这是‘圣·瑪丽亚’号船上的矛鈎！”

医生摘下眼鏡，开始研究这条矛鈎。

“显然这是涅涅茨人在北地島上找着的，”我激动地继續說道。“或者不，当然不是在北地島上，而是在岸边的什么地方。医生，您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嗎？”

涅涅茨人早已聚集在我們周围，他們那付神情，就仿佛是已經不下一千次地看見过我这样激动，这样大声叫嚷把矛鈎指給医生看的样子。

医生問这是誰的矛鈎，这时一个涅涅茨老人走了出来，他脸上的表情滞板，皺紋很深，仿佛木头雕的一般，他用涅涅茨語說了几句話。

“医生，他說什么？他的矛鈎是从哪兒来的？”

“你的矛鈎哪兒来的？”医生用涅涅茨話問道。

涅涅茨人作了回答。医生譯道：

“他說——撿来的。”

“在哪兒撿的？”

“在小船上，”医生譯道。

“怎么在小船上？他在什么地方找到这只小船的？”

“在岸边，”医生譯道。

“哪兒的岸边？”

“泰麦尔。”

“医生，泰麦尔呀！”我这一声喊叫，声音那么大，使他不禁又耽心地看了看我。“泰麦尔！这是距北地島最近的海岸！小船在哪兒呢？”

“小船沒有了，”医生譯道，“碎片还有。”

“什么碎片？”

“小船的碎片。”

“拿来看看！”

当老人去取小船碎片的时候，卢利把医生拉到一旁，他們悄声地議論了一番。卢利似乎还不甘心，認为我眞是神經失常了。

过了几分鐘，涅涅茨人拿了一块防水帆布来，他在泰麦尔找到的小船显然是用防水帆布作成的。

“这是不卖的，”医生譯道。

“伊万·伊万內奇，請您問問他，小船上还有沒有別的东西？如果有的話，那么都是些什么，到哪兒去了？”

“还有东西，”医生譯道，“我不知道哪兒去了。事情很久了。大約已經十年了。有一次我去打猎，看見有一輛雪橇。雪橇上放着一只小船，小船里放着一些东西。有一支猎枪很不好，已經

不能发射了，子弹沒有。滑雪板也很不好。还有一个人。”

“人?!”

“等一等，——也許是我說走了嘴，”医生連忙說道，他用涅涅茨話又問了一遍。

“是的，一个人，”他重复說道。“当然，是死人，脸被熊啃了，也躺在船里。完了。”

“怎么完了?”

“再什么也沒有了。”

“伊万·伊万內奇，請您問問他搜过这个人身上沒有，口袋里有沒有什么东西？也許有什么紙片，文件。”

“有。”

“在哪兒?”

涅涅茨人一声不响地聳了聳肩膀。大概在他看来，这个問題問得眞是糊塗。

“难道就剩下这么一条矛鈎嗎？这个人不是穿得有衣服嗎？衣服哪兒去了呢?”

“衣服沒有了。”

“怎么沒有了?”

“很簡单，”医生这时也发起火来了，“你大概是認为他应該預知十年以后，你和你的飞机会落到他头上，而特意給你把衣服保存着嗎？十年！何况那人还可能在这之前十年就已經死了哩！”

“亲爱的伊万·伊万內奇，您别生气。一切都清楚了！現在只要把这件事情記載下来——記載下来，并且請您加以証明，您是亲耳听見他說的。請您問問他叫什么名字?”

“您叫什么名字?”医生用涅涅茨話問他道。

"維尔加·伊万。"

"多大年紀了?"

"一百岁,"涅涅茨人回答道。

我們怔得哑口无言,卢利竟捧腹大笑起来。

"多少?"医生重又問道。

"一百岁。"涅涅茨人又說了一遍。

医生无可如何地向周围看了看。

"鬼才知道涅涅茨話的一百是怎样說的,"医生嘰哩咕嚕地說道。"也許是我錯了?"

"一百岁,"伊万·維尔加用地道的俄語固执地重复道。

当我們在窝棚里記載他所叙述的故事时,他还三番五次說自己是一百岁。他的岁数可能要小一些,至少表面上看来要小一些。不过我愈是仔細端詳他那张象木头雕刻的面孔和那毫无表情的目光,就愈加相信他确实是很老了。一百岁——这是他的驕傲,所以他才三番五次地去說它,直說到我們在記录中写上:"百岁猎人伊万·維尔加"为止。

15 万 龙 坎

說实話,我到现在还不知道作起落架支柱的那块木头,涅涅茨人是从哪兒弄来的。他們夜里穿上滑雪板到什么地方去了一趟,大約是到邻近的一个游牧地,等到早上,当我們从窝棚里爬出来的时候,这一块雪松木就摆在我們門旁了。

我在窝棚里度过的一夜不是很安靜的。只有伊万·伊万內奇在篝火旁边睡着了。他的两片帽扇扎在头頂上,象兎子耳朵似

的可笑地翘在皮袄外面。卢利翻来复去不住地咳嗽。我没有睡着。一个涅涅茨女人坐在摇籃旁边，我很久都在听她那仿佛是毫无感情，同时又象是自我陶醉地哼唱一首单調的曲子。有几个字不断地重复过来，重复过去，最后我甚至覚得这支歌就是由两三个字編成的。嬰兒早已睡着了，可是她还在唱。当潮湿的柳木燃烧正旺的时候，她那渾圓的脸孔不时被火光照耀得发亮，这时我才看見她是閉着眼睛在唱的。到了早上，医生把这支歌譯給我听，她唱的是：

冬天里。
我举目四望，
我的爱兒啊，
到处是白茫茫的原野，
我的爱兒啊。
我望湖上——
只有寒冰发着青光，
我的爱兒啊，
我望高山——
只見山石黑色蒼蒼，
我的爱兒啊。
可爱的冻土带，
白色的原野，
我的爱兒啊。
我的小快腿，
你的小耳朵多么可爱，
我的爱兒啊。
你的小眼睛多么可爱，

我的爱兒啊。

你的小鼻子多么可爱，

我的爱兒啊。

我望天空——

流云朵朵泛白，

可爱的冻土带。

和瓦里亚談話时体驗到的那种感情又回到我的心上，它是那样的强烈，使我眞想爬起来走出窝棚去，不听这个閉着眼睛的涅涅茨女人唱的这首令人厌倦的歌子也是好的。但我終究沒有起来。她愈唱愈慢，愈唱愈低，随后便沒有了声音，她睡着了。除了我以外，整个世界都在熟睡中；只有我一人躺在黑暗里，心兒由于孤独和委曲在哀泣。假如一切都已完結，假如我們之間已經沒有，也不会再有任何关系，而他日相逢时将形同路人，那么干嗎又发現这根矛鈎呢？我极力想克制着心头的煩恼，但是压制不住，我不断地努力，最后終于睡着了。

到中午的时候我們就把起落架修好了。我們把这块圓木头旋了几个孔眼，安装在飞机上代替支柱。我們用繩子把夹具纒起来，使它更結实一些。現在飞机象是被打伤了的样子，显得很可怜。我和卢利走开了几步，从一旁冷眼估量了一下这番工作。

“怎么样？”

卢利厌恶地揮了一下手。

沒有什么关系，姑且認为一切都很好吧。需要燒些热水，把发动机起动起来。

我們把大小鉄桶里塡滿了雪，把鉄桶放在汽爐子上。可眞是糟践人的事兒！我們的汽爐子，这个“住家不可缺少的，呱呱叫的机器”燃燒得很不好。

一切都妥当了，发动机也热了。开始起动了，涅涅茨人拉紧了起动繩[1]。

“注意！”

“是，注意。”

“一，二，三一拉！”

起动繩脫了，涅涅茨人摔倒在雪地上。

于是，又从头干起：

“注意！”

“是，注意”

“一，二，三一拉！”

这样重复了四次。发动机抖动着，契卡契卡地响着，轉了二十来下又停住了。后来終于发动了起来。分别的时間到了！涅涅茨人围聚在飞机跟前，我紧紧地和他們握手，謝謝他們的帮助，祝他們打猎吉利。他們笑嘻嘻的，样兒非常滿意。我們的領航員腼腆地笑着，往飞机里爬。我不知道他和他的妻子分别时說了些什么話，不过她很愉快地站在飞机旁边，穿着一件用杂色絨布鑲边的皮大衣，系着一条宽腰带，戴着一頂寬毛边的风帽，显得滿面生輝的样子。

她那高有半公尺的风帽，上面挂有一些叮鈴噹啷的小物件，风帽底下是一张圓圓的小脸——这就是我在分别时所見到的一切。

我习惯地举起手来，象是請求涅涅茨人准許我們起飞。

“再見吧，同志們！”

我們起飞了！……

---

[1] 旧式的飞机在起动时，需要用繩子套在螺旋桨上向它旋轉的方向拉动，就象卡車的搖把似的。——譯者注。

我不准备叙述我們是怎样飞到万龙坎，我們的領航員辨認地形的能力使我佩服得五体投地，他看那毫无二致的盖着雪的平川就象看地图一样熟悉。在一个游牧点的上空，他請我把飞机稍停一会兒；等他知道飞机不可能停一会兒的时候，甚至感到很扫兴。

我不准备叙述我們在万龙坎是怎样着陆的。試飞飞行員都很熟悉这种特殊的，职业性的感覚，这是由冒险，責任心和侥幸加在一起产生的一种容易燃燒起来的复杂的感覚。我們終于坐在一架起落架支柱是用木棒作成的，新式飞机上飞行了，这簡直是飞机制造界的奇聞！我大概将飞机全部重量恰好落在了那个完好的起落架上，所以还沒等飞机停住，卢利就从座艙里跳出来，对我伸出一个大拇指表示贊許。

我不准备叙述在万龙坎人們怎样欢迎我們。有三家人的茶炊都燒得开了焊口；又有一家的小孩从搖籃里摔出来，弄得医生不得不立刻予以治疗。我不准备叙述他們怎样用鮭魚和餡兒餅来款待我們，我怎样組織了一个飞机模型小組，并且还带少先队的兒童們坐飞机，万龙坎的居民怎样确凿地告訴我說，就在我們飞来的那一天，那一个时候，在村子上空还有两架飞机在盘旋，——后来我終于猜到了原来就是我們那架飞机，因为在着陆前，我們的飞机轉了三圈兒。

但有一件事我却不能不加以叙述，那就是伊万·伊万內奇在万龙坎的情形。

列德可夫的病情很不好。过去，在会議上我不止見过他一次，并且有一次还从紅雅尔斯克把他送到了伊加尔卡。他的文艺知識使我十分惊佩。原来他是列宁格勒教育学院毕业的，总而言之是一个学識渊博的人，他不仅讀过列夫·托尔斯泰的作

品，同时还讀过伏尔泰[①]的著作。他二十三岁以前，在冻土带当过牧童，无怪乎涅涅茨人談到他的时候都怀着驕傲和热爱的心情。

可是这位杰出的，聪明的人物，出色的政治活动家現在却被一个坏蛋打伤了，躺在这里，我刚一走进門的时候，都沒有認出是他，因为他的相貌完全变了。

甚至不能說他是在躺着。他坐在床上，痛得咬着牙。陣陣的剧痛常常使他猛地蹦起多高：他站起来，抓住床背，一下跳到椅子上。看見疼痛折磨着这高大，强壮的身体是十分可怕的。有时疼痛停止几分鐘，他的脸才有了人的脸相。可是过后便又是那种可怕的样子了！他咬着上嘴唇，眼睛——这位无力克制自己的壮士的恐怖的眼睛——也歪斜了。突然他用那只健康的腿站起来，又一个斤斗栽倒在床上。但就是在床上他也是时刻不停地滚来滚去。是不是因为子弹打中了某处的神經系統，或者还是伤口化脓疼痛难忍，这我并不知道。可是我有生以来，还从沒有見过比这更恐怖的景象！看着他那样子实在可怜，当他满床翻来复去，痛苦不堪地努力想坐起来的时候，大家都不禁为之失色。突然，他又竭尽全力一下子蹦到椅子上。

看見这样的病人往往会使人失掉理智的！可是伊万·伊万內奇却沒有，而且完全相反！他突然变得年輕了，他鼓起嘴唇，象一个誰都怕他的青年軍医。他很快就把病人房里的人都轟了出来，連那位不知为什么一定要参加診視列德可夫病情的区执委会主席也不例外。当本地医助，一个戴眼鏡的瘦瘪的老太太战战兢兢地在他面前出现时，他很客气地問她道：

---

① 伏尔泰（1694—1778），法国哲学家，十八世紀末法国資产阶級革命启蒙学者。著有哲学通信，哲学辞典等書。——譯者注。

“您参加过截肢手术嗎？”

他以灵巧自然的动作，一会兒便将屋子里的家具重新摆設了一番，把多余的一张桌子搬出去，把准备用来施行手术的一张桌子搬到屋子中間的吊灯下面。

他吩咐把全鎮的灯都拿来，但是“不要冒黑烟的”，他把灯分散挂在墙上，于是这間屋子立刻被万龙坎从来未曾有过的灯光照得通亮。

他刚把眉毛一揚，瘦瘪的医助便連忙拿着那条他認为不很洁凈的毛巾从屋里跑出来，我听見她在厨房里用医生那样凶狠而又和藹的声音說道。

“我的乖乖，你們存心把我送进棺材里去嗎？”

但是并沒有人存心把她送进棺材里去。大家都蹑着脚来回地跑，称医生为“他”。

医生用肥皂，刷子洗了不下半小时的手，一面这一句，那一句但又很客气地吩咐着别人。后来他手也沒有擦乾就走进病人房間里去了，他停下脚步，叉开腿，摊开手，評判式地周围打量了一番。后来門砰地一声閉上了。雪亮的房間，躺在雪白的抬子上的病人和穿着雪白罩衫的人，——这幅在万龙坎看来十分希奇的景象就隐沒不見了。

我們的伊万·伊万內奇在万龙坎的举动就是这样。四十分鐘之后，他从手术室里走出来。手术的經过一定是良好的，所以他一面脫罩衫，一面用拉丁語对我說了几句話，然后又引用柯兹瑪·普魯特可夫的話說道：

“假如你想作一个幸福的人，那就作吧！”

我們一早从万龙坎起飞，三个半小时后，沒有遇到任何险情就在北地城降落了。

关于这次的事情——即医生在当时那种困难的条件下能作出这样漂亮的手术，总起来說，也就是关于我們这次飞行的情况，后来在“消息报”上发表了一篇短訊。这篇短訊的結尾說“病人的健康在迅速恢复中”。的确，病人很快就痊愈了。

我和卢利受到了表揚，医生則得到了涅涅茨民族区的一张奖状。

那条旧黄銅矛鈎現在挂在我屋里墙上一张大地图的旁边，地图上面标着“圣·瑪丽亚”号帆船的漂流路綫。

*　　*　　*

我六月初去莫斯科。可惜时間很少，只批准了十天假，在这十天以內，我不仅要办理自己的私事，而且还要办理我那位船长的私事和公事。

一路上我想了許多事情，想到自己，想到我和卡佳的关系，于是关于她父亲的問題又压倒一切地出現在我脑子里了，仿佛是在要求特殊的关照和尊重。在我生活的每个环节中，我都有意无意地会碰到他，我能以收集起来的关于他的事迹的断片終于构成了一幅完整的图画。这条旧黄銅矛鈎就是这幅証据画中最后的，富有邏輯性的一笔。其中最复杂的問題也因为得到这件东西而解决了。

說眞的，我在讀完了航海长的日記以后曾經問过自己：“我将来能否知道塔塔林諾夫船长的結局呢？他是抛弃了船去研究他所发現的陆地了呢？还是同其它的人一起餓死在帆船上，被浮冰携带着，年复一年地向格陵兰岸边飘去了呢？”

“是的，”現在我可以回答了。“他抛弃了船。我們暫时还不知道这是在什么情况下：是因一部份船員罹难了呢，还是因为船被冰挤碎了。但是他却把自己那种‘幼稚，輕率’的想法付諸实

現了。”

我曾問过自己：“他走到北地島了沒有？”

“是的，”現在我可以回答了。“他走到北地島了。否則猎人伊万·維尔加几年前所找到的雪橇和帆布船哪能在这一带海岸上出現呢？”

我曾問过自己：“应該到哪兒去找这支探险队的遺迹？值不值得去找？”

“是的，”現在我可以回答了。“这些遺迹是值得找的，因为，如果合理地加以判断之后，这个搜索区的位置可以精确地肯定，偏差不超过半度。这件工作的科学意义是毋庸怀疑的。”

这仿佛是在法庭上的对話，全是一些問題和回答。但是在这些枯燥无味的談話背后，我似乎覚得还有另外一些完全不同的对話，我看見我朝思暮想的卡佳了。

“你忘記我了嗎？是不是？”

“沒有，”她回答道。“可是我們十七、八岁以前的那段生活却結束了；我不知道你到哪兒去了，所以以为我們的爱情也随着那段生活而結束了。”

“生活根本沒有結束，”我告訴她說。“关于你的父亲，我現在比你，比世界上任何一个人都知道得詳細。你瞧，我給你带来了些什么：这是他全部的生活史。我将他的生平事迹收集了起来，并且証明这些东西是屬于一个伟大人物的生平。你知道，我为什么要作这件事嗎？因为我爱你。”

于是她問道：

“这么說来，你还沒有忘記我？对嗎？……”

于是我要答复她。

“即使你不再爱我了，我也不会忘了你。”

这是我在途中編出来的一場精彩的对話。可是，也不能說它和那即将在我同卡佳之間进行的一次眞的談話完全不同。这次談話既相似又不相似，就好象梦境和眞实的生活是既相似又不完全相似一样。



第五部　为了良心

1　会見卡佳

要拆散一桩婚事，促成另一桩婚事，十天的时間并不算太多。何况我在莫斯科还有許多别的事情，我准备在地理学会作关于“一个被遺忘的北极探险队”的报告，而当时报告底稿还沒有写好；此外，我需要向北极航务总局提出关于搜索“圣·瑪丽亚”号的問題。

瓦里亚代我作了一些准备工作：例如他把我作报告的事同地理学会接洽妥了。不过这份报告他当然是不能代写的。

我本来打算在柯拉布略夫家里借住，但后来經过反复考虑，还是跑到两年前我从巴拉紹夫航校路过此地时所住的那家旅館住下了。这是一个錯誤，因为我不喜欢旅館，虽然对一个飘泊者

来說，这是很奇怪的。住在旅館里，我的心情总是十分郁悶。

我給卡佳打电話，正好是她接的。

“喂，您是誰？”

“我是薩尼亚。”

她沉默了半晌，然后用极平常的声調說：

“薩尼亚？”

“是我。”

她又沉默了一会兒。

“要在莫斯科呆很久嗎？”

“不，只呆几天，”我回答道。我也竭力保持着很平常的声調，就好象沒有覺得自己現在看見她仍旧戴着那頂沒有系上遮耳的帽子，穿着我們最后一次在凱旋路見面时穿的那件被雪打湿了的大衣。

“来休假嗎？”

“既要休假，又要办事。”

要費很大的力气才不至于問她：“我听說，你常和罗馬什卡会面？”我作了这种努力，所以沒有問她。

“薩尼亚怎么样？”她突然問起我的妹妹来。“我和她通过一个时期的信，后来就中断了。”

我們談起薩尼亚的情形来，卡佳告訴我說，前几天有一个列宁格勒的剧团到莫斯科来过一次，上演高尔基的“母亲”，在节目表里印着“艺术設計——彼·司考伏罗得尼可夫。”

“眞的嗎？”

“布景很好，挺有气魄，同时也很朴素。”

我覺得她有好几次故意廻避称呼我的名字，有次虽然称呼了也是压低了声音說的，好象不願意讓家里人知道她在跟誰談

話。她一次也沒有称呼我为"你"。我們一直用很平常的声調談这談那，直談到我突然恐惧地感覚到：一切就要結束了，也就是說，我們用这样平常的声調談談話以后就会分散了，以后連再挂电話給她的借口也沒有了。

"卡佳，我們应該見一次面，你什么时候方便？"

我說的是："你什么时候方便？"这么一来就把問題拉开了，如果我还称呼她为"您"，那眞是太傻了。

"正好我今天晚上有工夫。"

"九点好嗎？"

我希望她邀我到她家里去，可是她沒有邀我，于是我們就商議究竟在什么地方会面。

"或者就在凱旋路街心花园吧？"

"这个花园現在已經沒有了，"卡佳冷冷地說道。

于是我們約定在大剧院門前的石柱間見面。

我們在电話里談話的全部內容就是如此，并不值得回味，但我在莫斯科度过的漫长的第一天里，还是逐字逐句地在咀嚼我們的談話。

我先到民用航空局，然后去动物学院找瓦里亚。大概我当时有些心不在焉的样子，所以瓦里亚反复对我說了好几次，明天是柯拉布略夫从事教育工作二十五周年紀念日，校內将举行庆祝大会。

終于等到了晚上八点鐘，我直奔大剧院而去。

她还是从前的那个卡佳，是每回我思念她时所想到的那个把辮子盘在头上，前額上留鬈发的卡佳，只是她的脸色变得蒼白了些，身材也长高了。当然，現在的她已經不是从前在凱旋路街心花园里吻过我的那个小姑娘了。她的眼光变得十分矜持，声

調也变得矜持了。不过她总还是卡佳，长得一点也不象瑪丽亚·瓦西里耶芙娜，不知为什么，我过去总是害怕她会象她媽媽。相反的，昔日卡佳的輪廓似乎更加定形，她現在比从前更多卡佳的味兒了。她穿着一件短袖白綢衫，胸前領口間別着一个蓝色白点兒的蝴蝶結。在我們談話的时候，当我竭力想看一看她的脸时，她的表情馬上变得严肃起来。

这次談話給我的感覚就仿佛我們是分隔在两个房間里，隔着一堵墻壁，只是在房門偶尔微微敞开时，卡佳才向外面瞧一瞧，想看一看究竟是不是我。我們徘徊在莫斯科，度过了凄伤的一天，我滔滔不絕地說着，我想不起什么时候說过这么多的話。然而这些都不是我想要对她說的話。我談到"航海长的字母表"是怎样編成的，要看完他的日記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我談到那条上面鐫着"'圣·瑪丽亚'号帆船"的旧黃銅矛鈎是怎样发見的。

但是一句話也沒有提到我为什么要作这些事！一句話也沒有。似乎过去的問題早已死去，而且其中也并沒有充滿着委屈，爱情，瑪丽亚·瓦西里耶芙娜的死，对罗馬什卡的妒忌，和在我同卡佳身上跃动着的全部热血……

这一年莫斯科开始修地下鉄道，在許多最熟識的地方，拦路架着木栅栏，因此不得不順着栅栏在弯弯曲曲的木板上行走，因为栅栏尽头常常是一个大坑，所以又不得不掉过头来。昨天这兒还沒有坑，可是今天就能听見里面的人声和地下工作嘈杂的声音了。

我們的談話也和这差不多，在那些我們最熟悉的地方，从作小孩和讀書的时候起就熟悉的地方繞着路走，折回来走，到处碰到木栅栏。特别是每当我們走近那叫做"尼古拉·安东內奇"的

危险地方时，我們总要碰到木栅栏。

我問卡佳收到我的信沒有——一封是从列宁格勒发的，一封是从巴拉紹夫航校发的。当她說沒有的时候，我又暗示說，这些信是不是落到外人手里去了。

"我們家里沒有什么外人，"她直截了当地說道。

我們又回到了剧院广場上。这时天色已經很晚，不过小舖里还在卖花。到过北地城之后，看到这兒能有这么多的东西，人，汽車，房屋和数不清的晃动着的电灯，都不免使我感到稀奇。

我們坐在一张长凳上，她用一只手支着头，听着我講話。我这时想起她一向就喜欢把位子安排好，为的是听起話来更舒服一些。現在，我才了解到在她身上有了某种变化，这就是她的眼睛。眼睛变得忧郁了。

这是仅有的美好的一刹那。后来，我問她是不是还記得我們在凱旋路街心花园里最后一次的談話，可是她什么也沒有說。对于我說来，这是最可怕的回答，是从前的那个回答——"我們不要再說这件事了吧"。

如果我能好好地看看她的眼睛，也許我能明白許多事情。但是，她始終把头偏往一旁，因此我也就沒有再作这种打算了。

我只覺得她一分鐘比一分鐘变得更加冷淡。我对她說：

"我将永远关心你的一切，"她只是点了点头。

当我請她去听我的报告时，她很客气地謝了謝我。

"謝謝，我一定来。"

"那我高兴极了。"

我們沉默了一会兒。

"薩尼亚，我想告訴你，你的这种态度使我很感动。我还以

为你早已忘掉这件事了。”

“沒有忘記，你現在不是看到了嗎！”

“假使我把我們談話的內容告訴尼古拉·安东內奇，你不会反对吧？”

“恰恰相反！尼古拉·安东內奇知道我有这些发現将会很感兴趣的。因为这些发現和他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比他所能想象的还要密切得多的多。”

其实这些发現和他并沒有那么密切的关系，我也沒有什么根据去暗示我話里面的意思。不过我当时非常恼火。

卡佳留心地看了看我，稍微考虑了一下。大概她还想問我些什么事情，但又迟疑未决。我們分別了。我心神錯乱，憤恨而疲倦地走了，在旅館里，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头痛。

2　柯拉布略夫的庆祝会

把一个中学教員的庆祝会定在假期，这簡直是一种古怪的想法，因为这时学生們都已离校，学校也停止工作了。我甚至对瓦里亚說，据我看一个人都不会来。

結果完全不是这样！学校里挤满了人。同学們正在用白樺树和枫树的树枝装飾楼梯。衣帽間地板上放着一堆树枝，准备作会場的礼堂入口上面搖搖晃晃挂着一个巨大的25字。姑娘們捧着花圈往什么地方走去，大家都是一脸認眞，关心的样子。由于这种忙碌和兴奋的气氛，而更主要的还是因为我回到了母校的感覚，使我突然感到非常愉快。

可是同学們并沒有讓我沉醉在回忆里很久。当时我穿着制

服，他們一下子就把我包围住了。哈，来了一个飞行員！我簡直来不及回答大家的問題了。

后来有一个高年級的姑娘，那么肥胖，紅潤，使我想起了从前“經济委員会”的瓦蓮阿姨，她走过来，微微一紅脸，說伊万·巴甫雷奇在等我。

他坐在教員休息室里，样兒显得蒼老了一些，背稍微有点兒駝，滿头白发（已經白了！）。他現在象誰呢？象馬克·吐温！当然他变老了，但我覺得他比我們最后一次見面的时候更結实了一些。鬍子虽然也有点兒白了，但长得更濃密，很有精神地向上翘着，在松寬柔軟的領子上面露着健康紅潤的脖子。

“亲爱的伊万·巴甫雷奇，祝賀您！”我說，我們互相拥抱，亲吻了好久。“祝賀您！”我一面吻着他說道，“希望您的学生都象我这样的感激您。”

“謝謝，薩尼其卡。”

他又紧紧地拥抱了我一次。他非常激动，因而嘴唇稍稍有点兒发抖。

一小时之后，他就坐在我們以前审判叶夫根尼·奥涅金的礼堂的講台上，我們以貴宾的身份坐在主人两侧，組成主席团。“我們”包括：瓦里亚——他为这天的盛会特意系了一条鮮綠色的領带；丹娘·薇莉琪珂建筑工程师，她現在长成一个高大丰滿的少妇了，簡直令人难以相信她就是从前那个纖瘦，原則性很强的丹娘；此外还有伊万·巴甫雷奇的几个学生，我們在校的时候他們还是低年級的小孩子，我們那时甚至根本沒有把他們当作人。在这一代人中間有很多軍校学員，我十分高兴地認出有三个人是那时少年先鋒队我那一中队的队員。

然后来了一位豪华大方，穿着白长統袜，粗毛綫背心的人，

他就是莫斯科剧院的演員格里沙·法伯尔。这个人眞是一点兒也沒有变！他的那副神气，就好象礼堂里发生的一切事情只是和他有关系。他很講究地吻了吻主人的两頰，就翘起脚来坐下了。他在主席团里立即占了很大的一块地方，使人感到这好象不是柯拉布略夫的庆祝会，而是为他举行的庆祝会。他用一种迷迷糊糊的样子看了看与会的人，然后掏出小梳子来梳头。我写了一张紙条給他："格里什卡，坏家伙，你好哇！"他看完了以后，客气地笑着，对我招招手。

这是一次精彩的晚会，它之所以好，就是因为每一个发言的人講的都是实在話。誰也沒說假話，毫无疑問，因为講柯拉布略夫的老实話并不困难，同时，他向来对自己的学生除了要求他們作个老老实实的人之外，再沒有其它的要求。

但願工作二十五年以后，大家談到我的时候也能象今天晚上談論柯拉布略夫这样就好了。

学生家长，一九三一年毕业的同学，家具工厂的工人，区苏維埃，市人民教育局，都送来了花籃，一个比一个大。这时主席却宣布說："現在請格利高里·伊斯拉伊列維奇·法伯尔代表我校毕业的演員致詞。"接着有两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抬出一个使得大伙兒都惊叹不置的花籃，会場內立刻发出了嘖嘖咂舌声。

格里什卡站了起来。他象往常一样講得很漂亮，只是喊叫得过分了一点兒。我很奇怪剧团里还沒有教会他說話时声音应該低一些。他称呼伊万·巴甫雷奇为"艺术生活的导师"，并附带說，这对他个人起了很大的作用。然后他又吻了柯拉布略夫一次，便洋洋自得地坐下了。

台上的鮮花愈来愈多，伊万·巴甫雷奇坐在那兒，紅光滿面，不知如何是好地捋弄他的鬍子。他大概是因为自己太幸福

有点不好意思了，当别人頌揚他的时候，他的眼睛显出不十分好受的样子。

后来一位陆軍中尉致詞。我們在校时，他在五年級学习。他說，既然法伯尔同志代表演員，那么他也冒昧地代表从我校出去的工农紅軍学員和指揮員来致賀詞。

“亲爱的伊万·巴甫雷奇，”当主席請我发言时，我說道，“請允許我代表飞行員說几句話，因为在我們伟大的苏維埃国家領空也有很多您的学生在飞行，他們无疑問是会贊同我說的每一句話的。人們說，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但您也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譬如有一次，我一早醒来，发現我的邻床伙伴正目不轉睛全神貫注地看着天花板，竟連我的問話都沒功夫回答。我随着他的視綫看見天花板上画着一个有半卢布銀币大小的黑圓圈。第二天又复如此。我的邻床伙伴每天早上看这黑圈看了两个月。諸位想一想，他这样作是为了什么呢？当然，他自己能够回答这个問題，因为他現在就坐在这张桌前，也是我的邻座。”瓦里亚难为情地笑了笑，随后主席团和大家都笑了。“好，我来替他回答：他是在鍛炼眼光的威力。誰的眼光使得他这么欽佩呢？是伊万·巴甫雷奇·柯拉布略夫出名的眼光。亲爱的伊万·巴甫雷奇！我現在可以坦白的向您承認：我們經不住您的眼光照射。有时想搞点鬼，或是打算撒謊，可是遇到了您，或是一想起了您，便由不得要說实話了。我認为这也就是学校应該教导我們的主要东西。”

我講完了話以后，便过去和伊万·巴甫雷奇接吻。瓦尔加从另一边也探过头来吻他，所以我們的头互撞了一下。

在这以前掌声十分稀落，可是等我們撞了头以后，立刻响起了轟雷般的掌声。

在我后面講話的是丹娘·薇莉琪珂，不过我沒有去听她講，因为这时尼古拉·安东內奇来了。

他走进了礼堂——肥胖的身体，威严敦厚的仪表，穿着那么一条肥大的褲子，微微向前拱着身子，在人群里挤来挤去向着主席团走来。我看見从前用綜合教学法教我們“水鴨”的那位老态龙鍾的，可怜的塞拉菲瑪跑在他的前面，給他开路，可是他連看也不看她，脸上連一絲笑容也沒有，径直往前走。

自从上次他对我咆哮，折手指节，繼而吐唾沫那丑恶的一幕之后，我再也沒有見过他，我現在发覺他比那时候变了很多。在他的后面还有一个人，也相当胖，也些微向前拱着身子，也是繃着一张脸。

如果这时不是瓦里亚低声告訴我說“他就是罗馬什卡”，那么毫无疑問，我絕不会猜到他是誰。

怎么，他是罗馬什卡？他能是这么一位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神气十足，脸面又大，又白，十分端正，身穿一套极其講究的灰色西装的人？他那黄色的癩猫一般的乱蓬蓬白头发到哪兒去了？他那双反常的圓眼睛，猫头鷹的眼睛，夜間都不合上的眼睛到哪兒去了？

一切都那么利落，整洁，柔和到极点，甚至連那呆板的方下巴現在也不很方，宁可以說是十分飽滿，而且还十分体面了。即使讓罗馬什卡按照自己的心願捏塑一张新面孔，怕也不可能塑得比这更好了。如果一个不了解他的人初次遇見他，兴許还会对他产生一种好印象哩。

尼古拉·安东內奇走上主席台，他也跟着走上来，不管尼古拉·安东內奇作什么，罗馬什卡总是跟着他作。尼古拉·安东內奇勉强地，不过总也还热情地向柯拉布略夫祝賀，沒有吻他，

只是把手伸了出来。罗馬什卡也只是把手伸了出来。尼古拉·安东內奇向主席团扫了一眼，首先和市人民教育局局长問好，罗馬什卡也跟着向他問好。看起来也許很奇怪，但罗馬什卡的动作反倒显得更坚决，更勇敢一些。

尼古拉·安东內奇沒有理会我，也就是說他装作我不在这兒似的。可是罗馬什卡走到我面前时，立住了脚，微微把手一摊，似乎很惊訝——这是不是我？就好象我从来也沒有用脚踢过他的狗脸似的。

“你好，罗馬什卡，”我冷淡地說道。

他抽搐了一下脸，但馬上装出仿佛我們是多年的老朋友，彼此間就应該称呼“薩尼卡，罗馬什卡”似的。他坐到我旁边，开始談起話来，我不屑地沒有答理他，把身子轉过去，作出似乎是听丹娘講話的样子。

我并沒有听丹娘講話！我渾身的血液都在沸騰，只是靠着坚强的毅力，才保持住原来平静的神色。

庆祝会的仪式結束了。客人們紛紛被邀入席。罗馬什卡在走廊上追上了我。

“伊万·巴甫雷奇的庆祝会开得真不錯，对不对？”

他的声調甚至也变得柔和圓滑了一些。

“是的，很好。”

“眞是遺憾，我們見面的机会太少了。到底是老同学嘛。你在哪兒工作？”

“在民用航空局。”

“这个我知道，”他說完便笑了。“不，‘在哪兒’是另外一个意思，是地理上的意义。”

“在北极。”

“对啦！见鬼！我完全忘了！卡佳不是对我說过嗎！在北地城！”

卡佳！卡佳对他說过。我頓时身上象火烧一般，不过还是很鎮定地回答道：

“是的，在北地城！”

他沉默一会。然后很謹愼地試探道：

“呆很久嗎……是到我們这兒来的？”

“暫时还不知道……”我也很謹愼地答道。“这要看許多客观情况而定。”

我能这样鎮定謹愼地回答，不免暗自高兴。从这一会兒之后，我的激动都冰消瓦解了。我变得象蛇一般冷酷，客气和狡猾。

“卡佳說你准备作一次报告，好象是在‘学者之家’吧？”

“不，是在地理学会。”

罗馬什卡很高兴地看了看我，——他好象是因为我并不是在“学者之家”，而只是在地理学会作报告而感到滿意。事实也确是如此，不过当时我还不知道。

“是什么报告？”

“你来听好啦，”我淡然說道，“你会感到兴趣的。”

他的脸又抽搐了一下，这次是很明显的。

“好，”他說道，“应該記下来，免得錯过机会。”于是他在笔記本上很整齐地記了几个字。“报告的題目是什么？”

“一个被遺忘的北极探险队。”

“等一会兒！是关于伊万·李沃維奇的探险队嗎？”

“是关于塔塔林諾夫船长的探险队。”我毫不客气地反駁說道。

不过他把我的更正当作了耳边风。

“根据新的材料嗎？”

一个瞞不了人的、愚鈍的詭計在他眼睛里閃了一下，我立刻猜到这是怎么回事了。

“啊哈，你这个坏蛋，”我很冷静的思索道，“是尼古拉·安东內奇派遣来的。讓你来探听我是不是打算証明探险队的遇难純粹是他的錯誤，而不是什么維什米尔斯基爵士的錯誤。”

“是的，新材料。”

罗馬什卡留心地看了看我。这一刹那間，他又变成从前那个罗馬什卡了，他在盘算着如果我透露了这是些什么材料，他将会得到多少油水。

“关于这个探险队，”他說道。“尼古拉·安东內奇正好也有一些材料。他有很多信件，有些是很关重要的，他有一次給我看过。你最好找他談談！”

“啊哈，明白了，”我又想了一想，“尼古拉·安东內奇委托你来給我們拉綫，好商量商量这件事。他怕我，但是还想讓我先开头。沒有那么好的事！”

“不必了，”我冷冷回答道，“实际上他知道得很少。說来虽然奇怪，但关于他参加探险队工作的事，我比他本人知道得还多。”

这是一記估計得十分准确的打击，尽管罗馬什卡現在大大地学乖了，但究竟还是个笨蛋，他突然把口一张，显然很窘的样子看了看我。

“唉！卡佳，卡佳，”我心里想道，为了她和我所受的屈辱，我感到自己心都在收縮。

“是，”他拖长声說道。“是这么一回兒事。——是的，是这么

一回事。”

我們走到桌前，談話便終止了。我勉强支持到晚会結束，只是为了免得伊万·巴甫雷奇見怪。我的心情很不好，很想痛飲一番，但是我只喝了一杯酒，为主人干了一杯。

这一次酒是罗馬什卡敬的。他站起来，很体面地等了許久，一直等到全桌都靜下来。他有一句話說得特別流暢，这时脸上掠过一种自鳴得意的神气。他談的是“友誼把我們亲爱的主人的学生結合在一起”。这时他轉身向我举起酒杯来，表示也是为我干杯。我也很礼貌地把杯子微微举了举。大概我这时脸上不是一付和顏悅色的样子，所以伊万·巴甫雷奇先留心地看了看他，然后又看了看我，突然把一只手放在桌子上，用眼睛看着它示意，我一下子沒有想起这是什么意思。这只手抬起来，拍拍桌子，又靜靜地放了下去。原来这是我們从前的老暗号——不要激动！我們俩不約而同地笑了起来，我这时也感到心里比較高兴了一点兒。

3 无 题

这天我約定和“眞理报”的一位工作人員会面，因为我想把自己的发現告訴他。他已經推延过两次了，总是說有事，最后終于挂电話約我，于是我就到“眞理报”社去了。

这位老兄是一个高个子，办事很热心的人，戴着一付近視眼鏡，眼睛有点兒斜視，使人总覚得他是瞧着一旁在想自己的心事。他說自己“对飞行員还有点兒了解”。他似乎是眞的对我的叙述感到兴趣，至少从我講第二个字开始，他就在笔記本上記录

起来。他讓我把遇到暴风雪时如何固定飞机的办法画出图样，并且說我应該寄一篇报导这种方法的文章到“民航”杂志去。他当时就給“民航”出版社挂了一个电話，接洽好把这篇材料交給誰，在什么时候交去。我覚得他非常了解“圣·瑪丽亚”号探险队的意义，并且說，現在社会人士对北极感到极大的兴趣，所以这是一个很需要的，应时的題目。

“不过，已經有一篇文章写过这个問題了，”他說道，“仿佛是在‘苏維埃北极报’上面。”

“在‘苏維埃北极报’上？”

“是的，去年的。”

这可是一件新鮮事兒！去年的“苏維埃北极报”上登載过关于塔塔林諾夫船长的文章？

“我沒有讀过这篇文章，”我說道。“不管怎样吧，这篇文章的作者并不知道我所掌握的材料。我研究了航海长的日記，他是到达陆地的唯一的一个探险队成員。”

就在这时候，我才認識到在我面前的是一位眞正的記者。他的眼睛突然放射出光芒，迅速地記录着，甚至把鉛心都写断了。显然，这是一件聳人听聞的大事。他也这样說：

“这眞是一件聳人听聞的大事！”

后来他鎖上自己的办公室，如同他在走廊上說的那样，把我带到了“首长”那兒去。

我在“首长”那兒簡短地重复了一遍我的故事，于是我們約定：

1.我明天把日記送到編輯委員会去。

2.眞理报社派一个工作人員去听我的报告。

3.把我的发現写成文章，到那时候“我們再看看，把它排在

什么地方”。

这次本来应该把請求寻找探险队的問題和“眞理报”談一談，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当时却認为这是一个和新聞界沒有关系的特殊問題。眞是可惜，否則記者們也許会告訴我到北极航务局应該找誰联系，甚至还会挂一个电話帮忙哩。

我在会客室里坐了两小时，等候着謁見总局的一位秘書。最后終于等到了。我被引进办公室，我在这兒又候了半小时。这位秘書一点兒不得閑，水兵，飞行員，无綫电員，工程师，木工，农业家，艺术家絡繹不絕地来到他的办公室，所以他总得作出好象对航空，农业，繪画，无綫电都很內行的样子。最后他找我談話了。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倒是一件挺有趣的事，”我好歹把我的故事講完以后，他說道。“不过我們現在有一些更現实的任务。”

我辯解說，我很了解北极航务局的任务絕沒有包括搜索失踪的探险队的事。不过因为今年有一支北极探险队将出发到北地島去，那么也不妨給它一个附带的任务——勘查塔塔林諾夫船长殉难的地区。

“塔塔林諾夫，塔塔林諾夫，”秘書一面寻思着說道。

“关于这件事他已經写过文章了吧？”

我分辯說，他不可能写这些事，因为探险队是在距今約二十年前离开彼得堡的，而且最后一次收到的消息是在一九一四年。

“好吧，那么是哪一位塔塔林諾夫写过这个問題的呢？”

“塔塔林諾夫是船长，”我耐心地解释說。“他在公元一九一二年秋乘‘圣·瑪丽亚’号帆船出航，目的是想通过北海航綫，

也就是我們現在所在的北极航务总局的航綫。探险工作虽說是失敗了，可是塔塔林諾夫却順便完成了一个地理学上的重大发現。譬如，現在就有足够的根据，証明北地島并不是維尔基茨基发見，而是他发現的。”

“是的，很对，”秘書說。“关于这支探险队已經有过一篇文章了，而且我还讀过。”

“誰的文章？”

“我記得也是塔塔林諾夫的。塔塔林諾夫的探险队，塔塔林諾夫的文章。那么您的建議究竟是什么呢？”

我又把自己的建議重說了一遍。

“好吧，您写一份报告書来，”他說話时的那种語气，就仿佛是因为我不得不写这份报告，而后这份报告就不得不永远躺在他的抽屜里而感到遺憾似的……

我走了出来。

这不可能是一种偶合！我到高尔基路一家書店里翻遍了去年各期“苏維埃北极报”。这篇文章的題目是“一个被遺忘的北极探险队。”——这不是我的报告的題目嗎！——署名是尼·塔塔林諾夫。原来这篇文章是尼古拉·安东內奇写的。

这是用回忆方式，同时又是以学术性的語气写成的一篇洋洋大作。文章从一九一二年夏季，停在彼得堡尼古拉桥下的“圣·瑪丽亚”号帆船开始。“船內艙板和天花板上白色的油漆犹新，家具的紅木擦磨得象一面鏡子似的閃閃发亮，客艙里的地板上鋪設着地毯。庫房和貨艙里堆滿了各种各样的儲备品。眞是应有尽有！干果，糖，巧克力，各式水果罐头，菠蘿，成箱的果子酱，点心，糕餅以及其他許多东西，一直到最主要的东西，諸如肉罐头和成堆的米面。”

看到尼古拉·安东內奇从食物写起不免感到可笑，可是对我說来，这只不过是多余的証据了。不过再往后，他写得就比較聪明一些。說探险队是合資装备起来的，他很謙逊地暗示說，他是首先想到“循着諾登塞尔特的足迹航行”的人，他很沉痛地指出反动报紙和海軍部对他的百般阻挠。他引用了海軍大臣在关于“圣·瑪丽亚”号失踪一事的报告上的批示：“可惜塔塔林諾夫船长沒有回来，否則他这样輕率地对待国家财产，我将馬上把他送交法院法办。”

他更沉痛地写道，他因病不得不暫时离开他的堂弟时，阿尔汗格尔斯克的工厂主如何欺騙了他的兄弟，把一些未經訓練的，几乎都是街头野孩子們以“二十戈比一对”出卖的劣狗，魚目混珠地交給了他，从而影响了整个工作的組織。他沒有指出工厂主的姓氏，問題还不明显嗎！他只用了一个“維”字来代表他們中某一个人。尼古拉·安东內奇之所以归咎維某的原因，是維某在供应肉类上获了暴利，而这些肉还沒等探险队走到尤戈尔·沙尔海峡就不得不扔进大海去了。

这篇文章中的这一部份写得很在行。尼古拉·安东內奇甚至还引用了阿姆生的話——“一个探险队的成敗完全取决于它的装备”，并且很出色地用他“亡弟”的探险队証明了这一看法的正确。他摘录了他“亡弟”信件中的一些片断，他的“亡弟”曾痛心地指責那些利用該船在阿尔汗格尔斯克停泊时間縮短和急于出海的机会进行搗鬼的那些生意人。

关于探险途中的情形，尼古拉·安东內奇几乎絲毫沒有写。他尽提到“圣·瑪丽亚”号在尤戈尔·沙尔海峽遇到了几艘抛錨等候堵塞在喀拉海南部的冰块破裂后再走的商船。据其中的一位船长談，“‘圣·瑪丽亚’号于九月十七日黎明勇敢地駛入喀

拉海，很快就在地平綫上，在綿綿不断的冰原綫上消失了”。“伊·李·塔塔林諾夫船长給自己提出的任务虽未完成。”尼古拉·安东內奇繼續向下写道，“但是却順便完成了一个惊人的发現，就是被塔塔林諾夫船长命名为‘瑪丽亚島’的北地島的发現……”

我买下了这一期的“苏維埃北极报”，因为这篇文章中还引証了該作者所发表的关于这个問題的其他一些論文。然后便回到旅館里了。

很难說我回来时的心情很好！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旣然这篇謊言已經刊登了，而且已經登出了这么久——一年多了，那就是說一切都完了！要駁斥也迟了，誰也不会听我的駁斥了。他已經搶先告訴大家了。他所写的虽是謊言，但却摻杂着一些眞事。他是第一个指出“圣·瑪丽亚”号探險队的意义的人，他是第一个指出北地島是塔塔林諾夫船长在維尔基茨基看見这个島之前半年发現的。当然，这些情况是他从我交給卡佳的船长的信里看来的。他在所有的問題上都搶在我前面了。

我在自己的房間里踱来踱去，一面吹着口哨。

說眞心話，我这时候唯一想的就是到車站去买一张从莫斯科到紅雅尔斯克的車票，再由那兒乘飞机到北地城去。但是我并沒去車站，相反的，我坐了下来写报告書。我写了一整天。当一个人整天工作时，各种不愉快的思想是无法在脑子里久留的，一个思想来了，另一个又去了；实在沒有办法，脑子里沒这么多的地盘呀。最后，它們只好全都回老家去了。

4 許多新聞

当我走进門时，伊万·巴甫雷奇正在蹲着生爐子。多么熟悉的一幅图画——伊万·巴甫雷奇穿着他那件厚厚的毛茸茸的旧軍服在生爐子。我甚至仿佛覺得这几年的时間都沒有过，自己仍是一个小学生，如同在九年級我回恩斯克去找卡佳那次一样，他現在就要"大发雷霆"了。但他轉过身来。"他可老多了"，我心里想道，轉眼間，一切又恢复到原来的样子了。

"到底来了，"柯拉布略夫頗生气地說。"你为什么不到我这兒来呢？"

"謝謝，伊万·巴甫雷奇。"

"你不是写信說过要到我这兒来的嗎？"

"我怕会給您添一些麻煩。"

他看了看我，甚至閉起一只眼睛来仔仔細細地打量我。这是一种主人式的眼光——仿佛对待自己的事情似的。大概我总算还是使他滿意的，所以他高兴地梳了梳鬍子，就叫我坐下来。

"我昨天沒能好好地看看你，"他說道，"沒有功夫。"

他鋪好桌子，从壁橱里取出一瓶酒，切好面包，然后又从窗后端出冻牛肉来，也把它切好。他仍和从前一样独居，不过这所潮湿的老住宅变得比較舒适了些，而且好象也不那么潮湿了。使我不大高兴的是在我还沒把事情叙述完的一会兒功夫，他就把一瓶酒喝得一干二凈，連一点东西几乎都沒有吃，——这眞使我有点伤心。

我說現在只能对他講一些最主要的事。但是过了这么許多年，一旦碰見亲人，难道你还能想起什么是最主要的事，什么是次要的事嗎？伊万·巴甫雷奇詳尽地詢問起我北方的情形和飞行工作，总是不滿意我回答得那么簡略。

“伊万·巴甫雷奇，亲爱的，讓我講什么呢？因为我飞得还很少。啊，有一次我差点兒沒有冻死！您还記得我从学校里偷跑那次給我治病的医生嗎？您还到医院里来看过我哩。”

“記得。”

“他也住在北地城。我找到他了，这是我常去的唯一的一戶人家。可也真是，伊万·巴甫雷奇，我感到自己一生总是依靠着别人的家庭。小的时候在司考伏罗得尼可夫家里，您还記得嗎？我对您談到过的。后来到塔塔林諾夫家里去。現在又到医生家里去。”

“老弟，也該自己成家了，”柯拉布略夫很正經地說道。

“不，伊万·巴甫雷奇。”

“为什么不呢？”

“我在这个問題上很不順利。”

柯拉布略夫沉吟了一会兒。他給自己斟滿了酒，我們碰了杯，一飲而尽。他又斟了一杯，然后解开軍服上衣，准备发表一通长篇談話。

“薩尼亚，你听我講，你在离开莫斯科的时候对我說的話还記得嗎？你說：‘現在我即使是死，也要証实我是对的。’怎么样？証实了嗎？”

这是一个突如其来的問題，因此我沒有立刻回答，当然，我还記得我們的談話。我还記得，柯拉布略夫喊叫着說：“你搞些什么呀，薩尼亚！我的上帝！你搞些什么呀！”我还記得他如何

一面哭，一面說，一切都是我的过失，因为我一口咬定船长信中指的是尼古拉·安东內奇，但結果却指的是一位維什米尔斯基爵士。

我若是处在柯拉布略夫的地位，决不会提起那次的談話。可是看样子，他却很希望我能回忆起那次的談話。他很严肃地看着我，并且好象因着什么事在暗自得意。

"我不知道有誰需要我来証实什么問題，"我愁眉不展地說道，"我看不出有什么人需要我这样作。"

"薩尼亚，这你就錯了，"柯拉布略夫說道。"这是十分需要的，无論对你自己，对于我，以及对于另外一个人說来都是十分需要的。何况你的确是对的呢。"

我瞪着眼睛看着他。我們那次談話之后已經过了五年。我現在所知道的关于塔塔林諾夫船长探险队的事情比世界上任何人都要多。我找到了航海长的日記，并且讀完了这些日記，这是我一生中最艰巨的工作。我很幸运地遇見了涅涅茨老人，他是亲眼看見探险队的雪橇的最后的一个人，这輛雪橇上的尸体很可能就是船长。可是我并沒找到一件可以說明我在这个問題上是正确的証据。

而現在，当我回到莫斯科，来到自己的老教員家里，滿以为他早就把这件事情忘記了的时候，他却对我說："你的确是对的！"

"伊万·巴甫雷奇，"我声音不很坚决地說道，"有些事情您也不必太坚持了，假使您沒有……"

我正想說"沒有确凿的証据"时，可是他阻止了我。好象是門鈴响了。柯拉布略夫不安地咬了咬嘴唇，向周围看了看，按住我的肩膀說道：

"是这样，薩尼亚……我現在需要和一个人談談話。你就在

这兒先坐一会兒。”

他把我带到隔壁的一間屋子里去，这屋子有点象一个堆滿了書的大柜子，房門口挂着一块破得滿是窟窿的綠色門帘。

“讓你听听，对你也有好处。”

我还忘了說一說伊万·巴甫雷奇的情形。他这天晚上一开始就使我感到有些奇怪。他几次低声地吹起口哨，用手抱着头来回踱着，最后竟把剔牙齿的梨梗也吞到肚里去了。現在，他把我装进了“柜子”，就匆匆忙忙地收拾了桌上的伏特卡酒，从書桌抽屜里取出什么东西来吃了一点兒，又张大嘴喘息了一会兒。然后就去开門了。

諸位想一想，他是和誰从前厅里走进来的？和尼娜·卡比丹諾芙娜！这是尼娜·卡比丹諾芙娜——她的脊背已經弯了，比从前更加瘦了，眼圈边上有了上了年紀的人的迹象，披着她那件老是穿在身上的絨坎肩。

我沒听她說些什么話，我只注意着伊万·巴甫雷奇怎样殷勤地讓客人坐下。他正要給她倒茶，但是她阻止說：

“不想喝，刚才喝了。喂，怎么样？”

“有点不舒服，尼娜·卡比丹諾芙娜，”柯拉布略夫說道。“脊梁痛。”

“真的嗎？老了啊！乱想些什么呀！脊梁痛，擦点朋班格就好了。”

“什么，您說什么？朋班格？”

“朋班格。一种药膏。您还喝酒嗎？”

“說良心話，尼娜·卡比丹諾芙娜，我不喝酒了，”柯拉布略夫說道。“完全戒掉了。偶尔飯前喝一小杯。这种喝法連医生都贊成的。”

“不对，您还在喝。我年輕的时候住在村子里。我的父亲是个哥薩克。他有时回来的时候，脚都站不稳，还說：‘这沒有关系，最要命的是每天午飯前喝一杯酒。’”

柯拉布略夫笑了，尼娜·卡比丹諾芙娜看了看他也笑了。

后来，她还講了一个爱喝酒的伯爵夫人，她“早晨刚一睡醒，——咕嘟咕嘟就是一杯伏特卡酒！然后就出門。她也不戴头巾，一张脸又黄又肿。出去逛够了，回来又喝。上午她还很正常，等到吃午飯时走路就不稳了，可是一到晚上，又是宾客盈門。她穿戴得很华丽，坐在鋼琴前面，边弹边唱。她是个善良的人！有事大家都来找她。动不动就是——到伯爵夫人家里去！人倒是个好人！就是爱喝酒！”

柯拉布略夫大概不很喜欢这个例子，所以他竭力想把談話轉移到别的題目上去。他問卡佳現在的生活怎么样。

尼娜·卡比丹諾芙娜悄悄地摆了摆手，叹息說：

“我和她老是吵嘴。她的自尊心很强。一件事情还沒有成功又搞另一件事情。因此她总是那么急躁。”

“急躁？”

“急躁。还很自傲。总也不說話，”尼娜·卡比丹諾芙娜說道。“我碰到的这些不爱說話的人也够多了。我最不喜欢的就是她老不說話。眞不明白一个人干嗎不說話呢。有什么煩恼你就說一說嘛。可是她就偏不說。”

“您不妨問問她，尼娜·卡比丹諾芙娜。”

“她不会說的。我自己就是这样的人。我多喒也不說。”

“我有一次碰見她，覺得还沒什么嘛，”柯拉布略夫說道。“她是到戏院里去，只她一个人，的确，我也覺得有点奇怪。不过看

来她还滿高兴的，并且說地質学院答应給她一間屋子。”

“答应了。可是她沒有搬去。”

“为什么？”

“可怜他呀。”

“可怜他？”柯拉布略夫又問了一次。

“可怜他呀。她因为想念母亲，也就可怜他。他也是，一会兒不見她也不成——你瞧那付劲兒吧：一走进門，馬上就問：‘卡佳在哪兒？打电話回来了嗎？’”

我一下子就明白了“他”是指的誰，他就是尼古拉·安东內奇。

“所以她沒有搬走。而且总是在等着一个什么人。”

尼娜·卡比丹諾芙娜挪到另一张安乐椅上，坐得更近一些。

“我有一次看了她的信，”她鬼鬼祟祟地低声說道，并且向周围看了看，仿彿怕卡佳会看見她似的。“大約是假期里卡佳他們在恩斯克好起来的。他的妹妹写信来說：‘每一回来信他总是請求我告訴他：“卡佳在哪兒？她怎么样？我願意犧牲一切，只要能看見她。”他沒有你便活不下去，我实在不了解你們这次沒来由的爭吵’”。

“对不起，尼娜·卡比丹諾芙娜，我不明白。您說的是誰的妹妹？”

“誰的？就是那个人的，您的学生的唄。”

柯拉布略夫不由得向我这边看了一眼，我从門帘上的窟窿里正好碰上了他的眼光。說我的妹妹？薩尼亚？

“这也是常有的事嘛，可能事实上就是这样的，”柯拉布略夫說道，“大概眞是活不下去。問題很明显。”

“‘总是請求。’”尼娜·卡比丹諾芙娜富有表情地重复說道。“‘他沒有你便活不下去’。你瞧瞧！可是她沒有他才眞活不下去哩。”

柯拉布略夫又向我这边瞟了一眼。

我覚得他的髫子下面藏着微笑。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但她不是要嫁人了嗎？”

“她沒有这个打算。这不是她的主意。”她这样說道，“因为她不願意嫁給那个罗馬紹夫。我也不願意她嫁給他。这个小神甫。”

“什么小神甫？”

“他就是小神甫。还是个牛皮专家。不管对他說什么話，他馬上就添油加醋地講起来。我最恨这种人。并且还是个騙子。”

“得啦，尼娜·卡比丹諾芙娜！您怎么啦！”

“騙子。他借了我四十个卢布，就好象是我送他礼似的，一直沒有还給我。当然，我也沒有去提它。老是忙来忙去，无事忙。我的上帝！要不是我已經老了……”

她很痛心地把手一甩。

現在諸位可以想象我听到这番談話时的感情是怎样的！我从門帘的窟窿里看着老太婆，这个小窟窿就好象是一个鏡头，我和卡佳之間发生的一切都映在这个鏡头里，一时比一时明显，宛如落在了焦点上。过去的一切慢慢接近了，而且都恢复了原样。这一切是那么丰富，而且称心的事情又是那么多，以至于我的心都顫抖了起来，我明白自己激动得很厉害。只有一件事情完全不能理解：我从来也沒有向妹妹“总是”請求，而且从来也沒有写信对她說“我沒有卡佳就活不下去”呀。

"这是薩尼亚編造的，一定是这样，"我对自己解释道。"她一直在哄騙她。不过，这个情况倒是眞实的。"

尼娜·卡比丹諾芙娜还在講什么話，可是我再也听不下去了。我忘記了一切，竟至在自己的这間"柜子"里乱走动起来，直到听見柯拉布略夫严厉的咳嗽声，我才淸醒了。

我坐在"柜子"里，一直等到尼娜·卡比丹諾芙娜走了。我不知道她是来干什么的，也許只是为了散散心。在告别的时候，柯拉布略夫吻了吻她的手，她吻了吻他的額角。他們过去一向是这样告别的。

我正在想得出神，也沒听見他从前厅里回来的声音，突然我从两幅門帘的縫隙里，看見了他的鼻子和髫子。

"还活着嗎?"

"活着，伊万·巴甫雷奇。"

"你想說什么?"

"我說，我是一个不可救葯的大傻瓜，"我抱着头答道。"我是怎样和她談話的！啊！我怎样和她談話的！我怎么会一点也不明白！我怎么什么話也沒有对她說，原来她在等我呀！她会怎样感覚呢，伊万·巴甫雷奇！她現在会怎样想我呢！"

"沒有什么，改变想法了。"

"不，这是永远也不会的！您知道我对她說的什么話嗎?——'我将永远关心你的一切'。"

柯拉布略夫噗哧笑了。

"伊万·巴甫雷奇！"

"你不是写信說沒有她便活不下去了嗎。"

"我沒有写过！"我极力分辯道。"这是薩尼亚編造的。不过这个情况是眞实的！伊万·巴甫雷奇！这是絕对眞实的。我沒

有她便不能活，而且我們之間的确是沒来由的爭吵，因为我以为她早就不愛我了。現在怎么办呢！怎么办！？”

“是这样，薩尼亚，我九点鐘在一个戏院里还有一个約会，”他說道。“那么你……”

“好吧，我現在就走。我現在就去找卡佳，可以嗎？”

“她会把你赶出来的，而且赶得完全对。”

“讓她赶吧，伊万·巴甫雷奇，”我說罢突然吻了他一下。“鬼才晓得，我实在不知道現在該怎么办？您認为該怎么样，嗯？”

“我現在要換衣服了，”柯拉布略夫說罢便往“柜子”里走去，“至于你，我認为你应該赶快清醒过来。”

我看着他脫下軍服上衣，拉起軟衬衣領，开始系領带。

“伊万·巴甫雷奇，”我突然大声嚷道。“等一会兒！我还忘了，关于我們从前爭执的船长信里所指的是誰那个問題，您說我的确是对的！”

“是的！”

“伊万·巴甫雷奇。”

柯拉布略夫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的从“柜子”里走出来，他穿了一件灰色的新西服，样兒显得很年輕，很体面。

“現在我們先到戏院里去，”他很正經地說道，“等一会兒你就都会明白了。你的任务就是好好坐着，不准說話。只管听。明白了嗎？”

“一点也不明白。走吧。”

5 在剧院里

莫斯科剧院！如果从格里沙·法伯尔的那付神气来推断，一定会以为这是一所规模庞大，真正了不起的戏院，里面的演員穿的都是漂亮的白色长袜套，談吐优美，声音宏亮，就同莫斯科艺术剧院一般。哪知它却是在斯列琴克区一条胡同里的一个小戏院。

入口处的戏报栏前灯火輝煌，告訴人們正在上演“狼路”，我們很快就在演員表中找到格里沙的名字。他扮演一个医生：“医生——格·法伯尔”。不知为什么这个角色排列在最后。

格里沙和往常一样体面，在門厅里迎接我們，并且立刻就把我們請到他自己的化妆室里去。

“等第二幕开始时，我就叫他来，”他很神秘地对柯拉布略夫說。

“他”是誰？我看了看柯拉布略夫，他正在把一支烟卷往长烟嘴里按，并故意作出似乎沒有注意到我在看他的样子。

在格里沙的化妆室里还坐着三位演員，那付神气就象是坐在自己的化妆室里一般。当格里沙招待我們坐下的时候，他們就很客气地退出去了，此时格里沙便因为房間問題抱歉地說：

“我自己的化妆室現在正在修理。”

我們談起我們的学校剧团，回想起“时間到了”那幕悲剧，格里沙在这幕戏里扮演犹太人的养子。我說，我認为他演这个角色实在演得太好了。格里沙乐了起来，他的架子也頓时消失了。

“薩尼卡，我真不明白，你那时候不是很爱繪画嗎，”他說道。“怎么你却突然到天上飞起来了呢？到我們戏院里来吧，真見鬼！我們会把你培养成一个艺术家的。怎么样，不好嗎？”

我說同意。随后格里沙又請我們原諒，因为他快上場了，化妆师在等他，于是便出去了。这时只剩下了我們两个人了。

“伊万·巴甫雷奇，亲爱的，請您告訴我，到底是怎么回事？您把我带到这兒来干什么？‘他’是誰？您想介紹我和誰認識？”

“你不会作出什么傻事来吧？”

“伊万·巴甫雷奇！”

“你已經作了一件傻事了，”柯拉布略夫說道，“甚至是两件傻事。第一，你沒有先到我这兒来一趟。第二，你对卡佳說‘我将永远关心你的一切’。”

“伊万·巴甫雷奇！可是我当时什么也不知道呀！您只簡单地写道：‘到我这兒来。’我沒料到事情这么重要。請您告訴我，我們在这兒等誰？这人是誰？为什么您想讓我見他？”

“好吧，”柯拉布略夫說道。“不过你得記住我們的約言：好好坐着，不准說一句話。他是維什米尔斯基爵士。”

諸位已經知道，我們当时是坐在莫斯科剧院格里沙的化妆室里。可是这时候，我彷彿覚得这一切不是发生在化妆室里，而是发生在舞台上，因为伊万·巴甫雷奇才一說完話，維什米尔斯基爵士就走进屋里来了，他拱着腰，怕把头碰在低矮的門框上。

我当时就明白了这是他，虽然在这以前，我脑子里从来沒有想到人世間会真有这么一个人。我一向以为是尼古拉·安东內

奇捏造出了这么一个維什米尔斯基爵士，好把我的一切責难推卸到那人身上去。过去这只是一个名字，現在却突然成为現实，变成了一个細長干癟，腰都伸不直的黃白鬍子的老头兒。現在我們才明白，他只不过是維什米尔斯基，而不是什么爵士。他身上穿着亮晶晶的銅扣子制服，是一个看管衣帽的人！他前額上的头发已經斑白，下巴的皮肤皺成一道道很长很长的皺紋。

柯拉布略夫和他問好，他輕輕地，甚至十分恭敬地向他伸出手来。

"啊，原来是柯拉布略夫同志，我道是誰在等我呢，"他說道，"而且还不是一个人，还带着公子。是令郎嗎？"他急速地問道，并且急速地看了我一眼，然后又看了看柯拉布略夫，然后又看了看我，又看了看柯拉布略夫。

"不，他不是我兒子，是我从前的学生。他現在是飞行員，想和您認識認識。"

"飞行員，还想和我認識認識，"維什米尔斯基不愉快地笑着說道，"飞行員对我个人感到什么兴趣呢？"

"您使他感兴趣的是在这方面，"柯拉布略夫說道，"您大概不知道，他在写塔塔林諾夫船長探险队的历史。大家都知道，您曾經积极地参加过这个探险队的工作。"

看样子維什米尔斯基不太喜欢这种說法。他又急速地瞥了我一眼，在他那老年人的泪水模糊的眼睛里有一种东西迅速地閃了一下——是恐怖，还是疑竇？我不知道。

不过他的劲头馬上就来了，象放連珠炮似的滔滔不絕地說了起来。他一句一个"柯拉布略夫同志"称呼着伊万·巴甫雷奇，自吹自擂得令人难以忍受。他說那是伟大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探险队，說他"为了使一切好到极点"作了許許多多工作。——

这时他簡直一分鐘也坐不住了，一会兒站起来，作着各式各样的手势，揪住左面的鬍子，神經質地往下拽……

“不过，这是很早以前的事了，”最后他仿佛很感叹地說道。

“却也不算太早，”柯拉布略夫辯駁道，“就在革命以前不久嘛。”

“是的，革命以前不久。我那时不在老残互助組里工作。不过这是临时的，是服务。因为我有很大的功劳。我們那时工作很多。都是些重要的劳动。”

我正想問他这些劳动具体是指的什么，可是柯拉布略夫用一种很平靜的，仿佛絲毫也不表示什么的眼光看了我一眼，于是我就乖乖地閉上了嘴。

“尼古拉·伊万內奇，您曾經和我談过这个探险队的事，”柯拉布略夫說道，“記得您还保存着一些文件和書信。我有一个請求：請您給这个年輕人再講一遍，您可以直接称他为薩尼亚。請您指定一个日子和时間，同时給他留一个地址，讓他到您家去。”

“請来吧！我很欢迎！虽然事先我很抱歉寒舍簡陋，但还是請您到我家里去。过去我有一套十一个房間的住宅，我并不隐瞞这点，相反的，我还要写在調査表里面，因为我对人民有很多貢献。为此我还申請过养老金，我想他們会批准的，因为我有很大的功劳。这次的探险那只不过是滄海一粟！我还修过横跨伏尔加河的大桥。”

于是他又象决口的河水一般滔滔不絕地說了起来，他头上长着一簇尖尖的，向前伸出来的灰白头发，很象一只衰老的飽經风霜的鳥兒。

后来格里沙化妆室里的电灯忽然熄了一下，——幕終了！——这个上一世紀的幽灵就象来的时候一样突然消失了。

这次全部談話只持續了五分鐘，但是我却覚得象是在梦中一般进行了很久。柯拉布略夫看了看我笑了，大約是因为我当时的样子显得很傻。

“伊万·巴甫雷奇！”

“什么，亲爱的？”

“这是他嗎？”

“是他。”

“能有这样的事嗎？”

“能。”

“就是这个人？”

“是这个人。”

“他对您講过些什么？他認識尼古拉·安东內奇嗎？他常到他們那兒去嗎？”

“不的，”柯拉布略夫說道，“他正是不願意去。”

“为什么呢？”

“因为他恨尼古拉·安东內奇。”

“为什么？”

“为了种种事情。”

“他究竟对您講过些什么？那份署名維什米尔斯基爵士的信托書究竟是从哪兒来的呢？您还記得曾經和我談过这份信托書嗎？”

“哦——哦！問題就在这里！”柯拉布略夫說道，“就在信托書上！当我問起他这份信托書时，他簡直气得发抖。”

“伊万·巴甫雷奇，請您把这件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訴我！您

以为一直到最后一分鐘才告訴我他是維什米尔斯基这种作法好嗎？这只有使我惊惶失措，他大概还以为我是个白痴哩。”

“正相反，他很喜欢你哩，”柯拉布略夫一本正經地說道。“他有一个成了年的女兒，因此他对所有的年輕人都从一个角度去着眼：‘适不适合于作他的女婿？’你无疑是非常适合的：年輕，漂亮，还是飞行員。”

“伊万·巴甫雷奇，”我以責备的口吻說道，“說实話，我真不了解您。您变得太多了，实在太多了。您知道这件事对我多么重要，却还在打趣我。”

“好吧，薩尼亚，别生气，我全都告訴你，”柯拉布略夫說道。“不过，讓我們先从这兒溜走了再說，否則格里沙馬上就会捉住我們，把我們留在莫斯科剧院看戏……”

但是，我們还沒有来得及溜走，电灯又閃了一下，格里沙急急忙忙地走进了化妆室。他戴着紅褐色的絡腮鬍，白色的长鼻子，与其說是象医生，还不如說是象一个杂技团里的小丑，不过是一个脸部表情英勇善良的小丑。我和伊万·巴甫雷奇一下子沒有認出他来，而且，糟糕的是“留在莫斯科剧院看戏”这最后一句話无疑問的是传进他耳朵里去了。但是，显然格里沙并沒有发現这句話里有什么令人不愉快的意思，而且相反地，他以为我們迫切地希望赶快到剧場里去看戏，和看他扮演的医生。

“是这么一回事，我馬上就給你們找地方。”他說道。

他引我們走一条演員們走的內部通道，路上我問他为什么他这个医生化妆得这样古怪。想不到他却神气十足地回答道：

“这就是用意深刻微妙之处。”

我一时沒有想出怎样来反駁他。

伊万·巴甫雷奇对格里沙的才能大約估价不高。不过我却

是眞心喜欢他，我发見他有天才。他在这出戏里只是个很小的配角，可是我認为他演得很出色。他离开病人走出来的时候，沉思了一会兒，在前台站了相当长的时間。这是“捉弄观众的情緒”，讓观众去揣測他将要說什么話。可惜由于角色的关系，只允許他說些同他的作功和脸部那种勇敢的表情完全不相称的話。他在开葯方时那种斟酌再三的表情演得非常逼眞，他在接錢时，手部的那种不自然的动作簡直和一个眞正的医生完全一样。不过，他說話的声音能不那么高就更好了。总而言之，他这一个角色演得很好，我很正經地对伊万·巴甫雷奇說，我認为他将来能成为一个很好的演員。

他接过錢走出来时，不小心撞到了椅子上，这一个动作也演得很自然。后来我和伊万·巴甫雷奇就再沒有去看台上了。

我总是想談一談关于維什米尔斯基的事，可是我刚一开口，包厢里立刻有人发出噓噓的声音制止，因此我就問了一句：

“您怎么找着他的呢？”

伊万·巴甫雷奇也刚来得及回答說：

“很簡单：他的兒子在我們学校里学习。”

6　又有許多新聞

我对支票这些事情向来是一窍不通，因为在我开始讀書的时候还沒有这个詞。什么叫“借据”？什么叫“票据”？什么叫“保险单”？“保险单”就是“保险单”，而不是北极，这是誰都知道的。什么叫“貼現”？“貼現”就是“貼現”①，而不是高音。

当我在書本上碰到这些詞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总是使我

回想起恩斯克的“候审室”：在那半明半暗的高大走廊中的鉄椅子，母亲向他低三下四求情的，坐在木栏杆后面一个看不見的官老爷。当維什米尔斯基对我叙述他的不幸的往事时，这种昔日的，早已被忘怀的生活，又逐漸地在我眼前复活了。

我們坐在一間狹小的地下室里，从地下室的窗戶望出去，不时可以看見扫帚和脚：大約是淸道夫站在那里。这間屋子里的一切东西都很陈旧，椅子腿用繩子綁扎着，我刚把胳膊放到飯桌上，就連忙縮了回来，因为桌边上的木板眼看就要垮下来。到处都是肮脏的包袱布：窗戶上的窗帘，破烂的沙发套，連墻上挂着的衣服也是用这种布遮盖着的。这間屋子里的新东西只有維什米尔斯基的兒子——一个圓脸蛋兒，晒得黑黑的十二岁的小孩，在屋角他自己桌上摆弄着的小木板，綫軸和鉄絲卷兒。还有这个孩子也完全是新的，他距离我在听維什米尔斯基講故事，講他的那些“貼現”和“期票”时所隐隐約約能够回想到的那个世界是无限遙远的。

这是一个冗长的、錯綜复杂的故事，中間穿插着許許多多荒唐透頂的枝节。这个老头兒把他生平所作的一切事情都說成是功劳，因为“这些事都是为了人民，为了人民”。他特别着重地說自己担任伊西多尔大主教秘書职务的这件事，——他声称自己对神甫阶层的生活知道得很清楚，甚至还特别研究过，以期“对人民有利”。他随时都准备揭发这个大主教。

他竟把自己另外一个职务，給一个叫作什么海克尔特的海軍上将当差也算作是功劳。这位海軍上将有一个“神經病兒子”，維什米尔斯基就带着他到各个餐厅里串，为的是不讓人猜

① 俄文中的保险单 полис 和北极 полюс 很相近，貼現 дисконт 和高音 дискант 很相似，都只差一个字母。——譯者注。

到他有神經病，因为“他們不讓人知道这件事”……

等他談起尼古拉·安东內奇来的时候，我就連忙竪起耳朵来听了！我从前以为尼古拉·安东內奇一向就是教育家。是一个典型的教育家！因为他甚至在家里也教导人，給人講道理，引用实际的例子。

“沒有的事，”維什米尔斯基恶狠狠地把眉头一皺反駁道。“这是他山穷水尽，不得已而走了末路。他从前有买卖。他一面跑交易所，一面还有买卖。是一个旣跑交易所，又作买卖的闊佬。”

这是第一件新聞。跟着还有第二件。我問他，塔塔林諾夫船长的探险队和跑交易所有什么关系呢？为什么尼古拉·安东內奇要攪探险队的事呢？难道这也有利可图嗎？

“如果探险队完了蛋，那他搞起来兴致还更大哩，”維什米尔斯基說道。“他就是希望这样，非常的希望。結果正是如此。”

“我不明白。”

“他爱上了他的妻子，当时大家对这件事情議論紛紛，眞是議論紛紛。这已經是大家传来传去的閑談資料了。但是船长一点也不疑心。他是个好人，可是心地很单純，眞是一个热心能干的老好人，热心能干的老好人！”

我感到万分惊訝。

“爱上了瑪丽亚·瓦西里耶芙娜？还是在那个时候？”

“对，对，对，”維什米尔斯基耐不住地重复說道。“这里面有很多私人的原因。您要懂得这是私人的。私人，私人，私人的原因。他为了把这位船长打发到阴間去，可以犧牲自己全部家財。結果眞是打发去了。”

不过爱情終归是爱情。生意究竟是生意。尼古拉·安东內奇并沒有牺牲他的財产，相反的，他的財产还打了一个滚。例如他接受了承包商的賄賂，就把霉烂了的衣服收下給了探险队。他收下了带煤油味的剝庄的巧克力糖，也同样是因为受了賄賂。

“这是伤天害理，伤天害理的行为，”維什米尔斯基說道。“有計划的！伤天害理的計划！”

不过，維什米尔斯基过去对这个計划的看法显然和現在不一样，因为他也参加了这个計划，并且被尼古拉·安东內奇派到阿尔汗格尔斯克去，在那兒接探险队，并給探险队补充給养。

这时就出現了尼古拉·安东內奇給柯拉布略夫看的那份信托書。連同这张信托書一起汇給了維什米尔斯基一笔錢，有支票也有現款……

随后，老头兒气憤憤地哼哧着鼻子，从橱柜里取出几张支票来。支票一般就是一张保証按規定日期归还款項的签字收据。但这种收据是用很結实的，上面有水印的国家的鈔票紙开的，样子很华丽，使人深信不疑。維什米尔斯基向我解释說，当时这种支票可以代替現金流通的。不过支票又不完全等于鈔票，因为“签票人”可能突然宣布說他沒有錢。

这里面就可能有各式各样的欺騙勾当，他之所以控告尼古拉·安东內奇，就是因为上了其中的一种当。

他控告尼古拉·安东內奇，是因为尼古拉·安东內奇連同信托書一起汇給他的那些支票是“无效的”，也就是說，尼古拉·安东內奇早就知道“签票人”已經破产，不能再兌現了。可是維什米尔斯基并不知道，就把支票当作現金收下了，因为“签票人”是各行各业的商人，和一些当时很有名望的人。只是到帆船出航后，留下一笔四万八千卢布的債务时，他才知道上了当。这时

自然誰也不会收这些“无效的”支票来抵偿債务了。

这么一来，維什米尔斯基就只好从自己口袋里掏錢来偿付債务。可是后来因为尼古拉·安东內奇又把他告到了法院，法院判决追还他去阿尔汗格尔斯克时尼古拉·安东內奇汇給他的全部款項，所以他又不得不再偿付一次。

当然，这些事情我在这兒叙述得很簡略。老头兒一会站起来，一会坐下，整整对我講了两个鐘头。

“我一直告到最高法院，”最后他声色俱厉地說道。“可是我敗訴了。”

他敗訴了，事情就結束了，因为他的財产都拍卖光了。他原先有所房子，房子也卖了。他只好搬到另外一所較小的房子里去住。接着他的老婆也忧愁死了，留下几个未成年的孩子。后来革命了，他那所較小的房子最后就剩下了現在这么一間勉强住得下的屋子。当然，“这是暫时的”，因为“政府很快就会重視他給人民立下的功劳”，不过暫时他还不得不住在这兒。可是他有一个已經成年的，掌握了两种語言的女兒，就是因为这間屋子过于簡陋，害得她嫁不出去：丈夫无門可入呀。等到养老金批下来以后，他就搬家。

“哪兒都行，哪怕进老残院也行，”他痛苦地把手一甩說道。

这位成了年的女兒显然是急于出嫁，所以她总是在赶他。

“尼古拉·伊万內奇，”我对他說道。“我可以向您提出一个問題嗎？您說他把这张信托書給您寄到阿尔汗格尔斯克，怎么会又重新落到了他的手里了呢？”

維什米尔斯基站了起来，他的鼻孔鼓得老大，头上翘着的那一簇斑白头发也因为憤慨而顫抖起来。

“我把这张信托書朝他脸上摔回去，”他說道。“他跑去弄水，可是我沒有喝。我出門走到街上就暈倒了。还有什么可說的呀！”

于是他又痛苦地把手一甩。

我怀着沉重的心情听着他講。在这个故事里有一种和这兒周围的一切不相上下的肮脏东西，因此我老是想洗一洗手。我原来以为这次談話将是証明我是正确的一件新証据，它新奇得就如同这个人物的突然出現一般。結果的确是如此。不过，我也感到很不舒服，因为在这些新的証据中染上了一块污秽的痕迹。

后来他又談到养老金：“他們一定会发給我养老金的，因为我已有四十五年的工龄。”已經有一位年輕人到他这兒来过，并且把文件都拿去了，同时他对尼古拉·安东內奇也很感兴趣，可是后来便再沒有来了。

“他答应給帮忙，帮忙，”維什米尔斯基說道，“可是后来便沒有来了。”

“对尼古拉·安东內奇感兴趣？”

“对，对，对！当然感兴趣啦，怎么会不感兴趣呢！”

“这人是誰呢？”

維什米尔斯基把手一摊。

“来过几次，”他說道。“您知道吧，我有一个待嫁的女兒。他們在这兒喝喝茶，聊聊天。認識認識！”

一絲淡淡的笑影从他脸上掠过：大約这种“認識”是和某种希望关連着的。

“是的，挺有意思，”我說道。“还把文件拿走了？”

“是的，为了养老金的事，为了养老金的事。便于帮忙。”

“还問过尼古拉·安东內奇的事嗎?”

“对，对。甚至还問我知不知道还有什么人知道，或者了解他干的事……这个家伙干的事！我讓他到一个人那兒去了。”

“眞有意思。这个年輕人究竟是誰呢?”

“那么一个相貌堂堂的，”維什米尔斯基說道。“答应帮忙。他說要領养老金这些材料都是需要的，是个人的，不是别的！”

我問他这人姓什么，可是老头兒想不起来了。

“什么‘紹’，”他說道。

后来那位待嫁的女兒走来了，她的确是应該赶紧出嫁了。不过这个問題并不那么簡单，这絕不是因为“丈夫无門可入”。問題在于这个大女兒长着一个其大无比的鼻子，而且总是用一种异常凶狠的样子抽吸着鼻子。我不知道这是因为她患了慢性伤风呢，还是因为一种坏习慣使她不断地做这个动作。但当我看見她那么凶恶地向着她父亲抽吸了一下鼻子的时候，我立刻就明白为什么老头兒那么急于想迁到老残院里去了。

我很有礼貌地向她問了好，她連忙跑到什么地方去了一趟，回来时就完全变成另外一付模样了：她原来穿一件阿拉伯式的带风帽的斗篷，可是这会兒却是穿着通常的連衣裙了。

我們閑談起来，先談柯拉布略夫，这是我們都認識的唯一的熟人，然后又談到他的那个学生，——他仍旧在屋角摆弄着他的綫軸，一点兒也不注意我們。要不是她的鼻子的那些动作，我們的談話甚至可以說是很愉快的。她說她不喜欢电影，因为电影里所有的人物都是“死人一般的蒼白”，但这时老头兒又拿起他的养老金問題插进来說話了。

“紐多其卡，那个年輕人姓什么来着?”老头兒懦怯地問道。

“哪一个年輕人呀？”

“那个答应帮忙办养老金的人。”

紐多其卡皺起了眉头。她的嘴唇顫动着，立时有好几种感情浮現在她的脸上，但其中主要是憤怒。

“不記得了，好象是罗馬紹夫，”她漫不經心地答道。

7　我們家里有客人

罗馬什卡！罗馬什卡到过他們家里！他答应帮老头兒搞养老金，他追求一个长着那样大鼻子的紐多其卡！最后，他拿走了一些文件，并且失踪了，甚至連老头兒也不能确切地想起都是些什么文件。起初我以为这是另外一个罗馬紹夫，是一个同姓的人。不，这是他。我詳細地形容了他的相貌，紐多其卡憤恨地說道：

“是他！”

問題很明显，他追求过她，后来他又不追她了，否則她也不致于象現在这样狠毒地罵他。他到老头这兒来打听尼古拉·安东內奇的事情，他搜集这些材料，这是为了什么呢？他把維什米尔斯基这兒的文件拿去又是为了什么呢？从这些材料里至少可以得出一个結論，就是尼古拉·安东內奇在革命前并不是一个教育家，而是交易所的一个齷齪的投机家。

我从維什米尔斯基那兒回来，感到有些头暈。这兒只有两个答案：不是想把过去的一切毁痕灭迹，就是企图把尼古拉·安东內奇抓在自己手里。

把他抓在手里？这是为什么？他不是他最忠实，最可靠的学生嗎！他还在小学时期就一直是这样，偷听同学們关于尼古

拉·安东內奇的談話，然后向他彙报。看来这是一件使命！尼古拉·安东內奇委托他了解維什米尔斯基所知道的关于他的一切。他暗派罗馬什卡把那些足以使一个苏維埃教育工作者身敗名裂的文件取走。

我走进咖啡店吃了一份冰淇淋。然后又喝了一些飲料。我感到很热，我总在不断地思索。毕业以后，我和罗馬什卡分别已經好些年了。那时候他的确是一个卑鄙，冷酷的动物。不过他对尼古拉·安东內奇却是忠心耿耿的，难道这能是我們的錯覚嗎？現在我已經不了解他。也許他轉变了？也許他是瞞着尼古拉·安东內奇，出于对他的爱戴，想把这些可以給他师长，他的密友的美名投上一层暗影的文件毁掉？

但这种假想未免太荒唐了，只要一想起罗馬什卡和他那张蒼白的丑脸以及反常的圓眼睛，便可以恢复对他的現实的認識了。

我又吃了一份冰淇淋。当我要第三份时，給我端冰淇淋的女郎笑了起来。我吃了这么許多的冰淇淋大概很合她的意，所以她还走到鏡子跟前整了整发針。

不，仅只是出于对某个人的好感的話，他向来是什么也不干的。这里面有着不可告人的目的，我对这一点深信不疑，只是猜不透这个目的是什么，因为我只能从他和尼古拉·安东內奇的旧关系上来判断，而新的关系我又很不了解。

这可能是关系到提升职务之类的一种很单純的目的。因为尼古拉·安东內奇是教授，罗馬什卡是他的助教。也可能是为了金錢，因为在学校里的时候，他一談到錢連耳根都燒紅了，这也是不无道理的。关系到薪金的問題吧，鬼才知道！

我挂电話給瓦里亚，想同他商議商議，因为最近几年他总还

是到塔塔林諾夫家中去过几次。可是他不在家。同往常一样，当你需要他的时候，他总是不知在哪兒游蕩！

"不，不是为了薪金，也不是为了地位，"我繼續想道。"要达到这样的目的，他完全可以用其他較簡单的办法，只要看看他这一个人就可以断定这点。"

到了应該回家的时候了，可是黃昏却刚刚来临，这是一个那么具有莫斯科情調的黃昏，和我在北地城所度过的那些黃昏是迥乎不同的。所以，虽然旅館距离很远，我仍然想步行回去。

我慢慢地走去，先向着高尔基大街走，然后順着領子胡同走。这是多么熟悉的地方啊！旅館已經被拋在一旁去了，我还是沿着領子胡同走，然后拐到我們学校旁边的公园凱旋路！大家都知道，从公园凱旋路到特維尔·亚姆二路是很近的，因此我就往二路走去。几分鐘以后我便站在一所熟識的房子門前。我向門里张望了一眼，看見一个熟悉的，洁凈的小院子，和那間熟悉的，我曾經在那兒劈过木柴，帮老奶奶工作过的石头庫房。这是楼梯，我曾經从上面倒栽下来，这是用黑漆布裱糊的房門和写着花体字姓名"尼·安·塔塔林諾夫"的小銅牌……

"卡佳，我来找你，不会赶我走嗎？"

后来卡佳告訴我說，她一見我，馬上便看出我"跟三号那天在大戏院門前完全不一样"。但有一件事她始終不了解：为什么我这次神色和上次完全不一样，出人意料地来到她家，口头上旣然說是訪問她，而整个晚上，却目不轉睛地瞧着尼古拉·安东內奇和罗馬什卡呢。

当然，这样說未免有些夸大，不过我的确是老看着他們。这天晚上我用的脑筋就象考試的时候一样，想从片言只語中去猜測和了解問題。

我忘記說一件事，就是在咖啡店的时候我买了一束鮮花。我手里拿着鮮花向塔塔林諾夫家走去。这眞有点兒难为情：自从我和彼其加在恩斯克花园里偸紫蘿兰，散場后再以五个戈比一束卖給观众之后，我就沒有拿着鮮花在大街上走过。現在，我到了他們家里，理应把鮮花送給卡佳……但不知为什么我却把花放在了小桌上帽子的旁边。

大概我的神情很激动，所以說了两句話以后，声音便不由得高起来了。卡佳迅速对着我的脸看了看。

我們正要往她房間里走去，但这当兒尼娜·卡比丹諾芙娜恰好从餐厅里走出来。我向她鞠了一躬。她惊訝地看了看我，很有礼貌地点了点头。

“姥姥，这是薩尼亚·格利高里耶夫。你認不得了嗎？”

“薩尼亚！天哪，是眞的嗎？”

她惊愕地把我打量了一下，这时餐厅的門开着，我看見尼古拉·安东內奇手里拿着报紙，坐在圈椅上。他在家！

“您好，尼娜·卡比丹諾芙娜，亲爱的，”我說道。“您还記得我嗎？大概早已忘記了吧？”

“嘿！忘記了！我一点兒也沒有忘記，”老太婆回答道。

我們还在接吻，尼古拉·安东內奇从餐厅里走出来，站在門口。

这是我們重新估量对手的一分鐘。他滿可以象在柯拉布略夫的庆祝会上那样装作沒有看見我。也可以强調說我們素不相識。最后，虽然这样作未免有点冒险，但他也仍可以指着門叫我滾出去。他旣沒有采取第一种办法和第二种办法，更沒有采取第三种办法。

“哦，年輕的山鷹，”他笑容可掬地說道。“終于飞到我們这

兒来了？早就該如此嘛。”

接着他很爽快地把手伸給我。

“您好，尼古拉·安东內奇。”

卡佳詫异地看着我們，老太婆不知如何是好地眨着眼睛，但我却非常高兴，現在居然也可以和尼古拉·安东內奇随便談話了！

“是啊，眞沒有什么可說的，太好了。”尼古拉·安东內奇很正經地看着我。“不久前，还是个孩子，可是現在你瞧，已經是北极的飞行員了。要知道你选择的是什么样的职业啊！眞是好样的！”

“这是很普通的职业，尼古拉·安东內奇，”我回答說。“和其他的职业一样。”

“一样？需不需要沉着？遇到危险时需不需要勇敢？还有紀律，不仅是执行勤务的紀律，而且是內心的紀律，就是所謂自觉的紀律！”

听到他这些虛伪的装腔作势的話，心里照旧感到作呕，不过我还是很注意地，很有礼貌地听他講。我感覺他比在庆祝会那天衰老得多了，他脸上的神色显得十分疲憊。当我們往餐厅里走的时候，他把卡佳的肩膀抱起来，微微可以看出她躲閃了一下。

餐厅里还坐着一位布宾其可夫家来的姨媽，不过我現在已經分辨不清她是那个想用刷子打我的呢，还是那个劝止山羊的姨媽。不管怎样吧，她这次却是很殷勤地迎接我了。

“看，我們都在等你嘛！”尼古拉·安东內奇說道。这时尼娜·卡比丹諾芙娜正怯生生地忙着招待我，替我倒茶，把桌上吃的东西都推到我的面前。“我們等您講北极的故事。講盲目

飞行，終年結冰的地带，漂浮的冰山和雪原！”

“一切都很好，尼古拉·安东內奇，”我很高兴地說道。“冰山就是冰山，雪原仍是雪原。”

尼古拉·安东內奇笑了。

“有一次我遇見一位老朋友，現在在我們駐罗馬的商务代表团里工作，”他說道。“我問他：‘喂，罗馬怎么样？’他回答說：‘沒有什么！罗馬就是罗馬嘛。’这和你說的很相似，对不对？”

他的声调很客气。卡佳垂下眼睛，听我們談話。应該設法把談話維持下去，于是我就眞的講起涅涅茨人的故事，北极的风光，順便还講了我和医生怎样飞到万龙坎的事。尼娜·卡比丹諾芙娜总是关心我飞的高不高，——这使我回想起在巴拉紹夫航校收到达莎阿姨的一封信。信里說：“旣然你命中注定不同凡人那样在地面上行走，薩尼其卡，那么我請求你尽量飞低一点兒。”

我講到米沙·戈洛布偸走了我这封信，从此，我只要一戴上飞行帽，就听到机場上到处都在向我喊叫：

“薩尼亚，飞低一点兒！”

就是这个米沙在航校里办了一种幽默杂志，名称是“飞低一点兒”。杂志里开辟了一个专栏，叫做“飞行技术图解”，上面有这样的一首詩：

有了高度，才好側滑，
拉平与屋檐齐高眞糟糕！
薩尼亚，别拿自己开玩笑，
阿姨求你飞低一点兒才好！

这个故事大概講得很成功，逗得大家都笑了，而且尼古拉·安东內奇比所有的人笑得声音都大。他一直笑个不停！同时脸都笑白了，他笑的时候向来脸都要发白的。

卡佳几乎沒有在桌边坐过，老是站着，一进厨房里就是好久不出来，我覺得她走开只是为了一个人好考慮考慮問題，因为她回來时的那种表情就是这样。有一次，当她从厨房里回来时，不知为什么手里拿着一个藤条編的盘子走到食橱前面，但看样子，她又忘了为什么要到食橱前面去。我正对着她的脸看了看她，她回答我的是一种忧慮不安的，困惑的眼光。

尼古拉·安东內奇大約发覺我們在交換眼光，脸上不由得罩上了一层暗影，于是他开始把話說得更緩慢，更圓滑了。

后来罗馬什卡来了。尼娜·卡比丹諾芙娜給他开了門，我听見她在前厅里又怯又恨地說道：

"我們家有客人哪。"

他在前厅里走来走去磨蹭了好半晌，——大概是修飾了一番，——然后才走了进来，并且看見我时装作絲毫不感覺惊奇。

"啊，原来是这位客人！"他假笑着說道。"眞高兴，眞高兴，非常高兴。非常高兴！"

一眼便可以看出他是否眞高兴。不过我却是眞的高兴！他刚一走进屋子，我就开始注意他的每一个动作。我的眼睛沒有离开过他。这是一个什么人呢？他現在成了一个什么样的人了呢？他对尼古拉·安东內奇，对卡佳的态度怎样呢？他走到她的跟前，和她談起話来。他的每一个动作，每一句話对我說来都是一个小小的謎，不过我馬上就猜透了。我越来越紧张地，細心地注視着他，揣測他的言行。

現在，当我看見他們，看見他和卡佳在一起时，我甚至覺得好笑：他和她相形之下，是多么的微不足道，多么丑陋和渺小。他很自信地和卡佳攀談，我心里暗想："你也未免太自信了。"他对尼娜·卡比丹諾芙娜說了句什么玩笑話，可是誰也沒有笑，我心

里又暗自想道："連尼古拉·安东內奇也沒有笑。"

但是他們立刻就談起了自己的本行——关于一篇学位論文的答辯問題，尼古拉·安东內奇認为这篇論文不好，可是罗馬什卡却認为很好。

当然这是故意做作出来給我看的，其目的不过是为了强調我在这兒对他們是无所謂的。不过这样我倒更高兴，因为我可以一句話不說地坐在这兒，看着他們，听他們講話，考慮問題。

"不，"我想，"他不是从前那个以絕对听从尼古拉·安东內奇的命令为荣的罗馬什卡了。他以一种卑視的，几乎是无礼的态度同他談話，而尼古拉·安东內奇則是皺着眉困倦地在回答他，这是一种使尼古拉·安东內奇极不舒服的复杂关系。我的看法是正确的。这不是使命。他从維什米尔斯基那兒拿走文件不是想把它毀灭。他干这件事是为了把它們卖給尼古拉·安东內奇，这才象他那号的人作的事！并且，大概获得了很高的价錢。或者还沒有卖，正在講价錢。"

卡佳問了我几句話，我回答了她。罗馬什卡一面听尼古拉·安东內奇講話，一面焦灼不安地看看我們。这时，一个想法突然从其它的思想中緩緩地冒出来，在一旁停留下了，仿佛是等待着我走到它的近前去。这是一种非常奇怪的想法，但是，对一个从小就了解罗馬什卡的人說来，却完全是很实际的想法。但現在我却不能停留在这种想法上，因为它实在太可怕了，現在最好不要去想这件事。我仿佛只不过从远处瞥了它一眼。

后来尼古拉·安东內奇和罗馬什卡不知为什么事到書房里去了，留下了我們俩和两个老太婆。一个老太婆什么也沒听見，另一个却假装着什么也听不見。

“卡佳，”我声音不大地說道。“伊万·巴甫雷奇請你明天七点鐘去一趟。你去嗎？”

她默默地点了点头

“我到你們家来沒有关系吧？我很想看見你。”

她又点了点头。

“請你忘掉三号那天晚上吧，总之一切都不是那样，不是那么一回兒事，就算我們还沒有見过面吧。”

她默默地望着我，一点兒也不明白。

8 忠貞不渝

这究竟是个什么想法呢？我整个晚上都在考虑它，不知不觉便睡着了。早上醒来时，感觉好象根本沒有睡，而且始終在考虑。

整整的这一天都是如此。我怀着这种思想到北极航务总局，到地理学会，到一个北极杂志的編輯部去。我偶尔忘記了它，不过就好象是把它留在大門外，等我出来的时候，又好象碰見老朋友似地碰見了它。

五点多鐘，我疲倦地，滿腹气悶地来到了柯拉布略夫家中。我来的时候他正在工作，批改練习簿。他身旁桌子上放着两大迭本子，他戴着眼鏡坐在那兒批閱，手里握着鋼笔，毫不留情地改正錯誤。我不知道这是什么練习；这时正在假期里，学校沒有上課。他就是在假期里也能找工作干。

“伊万·巴甫雷奇，您工作吧，我坐一会兒，好嗎？我累了。”

我們在十分寂靜的气氛中坐了些时間，只有鋼笔尖刷刷的声音和柯拉布略夫嘟嘟囔囔发怒的声音划破了这沉寂。从前我沒有发現他这么生气地抱怨过練习。

“喂，薩尼亚，事情怎么样了？”

“伊万·巴甫雷奇，我想問你一个問題。”

“問吧。”

“您知道罗馬紹夫最近去过維什米尔斯基家嗎？”

“知道。”

“您知道他为什么到他家去呢？”

“知道。”

“伊万·巴甫雷奇，”我以譴責的口吻說道。“說实話，我又不了解您了。您早就知道这件事，却又一点也不告訴我。”

柯拉布略夫很严肃地看了看我。这天晚上他的神气非常严肃，大概是因为在等着卡佳，所以有点紧张，而且还不願意讓我看出来。

“薩尼亚，我沒有告訴你的事多着哩，”他辯駁道。“因为你現在虽然已經是个駕駛員了，可是还說不定会突然用脚去踢別人的脸的。”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了啊！伊万·巴甫雷奇。現在的問題是我脑子里产生了一种想法。当然，也可能是我想錯了，假使是我想錯了，那倒更好一些。”

“你看，你又激动了。”柯拉布略夫說道。

“我沒有激动，伊万·巴甫雷奇，您沒有想过嗎？罗馬什卡可能要挾他……他可能說如果尼古拉·安东內奇肯帮助他同卡佳結婚，那么他就不对外宣揚。”

柯拉布略夫一句話也沒有回答。

“伊万·巴甫雷奇！”我大声喊道。

“你又激动了。”

“我沒有激动。不过我有一件事不明白：你怎么能讓他有这个念头呢？她是卡佳呀！”

柯拉布略夫沉思地在屋里踱来踱去。他摘下眼鏡，脸色变得十分忧郁。我发現他对着瑪丽亚·瓦西里耶芙娜的相片瞥了好几次，就是頸上戴着珊瑚項鏈照的那张相片，現在照旧放在他的桌子上。

“是的，是卡佳，”他慢吞吞地說道。“你現在完全不了解她。”

这倒是件新鮮事兒。我不了解卡佳！

“你不了解她这几年是怎样生活的。可是我却知道，因为……我关心，”柯拉布略夫急速地說道。“尤其是好象有那么个人不怎么关心她嘛。”

他是在說我。

“她从母亲去世以后十分悲伤，”他繼續說道。“可是在她身边还有另外一个人，也象她那样，甚至还比她更悲伤。你明白我說的是誰。”

他說的是尼古拉·安东內奇。

“他是一个很有經驗，很阴险的人，”柯拉布略夫繼續說道。“一个可怕的人。但他真是一生都爱着她的母亲，一生——这不是一个短时間。因此她的死大大地使他們的关系亲近了，——問題就在这里。”

他开始抽烟，划了一根火柴，手指微微抖动着，然后輕輕把火柴放到烟灰碟里去。

“这时插进一个罗馬紹夫来，”他繼續說道。“我应該告訴

你，你現在連他也不了解了。这也是一个尼古拉·安东內奇，不过是另外一种类型的。第一，他的攻势更猛。第二，他根本不講什么道德，旣沒有好的道德，也沒有坏的道德。第三，他善于采取断然的手段，換句話說，也就是一个干实事兒的人。这位很清楚自己需要什么，干实事兒不择手段的人有一天来到他的老师，也是他的朋友家里，对他說道：'尼古拉·安东內奇，請您想一想吧，原来那个格利高里耶夫完全是对的。您在塔塔林諾夫船长的探险队身上的确是捞了一把。除此之外，您还有好些事兒沒有在自传里交代……'这次談話是尼娜·卡比丹諾芙娜听見的。但是她不懂这是什么意思，便跑来找我。我当然是理解的。"

"原来是这么回事，"我說道，"眞有意思。"

我們沉默了一会兒。

"那么后来又怎样了呢？"柯拉布略夫繼續說道。"可以根据結果来判断。你也知道尼古拉·安东內奇的为人，他作事向来是不慌不忙的。起初这件事大概是半开玩笑式的，順便說說，后来却愈来愈認眞，愈来愈經常了。"

"伊万·巴甫雷奇，但他不是終究还沒有說动她嗎，是不是？"

"唉，薩尼亚，薩尼亚，你这人眞是个怪物。如果他已經說动了她，我难道还会写信叫你来嗎。可是誰敢打包票呢！也許他終有一天会达到自己的目的，就象他……"

我明白，他是想說"象他得到瑪丽亚·瓦西里耶芙娜作妻子一样"。

我不知道是留下来好，还是走了的好，——已經七点鐘了，每一分鐘卡佳都有可能按門鈴。我簡直是下意識地感到难以离

开他。我一声不响地看着他低下斑白的头去，伸出两条长腿在抽烟的神情，我心里想，他是多么深厚地爱着瑪丽亚·瓦西里耶芙娜，他是多么不幸，他对她是多么忠貞不渝，这就是他近几年为什么那么留心观察卡佳生活的原因。

后来他忽然想起来，說我最好是走开。

“你不在場，我同她談話更方便一些。”

他送我出来，我們告别說明天再見。

我走到街上的时候，天还很亮，太阳还沒有落下去，花园路对面的窗子上反映着夕阳的余輝。

我站在門旁順着街往外瞧，卡佳应該从这个方向来。我大約已經等了相当久，街上的窗戶从左至右順次地暗下去了。后来我看見她了——根本不是从那个方向来的：她从兵工胡同走出来，站在人行道上等汽車过去。她今天仍是穿着那天来大剧院穿的那件連衣裙，当我看到她滿腹心思，愁眉不展地跨过街道时，不知为什么竟感到一陣恐怖。她現在离我很近，可是因为低着头走路，竟沒有看見我。同时我也不願意讓她看見我。我在心里默默地祝她鼓起勇气，把我这时所能够想到的最好的为她祝福，并且目送她到門口。她走进門去不見了，但我思想上还在跟随着她——我看到伊万·巴甫雷奇在迎接她。他很紧张，但竭力作出十分鎮靜的样子，我看見他在开始講話以前，神經質地把一支烟卷往长烟嘴里按了好久……

現在窗戶迅速地暗下去了，只有临着兵工胡同最头上的一幢楼房的最后两个窗戶还殘留着淡紅色的余輝；在我讀書的时候，这所房子是莫斯科市苏維埃文化部。

这时才八点种，我还不想回家。我在一所住宅的小花园里坐了很久；从这个小花园里可以看到我們学校的大門。我几次

走进学校的院子里去，想看看柯拉布略夫屋里的灯亮了沒有。然而他們是在暮色中談話，柯拉布略夫在說，卡佳一声不响地听着。

望着这些昏暗的窗子时，我眼前又出現了另外一次談話的情形。柯拉布略夫也是这样两手交叉着放在胸前，坐立不安地不时突然站起来在房間里踱来踱去。瑪丽亚·瓦西里耶芙娜直着腰坐着，脸上一点兒表情也沒有，偶尔用纖瘦的手理一理梳得很整齐的头发。"鷹爪蒙其哥瑪，我曾經这样称呼过他。"她坐在我們面前不停地抽烟，烟灰落得到处都是，她的膝盖上也是。她的脸色已經不是蒼白，而是慘白了。她沉静地一动也不动，只是偶尔輕輕地把頸上的珊瑚項鏈松一松，就好象这条項鏈窒息着她似的。她害怕眞理，因为她經受不住眞理的考驗。可是卡佳并不害怕眞理，要是她知道了眞理，一切就都好了。

……灯早已亮了，我看見柯拉布略夫細长的黑影出現在窗帘上。随后卡佳出現在他的身旁，可是很快又走开了，仿佛仅仅說了一句很长的話。

現在室外已經完全黑下来了，这样倒是好一些，因为我在这个小花园里坐得太久了，而且隔不一会兒又走去看一看对面的窗子，最后自己也感到有些不妥当了。

突然，卡佳从門里走出来，慢慢地独自在花园路上走着。

无疑問她是要回家去。不过看样子，她并不十分急着回家，在回到家里以前，她还有好些事需要考虑。她一面走，一面想，我跟在她后面，这情景就好象在偌大一个城市里只有我們两个人——卡佳和跟在她后面的我，不过她沒有看見我。电車震耳地响着向广場駛去，汽車停在紅灯前面怒吼着。我覺得在这样鬧哄哄的环境里是很难想什么事情的，更不用說要想通什么問題，

想通你需要想的問題了！这不是我，不是卡佳，不是船长（如果他还活着的話），也不是瑪丽亚·瓦西里耶芙娜（如果她还活着的話），不是我們所有的生者和死者所需要想的。

9 她决定搬走

旅館的房間里早已大亮了，但是因为我昨夜忘了熄灯，所以鏡中的我显得有些蒼白。我感到很冷，背上一陣陣地跳起鷄皮疙瘩来。我取下了电話筒。对方很久沒有接。最后有人答話了，我听出是卡佳的声音。

“卡佳。是我，这样早沒有关系吧？”

虽然还刚刚打八点鐘，她却說沒有关系。

“打扰你睡覚了吧？”

“沒有。”

我这一夜都沒有入睡，我相信她也是一分鐘也沒有睡着。

“卡佳，我可以来嗎？”

她沉吟了一会兒。

“来吧。”

……一个完全不認識的，头上盘着金色发辮的胖姑娘給我开了門。“卡佳在家嗎？”当我問她时，她脸都胀紅了。

“在家。”

我魯莽地刚要闖进去，連自己也不知道往哪里去，总而言之找卡佳，但是这位女郎連忙把門关上，打趣地說道：

“您怎么啦，指揮官同志！别这么着急呀。”

随后她就哈哈大笑起来，笑得那么震耳，笑得那么突如其

来，这时再要認不出是她来那簡直是不可能的事了。

"琪玲！"

我們跨过横隔在中間的箱子向对方扑去，差一点兒沒有拥抱在一起，这时卡佳正好从餐厅里走出来，琪玲很不好意思地往后退了退，所以我只好握了握她的手。

"琪玲，眞是您嗎？您从哪兒来？"

"就是我，"琪玲乐哈哈地笑着說道。"不过，請不要再叫我琪玲。我現在已不是那么一个傻瓜了。"

我們重又热烈地搖撼着对方的手。……她大約是在卡佳家里睡的，所以身上穿着卡佳的睡衣，当我們收拾东西的时候，这件衣服的扣子一連掉了好几个。前厅里放着两个打开盖子的箱子，餐厅里也有箱子，我們把衣服，書，器具，——总而言之，这屋子里卡佳所有的东西，全部放到这几个箱子里去。她要走了。到哪兒去呢？我沒有問。她要走了。一切都决定了，她要走了。

我沒有問，因为我不問也知道她和柯拉布略夫談話的每一个字，以及她回家后对尼古拉·安东內奇所說的每一个字。尼古拉·安东內奇不在市里，——他大約是在沃罗柯拉姆斯克的什么地方。不过反正都是一样，如果她从柯拉布略夫家里回来以后找着了他的話，我知道她要对他說的每一个字。

她的样子很坚决，脸色蒼白，走来走去，高声地談着話，料理着事情。但这是一个人受了刺激之后的鎮靜，我覺得現在什么也不需要和她談。我只是紧紧地握住她的手吻了吻，她默默地紧紧捏了捏我的手指表示回答。

眞正着了慌的是老太婆。她碰到我时样子很严峻，只是点了点头，便傲然从我身旁走过去了。后来她突然回来，带着賭气的神气往箱子里塞了一件薄紗短衫。

"这也很好。有什么法子呢？应該这样。"

她在餐厅里坐了很久，什么也不作，只是批評我們装箱子的工作。后来她突然走开了，彷彿什么事也沒有似的跑到了厨房里去駡女佣人，因为她把什么东西买少了。

"我对她說了上千次：看見下水[1]就买来。"她回来的时候对我說道，"看見好后肘就买来。'那怎么行呢，你不在我不知道該买不該买呀'。这有什么要知道的呢？一点也拿不定主意。这样的人我看不慣。"

"姥姥，我什么也不要。"卡佳說道。

"不要？怎么能不要？一定要拿着。"

后来她撇开了这些生活瑣事，开始叹起气来，并且偷偷地在食橱前服用月桂樱桃葯水，有时又跑到一个沒有人的地方，劝自己不要激动。但这些自慰的話对她起不了多久的作用，于是又跑到食橱前，偷偷地服用月桂樱桃葯水。

装撿卡佳的东西用不了多少时間。她的东西很少，虽然她所要离开的这所房子是她差不多有生以来就住在里面的。这兒的一切都是屬于尼古拉·安东內奇的。但是她自己的东西却也一点兒也沒有留下——她不願意遺留下任何一点兒东西使她回忆起自己曾經在这所房子里居住过。

她和她的一切——带着她的童年，她的信，瑪丽亚·瓦西里耶芙娜保存起来的她的最初的几张图画，还有我在三年級的时候向她借过的"叶林娜·罗宾逊"和"百年来的新发現"都要离开这兒了。

在九年級的时候，我还向她借过一些書，当我們收拾到这些

---

[1] 下水（或称下貨），是牛羊猪等的內脏部分的俗称。——譯者注。

書籍时，她把我叫过去，并且把門稍微掩了掩。

“薩尼亚，我想把这些書送給你，”她的声音微微发抖地說道，“这是爸爸的書，我一向十分珍惜它們。但是現在我想把这些書送給你。这里面有南生的書，还有各种航海指南以及他本人写的書。”

后来她把我带到尼古拉·安东內奇的書房里，从墙上取下船长的相片，一个前額寬大，下顎紧縮，目光炯炯有神的航海家的美丽照片。

“我不願意留給他，”她坚决地說道。于是我把相片拿到餐厅里去，妥善地把它和枕头，被窩等放在一个包里。

这是卡佳带走的，屬于尼古拉·安东內奇的惟一的一件东西。若是能够的話，她还会把对船长的怀念也从这所肮脏的房子里带走。

我虽然不知道那个曾經使我感到稀奇的小航海罗經是屬于誰的，但我也瞞着卡佳把它塞进了箱子里去。不管怎样吧，这总是屬于船长的东西。

一切都完了。当我們收拾好了东西，拿起大衣，在前厅里和尼娜·卡比丹諾芙娜告别的时候，这兒就成了世界上最空虛的地方了。尼娜·卡比丹諾芙娜留下来沒有走，但也不会留得很久，等卡佳搬进了学校給她的房子以后，她也要走的。

“不会留很久，”老太太郑重地說，老泪縱横地吻了吻卡佳。

琪拉在楼梯上絆了一跤，为了怕滾下去，就一屁股坐在箱子上哈哈大笑起来。卡佳生气地說道：“琪尔加，傻瓜！”我跟在她們后面走着，我仿佛看見尼古拉·安东內奇怎样走上这个楼梯，按門鈴，一言不发地听着老太太对他講話。他用顫抖的手摸着光禿的头頂，仿佛怕跌倒似的机械地迈着脚步走进書房里去。

在这空蕩蕩的屋子里只有他一个人。

当然他也猜想得到，卡佳是永远不会回去了。

10　西夫切夫·符拉什克胡同

以前这只不过是莫斯科的一条最普通的，曲曲弯弯的胡同，就象彼其加曾經居住过的义犬广場一样。可是当卡佳搬进了西夫切夫·符拉什克胡同，从此它就眞的变了样。正因为它成了卡佳所居住的胡同，所以也就和莫斯科别的胡同迥然不同了。就連这个我过去总覺得可笑的胡同名称，現在也变得意味深长，和一切与卡佳有关的东西一样，也有一种說不出的卡佳的味道……

我每天都到西夫切夫·符拉什克去，这时卡佳和琪拉还沒有回家，每次都是琪拉的媽媽接待我，陪我談話。她是一位頂好的媽媽，是一位朗誦演員，常在莫斯科各俱乐部朗誦古典作品。她身材矮小，头发已經斑白，富有幻想，和琪拉完全不一样。她談什么事情都很热情，使人一眼就可以看出她喜好文学。这一点和琪拉也不大相象，特别是想起过去琪拉費了多大的劲兒才讀完了“杜布罗夫斯基”，并且还錯認为最后“瑪莎嫁給杜布罗夫斯基了”。

和这位媽媽一起有时候能談上两个鐘头，可惜总是談那么一个瓦尔瓦拉·拉宾諾維奇。这人也是一个朗誦家，不过她很有名气。琪玲的媽媽本来想向她請教的，可是因为这位瓦尔瓦拉“鼻孔朝天”地接見了她，所以她就賭气不去了。

过不一会兒，琪拉回来了，每次总是这样說：

“哎呀，呀，呀，又是你們俩坐在暗屋子里。眞有意思，眞

有意思……薩尼亚，我眞替媽媽担心呀，”她悲剧式地說道。“她已經愛上你了。媽媽，你怎么啦？这么大年岁还搞这玩意兒！我怕不会有好結果啊。”

結果总是媽媽嘔气走到厨房里去，琪拉跺着脚跟在她后面一面解释，一面亲吻。

随后卡佳回来了。伊万·巴甫雷奇說得很对——我不了解她。問題决不在于我不了解她生活中的許多事情，譬如她的勘查队（她是队长）去年在南烏拉尔发現了一个蘊藏极富的金矿，或者是她的摄影作品在摄影爱好者展覽会上得了一等奖，而在于我不了解她內心的刚毅，她的率直，她对生活的公正而聪明的态度，也就是柯拉布略夫称贊为“稳重，严肃的灵魂”的一切。我覺得她似乎比我懂事得多，特别是在她談到艺术的时候，这些年来，我在这一方面大大地落后了。不过有时候在她身上又会突然显露出昔日的那个卡佳，那个醉心于爆炸，和因为“費迪南多·科尔特斯怀带着特拉克斯卡兰人的祝福走上征途，日內即将到达火奴魯魯”而深为激动的卡佳。关于費迪南多·科尔特斯的事，我是在看到卡佳穿着男长褲和长統皮靴，肩上背着一枝馬枪，头上戴頂寬边帽騎在馬上所照的一张相片时才想起来的。她成了地質勘查家！船长要是看見这张相片，一定会非常滿意的。

就这样几天过去了，我們还沒有談过上次見面后发生的事情，虽然发生的事情那么多，似乎足够談一輩子的。我們好象感覺到应該首先好好地彼此回忆一下，——关于尼古拉·安东內奇，关于罗馬紹夫，以及关于我对不住她的地方，可是我們一个字也沒有提。但是这样并不容易，因为老太太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到西夫切夫·符拉什克来。

起初她来的时候样子总是那么庄重，那么客气。她穿着一件带皺折的連衣裙，尽是講一些过去的事——这时尼古拉·安东內奇还沒有回来。她講了自己一个女朋友的故事。她嫁給了“剪掉头发的神甫”，这个神甫发了財，后来有一天，他走到講坛上去說道：“公民們，我現在坚決地相信上帝是沒有的。”我不知道她講这故事的意思是什么，——大約是老太太发現这个神甫和尼古拉·安东內奇有些相似的地方。

但是有一次她慌慌张张地跑来，大声喊喊嚓嚓說道：“他回来啦！”

說完馬上就把自己和卡佳关在房間里。她临走时气冲冲地說道：

“和別人一起生活，也应該通些世故。”

可是卡佳什么話也沒有回答，在分別的时候只是默默地，若有所思地吻了吻她。

第二天，老太婆带着一把伞，哭得眼睛紅紅的，十分疲憊的走来，坐在前厅里。

“他病了，”她說道，“我請了同种疗法的医生来給他看，可是他却把医生赶走了。他說：‘我把整个的生命都献給了她，可是得到的报答却是如此。’”

她低声欷歔起来，說道：

“他說‘这是支持我活下去的最后的一个人。現在一切都完了’。尽是这一类的話。”

显然一切并沒有完，因为尼古拉·安东內奇后来又恢复健康了，虽然严重的心脏病的确使他好几天沒有起床。他叫卡佳去。可是她沒有到他那兒去。我听見她对尼娜·卡比丹諾芙娜这样說道：

“姥姥，他生病也好，健康也好，活也好，死也好，我都不願意看見他。你明白了嗎？”

“明白了，”尼娜·卡比丹諾芙娜回答道。“她老子过去也是这个样子。”她临走时对琪玲的媽媽訴苦道。“怎么样才能把这个脾气改一改呢——哎，哎。哪怕你把她扔到火車底下去压也不行！眞是牛性子。”

但是尼古拉·安东內奇恢复健康了，老太婆也高兴了。她現在有时一天要来两次，因此我們經常可以听到关于尼古拉·安东內奇和罗馬什卡的最新的消息。不过有一次卡佳也提到了罗馬什卡。

“他到办公的地方去找我，”她簡略地說道，“但我請人轉告他，說我沒有时間，而且永远也不会有时間。”

“……他們在写信，”有一次老太婆告訴我們說。“总是說飞行員‘格’长，飞行員‘格’短。大概这次又要告密吧。那个小神甫簡直气得快发疯了。可是尼古拉·安东內奇一声也不响。他全身都肿了，一声不响地坐着。披着我的披肩坐着……”

瓦里亚到西夫切夫·符拉什克来过几次，这时大家就都放下自己的事情，停止了談話来看他怎样追求琪拉。他的确是非常正規地在追求琪拉，并且十分自信，認为誰也不应怀疑这一点。

他把鮮花插在花瓶里給琪拉送来，总是那几种花，这么一来，她的房間就变成了一座小小的月季花和櫻花的花圃了。显然，他看我和卡佳时是在一种半睡半醒的状态中，只有看見琪拉，有时还有琪拉的媽媽时，他才是清醒的。他也贈送礼物給琪拉的媽媽，譬如有一次，他送給她一本一九一七年出版的“朗誦家”。

有时他振奋起来，便講一講跳鼠或者蝙蝠生活中的一些趣

事。

好在逗引琪拉高声大笑也并不費事……

在西夫切夫·符拉什克的那些个晚上就这样消磨过去了。这是我回到北方以前最后的几个晚上。

我有許多麻煩事情要作：我建議組織寻找塔塔林諾夫船长的探险队的事情还很难說已經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也許是我办事不力吧？

我写了几篇文章：給"民航杂志"写的是在暴风雪中固定飞机的方法，給"眞理报"写的是关于航海长的日記，給北极航务总局写了一份报告書。过了几天，刚好在我离开的前一日，我需要到地理学会巡迴大会上去作关于"圣·瑪丽亚"号漂流情况的报告，这是最主要的綜合报告。

有一次夜里十二点多鐘，我兴高彩烈地回到旅館，先到看門人那兒去要鑰匙，他說道：

"有您的信。"

随后就递給了我一封信和一份报紙。

这封信很簡短：地理学会秘書通知，因为我沒有按时把报告写成書面的东西交去，所以报告不能举行。我刚把报紙拿到手里，它自己就随着叠縫摊开了。上面有一篇文章，标题是"捍卫学者"。我便开始讀起来，一行行的字頓时在我眼前融合成了一片……

11　忙碌的一天

下面就是这篇文章的內容：

一、莫斯科有一位素享盛名的教育家兼社会活动家尼·安·塔塔林諾夫教授，他写过一系列有关征服与开拓北极的历史方面的文章。

二、有飞行員格某者現正奔走于各北极的业务机关，不惜用一切手段誣蔑这位受人尊敬的学者，硬說塔塔林諾夫教授窃取了自己的堂弟伊·李·塔塔林諾夫船长探险队的財物。

三、該飞行員格某竟然打算作一次有关报告，显然，他还認为自己这种誣蔑是科学上重大的成就。

四、北极航务总局应对此人严加注意，因为他的行为已玷辱了苏維埃北极工作者这一大家庭的名誉。

这篇文章的署名是“伊·克雷洛夫”，使我惊訝的是編輯部怎么好意思用这个伟人的名字署在这样一篇文章上。我毫不怀疑这篇文章是尼古拉·安东內奇自己写的，就是老太婆所說的那“一封信”。报紙是經邮局寄給我的。

“見鬼，要不是他呢？——这时已經夜里三点鐘了，我还不停地走来走去思索着。这封信是地理学会寄来的，毫无疑問，也是他干的。柯拉布略夫早就說过，尼古拉·安东內奇是这个学会的委員，并且責备我不应該把作报告的事告訴罗馬什卡。这篇文章也是他写的！他着慌了。卡佳一走，他就着慌了。”

于是我想象到他披着老太婆的披肩坐着，一声不响，罗馬什卡则放肆謾駡他的場面。这个情况是很可能发生的！

“……他們最不希望的就是北极航务总局叫我去，請我解释！而我現在所爭取的也正是要达到这个目的。”我躺到床上心里还在想这件事。“他的行为玷辱了……”，什么行为呢？关于他的事我沒有向任何人談过。他們希望着我会罢休，我会被吓唬住……

要沒有这篇文章，很可能我会什么事也沒有替船长作成就离开了莫斯科。这篇文章对我起了很大的督促作用。現在我应該行动了，并且愈快愈好。

不要以为我那时候也象現在回忆这件事情似的这么鎮定，我有好几次突然发現自己在想一些极其野蛮的办法，这些想法刑事調查局是了解得最清楚的。不过只要我一想到卡佳和她所說的話，——“他生病也好，健康也好，活也好，死也好，我都不願意看見他”，——便一切都释然了。連我自己也对我在这忙忙碌碌的一天中說話，作事所表現出来的那种鎮定感到惊异。

天刚亮我就把計划拟好了。計划很簡单，不过从这个計划中大概也可以看出我实在厌煩和那些文書、秘書之流打交道了。

一、去“眞理报”社。反正我要到“眞理报”社去一趟，我应当在动身以前把已經答应的一篇文章交了去。

二、到契同志那兒去。

到契同志那兒去，到昔日列宁格勒航校的英雄，后来又成了苏联英雄，全国都知道他，都热爱他的，大名鼎鼎的契同志那兒去——我昨夜里就有了这个念头，不过当时我覚得这想法太大胆了一点。給他挂个电話是不是妥当呢？他还記得我嗎？我还是飞行学員时，我們就分开了！

但現在我决定了。这有什么了不起的，即使他已經不記得了，他也不会拒絕我的！

我不知道是誰接的电話，大概是他的妻子。

“我是飞行員格利高里耶夫。”

“唔。”

“我很想見見契同志，”我用他的名字和父名称呼他。“我是从北地城来的，因此很想……”

"那么您来吧。"

"什么时間？"

"最好今天，他十点鐘从机場回来……"

我到了"眞理报"社，这一次我等記者一直等了两个多鐘头。最后他来了。

"啊，飞行員格同志嗎？"他頗为客气地說道。"就是您誹謗了別的人嗎？"

"就是本人。"

"为什么要这样呢？"

"請允許我解释解释，"我很鎮靜地說道。

这是在責任編輯办公室里的一次很严肃的談話。在談話时，我将下列文件順次摆在桌子上：

一、船长最后的一封信。（抄本）

二、开头是"首先我要告訴您的，就是伊万·李沃維奇一切都好"的航海长的信。（抄本）

三、航海长的日記。

四、由医生签字作証的猎人伊万·維尔加的談話記录。

五、由柯拉布略夫签字作証的維什米尔斯基的談話記录。

六、鐫有"'圣·瑪丽亚'号帆船"的黄銅矛鈎照片。

这次談話大概还很成功，因为有位样皃很严肃的同志紧紧地握了握我的手，另外一位对我說，我那篇关于"圣·瑪丽亚"号漂流情况的文章将在最近几天的"眞理报"上刊出……

从"眞理报"社到契同志的寓所至少有六公里，可是我走了一半路才想起可以坐电車。我好象发了疯似地飞奔，心里想着我現在該怎样把在"眞理报"社的談話告訴他。

不知不覚我已經順着楼梯，順着一座新房子的洁淨的楼梯

走上楼去了。我停在門前擦着脸，——太热了，——同时竭力使脑子慢慢地想点什么事情，这是制止兴奋最有效的办法。

門开了，我通告了姓名，就听見隔壁屋子里他那低沉的，“奥”音很重的声音。

“找我的嗎？”

于是这位为我們从小就热爱着，而且一年比一年更加热爱的人，这位我們未曾目睹，只是耳聞过他許多卓越飞行事迹，而越来越为我們热爱的人向我走来，伸出他那有力的手。

“契同志，”我称呼他的名字和父名，說道，“您大概不記得我了。我是格利高里耶夫。我們曾經在列宁格勒見过面，那时我还是飞行学員。”

他沒有作声。随后便很高兴地說道：

“怎么会不記得呢，眞是一只山鷹呀！我記得！”

我們往他的書房里走去，我开始叙述自己的故事，原来他还記得我，这就使我更加激动了起来……

就是在这次和他会面的时候，他送給了我一张亲笔題字的相片：“永远作一个出类拔萃的人”。他說我是屬于那种“持有远程客票”的人。他听我講完了以后說道，关于我的計划草案問題，他明天就給北极航务总局局长挂电話。

12　罗馬什卡

深夜十二点鐘，我辞别了契同志回到自己家中。这时来串門可說是太晚了，但是偏有客人在等着我，他也确实是一位不速之客，但不管怎样总是位客人。

看門人告訴我說：

“有人找您。”

接着罗馬什卡就迎着我站了起来。

可以这样說，他这次不只是精神上，而且在肉体上也准备好了拜訪，因为我从来还沒看見他穿戴得这样的华丽过。他穿的是一件寬大的鉄青色大衣，戴着礼帽，这頂帽子不是戴，而是頂在他那个不規則的大头上。他的身上散发着香水的气味。

“啊，罗馬什卡，”我很快乐地說道。“你好，猫头鷹。”

这样的欢迎大概使他吃了一惊。

“啊！是的，猫头鷹，”他笑道。“我完全忘記了从前在学校里的时候大家这样叫过我。不过眞奇怪，你还記得这些学生时代的綽号啊！”

他也竭力作出泰然自若的神气說道。

“我呀，老弟，什么都記得。你是找我的嗎？”

“假使你不忙的話。……”

“一点也不忙，”我說道。“沒一点事。”

在电梯上他始終留心地看着我，大概是在估量我是否喝醉了，如果我喝醉了，他可以从中捞到什么油水。可是我并沒有醉，只不过是为伟大的飞行員，也是我的老朋友的健康喝了一杯。

“你就住在这兒，”当我很客气的把圈椅讓給他坐的时候，他說道。“房間挺不錯。”

“沒什么。”

我等待着，以为他馬上就会問我花多少錢租的这个房間，但是他并沒有問。

“不管怎么样吧，这是个好旅館，”他說道，“不次于‘麦得洛波利大飯店’。”

“也許。”

他希望我先开始談。但是我架着腿坐在那兒，一面抽烟，一面专心一意地研究書桌上玻璃板底下压着的那張“客人須知”。这时他十分坦白地叹了一口气，开口說道：

“薩尼亚，我們有許多事情需要談一談，”他一本正經地說道。“我們似乎都是很有文化的人，是可以用和平的办法来商量和解决問題的。不是这样嗎？”

显然他还沒忘記，我曾經有一次解决“这些問題”用的不是很和平的办法。但他的声調随着每一句話愈来愈强硬了。

“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促使卡佳突然离开了家，但我有权利問一下：这些原因是否和你的出現有关系？”

“关于这个問題你最好去問卡佳，”我很平靜地答道。

他不吭气了。他的耳朵紅起来，眼睛突然变得发了狂的样子，前額也舒展开了。我很感兴趣地看着他……

“然而据我所知，”他又稍微压低了嗓門开始說道。“她是和你一块兒离开的。”

“一点兒不錯。我甚至还帮她收拾过东西哩。”

“是这样噢，”他断声断气地說道。这时他的一只眼睛差不多完全閤上了，另外一只眼睛却斜着吊起来——这付嘴脸眞可怕极了。我还是第一次看見他这付样子。

“是这样噢，”他又重复了一次。

“唔，是这样。”

“是的。”

我們沉默了一会兒。

"喂，"他又开始說道。"我們上次在柯拉布略夫庆祝会上談的話还沒有完。我应当对你說，关于'圣·瑪丽亚'号探险队的問題，我多少也了解一些。我也和你一样，对这个探险队很关心，不过，我的观点或許和你的有些不同。"

我什么話也沒回答。我很了解他的观点。

"另外，你似乎很想知道尼古拉·安东內奇在这次探险工作中扮演了什么角色，至少可以根据我們的談話这样来判断。"

他何止是可以根据我們的談話这样来判断呢。但我沒有駁斥他。因为我还不明白，他現在究竟往哪一边倒。

"我想，我在这个問題上能够帮你的大忙。"

"眞的嗎？"

"眞的。"

他突然冲我奔过来，我本能地跳起来避到圈椅的后面。

"你听我說，你听我說，"他低声低語地說道，"我知道他的老底兒！我知道他干的那些勾当！我有許多証据，只要事情干得漂亮，准会叫他栽个大觔斗。你以为他是什么人？你以为他是什么人？你以为他是什么人？"

这一句話他重复了三次，身子向前凑得几乎紧貼着我，以至于我不得不抓住他的肩膀，把他稍微往后推开一点兒。可是他并沒有理会到这些。

"連他自己都忘記了的那样一些勾当，"罗馬什卡繼續說道。"是有文件作証的。"

他所說的文件自然是指那些他从維什米尔斯基家弄来的材料。

"我知道你們为什么爭吵。你說他窃取了探险队的財物，他

便把你驅逐出来了。但这是事实。你原来是对的。”

我这是第二次听到这种承認的話了，不过現在它給我的快乐并不大。我假装惊訝地說道：

“你这是怎么啦？”

“那是他！”罗馬什卡带着一种下流的狂热神情重复說道。“我可以帮助你。我把这一切，把全部的証据都交給你。他会四脚朝天地从我們这兒滚开的。”

本来我这时应該沉默一会兒，可是我忍不住了，便問道：

“你要多少錢？”

“随你的意，怎么办都好，”他定了定神，說道。“不过我只求你一件事：請你离开此地。”

“一个人？”

“是的。”

“不带卡佳？”

“是的。”

“有意思。換句話說，也就是你要我放弃她了？”

“我爱她，”他几乎是傲慢地說道。

“嗬，你爱她。这倒有意思。你还希望我們今后不再通信吧，对不对？”

他沒有吭声。

“稍等一会兒，我馬上就回来。”我說完就出去了。

这层楼的女管理員坐在門口的小桌旁边，我請她讓我使用一次电話。这时我一边談話，一面向走廊里看着罗馬什卡走沒有走。他沒有，他恐怕想不到我在給誰打电話。

“您是尼古拉·安东內奇嗎？我是格利高里耶夫。”他反問了一遍，大概以为是听錯了。“尼古拉·安东內奇，”我客客气

气地說道，“很对不起，这么晚还来打攪您。事情是这样，我需要会見您。”

他沒有作声。

“那么就請到我家来吧，”他終于說道。

“尼古拉·安东內奇！我們这次也不算是誰拜訪誰。請您相信我，这个問題很重要，与其說是为我，还不如說是为了您自己。”

他沒有作声，我听到他在粗声喘气。

“什么时間呢？总之今天我是不来了。”

“不行，就是要今天，馬上就来。尼古拉·安东內奇，”我大声說道，“請您相信我，哪怕一生中就只这一次也行。您一定要来，”我把电話挂上了。

他沒有問我住在几号房間。順便說一下，从这一点也可以进一步証明登載着“保卫学者”那篇文章的报紙就是他寄来的。不过現在我也不管这些小事了，我回来守着罗馬什卡。

我想不起还有什么时候，象尼古拉·安东內奇未来之前的二十分鐘內这样撒謊和躲躲閃閃地談問題。我假装对尼古拉·安东內奇以前是什么样的人絲毫不感兴趣，故意仔細打听这都是些什么文件，并且狡猾地用鼻音肯定地說道，我不带卡佳是不能离开的。正在这个时候，有人叩門了，我喊道：

“請进。”

尼古拉·安东內奇走了进来，沒有問好，站在門旁边。

“您好，尼古拉·安东內奇，”我說道。

我沒有去看罗馬什卡。后来我看了一眼：他坐在椅子角上，把脑袋縮在肩膀里，惶恐不安地傾听着，眞是一个十足的猫头鷹，不过比猫头鷹还要可怕。

"尼古拉·安东內奇，"我很鎮靜地繼續說道，"毫无疑問，您是認識这位公民的。这是罗馬紹夫君，您的得意門生和助教，假若我沒弄錯的話，只差几分你們就要成亲戚了。我請您来的目的是想把我和他談話的內容概略地轉告給您。"

尼古拉·安东內奇一直在門旁边站着，身板直挺挺的，直得出奇，他穿着大衣，手里拿着礼帽。后来礼帽从他手里掉了下来。

"这位罗馬紹夫，"我繼續說道，"在一个半鐘头以前到我这兒来，提出了下面的建議。他建議我利用某些証件，来証明：第一，您窃取了塔塔林諾夫船长探险队的財物。第二，您过去还有一些見不得人的事沒有在自传里交代。"

他的礼帽就是这个时候从手里掉下来的。

"我有这样一种印象，"我繼續說道，"就是他作这項买卖已不是第一次了。不知道我这个看法对不对。"

"尼古拉·安东內奇，"罗馬什卡突然喊叫起来。"这全是胡說。不要相信他。他在撒謊。"

我稍等了一会兒，等他停止喊叫了再說話。

"当然，現在这件事已經沒什么价值了，"我繼續說道，"現在的問題只是你們的关系。但您有意識地……"

我早就感到脸上有一根血管在跳动，这很不合我的心意，因为我囑咐过自己，和他們談話应該絕对鎮靜。

"但您有意識地要讓这个人成为卡佳的丈夫。您劝說她，——当然是出自一种卑鄙的思想，因为您怕他。可是現在他竟跑到我这兒来，大喊大叫地說'他会四脚朝天地从我們这兒滚开的'。"

尼古拉·安东內奇仿佛是猛然醒悟了似地向前迈了一步，

凝視着罗馬什卡。

他看了他很久，久得甚至使我都感到难以忍受这种紧张的沉寂。

“尼古拉·安东內奇，”罗馬什卡又低声下气地乞怜道。

尼古拉·安东內奇还瞪着眼睛。后来他終于說話了，使我納罕的是，他的声音显得那样的頹唐和衰老。

“您为什么請我到这兒来？”他問道。“我正在生病，說話都困难。您想讓我相信他是一个坏蛋，这对我說来并不是一件新鮮事了。您还想来敗坏我嗎，但是您不可能比您以前已經作过的，也是无可挽救的事情作得更多了。”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我看到他的确說話很困难。

“讓她自己的良心裁判吧，”他的声音仍然是那么低，但已經換了一种凶恶的表情繼續說道。“因为她相信了那种卑鄙的，迫害了我一生的讒言，連一句話也沒有說就走了。”

我沒有說話。罗馬什卡用哆哆嗦嗦的手倒了一杯水端到他的面前。

“尼古拉·安东內奇，”他低声低气地說道，“您不能激动呀。”

但尼古拉·安东內奇用力把他的手推开，水泼到了地毯上。

“我不接受，”他突然摘下眼鏡，在手上捏来捏去，說道。“我既不接受責难，也不接受怜憫。至于她的事，那是她个人的命运。我惟一希望她的就是幸福。但我对舍弟的怀念是任何人也夺不了的。”他啞着嗓子說道，他那长着两片厚嘴唇的面孔变得阴沉，肿脹了，“我倒是甘願受到这种折磨，哪怕一直到死，因为生命在我早已不需要了。不过，既然沒有这样的事，那我就

坚决否認这种恐怖的、可耻的控告。如果認为一个証人不够，您就再举一千个伪造的証人也沒有关系，反正誰也不会相信是我害死了他，并且連他伟大的思想，他伟大的灵魂也是被我戕害的。”

我本想提醒尼古拉·安东內奇，他对自己的堂弟并不是一向就这样高看的，但是他沒有讓我講話。

“我只承認一个証人，”他繼續說道。“就是伊万他本人。只有他一个人可以控告我，如果真是我錯了的話，那也只有他一个人有这种权利。”

尼古拉·安东內奇哭了起来，他的手指被眼鏡片划破了，掏手絹掏了好久。罗馬什卡跳过去帮助他，可是尼古拉·安东內奇又推开了他的手。

“就是死人到这种地步大概也要說話了，”他說道，一边虛弱地不断喘着气，伸手去取帽子。

“尼古拉·安东內奇，”我鎮靜地說道。“請您不要以为我打算牺牲生命来向人类証明您的錯誤。这件事我早就清楚，同时現在也不只是我清楚了。我請您来不是为了这样一場談話。我不过認为自己有責任当着您的面来揭露这个无耻之徒的真正嘴脸。我并不需要他对我报告您的事情，——何况这些事我早已知道了。您还想和他說什么嗎？”

尼古拉·安东內奇一声不响。

“喂，那就滾蛋吧！”我对罗馬什卡喝道。

他扑到尼古拉·安东內奇跟前，向他嘰哩哇啦講起什么話来。但是尼古拉·安东內奇象失掉知觉似地呆呆地站着，两眼直望着前面。只在这时我才发覚他这些日子以来老多了，他多么萎靡，多么可怜。但是我并不怜憫他——还沒有到去怜憫他的

地步。

“滚!”我又向罗馬什卡喝道。

他沒有走，还在嘟囔着，后来他挽着尼古拉·安东內奇的手，扶着他向門口走去。这倒有些出乎意外，因为我想赶的只是罗馬什卡，而不是我自己邀請来的尼古拉·安东內奇。我本来还想問他“保卫学者”那篇文章是誰写的，伊·克雷洛夫是不是名寓言家的后代，但是我迟了一步，他們已經走出去了。

看样子，我終究还是沒有把他們的关系拆散。他們挽着手慢慢地沿着长廊走去，只有那么一会兒，尼古拉·安东內奇停下脚步搔弄起头发来。他的头发已經沒有了，他以一种痛苦惊訝的神情瞧着手指間留下的細毛。罗馬什卡攙着他的手，替他扑打净了大衣，他們又稳重地往前走去，直到拐角的地方才看不見了。

临行的前一天，契同志挂电話告訴我，說他已經和北极航务总局局长談过，并亲自把我的报告念給他听了。答复是肯定的。今年派遣探险队已經来不及了，但是明年絕对可靠。計划草案制訂得很有說服力量，很詳尽，不过航綫的一部份需要再具体一些。历史的一部份很有意义。他們要召見我一次，通知后发。

这一整天我都在商店里消磨过去了，我想送点东西給卡佳，我們又要分离了。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送她茶壶套子嗎？但她連茶壶都沒有。送她衣服嗎？可是我一向是連紗和綢都分不清楚。送她莱卡照相机嗎？莱卡照相机她倒是很需要。可是要买莱卡照相机錢又不够。

若不是在阿尔巴街碰到瓦里亚，恐怕就什么也买不成了。他

正站在書店窗子前想心事兒，要是以前，我可以断定他是在想野兽保准沒有错。可是，現在却另有一个需要他动脑筋的对象了。

“瓦里亚，”我說道。“是这么回事兒。你有錢嗎？”

“有。”

“多少？”

“五百卢布。”瓦里亚答道。

“都給我。”

他笑了起来。

“怎么，你又打算到恩斯克去追卡佳嗎？”

我們去照相器材商店买了一架萊卡照相机……

对一般人說，我是在夜間一点鐘走的，但我和卡佳直到早晨才分手；我一会兒跑到她家里去，一会兒跑到她办公室里去。我們这次分别的时間并不太久，她預計八月里到北地城去找我；可是我却期待着上級会在这之前召見我——也許会在七月里。不过我总有点害怕——千万可不要再长期的别离了……

瓦里亚把登有我的文章的那份“眞理报”送到車站，文章完全照我所写的那样刊登出来了，只是有一个地方的文字稍有修改。全文縮短了将近一半，不过日記摘录部份却全部刊登了：“我永远也不会忘記这次的别离，不会忘記他那张振奋人心的蒼白的脸和他的眼光的远大。这和过去那个紅光滿面活力充沛的人，会編笑話和滑稽故事的人，我們全队的偶象，对任何一件最艰巨的工作都是处之以詼諧的人还有什么共同之点呢？他講完話以后，誰也沒有离开。他閉着眼睛站着，聚精会神地仿佛准备說两句送别詞。然而，送别詞还沒有說出，却迸出了一声微弱的叹息，眼角上涌出了閃閃的泪珠兒……”

我和卡佳站在車厢的过道上讀着，我感覺到她的头发輕輕拂着我的脸，我还感覺到她竭力忍着眼泪不讓它流下来。



下　　册



第六部　青春常在

卡佳·塔塔林諾娃述

1 “你不了解他”

伊万·巴甫雷奇很知趣地走出車廂，可是瓦里亚仍然不住地唠叨，請求代他向国营养兽場的某一位巴維尔·彼得洛維奇問好：“嗨，眞見鬼！还請你問候医生！差点兒把他忘記了！”这样一直捱延到琪拉回来，好歹拉着他的手把他带走才算完事。就剩下我們俩人了。啊，我多么舍不得薩尼亚离去呀！

他在这一会兒的样子多么好看，我不仅想把他那双我百看不厌的眼睛，并且想要把他的一切都牢牢記住：他沒有戴帽子，显得那么年輕；連我都説他現在結婚还早了一些。他穿制服时身材显得高一些，但总还是小个兒。大概正因为如此，他有时

会不自觉地踮起脚尖来——这会兒当我回过头去的时候，他也正踮着脚尖。他精神奕奕，整齐清洁，一撮头发朝前翘着，特别是在他笑的时候，这撮額发使他显得更加可爱。我們拥抱过后，我站在車厢的梯阶上，最后一次回过头去。他笑嘻嘻的，这付模样兒同当年使我爱上了他的那个果断的、黑黑的、可爱的薩尼亚相象极了。

这兒人很多，但是我什么人也沒有看見，当我从車厢的梯阶上走下来时，差点沒有摔倒。啊！我是多么舍不得他离开呀！

火車开动了，他揮舞起帽子来，我跟着車厢一面走，口里不断地說着："好，好。"

"你写信来嗎？"

"好，好！"

"每天都写？"

"好！"

"你来嗎？"

"好，好。"

"你爱我嗎？"

这句話他是压低了声音問的，可是我从他嘴唇的动作上猜出了他的意思。

"好，好！"

我們走出車站去送伊万·巴甫雷奇，一路上他老是談着薩尼亚。

"最主要的是不要把他看得太复杂了，"他說道。"你的自尊心又很强，所以在最初的一段时間內，你們会吵架的。卡佳，总之你几乎是不了解他。"

"看你說的！"

“你知道他最主要的特点是什么嗎？他永远是个青年，是一个有自己理想的、热情洋溢的人……”

他严厉地看了看我，又重复説道：

“有自己理想的人……然而你是个驕傲的姑娘，不过，你也不必介意。”

我忍不住笑了。

“这有什么可笑的。就是驕傲嘛，你小时候完全不是这个样子。他也是个性情急躁的人。总而言之，卡佳，你多想想他吧。”

我回答説，現在想他就已經想得够多了，而且他也不是什么好得不得了的人，值得人一天到晚地想。

但是晚上我却眞就是这样：一坐下来就开始想起薩尼亚。大家都走了，瓦里亚和琪拉去电影院了，亚历山大拉·德米特里耶芙娜到一个俱乐部里讀高尔基“大灾星”的摘录去了，她很得意自己这回搞出的东西。我把自己的地图拿出来搞了好半天，后来便扔下它想起心事来了。

是的，伊万·巴甫雷奇説得对，我不了解他！我总是不自覺地認为他还是那个穿短褂的孩子。他曾經在凱旋路的街心花园里等候过我，总是不停地在徘徊，直到路灯亮了，直到我突然下定决心，穿过广場向他走去。他还是那个我曾經拥抱过的孩子。那时候我是不顧我們学校，第一四三和第二八中学这三个学校的人都能看見我們是怎样亲吻的！但那个孩子只是在我的想象中存在，新的薩尼亚和他是不相同的，就好象我們的第一次接吻和現在的接吻是不相同的一样。

不过我根本就沒有把他看得太复杂呀！我只不过是看到在我过去熟悉的那个思想和感情世界以外，在他的身上又产生了一个完整的，我对它一点兒認識也沒有的世界。这就是他职业范

围內的世界——单調而危险的北极航綫的世界，在駕駛員之家和熟識的飞行員不期而遇的世界，看見新飞机时那种孩子气的狂喜的世界。沒有这个世界，他甚至連一个星期也活不下去。可是我在这个世界里暫时还沒有位置。有一回，他在叙述一次惊险的飞行时，我突然发現自己有一种非常奇怪的感觉——我覚得他講的好象是另外的一个人。我无法設想是他遭遇上了暴风雪的袭击，在着陆的时候只是靠侥幸才沒有摔死，后来又在飞机里坐了三天三夜，竭力支持着不睡覚，身体慢慢地都冻僵了。这是一句傻話，但我还是說了：

“那么你不能想法使这样的事情不再发生嗎？”

他脸上露出无可奈何的样子，于是打趣地說道：

“是！以后再不发生了。”

……当然，他自己滿可以把他和維什米尔斯基的談話內容告訴我。但他請求伊万·巴甫雷奇轉告我。他覚得問題完全不在于他个人对不对。这兒不是什么个人的眞理問題，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我应該从伊万·巴甫雷奇口中听到这个眞理，因为他爱过我的媽媽，而且一直到現在还是独身一人非常不幸。那天晚上我知道薩尼亚在街上等我，所以当我看見他在領子胡同和花园路拐角的街心花园入口处的时候，我絲毫也沒有感到惊奇。但他并沒有走到近前来，虽然我知道他跟在我后面一直走到我的家門口。他了解我需要独自一个人靜靜地呆一会兒，尽管我这时离他很近，但思想上的距离却是异常遙远，因为他是对的，我是不对的，而且因为柯拉布略夫告訴了他一些事情使他受了屈辱……

薩尼亚在莫斯科的期間，我們在一起仅仅过了一个晚上。他到我这兒来的时候样子非常疲倦。亚历山大拉·德米特里耶

芙娜本来想对我們講一講在大庭广众之前演出的困难，以及演出时一定要有感情，否則就不会有好的效果。可是她一看見他，立刻就走了。这时太阳还沒有落下去，狹窄的西夫切夫·符拉什克胡同里充滿了阳光，仿佛太阳已經搬下了其它地方，决定永远定居在这弯弯曲曲的小胡同里了。我給薩尼亚茶喝——他喜欢喝浓茶——一面不住地瞧着他，最后他一定要我也坐下来，同他一起喝茶。

后来他忽然回忆起我們滑冰的事来，并且信口說，有一次在冰場上吻了吻我的脸，还說这回事干得的确太生硬，毛毛草草，冷冰冰的。而我却想起了他审判叶夫根尼·奥湼金的情形。他总是垂头丧气地瞧着我，后来在总結发言时，竟把格里什卡·法伯尔称作“毛色好的人”①。

“你还記得‘格利高里耶夫是最杰出的人材，連狄更斯的作品都沒有讀过’这句話嗎？”

“怎么能不記得呢！以后你讀过了沒有？”

“沒有，”薩尼亚很遺憾地說道，“总是沒功夫。讀过伏尔泰的書——‘奥尔良的貞女’。不知为什么，我們北地城的图書館里藏有很多伏尔泰的書。”

在傍晚的暮色中，他的眼睛显得愈发黑亮了，我突然間覚得我看見的只是他的这一双眼睛，而周围的一切漸漸昏暗下去看不見了。我本来想說，在北地城居然有那么多伏尔泰的書眞是可笑，但我們突然迅速地吻了很多次。这时电話鈴响了，我走出

① 俄文中 мастистый 是形容动物的毛色很好时常用的詞，而与此相似的詞 маститый 則有博学多才，德高望重等意思。这两个詞在讀音和写法上只差了一个字母，但意义却絕然不同。薩尼亚在发言时，大概是說格里什卡博学多才，因为心不在焉，說錯了一点，以致說成 мастистый 毛色很好的人，成为笑柄。——譯者注。

去在电話上和我的老教授談了整整半个小时。她总是叫我“娃娃”，并且对我的一切事情，諸如我現在在哪兒吃午飯，我买下“繆拉”公司那个漂亮灯罩了沒有等等，都要了解。等我回来的时候，薩尼亚已經睡着了。我喊了他一声，但立即有一种不忍心叫醒他的感覚，于是便蹲在他身旁，隔得近近地仔細端詳他。

在这天晚上，薩尼亚把航海长的日記和所有的文件，照片都交給了我。日記放在一个特制的上鎖的文件夹里。薩尼亚走后，我把这些边緣揉碎了的紙张仔仔細細看了很久，每一张紙上都写滿了一行行密密麻麻歪歪扭扭的字。有时这些字忽然又疏疏落落微弱无力，仿佛那只写字的手已失去控制的力量，虽然在写，可是思想已經不知跑到哪兒去了。需要多么頑强，多大的毅力才能讀完这本日記啊！

鐫刻着“圣·瑪丽亚”字样的矛鈎留在北地城了，可是薩尼亚带来了它的照片；世界上大概还沒有一条矛鈎照得这么清楚！

所有这些东西仿佛是一部伟大历史的許多碎片，散失在世界的各个角落，而薩尼亚又把这些碎片撥拾起来，写成了或者还在繼續写这部历史。可是我呢？我什么也沒有作。而且若不是薩尼亚的話，关于我的父亲，我所知道的也只是那一天在恩斯克車站分别的情景。那一天在恩斯克車站上，父亲把我抱在手里，最后一次把我高高地抛起，再用他那慈爱的大手把我接住，除此以外，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我答应薩尼亚每天給他写信，但是每天写是沒有什么可写的。我仍旧住在琪拉家里，学习和工作都很忙，加上这兒很不方便，所有的資料都装在箱子里放在外厅，地图也只能舖放在鋼琴上繪制。

那年夏天，我第一次沒有到野外去，因为一九三四年和三五

年的材料需要整理，所以我所在的巴什基里亚管理局批准我留在莫斯科过夏天。

姥姥每天都到我这兒来，总之，一切都很好，更加上瓦里亚和琪拉突然变得那么沉默，严肃起来，总是坐在厨房里，低声地談話。除此他們再沒有清靜地方可去了，因为整个这所住房就是由一間旧式的大厨房改成的，这間厨房分成了“外厨房”和“內厨房”两部分。瓦里亚和琪拉坐在間壁后面，也就是說是坐在內厨房里。这么一来，亚历山大拉·德米特里耶芙娜現在就只好在外厨房里作晚飯了。

瓦里亚以后再沒送过鮮花，显然是因为沒有錢的关系。但有一次他却带来一只白色的河鼠，把琪拉吓得尖叫起来，跳到桌子上去了，这使他感到很扫兴。他对她解释了很久，說这是一种极好的标本——缺乏色素的河鼠，是稀有的东西！可是琪拉总是叫个不停，不肯从桌子上下来，所以他只好用手絹把缺乏色素的河鼠包起来放到前厅的小桌上。后来亚历山大拉·德米特里耶芙娜从演奏会回来了，又在小桌上发現了这只河鼠，立刻大喊大叫起来，于是瓦里亚只好把自己的礼物带走了。

每到夜間，我和琪拉尽兴地喁喁閑話之后，彼此輪流說“喂，睡覚吧！”她就突然睡着了，在睡梦中她脸上的表情显得十分有趣和幸福。这时剩下我一个人，煩惱終于爬上了心头。我开始想到他們的愛情是多么美滿，这是人生最好的时光。然而他們的愛情和我們的愛情又是多不相象啊！他們經常在一起，每天都見面，可是我們却相隔那么遙远！

我仿佛是从火車的窗子里向外眺望，我看見田野和森林，接着又是原野，然后是原始森林和北方那一条条寒光慘淡的河流，以及那被积雪复盖着的平原，——横亘在我們之間的无边无际

的大地。

“我們当然是会見面，”我安慰着自己。“等我到他那兒去，一切就会好了。我已經两年沒有休假，現在我就請求休假到那兒去，要不然就等他来，也許他六月里能来。”

但是煩恼总在糾纏着我……

这张地图很費力，因为以前的地图上有許多地方都弄錯了，現在只好从头作起。但是薩尼亚走后的这几天，工作愈困难，我就愈加起劲兒地干。不管这些夜晚有多么苦恼，但我覺得仿佛一切痛苦、寂寞和不安都已成为过去，而未来的只是新奇和有趣，我的心似乎因此停止了跳动，感到輕松愉快，甚至多少有些害怕。

2　在义犬广場

薩尼亚在最后一天所到过的地方，无論北方航务总局也好，“真理报”社也好，到处都留下了我的电話号碼。当他把这件事告訴我，我不禁有点惊慌起来。

“我究竟算是什么人呢？他們要問起我是誰怎么办呢？”

“卡杰琳娜·伊万諾芙娜·塔塔林諾娃-格利高里耶娃，”薩尼亚一本正經地回答道。

我以为他是开玩笑。但他走了以后还不到三天，就有人挂电話来找卡杰琳娜·伊万諾芙娜·塔塔林諾娃-格利高里耶娃了。

“是我。”

“我是‘真理报’社。”

一位我在“真理报”上常常看見他的名字的記者說，薩尼亚

的文章引起了許多反应，甚至北极研究所也来打听关于作者的事。

"請您祝賀您丈夫的成就吧。"

我本想說他还不是我的丈夫，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沒有开口。

"听說您是塔塔林諾夫船长的女兒，对嗎？"

"是的。"

"您那兒还有沒有关于您父亲生活和工作方面的材料？"

我回答說有，可是很遺憾，沒有得到亚历山大·伊万諾維奇的允許，——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把薩尼亚的本名和父名連起来称呼——我不能处理这些材料。

"那么，我們写封信給他……"

"民用航空"杂志也打来电話，問登載着薩尼亚那篇在暴风雪中如何固定飞机的文章的一期杂志应該往哪兒寄——我还不知道他写过这样一篇文章哩。我要了两份——一份自己留下看。后来"文学报"又来电話問格利高里耶夫是誰，是不是作家？

不过最重要的还是和契同志的一次談話。我不知道薩尼亚对他談了我些什么，可是，他在电話里就象同一个老朋友談話似的立刻和我談起来了。

"領撫恤金了沒有？"

我沒有听明白。

"您父亲的。"

"沒有。"

"应該想办法申請。"

后来他笑了，說道，这回北方航务总局大吃一惊，因为北地島是我父亲发現的，而他們却記載着是另外一个什么人发現的。

"总而言之，我覚得有点不对劲兒……我不喜欢这些言論。"

“我还以为探险队的事已經决定了哩。”

“本来已經决定了，可是現在突然又說沒决定。我对他們說主要的是你們讓他跟‘巴赫图索夫’号去。可是他們却說那兒已經有駕駛員了。有就有罢！但您的那一位是个有主意的人。”

他就是这样說“您的那一位”，而且說的时候音調特别低沉“奥”音說得特别清楚。

“好吧，我还在老地方……您到我們这兒来玩吧。”

我說我很高兴去，于是我們就告别了……

我每天都要收到罗馬紹夫一封信，有时甚至是两封。信封上写着“巴什基里亚地質局第二勘探队”，仿佛眞是发到哪个机关里去似的。的确也是这样，那几年我一个人就好象是个机关，否则我是无法定居在莫斯科工作的。但是用这个通訊地址簡直是开玩笑，而且这个玩笑开得也很无聊，但他却每天都在重复它！

起初我还看一看这些信，后来就原封退回，再后来就看也不看，退也不退了。不知道为什么我总是怕把这些信烧掉，因此扔得到处都是，我有时无意中碰到它們，連忙又把手縮回来。

在碰到写这些信的人时，我也有同样的感覚。过去他总說自己很忙，可是現在，无論我什么时候出門，总会在街上碰見他。因此我簡直不能理解，他怎么会有这么多的时間。我在商店里，在戏院里都常常碰見他。这实在是件非常难堪的事，因为他要同我打招呼問好，而我又不答理他，他作出要走过来的样子，我却轉过身去避开他。

他到瓦里亚那兒哭鼻子，但当瓦里亚同他开玩笑，举了一个和他相似的，类人猿失恋的例子时，他又那样可怕地向他大叫大嚷起来。

总而言之，他在我的生活中占据了那么多的位置，以至于最后使我产生了一种病态的感觉，我只要一阖上眼，他立刻就出現在我眼前。他穿着嶄新的灰大衣，戴一頂呢子礼帽。他有一次对我說，他是特意为我戴这頂帽子的。

当然，到罗馬紹夫那兒去把維什米尔斯基交給他的那些文件要回来，这是一种荒謬絕倫的想法。特别是在我把他送来的信和花全部退回去之后到他那兒去，这也是一种残酷的想法。可是我越想越喜欢这个想法。我設想自己怎样走进門，他怎样惊惶失措，一句話也說不出来，老是瞧着我，后来他怎样脸色变得蒼白，順着走廊跑去，打开了自己的房門，可是我冷冷地說道：

"米沙，我找您有点兒事。"

有趣得很，这件事情的經过和我設想的完全一样。

他穿着暖和的淡青色睡衣，大約是刚从浴室里出来，所以还沒来得及梳头，湿漉漉的黃头发垂在額前。他脸色蒼白，一声不响地站着，一直等到我脫下短外衣，然后才向我跑过来。

"卡佳！"

"米沙，我找您有点兒事，"我冷冷地說道。"您穿上衣服，把头发梳好。我在哪兒等您？"

"对，应該如此，請……"

他順着走廊跑去，推开自己的房門。

"就到这兒来。請原諒……"

"哪里，倒要請您原諒。"

去年我們到他这兒来是三个人：尼古拉·安东內奇，姥姥和我。姥姥整个晚上都用話暗示他借了她四十个卢布，現在还沒偿还。

我那一次就觉得他的房間很称心，当我这次进来时，就更加感到这个房間的漂亮。房間粉刷得給人一种非常爽快的感觉：墙壁是浅灰色的，房門和壁橱的顏色更淡一些。家具都柔軟而舒适。总而言之，一切布置得十分舒适，十分美观。窗外可以望見义犬广場，这是我在莫斯科所喜爱的地方。不知为什么，我从小就喜欢义犬广場，还有那小巧的义犬紀念碑，以及所有通向广場的胡同。

"米沙，"当他把头梳得整整齐齐，身上洒得香噴噴的，穿着一身新藏青色的西服回来的时候，我說道，"我特意来答复您所有的来信。您写些什么鬼話，說我若不嫁給您，将来一定要后悔！您何尝不知道我甚至連看都沒看那些信，可是您还要天天給我写，这眞是太輕浮了。您很清楚，我从来就沒有打算要嫁給您，因此也談不到什么我欺騙您的問題。"

他脸上的变化实在有点兒可怕。他走进来的时候是一种急不可待、兴高彩烈的神情，仿佛充滿了希望，而又不敢相信自己，可是現在呢，随着我說的每一个字，他的希望在破灭，他变得呆呆的象死人一般，越来越难看。他轉过身去，眼睛望着地板。

"要說明我过去为什么允許您談这件事，这需要費很长的时間。这里面理由很多。但您也是个聪明人！您一直很清楚，我并不爱您。"

"但是你同他在一起是不会幸福的！"

"您为什么和我說話用'你'？"我冷冷地問道。"我馬上就走。"

"你同他在一起是不会幸福的，"罗馬紹夫重复說道。

他的膝盖哆嗦着，好几次眯縫起眼睛来，样兒說不出有多么难看，因此使我想起了薩尼亚講他睜着眼睛睡觉的事。

“我要杀死你們，杀死我自己，”最后他喃喃地說道。

“如果您眞要杀死自己，那可是太好了，”我非常鎮靜地說道。“我不打算跟您吵架。但是如果眞要那样的話，那么我問您，您有什么权利講这种話？您挖空心思地搞鬼，好象在我們这种时代里居然还可以靠这些鬼把戏同女孩子結婚似的！您是一个毫无品德的人，否則，您就不会象一条狗似的每天紧紧地釘着我。总而言之，您应該閉住嘴，好好听我說，因为您要說什么我完全知道。現在我問您：您从維什米尔斯基那兒拿走了些什么文件？”

“什么文件？”

“米沙，您不要装糊塗，您很淸楚我指的是什么。就是您用来恫吓尼古拉·安东內奇，說他以前是交易所的經紀人，后来又用来向薩尼亚建議，要他放弃我并且离开这兒的那些文件。立刻把这些文件交出来，听見了嗎！立刻交出来！”

他好几次閉上眼睛叹气，后来还想下跪。但我大声喝斥道：

“米沙，您敢！您听見了嗎！”

他抑制住了自己，只是咬了咬牙，他脸上那一付絕望的神情，使我的心都不禁一陣子发紧。

这并不是我怜憫他！不过，我有一种感覚，覚得他之所以这样痛苦，甚至連一句話都說不出来，似乎我也有些不是。如果他能把我痛罵一頓，我也許能輕松一些。但是他自始至終一声不响。

“米沙，”我开始紧张起来，重又說道，“您要明白，这些文件現在对您說来已經完全用不着了。反正事情絲毫也不能改变了，只是我覚得很慚愧，当所有的报紙都登載了关于我父亲的事

迹的时候，我却对他几乎是一无所知。这些文件是我需要，是我自己，而不是其他什么人需要。”

当我説到“我需要”时，我不知道他想到哪里去了，不过他的眼睛突然变得疯狂了，他把脑袋一仰，輕快地在屋里走了一圈。他想到薩尼亚身上去了。

“我什么也不給，”他蛮横地説道。

“不，您要給！您要是不給，我就認为您写給我信里的話又是撒謊。”

他忽然跑了出去，留下我一个人。这时周围异常寂靜，只有小孩的声音和一两次汽車謹愼的鳴笛声从街上传来。他出去这么久还不回来，这实在叫人納悶。万一他眞的給自己搞出点什么名堂来可怎么办！我心里打了一个寒战，赶忙到走廊上去听听动靜。什么也沒有，只是什么地方有嘩啦嘩啦流水的声音。

“米沙！”

浴室的門开着一道縫，我往里瞧了一眼，看見他扒在浴盆上。我一时沒有弄清楚他出了什么事，——他沒有扭开电灯，屋子里看不十分眞切。

“我馬上就来，”他头也不回，清清楚楚地説道。

他深深地躬着腰，把脑袋放在水龙头下面；水流到他的脸上和肩上，新衣服也完全淋湿了。

“您在干什么？您发疯啦！”

“去吧，我馬上就来，”他气忿忿地又説了一遍。

过了几分鐘，他果然来了，——衬領也沒有了，瞪着一双血紅的眼睛，——并且带来四本普通的蓝皮練习本。

“这些就是，”他説道，“我再沒什么文件了。拿去吧。”

可能这也是假話，我随便翻开了一个練习本，里面好象是印

的什么东西——象是撕下来的一頁書，——但現在已經不能再和他談什么了，因此我很客气地感謝他說：

"謝謝，米沙。"

我回到家里，把这些蓝皮笔記本翻开来讀了几个小时，閱讀到晚上很晚以后，才强使自己忘掉那张面孔，忘掉他回来时穿着淋湿的西服，脸上瘦了許多，就象一只受了伤的鳥兒似的样子。

3 祝航行幸福和成功

在我面前摆着四本厚厚的蓝皮練习本：旧式的，也就是革命前的練习本，所以封面上滿处都印着"腓特烈·康"公司的字样。在头一本的第一頁上用带阴影的美术字写着"目击者札記"和一九一六年某月某日。这是一本回忆录！但后面只是一些旧报的剪貼，其中有些是我过去从未听見过的报紙如："交易所公报"，"居民报"，"戈比报"。剪报按栏依次縱貼着，但有个別地方，例如："塔塔林諾夫探险队"，"請买明信片！"这类地方是横貼着的。

一、出发前的祷告。

二、"停泊中的'圣·瑪丽亚'号"帆船。

我很快地看完一本，然后看第二本，第三本。我和伊万·巴甫雷奇談話时我所理解的那种"文件"一份也沒有，有的只是探险队从彼得堡沿西伯利亚海岸去海参崴的一些文章和短訊。

这都是些什么文章呢？我一开始閱讀就不能释手了。往日的生活展現在我的面前，我怀着不可挽回的，冤屈的痛苦心情

閱讀着。所以說这是不可挽回，是因为"圣·瑪丽亚"号在出海前就已經遇难；这一点是我讀了这些文章以后深信不疑的。所以說冤屈，那是因为我現在才知道他們是怎样肆无忌憚地欺騙我父亲，他那輕信人和坦白直率的性格是怎样严重地害了他自己。

下面就是一位"目击者"描写的"圣·瑪丽亚"号出航的情形：

> ……即将远航的帆船船桅上慘淡地裝飾着旗子。出航的时刻临近了。給"航行者和旅客"作完最后一次祈祷，說了最后的祝詞……"圣·瑪丽亚"号緩緩离岸，海岸越来越远，房屋和人群融合成了一条斑駁的彩带。这时刻是多么庄严隆重！同大陆和家园最后的联系断絕了。但我們却为这凄凉的送行，为那一张张充滿好奇的表情的冷漠的面孔而感到伤心和羞愧。暮靄降临了，"圣·瑪丽亚"号停泊在德維納河口。送行的人飲了一杯香檳酒祝探险队成功。又一次紧紧的握手，又一次拥抱，該换乘"天鵝"号返回城里去了。妇女們站在小火輪上不断地揮手……她們擦乾眼泪，又揮手。从逐漸远去的帆船上传来陣陣神經質的犬吠声。船身愈来愈小，在愈漸黑暗下去的黃昏的地平綫上終于变成了一个小点兒……勇士們，是什么样的命运在前面等待着你們呢？

帆船就这样出发远航了，阿尔汗格尔斯克的灯塔从后面向它发出送别的信号："祝航行幸福和成功。"我的天！这下子岸上开始搞了些什么名堂呢？在供应帆船物資的商人之間发生了多么肮脏的爭吵，打了多少官司，进行了怎样的拍卖——一部份不得不留在岸上的装备和給养被拍卖得一乾二净。还有种种責难，对我父亲的責难眞是无所不有！帆船出航后不到一个星期，就有人責备他，說他旣沒有給自己保险，也沒有为其他的人保险，說他出航的时間較北极航行条件所要求的迟了三个礼拜，說

他沒有等到无綫电报务員来就走了。还責难他輕举妄动，說他不善于挑选船員，所选的船員中“沒有一个会使用帆篷”。有人嘲笑他，断定說“这次荒謬的冒险，就象是一滴水珠，它反映出我們时下浮夸的，混乱的生活”。

“圣•瑪丽亚”号开走几天以后，喀拉海上发生了一次剧烈的风暴，于是，說探险队在新地島附近遇难的流言馬上就传开了。“是誰的錯誤?”，“‘圣•瑪丽亚’的命运”，“到哪兒去找塔塔林諾夫?”——这些文章喚起了我童年时期最早的恐怖印象：是在恩斯克，媽媽穿着她那件美妙的，刷刷响的黑連衣裙，手里拿着报紙，急忙忙地突然走进我的小房間，尽管我在对她說話，而且从小床上跳下来，赤着脚向她跑去，身上只穿一件衬衣，但她并沒有理睬我。地板冰凉冰凉的，可是她幷沒叫我回到小床上去，也不把我从地板上抱起来，手里拿着报紙老是在窗前呆呆地站着。我也竭力够着往窗子外面看，但我仅仅看到我們的小花园，整个小花园被一层湿漉漉的秋天的枫叶复盖着，再看到的就是潮湿的小径和水洼，最后的几滴大雨点还啪嗟啪嗟地落在上面。“媽媽，你瞧什么?”她沒有說話，我又問了一遍，而且想要她抱抱我，因为她总是不說話，可怕极了。“媽媽!”我大声哭起来，这时她才轉过身，弯下腰想把我抱起来，但是不知道她是怎么回兒事，一下子就坐在地板上了，随后又倒下去。她身子伸得直挺挺地，静静地躺在地板上，穿着她那件美妙的，刷刷响的黑連衣裙。这时突然一陣强烈的，莫明的恐怖包围了我，我喊叫着，耳朵里听見的也只是自己可怕的喊叫声，幷且覺得我手打脚踢着什么东西，后来还听見媽媽惊駭的声音，于是我又大声叫喊起来，而且总也不停止。以后我睡着了，梦寐中听見姥姥和媽媽談話的声音。媽媽說：

"她被我吓坏了。"

但我沒有出声，并且假装睡着了，因为她究竟是媽媽，因为她說話和哭泣都象媽媽……

只有現在我讀了这些文章后，我才明白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兒。

不过后来証明这些传說是假的，而且塔塔林諾夫船长还通过尤戈尔·沙尔的电訊探险队向"捐款人和同情探险队事业的人致以衷心的敬礼和最好的願望"。

这封信是用手稿刊登的，信的上方还附有父亲一张我从沒見过的相片。他穿着海軍夏服，带着銀白色的肩章：一个瀟洒的軍官，留着旧式的向上翘起来的髯子。

他向"所有的捐款人致以最好的願望"不是沒有緣故的：他希望"俄罗斯极地勘探委員会"能用这些捐款来接济船員的家屬。关于这件事，他在經尤戈尔电訊探险队寄回来的报告中曾經提到过，这份报告刊登在六月十六日的"新时代报"上：

我深信委員会决不会讓那些为民族共同事业献出了生命的人的家屬听天由命。

希望落空了！在六月二十七日的这家报紙上，我看到委員会的总結："据委員会秘書尼·安·塔塔林諾夫彙报，最近一次認捐結果为数甚微。而其他办法，諸如举办娛乐活动等也同样未获得預期的利潤。因此，委員会原定以乐捐办法募集一千卢布救济船員家屬的計划无法付諸实現。"

我讀到这些什么"乐捐"的时候，心里眞是覺得荒謬怪誕到了极点……要是我和媽媽依靠这种"乐捐"办法募集起来的施舍来生活的話，那也許早已淪为乞丐了吧？

然而这一切仅仅在我脑子里閃了一下，我并沒有特别去咀

嚼这些几乎和我年龄一般大的旧帳。在这些旧报上有另一种言論引起了我的注意，并使我感到十分惊訝：他們异口同声地断定說“圣·瑪丽亚”号帆船的遇难是不可避免的。有的人手里拿着鉛笔算来算去，說它不一定能走到新地島。另外一些人推測它将被最初的冰层封住，至于毁灭的时間，还会稍晚一点兒，那是在它成了“北冰洋的俘虏”通过佛罗兹·約瑟夫島的时候。

不論它用一个航行期，或者两个航行期，或者三个航行期的时間，反正它不可能通过北海航路。这一点是沒有一个人怀疑的。

只有一位詩人在阿尔汗格尔斯克报紙上发表过一首題目为“献給伊·李·塔塔林諾夫”的詩，从这首詩里可以看出他持有另外一种看法：

他是多么健康！命运之神保护着他，
他那充沛的精力和冒险的行动
冲破了北极圈，
就是坚固的冰原也要讓路。

我过去也知道一些情节。薩尼亚在恩斯克所找到的信件中，父亲这样写着：“六十条狗，其中大部份在新地島就不得不射杀掉。”薩尼亚根据維什米尔斯基談話所写成的記录中，提到过霉烂了的衣服和剝皮的巧克力糖。我在“阿尔汗格尔斯克”报紙上讀到商人叶·符·杰米多夫的一封信，他說“腌肉和成衣不是他的专长”，并且还說“他当时只是一个生意人，同时他还有自己的大买卖要作，自然不可能注意到放进桶里去的每一块肉和每一条魚是好是坏。塔塔林諾夫船长不断地拍来这样一些电报：‘請停止采購，因目下无款’。或者：‘請将已采購之物品卖出，目下无款’，以及諸如此类的話。既然沒有錢，为什么还要装备探险

队呢？……如果这件紧急的事情中眞有什么問題的話，那么犯錯誤的人就不应該在当地的生意人中去找，而应該在上层中去找……”

但是我过去并不知道，薩尼亚也不知道，同时我也不明白为什么媽媽从来沒有談过这件事。“在‘圣·瑪丽亚’号出航前三天，它的前艙第二层甲板下面，在水綫下面很深的外板的两側都发現有足以造成航行危险的切口，从肋骨一直到外壳板，都有斧头和鋸子的痕迹。这些縫眼兒經过测量，照象，最大的一个寬达十二吋，长二呎四吋，其它的稍微小一点。这些縫眼兒的由来很耐人寻味，不过也使人想起一件事，就是如果这条船遇难，它的新主人可以得到一笔相当可观的保险金”。

当然，現在并不需要更多的新証据来証明父亲巳經遇难，証明他永远也不会回来了。他不可能不遇难。他是被送到了一条絕对不可避免的，必死无疑的道路上去的，当然就遇难了。

4　我們为薩尼亚干杯

我巳經說过，我那个夏天工作很多，同时还因为我的助手，一位大学三年級的女学生实在太笨，結果不仅要代她作所有的事，而且还要安慰她，因为她也因为自己太笨而感到非常伤心。很多問題我自己也不懂，所以每隔两、三天就要跑到我的老教授那兒去一趟，她总是叫我“娃娃”，总是替我担心，說我瘦了。的确，我瘦了許多，脸色也不好，因为我似乎从来还沒有考虑过这么多的問題，感情也沒有这样激动过。我讀这些文章的时候感情要激动；薩尼亚的信来晚了感情也激动；因为姥姥生我的气，

甚至有一个时期她根本不来了，我心里也激动。除此之外，还因为瓦里亚和琪拉的問題也使我心里激动。

他們一切都很好。照旧坐在自己的厨房里悄悄地說話，然后带着一脸严肃、幸福、傻里傻气的表情喝茶。但是有一次，低声的談話突然中断了，跟着沉寂了一会兒，他們便互相叫嚷起来。我吃了一惊，也跟着叫起来。就在这时，瓦里亚出来了，他通紅着脸，一头撞在壁橱上，显然他是把壁橱錯認作房門了。我把帽子递給他，畏怯地問他怎么啦，但他回答說：

"怎么啦，去問您那位朋友吧。"

我不記得最后一次看見琪拉哭是什么时候了。好象是在五年級因为繪图"不及格"的那一次。現在她又哭了，用手揉擦着眼睛，哭得象个泪人兒似的。

"琪拉，怎么啦？"

"不怎么。我們决定去登記，可是他不願意搬家。就是这么一回事兒。"

"是由于我的关系嗎？因为太挤了吧？"

"根本不是因为你。他說我自己应該猜想得到。可是我，說实在話，簡直猜不透。他希望我搬到他那兒去。但是我不願意。我到他那兒去什么都需要准备，我哪兒有时間准备呢？总而言之，这兒什么都有，有碗碟，又有桌布，穿的盖的，什么都齐全。"

"还有媽媽。"

"是呀，还有媽媽。"

我們整整談了一晚上，夜里琪拉走来說她猜中了——无非是他不爱她了。我一再向她証明說瓦里亚是爱她的，如果不爱的話，决不会那样激动，我一直同她談到第二天早上七点鐘。不知道我到底把她說服了沒有，不过她突然說她很清楚，他是个好

人，倒是她自己不好，并且她要写封信給他，說她配不上他，說他不愛她，因为他認为她是个“儍瓜”。

“不过，你在发信前先給我看看好不好？”我用昏昏欲睡的声音說道。在瞌睡中，我所看見最后的情景是琪拉只穿件衬衫坐在桌前不停地写着……

第二天早上，我和她把她所写的那篇荒唐的东西撕掉，随后我就到瓦里亚那兒去了。他正在动物园里工作，使我不禁回想起和薩尼亚有一次到这兒来，他把他的嚙齿动物給我們看的情形。現在那座房子已經沒有了，換了一座漂亮洁白带圓柱的陈列館，同时瓦里亚現在也不需要一再向看門人解释，請他相信他是生物实驗室的工作人員了。但在这座漂亮洁白的陈列館里同样有着一股老鼠气味，瓦里亚也仍旧是那付老样子，只不过穿了一件白罩衫，鬍子也沒刮。我覚得好笑，因为琪拉昨兒晚上說他現在留鬍子了。

他請我坐下，自己也垂头丧气地坐了下来。

“瓦里亚，首先告訴你，我是自己主动来的，”我很生气地說道。“所以請你不要以为是琪拉派我来的。”

他声音顫抖地說道：“是嗎？”我不禁有些兒可怜他。但我还是継續严厉地說道：

“你們在西夫切夫胡同住当然要方便些，但如果你眞有正当的理由，一定要留在自己这兒也是可以的。那你应該向她解释清楚，这不就得啦。而不应該要她自己去猜。”

他沉默了一会兒才說道：

“你要知道，問題是……我不能搬到西夫切夫·符拉什克胡同去，虽然我也同意这样很好。在那兒可以布置象書房和臥室那样的房間，特別是如果把間壁挪动一下的話更好，至于現在

的贮藏室，那可以用来作一間小小的实驗室。但这是不可能的。”

“那为什么呢？”

“因为……你听我說，你不嫌她嘴碎嗎？”他突然用一种无可奈何的口气問道。

“誰呀？”

“琪拉的媽媽。”

我笑得腰都直不起来了。

“是的，你覚得好笑，”瓦里亚說道，“当然罗，你覚得好笑。可是我不能忍受。我只覚得恶心，难受。有一次她反复地問我‘你的脸色为什么这样不好？’我差点兒对她說……总是叨叨那个瓦尔瓦拉·拉宾諾維奇，就算她眞不好吧……不，我不搬。”

“原来是这样，瓦里亚，”我严肃地說道，“我可眞不知道究竟你們誰嫌誰嘮叨。不过无論如何，你对琪拉的态度太沒有道理了。她昨天一晚上都沒有睡覚，不停地哭，不管怎样吧，你应該馬上到她那兒去，把事情向她解释清楚。”

他脸上显得很难过，而且十分激动地在屋子里走来走去。

“我不去！”

“瓦里亚！”

他固执地一句話不說。“啊，想不到你还这么倔强！”我怀着敬意地暗自想道。

“那你以后再别来找我了，去你的吧！”我气忿忿地說完了就想走，可是他不放我走，于是我們又談了两小时，商量怎么才能使琪拉的媽媽不說那么多的話……

把这件事情的原委告訴琪拉实在不怎么合适，但我还是告

訴了她。她感到非常詫异，接着她就說她的媽媽每天都在抱怨，嫌瓦里亚嘮叨，并且有一次在他走后，她甚至就躺下了，在額上放了一块湿毛巾，說再也不能够听那些关于玄狐混合种的話了，并且說如果琪拉嫁給这样的人簡直是发了疯，因为他不讓别人說話，可是自己就象个扩音器似的不停地講。

轉眼間她穿好衣服就跑到瓦里亚那兒去了，——尽管我說，假如我处在她的地位，决不先去找他。到了晚上，他們便又坐在內厨房里悄声談話了。他們决定不管怎样还是先試一試在西夫切夫·符拉什克胡同安家。

这是一个非常美妙的晚上，是沒和薩尼亚在一起度过的最好的一个晚上。头一天我收到他一封信，这封信写得又长又好。在这封信里，他还提到他現在看了很多書，并且开始学习英文。我回想起当他知道我能相当自如地說英語时那付惊奇的神情。又有一次，大家当着他談論作曲家肖斯塔科維奇的时候，結果发現他从来还沒有听說过这个名字，这时，他的脸孔紅得多么厉害。总而言之，这是一封使我从心眼兒里感到愉快和安慰的絕妙好信。我和亚历山大拉·德米特里耶芙娜一起，瞞着这对"青年恋人"准备了一席丰盛的晚餐和一些葡萄酒。虽然瓦里亚爱吃的龙虾拌凉菜被我們把盐放重了，——我先放了一次，——后来亚历山大拉·德米特里耶芙娜又放了一次，——但还是吃得精光，原来瓦里亚从昨天起不仅沒有刮鬍子，而且也沒吃过一点东西。

我們为薩尼亚的健康干杯，然后又为他一切事业的成功而干杯。

"为他的伟大的事业干杯，"瓦里亚說道，"因为我相信，他这一生中必然会作出点伟大的事业来。"

后来，他又講起一九二五年他在共青团莫斯科市委会的少年自然科学家委員会工作时，有一次他怎样劝薩尼亚去銀松林游覽，以及薩尼亚怎样花了很长的时間，尽力想了解为什么这件事有趣，后来他突然引用了两句名言。大家对他那非凡的記忆感到十分惊訝。他引用的名言是：

奋斗吧！奋斗吧，当希望还没有破灭的时候，

生命中还有什么比奋斗这样的游戏更美妙的呢？——

并且还說，他不擅长捉田鼠。

亚历山大拉·德米特里耶芙娜也想說点什么話，我和琪拉都怕她又要談起瓦尔瓦拉·拉宾諾維奇来。不过这回还算好，她只給我們朗誦了几首詩，并且說她对詩也有非凡的記忆力。

我們就这样坐着喝酒。已經十二点了，这时有人按門鈴。亚历山大拉·德米特里耶芙娜正在給我們表演"假嗓子"，她說这是清扫工人倒垃圾来了。我連忙跑到厨房里去，一只手提着污水桶出去开門。然而来的并不是清扫工人，是罗馬紹夫。当我把門敞开的时候，他一声不响地迅速往后退了退，把帽子摘下来。

"我有一件紧急的事，而且因为这件事也关系到您，所以这样晚我还是决定来一趟。"

他說这話时很認真，所以我也就立即相信事情一定很紧急，而且和我有关系。我之所以相信，是因为他的神色非常鎮静。

"請进吧。"

我們就这样面对面地站着，他拿着帽子，我手里提着污水桶。后来我突然发覺这样不对，便連忙把桶放到門后。

"我怕不太方便，"他很有礼貌地說道。"您这兒好象有客人？"

“沒有。”

“就在这兒，在楼梯上可以嗎？要不我們下楼到林蔭路上去。我需要通知您……”

“等一分鐘，”我急促地說道。

亚历山大拉·德米特里耶芙娜在喊我。我把門掩上，迎着她走去。

“誰？”

“亚历山大拉·德米特里耶芙娜，我一会兒就回来，”我急促地說道。“要不，这样吧……过一刻鐘讓瓦里亚下来找我。我就在林蔭道上。

她还在說什么話，可是我已經跑出来，砰地一声把門关上了。

这天傍晚有点兒凉，我只穿了一件連衣裙，因此在楼梯上罗馬紹夫就說：“您这样要感冒的。”大概他想把自己的大衣給我穿，甚至已經把大衣脫下来拿在手里，但沒有敢这样作，后来我們坐下时，他把大衣放在了凳子上。其实我并沒有覚得冷。我因为喝了葡萄酒脸上发热，心里也很激动。我感覚到他这次来不是一件簡单的事。

林蔭道上靜悄悄的，从果戈理的紀念碑一直到栅栏尽头，只有一些老年人拄着手杖坐着——一张凳子上坐着一个——栅栏后面正在修建“苏維埃宮”車站。

“卡佳，我想对您說，”罗馬紹夫愼重地开始說道。“我知道成立探險队的事对你說来有多么重要，同时对于……”

他迟頓了一会兒，然后又很順暢地繼續說道：

“同时对于薩尼亚也一样。其实我并不認为这件事眞的那么重要，也就是說会引起生活中什么变化，例如您的伯父，他就

非常怕这件事。不过事情既然关系到您，所以我也就不能等閑視之了。”

他这話說得很自然。

“我来是預先通知您。”

“通知什么？”

“探险队不成立了。”

“不对！他們在电話里告訴过我的。”

“这是刚决定的，他們認为不值得派遣一个探险队，”罗馬紹夫很鎮定地辯解道。

“誰决定的？您从哪兒知道的？”

他轉过身来，笑嘻嘻地看了看我。

“我不知道該怎么說。这回我又成了象您称呼我的那样一个卑鄙的坏蛋了。”

“怎么說都行。”

我怕他站起来走掉，但他是那样鎮定和自信，簡直不象从前的那个罗馬紹夫了。他沒有走。

“尼古拉·安东內奇告訴我，說北方航务总局副局长作了关于成立探险队的报告，但他自己却表示反对。認为寻找那些二十多年前就失踪了的船长并不是北方航务总局的工作。不过据我看来……”罗馬紹夫打了一个頓，他大概是感到悶热，所以把帽子摘下来放在膝盖上，“这并不是他的意見。”

“那么是誰的意見呢？”

“是尼古拉·安东內奇的，”罗馬紹夫急促地說道。“他和这位副局长有几分交誼，并且这位副局长把他看成是研究北极历史的大专家。再說，关于寻找塔塔林諾夫船长的事如果不和尼古拉·安东內奇商量又去和誰商量呢？探险队本来是他負責装

备的，后来他还写过一些关于探险队的文章。他是地理学会的委員，还是相当有威望的委員。”

我非常生气，在这頃刻間，我旣沒有考虑尼古拉·安东內奇为什么要这样千方百計把寻找的工作搞垮，也沒有去想究竟什么原因使得罗馬紹夫又一次地出卖了他。我感到自己受了侮辱——不仅因为我父亲，而且也因为薩尼亚的关系。

“他姓什么？”

“誰？”

“就是那个說不值得去寻找已經失踪的船长的人。”

罗馬紹夫說出了他的姓。

“当然，我不准备去和尼古拉·安东內奇講道理，”我繼續說道，我觉得我的鼻孔都气胀了，我极力想平静下来，可是我觉得实在沒有办法。——我跟他談过一次話就够了。不过我要到北方航务总局把他的情况多少向人講一点兒。薩尼亚上一次沒有时間来跟他算清这笔帐，我不知道是不是可怜他……算了吧，这个消息眞的嗎？我看了罗馬紹夫一眼，忽然这样問道，同时心想，說这話的人到底是他，因为他爱我，所以大概总是一心在梦想着如何才能更保准兒地陷害薩尼亚！

“我干嗎要說假話呢？”罗馬紹夫滿不在乎地辯解道。“你就会知道的！他們也会通知您……当然，应該去解释个明白。不过您……可不要說这件事是从哪兒听来的。話又說回来了，您即便說了，我也无所謂，”他态度傲慢地又加了一句說，“頂多讓尼古拉·安东內奇知道罢了，那么以后我就再也不能象今天这样瞞哄他了。”

瞞哄尼古拉·安东內奇是为了我——这就是他說这句話的意图。他瞧着我，等待着我表示意見。

"我并沒有請求您瞞哄任何人，不过您这次决定（我差点兒說出"是有生第一次"）憑良心办事，并且帮助了我，我認为这并沒有什么値得慚愧的。我不知道您現在对尼古拉·安东內奇抱什么态度？"

"藐視的态度。"

"好吧，这是你們的事。"我站起身来，因为我覺得討厌。"不管怎样吧，应該謝謝你，米沙。再見……"

我在西夫切夫·符拉什克胡同附近碰見了他們三个人：亚历山大拉·德米特里耶芙娜，琪拉和瓦里亚。他們很着急的跑着，亚历山大拉·德米特里耶芙娜还在說："天哪，我哪兒知道呢？她只是說如果十分鐘以后不回来的話……"

电車正好在我們中間停下，等它开走之后，他們三个人一起气势汹汹地向林蔭道上奔来。

"站住！"

"这不就是她！亚历山大拉·德米特里耶芙娜！她在这兒！卡佳，你是怎么一回事？"

"葡萄酒喝完了沒有？"我一本正經地問道。"要是喝完了，还应該再买一点兒……我还想为薩尼亚干一杯。"

5 这上面写着"圣·瑪丽亚"号

那时候，北方航务总局的局长是一位著名的北极活动家，在任何一张俄国北极的地图上都不难找到他的名字。去他那兒找他自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經过契同志打了个电話之后，我当天就被接見了。当然，我还得先等候一会兒，不过这样倒也有

趣，因为在接待室里还坐了好些刚从北地城回来的海員和飞行員。有个人的面貌有点象薩尼亚，我不由得多瞥了他几眼，并且側耳听了听他在說什么話。可是他大概理解成另外一种意思了，所以便擺出一付精神十足的样子，傻里傻气地笑着。后来他們都走了，我又坐了很久，为了那时时刻刻袭上心头来的煩恼在生自己的气。

这次和北方航务总局局长的談話我記得很清楚，因为这天晚上我在給薩尼亚的信中，又一字一句地把他的話复述了一遍。

开始的时候，我有点不安，并且覺得自己神色不好，但一听到他用那种低微温和的口吻問我："您有什么事嗎？"我所有的不安便立刻消失了。后来不安的心情又产生了，但这是另外一种不安，是兴奋的不安，这种不安可以使你忘却自己，感覚到又是寒冷，又是舒暢。

"有个姓格利高里耶夫的飞行員給您一份关于寻找探险队的計划草案，"我开始說道，"本来已經决定成立这支探险队。可是昨天……"

他留心地听着我講。他本人同报紙和杂志上曾經登載过千百次的他的照片象极了，我不禁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感覚，仿佛我不是在同他本人，而是在同他的照片談話。

"不，"当我問他是不是也認为寻找已經失踪的船长是一件不值得的事情时，他分辯道，"不过我們仔細地考虑了所有'贊成'和'反对'的意見之后，断定这类的搜索工作早就注定要失敗。实际上也是如此：第一，草案中所指的地方在近年来已經或多或少地經过一些研究，可是直到目前为止，还沒有发現'圣·瑪丽亚'探险队的任何遺迹；第二，从北地島到皮亚辛河口有一

千多公里，要在这样长的距离內組織搜索工作是非常复杂的；最后，也是最主要的一点，就是我对于为什么偏偏要在这个区域內寻找您父亲的探险队这一点沒有信心。”

“毫无疑問，正是要在这个地区，”我毫不犹豫地分辯道。

“为什么？”

“因为……”我这时突然把所有的証据都忘光了，虽然我在接待室里的时候曾重新默誦了一遍，甚至扳着指头数过。“因为……”

他看着我等我說話。他的眼睛非常明亮，鬍鬚烏黑，他冷静地看着我，等着我說話。这是非常可怕的一刹那。

“第一，这可以从航海长的日記里看出来，”我声音有点兒发抖地說道。“您还記得他引用过我父亲的話：‘要是絕望的环境迫使我丢开船，那么我就到我們发現的陆地上去。’第二，……”我从皮包里掏出薩尼亚給我留下的照片。“請您看一看……这上面写的是‘圣·瑪丽亚’号。这条矛鈎是在泰麦尔找到的。”

“就假定是这样吧。但为什么不可以認为这条矛鈎是屬于早两个月离开船的航海长他們那一队人的呢？”

“因为航海长……您的地图在哪兒？”虽然書桌上方就挂着一幅北极大地图，而且我一直都在望着它，但大概是由于我太激动的緣故，竟沒有看見它。“他是順着漂流的冰块走的，而且完全是另外一个方向。可以嗎？”我取过指图竿，站到椅子上，因为我站在地板上够不到弗罗拉海峽。“您看，他是怎样走的。他是同塞多夫中尉的探险队一起回到阿尔汗格尔斯克来的。但是我們再往下看，”我繼續說道，同时感到渾身发冷，脸色也变白了，不过現在是由于过度兴奋而变白的。“您剛才說，从北地島

到皮亚辛河口所有的地方都研究过了，而且奇怪的是直到目前为止，还沒有人碰到过探险队的遺迹，即便是偶然的也好。可是魯薩諾夫① 呢？从他的残余装备被发現之后經过了多少年才找到他呢？而且是在什么地方找到的呢？不正是在那些有船只往来，人类常去的地方嗎？还有阿姆生的那个水手，他不正是在离站台仅三公里的廸克逊被人找到的嗎？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我那时候还不知道这位水手（他的名字叫吉生）的坟墓就在碼头食堂旁边，吃完飯到北极站去的人都要走这条吉生未曾走完的路，也就是他从生到死的路。

“不对，問題不在于这些地方都已經研究过，而在于大家从来就沒有寻找过我的父亲。他的航綫是这样的：从第八十六和第八十七子午綫之間北緯的地方前往俄罗斯島，諾登塞尔特群島，然后，大概經过了一段长时期的漂泊，又从斯帖尔列果夫海峽前往皮亚辛河口。一位涅涅茨的老人就在这兒找到过一只放在雪橇上的小船。然后，他們又往叶尼塞河駛去，因为叶尼塞河是可以遇見人和得到帮助的唯一的希望。”

我从椅子上跳下来。他捋着鬍子，滿有兴味的样子瞧着我。

“您这么有把握？”

“是的，不可能是另外一种情形。究竟格利高里耶夫提出些什么建議呢？‘巴赫图索夫’号破冰船去北地島是进行科学研究工作的。这是一支水道測量探险队，对不对？”

① 魯薩諾夫（1875—1913），俄国有名的北极探险家，因参加革命运动曾多次被沙皇政府逮捕。——譯者注。

“对。”

“那好极了。中途它可以在几个地方建立供两三个搜索队用的基地。格利高里耶夫認为只需要两个队，每队三个人。而我却覺得应該有三个队，或者用一艘小汽艇作为第三队。他們要沿着近海島屿的外海岸前进，‘巴赫图索夫’号这时可以在这附近的地方工作，这样也就不致失掉了联系。”

我把話停下了，因为这时北方航务总局局长笑着站了起来。他从桌边繞过来，和我并排坐下。

“不錯，您眞是塔塔林諾夫船长的女兒，”他愉快地說道。“您是学地理的嗎？”

“学地質的。”

“几年級了？”

我回答說，我早已大学毕业了，而且在巴什基里亚地質局工作都已經两年了。

“您有兄弟姊妹嗎？”

“沒有，就是我一人。”

“母亲呢？”

“去世了。”

他很体貼地沉默了一会兒，然后又回到薩尼亚的草案上来。

“当然，所有这一切都远不是那么簡单的，”他沉思地說道。“但也不是不可能的……一艘小汽艇嘛，当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問題。不过显然这个問題还应該找格利高里耶夫来一趟。他在什么地方？”

“在北地城。”

我的心怦怦地跳了起来，也不知为什么，我又說了一次：

“在北地城。”

他故意逗弄人的样子看了看我。

“我們眞把他請来吧，”他带着孩子般快乐的神情重复說道。这一来我就知道契同志已經把我和薩尼亚的关系对他講过了。“您認为怎么样，我們解决这个問題不正是需要他嗎？”

“我覺得是的，”我鼓起勇气来說道。

“就这样吧。我同您認識非常高兴，”他站起来，很認眞地說道。“探险队成立也好，不成立也好，不过您能到我这兒来，而且講得这么起劲，这么热情，这实在太好了。”

6 在姥姥家

我已經說过，姥姥每天晚上都到我这兒来。她来的时候总是噘嘴鼓腮很不得了的样子，和琪拉的媽媽談話也很高傲。她很不高兴我放着自己家里“頂好的房間”不住，却住在“别人”家里。并且她怕一个叫做多拉·阿布拉莫芙娜的女人，說她已經“跑来嗅过”两次了。

“我的晚年到了，”她有一次眼泪汪汪地向我說道，“可是这么孤独的生活我还沒过过。”

但有一天姥姥却沒有来。第二天早上她挂电話来說她的心脏有点不舒服。当我問她尼古拉·安东內奇在不在家的时候，她竟大发起脾气来。

“眞問得胡塗，”她厉声說道。“他能到哪兒去？都象你那样？老賴在别人家里嗎？”

后来她說他已經走了。我便赶快收拾了一下，上她那兒去了。

她盖着她的那件旧式的綠色皮袄躺在沙发上。月桂樱桃水放在沙发旁边的小桌上——这是她認为唯一有效的藥。我問起她健康情况时，她只摆了摆手。

“她是一有点什么事就点头哈腰的人，”她气呼呼地說道。“現在滿可以看出她从前当过修道女，是个迷信宗教的人。可是我問她‘那你为什么还要干活呢？’就把她辞退了。”

她辞退了女佣人，这很不好，虽然女佣人信教，但却是个好人。过去姥姥甚至还因为她作过修女而感到喜欢哩。

“姥姥，你这是作的什么事？”我說道。“就剩下你一个病人，現在我可要把你带我到那兒去了。”

“我不去。越来越不象話了！”

她坚决拒絕脫掉衣服睡到床上去，并且說她不是心脏的毛病，只不过因为昨天沒有作菜，吃了点素油蘿卜，因此她的病是蘿卜引起来的。

“你要是不睡下，我立刻就走。”

“哎呀！吓唬起人来了。”

后来她終究还是脫了衣服，唉声叹气地躺到床上，一会兒就睡着了……

母亲的房間里，不知道为什么一打开窗戶总是有穿堂风，我为了透透风便把通走廊的門敞开了。然后我又走到我自己的房間里去，尽管我覺得这个房間是那么不舒服，那么空虛，可是我曾經在这里度过了多少岁月啊！我走后，这个房間里的一切甚至变得更好了一些。床上舖着姥姥古色古香的带花边的被单，窗帘浆洗得硬板板的，白得不能再白了，所有的东西都收拾得干干净净，甚至在我离开前不知由于什么原因而看过的那卷百科全書也仍旧在原来那一頁上摊着。这兒的人在等待着我……

在窗台上放着的許多旧課本中間，我找到一本笔記本，里面抄写着一些从我喜愛的書上摘引下来的語句："人心本是一个古怪的东西，而女人的心尤其古怪。"——莱蒙托夫。

这是一些玄妙而可笑的語句，我把它們从头到尾讀了一遍。我彷佛是在作梦，梦見自己在一个熟識的小姑娘家里作客，这位小姑娘把一切的事情都想象得那么美丽，整个世界在她眼里也是那么輝煌壮丽。

"世界是舞台，人就是演員。"——莎士比亚。

当我手拿着笔記本从房間里走出来的时候，我覚得似乎有人在走廊上急急忙忙地走了过去。

我这时当然不会想到是我那生病的姥姥穿着她那件綠色天鵝絨皮袄在走廊上跑。但的确有人在跑——而且正是穿着綠皮袄。結果真是姥姥，因为在我回来的时候，虽然她仍旧和刚才一样躺在床上，但可以看出她是刚刚躺下去的，甚至連被子都沒有来得及盖好。

这是非常可笑的，她甚至眯縫着眼睛，竭力装出一直是在睡覚，根本就沒想要跑到走廊上去的样子。她刚才是在偷偷地观察我：說不定我会突然决定搬回家来呢？

"姥姥，医生来过嗎？"等她終于睜开眼睛，并且假装大声打了个呵欠时，我問她道。

医生沒有来过。她不願意找医生。她知道这是蘿卜引起来的。

"可是你打电話說是心脏不舒服。"

"心脏不舒服也是蘿卜引起来的。"

"真是瞎說！我立刻去請医生来。"

姥姥发起火来了，說要是我請了医生来，她馬上就穿起衣服

到一个叫瑪丽亚·尼基吉希娜的女邻居那兒去。

要給姥姥請医生，非先大吵一場不可，所以我也就不再坚持，同时姥姥也一分鐘比一分鐘地愈来愈感到輕松了。她終于覺得完全好了，因为她这时突然吃惊地聞了聞味，說了一声“烤焦了……”，便披上大衣跑到厨房里去了。

这是肉餡餅烤焦了，其实还不太焦。肉餡餅装在一个巧妙的烤爐里，放在煤汽爐上，散发着香噴噴的气味。姥姥还說，假如我不尝尝这个肉餡餅的話，她的病又要加重了。

所有这一切，这些計策，特别是她不惜放了很多的油作成的，我最爱吃的肉餡餅都和姥姥本人一个格調。作肉餅的目的是使我彻底信服在自己家里比在“别人”家里好。但是我吃了两块，然后吻了吻姥姥，只不过說作得很好吃罢了。

关于尼古拉·安东內奇的事暫时一句話也沒有談。但姥姥已經作出一付若无其事的样子，于是我明白話就要开始了。姥姥先是从很远的地方扯起。

“我收到奥列琪加和拉拉一封信，”她严厉地說道。“她們劝我‘千万不要管那些家务事’，我現在管这些事太累了。”

奥列琪加和拉拉就是我的两个上了年紀的姨媽布宾其可娃，她們住在恩斯克。

“可是我怎么能不管呢，你責备她，她不吭声。你再說她几句，她还是不吭声。你都气得发火了——她仍然是不吭声。她是遵照神甫的計划生活的，”姥姥多少有点兒兴奋地說道，“对自己的人滿不在乎，什么都是神甫。眞是歇斯底里的女人。神甫給她写信說：‘沉默吧，忍耐和哭泣吧。’她就是乐意这样。她在衣柜里釘了几个釘子，挂上圣象，总是那么小声小气地說‘我听話’。我討厌这样的人。”

"姥姥，你已經把人家辞退了还說什么呢。"

姥姥沉默了一会兒。

"一家人都七零八落了，"她又叹了口气說道。"你抛弃了家，可是他又怎么样呢？他現在也变得对什么都无所謂了，有也行，沒有也行。有时吃一点，有时也不吃。"

"他"——这是指的尼古拉·安东內奇。

"总是在写，不停地写，"姥姥繼續說道。"白天黑夜，日以繼夜地写。早上一喝完茶，立刻就围上我的披肩坐到桌边去了，并且說：'尼娜·卡比丹諾芙娜，这将是我一生的劳动。至于我有沒有錯这一点，現在讓我的朋友和敌人去公断吧。'他自己瘦多了，精神总是恍恍惚惚的，"姥姥悄声說道，"这几天竟戴着帽子来吃飯。他大概非发疯不可。"

这时大門輕輕响了一下，有人走进前厅站住了。我望了望姥姥，她恐惧地把眼光移开，于是我明白，这是尼古拉·安东內奇回来了。

"姥姥，我該走了。"

"不，还不到时候。肉餅还沒吃完呢。"

他輕輕地敲了敲門，沒等回答便走进来了。

我轉过身来，点了点头，——連我自己都覚得高兴，我能这样毫不在乎地，大胆地点头。

"工作怎么样，卡秋莎？"

"还好，謝謝。"

說来真是奇怪，現在他对我說来只不过是一个脸色蒼白，上了年紀，长着两只手指肥胖的短胳臂的人。他总是令人不愉快地神經質地掰他的手指，不停地往什么地方塞：一会兒伸到領子里，一会兒插在背心口袋里，仿佛要把它們藏起来似的。他变得

象一个衰老的演員。我和他認識的关系仿佛是几千年前的往事那么久远。現在不管他的脸色怎样蒼白，不管他的脖子瘦得多么可怜，在他伸手想挪动一下圈椅时，不管他的手是怎样发抖，我現在覚得这一切都是无所謂的。

最初难堪的一会兒过去了，他用开玩笑的口气問了我一些关于我的地图的事情，問我是不是把澤尔麦尔达格岩系和阿申斯格岩系互相混淆了——我在大学念書的时候，发生过这样一次事情。这时，我又告辞要走。

“再見吧，姥姥。”

“我可以出去，”尼古拉·安东內奇低声說道。

他坐在圈椅上，蜷縮着，带着眞摯善良的神情注視着我。母亲去世以后，我們有时长談的时候，他就是这付样子。但現在对我說来这只不过是遙远的回忆罢了。

“假如你急着要走的話，我們改次再談吧。”

“姥姥，說实在話，有人在等我，”我对紧紧扯住我袖子的姥姥說道。

“不，沒有人等你。怎么能这样呢？好歹他是你的伯父啊。”

“得啦。尼娜·卡比丹諾芙娜，”尼古拉·安东內奇善良地說道，“我是伯父也好，不是伯父也好，还不都一样。卡秋莎，显然你是不願意听我講完娄？”

“不。”

“眞任性，”姥姥憤恨地說道。

我笑了。

“我沒法跟你說，你連和我告别一下都不肯就走，使我多么难受，”尼古拉·安东內奇急促地，但仍然用那样眞摯、善良的

声調繼續說道，“我也沒法跟你說，你們两个居然相信了一个不久前刚从精神病院出来的、不幸的老头子，而把自己引入了迷途。”

他从眼鏡上面瞅了瞅我。从精神病院出来的！这又是一次謊言。也許不是撒謊，不过这些事情現在对我說来已經无所謂了。只有一种思想輕輕地刺痛着我，就是这件事涉及到薩尼亚，或者他要不高兴的。

“我的天哪！这样一个可怜的，混乱的脑袋瓜兒什么事想不出来呀！居然說我用什么支票把他弄得傾家蕩产，說我故意不好好地装备探险队，你想想看，这是为了什么，就是因为我想害死伊万嗎！”

尼古拉·安东內奇眞心地放声大哭起来。

“出于忌妒！我的天哪！我爱你的母亲，由于嫉妒，所以想把伊万害死！”

他又哭了，但忽然摘下眼鏡，擦起眼泪来。

“是的，我爱过她，”他流着眼泪喃喃地說，“上天明鉴，一切本来都可以不至于这样。如果我眞是錯了，那么除了她以外还有誰来懲罰我？受这样的懲罰眞是从来也沒有想到过。”

我听着他講，象是在作梦一般，我开始覺得所有这些情景曾經在什么时候发生过。也是这个只有几根头发的发紅的秃头頂，也是用这种表情說这些話，也是因为看着一个上了岁数的男人哭鼻子而引起的那种不愉快的感覺。

“怎么样？”姥姥恶狠狠地問道。

“姥姥，肉餅好极了，再切一块吧，”我高高兴兴地說道。“尼古拉·安东內奇，您繼續講吧。”

“卡佳，卡佳！”

“你們知道，”我这时甚至感觉到有一种泄憤的快乐說道。“我已經不是小孩子，我已經二十四岁了，我似乎也可以作我願意作的事了。我不願意再在这兒住下去，明白了嗎？我要出嫁了。我很可能要和我的丈夫住到北极去，因为他是个北极飞行員，他在这兒沒有什么事可作。至于尼古拉·安东內奇，我已經看見他哭过很多次了，同时，我也看够了。我只能这样說，如果他眞是沒有錯的話，他恐怕也不会終生忙着去搞这件事。例如，他未必会到北方航务总局去奔走，設法搞垮薩尼亚的探險队。”

显然这时我已經不象刚才那样高兴了，所以姥姥才那么吃惊地看着我，似乎还偸偸地画了个十字。尼古拉·安东內奇脖子上的血管跳动着，默默地沒有吱声。

“讓我安靜安靜吧，”我发狂一般地說道，“永远，永远也別来打扰我！”

7 冬天

十一月，我在近郊区靠莫斯科河的地方領到了間屋子。尽管瓦里亚和琪拉都异口同声地說，他們的家庭生活中不能沒有我，亚历山大拉·德米特里耶芙娜也把我拉到一边，說她現在也要走了，因为我过去“总还起了一些防御黑褐色狐狸的避雷針作用”，以后我不在这兒，瓦里亚会把她嘮叨死的。但我最后还是搬走了。

我的屋子是在一栋新楼房里面。这座五层楼的房子孤零零地聳立在空曠的河岸上，还說不上特别美观。工人們刚刚走，甚

至可以說还沒有走，还在院子里忙着收拾施工剩下的破砖碎片；楼梯上放着一些米黄色的槽子，到处都挂着被人遺忘了的装着油漆的小桶。

过去到郊区一趟，乘坐电車需要磨蹭整整一个小时，而現在乘地下电車只消十分鐘就到了。过去符地非常荒凉，而現在却跟莫斯科一般热鬧了。我們这座本来想用垣墙隔开来的不很雅观的独立大楼和那些用小柱头，栏杆以及雕刻小玩意兒装飾起来的頹老的别墅并排在一起显得非常突出。

然而不仅楼房，就是自己的房間我也不敢夸奖。这个房間只有一个优点，就是朝莫斯科河的一面的景色非常优雅。即使在冬天，莫斯科河也是美丽的，特别是傍晚，淡淡的柔弱的阳光从遙远的地方射来，而雪堆前出現一块块洁凈的椭圓形阴影，由此使我联想到在北极圈外的一个小小的海港城，那兒牡鹿拖着雪橇在木街上奔馳。“不过，和牡鹿并排着竟相奔走的，”薩尼亚在信中这样写道，“还有木材运輸車，大卡車，馬兒和拉車的狗。这样一来，人类的全部历史，从氏族制度直到社会主义的文明，便都展現在我們眼前了。現在我們正在修建一座新城，到处都是脚手架，滿街都是木屑，航空站已經迁入一栋新修的，华丽的，带有‘候机室’的三层楼房里去了，每当夕阳西下的时候，我們就坐在这間候机室里閱讀伏尔泰的作品。眞有意思，这位‘現代’作家在我們这兒居然这么受人欢迎，許多墙报都引用他作品中的名言作点綴。我想念你的时候那么多，甚至使我感到奇怪，怎么还会有时間来作其他的事！这大概是因为在某种程度上說其它一切事也就是你，特别是在飞行中，当我想什么問題的时候，或者輕声地唱几句又想心事的时候，我脑子里想的总是你……”

那个冬季，我的經济情况相当困难，因为巴什基里亚地質局在烏发，錢要从那兒寄給我，所以經常延誤。有时不得不拍电报去責問。除此之外，我还沒有吃飯的地方，自己又懶得作。总而言之，我完全成野人了，有一次，我比量了一下节日穿的那件綢連衣裙，便气得坐下哭了起来。

我这个冬天第一次准备去剧院，去瓦赫坦戈夫看“人間喜剧”的首次演出，这才发现我那件带尾巴的連衣裙已經不时髦了，这种尾巴早几百年就沒人带了。后来我和琪拉把衣服改了一下，把它剪短縫起来。但是去参加晚会的兴致也因此敗坏了。

这是在符地度过的一个孤独的冬天，孤独得几乎只有罗馬紹夫是我唯一的常客。現在很难想象他就是那个曾經說要杀死我和杀死他自己的罗馬紹夫了。他每次来的时候都很有礼貌，很安靜，穿的总是那么漂亮，甚至可以說是很豪华，用着不高不低的，大概也就是他在专科学校講課时的那种声調和我談話。

有一次，他样子非常疲憊和飢餓的来了。我問他道：

“米沙，想喝点茶嗎？”

他冷淡地謝絕了。他显然是想表示除了事务关系之外并不急于向我要求其它关系。这里所說的事务就是指探险队和一切与探险队有关的事。

为什么他要操心探险队的事呢？当然是因为这件事情与我有关，那末“对他說来也就不能等閑視之了”。但是这中間也有一点驕傲，他仿佛想借此表示我拒絕他并沒引起他的怨恨。毫无疑問，他大概还有一个計划，仍旧是那个老計划；用一些愚蠢而复杂的阴謀达到和我結婚的目的。在他的身上，在他这种装腔

作势的态度上，在他那张翘着两只发育不全的耳朵的面孔上，就有着一种愚蠢同时又是复杂的东西，有时还会突然閃現出一种令人可怕的神情。难怪有一次伊万·巴甫洛維奇說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至少也是一个善于使自己的感情急轉直下的人。

不过他的感情与我并不相干。自然我也沒有把他常到我这兒来的事写信告訴薩尼亚。薩尼亚知道会气得发疯的，何况我現在写的信不知道为什么就已經够干巴巴，冷冰冰的了……

問題突然发生了，北方航务总局对于委托薩尼亚作这次的搜寻工作还很不放心。虽然他已經工作了許多年，可是究竟还很年輕，他在北极工作的时間也比較短。大家虽也知道他是一个优秀可靠的駕駛員，可是，他能否胜任这样一件要求有一定組織能力的复杂的工作呢？总而言之，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記得有一份杂志曾經指責过他誹謗别人，似乎是誹謗船长的堂兄，著名的北极活动家尼古拉·安东內奇·塔塔林諾夫。

因此我要求杂志的編輯部更正，我又說明組織一个六个人的搜索队并不是一件十分了不起的复杂事情，我要求把搜寻塔塔林諾夫船长的任务不要委托給旁人，应該委托給那从小就被这一思想鼓舞着的人。

罗馬紹夫是知道这些事情的。他究竟在想什么？期望些什么？我沒有問过他，同时他也沒有談起过。但是有一天我猜到了許多事。

假如探险队成立的話，我一定毫不犹疑地跟着薩尼亚到北地島去。我把这个意图写信告訴了北方航务总局的局长，并且表示願意去作地質工作。干部部門的答复很快就回来了，遺憾的是結果完全不是我所預期的那么一回事兒。他們建議我到北极的一个站（任我选择）去工作，并且約我到北方航务总局去談

一談。

我这天很晚才回家，每次进“城”都是如此，走到楼梯上，我才懊悔忘記了鎖門。这时正好有一个人在我房間里走来走去；我疑心是小偷。但結果却不是小偷，而是罗馬紹夫。我一进門，他就站住了，我立刻看出他样子很慌张。

“我看了这封信，”他連好也顧不得問，便說道。“您想去探险队，原来是这样！”

我看了看他，不禁回想起在学校时，大家嘲弄他是“猫头鷹”的事。他的眼睛滚圓，在这一瞬間，他特别象一只猫头鷹。不过是一只很大的猫头鷹，它喊叫了一声“原来是这样！”便吃力地喘息起来。

“您为什么要偷看别人的信？”我保持着相当和气的态度，問道。“这是不应該的，米沙。”

“您瞞着我！背着我找門路要走啊！”

“米沙，您怎么啦，发昏了嗎？难道要我向您請示不成！”

他突然怪腔怪調地发出一种嗚嗚咽咽的声音来，旣不象笑，又不象是哭。

“如果您願意的話，”他高声說道，“讓我自己来办这件事。好，您走吧！”

我沒有作声。我不知道为什么不願意得罪他。

“您为什么不作声呢？”

“因为我不打算回答您的鬼話。”

“卡佳，卡佳！”

“您听我說，”我鎮定地說道，“您知道您需要什么嗎？需要休息。您累了。您根据哪一点說我一定要留在莫斯科呢？”

“是的，您要留下的。”

我正想笑，可是他向我跟前跨了一步，他的脸色变得那样，仿佛再有一秒鐘就要打我了。

“喂，这样吧，我的亲爱的，”我仍然心平气和地說，但已經不能象我想要作到的那样了，“您的大衣和帽子在哪兒？”

“卡佳！”他又絕望地呢喃說道。

“‘卡佳’又怎么样！我知道您打的是什么算盘，即便我留下来您又敢怎么样。您大概完全疯了，不过，您疯不疯跟我沒多大关系。怎么样？”

他一声不响地穿上大衣，戴好帽子，走出去了。

一九三五年秋，探险队的事終于决定了。著名的北极研究家符教授发表了一篇論文，認为根据克里莫夫航海长的日記来判断，“塔塔林諾夫探险队的材料如果能够找到的話，甚至对于近代的北极研究工作也有一定的价值”。他的这个見解在我看来也是很大胆的，可是竟出人意料地被接受了，这个新的情况推动了大家承認薩尼亚的方案的正确。原来符教授研究了“圣·瑪丽亚”号自一九一二年十月到一九一四年四月間的漂流图以后，作了一个推論，認为在緯度 78°02′和經度 64° 的地方应当有一块尚未被人发現的陆地。后来，这块为符教授坐在办公室里发現的，假想的陆地終于在一九三五年的航行期內被发現了。固然，它并不是一块什么了不起的陆地，仅仅是隐沒在飘浮的冰山之間，景象极其荒凉的北极大陆的一小块地方。但不管怎么样，在苏維埃北极地图上又抹去了一个“空白点”，而且是靠“圣·瑪丽亚”号漂流图的帮助完成的。

我不知道这些新的論据对支持薩尼亚的方案是否需要。不过需要也罢，不需要也罢，“一支附屬于研究北地島的高緯度探险队的搜索队”总算是列进下年度的航行計划之內了。薩尼亚

应該在春天去列宁格勒，因此我們約定在我从未去过的列宁格勒会面。

8 列宁格勒

一九三六年五月十日早晨，我乘火車去列宁格勒。明天我就要和薩尼亚会面了！我的脑子里翻来复去地想了許多事情，什么都想到了。我大概是坐上了一节老旧的車箱，車箱一路上吱嘎吱嘎地响个不停，但我一夜都睡得很香甜，很安稳。我睡醒以后，就开始幻想起来。我感到幻想的滋味非常美妙，鉄輪单調的声音和邻床旅客梦中的呼息声仿佛是响在千里之外！我把生活中的事，不管能成的也好，或不能成的也好，都安排得多么如意！我覺得什么事情——甚至連我的父亲还活着，我們会找到他，一同回来，——都可以作到，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事。可是我这时的心情是那么舒暢，那么宁静，所以也就放任自己这样想象了。我好象是暗自命令我們要找到他；他不是站在那兒嗎，白发蒼蒼，身板笔挺的，現在应当讓他睡着，要不然他会因为激动和幸福而神經失常的。

車厢搖晃着，吱吱軋軋地响，好象是一曲节奏均匀，声音宏亮，只有开头永无結尾的乐章。我一直在等待着，下面是什么呢？可是，这支乐曲又从头开始了。再想点什么呢？再命令自己作点什么呢？——要生活中最美好，最珍奇的。于是我想象着我們回来了，大家象欢迎一九三三年拯救了切留斯金号船員的那些飞行英雄一般在欢迎我們，当这些为众人所热爱，为众人所称道的英雄乘着复滿鮮花的汽車行进时，整个莫斯科都因鮮花，传

单和迎接英雄們的妇女所穿的洁白的服装而变成了白色。不过我这样希望并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薩尼亚和父亲。只有現在，在朦朧中，在車厢里，在車輪发出的节奏均匀，声音单調，只有开头的音乐伴奏下，才可以放任自己設想那最不可能的事情。

"特别快車"到达列宁格勒的时間是十点二十分。邻舖的旅客們早已去过道抽烟了，他們大概是等我穿好衣服出去。可是我仍然躺着，仿佛害怕以后会很久都不可能重温現在这样美妙的，兒童般的心理状态。

我們約定要薩尼亚的妹妹（为了和我的薩尼亚有所区别，我在信里总是称她薩沙）到車站来接我。"如果我身体不舒服的話，"她信里写道，"就讓彼加去接您。"她不止一次隐約地提到自己身体不好，可是这些信里又充滿了快乐，还带着插图，所以我对于她所說的身体不舒服沒有給予任何重視。但我也有些兒怀疑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兒。有一封信里，画着彼加一手拿書，另一只手抱着一个嬰兒，眞也奇怪，他們的模样兒竟十分相似。

大家已經穿好大衣，戴上帽子站起来了，邻座的客人帮我把箱子从擱架上取了下来。箱子很重，因为我把所有的东西都带上了，甚至还带上了几块很有趣兒的岩石标本，仿佛我已經預感到长时期不会回到莫斯科去了似的。我心里很激动，列宁格勒到了！——在万头攢动中，突然看到站台了。我立刻开始找司考伏罗得尼可夫家的人，可是等站台已經跑到后面去了，还沒看見他們，我失悔在电报里沒有把車厢号碼告訴他們。

搬运員把我的箱子搬了出来，我和他站在一起，一直等到人都走完了，还是沒有看見司考伏罗得尼可夫。

"也許在进口的地方吧？"搬运員說道。

我們走到入口处，又等了足足半个鐘头，最后我終于断定他們拆烂污了。哪里有这样邀請朋友的，連接都不來接一下，并且他們也知道我是第一次来列宁格勒。

我迟疑了一会兒，考慮是不是先去旅館，但总有点兒不放心，因为这事毕竟出奇，所以我还是到司考伏罗得尼可夫家去了。

实际說来我还不太認識他們。我和薩沙是多年前在恩斯克認識的，以后，恐怕也只不过見了不到三、四次面。不过我們經常通信，尤其是媽媽去世后，我孤孤单单的一个人住在莫斯科那几年的沉痛的日子里，我們之間通信最多。她把薩尼亚信里的內容都告訴了我，甚至当他在巴拉紹夫，以及后来在北地城，他已經忘記了我的时候，她还是肯定地向我說他依然爱着我。

她是我过去的朋友，我毫不怀疑，等一会兒我們見了面的时候也会很亲热。她是我的朋友，何况她还是薩尼亚的妹妹。

我和彼加見面的次数也很少。在恩斯克的时候，他还是个細长条，头发乱蓬蓬的少年，經常作些出人意料的事；誰也沒有等他，他却突然来拜訪，然后又同样突然站起身来走掉了。他跟列宁格勒的一个剧团到莫斯科来过几次，經常跑来看望我，他除了稍微长大了些之外，依然还是那样一个匆匆忙忙，头发乱蓬蓬的，出人意料的人。

薩沙在有一封信里曾經把从車站到她們住的那条街卡尔·李卜克內西大道去的路程詳細地講过，并且还画了一个图。但是我这回仍然暈头轉向，我已經走到了涅瓦大街，还向一位彬彬有礼，戴夹鼻眼鏡的列宁格勒人打听：

"請問，到涅瓦大街怎么走？"

这是一件丢人的事，我对誰也沒有談过。

后来我挤上了电車，唯一能看出的一点便是这兒的街道比起莫斯科冷清得多。我下了电車，提着箱子一拖一拖地走着，这条街道也同样很冷清。哦，这不就是七十九号，“摄影艺术家柏林什登”的寓所嗎。

是在这兒。

我站在三楼的楼梯台上，搓弄着被这只該死的箱子勒得麻木了的手指。这时楼下的門砰地响了一声，接着便有一个身穿雨衣，手里拿着帽子的細长身材的人，三步并作两步地跳上楼梯，从我身边冲过去了。

“彼加，是您嗎？”

这时他脑子里大概根本沒有想到我，所以他停住脚，瞥了我一眼，沒发現我身上有什么值得他注意的地方，便作出又要向前跑的样子。可是一个模糊的記忆終究还是使他停下步来。

“認不得了嗎？”

“看，您这是說的什么，当然認得罗！卡佳，我是从医院跑回来的，”他很着急地說道，“薩沙昨天晚上入医院了。”

“您說什么？”

“是的，入院了。先到我們家里去吧。所以我們也沒有能够去接您。”

“她究竟怎么啦？”

“难道她写信沒有告訴您嗎？”

“沒有。”

“好，走吧，我把一切都告訴您……”

摄影艺术家柏林什登一家人对薩沙和彼加的事显然也很关心，所以穿得很考究的小个兒女人在前厅里一碰見彼加，便着急

地問道：

“喂，怎么样啦？”

他回答說什么也不知道，他們不放他进去。可是这时又跑进来一位穿得很考究的小个兒女人，她也同样很紧张地問道：

“喂，怎么样啦？”

彼加只好又对她詳細講了一遍，說他什么也不知道，他們不放他进去。

薩沙要生孩子，这就是她住院的原因。

“彼加，您干嗎这样着急？我相信一切都会很好的。”

他的房間里現在只有我們两人，他搭拉着头，聳着消瘦的肩膀，坐在我对面的圈椅上，一臉无精打彩，心神錯乱的样子，当我說一切都会很好的时候，他痛苦地咬了咬牙。

“您还不知道……她病得很厉害，她患流行性感冒，并且还咳嗽。她也說过一切都会很好的。”

他跳了起来。

“应該到加布里切夫斯基那兒去一趟。我已經打了电話，可是他說自己不太方便，因为他不在薩沙住的医院工作。薩沙是在雪列捷尔医院里。”

我这才知道加布里切夫斯基是平常給薩沙治病的医生。

“不，还是先到她那兒去吧。你想想看，流行性感冒！我相信一切都会平平安安过去的。”

他不知如何是好地看着我。

“怎么啦，彼加，淸醒淸醒吧！”我着恼地說道。

我一路都在責罵他，他这才慢慢地淸醒了。当我向他描繪了一个可喜可賀的場面——薩沙怎样抱着一个女兒或者兒子回

到家里来时，他甚至出人意料地笑了。

"您当然是希望生一个兒子罗？"

"哎呀，只要能快点生下来，哪怕生个蛤蟆也行！"

我不知道这是一所什么医院——彼加說很好，不过我觉得很奇怪，这所医院里竟連一間接待室也沒有，大家就站在楼梯口，这兒放着一道木栅栏挡住楼梯。有几个同彼加一样的，心慌意乱的年輕的父亲坐在长凳上，或者垂头丧气地走来走去，互相碰撞着。彼加本来也想坐到长凳上去，可是我拉着他上了楼。一位挺討人喜欢的女护士告訴我們說，最好趁教授巡廻診断完毕，从一科到另一科去的时候去走廊上找他。

我們終于截住了他，当彼加激动得連蹦带跳地扑到他跟前时，他只是眯縫起眼睛笑了笑。

他把我們領到自己的办公室。說来不免令人害臊，我們談了半个鐘头的話，我就觉得自己爱上了这个人。他长着一双善良的、天蓝色的眼睛，紧紧地握着彼加的手，向他解释什么样的情况应該担忧，什么样的情况不应該担忧。他特别易于使人发生好感。虽然他所講的并不都是些使人安心的話，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們听了却十分寬心。总而言之，教授是深信一切都会平安过去的，"虽然如此，但在这种情况下患流行性感冒，当然又添了一样病了"。在談到薩沙时，他說她眞是个好样的，他还很少見过这样的人。

我們怀着极其愉快的心情回到家里，这时候彼加才想起我刚下火車，他連茶都还沒請我喝一口。房門响了一下，我听到有人在走廊里說：

"彼加，算了吧，我們壶里的水还热着哩。"

但他沒有把茶壶提回来，他拉开書桌的抽屜，拿了錢便跑出

去了，虽然我一再发誓說我路上吃的东西还剩得有，什么也不需要……

这可真是艺术家住的房間，給人第一眼的印象就是这样。甚至可以明显地看出，这兒住着两位艺术家，而且住得很挤。或許还可以猜出来誰在什么地方工作，另外一个又在什么地方工作，哪兒是他們相互妨碍的地区。

靠窗戶的一张桌子是用制图桌改成的，虽然很朴素，可是洁白美观，毫无疑問这是薩沙的。另外一张桌子很脏，上面摆着一个模型，乱七八糟地扔着鉛笔，水笔，紙卷，毫无疑問，这是彼加的桌子。

从各方面都可以看出，他們过的完全是另外一种生活，和我根本不相同的生活。我突然感到我在莫斯科的生活，特别是最后一个时期的生活实在是太单調、太寂寞了。不过他們是艺术家，是有天才的人，而我什么天才也沒有。当然，我这种想法純粹是自寻苦恼，考虑这些事情也是白費力气。这时彼加回来了。

他很抱歉說房間沒有收拾，因为想不到薩沙会突然住院。这一来，我倒感覺有些不好意思，因为自己刚才就象个傻瓜似的站在窗前，也沒有趁这个时間把屋子整理一下……

"啊，我实在太餓了！我真是餓极了！"

于是，我們坐下来，一面吃茶点，一面談論着薩沙。

我还忘了說一件事，就是我們从医院出来的时候，曾經和一位見习护士約定，請她每隔一个鐘头把薩沙的情况用电話告訴我們一下。談这件事情的时候，彼加把身上所有的錢都給了她，——錢数大概相当可观，所以她脸上現出非常惊愕的神色，連忙把錢塞回来。現在是下午两点，她来电話了，說一切都很

正常。

"正常嗎？"彼加喊道。

"正常。"

"她自己感覚得怎么样？"

"正常。"

过了一个鐘头，她又挂电話来了，还是說正常。

"稍微有点兒呻吟，"她考虑了一下，又加了一句說。

我又听見刚才要彼加用他开水壶的那个人的声音，他恼怒地說道：

"彼加，不要发神經病。呻吟是什么意思？您想想看，难道您沒呻吟过嗎？"

这样繼續了整整一个白天。傍晚的时候，我怯生生地說，要是能出去走走，看看列宁格勒城那該多么好。可是一看到他那付愁眉苦脸，恐怖的样兒，我就留在家里了。

"我来給您解解悶兒，好嗎？"

于是他便把自己最近的作品——普希金一百周年紀念象的草图拿出来給我看。画面上的普希金在涅瓦河畔迈着大步，迎着风，身上穿的大衣为风卷起，脸上的表情固执而振奋。这是青年时代的充滿浪漫情調的普希金，他酷似一个黑人，正沉湎在冥想之中，隐隐地透露出一絲高兴的样兒。

"喜欢嗎？"

"很喜欢。我还不知道您在搞雕刻呢。"

他开始解释自己是为什么搞起雕刻来的。后来突然又把話題扯到在莫斯科举行的，有拉斯克尔和卡巴布兰卡两人参加的象棋比賽会，然后又談到国际局势。在这当兒他还是一直在傾听电話鈴响了沒有。他无論講什么事情，哪怕是談意阿战爭，口

里都离不了薩沙，薩沙……

八点鐘的时候，見习护士不知为什么沒有来电話，因此我們又跑到医院去了一趟，又說了一番話，这次是和那位建議我們趁教授巡廻診断之后去找的那位可爱的护士談的。总之一切都很好，至于見习护士沒有打电話的原因，只是因为她感到不好意思这样頻繁地打扰我們。

我們回来后，彼加就介紹我和攝影艺术家的家庭，和他那矮小，文雅，鬢发斑白的妻子，以及同样矮小，文雅，鬢发斑白的他妻子的妹妹認識。因为某种原因，主人經常住在莫斯科，不过她們把他的相片給我看了，他原来是一个仪表堂堂的美发男子，穿着一件天鵝絨的短外衣，眞是一位名符其实的攝影艺术家，甚至称他为艺术家倒比攝影家也許更恰当些。

到夜半一点多鐘的时候，他們讓我到薩沙的床上去睡。彼加說他还不想睡，便拿了一本書在电話机旁安頓下来。見习护士的电話現在来得很准时，但每一次都要先告罪說打扰了。我听了这样的一次談話之后便睡着了。好象睡了一会兒功夫，便听得有人急速而短促地敲着墻壁，我慌忙跳起来，不知道自己是在什么地方，发生了什么事。走廊上有亮光，从什么地方传来說話的声音，好象是几个人在爭先恐后地高声講話。这时我由睡梦中醒来，看見彼加象一个細长的怪物似的跑进了房間，手舞足蹈地跳起舞来……

随后他隔着桌子探过身去，想把什么东西从墙上取下来。

“彼加，您到哪兒去啦？发生了什么事？”

“男孩！”他嚷道。“男孩！”

所有的东西都摺到地板上了。原来他是想把墙上那张嵌在

笨重相框里的相片取下来，他起先跪在桌子上面，現在又在上面走来走去，极力想鑽到墻壁和相片中間去。

"薩沙呢？薩沙怎么样了？您发疯啦！您取这张相片干甚么？"

"我答应过罗莎莉·納烏莫芙娜，如果一切都平安无事的話，我就把这张相片送給她。"

他从桌子上爬下来，吻了吻我，激动得流下了泪。

9 相　逢

一切經过比預期的要好出千百倍。第二天早上，我們就給薩沙送去了信、糖果和一籃鮮花，这是花店里所能找到的最大的一籃鮮花。当我們把这些东西送去的时候，服务員不禁惊訝地叫了一声："哦喲！"还有値班护士也惊叹說："哦喲！"

一切都平平安安过去了，可是被我昨天爱上的那位教授却似乎有点不滿意。不过这也可能只是我的感覺而已。不知道为什么，他們还沒有把薩沙轉入病房。但最后还是当着我們面把她轉去了。我們托那位給我們打电話的見习护士去看她。这位見习护士捎回来了一张她写的便条。

亲爱的彼加，象你象极了，鼻子也是那么大大的。我不是說过一切都会很好嗎？卡佳，亲爱的，讓我吻你，吻你。謝謝你們送来美妙的鮮花。不需要送这么多的东西来。向柏林什登一家問好。你們的薩沙。

我讀了这张便条以后，甚至想痛快地哭一場。也許我眞的哭了。这时有人在会客室里問現在是几点鐘，原来差一刻就十

点了。

于是，我告别了极不願意离开这座房子的彼加，独自到車站去了，因为从穆尔曼斯克来的火車十点四十分鐘就要进站。

我发覚过去每次和薩尼亚久别重逢时，都会突然产生一种奇怪的失望的感覚。我把这次会面的情形想象了千百次，似乎再沒有比我所感受到的更加甜蜜的了。在莫斯科的那一次，薩尼亚从北方来，我們在大剧院門旁見面时我的感覚就是这样。在那一次，我覚得应該是发生什么不平常的事，发生天翻地复的大变化了。可是除了使我們倆后来都为这次会面而感到惋惜之外，什么事也沒有发生。

現在来到車站上，我驟然对这种感覚害怕起来了。其他人也和我一样，到这兒来接人，搬运員向列車跑去，一个鬍子花白，肮脏，相貌奇丑的列車主任为了点什么事情正在粗暴地罵一个乘务員。

但我知道这种感覚是会消失的，因为我們这次完全是另外一种会見……

列車到了，站台上刹时間騷动起来。接客的人并不多，但我还是离开大家远远的，好讓他一下子就能够发見我。我表面似乎很鎮靜，只是感覚得这一切过得太慢——火車慢騰騰地接近月台，第一批旅客慢騰騰地从車扶梯上走下来，而且慢得出奇地向我走来。一批一批地走过去了，可是独独沒有薩尼亚。旅客还在走，因为沒有他，我的心都开始要滚出来了。他沒有来。

“卡佳！”

我轉身一看，他站在第一节車厢旁边。我連忙向他跑去，一面跑着，一面感覚得我內心的一切都因为激动和幸福在顫抖着。

我們也同样緩慢地沿着月台走，因为我們不时停住脚步，想多看对方一眼。我不記得在最初的一会兒我們都談了些什么話。蘭尼亚很快地发問，我連听都沒有听清楚就回答。后来，我談到薩沙，我們又停了下来——这次停的地方很不好，所以一下子就被人挤得东倒西歪，——我們談了很久关于薩沙的事。

"彼其加怎么样？他大概把全列宁格勒都鬧翻了。他眞是个神經病。啊！我多久沒有看到他們了！"

薩尼亚說，他住在旅館里比較方便一些，所以我們就先到"阿斯多里亚"旅館，然后从旅館里打电話給彼加，先挂到家里，再挂到医院。医院里的人都知道他，說他买罌粟餅去了。

"什么？"

"罌粟餅。"

"买罌粟餅去了，"我疑惑地說道，一面把电話筒挂上。

薩尼亚捧腹大笑起来。

"这是他想起了薩沙爱吃罌粟餅，"他解释道。"她一向就喜欢吃罌粟餅。啊！眞可笑！他还說'傻小鬼'嗎？'傻小鬼'和'可笑'是他过去的口头禅。你在看什么？"

我在看他，因为我喜欢他，我实在太喜欢他了。我們又整整一年沒有見面了，但是很奇怪，我倒覺得我們比分别的时候更要亲近了千百倍。不知道为什么，我覺得他在这一年中长高了一些，胸膛和肩膀也寬了。他的輪廓已經定型，面部，特别是下顎和嘴上的綫条变得更坚决，更有力了。他已經不再象一个孩子，現在似乎也不能再說他結婚还早这样的話了。他虽然把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的，人也老成了些，但头上还是和过去一样，直挺挺的竪着一綹头发。

"我簡直都要忘記你这付漂亮的模样兒了，"他說道。"很奇

怪，但不知道为什么，我在那兒总感到不太好。”

“那么在这兒呢？”

他吻了吻我，我們又給彼加打电話。

这一次他在家里。当我告訴他說薩尼亚就站在我的旁边，現在正从我手里把話筒拿过去的时候，他便在电話里瘋狂地吼叫起来。他們乱七八糟地嚷了很久：“喂，老家伙，怎样？哈！”互相罵“傻小鬼”。后来薩尼亚問他买到罌粟餅了沒有，一面笑得喘不上气来，用手势告訴我說他沒有买到。最后他們約定讓薩尼亚到医院去，一起去碰一碰运气，也許能見着薩沙。

“我呢？”

他又拥抱了我一次。

“我到哪兒去能沒有你呢？”他說道。“老兄，現在先結束吧。好啦，好啦！”

他又象那次我在火車上送他时那样悄悄地問我：

“你爱我嗎？”

“唔，唔。”

医院里当然还是不允許我們去看薩沙，但我們又递了一张便条給她，并且收到了回信。这一次她請我們把彼其加管束起来，因为他使所有的人都膩味他了。她还說，她想和我們一块兒散散步，最后又問我們吃过飯了沒有，如果还沒有，就把她的丈夫也带去，因为“如果沒有人提醒他的話，他可以两天两夜都不吃飯”。

飯沒有吃成。薩尼亚要到北极研究所去，我就去送他；不仅因为我心里願意去送他，而且也因为我們需要抽个机会談談那促使我們能在列宁格勒会面的事情。我最后写的几封信他还沒有收到，所以他不知道“巴赫图索夫”要經过馬托奇金—沙尔，然

后繞过北地島，直往良霍夫斯基列島开去的消息，这是刚刚才决定的。

“这有什么呢，这样我們的时間就会更充裕，”薩尼亚說道。“最使我耽心的就是时間問題。”

我們又談起搜索队的人选問題，他說他推荐了迪克逊的一位报务員，还有伊万·伊万諾維奇医生和他自己的机械員卢利。他从北地城写給我的信中常提到卢利。

“他是一个很好的报务員。你知道是誰嗎？”

“不知道。”

“柯尔津金，”薩尼亚郑重其事地說道。“就是他。”

我承認自己还是头一次听到过这个人，于是薩尼亚就解释說，柯尔津金是跟阿姆生到过南极的两个俄国人当中的一个，阿姆生在他所写的書中甚至还提到过他。

“好极了，对不对？第五个人是我。第六个人就是你。我是把你作为船长的‘女兒’推荐的。”

“眞是这样嗎？不过我以为我有权利参加这次探险，不仅因为我是塔塔林諾夫船长的女兒。怎么你眞是这样写的：职业是女兒嗎？”

薩尼亚有点不好意思起来。

“怎么啦？”他低声問道。“这有什么希奇。这件事作得不怎么高明，是不是？”

“很不高明。”

“不过要不这样的話，就好象我是为了自己的妻子在张罗似的。多么难为情。”

“薩尼亚，我根本沒有求过你帮忙，”我平心靜气地說道。“什么女兒，妻子的！我还是侄女兒，孙女兒哩！薩尼亚，我是一个

老地質工作者，因此我請求北方航务总局局长把我作为一个地質工作者，而不是作为你的妻子編在探险队里的。何况我現在还不是你的妻子，如果你以后再有这种愚蠢举动的話，那我就豁出来跟别人結婚。我們不是还沒有登記嗎？”

他急得眼睛一眨一眨的，很难为情地强笑着，然后又摘下軍帽用手擦了擦脑門，我这时甚至又有点可怜起他来了。

“卡佳，請你原諒，說良心話！”他嘟嘟囔囔地說道。

虽然这时我們已經站在院子里，站在北极研究所大楼的前面了，但我还是迅速地吻了吻他，然后說道：

“祝你成功。”

他答应六点鐘以前打电話給我，如果来得及的話，就到彼加那兒去一趟。

10 夜

他回来的时候不是六点，而是将近十一点了，到的地方也不是彼加那兒，而是“阿斯多里亚”旅館，并且要求我們立即到他那兒去吃晚飯，因为他連午飯都还沒有吃，餓得象个餓鬼似的，而一个人吃飯又覚得悶得慌。

可是彼加經过这样紧张的一天之后已經累垮了，再加上他为了提神还喝了些俄斯克酒，現在正躺在沙发上，瞪着一双昏昏欲睡的眼睛，加上他那个蛮生生的鼻子和那付不相称的手脚，活象一个彼得魯什加[①]。

① 彼得魯什加是俄国民間木偶戏中的一个主要角色。——譯者注。

……我和薩尼亚每一次会面的日期我都記得，不仅是会面的日期，甚至通信的日期我都記得。在凱旋路花园里会面的那一天是四月二日，在大剧院門前会面的那一天是六月十三日。这次他从北极研究所回来后打电話給我，我到他那兒去的这个晚上我一生都記得，是五月二十一日。

我們是从童年时代就認識的，因此我总覺得我对他的了解似乎比他对他自己的了解还清楚一些。但是他这天晚上的神情我从来还沒有看到过。当我們吃晚飯时，我甚至把这种感覺告訴了他。

方案已經全部通过了，在研究所里大家对他說了許多恭維話——这显然不是沒有根据的。他同那位根据“圣·瑪丽亚”号漂流路綫发現了一个島屿的符教授見了面，而且符教授待他非常好。他过去在列宁格勒这座美丽的大城市里住过，还在航校学习期間，他就爱上了这座城市。現在經过在北地城的一段宁静的生活之后，他又回到列宁格勒来了！一切都順利，事事都如意。

在他的脸上，在他的一举一动之中，甚至在他吃飯的时候都可以看出这种幸福，看出这种得意的心情！他的眼睛閃閃发光，他的举止坦率而又自然。假如我过去沒有爱他的話，那么这天晚上我也会永远不变地爱上他了。

我們沒有止境地吃着东西，后来因为我說我还沒有来得及好好地看一看列宁格勒，薩尼亚就兴奋了起来，說他要“亲自带我去看这座城市”，于是我們就出去散步了。

这时已經两点多鐘，本該是夜間最黑的时候，可是当我們走出“阿斯多里亚”旅館时，天色是那样的明亮，我故意在果戈理大街上停下来讀一讀报紙。

多么美妙的白夜！但薩尼亚却說他对白夜并不感覺希奇，列宁格勒的白夜之所以美，就在于它延續的时間不超过半年。

我們从总参謀部的大拱門下走过，一个宏伟空曠的广場立刻展現在我們面前。这个广場也不是特别大，然而寬敞开朗，又很紧凑，不象莫斯科的一些广場那样大得沒有个遮拦。但遺憾的是我还不知道这是一个什么广場，薩尼亚只得簡短地給我上了一堂关于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七日的俄国历史課。

然后我們沿着哈尔都林街——我是借一所房子的灯光看出这条街名的——走去，在列宁格勒博物館前一些用肩膀扛着大拱門的巨人象前站了許久。我不知道薩尼亚的感覚怎样，我却是怀着体貼的心情瞧着他們，仿佛他們都是活人，——他們显得那么吃力，不过样兒还是很好看的。

后来，我們走到河边。这兒才說得上是眞正的白夜，旣非白昼，又不是黑夜，旣非黎明，也不是黃昏。軍医学院大楼的上空呈現着一片片深蓝色，淡蓝色，黃色，橙紅色，——仿佛世間所有的顏色这兒都应有尽有了。而彼得罗巴甫洛夫城堡上空又全然是另外一种霧蒙蒙的鉛灰色。它們之間的顏色相差得那么远，簡直使人不能相信这是一个天空。我們先朝城堡和城堡上面的天空看了很久，然后，猛然轉过身来看軍医学院和学院的上空。这就好象是从一个国度倏然跨进了另一个国度一般；从一个靜止不动的，灰色的国度跨入了一个美丽的，生气勃勃的，色彩瞬息万千的国度。

我穿得很单薄，感到有点冷，薩尼亚披了一件斗篷，于是我們倆一同蜷縮在里面，默默地擁抱着坐了許久。

我們坐在涅瓦河岸紧靠水面的坡道旁一张半圓形的花崗石椅子上，隐隐約約可以听見下面浪花拍打着石岸的声音。

我无法表达自己在这天晚上是多么幸福，心里感到多么舒服！我們終于在一块兒了，現在永远也不分离了。再也不需要向对方証明什么，也不需要象我們过去那样总是拌嘴了。我握着他的手，握着他坚硬的，寬大的，可爱的手吻了一下，他也吻了吻我的手。

我不記得在这天晚上我們还在哪些地方蹓躂过，只記得我們怎样也舍不得离开涅瓦河。那天蓝色圓屋頂和一高一矮的两个塔尖的清眞寺总是聳立在我們前面，我們不停地向它走去，可是它象个幻影似的总是躲閃着我們。

清道工已經在打扫街道，悬挂在維波尔格斯克上空那巨大的，黃橙橙的太阳已經升得相当高了，尽管我們舍不得和这个夜晚分別，可是它已經逝去了。这时薩尼亚突然决定，应該立刻給彼加打电話。

“我們問問他，”他笑着說道，“問他这天晚上打算怎样过。”

但我劝他不要打电話，因为电話装在前厅，这样会把摄影艺术家柏林什登一家子吵醒的。

“这一家人很可爱，天不亮就把他們吵醒，这簡直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

我們終于走到清眞寺了，薩尼亚在清眞寺旁叫了一輛出租汽車，我們忽然覚得坐在出租汽車里很舒适，因此薩尼亚又劝我先到島上去玩一趟，然后去彼加那兒。不过他今天还有很繁重的工作，所以我希望他先回去，哪怕是稍微睡一会兒也好……

于是我們就回到“阿斯多里亚”旅館，动手煮咖啡。薩尼亚总是把咖啡壶和酒精爐带在身边——他是在北方开始嗜好起咖啡来的。

“生活居然这样美滿，眞是太可怕了，对嗎？”他說罢便把我

拥抱住。"你的心跳得多么厉害呀！我的心也是，你摸摸看。"

他拿起我的手貼在他的心口上。

"我們太激动了，真可笑，对嗎？"

他自己也不知道他在講些什么話，由于激动，他的声音突然完全变了……

都快到下午一点鐘了我們才去司考伏罗得尼可夫家。矮小文雅的老太太給我們开了門，她說彼加不在家。

"他到医院去了。"

"这样早就去了？"

"是啊。"

她的脸上显出慌乱的样子。

"出了什么事嗎？"

"沒有什么，沒有什么。他給医院通了一次电話，他們告訴他說亚历山大拉·伊万諾芙娜感到有点不舒服。"

11 妹　　妹

一直到現在，每当我回忆起这几天，便有一种无能为力和抱恨終生的痛苦的感觉。我們每天到雪列捷尔医院去三次，在那挂着体温报告表的小玻璃公告栏前一站就是好久："司考伏罗得尼可娃——37、37.3、38.2、39.9。"但这幷不象我从前在学校里所患的那种簡单的肺炎，第九天上一度有过危险，后来体温就下降了。就象教授所說的那样，这是一种可詛咒的"蔓延性"的炎症。有几天她的体温几乎完全正常了，这时我們总是兴高采烈地走回来，开始等待着薩沙回家。摄影艺术家的妻子罗莎莉·納烏

莫芙娜說她也患过肺炎，这种病比起她的姐姐貝尔塔所害的潰烂性肋膜炎来那眞是微不足道的。彼加又談起了他的雕刻工作，有一次我甚而說动了他，讓他陪我一块兒去列宁格勒博物館。但第二天早上，我們又默默地站在小玻璃布告栏前，一遍又一遍地看……我发現彼加有一次閉起眼睛来，又迅速地睜开，就好象作孩子的时候，以为一睜眼就能看到完全另外的一种情形。可是他所看到的还是和我所看到的，也是我們希望不要再看到的一样："司考伏罗得尼可娃——38.1，司考伏罗得尼可娃——39.3，司考伏罗得尼可娃——40。"

接連三天她的体溫都保持着四十度，后来急剧下降，在几个鐘头之內，重又上升，这次一直升到40.5°。我相信这不是肺炎，就瞞着薩尼亚跑到教授寓所里去找他。但他确信診断的結果——病症听得很淸楚，不是一处，而是好几处，两边的肺上都有。他說这病不屬于他这部門治疗，薩沙已經由內科医生診視过了。

"到底怎么样?"

"流行性感冒轉肺炎而复杂化了。"

我知道他一天看視薩沙的次数不下一百次。总而言之，医院的人对她都很好，但我还是問他，是否需要再請一位內科医生来。

"或者就請加布里切夫斯基来罢?"

"当然可以，我亲自来給他打电話。"

但是薩沙經过加布里切夫斯基診視后，体溫仍然沒有下降。

我在这些日子里几乎沒有看見过薩尼亚。他只是偶而在夜間来一次电話，再就是我到研究所一間为了装备搜索队而騰出来的小屋子里找过他一次。他坐在桌前，桌上堆满了武器，照

相机，手套和皮袜子。一个穿着皮大衣，满面鬍鬚，样子很严肃的人在装配桌上的双筒枪，口里不住地駡着，說枪筒和枪托配不上。

“喂，她怎么样啦？你看見她了嗎？医生講了些什么？”

电話鈴不停地响，最后他拿下話筒来，憤憤地把它扔到桌子上。

“总是那一套。”

“体温呢？”

“今天早晨是四十度二。”

“見鬼！难道就什么办法也沒有了嗎？”

他这几天消瘦了許多，样兒十分焦灼，疲憊，总之，他已經不象他自己，特别是不象他第一天来时的样子了。

“看你瘦成什么样子了，沒有睡覺嗎？”他問道。“我不明白，究竟情况怎么样？”

“沒有直接的危险。”

“什么？”

“加布里切夫斯基說，沒有直接的危险。”

“去他們的吧！”薩尼亚怨恨地說道。“連人都治不好！我知道她本来是很健康的，她从来也沒害过什么病。”

我說現在大約要有好几天不能和他見面，因为他們已經答应讓我值班看护薩沙，从今天晚上起我就要搬到医院里去。他握住我的手，感激地看了看我。后来他把我送到門口，我們就分别了……

她躺在床上，眼睛望着天花板，間或舐一舐焦干的嘴唇。她沒有立刻認出是我来，也許是因为我戴着白帽罩，穿着白罩衣的

关系。但我認为她开始是把我当成了另外一个人了。

她显然已經很久沒有睡覚，对一切事情都錯乱了，早晚也分不清，对于她說来，时間仿佛也已經是不存在了。

她那黝黑的脸色現在变得蒼白了，两只眼睛深深地陷下去，在她寬闊的脸庞上那种韃靼人的神色更加明显了。她一向就有点兒輕微的斜視，过去，这对她說来甚至是很相称，賦予她一种天然的，可愛的媚态。可是現在不知道为什么，特别是在晚上，她那艰涩斜睨的目光往往会使我突然駭怕起来。她直着身子坐在床上，脸色又黑又白，两条辮子搭拉在胸前，一句話也不說，我費尽力量也沒能把她劝得躺下去。有一次，薩尼亚也在場，她的样子使他想起了母亲，所以他发了半天呆，好久沒有恢复过来。

我几乎从来沒有护理过病人，特别是象薩沙这样病势沉重的人，可是我現在学会了。这种工作是很困难的，因为薩沙差不多根本就不睡覚，或者睡不多一会兒，馬上又醒了，同时还需要經常注意她的呼吸状况。

也有那么几天，生命以其无比的活力又回到她的身上。我記得有这样一天，这是我搬到医院后的第四天。她一夜都睡得很好，早上醒来說要吃东西。她喝了点牛奶茶，吃了一个鷄蛋，当我們为了使病房透透风，严严实实地把她盖起来的时候，她还突然說道：

“卡琴加，你一直陪着我嗎？夜里也是睡在这兒嗎？”

大概我这时脸上肌肉微微抖动了一下，她惊异地看了看我。

“你怎么啦？我病得很厉害嗎？是嗎？”

“薩申加，我們現在要开窗戶了，你好好地躺着，别說話，好嗎？你前些日子是在生病，不过現在漸漸复原了，一切都会很好的。”

她乖乖地不說話了，只是当我用香醋給她擦脸和手臂时，她抓住我的手握了一会兒。后来嬰兒送来了，我們仔細地观看他吃奶的样子，他睜大了眼睛，以一种認真的，莫名其妙的神情吃着。

“很象他，对不对？”薩沙戴着面罩，問道。

她很高兴嬰兒能象彼加。也的确是如此，虽然他生下来总共才不过十天，可是已經有个輪廓了，也給人一种細长的感觉。不过我覚得他象薩尼亚，——不是象他的母亲，而是象我的薩尼亚；他吃奶的模样兒就有一种不顧一切和坚决的劲头！

“彼加怎么样？他很着急吧？我今天作了一个梦，梦見他来了，就坐在这兒，在这間屋子里，可是他們却把他藏起来不讓我看見他。我明明看見他了，瑪丽亚·彼得洛芙娜却硬說他不在。”

瑪丽亚·彼得洛芙娜就是那位見习护士。

“他就坐在你現在坐的这个地方，一句話也不說。他沒法說話，因为他們把他藏起来不讓我看見他。天哪，我又忘記了，你还不太認識他嘛！”

“我覚得我已經和他認識很久了。”

“薩尼亚呢，你們什么时候走？”

“大概两个礼拜以后，我們的‘巴赫图索夫’号还在修理。要到六月底才能出塢。”

“塢是什么？”

“我不知道。”

薩沙笑了起来。

“你們眞是幸福，美滿呀！”

我們談了大約整整一个鐘头，順便还談到彼加的“普希金”。薩沙說她也覚得这件作品很好。

“他的精力很分散，”她愁悶地說道。“他現在在搞雕刻，起初我是不贊成的，但他在繪画方面也这样。”

她又回想起我們在恩斯克認識的情形，那次我去她們家作客，达莎阿姨評論我說：“还不錯，挺討人喜欢的。长得可真漂亮，就是有点愁眉不展的样子，身体也滿健康。”

“达莎阿姨在什么地方？”我問道。“她为什么沒有来。这是生头一个孙兒，可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呀。”

“难道你还不知道嗎？她病得很厉害，她的心脏很不好，不久以前，医生还囑咐要她休息半年。我和彼加常去恩斯克，差不多每个夏天都去。”

她說話还很費劲兒，常常停下来喘息。但无論如何，已經和昨天大不相同了！她已經好得多了。

“法官呢？”

“哪位法官？”

“看你，我們的法官唄！”

她对我說，司考伏罗得尼可夫法官——彼加的父亲——已經荣膺“光荣”勋章了。

“恩斯克那个地方很好，对不对？”她沉默了片刻說道。“你們能去嗎？”

“当然要去！”

等医生巡廻診断以后，彼加就直叫我出去，我飞也似地跑去告訴他，說薩沙已經好多了。就在这当兒，接待室里发生了一件事：一个穿斜領衬衣，戴着鴨舌帽的青年和彼加一起在等候巡廻診断的結果。因为每天早上他經常和我們同时到医院里来，所以我对他很面熟。我們知道他看望的病人姓阿列克塞耶娃，她的体温也很高；整个布告栏內只有她和薩沙的温度最高。当我

和彼加站在接待室里的时候，突然一位护士走出来，急促地向他說道：

"您是来看阿列克塞耶娃的嗎？去吧，去吧。"

这时我們听見她低声对更衣室的值班女工說道：

"快点把罩衫拿来……也許，他还赶得上見一面。"

这眞是可怕。他竭力克制住自己不看任何人，匆匆忙忙地穿罩衫，可是总也套不到袖子里去，到最后，护士乾脆就把罩衫象外套似的給他披在肩上了。

我們仍旧繼續談話，但彼加这时再也沒有听我談什么了。他脸色突然变得蒼白，我不由得抓住了他的手。

"您怎么啦？"

"沒有什么，沒有什么。"

我扶住他坐下来，便跑去找开水。他暈了。

这天我和內科教授談过話，他停止使用强心剂了，并且說"我們給薩沙服的藥太多了"。他临走的时候說，最近他看到一种治疗肺炎极为有效的新藥——二基膦胺，这是不久前一个科学家发現的。

到傍晚时，薩沙的病势又有点加重，但我并不十分慌张，因为她的病况到晚上一般总是要轉坏的。我拿着一本書紧靠在床头柜上的台灯閱讀着，我把头巾搭在灯罩上，不讓灯光影响病人的安宁。薩尼亚在前一天寄了几本書給我，現在我还記得当时讀的正是斯梯芬逊著的"好客的北极"。我参加探险队的事已經最后决定了，而且是以地質学家的身分参加的。符教授被任命为有关科学研究方面的領导人，再过几天，我就要去謁見他。当然，我并不隐瞞，暫时我对北方的知識还很有限。薩尼亚寄給我的都是些基础書籍，毫无疑問必須把它們从头到尾很好地讀一遍。

約摸在两点多鐘的时候，我站起来想听听薩沙的动静，我看見她睜着两个眼睛躺着。

"薩申加，你怎么啦？"

她沉默了一会兒。

"卡佳，我要死了，"她低声說道。

"你快要好了，今天就已經好多了。"

"其实这并沒有什么可怕，只是一想到孩子，就覚得可怕极了。"

她的眼眶里充滿了泪水，她竭力想轉动一下头，把眼泪擦在枕头上。

"他将来能进大学嗎？"

"薩申加，你别胡思乱想了，进什么大学？"

我替她擦乾眼睛，吻了吻她，她的前額烧得滾燙。

"他进了大学，那时我就要認不得他了。彼加怎么沒有来呢？他們为什么不讓他进来？他們有什么权力不讓他进来？他們以为我看不見他嗎？这不就是他，这兒！这兒！"

她想要坐起来，但我阻止了她。这时見习护士来了，我讓她去取氧气面罩……

从这天晚上起，恐怖的事便开始了，眞叫人怎么說是好呢！

每一小时都給她注射一次樟脑，她不用氧气面罩能够呼吸的时間愈来愈短。体温逐漸下降，无論樟脑还是强心剂，对心脏都已不起作用了。她躺在那兒，指头发青，脸色变得象黃蜡一般。尽管如此，人們还是尽力地摆布着这可怜的，受尽折磨，遍体鱗伤的躯体。

我不知道这样的情形繼續了多久，大概很久，因为这已經是又一天晚上，一个我过去从来未見过的新来的医生从病房里輕

手輕脚地走到走廊上向我們走来。我們——薩尼亚、彼加和我站在走廊上。不知道为什么他們要把我們从病房里赶出来。这个医生在門口站了一会兒，然后慢慢地朝我們走过来。

12 訣　别

人死而方为世人所知！在美术学院的追悼会上，我听到大家的講話时，心中便暗暗想道，薩沙生前大家对她說的好話恐怕連死后說的一半也沒有。

灵柩放在台上，周围堆滿了花，以至于她那蒼白的脸孔在鲜花堆中都快要看不見了。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称她作“你”，說“她是一个优秀的艺术家”，“优秀的苏維埃人”，說“突然降临的死神横蛮地攫去了她的生命”等等。这些辞句和死者这张庄严肃穆的脸相之間相距多么远啊！

我感到身上很不舒服，費了很大的劲才支持到追悼会結束。經过了这一番无时无刻不在紧张的工作，全心全意的工作，竭尽全力想挽救一个最亲近的人的生命的工作之后，我覚得再也沒有什么事可作了。我現在是空閑了，我茫然若失地站在棺材旁。薩尼亚站在我的身边，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看他一会兒清晰，一会兒模糊。他目不轉睛地望着妹妹，他的脸色显得非常疲困，憤怒，仿佛因为她死了而在生气。

他把所有的事都办了——訂棺材，要汽車，料理事务，到民事登記处办手續，去公墓，最后又送我回“阿斯多里亚”旅館，通宵陪伴着彼加。現在他和我并肩站着，把妹妹看了又看，仿佛要把她看个够，以补偿这一生似的。我問他彼加怎么样了；他沒有

作声，只是指了指站在棺材架旁的人。

彼加的样兒还好，不过他那蒼白的，冷漠的面孔使我感到惊奇；他好象是在耐心等待着这一套冗长的仪式的最后結束，仿佛仪式結束后薩沙就会重新和他团聚，一切又会美滿了。司考伏罗得尼可夫老爹是前一天赶来参加葬礼的。他站在彼加身后，眼泪扑簌簌地沿着两腮滚落在他那茂密整齐的花白鬍子上。后来我眼前又是一陣模糊，再就不記得这天的追悼会是怎样結束的了。

大概是薩沙殯葬之后的第二天，或者是第三天，司考伏罗得尼可夫老爹准备回恩斯克去，特意来"阿斯多里亚"旅館告别。薩尼亚屋子里正好有客人，仿佛是負責送給养去阿尔汗格尔斯克的那位代理人，因此我們就到臥室里去了。屋子里到处堆放着棉衣，手套，背囊……探险队已經从北极研究所迁到薩尼亚住的旅館房間里来了。

我請老爹坐在床上，招待他喝咖啡。

"你們要走了吧？"他問道。

"是呀，現在快啦。"

我們沉默了一会兒。

"請原諒，我还不太認識您，"他說道，"不过关于您的情况我听到的很多，我一向把薩尼亚当作自己的亲生兒子看待，我从心眼兒里高兴他能和您結合。当然，这次薩沙的事情的确令人伤心……要不然也可以团聚一堂庆賀一番……但人生变幻莫测……"

他长叹了一口气，又重說了一遍：

"人生变幻莫测啊！……彼加对我說过，您很关心薩申加，我衷心地感謝您。"

我詢問达里亚·嘉芙里洛芙娜的健康状况怎么样。

“問題也就在这里，她的身体不好。医生不讓她起床。气喘起来可怕极了。要是她身体好的話，我們也就馬上会把孩子带回家去了。还有彼加，哪怕讓他到我們那兒住一些时候也好。可是現在不用說带孩子——我甚至都不敢想象回去怎么交代。要是她知道薩申加的事，她准死无疑，她把整个生命都寄托在薩申加和彼加身上了。”

他手里摆弄着一个用枪弹筒改制成的很旧的銅打火机，——大概是內战时期的紀念品，——我知道他这时心里在想什么問題。我在送殯后回彼得格勒街时自己也曾經考虑过这件事。

……白淨的，未曾油漆过的桌子空閑起来了，小巧的画笔和薩沙临死前未完成的一幅风格古老的工笔装飾画放在桌上，現在誰也不需要这些东西了。

“其实这并沒有什么可怕，只是一想到孩子，就覚得可怕极了。”她好象是要把小兒子托付給我。如果她临死那一刻还清醒的話，她也一定会恳求我作这件事。

13 小彼加

我們决定在六月中旬出发，我和孩子在一起的时間只剩下两个星期了。对于一个生下来总共才两星期的嬰兒說来，这个时間也不算太少。我現在想起来都好笑，当我和彼加到医院抱他时，我不仅不敢把他抱在手里，甚至連輕輕碰他一下都害怕。当护士講解应該怎样照料嬰兒，并且用手把他高高举起时，我不禁吓得惊叫起来。她用一只手把他托在空中，嬰兒呱呱地大声哭起来，可是她却冷靜地說道：

“可以增大肺活量。”

奶瓶要用滚水煮，每隔三小时喂一次奶，隔一天洗一次澡，她的这許多規章条令攪得我的头都暈了！最后，不管这件事有多么可怕，我还是把嬰兒包裹好，抱到手里了。我的动作大約是过份小心了，所以护士笑道：

“大胆一点兒，大胆一点兒。”

我白天黑夜地忙：一会兒要換垫布，一会兒要喂奶，一会兒要洗澡，一早一晚我还得去医院取母乳，总之一句話，麻煩的事情非常之多。但說也奇怪，我却愈来愈难以設想，不久以后，晚上就不能給嬰兒洗澡了，——他很喜欢洗澡，躺在澡盆里时那付神气十足的样子活象个小皇帝，——不久以后，再也不会因为应不应該給孩子橡皮奶头吮的問題而和罗莎莉·納烏莫芙娜爭吵不休了。

自然其他的事情什么也沒有改变。巴什基里亚地質局給我寄来了出差証，准許我在北极研究所工作一年，符教授也召見了我，我們詳尽地討論了高緯探险队的地質工作任务，因为我那时对北极的地質情况还一点兒也不了解，所以对有些問題感到很棘手。

“好客的北极”一書我已經讀完了。困难是很多的，因为我是在每天夜里，时而睡去，时而醒来的条件下閱讀的。还記得当时我怎样也不懂为什么說北极好客，据我看来它并不怎么好客。

每当我拿起書本的时候，孩子就“呱呱”地哭。仿佛他也預感到我就要走了似的。

早就該考虑考虑我走后如何安排孩子的問題，我不止一次地和彼加談起这件事，可是他总是低着头，默不作声地听我講，

一句話也不回答，样兒十分頹唐，这次可悲的事情把他完全毁了。

“要保姆干什么？”他有一次这样問道。我当时就明白，他看到这間屋子里有一个生人心里会很难过的。

不管我怎么劝他，他还是一点东西也不吃。不知道他把便帽丢到哪兒去了，大概是丢在街上，但总是在家里找来找去。他对嬰兒連看也不看一眼，这种态度使我感到特别地惊异！但有一次天快亮的时候，我正抱着書打瞌睡，突然一陣子悉悉索索的声音和嘟嘟囔囔的声音惊醒了我。我听見有人在説：“可怜的，亲爱的小乖乖。”

彼加只穿了一件內衣，胸口裸露着，样兒瘦得可怕，站在小床前。他大睜着眼睛，带着一种病态的困惑神情注視着熟睡的嬰兒。当我問他：

“彼加，你怎么啦？”

他吓了一跳，慌忙离开了小床。他的眼眶里滿含着泪水，嘴唇顫抖着……

薩尼亚几乎每天都来，我总是一眼就能看出他的工作进行得是否順利，滿意不滿意。我們先談一会兒話，然后他就到走廊上去抽烟，为了免得他寂寞起見，我也陪同他一起出去。

有一次，孩子哭了，我把他从小床上抱起来，在房間里来回走动，一面搖着嬰兒，一面輕声哼唱，这时他对我説道：

“瞧你……”

“怎么啦？”

“不怎么，沒有什么。眞象个当媽媽的。”

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听了这話会脸紅。他笑嘻嘻地把我連孩子一齐抱住亲吻……

“我眞不知道該怎么办，”有一次，他滿臉困倦，忧虑的对我說道，“尽管我多方奔走，可是批下来的錢还是很少。錢少，所以时間也少。”

“这和时間有什么关系呢？”

“鷄毛蒜皮的东西买不买也要考虑几个鐘头。什么事兒都得通过会計室，眞是活見鬼！”

他一碰到心里煩躁的时候就咬嘴唇，这已經成了一种习慣。現在他又在咬嘴唇，他的眼睛黑溜溜，怒冲冲的。

“你不能帮帮我嗎？”他迟疑不决地繼續說道。“我知道你很忙。但是你要知道，現在哪怕把帐目整理一下也好。說良心話，我怕等不到出发就要被送进监牢了。”

第二天，我給罗莎莉·納烏莫芙娜留下了上千条注意事項，写下了每小时的工作——什么时候喂孩子，什么时候取奶等等，然后便到“阿斯多里亚”旅館薩尼亚那兒去了。我在他那兒呆了一天一夜，因为沒有我，他的确应付不了工作，甚至連离开一下房間都不行，平均每隔五分鐘就要来一次电話。

14 深夜的客人

契同志一次和我談話时，用了“患北极症”这样一个詞兒，只是現在，当我协助薩尼亚为搜索队搞給养工作时，我才完全理解到他这話的涵义。每天都有一些害这种不治之症的人来找薩尼亚。普君就是这样的人，他是一位老艺术家，是塞多夫的摯友和伙伴。当薩尼亚的文章在“眞理报”上发表后，他曾經热情地响应过，并且发表了一篇回忆录，叙述“圣·福嘉”号向大地島返航时，

在弗罗拉海岬碰見航海长克里莫夫的情形。

来客之中有一些是什么經驗也沒有的年輕小伙子，他們跑来恳求薩尼亚把他們安插在“巴赫图索夫”船上作司爐，当伙夫，总之干什么都行。

来客中有的是沽名釣誉的人，他們想找一条获得荣誉和光荣的捷径；有的是不为私利的幻想家，在他們看来，北极是一个充滿奇迹和象神話一般变幻莫測的天堂。

現在，当一切皆已改变，当往日的激情和忧虑仿佛是那样微不足道，甚而令人覚得可笑的时候，回想起当初这些来客，我总不免要想起一个只露了一次面的人。他象是深夜梦中的幻象，閃露了一下便消失了，我甚至过了很久还不知道他的名字，不知道薩尼亚在什么地方同他認識的。但就在这一刹那間，在我的脑海里突然涌現出一付将来的，而且也許还是最近的将来的情景。我好象洞悉了几年以后的事，我的心在收縮，我的心在发抖……

我沒有等到薩尼亚回来就把腿蜷在圈椅上睡着了，等我夜里醒来时，看見屋子里有一位陌生的人，这人是个海軍，不知道他是什么軍銜。薩尼亚半坐在桌子上画着薔薇花，他却在屋子里来回不停地走着。这个人生气勃勃，动作敏捷，留着哥薩克式的头发，生着一双墨黑的，嘲弄人的眼睛。

他們正在談一个很重要的問題，我連忙合上眼睛，假装睡觉。这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一面听人談話，一面打瞌睡，或者假装着是在打瞌睡，这样就可以免去介紹，梳头，换衣裳的麻煩。

“寻找塔塔林諾夫船长的事和北方航务总局的基本任务沒有絲毫相同之点，再沒有比这更容易証明的了。只消回想一下

寻找佛兰克林的情形就行了，沒有問題，这实在是一件荒唐的事。总而言之，人当然应該找，这样也可以把地图更正一下。不过，我要談的是另一回事。"

"另一回事"——这是指战爭，是指在北极，巴倫支海和喀拉海沿岸的战爭說的。我听着他的談話心里想，这可是一件新鮮事兒！

他手里拿着鉛笔，一面計算着在科拉半島上的矿藏数量，——这已經关系到我的工作了。这位深夜的客人把所有的和平的矿物都算作未来战爭中所必需的"战略原料"，我心里立刻就对他的意見加以反駁，因为我深信战爭是不会有的。

"……請您相信，"海軍同志急急忙忙地說道，"塔塔林諾夫船长非常了解，軍事意义应当是每一支北极探险工作队的基础。"

"显然他是了解的，"我心里立即說道，但自己仍旧处在那种可笑的假寐状态中。在这种状态下，旣能思想，又能說話，正如同旣不思想，又不說話一样。"不过战爭是不会有的！"

"……早就应該在我們商船队行駛的航路沿綫修建一些防御性的軍事基地……比方說在新地島吧，我看到那些十全十美的远射程炮連陣地心里就高兴……"

"算了吧！"我心里馬上就駁斥了他。"这是和誰打仗呢？和白熊嗎？"

但他仍然不停地講着。刹那間，我仿佛是从旅館这个夜深人靜的房間，也就是我蜷着腿半睡半醒地躺在圈椅上的房間，也就是薩尼亚用桌布的一角遮住了灯光，以免光綫照在我眼上的这个房間里轉移到了一个奇异的，被战火焚燒殆尽的城市。这兒一片寂靜，不过这是令人毛骨悚然，心神紧张的寂靜。大家都

象是在等待着什么似的悄声交談着，应当在黑暗中摸索，沿着潮湿的墙壁到地下室里去。我沒有去。我站在一所黑洞洞的空无一人的木房子的台阶上，在我的头頂上是一望无际的晴朗而神秘的天空。現在他在什么地方呢？在那可怕的，星辰滿布的太空中有一架飞机在飞翔，发动机吃力地喘息着，每一瞬間，結冰的机翼都在加重。这幅情景就会来临的，絲毫也不能变更的。发动机顫振的声音愈来愈瘖哑，飞机抖动着，再也听不到远方电台传来的信号了……

“不錯，这是一个老問題，”海軍同志突然大声說道，于是我醒来了，快乐地叹了一口气，因为这一切实在太荒謬了。我們日內就要一同到北方去，他不是好好地站在我的面前嗎？我的薩尼亚，我所热爱的，累坏了的，聪明可爱的薩尼亚，現在我和他永远也不分离了。

“但是北方航务总局的人对历史却不感到兴趣。这些魔鬼，哪怕讀一讀苏联大百科全書上的文章也好哇！那上面正好引用了門德列也夫的一段很重要的名言。我把它抄下来了，您听着，眞是一段精彩的名言。”

于是，他象个发音不清的小孩似的朗誦了門德列也夫的名言，这几句話我在父亲的遺稿中也看見过：“假如我們把在对馬海峽所損失的十分之一用来开拓北极的話，我們的艦队也許就能經日耳曼海和对馬海峽到达海参崴了……”

薩尼亚曾經告訴过我，說达莎阿姨总喜欢这样問他：

“喂，薩尼其卡，你生命的旅行怎样了？”

当我盘着腿坐在椅子上假装睡覚，懶洋洋地眯縫着眼睛細細瞧着我們这位夜間的不速之客，这位热情洋溢，說起話来象孩子一般口齿不清的，留着令人可笑的哥薩克式的头发的客人时，

我怎能想象到几年之后，我的"生命的旅行"竟会把薩尼亚带到这个人的家中呢？要是有人对我說，将来有那么一天，在他忧郁地思念着我，受尽了千辛万苦，年紀老大起来的时候，将要在这座寓所的空房間里来回徘徊，那么我一定会从心坎里大声笑出来的。

不过我們最好还是不要去窺探未来的事情吧。假如我們眞能預知自己"生命的旅行"的話，那么活着就太沒有意思了。

15 青春常在

我們終于物色到一个保姆，这是一位受人推崇的很好的女人，她生得胖胖的，很爱干凈，已經有四十年的工龄了。柏林什登一家子兴奋地告訴我道："她不是保姆，是位教授。"她刚一到，扫院子的清洁工人紧跟着就拖进一只旧式的大箱子。保姆从箱子里取出白围裙，白罩帽和一张古老的相片。相片上面隐隐可以看出保姆的父母和一个面部表情呆板的七岁的小姑娘，这就是她。

她穿上围裙，戴好罩帽，把相片挂在彼加为了紀念兒子的誕生送給罗莎莉·納烏莫芙娜一张画象原来挂的地方。从这一会兒开始，大家便都明白誰是这家屋里最主要的人物了。她向我說道，根据科学要求，嬰兒必須有自己的食具，自己的家具（尽可能用白色的）以及自己的固定医生。至于她自己，謝天謝地，沒有用白色的家具，医生和自己的食具也把孩子拉扯大了。柏林什登一家人都带着欽佩的神情听着她講，并且似乎还有点害怕，不过我并不怕。說实在的，她是一位善良、眞

誠的老太太，她深信自己的职业比地球上其它任何职业都重要。

我們决定在秋季回到这兒来，然后把小彼加和达丽亚·季摩菲耶芙娜(保姆的名字)一齐带到莫斯科去。至于大彼加的問題則稍为复杂一些。有一次薩尼亚把他領进自己屋子里，把我赶出来，然后鎖上門，两个人在一起过了整整一个晚上。我不知道他們都談了些什么，不过深夜一点多鐘当我回来的时候，看見他們俩眼睛都紅紅的——大概是烟熏的；滿屋子里都是烟，可是窗戶却毫无道理地关着。

“老家伙，也得活下去呀，”当我迈进門时，薩尼亚声音不大地說道。“你兒子都有了。”

彼加叹了口气。

“我尽量努力吧，”他說道。“沒有什么，很快就会过去的。朋友們，你們別耽心。你說得对，事情旣然已經发生，就再也挽回不过来了……”

探险队的基本队伍因为装备問題延誤了，而我們的装备却已准备齐全，甚至打好包发往阿尔汗格尔斯克去了。这样一来，我便突然有了几天閑暇的时間，为什么只說我有呢？因为薩尼亚依然是从早到晚在北极研究所里盘桓。因此，我决定就利用这两三天的空閑时間，哪怕走馬观花地看一看列宁格勒也好。

当我看到一群兒童在“青銅騎士”的台座上爬来爬去，騎在大蟒身上嬉戏时，我就想到，如果我出生在列宁格勒的話，我的童年一定会完全两样。那将是富有海洋色彩的童年，充滿了波罗的海情調的童年。說实在的，当初我应該把“百年来的新发現”拿到这兒来讀，那才眞够味哩！

我参观了普希金的住宅，到了彼得大帝的荷兰式小屋，游覽了夏园。

涅瓦河上停泊着軍艦，有一次我在参議院附近看到水兵們上岸。信号員站在围墙上打旗語。从軍艦上，透过大气，透过太阳光和涅瓦河上的水汽交溶的輝光有人用旗語在回答他，所有这一切都令人感到是那么愉快，那么舒暢，我的眼泪不由得夺眶而出了。

的确，我在列宁格勒的时候常常想痛哭一場，——悲痛和欢乐交織在心头，我心神恍惚，如醉如迷地在这美妙开闊的城市里漫步，竭力不去想在列宁格勒的这些幸福而又悲伤的日子即将結束。

薩尼亚当然也看出了我思想上发生了問題，有一次因为給他送飯的姑娘的事情，我竟至吃起醋来了。不过，他对我这种疯疯癲癲失常的样子似乎还很喜欢。

我脑子里常常产生一些突如其来的可怕的想法，有时候我刚走出門，便又急忙返回家里去。当我走上"阿斯多里亚"旅館的台阶时，心里总要猜想，薩尼亚在不在家呢，其实，滿可以不必猜測，只要問一問看門人就知道了。

当然这都是些傻事，可是我对自己实在是沒有办法。什么事都想要有一个圓滿的結果，仅憑我热烈的主观願望似乎是不够的，还需要一种超自然的，神奇的力量才行。

……我一生都記得临行前的那一夜。当天晚上我到彼得格勒大街上去跑了一趟。小彼加刚洗完澡在睡覚，保姆戴着罩头，穿着很高級的围裙坐在箱子上織絨綫。

"我們撫养的是一位爵爷，"她驕傲地答复我最后的要求和囑咐說道。

我忽然害怕起来，这样一位学究式的保姆会不会作出許多莫名其妙的事情来，但我瞧了瞧孩子便放心了。他干干净净，

白白嫩嫩的躺着，以至于使得周围的一切也都发着洁净的光彩。

大彼加和柏林什登家准备送我們到車站。

我回来的时候，薩尼亚已經睡着了，地毯上到处扔着錢，我把錢撿起来后，便去看薩尼亚留待明天作的一紙长长的工作計划。

这时已是深夜，可是房間里还很亮，原来薩尼亚沒有把窗帘拉上。我脫下連衣裙，洗完脸，穿上了睡衣。我的脸頰不知道为什么老是发烧，而且一点兒睡意也沒有，反而希望薩尼亚也醒来。

电話鈴响了，我取下話筒。

“他睡了。”

“睡很久了嗎？”

“刚睡着。”

“好吧，那就不用叫醒他了。”

那还用說，我当然不会把他叫醒的！我从說話的声音辨出是符教授来的电話。大概是有很重要的事，否則他不会在深夜挂电話来。不管怎样吧，我总算沒有叫醒薩尼亚。他衣服也沒有脫，在沙发上睡得那么熟，大概在梦里还着急呢，他的脸上掠过一絲暗影，嘴唇紧紧地閉着。

啊，我多么希望他醒来呀！在房間里我来回地走着，撫摸着滾燙的双頰。这兒不是自己的房間，明天这兒将会有另外的人来住。这个房間和其它千百个房間一样，摆設着罩天蓝色絲絨套的沙发，挂着小絲球鑲边的窗帘，摆着上面放了一块玻璃板的小書桌。可是不管怎样吧，目前这終究是我們的第一个家，我要永远地記住它。

隔壁有人在拉小提琴。他已經拉了很久了，可是我現在才开始注意它。拉提琴的人是一个細瘦身材，紅头发的男孩子，是别人隔着門厅指給我看的，他是一个很出名的小提琴家。我知道他就住在我們旁边。

他演奏的东西完全不是我心里所想的。他在音乐中所描述的不是因为薩尼亚是我的丈夫，我是他的妻子而产生的那种微妙的幸福的感觉。他是在追述我們昔日的，童年时期的会見，仿佛他曾經在第四中学的舞会上看見过我們，就在那一天薩尼亚第一次吻了我……

"青春常在，"这个我認为长得很丑陋的赤发少年演奏道。"苦尽甘来，久别又重逢。你記得你曾經許下心願，你們一定要找到他，看吧，他就站在你的眼前，白发蒼蒼，挺着胸膛，激动和幸福眞足以使人发狂。明天就要启程，一切都会象你所决定的那样。一切都会美滿如意，因为我們所相信的神話还存在在这世界上。"

我躺在地毯上，紧按着鬢角傾听着，一面哭泣，一面責备自己干嗎淌这些无謂的眼泪。我已經很久沒有哭过了，而且总是假装着我从来不哭，甚至不会哭似的。……

我照薩尼亚的要求在七点多鐘的时候把他叫醒了，并且告訴他，說夜里符教授打电話来了。

"你生气嗎？"

"为什么？"

他睡眼惺忪的坐在沙发上，一会兒用右眼看着我，一会兒用左眼看着我。

"因为我沒有叫醒你？"

"生气了，"他說完笑了起来。"你变得年輕了。昨天符教授

問我你多少岁，我告訴他說你十八岁了。”

他吻了吻我，跑进洗澡間，然后穿着一条裤衩跳出来作柔軟操。他要我也作柔軟操，但我作了几次就不作了。他却很有規律，每天两次，早晚各一次。

他身上还是湿淋淋的。尽管我說現在給符教授打电話还太早，可是他还是一面用松軟的毛巾擦抹着胸膛，一面走到电話跟前，取下了話筒。我这时正在作什么事情，大概是点酒精灯煮咖啡。薩尼亚用符教授的名字和父名称呼他。后来他用一种奇怪的声調反問道：“什么？”我轉过身去，看見毛巾从他的肩上滑落了下来，他也沒有去撿它，直挺挺地站在那兒，臉上的血色馬上消退了。

“好的，我馬上就办，”他說完就把电話筒挂上了。

“出了什么事？”

“眞是扯淡，”薩尼亚撿起毛巾，慢慢吞吞地說道。“符教授昨天夜里接到了一封电报，搜索队的事有了变化。上面命令我立即到莫斯科民航局去接受新任务。”

16 “我看見你手里抱着婴兒”

薩尼亚有一次曾經說过，他的生活总是这样：起初一切事情都很順利，然后突然来个急轉弯，跟着就开始“横滚”和“英麦曼”。至于这次，簡直可以說是进入螺旋了。

現在，当旧的欢乐和悲伤已被种种新的感情所掩盖，而新的感情又比过去我們所經受的欢乐和悲伤强烈千百倍时，回想这次不如意的事情竟然給予薩尼亚那样大的影响，自然会覺得很

奇怪似的。这个影响甚至或多或少地改变了他对人生的看法。

"卡佳，一切都完了，"他从符教授那兒回来后，激烈地說道，"什么北方啊，探险队啊，'圣·瑪丽亚'号啊，我再也不願意听見这些东西了！这全是些童話，早就应該把它們忘个一干二净了。"

我回答他說，讓我們一起来忘掉这些"童話"吧。虽然我深信他是永远也忘不了这些童話的。

我还抱着一綫希望，以为薩尼亚能在莫斯科爭取到改变这个命令。但是我收到他的电报已經不是从莫斯科，而是在去薩拉托夫的途中发来的，这封电报使我完全失去了信心。他所接受的新职务也似乎更进一步地說明了探险队的彻底垮台。他調到农业航空部門，就是所謂的特种任务航空部門工作。他現在除了播种小麦，噴撒石胡荽花粉之外什么也不作。"好极了，他們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得啦，"他由集体农庄寄来的第一封信里写道，他为了和当地政权机关"协商和安排"他的工作問題，在这个集体农庄里已經蹲了一个多礼拜了，"讓往日的幻想見鬼去吧，——本来这些也的确都只是幻想而已！但契同志毕竟說得对，要永远作一个出类拔萃的人。你别以为我屈服了。一切还有待于将来呢。"

"我們将要感謝以前的这段历史，"他在另一封信中写道，"至少，它帮助我們找到对方和建立爱情关系。但我深信不久的将来，这些年来的个人計划将会成为一件不仅对于我們說来才是重要的事情了。"

他用一种純客观的态度在信中对我說，他对于担当"五谷的种植者"和"蝗虫的死敌"这一有益于人类的任务已逐漸习慣。他显然已經爱上了新的工作，因为很快我又收到了他完全不同的另一封信。

“亲爱的老婆子，”他写道，“你想想看，地球上居然有这样一种名为巴黎青的植物，它是用来在水田上空撒播的，每公里撒十一公斤。你可以想象到，作这种工作該需要多么高超的飞行技巧，更不要說这些水田都很小，散布在森林里，一块块就象亲兄弟一般彼此酷似。当你加大油門飞近一块这样的水田时，就要赶紧疾剧地俯冲，然后急上升。这不是很有趣嗎？說也奇怪，当我在这些水田上空俯冲，或者以超低空飞行撒播小麦时，我所想的却不是农业，而完全是另外一些事。現在一天飞一百二十五个起落，如果我飞机上的巴黎青一旦换成了另外一种更够味的貨载时，今天这些起落的鍛炼对我将会大有用处。一切都往好的方面走，我一点兒也不覚得后悔。拥抱你。我仿佛看見你手里抱着嬰兒，一面走着，一面哼唱着，你的辮子沒有綰好，散开了，你走近我跟前蹲下来，要我替你綰好辮子……”

薩尼亚脑子里想象着我抱小彼加的情景不是毫无道理的，我把全部的时間都消磨在他身上了。他每天都有变化。观察他怎样逐漸辨認我，辨認出罗莎莉·納烏莫芙娜，辨認出保姆来，观察他的眼睛，嬰兒的眼睛里根本是茫然沒有任何思想活动的，可是有时候会突然閃現出惊訝和专注的神情，这眞是有趣极了。說来也令人难以相信，虽然他还沒有滿月，可是他却会笑了。他爱看电灯，灯一熄就要哭，最初他見了自己的小手感到很害怕，可是后来他却很久很久地瞧着自己的小手，并且也不害怕了。其他的小孩在他这样大小时总是滿脸皺紋，一付苦相，而他却总是那么愉快，仿佛是因为降生到人世間来而感到高兴似的。我覚得他比我在医院里第一次看見他时更象薩尼亚了。他生下来头发就是黑的，不过那时只是脑門上有头发，而現在却滿头都长起来了。他长得非常可爱，长得十分端正……

一切事情的演变同心里想望的和幻想的完全不一样！我到列宁格勒来住这两三个礼拜，本来是为了会見薩尼亚，是为了能和他在一起，无論他到哪兒都行，可是現在他又远远地离开了我。我是出乎意料地突然有了一个家——小彼加，大彼加，还有保姆。他們需要有人照料和关心，而且誰也不怀疑，照料和关心的責任应該由我来担負。

虽然我已經告訴薩尼亚，要他永远把北方的事丢在脑后。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还繼續在研究北方的地質。我因为經济情况很不好，所以又在地質研究所担任了一些很乏味的工作。

要是在过去，我很可能因此会苦恼，責备自己，过多地考虑自己的問題。但是現在我却被一种奇怪的平靜的心情突然控制住了。我的自尊心，驕傲和因为一切不遂心願的事而引起的怨恨仿佛都随着"童話"一起被我擯弃了。"有什么办法呢，我的亲爱的！"我回复薩尼亚道，因为在一封信里他抱怨自己，說都怨他把我弄到列宁格勒来，又把我撇下，还給我留下了一个家庭包袱。"就象老法官說的那样，人生是变幻莫测的。"

我給他的信往往很长，写关于"科学保姆"的情形，关于小彼加变得多么快，大彼加怎样突然狂热地搞起工作来，以及普希金紀念象的設計作得多么惊人，巧妙……

可是有一件事我却一字也沒对他提过。就是有一次，我在十月革命节大街"美味之家"买东西的时候，看見窗外有一个穿灰大衣的熟悉的身影，他戴着那頂特意为我而买的軟呢礼帽，这頂帽子是那么不自然地扣在他那个方棱的大脑袋上……

当时天色已經昏暗，我可能是看錯了。不过这人确实是罗馬紹夫。他样兒很沉着，脸色蒼白，身躯微微前傾，緩緩地从橱窗前走过，一会兒便隐沒在人群中了。



第七部　別　离

卡佳·塔塔林諾娃述

1　五　年

我不記得在什么地方讀过一首詩，这首詩里把岁月比作想象中的一条"时間之繩"上的小灯籠。

有的灯籠燃得很亮，放射出輝煌灿烂的光芒，另外一些却在黑暗中冒烟，烟气騰騰地劈劈拍拍爆着火花。

我們在克里米亚和远东居住过。我是一个飞行員的妻子，因此有許多新朋友，她們都是克里米亚和远东等地的飞行員的妻子。当大队里来了新飞机时，我也和她們一样感到兴奋。当薩尼亚参加飞行到了預定时間还不回来时，我也和她們一样总是不断地往大队部挂电話，使得值班員感到討厌。我和她們一

样，認为自己永远也不会习惯于丈夫的职业，可是最后，也和她們一样又終于逐漸习惯了这个职业。但我并沒有放弃自己的地質工作（这几乎是不可能的）。虽然那位直到現在还叫我"娃娃"的年老的女教授总是武断地說，"要是我不出嫁的話（偏偏还嫁了个飞行員），那我早已經得到碩士学位了"。可是一九三六年深秋，当我带着我和薩尼亚一起所作的新的工作成績从远东回到莫斯科时，她只好把自己的話收回去了。我們的工作是航空磁力勘探！从飞机上探查鉄矿。

現在伊万·巴甫雷奇大概不会再說"你不了解他"的話了吧。在薩尼亚思想和感情遙远的深处，我看見了那曾經照亮过他童年的北极的星光。仿佛这是在一所荒废的，无人照管的房子里，每天夜間都有一种神秘的亮光在閃耀，細长的光綫从牢牢釘住的百叶窗縫里透露出来。百叶窗关閉着，釘得牢牢的，可是明亮的光綫照样透露出来，落在我們时聚时散的道路上。

"薩尼亚，我現在了解你是个什么人了。"

我們坐在海参崴到莫斯科的国际列車的包厢里。这是料想不到的，但我們这一次的确是十天十夜都住在一个車頂下面，朝夕不离。我們同在一张桌上吃早飯，吃午飯，吃晚飯。白天，我們能够互相看見。据說，居然有些女人对这样的幸福不覚得奇怪。

"我是什么人呢？"

"你是个以四海为家的旅行家。"

"是的，从滨海机場起飞，由海参崴到伊尔庫茨克只要七小时四十四分鐘。"

"不是这么說。他們不放你走哇。不过反正都是一样，不管从才干上說，或者从爱好上說，你都是一个旅行家。只有旅行家才能在我們吃魚的时候，問魚有多大的岁数。"

他笑了。

“只有旅行家才象你这么害怕文牍。只有旅行家才会在别人向他献花的时候象你这么难为情。只有旅行家才会象你这样吹口哨，总想自己的一套，每天早上用二十四个練习組成的体操来折磨自己的妻子。”

“还不包括冷水擦澡。”

“是的。只有旅行家才不容易老。”

“我可是漸漸老了。”

“你知道，我总觉得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年龄特征。有的人一生下来就象是四十岁，可是有的人一辈子都象是十九岁的小伙子。契同志是这样的人，你也是这样的人。总而言之，很多飞行員都是这样。特别是那些喜欢飞越重洋的人。”

“你以为我是那种喜欢飞越重洋的人嗎？”

“是的。你飞过大洋后不会把我抛弃嗎？”

“不会的。不过我自己倒总是半路上就会被人截回来。”

我沒有作声。“把我截回来”，他談的完全是另外一回事，这句話是指薩尼亚把散失在从恩斯克一直到泰麦尔的残片搜集起来，組成了我父亲的生活眞相，而結果却落到了外人手里。在地理协会，在北极研究所都挂着塔塔林諾夫船长的相片。許多詩人写詩歌頌他，其中絕大部份都写得不好。在苏联大百科全書中登載着关于他生平的长篇論著，下面却是尼·塔的署名。他的这次探险，和塞多夫，魯薩諾夫，托列等人的探险共同載入了俄罗斯人开辟北极的史册。

他的名声愈高，他的堂兄，这位为了組織“圣·瑪丽亚”号探险队而牺牲了自己的全部財产，又献出了毕生精力来研究这位伟大人物的可尊敬的北极学家的名字，也跟着越来越經常地为

人們提到。

憑借着自己的地位，尼古拉·安东內奇的功績受到了重視，“在冰原上”这本書每年都再版，供給兒童和成年人閱讀。报紙上不斷报导一些由他主持的“学术会議”的消息。他在“学术会議”上經常发言。从这些发言中，我又发現了旧日爭論的痕迹。这場爭論是在一个脸色极其蒼白的女人被抬到冷冰冰的石板地上，被永远地从房子里运走的那一天，那一个时刻終止的。不，这場爭論还沒有結束！这位可尊敬的学者在自己所写的書中，也不嫌累得慌地重复着說，塔塔林諾夫船长的犧牲其錯誤是在某些“厂主”身上，特别是在一位維什米尔斯基爵士的身上，他这样說不是沒有原因的。这位可尊敬的学者曾經用过一些証据，企图把那个識破了他秘密的小学生反咬一口，現在他又搬出这些論据来不是沒有苗头的。

現在这个小学生緘默了。但一切还有待于将来。

他默不作声，日以繼夜，毫不疲倦地工作着。他在伏尔加河流域一带撒播石胡荽。他在依尔庫茨克和海参崴之間的航綫上载运邮件，因为能在两天两夜內把莫斯科的报紙赶运到海参崴而感到幸福。他获得了二級駕駛員的称号，他曾經多次申請派他到北方去，但每一次的回答都是要他当“空中馬車伕”。这一次是調到西姆菲罗波尔和莫斯科之間的航綫，他自己倒不在乎，可是我却为他感到憤懣不平。这个每次都横亘在他道路上的神秘的阴影究竟是誰呢？我不知道。他也不知道。

他在工作着，人們也称贊他，說他工作得很好。可是只有我一个人猜得到他因这些千篇一律的航綫飞行感到多么疲劳。

“我最近找到一本旧笔記本，你知道在第一頁上写的是什么嗎？”

我穿着一件白色的連衣裙，和他并肩站在雪白华丽的輪船甲板上。薩尼亚这回是休假，我为他这次休假，为我們这次突然去塞瓦斯托波尔的决定感到非常幸福，至于以后再往哪兒去，我們自己也不知道。

“阿姆生的船名叫‘前进’。他給它取名‘前进’，自己也的确是在努力前进。这是南生对阿姆生的評論……，是我十四岁时的座右銘。的确好吧？可是現在呢，前进了又后退。忽而莫斯科，忽而西姆非罗波尔。”

……灯籠时明时灭，在它那搖曳不定的灯光照耀下，忽兒是欢乐，忽兒是痛苦。时間头也不回地往前奔跑，只在一天晚上，就是薩尼亚叙述（不是对我叙述）他自己一生历史的时候才停頓了一会兒。这次重要的談話是在鞑靼村飞行員俱乐部的花园里进行的。花园修在一片斜坡上，园中的小径穿过花开正盛的苏枋丛，蜿蜒而下，直抵海边。碎石子在飞行員們小心的步履下吱軋作响。驟然吹来一陣輕风，从阿依·华西里花园里带来了片片的櫻花和苹果花瓣。这是一次公开的党的会議，說它是公开的还有着字面上的意义，因为会議是在迅速昏暗下去的南国天幕下，在戏台前的露天广場上举行的。

薩尼亚講得很連貫，很鎮静，但只有我知道他在講快了的时候，往往突然停頓住，这个动作表示什么意思。这是說明他发慌了。这还用說嗎！

我听着薩尼亚叙述，眼前不禁浮現出那即将遺忘的少年时代。这好象是在放演电影，有一个人的声音不慌不忙地講着，而銀幕上演的却是云彩和沿着广闊无垠的平原伸向远方的一条霧蒙蒙的带子似的河流。这是晨曦的景象。在我的印象中，少年时代就是这般霧蒙蒙的，这般幸福的。

我又想起了第四中学那个审問叶夫根尼·奥涅金的額头上总是搭着一綹头发的，又黑又瘦的共青团員。有一回在冰場上，他第一次向我傾吐了要上航空学校的志願。我看到他在恩斯克教堂花园里因讀了那些旧信而激动的情形。无論是在莫斯科，在北方，或者重返莫斯科之后，他都准备在全世界面前捍卫自己的眞理。

回忆得够多了！讓我們来听听大家都說他些什么吧。

学校教育了他，苏維埃社会把他造就成了一个人，这就是大家对他的評論。他的特点是学习努力，作风正派。作为一个飞行員，他远在一九三四年就因在艰苦的北极条件下完成了多次惊险的飞行而受到涅涅茨民族区的表揚。自此以后，比如在掌握了夜航駕駛术以后，他又大大地往前迈进了一步。当然他还有一些缺点，性情急躁，易于动怒，沒有耐心。可是，对于"格利高里耶夫同志是否够得上一个党員的称号"这个問題，我們应該回答說："是的，够得上"。

……一九三七年冬季，薩尼亚調到列宁格勒，我們寓居在柏林什登家里。一切似乎都还不錯，只是每当我夜里醒来时，总看見薩尼亚睜着眼睛躺着。每一个礼拜我們都要到涅瓦大街的紀录片电影院去看关于西班牙內战的电影。这是馬德里城郊大学区，許多手里拿着步枪，穿花格子衬衣的少年隐藏在废墟中。看吧，他們站起来，冲鋒了。这是第五团在領取枪枝的場面。这是兒童从被围的馬德里撤走的情形——母亲們哭泣着跟在汽車后面奔跑，孩子們不断地揮舞着小手，这是眞情实况嗎？是眞情实況。那么但願这种痛苦的眞情实況永远也不要在任何地方重演了。永远也不要在任何地方！这些梗在喉嚨里的泪水究竟是从哪兒来的呢？这种痛苦的預感，这种在窄小，气悶的暗黑电影院

里突然产生的激情究竟是从哪兒来的呢？

两个礼拜以后，在柏林什登家狭窄的前厅里，在挂着旧皮袄和女斗篷的衣架之間，我和薩尼亚一声不响默默地站着。这是新的一次别离前的最后一刻鐘！他这次出发是穿便装，他穿着那件寬肩的时髦大衣，戴着軟呢礼帽，样子怪里怪气的，使人完全認不出是他来了。

“薩尼亚，这是你嗎？也許不是你吧？”

他笑嘻嘻地說：

“就算不是我吧。你哭了嗎？”

“沒有。我亲爱的，我最可爱的，好好保重自己吧。”

他說“我会回来的”，还說了一些温存的，杂七杂八的話。我不記得自己說了些什么，只記得我請他不要輕視降落伞的作用，因为他經常不带降落伞。

他出发到哪兒去呢？我不知道。他說是到远东去。可是为什么要穿便衣呢？为什么我問起他这次出差的一些事情时，他不馬上回答我的問題，而是先考虑一下，然后才說呢？为什么从莫斯科深夜里打来电話时，他只回答“是”或“不是”呢，为什么后来又在房間里来回地走了很久，不断地抽烟，显得十分激动，十分高兴，又因为什么原因显得滿意呢？他滿意什么？我不知道，也不应該知道。为什么我不能够送他到車站，他不是去远东嗎？

“这有点不太方便，”薩尼亚回答道，“我不是一个人走。也許我根本就不到那兒去。如果方便的話，我从車站上再給你打电話。”

他从車站給我来了电話，說再过十分鐘就要开車了，要我不必耽心，一切都会很好的，他隔一天就給我写一封信，他以后再也不輕視降落伞的作用了……

我經常收到盖有莫斯科邮戳的信。从这些信来判断，他也很有規律地收到了我的信。一些素不相識的人常常給我来电話，关心我的身体健康。远在千里之外，在瓜达拉馬山，正在进行着战斗。在我夜間看書的小桌上方，挂着一幅釘滿了小旗子的地图。遙远而神秘的西班牙，霍查·吉阿沙，多洛列斯·伊巴露丽的西班牙突然变得那么亲近，就象是我度过了童年的街道。

三月里春雨連綿的一天，共和国的航空兵，"一切有翅膀的"都出动去迎击那企图切断瓦倫西亚和馬德里的联系的叛軍。这是在瓜达拉哈拉城下的一次胜利。我的薩尼亚是在那兒嗎？

七月里，共和国的軍队击退了布龙涅托的叛軍。我的薩尼亚是在那兒嗎？巴斯康尼亚被截断了，需要駕駛着老旧不堪的民用飞机穿过浓雾，越过重山峻岭飞到毕尔波去。我的薩尼亚是在那兒嗎？……

"出差期限延长了，"他写道，"說不定我会发生意外。总而言之，請你記住，你是自由的，沒有任何义务。"

我在沃洛达尔斯基大街一个旧書商手里买到了一本一八三六年出版的俄西字典。因为这本字典已經破烂不堪，紙张也发黄了，所以我又把它交給装訂工重新装訂了一下。每天晚上我都在学习这些西班牙文的长句子："是的，我是自由的，我对你沒有任何义务。如果你眞不回来的話，那我就情願一死了之。"或者"亲爱的，你为什么写这些令人伤心落泪的信呢？"

我嘰哩咕嚕地念着这些西班牙句子，大概在黑暗中这些話听来更是怪声怪气，十分别扭，所以"科学保姆"以为我是在說梦話，赶忙起来，悄悄地为我划了个十字……

一件似乎是最不可能，最难以令人置信的事情突然发生了。

一件最普通的，使得万物——天气、身体、工作都好了千百倍的事情发生了。

这天深夜从莫斯科来了电話，說他要回家，惊愕万分的罗莎莉·納烏莫芙娜把我叫醒，我急忙跑到电話机前……几天以后，他果然站在我的眼前了，样子瘦了一些，人也晒黑了，眞有点象西班牙人了。我亲手将紅旗勛章給他佩在制服上。

……秋天，我們动身到恩斯克去。彼加和他的兒子以及“科学保姆”每年都去恩斯克过夏天。达莎阿姨在每一封信里都請我們到恩斯克去。現在，我們終于动身去了；早上决定，晚上我已經在車厢里責备薩尼亚了，因为只差五分鐘就要开車，而他还沒有来，买什么大蛋糕去了。車已經开动他才喘吁吁地，笑嘻嘻的跳上来。

“这玩意兒眞好，他們那兒可沒有这种大蛋糕！”

“要多少有多少！”

“这样的糖果該沒有吧？”

的确，恩斯克大概沒有这样好的糖果，甚至連盒子怎么开法也不知道。盒盖上的小紅圓框里写着“长命富貴”四个金字。

我們靜坐在昏暗的包厢里，很久也沒开灯。

什么时候曾經有过和这差不多的事情呢？这是在我們儼如成年人似的从恩斯克回来的那一次。几个虛无主义者的老太婆統着用細繩拴着的又大又可笑的暖手筒来送我們。一个沒有刮脸的小个子男人总是在猜測我們是什么关系：兄妹嗎？样兒不象！夫妻嗎？年岁太小！还有那些苹果——又紅又結实的冬苹果！为什么童年时代才会吃到这样的好苹果呢？

“我就是那一天爱上了你的。”

“不对。有一次我們从冰場出来，你請我吃豆角，我沒有吃，

你就把豆角給了一个小姑娘，那次你就爱上我了。”

“是你自己那时候爱上我了。”

“不对，我知道是你。要不然你就不会給别人了。”

他很認眞地思索着。

“那么，你又是在什么时候呢？”

“不知道……一向就是。”

我們站在車厢的过道上，也和那回一样，目送着窗外一起一伏的电綫往后飞奔。一切事物都有所改变，只有幸福还是和从前一样。肥胖的大鬍子列車員不时瞧瞧我們，——也許是瞧我，——然后叹了一口气，說他也有一个很漂亮的女兒……

到了恩斯克。清晨，电車还沒有开始运行，所以我們只好徒步穿过全城。一个很有礼貌，衣衫襤褸的人帮我們提着东西，不停地嘮叨着。尽管我們告訴他，說我們就是恩斯克生的人，可是这些話都不起作用。他所有的人都認識：已故的布宾其可夫家里的人，达莎阿姨，法官，特别是对法官熟悉，他同他打交道已經不止一次了。

“在哪兒呢？”

“列宁区的审判庭上。”

在广場上，在农庄庄員們出售苹果、白菜的貨攤前面，样兒显得有些衰老了的达莎阿姨拿着一棵大头白菜，正站在那兒斟酌：买呢，还是不买呢？

薩尼亚招呼了她一声，她以老年人慣有的严峻神情从眼鏡下瞅着他，突然失去支持地松开了手，白菜掉到地上了。

“薩尼其卡！我的宝貝兒！这是怎么回事？怎么跑到市場上来了？”

“不是的，达莎阿姨，我們是順路，达莎阿姨，这是我的妻

子。”

他把我引到达莎阿姨跟前。恩斯克市場上的交易这一来都中断了，連馬兒也把嘴从袋子里抬起来，很有兴趣地瞧着我和达莎阿姨怎样亲吻……

这是果戈理街馬尔庫兹的房子，大門的两旁都有獅子象。早餐是按照达莎阿姨的口味准备的，吃完这样的一頓早飯之后，一想到世界上还有午餐和晚餐就觉得可怕。我們在电話里和法官談了一次話。他这时正在区里开庭审訊，听他那細微遙远的声音，就好象他是在地球另一边的某个地方說話似的。小彼加居然已經三岁了，难道討論用不用奶瓶給他喂奶，出門是抱着他，还是把他放在小推車上这样一些重大問題眞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嗎？

我們在教堂花园里，正是在过去薩尼亚他們曾經躺在那里企图在白天看見月亮和星星的地方找到了大彼加。他們在这兒讀过尺牘文选，在这兒互相进行了“友誼的歃血盟誓”。

彼加象个土耳其人似的盘着腿坐着，膝盖上放着一本很大的亚麻布写生簿。他正在画沙河与静河汇流处——鉄栏杆的风景；洁白肃穆的波克洛夫修道院高插在充滿阳光的广闊的晴空中，在修道院的后面，在河对岸是連綿不断的田疇。

“对不住，公民，請問您沒有看見一个画匠嗎？”

他回过头来，惊异地看着我們。

“一个画匠从这兒走过去了，”薩尼亚繼續說道，“一个穿短上身，脸上有雀斑的人。”

彼加立时跳起来。他的身躯又瘦又长，举动显得很笨拙。

“你們来啦？还有卡佳？嘿，好样兒的！我眞高兴！喂，講講吧！薩尼亚，你不是从那兒来的嗎？”

“我是从那兒来的。”

我們在馬尔登长老碉堡旁边坐了約摸两个鐘头，然后走到河岸上，順着一个一个的花园走遍了全城。这座城市在秋日里显得多么美丽！波达尼切斯基花园里的枫叶多么紅啊！悬崖下面，一行行树身被塗刷得粉白的矮矮的苹果树整齐地排列着。沿着这条久已荒蕪，被人遺忘了的綠蔭小径向着悬崖那边漫步走去，这又是多么惬意啊！

“我們曾經鑽到这兒来偸过苹果。你还騙我說园丁的枪里装的是盐粒。”

“那可不是撒謊。眞有趣，我們当时都是些什么样的孩子呀？譬如你吧，你記得起自己小时候的情形嗎？我可是想不起来了。”

“你那时眞是个奇怪的孩子。你还記得，有一次你异想天开，說老鼠里也有女王嗎？还有土耳其斯坦的事，这眞是幻想。你那个时候就已經是个艺术家了，至少也可以說是一个艺术人了。”

“不过我那时覺得你才应該成为一个艺术家呢，你不是搞捏塑搞得很好嗎，为什么又半途而废了呢？”

我瞧着薩尼亚，心里想要不要揭露他的秘密，可是他对我使了一个威吓的眼色，所以我什么話也沒有說。他現在空閑的时候还在捏塑，当然是自己捏着玩的。

法官晚上很晚才回来，这时我們早已不等他了。突然外面拐角的地方，劈劈啪啪响起了“加吉克”轎車汽缸的燃爆声，接着老人便出現在便道上。他戴着一頂沾滿了尘土的白色无綠帽，提着两个公事皮包。

“喂，都来了一些什么客人？等我先去洗洗脸，然后来和你們接吻。”

随后我們就听見他在厨房里呼哧呼哧地洗了很久。达莎阿姨埋怨他又撒了一地水，可是他仍然不住地呼哧呼哧打着响鼻說："啊哈，真舒服！"——最后，他終于梳洗得整整齐齐的，赤着脚穿了一双拖鞋，穿着洁净的托尔斯泰式的衬衣走出来了。他把我們輪流拉到台阶上，仔細地打量，先看我，后看薩尼亚，又专門看了看勛章。

"不錯，"他滿意地說道。"一道杠？"

"一道杠。"

"这么說来，当了大尉罗？"

"是大尉。"

他紧紧地握住薩尼亚的手。

在恩斯克这个美妙的晚上就是这样度过的。我們很少能全家团聚，但我們彼此非常亲热。现在，当我們終于聚会了的时候，大家不免因为我們原来是分居在不同的城市里而感到奇怪。

我們围坐在桌旁，一直坐到深夜，天南海北地談得沒有个止境。我們回忆起薩沙来，随随便便，毫无拘束地談論着她，就好象她还生活在我們之間一样。小彼加一个月比一个月地越长越象她了：也是那种蒙古人的眼睛，两鬢上也是生着那么茂密，柔軟烏黑的汗毛。他低下头去的时候，眉毛也是那么高聳着……

薩尼亚講起了西班牙的事情来。一种奇怪的，早已忘記了的感覚包围了我；我听着他講，就好象他所說的是另一个人。有一次，他起飞去偵察，看見五架"容克"飞机，他毫不犹疑地朝它們迎面冲去。难道这真是他嗎？当他飞到这几架"容克"飞机的中間时，他差不多是在盲目地扫射，因为距离这么近，是不可能不击中的。难道这也是他嗎？他的上衣着火了，他用手套掩护住脸，把受伤的飞机安全降落，过了一个鐘头之后，又駕駛着另

一架飞机飞上天空。难道这眞是他嗎？

法官听他講着，他那毛茸茸的花白眉毛下面的眼睛里閃耀着孩子般的满意神色。他举杯站起来发表演說；薩尼亚还在火車上就对我說过，法官一定要演說。

“薩尼亚，我不准备夸奖你，虽然，你所作的事是值得夸奖的。你曾經对我說过，你想作一个飞行員，当时我問你：‘是作空軍飞行員嗎？’你回答說：‘是北极飞行員。如果需要的話，那就作空軍飞行員。’瞧，現在不眞是成了一个能征善战的空軍飞行員了嗎。你就坐在我的面前，我怀着驕傲的心情回忆往事，我完全有权利把你看作我的亲生兒子。不过当我看到你的时候，我脑子里还产生了另外一些想法。我想談談你力图找到塔塔林諾夫船长探险队的这一崇高的理想，这个理想曾經溫暖过你的青年时代。你象是給自己提出一个要干預这个問題，并按照自己的看法把它糾正过来的任务。这是正确的，正因为这样，我們才是布尔什維克革命家。因为我从你的童年时代就了解你，所以相信你迟早是能够完成这一重大任务的。”

我們碰杯的时候，薩尼亚用西班牙話說道：

“Salud①！……就当‘走向生活的旅行’現在开始吧，”他說道。“就当艦船昨天才离开港口，远方的灯塔还看得見，它已給离港的艦船拍发了告别的祝詞‘祝你們航行順利和成功’。从前我們年紀虽小，但是很勇敢，我們在城市阴暗而寂靜的街道上走着。我們俩的武装只是一把芬兰刀，也就是彼加用旧皮靴給它縫了一个刀鞘的那把刀。不过，我們內在的武装比起表面看上去的要好得多。我們前进，因为我們互相起了誓：‘奋斗，探求，

① 干杯的意思。——譯者注。

不达目的，誓不罢休’。我們前进，因为路程还沒有結束。”

薩尼亚高举酒杯，一飲而尽，使劲把酒杯摔到墙壁上，嘩啦一声砸得粉碎……

一九三九年，我們住在莫斯科，我們經常到西夫切夫·符拉什克胡同瓦里亚和琪拉家里去。西夫切夫·符拉什克的寓所里現在显得有些拥挤了。

一个扎着小辮子的白嫩白嫩的小女孩睡在“外厨房”里，她和她媽媽琪拉一样，生着一个大大的，坚硬的鼻子。过去一度曾被瓦里亚用作照相室的貯藏室里挂着小孩的襁布。在“內厨房”里，薩尼亚差一点兒沒有坐到一个小包裹上去；原来里面裹着一个額上生着一綹黑头发的嬰兒。一张严肃的、呆呆的小脸露在外面，看样子，只要給他戴上一付牛角框眼鏡，他就会去听关于玄狐混合种的报告了。

小女孩已經能“带表情地”朗誦詩歌，从她身上也使你能覚察出琪拉的媽媽对她認眞教育的結果。她的教育在原則上和那已經驕傲得不可救葯的瓦尔瓦拉·拉宾諾維奇的教育完全相反。

在西夫切夫·符拉什克胡同里，我和薩尼亚坐在这样一些可爱的，这样一些“小”朋友中間的时候，我們两个流浪人，两个旅行家心里都在想些什么呢？

当然，我們想了自己一生寄人篱下，想了我們沒有自己的家，哪怕是象瓦里亚和琪拉这样狹小，拥挤的家也沒有。

因此，我們决定現在在列宁格勒要有这样一个家……

灯籠时明时灭，在它那搖曳不定的灯光照耀下，忽而是欢乐，忽而是痛苦。

一个晴朗的冬天，我們站在克里姆林宮墻下一块黑色的大理石前，在这块大理石上刻着一个为我們所热爱的普通的人名。薩尼亚回忆起有一次去見他时的情形，一路上他竭力慢慢地思想，借以克制內心的激动，等走到了同他說起話来时，就好象是在电話里交談一样：

“是契同志嗎？我是格利高里耶夫。”

一座巨大的城市，几百条美丽的街道、剧院、公园和花园都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时期距現在已經一年了。可是我和薩尼亚总还感到奇怪，难道我們眞的永远再也听不到他那把“奥”咬得特别重的低沉的声音了嗎……

一九四一年，我們搬到列宁格勒——如果可以的話，但願这是最后的一次搬家了。我們租了一所三个房間的別墅，带一口井，还有一位貌似古俄罗斯射手的英俊的老主人，彼加立刻就給他画起象来。彼加父子两个和“科学保姆”今年沒有到恩斯克去，我們全家都住在別墅里。我們常常去湖边游泳，用眞正的銅制大肚茶炊煮茶喝。我們有些妇女对于这种絕妙的安静生活，和这样的幸福居然覚察不到，眞使我感到奇怪。

我們每个星期六都要去接薩尼亚。我們全家一起都去車站接他，其中自然又要以小彼加等待薩尼亚叔叔等得最着急了。这一次他心里希望能够得到一艘鉄甲艦。希望实現了，薩尼亚拿着一只漂亮的大軍艦从經由我們面前駛过的車厢門梯上跳了下来，向我們揮着手，但不知道为什么他还在跟着車厢走。火車停下来，他伸出一只手去，一位瘦小的老太太从車梯上走下来。她精神矍鑠，但却象是有什么心思牵挂的样子。她一只手拿着一把伞，另一只手里拿着一个帆布旅行包。我眞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了，但这确实是姥姥。她穿着华丽的絲綢衣裳，戴着一頂很

显眼的草帽。这是姥姥，薩尼亚恭恭敬敬地搀扶着她，保护着她不致被頓时挤滿了小小站台的喧嚣的人群挤着……

2 姥姥叙述的事

应該說明一点，近来姥姥的某些性情使我感到很神秘。她向来耻笑别人用紙牌算命的事，可是現在她却突然热中于算命，甚至自己还带了一付紙牌。她算的是紅桃K，显然，她和它之間有着极为复杂的关系。

“宝貝兒，你这是打些什么算盘，”姥姥怒气冲冲地說道，“好！公家的房子都不合你的口味了？……”

她虽然刚才还抱怨，說家里太寂寞，沒事可干，但在談着話的时候，却突然跳起来急着要回家去“忙家务”。

“不，应該走了，”她慌慌张张地說道。“这怎么成！一定要走！”

她一向喜欢看电影，可是現在当我請她去看电影时，她甚至感到吃惊。

“到电影院去，”她慢条斯理地說道，“这要完全看影片的質量如何而定。”

“这要完全看影片的質量如何而定。”——姥姥以前說話不是这么咬文嚼字的呀。

我自然猜得到姥姥內心里所說的，要給他一間公家房子的那位紅桃K是指的誰，以及她为什么突然着急要回家去，还有这些冗长的，轉弯抹角的句子是从哪兒来的。这都是尼古拉·安东內奇，是他支配着我可怜的姥姥的全部思想活动。

这是他的势力范围，是他所起的惊人的影响！

我不止一次地劝她同我一起住一个时期，哪怕是在我和薩尼亚寓居莫斯科期間来住一住也好。但怎么說也不行，她連听也不願意听这样的話！

“我一走开，他一定要找我，”她神秘地說道。“不行，看来是命該如此。”

“什么一定要找到！他真是那样需要你嗎！他連找都不会找你的。”

姥姥默默地沒有作声。

“不，他会找的！这件事对他說来是很重要的。”

“为什么？”

“因为我住在他家里，那就是說遂了他的心願，而不是随了你們的心願。别着急，他每天晚上还念書給我听哩。”

尼古拉·安东內奇每天晚上把自己的書念給姥姥听……

当我們决定在列宁格勒成立自己的小家庭时，我很想讓她搬到我們这兒来住。可是每見一次面，我就越加深刻地感覚到这是不可能的。姥姥罵尼古拉·安东內奇的次数愈来愈少，而談到他的时候那种迷信的恐惧心里却愈来愈明显。显然她心里是深信他有一种超凡的力量的。

“我只要动一动念头，他就会立刻知道的，”她有一次說道。“前几天我想烘点心，他就說：‘不过千万别用西米。胃里不好消化。’”

而现在姥姥却一手拿着伞，一手提着帆布旅行包，突然出现在列宁格勒車站上，精神勃勃地向我們走过来。大概出了什么事情了吧？

她在路上問，在我們别墅里住是不是一定要登記。

“可以不登記，就这样住下，”我回答道。“你为什么要耽心这件事呢？”

“沒有什么！登記就登記好了，”姥姥把手一甩說道，“我現在对什么也不在乎了。”

关于大小彼加和已故的薩沙，我在信里和口头上对她講过上千次了。在我还是个年輕姑娘，住在特維尔·雅姆二路时，彼加到过我們家里，姥姥認識他。但她那么客气地同他問好，就仿佛是第一次看見他似的。她心不在焉地吻了吻小彼加，至于“科学保姆”，她只是冷冷地評論說她“一脸蛮气”。

姥姥受了刺激，这是毫无疑問的。但受了什么刺激呢？这就是个謎了。

我們租了两間带閣楼的房間。这間閣楼和姥姥一样瘦小，好象是特意为她修筑的一样。姥姥首先就检查窗戶上有无插門，房門是否能够鎖住。

“得了吧，姥姥，我不喜欢这样，”我坚决地說道。“等我馬上把門关起来，就誰也听不見了。赶快談吧，究竟是怎么回事。”

姥姥沉默了一会兒。

“我就說！瞧你，还吓唬人哩！”

……她睡了一会兒，洗了脸，穿着一件带皺褶的連衣裙，一双鞋尖頂长的乳黃色皮鞋走到桌前来，服装入时，人也显得年輕了些。

“他找了个女管家，”她劈头說道。“他还說：‘不是女管家，是秘書。她对我会有帮助的。’不过她却把肮脏的鞋子放在我的爐板上。嘿，这就是給你的帮助！”

把脏鞋放在爐板上的人名叫阿列芙琴娜·謝尔盖耶芙娜。

这真是太有意思了。我們坐在花园里，姥姥很威风地叙述着，一时叫人弄不明白她說的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兒。我看見彼加极力想把她画下来，我連忙吓唬他，不許他这样作；我也恫吓薩尼亚，因为他几乎忍不住要笑出声来了。只有小彼加認真地听着。

“如果你真是什么秘書，那么干嗎把鞋子擱在我作飯的地方？我永远也不允許这样作。要是我今天生爐子怎么办呢？”

“結果呢？”

“我真的生起爐子来了。”

“結果呢？”

“鞋子烧坏了，”姥姥驕傲地說道。“再不敢放了。”我們忍不住笑成了一团。

总之一句話，女管家損失了一双鞋，这就使尼古拉·安东內奇不得不把姥姥請到他那兒去进行一次严肃的談話。

“我是如此这般的一个了不起的人物！”姥姥气呼呼地摹仿着尼古拉·安东內奇吹嘘自己时的神气說道。“哼，如果你真的比别人都强的話，那也不要自己說，讓别人来評論好了。”他把房子指給我看，說道：“尼娜·卡比丹諾芙娜，請您挑选吧！”

尼古拉·安东內奇在果戈理大街一幢新住宅里領到一套房子，請我那可怜的姥姥在这套豪华的房子里任意挑选一个房間。他为了选購家具，在莫斯科跑了整整一个月。按照尼古拉·安东內奇的想法，特維尔·雅姆二路上的那所住宅应該作为“塔塔林諾夫船长紀念館”。他这样决定也不害臊，塔塔林諾夫船长連这座住宅的大門都沒有进过啦。

“我对他行了个礼說道：‘多謝您啦。我还沒有在别人家里

住过哩。'”

就在这次談話之后，姥姥产生了摆脫尼古拉·安东內奇，搬到我們这兒来住的念头。可是她怕他怕到了那种地步，甚至就不敢公开地收拾收拾东西就走，而是首先同他和解，甚至还竭力討好女管家。她制定了一个反映她心里状态的极端复杂的計划，把一切寄托在尼古拉·安东內奇动身去波尔雪沃村科学家休养所的时机。二十年来，她这是第一次离开家，一只手拿着伞，一只手提着帆布旅行包，悄悄地离开了莫斯科。

……薩尼亚向来是六点多鐘起床，我們在早飯前先去洗澡。这天早晨也是如此。这个早晨和任何一个礼拜天的早晨似乎并沒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的确是沒有！可是我为什么又記得这么清楚呢？仿佛是昨天发生的事情一样。我和薩尼亚手拉着手，从山坡上跑下去，他一晃一晃地平衡着重心，从一条搭在小河上的白楊树干上輕巧地跨过，我干脆脫掉鞋涉水过去，我感到沙底上有着一道道密密的皺紋。这些旧日的情景为什么記得这么清楚呢？为什么我到現在还能重述我們当时談話中的每一句話呢？为什么我到現在似乎还能感覚到娇阳斜照在湖上的那种迷迷蒙蒙，梦一般美丽的景色呢？为什么我会怀着那样一种愁腸寸断的柔情回忆这天早晨所发生的种种微不足道的細节呢？当他走出水来，双手抱膝和我并肩坐着时，在他那晒得又紅又黑的脸上，肩膀上，胸膛上的水珠，和我脑后那一綹湿漉漉的头发我都記得非常清楚。为什么我連薩尼亚跟一个翻卷着褲腿，带了一张自制的魚网的小孩講解怎样用柴火和腐肉捉大虾的細节都記得清清楚楚呢？

因为經过了約摸三四个鐘头之后，所有这一切——我們俩人这次絕妙的游泳，朦朧的湖光，湖水中靜止不动的河岸的倒

影，还有那带魚网的小孩，以及千百种其它的思想，感情，印象——所有这一切都驟然飞到九霄云外去了，仿佛是从倒过来的望远鏡中看去一般，显得渺小，微末和无限的遙远……

3 “可不要忘了，你是相信我的”

等我跑进城时，已經找不到薩尼亚了。不知是为什么，我在涅瓦大街下了电車，在“美味之家”寬大的橱窗前停下来，看张貼在里面的，最高統帅部出的第一张战报。如果可以把时間停止住的話，我一定要把它停止在这一个时刻上。我紧貼着橱窗站着，一气讀完了这张战报，回过头来，便看見了一张张严肃的、紧张的面孔，一种奇怪的感覚突然籠罩了我，仿佛这次讀战报的事情是发生在无人知道的新生活里。在这无人知道的神秘的生活里，这天晚上是夏天第一个温暖的晚上，蒼白的影子在人行道上走动着，太阳还沒有落山，可是月兒已經挂在海軍部大樓的上空了。在这个生活里最初的几句話是用粗体字滿滿地写在橱窗上的，接連不断地有人走上前来讀这几句話。尽管人們极端不願意发生这样的事，但事情已經发生，絲毫不能改变了。

罗莎莉·納烏莫芙娜把薩尼亚留的便条交給了我，我隔不一会兒就从提包里掏出来看一看。这是用他記事本上撕下来的一张淡蓝色的紙匆匆忙忙写成的。

“亲爱的枇拉·波列金，讓我拥抱你。可不要忘了，你是相信我的。”

我們住在克里米亚的时候，养了一条狗叫作“枇拉特”①。我每次澆花的时候，它总是跟在我后面，薩尼亚曾笑着把我們

两个一起称为“枇拉·波列金”……“可不要忘了，你是相信我的”——这是我說过的話。我有一次曾經說过我相信他。他那时的心情非常好，就是这么一回事兒！我們沒有来得及道別。他是十一点鐘走的，等我到达城里时已經找不着他了，他留下的便条也沒有提告別的事，不过这完全是无关紧要的。

不知道为什么我又回到了別墅，在那兒过了一夜。似乎一分鐘也沒睡着，但終究还是睡着了，因为我突然醒了一次，感到惊惶失措，心里怦怦地跳着：“打仗了。絲毫不能改变了。”

我起身叫醒了保姆。

“阿姨，应該收拾收拾东西。我們明天就走。”

“一会兒这样，一会兒那样！”保姆气呼呼地打着呵欠說道。

她穿了一件白色的长睡衣，迷里迷糊地坐在床上，嘴里嘟嘟囔囔不停地埋怨，我只管滿屋子里走来走去，沒有理会她說些什么，后来又把窗子打开，外面稀疏的小树林里寂然无声，充滿了宁静的幸福！

姥姥听見我們談話，把我叫了过去。

“喂，卡佳，你怎么啦？”她严厉地問道。

“姥姥，我們連告別一下都沒来得及！怎么会弄得这样，我們連告別都沒有！”

她瞧着我，吻我，然后偷偷地划了个十字。“沒有告別也好，这是吉祥之兆，意思就是說他很快就要回来的。”她說道。我感觉自己在哭泣，感覚到我今后再也不能，不能，可是究竟不能什么呢，連我自己也不知道……

---

① 枇拉特原意是海盜。——譯者注。

彼加坐晚車回来了。他的样兒十分疲憊，一脸心事，不过神色很坚定，这是和他往常完全不相象的。

我从他口中第一次听見要把孩子从列宁格勒撤走的消息。我們的别墅是那么美好，我和保姆在这兒栽种了很多花草——紫罗兰和烟草花，花坛上已經出現了初生的嫩苗，而現在却不得不离开这座别墅，我覺得这样的事情未免太不近情理了。整个六月里一直很冷，可是就在这几天开始热起来了。在这样悶热的天气里，把小彼加装在挤得滿滿的、肮脏的車厢里，不仅到列宁格勒，而且还要到别的地方，到另外一个陌生的城市里去！

彼加說，艺术家协会决定把孩子們送到雅罗斯拉夫去。他已經給小彼加和尼娜·卡比丹諾芙娜登記上了。保姆問題是件比較麻煩的事，只好以后再想办法。

他很快地把东西收拾妥当，跑到外面去叫了一輛运貨馬車，然后又到楼上去找姥姥，因为她声明說，她不願到雅罗斯拉夫去。我不知道他們都談了些什么話，也不知道为什么姥姥对雅罗斯拉夫有那么大的反感。但过了半个鐘头以后，他們走下楼来，彼此的神色都很滿意，而且姥姥当时就动手給口袋縫拉鎖，同时又尖刻地批評了保姆的科学动作。

除我以外，大家都有点兒什么事情可作，就連小彼加也在一本正經地把玩具往三合板作成的兒童提箱里装，使劲想把小滑稽人的头扭下来，因为带着头塞不进箱子里去。

我渾身无力，沒精打采地坐在因搬家而弄得杂乱无章的房間里，一直到最后，等彼加走来关切地对我說道：

"卡佳，亲爱的，清醒清醒吧！"

……我們回到列宁格勒，彼加把我带到艺术家协会，对一个人說我什么事都能作，于是我馬上就被安插下来，搞一些多得沒

有止境的名单，关于这些事情我都不准备詳細叙述了。

命令規定发送兒童时不准媽媽和保姆跟着。因此最主要的事就是和这些媽媽保姆周旋。刚刚把她們的名字从名单上勾掉，可是不一会兒她們又通过某种方式出現在名单上了。

我对这件事处理得大概不够好，一位恶狠狠的小个子女艺术家突然从我手中把名单夺了过去。可以断定，以后大約再不会有一个媽媽，一个保姆能从她那兒得到絲毫寬大处理的。我們的保姆是第一批就被勾掉的。

去雅罗斯拉夫的事情还需要到市苏維埃去設法，就比如要客車而不要貨車的問題，以及其它成千上万的不可預料的事情一样需要設法，因为这几天中所发生的一切事情是过去从来沒有碰到过的。

我們先去市苏維埃，然后又到美术学院院长那兒，求他給市苏維埃打电話。我們接收路上用的和吃的东西，縫制带号碼的袖套。不知怎么搞的，我也成了那种什么事情都得知道，别人有什么事情都来找我的女人了。

开車的日期規定在七月五日，后来又改到六日。就現在看来，当时那种每时每刻都在逼近的，最后終于把这座有四百万人口的大城市完全控制了的焦急心情，以及收拾行囊的忙乱状态，因为即将和孩子們别离而引起的痛苦，所有这一切只不过持續了几天功夫，不免感到有些奇怪。

列車誤点了，孩子們在候車室里站了很久。他們站在一排排的成年人中間，这样作是为了防止他們的父母阻碍上車工作。但整齐的行列早就被打乱了，疲憊不堪如痴如顚的母亲們早已偎在自己的孩子身边了。天气很热，孩子們都要水喝。我們只好劝說他們，要他們忍耐一下。七月的尘土和悶热仿佛也同大

家一起，分担着别离前的苦痛。

人流終于开始移动了。前面是年龄較大的学生，然后是年龄較小的学生，再后就是六、七岁的小孩子。他們手牵手雄糾糾地走着。看到他們这样小就背着背包走路，实在不能不令人伤心落泪！他們是到某个地方去，可是到哪兒去呢？还在家里的时候，我一看見彼加的背包，立刻就感到說不出的难过。每个人都跟在自己孩子的后面，我也尾随着小彼加向前移动，他和一个胖虎虎的，很整洁的小姑娘走成一对。我夹在人群中，和所有的人一样停在入口处旁边——送行的父母不能再往前走了。我也和所有的人一样，为了不致哭出声来，紧咬着嘴唇，目送他离去。然后我又跑到貨車站，因为东西送来后需要照料，免得把兒童的行李和大人的攪混在一起。

火車应該在四点鐘开出，开車的时間非常准确。彼加直到最后一分鐘才跑来——后来我才知道，他和校长到斯莫尔尼宫去了一趟。别人把孩子从窗戶里递給他，他抱着孩子，把孩子长满黑发的小脑袋紧貼在自己的脸上，稍微站了一会兒。姥姥看到这一場面，受了很大的刺激。他見姥姥很激动，便匆匆地吻了吻孩子，連忙送进車厢去了……

一直到今天，每当我回想起孩子們离开时的場面，心里就特别激动，甚至无力把当时的情景完滿地叙述出来。在战爭年代里遭受的苦难似乎够多的了。那些怪异的，异常强烈的印象使人往往心碎胆裂，永远也不能忘怀，可是在我的心里，这几次送别孩子的場面却是单独屬于一类的，比其它的痛苦更为突出……

4 “我們一定能見面，但不会很快”

虽然艺术珍品收藏所的人說，列車已經平安到达雅罗斯拉夫，很多人带着鲜花来欢迎孩子，可是我很久也沒收到姥姥的电报。同时，他們还要由雅罗斯拉夫到一个叫什么脓谷村的地方去。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覺得孩子們在一个村名这般令人憎恶的地方不可能过得很好。我收到了琪尔加一封极为悲观失望的信，她带着孩子和媽媽也疏散到什么地方去了。瓦里亚仍旧留在莫斯科，这是他們第一次分离。使我惊奇的是她居然对那很可能落到西夫切夫·符拉什克的法西斯的炸弹都不怕，反而怕一个叫任卡·柯尔巴克察的姑娘，因为她向瓦里亚卖弄风情。可怜的琪尔加是哭着写这封信的，因为信紙都濕透了。我从心眼兒里可怜她，虽然事情很明显，战爭使她变糊塗了。

最令人忧虑不安的是关于薩尼亚的情形和一些使我苦恼的梦。我梦見自己在对他生气，为了什么呢？他脸色蒼白，疲倦不堪的样子，攢着眉头听着……

罗莎莉·納烏莫芙娜在从前的“爱里特”电影院的办公室里設了一个医疗站。因为罗莎莉·納烏莫芙娜說我“护理病人有丰富的經驗”，所以区苏維埃的防卫三人小組就建議我去当护士。

“塔塔林諾娃-格利高里耶娃同志，你要知道，”防卫三人小組的委員，一位头发斑白，心地善良的医生秘密地对我說道，“假如你不答应的話，我們就立刻派你去修建工事……”

修建工事，或者象列宁格勒的人所說的那样，在“战壕”里工作自然比作护士要艰苦得多，但我还是謝过他的好意，拒絕了当

护士。

我們傍晚出发，整夜都在中罗加特卡挖反坦克壕。这兒的土地是粘土，非常坚硬，先要用鶴嘴鎬头刨松，然后才能使用铁锹。我被分配在列宁格勒一家出版社的工作队里，正如周围的人們开玩笑所說的那样，这是一个替"希特勒掘坟墓"的高級工作队。这个工作队几乎全部是妇女：女打字員，女校对員，女編輯。使我感到奇怪的是，不知道为什么她們很多人的衣着都非常講究。我問一位皮肤黑黑的，长得相当漂亮的女編輯，为什么穿着这么华丽的連衣裙来挖战壕。她笑了笑說道，因为她們"实在沒有别的衣服"。这些人的生活完全是另一个世界，是戏剧，文学和艺术世界的人；这个圈子里的人一向使我感到兴趣。但是现在，当这些漂漂亮亮的女知識分子手里拿起鎬头，用力在刨那坚若磐石的深褐色泥土的时候，縱使談話偶尔涉及艺术工作方面的事情，諸如最近的新戏罗，艺术家尔同志不該搞"席尔瓦"①的舞台設計，但她們此时也沒有閑情逸致来大談其艺术了，因为在所有的事物后面，都摆着一場折磨人的，避不了忘不掉的战爭。

我和黑黑的女編輯分在一組，她說她的丈夫和两个兄弟昨天上前綫去了。她特别担心她的弟弟，因为他的身体很弱，完全是个孩子，她的丈夫也极力劝阻过他，可是怎么說也不行。我把蘼尼亚的情形对她講了。我們默不作声地工作了一段时間。我們把抬架放在战壕深处的地上，另外的姑娘就把土倒在抬架上，我們再把抬架抬起来，倒在战壕的陡坡上。我沒有对她說从开战的第一天就沒有得到蘼尼亚的消息。昨天，我給一位和他同

① 匈牙利作家伊·卡尔曼（1882—）的一部馳名的小歌剧，一九一六年开始上演。——譯者注。

在一个大队的飞行員的母亲打了一次电話，她說她收到一封从里宾斯克寄来的信。或者薩尼亚也在里宾斯克吧？那兒也許正在組織飞行部队。不过，如果这个根据是对的話，那在苏联境內我也可以举出另一个城市的名字来。我沒有权利知道他究竟在什么地方以及他的情况怎样。假如他牺牲了，我也不知道他是在什么时候，是怎样牺牲的。也許那个时候我正在看戏，或者是什么感觉也沒有地正在睡觉，或者是在和别人談笑；——就象現在队长建議我們要机械地工作，也就是說心里想着别的事情工作时，我和黑黑的女編輯互相看了一眼，都放声笑了起来。这个建議眞是妙极了——我們应該想点什么事情。

黑夜不知不覚地破裂了。在天与地之間那靜止不动的，朦朧而稀微的鉛灰色晨光中，突然透露出了早晨清新的气息，那掠过原野，拂动着隐蔽高射炮的矮树丛的清风也好象与昨夜不同，飘散着黎明的味兒。在远方城市的上空，順馴得象一条条大魚般的銀白色障碍气球升起来，又隐沒在尙未露面的太阳的霞光中去了。

等干到天亮时，大家都累得脸色发白，一个姑娘甚至累病了，但我們这个工作队还是比其它的队搶先結束"課程"。我想要喝水，我的新朋友就引我去排队买克瓦斯①。卖克瓦斯的帐篷搭在一座荒蕪已久的老教堂旁边，我們已經排好队了，可是女編輯忽然建議我爬到鐘楼上去。

这是一件傻事，我已經累得腰酸背痛，总之是非常疲乏了，但我竟突然答应了。

我順着插在地里，上面张貼着墙报的抬架找到了我們的工

① 克瓦斯是用面包发酵作成的一种清凉飲料。——譯者注。

段，一群新人正朝这兒走来。难道我們才干了这样一点点嗎？这个工段联着那个工段，那个工段又联着第三个工段，远得一眼望不到头。妇女們在深达三公尺的战壕里挖土。战壕的一边陡直，一边是斜坡。有的人用鉄鍬往外揚土，有的用小車把土推走……如果一个月以前，有人对她們說她将要抛掉家庭，扔下工作，夜里跑到城外，跑到曠野来挖土，修壕沟，棱堡，塹壕，恐怕她們沒有一个人不从心底里感到好笑的。可是現在她們的确来了，并且眼看着这一条一条围繞着整个城市，仅仅在路軌交叉的地方才中断的大沟几乎就要完工了。

我不知道应該怎样来描述自己在看到这可哀的田野时的心情。田野被許多巨大的半圓形分割得支离破碎，列宁格勒的太阳黯淡地，懶洋洋地照在上面。我好象是面临着一場无法迴避的暴风雨感到非常恐怖，但同时也有一种勇敢，年輕而乐观的感情在我的心里苏醒了。

中午我回到家里，一进門就碰見了罗莎莉·納烏莫芙娜。她非常兴奋地說刚才在涅瓦大街上看見一个特务被抓住了。

“一个胖胖的家伙，留着两撇小胡子，眞是标准的特务象！呸！”她憎恶地吐了一口唾沫。“幸亏貝尔塔沒和我在一起！要不然她会吓疯了的！”

貝尔塔是个很胆小的妇人。

我們停在二楼楼梯間，罗莎莉·納烏莫芙娜开始形容这件事情发生的經过。这时从楼梯上走下来一位軍人，高統馬靴咯登咯登地大声响着，他还沒有走到我們跟前，便探身到楼梯外面往下看了看，我認出了他是卢利。

卢利是領航員，是薩尼亚的朋友，他們曾經在北方同过事，后来便分开了。薩尼亚无論在哪兒工作，总是說他沒有卢利不

行。“舒尔卡到这兒来就好了！”他从西班牙給我的信中这样說过。卢利經常到我們家里来，他是一个快乐的、喜欢吹嘘的人，留着髭子，使得他很象一个外国人。

“卡杰琳娜·伊万諾芙娜！”他很精神地对我行了个举手礼。“我敲了半天門，又按电鈴，最后实在是絕望了，才把信扔到信箱里去了。”

“薩尼亚的嗎？”

“正是。”

卢利对罗莎莉·納烏莫芙娜也同样很精神地行了个举手礼。

他說很抱歉，他只有十五分鐘的时間。我当他面沒有閱讀薩尼亚的信，只是瞥了一眼，很自然地看到了最后的一句話：“我們一定能見面，但不会很快。”

“您是从哪兒来的？您参軍了嗎？是在列宁格勒？薩尼亚在哪兒？”

卢利参了軍，是在列宁格勒。回答这两个問題对他說来并不困难。但我还在一个劲兒地追問：

“薩尼亚在哪兒？”

他沉思了一会兒，含糊其詞地回答道：

“在团里。”

“您是不願意說，对吧？那么他身体好嗎？”

“再好沒有了，”卢利笑着說道。

尽管卢利一再重复，甚至以自己的人格发誓，他只有十五分鐘的时間，可是罗莎莉·納烏莫芙娜还是跑去煮咖啡了。这时就剩下我們两个人，我終于从他口中套出了一点消息。原来在某一个地方，究竟在什么地方我不知道，正在組織一个特种任务航

空团，空勤人員主要是飞行了一千五到两千小时的民航飞行員，他們現在正在进行新机种的改装学习。

当我听到"特种任务航空团"这几个字时，心里立刻产生了一种冰冷的感觉。但我并沒有繼續追問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反正卢利也不会答复的。我只問了問，薩尼亚的改装学习是不是要进行很久。卢利又沉思了一会兒，回答說不会很久。他对所有的問題都是先沉默、考虑一会兒才回答，在他那若无其事的声調中隐含着一絲忧虑。

我給薩尼亚写了几句回話，卢利刚往外走，在門口正好碰見罗莎莉·納烏莫芙娜，他只好答应"如果可能的話"，下次再来。我們在敞着的門边又站了几分鐘，分别的时候我們突然拥抱在一起，热烈地接吻……

薩尼亚这封信写得很忧伤，然而只有我一人才能看出它写得很忧伤。

薩尼亚問到大小彼加，劝我們立即把孩子从列宁格勒送走。

"到恩斯克老人家那兒去多么好啊！"他說到这里，又替法官和达莎阿姨担起心来。从一句很謹愼的話里可以了解到，虽然恩斯克距前綫还很远，可是已經遭到轟炸了。总之薩尼亚知道一些风声，知道情况不好，所以才說"我們一定能見面，但不会很快"。

是的，不会很快。艰苦的日子已經来到了。我在屋子里来回徘徊，当我朝窗戶走时，鑲木地板的一半小方格呈阴暗色，轉回来时，另一半又变成了阴暗部份，我竭力只踩在阴暗的小方格上走。

特种任务团——"这有什么关系呢，有什么可怕的呢"。这話是自己心里說的。可是当我重把这句話大声說出来时，心里又

感到不是滋味。"他去西班牙那一次最后不是也回来了嗎。不过我应該多写些信，告訴他說我永远相信他"。

这时我才感到自己已經累得支持不住了。我躺下来閉上眼睛，立刻一切都动蕩起来：姑娘們抬着盛滿了沉甸甸的，堅硬的泥土的抬架；小推車慢慢地順着木板滚动；太阳光在深褐色的窗框上閃耀。

后来不知从什么地方照来了一片柔和的，繼白夜之后緩緩来临的亮光，所有的东西便都逐漸发白，隐退了，这时我感到自己正在打瞌睡。一切都好，都很好，就只是不願意听見隔壁凄慘的，經久不絕的呻吟声，或者歌声……

"卡佳，警报！"

罗莎莉·納烏莫芙娜搖撼着我的肩膀。

"快起来，发警报了！"

……六月末，我在涅瓦大街遇見了瓦丽亚·特洛菲莫娃，她的丈夫是和薩尼亚在"特种航空兵"一起服务的飞行員，是一位苏联英雄。我曾經和这位瓦丽亚一起到薩拉托夫去探望过我們的丈夫。記得那个时候，我听說她是个牙科医生还感到非常惊奇。

她是一个身材高大的坚强的女人，她的脸色紅潤，步履坚定。她有些地方，特别是当她高声大笑，露出两排細长的美丽的牙齿时，不禁使我想起琪尔加来。

"我的格利沙呀，"她叹了一口气，說道。"在轟炸柏林了！看到报紙了嗎？"

我們談了好久，她建議我到軍医学院的口腔医院去工作。

我开始考虑起来，瓦丽亚連忙說："首先应該看看这是一件

什么工作"，要不然就要象她过去介紹的一位太太那样，"工作了两天就走了，你看，她不喜欢那种气味。"

瓦丽亚对于"太太之流"很厌恶；还是那次去薩拉托夫同路的时候起，我就記得她的这个特点了。

这种气味确实令人难以忍受，我刚一走进两边是病房的走廊时，馬上就感觉到了。这种气味使我立刻就想呕吐，当瓦丽亚介紹我同其它的护士，X光医生，主任医生的夫人以及其它什么人認識的时候，我一直都在想要呕吐。

这兒躺着一些面部受伤的人。我刚一到，就送来了一名面部被地雷炸坏了的青年……

担任这件工作后的头两三天，我就理解到在护理这些人的时候，需要不断地增加他們的信心，告訴他們說不要紧，即使留下伤疤的話，那也不是什么倒霉的事，只要忍耐一个时期，疤痕就看不大出来了。后来我在战地外科医院工作过，那兒这种秘密是不存在的，但是每一句話里都透露出怕残废的心理。人們第一次看到自己毁容后的面貌时感到恐怖，临出院前长时間地兀立在鏡子前，无可如何地修飾自己，美化自己……

不过有时候，我們用"以后一点也看不出来"的話来安慰伤員，我們这并不是昧着良心說的。我过去从来都沒有想到过可以作一个假鼻子，或者往脸上移殖皮肤。有些伤員扎着草草捆上的綳带被送来的时候，样兒眞是可怕极了，可是經过两三个月之后，在他回到原部队时，先前那些似乎是要使他这一辈子遭到毁容痛苦的剧伤，却也不大看得出来了。

我在口腔医院工作，特别是开始一段时期是很困难的。不过正因为困难，需要对每一个字都特别注意，即使你心中感到非常沉重的时候，也要保持沉着，所以我也感到很快乐。

彼加的部队駐扎在大学河岸街。他在送走孩子后，便立刻报名参加了民兵队。一有空的时候，我就跑去看他。我們或是坐在蒜胸墻边的木材堆上，或是从語言学院蹓躂到獅身人面象的地方。其它的紀念物都已运走，或者用沙袋埋起来了，可是不知道为什么，獅身人面象却仍然和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以前，和那久远的和平时期完全一样地躺在那兒。它們躺在涅瓦河畔，茫然凝視着这无味的，人世間的紛紜。它們大睜着眼睛，伸着唯我独尊的脚爪。彼加看着獅身人面象时，脸色頓时变得柔和起来，象是在想心思似的。

“能塑出这样一只脚爪，死也无憾了，”他有一次对我說道，接着就滔滔不絕，很有兴趣地对我叙述，为什么說这是一只了不起的脚爪。

我和罗莎莉·納烏莫芙娜把他所有的內衣都縫补好了，可是他一件也沒有要，他在营里領的衣服还要次得多。总之，他是在努力爭取早日成为一个真正的战士。

5 兄　弟

我昨天晚上到他那兒去的时候，他什么也沒有講，显然命令是在夜間收到的。我这时正在值班。罗莎莉·納烏莫芙娜把我叫了出去說道，彼加往家里打了电話，要我去一趟，如果能行的話，立刻就去，不过无論如何也要在中午以前去。我的值班时間要到中午才結束，不过我請准了假，由瓦丽亚·特洛菲莫娃代替我。还不到十点鐘，我就到了語言学院。一位和彼加同营的熟識的战士在窗口里晃了一下，我連忙喊了他一声。

“您找司考伏罗得尼可夫嗎？我們馬上就想办法……”

彼加急急忙忙地从屋子里走出来，我們互相問了好，便沿着河岸街向獅身人面象走去。

“卡佳，我們就要开拔啦，”他說道。“我感到很高兴。”

他沉默了一会兒，样子很激动。

“誰也沒想到。我們最近几天本来要出发作一次行軍練习。不过，看样子情况变化了。”

我点了点头。近来从卢加附近不断送来伤員，因此不难猜出，情况发生了变化。

“我的信都写好了，”他繼續說道，一面掏着袋子。“我想請您……这封不要发。”

他取出一个未封口的，沒有署名的信封递給了我。

“这是給小彼加的。請您把这封信交給他，假如我……”

他想說“犧牲”了，嘴唇甚至都作出了說这話的动作，可是突然又孩子气地微微一笑說：

“当然罗，不是現在給他，而是要过上十来年以后。”

“要是薩尼亚，他决不会写这种信。”

“他沒有兒子啊。”

我脸上的肌肉可能微微抖动了一下，所以他吓了一跳，以为自己的話刺痛了我……我們停下脚步，他紧紧地握着我的手。

“薩尼亚怎样了？他在哪兒？”

“不知道。”

“我往軍郵站給他去过信，但是沒有收到回信。反正他生活得挺好，不会出什么事情的。”

“为什么？”

他沉默了一会兒。

"我相信不会出什么事情的。您还記得他說过：'天不負我，不过，在地面我可不敢担保。'"

薩尼亚的确說过这話。但这是很早以前的事了，而現在在战争期間，这种話听来是多么空洞。

"这封是給父亲的。"彼加从袋子里掏出了第二封信来。"假如他还活着的話。您看，全是这类的信，实在是沒法从邮局寄的，"他很感伤地說道。"我已經交涉好了，我的作品将来收藏到俄罗斯博物館里去。"

我着急地拍了一下手。

"不，这只是說，"彼加急忙解释說，"可能会被打死，每个人都应該作这样的打算。柯斯托奇金也是这样作的，还有李佛希茨，納扎洛夫。"

这些人都是艺术家。

"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但不一定就发生在我身上，天曉得，"他不耐煩地說道。"或者您以为敌人只是轟炸莫斯科，对于列宁格勒就連碰都不碰一下嗎？"

我并沒有这样想过。但他把自己所有的事情作了这样的安排，就仿佛从心里压根兒就不希望回来了似的。

"咱們还以为自己是一回事，而战爭又是另一回事，"他沉思地說道。"但我們是兵士，兵士也就是战爭。"

最后他又要把手表塞給我，这一来可眞把我惹恼了。我把他狠狠地駡了一頓，駡得他笑了，又把表收了回去。

"你眞是个怪人，我已經領了一块新罗盘表啦，"他說道。"噢，卡佳，你知道我嗎？我現在是堂堂少尉軍官，您可不要乱开玩笑呀！"

他参軍总共才一个月，我眞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取得少尉軍

衔的。不过据他說，他在学院时受过短期訓練，是預备役指揮軍官。

我們走到獅身人面象前面，象往常一样，在不知为什么拆去了胸墻，还有一块毁坏了的栏杆悬在半腰里晃蕩着的地方停下来，彼加叹了口气，注意地看着獅身人面象。他是在告别嗎？他的身材本来就很高，这时他昂着头站着，眼睛呆呆地傲然微閉，从他这瘦削的側影上看来頗有一种山鷹的軒昂气概。过了很久以后，他的营长有一次对我說，他"对于死是毫不在乎的"。說来也未免奇怪，但正就是在獅身人面象前和彼加分别的这一天，我感觉到了这种驕傲和这种对死的鄙視。

虽然他知道我向来就把小彼加看成是亲生的兒子，不过这时似乎还应該来把这个問題对他再說一遍。在别离的时候，一定要把心里話全部傾吐出来，現在我也該学一学这些事情了！但不知道为什么我沒有对他說，等我回到家里以后，便立刻对此事懊悔起来。

他又拉住我的手，吻了吻。我們紧紧地拥抱着，他低声叫了一声：

"妹妹……"

我送他到語言学院門前。虽然經过了一个不眠之夜已經感到很疲倦了，可是我仍然徒步走到彼得格勒大街。

那天天气很热，罗斯特拉尔圓柱大厅旁新舖的柏油路面也溶化了，脚一踩下去便留下脚印。从比尔热桥畔停泊的貨船上漂来陣陣清淡的松香气味。雄伟浩蕩的涅瓦河不是在流，而是在凱歌前进，正是在河身那最美丽的地方，分成了两条同样雄伟，同样浩蕩的涅瓦河。想起来也眞是奇怪，眞是荒唐，就在距离这兒几百公里的地方，居然有一些德国士兵，滿身臭汗，用一

股野兽般的猛劲向着我們的高楼大厦，向着涅瓦河上充滿了节日气息的夏天的絢烂光彩，向着比尔热桥和宫桥間新修的，綠意葱蘢的街心花园拚命地冲杀。

但暫时周围还是沉寂，平靜的，一群孩子在街心花园里嬉戏，看門老头兒手里拿着一根鉄条在小径上走着，不时停下脚步用鉄条把碎紙片撿起来。

6　現在我們平等了

每次和薩尼亚会面的日期我都記得。現在也和过去一样，我似乎永远都記得收到他来信的日子。假如不算那封他把我称作“枇拉·波列金”的短箋的話，他的第二封信我是八月十日收到的。繼后很长一段时間內，这一天都常来入梦，而且不知道为什么，尽是一些最恼人的梦，我甚至因此对自己生起气来，仿佛为了作梦也可以生气似的。

我沒有在医院里住，是在家里住宿的，因为家里沒有人，所以我一早便去找罗莎莉·納烏莫芙娜。我在院子里找到了她，这时有三个男孩站在她面前，她正在教他們如何調顏料。

“太稠和太稀都不好，”她說道。“板子在哪兒？瓦洛布約夫别搔痒。在板子上試試看。不要一齐动手。”

由于慣性的关系，她对我也用这种一本正經的腔調說道：

“頂楼和建筑物上部的木料部份塗上顏料是一种防火办法。这是耐火原料。我在教孩子們怎样塗顏料。”

“罗莎莉·納烏莫芙娜，”我畏縮地問道，“您現在不馬上回家嗎？等会兒有人要給我打电話来。”

我在等俄罗斯博物館的电話。彼加的作品早就包装好了，但不知道为什么他們还不派人来取。

"再过一个鐘头。我先带孩子們到頂楼上去，給他們分配工作，然后我就有空了。卡佳，你看我这是怎么搞的！"她把手一掰急忙說道。"有您的信，一封信！我手上都是顏料，您自己掏吧！"

我伸手到她衣服口袋里掏出了薩尼亚的来信……

同往常一样，我先草草地把信看一遍，好尽快一点兒了解薩尼亚出了什么事情沒有，然后再慢慢地，一个字一个字地精讀一遍。

"你还記得格利沙·特洛菲莫夫嗎？"他在信末尾告别时写道。"我們曾經一起在湖上播过巴黎青。我們昨天把他埋葬了。"

我到薩拉托夫不久之后，格利沙·特洛菲莫夫就离开了，所以我不太記得他的样子，更不知道他現在和薩尼亚在一个团里服务。但是瓦丽亚，不幸的瓦丽亚的形象立刻浮現在我的眼前，我手里的信不知不覺地滑下来，信紙飞散到了地上。

……該去医院了，但不知为什么我却拖着步子回到家里，完全忘記自己已經把房門的鑰匙交給罗莎莉·納烏莫芙娜了。我在楼梯上碰見了"科学保姆"，她馬上就向我訴起苦来，說她怎么也找不到工作。因为"粮食不够"，誰也不肯收用她，又說某一个女佣人到造林托拉斯工作去了，可是她現在已經干不了这样的工作等等。我一面听着她講，一面心里在想："瓦丽亚，可怜的瓦丽亚。"

我到了医院，在走进"口腔医院"以前，因为可能在这兒碰見她，所以我又把信重讀了一遍。我忽然想起薩尼亚过去从来也沒有写过这样的信給我。記得有一次在克里米亚，他回来的时候，

脸色蒼白，样子显得很疲乏，他說，他的后脑壳因为灼热整天都感到胀痛。第二天，領航員的妻子告訴我說，他們的飞机在空中着火了，他們就是駕駛着这架着火的飞机，上面还带着炸弹着陆的。我連忙跑去問薩尼亚，他笑着对我說道：

“你这是在作梦。”

薩尼亚一向爱护我，有意識地不讓我分担他职业生活中的一切惊险。現在他突然这样詳尽地描写了他的同志犧牲的情形，他甚至把特洛菲莫夫的坟墓也描繪了一番。薩尼亚居然描写起坟墓来了！

“我們把未爆炸的炮弹放在中央，然后放上較大的，象一朵朵花似的安定翼片，安定翼片愈往中間愈小，这样就构成了一座仿佛是长滿了鉄花的花坛了。”

我不知道这种想法是否太复杂，伊万·巴甫雷奇曾經說过，我把薩尼亚看得太复杂了，这不是沒有道理的。这封信里虽然沒有明說，但我讀信后就理解了他的意思是說“我們現在平等了，你要准备迎接一切，我以后什么事也不瞞着你了”。

挂白罩衫的柜櫥放在“口腔医院”，我急急忙忙穿上白罩衫，走到空場子上去，因为医院还隔着一块空地。我还沒有走到自己的病房，便听到瓦丽亚的声音。

“如果病人还不会的話，那就应該自己动手作，”她气忿忿地說道。

她正在申斥一个护士，因为她沒有用双氧水替病人嗽口。她說話的声音还是和昨天，和前天一般平常和坚决。她仍然是那么刚强，具有几分男子气概。她一面吩咐着什么事情，一面往外走。我瞥了她一眼，她仍旧是原来的那个瓦丽亚！她什么也不知道。对于她說来，什么事情都还沒有发生！

我应該把她丈夫犧牲的消息告訴她嗎？还是什么話也不要說，等那不幸的日子降临，"死亡通知書"就象給千千万万个俄罗斯妇女的那样，送到她的手里，說他"为了祖国在战斗中犧牲"。起初她也許还不明白，感情上不能接受，可是随后就会象一只失掉自由的小鳥，心兒怦怦地跳起来——跑也跑不了，藏也藏不掉。只好把你的痛苦承担下来吧！

我从瓦丽亚的办公室旁走过，連眼也不敢抬，仿佛我对她犯了錯誤似的。究竟犯了什么錯誤呢？我自己也不知道。

这一天过得很慢；伤員源源不断地送来，最后連床位都沒有了，护士长只好派我去請示主任医师，是否可以在走廊里放几个床位。

我敲了敲办公室的門，先是輕輕地敲，以后又重一点兒敲。沒有人回答。我把門推开了一点，一眼便看見了瓦丽亚。

主任医师不在，她大概也是在等他。她微拱着背站在窗前，重重地单調乏味地用手指弹掉窗上的碎玻璃片。她沒有轉过身来，沒有听見我走进去，也沒有看見我站在門口上。她小心地順着窗台迈了一步，把头在墙上狠狠地撞了几下。

我还是第一次看見人用头去撞墙壁。她不是用前額去撞，而是用两边撞，大概为的是能更痛一些。她沒有哭，脸上的表情呆呆的好象是在作一件什么正經事似的。她的头发抖动着，突然两臂一张，把脸貼在墙壁上……

她已經知道了。在这令人操心劳累的一天中，由于門診的人手不够，許多不十分紧急的手术都不得不往后延迟了，由于沒有地方安置病人，大家都感到十分焦急，而她一个人却象什么事也沒有发生似的工作着。她在一号病房教一个舌头外吊的不幸的青年說話。这时她已經知道了。因为土豆沒削干淨，因为管子

堵塞了，她用煩躁的口吻把炊事員申斥了好久。这时她已經知道了；各个病房里都可以听到她那气忿忿的充滿了自信的声音，可是在这世界上却沒誰，沒有一个人能猜到她已經知道的是什么事。

7 “叶卡杰琳娜·伊万諾芙娜·塔塔林諾娃-格利高里耶娃”

我在医院住宿的次数越来越多了，后来一住就是两三天，最后只有在罗莎莉·納烏莫芙娜找我时，我才回家一趟。

“卡佳不在，我覚得有点怪煩悶的，”她說道。

“煩悶”，这話的意思就是說她又不知道該怎样对付貝尔塔了。因为她变得愈来愈胆小，愈加不爱說話了。她每天都不上班，整天躺在沙发上，而且最主要的是她几乎完全絕食了。

她的情况很不好，所以我就劝罗莎莉·納烏莫芙娜立刻带她离开列宁格勒。可是，罗莎莉·納烏莫芙娜既不放心讓她一个人走，也不願意听要她自己去送她的話。

……屋子里充滿寂靜和空虛。太阳穿过了半掩的百叶窗的窗孔，一条一条細长的光綫照射在家具上和地板上。我挨着貝尔塔坐下，开始沉思起来，后来好象是从梦中，从一些令人厌煩苦恼的思想中清醒过来，它們仿佛是要把我带出这間屋子。屋子里摆着带布套的家具，坐着一个穿洁凈睡衣的瘦小的老太婆，她正以孩子般专心一意的神情剪裁紙餐巾，这是她近来喜欢作的一件事。

“你这么干下去，非神經失常不可……”

大概是我失口把这句話說出声来了，貝尔塔立刻放下了她

的餐巾，呆呆地看了看我。

"卡佳，有人在等您，"她停了一会兒說道。

"誰呀？"

"我不知道。"

我連忙跑回自己的房間里去。一个完全陌生的老人双手交叉着放在肚子上，在我的房間里睡着了。

我踹着脚，又回到貝尔塔屋子里問她道：

"他說他認識我嗎？"

"是罗莎和他談的。怎么啦？"

"沒有什么，不过我生来还是第一次看見这个人。"

"您这是說什么？"貝尔塔惊怖地問道。"他說是朋友！"

我劝她放心。不过我的确是沒有这样一位高个子，大胡子，吊着夹鼻眼鏡繩的可敬的朋友。我感到好笑。居然有这样的事兒！他的軍服和防毒面罩搭在椅背上，这人是一个海軍。

他終于醒了。悠长地打了一个呵欠坐了起来，象所有近視的人一样，周围乱摸了一会兒，大概是找他的夹鼻眼鏡。我咳嗽了一声，他立刻跳了起来。

"卡杰琳娜·依万諾芙娜嗎？"

"是的。"

"总之，卡佳，"他慈祥地說道，"眞是莫名其妙，我一来就睡着了。"

我睜大了眼睛望着他。

"当然，您很难認得我。可是我和您的薩尼亚却是老相識了……天哪，有多少年啦？"

他默默地計算着。

"二十五年了。我的天哪！不多不少，整二十五年。"

"您是伊万·伊万內奇嗎?"

"正是我。"

他是伊万·伊万內奇医生。我听薩尼亚講他不下一千次了。他教会了薩尼亚說話，我甚至还記得最初的那儿个可笑的詞："阿布拉木，母鷄，箱子"。他和薩尼亚一起坐飞机到过万龙坎，途中碰上了暴风雪，整整刮了三天三夜，他們除了坐以待斃之外，什么办法也沒有，若不是医生那惊人的毅力，恐怕事情就糟糕了！我总覺得薩尼亚談到他的时候甚至象一个小孩子似的那么兴奋，象講神話似的。他确是很象阿依波里特医生，生着一张紅潤的，滿布着皺紋的脸，一个昂然架着夹鼻眼鏡的肥大的鼻子，一双大手令人发笑地揮动着，他在說話的时候，总是就好象要把什么东西朝你脸上拋过来似的。

"我还在絞尽脑汁想，这到底是哪位朋友呢！医生，您究竟是从哪兒来的？您不是在很远的地方嗎?"

"不，并不远。在緯度六十九度。"

"您是海軍嗎?"

"我是一个紅海軍，长得年輕又漂亮①，"医生說道。"我現在就講給您听。先来一杯茶吧！"

不知道为什么，他把胡子貼着我的脸吻了一下。我跑去煮上了茶，然后回来对他說，薩尼亚直到現在还带着医生遺忘在恩斯克，一个荒凉而偏僻的乡村中，一座被积雪埋沒了的小屋里的听診器。

他笑了一笑。儿分鐘以后，我們便坐在一块兒談起話来了，就好象我們已經認識了一千年。事实也确实是这样，虽然沒有

① 这是苏联海軍中流传很广的一首歌中的第一句。——譯者注。

一千年，但毕竟也很久了，从我第一次听到薩尼亚談到他之后就相識了。

医生到艦队服务还是不久以前的事，是在战爭爆发以后。这是医生自己請求的，尽管涅涅茨民族自治区不同意，由一位姓列德可夫的人同他談了整一个晚上，劝他留下来，但他还是坚持自己的意見。他的兒子沃洛嘉在列宁格勒前綫的軍队里服役，医生也認为应該去打仗，而不应蹲在离前方十万八千里的地方。后来他被派到北极城潛艇部队工作。北极城不是北地城。这是在科拉海岬，距北地城两千公里的一个小城市。北极城那兒的海空軍飞行員对他說，薩尼亚在远程航空兵中服务，常去肯尼斯柏格，并且听說，远程航空兵的一个团就要調到北方来。

“怎么去肯尼斯柏格？我一点兒也不知道。”

“你瞧！”医生生气說。“亲爱的，要是您都不知道，那还有誰能知道呢？”

“从哪兒知道啊？薩尼亚写信又不告訴我这些事。”

“就假定是这样吧，”医生同意道。“反正应該知道，应該知道。”

我拿了茶来，他一口气喝了一杯，說道：“不錯。”

“現在前綫很苦，”他說道。“我見到沃洛嘉，他也說很苦。就在这兒，在列宁格勒近郊。对不起，我还給您捎来了一封信呢！”

“誰来的？”

“一个老朋友，”医生神秘地說道，一面到处找他的防毒面罩，其实防毒面罩就挂在他眼前；显然这封信是放在防毒面罩里的。——他和沃洛嘉在一个部队里。就是他告訴我的，說您在列宁格勒。临走时他托我带一封信給您。

信封上写着：“叶卡杰琳娜·伊万諾芙娜·塔塔林諾娃—格

利高里耶娃收”，和詳細的地址。为防医生在家里找不到我，上面还写着医院的地址，笔迹清晰，尖細，說是不熟悉吧，似乎又还是熟悉的。我惊异地看着信封。这封信是罗馬紹夫写来的。

“喂，怎么样？”医生郑重其事地問道。“認出来了嗎？”

“認出来了。”我把信扔在桌上。“您認識他嗎？”

“我們在沃洛嘉那兒認識的。这人挺好。干行政經济方面的工作，沃洛嘉还說，若是沒有他就会象沒有了手一样。很和藹的一个人。可惜离开了。”

我喃喃說了几句話。

“是的，很和藹，”医生繼續說道。“不錯，爱喝点酒，可是誰不喝酒呢？”

“眞有意思，他是从哪兒知道我在列宁格勒的呢？”

“这是怎么回事！难道他沒到您这兒来过？”

我沒有作声。

“唔，”医生从眼鏡上面瞧了瞧我，說道。“我以为他是您的朋友，他把您的一生經历，特别是最近几年的情况都对我講了，关于这些我是知道得很少的。”

“医生，这是个非常可怕的人。”

“哦，是这样啊！”

“总而言之，見他的鬼去吧。还要茶嗎？”

医生又喝了一杯，仍然是一飲而尽，然后取出带可可的巧克力糖来招待我。

“眞奇怪，”他沉思地說道。“怎么，你不准备讀这封信嗎？”

“不，我要讀。”

我拆开信封。“卡佳，請您立刻离开列宁格勒，”信写得很潦

草，很仓促。“我恳求您。一分鐘也不能耽擱了。我不便把我所知道的都告訴您。願我的愛情保佑您，亲爱的卡佳！您看，我都說些什么話。要不是因为您孤孤单单一个人留在列宁格勒把我急得发疯了，难道我敢說这样的話嗎？到吉赫文可以乘汽車，但如果火車还通行的話，最好还是坐火車。我的主啊！我不知道，不知道是否还能見到您，我的亲爱的，我的幸福和生命……”

8 这是医生的成績

我們每天傍晚都在彼得格勒街聚会。有一次我邀請了瓦丽亚·特罗菲莫娃来，她这次同医生第一次談到她的丈夫。他很簡单地問了几句話，她一一回答了；当时就可以看出談談她丈夫对于她說来是多么重大的事，要想掩盖自己的痛苦是多么困难。第二天她把他的来信和相片都捎来了，我們回忆起薩拉托夫之行禁不住落下泪来，仿佛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那时候我們还是不大懂事的姑娘哩！当我送她回去的时候，她的眼色悒郁而沉静，她已經感到稍微寬心了一点兒。

这是医生的成績。

他住在我們家里的这个星期中，列宁格勒前綫的情况恶化了，德寇开来許多生力軍，从早晨起就要躲警报。我睡眠很不好，总是为薩尼亚担心。有一次，我刚刚躺下还沒有脱衣服，医生敲了敲門进来了，在黑暗中他把一个小狗熊塞到我的手里。

“这是潘柯夫的作品，”他說道。“潘柯夫是涅涅茨一位出色的手艺人。留下作紀念吧。这个小白熊是我伊万·伊万內奇医

生送給您的，它会告訴您，薩尼亚能回来的。”

当然，这是无稽之談。可是現在，当我心里忧郁的时候，我便从提包里取出这个小狗熊来。說实話，我看到它就感到高兴了些。

医生每天早晨都要唱歌，或者哼几句幽默的詩歌，这大概是他自己的創作，然后长时間地在浴室里盥洗。他說德寇的空袭和他的洗澡之間有着某种神秘的联系，他只要一跨进澡盆，警报就响起来了。这样的事发生了好几次。他来吃早飯的时候，他那看了叫人很起好感的胡子，往往还是湿漉漉的。他第一件事就是把椅子拋給我，我必須抓住椅子腿給他扔回去。他有一些令人高兴的怪脾气。他喜欢使人惊訝。

医生住在我家里的这一个星期眞是好极了！这仿佛是在雷电交加的暴风雨中突然听到了安詳的人語声。

但分别的日子終于来临了。他收拾好了自己的提包，把在列宁格勒买的書都捆扎了起来。

我去送他……

涅瓦大街上似乎从来还沒有过这样多的人。妇女們推着滿載包袱、箱子、洗衣盆等东西的小推車，仓皇不安地回头看顧那些疲倦不堪，滿身尘土的孩子。一些从乡下来的，被太阳晒得黑黝黝的老头兒弯着腰，在人行道上逆着人流走着。他們是柯尔平鎮人，兒童村人……城郊的人都拥进城来了！

我們足足走了两个鐘头才走到莫斯科車站。我沒讓医生提行李包穿过广場，我自己提起行李包在旧涅瓦大街的拐角处停了一下，为的是把包裹提得合手一些。伊万·伊万內奇走到前面去了。寬闊的車站前一个人也沒有，我感到很納悶兒。

“可能現在是在里果夫加站上車吧，”我寻思道。

眞是奇怪，这一刹那間的情景我記得那么清楚：太阳光滿泻在起义广場上，穿着海軍大衣的高个子医生一步一步地跨上台阶，被台阶截成几段曲曲折折的影子随着他步步上升，車站的正門那兒，冷清清的一个人也沒有，使人感到不安……

門緊緊地閉着。医生敲了几下，一个戴鉄路員工帽子，身体丰滿的女人探出头来，不知对他說了两句什么話。他站了一会兒，然后慢騰騰地回到我这兒。他的脸色显得非常严峻。

“喂，卡佳，把行李包提到这兒来，”他說道，“回家吧。最后的一条路也被截断了。再沒火車了。”

几天以后，医生坐飞机走了。

9 撤　退

我們的司机是第一次在前綫这个地段开車，我們好几次在叉路口停下来看地图。我們已經走了一个多鐘头，使我感到惊奇的是德寇距列宁格勒还相当远。不过在奥兰林巴烏木后面，經过果斯古里茨向柯波林方面去的这个地段也是最突出的一个地段。海軍利用远射程艦炮的火力控制着这块地方。

我們向民兵师駛去，一路上我都在盼望着能够看到彼加，因为他正是在这个师里服务，我还知道团政委姓什么。

牵引車拖着被击伤的火炮迎面向我們駛来。輕伤号三三两两的在田野上沿着空曠的，尘土飞揚的大道走着。一个小矮个兒，身体很結实，两腮象小孩子似的女卫生員巴尼雅告訴我，說前面某处路上双方正在互相射击。这个姑娘的辮子盘在头上。每当汽車碰上弹坑蹦起来的时候，她都忍不住要高声大笑。

我們越过了射击区域，偶尔在車后发生了两三次爆炸，我微微敞开車后門，看見路上一团云雾般的尘土正在墜落。我們以全速冲进了村庄。司机刹住車，一面看着那被打坏的护泥板，一面咒駡着。我和巴尼雅便趁这时跑去找卫生营营长了。

这是一个极普通的村庄，周围的景物也是极普通的：柳枝編成的新篱笆，疏疏落落刚露出尖兒的树芽，院子里的砖灶，用一条繩子吊着門的谷仓，里面有一种阴森的感覚，散发出新收的干草气息。师司令部就駐在这里，前沿距这兒还有两三公里。一位皮带上插着笨大的左輪枪，穿着長褲的女卫生員指着草地尽头稀疏的小树林对我說道："就在那兒，小树林那兒。"小树林背后是一片白樺树丛，在太阳照耀下閃閃发光。

命令規定在天一黑的时候运送伤員。所以我一有空就去找彼加。我問遍了伤員，护士，师联絡政委（别人对我說，他認識所有的軍官）。我知道姓氏的彼加的那位团政委昨天犧牲了——这是政治部告訴我的。

"司考尔尼亚可夫也犧牲了，"政治部的一位校級检查員，一个身材魁梧，体質結实的汉子对我說道。

我是在吃飯的时候找到这位检查員的，大概是因为我的脸色吓得发了白，所以他停止了喝湯，向周围看了看，用一种很严厉的吼叫声問一个盖着軍大衣，躺在长凳上的軍官道：

"魯宾·司考尔尼亚可夫犧牲了嗎？"

盖軍大衣的軍官說是犧牲了。

"是司考伏罗得尼可夫，"我的音声都变了，更正道。"怎么司考尔尼亚可夫呢？我問的是司考伏罗得尼可夫少尉！"

"司考伏罗得尼可夫？我不認識这样一个人。您吃过飯了嗎？"

“吃过了，謝謝。”

我从政治部走出来的时候，两条腿还在不住的发抖……

一架飞机在村庄上空盘旋，女卫生員連忙从后院里跑出来，可以清晰地听到她們的喊声：“瑪露霞，空袭警报！”炮弹落到街上的愈来愈多，現在看得很清楚，德寇轟击的不是炮兵連陣地，而是村庄。我們的部队在撤退，村庄里迅速集滿了穿着肮脏的，被泥土染紅了的軍大衣的人，一会兒又同样迅速地走空了。一个双眉飞揚，嘴唇紧閉，尖瘦的鷹鼻子少年跑到卫生营里来求点水喝。巴尼雅把水递給他，我以一种从未对世上任何人有过的强烈的，純洁的体貼心情望着他喝水。他那干瘦的喉結一上一下地动着，他憤怒地斜着眼睛望着我們部队撤退的道路。

我們是在八点多鐘出发的，整个卫生营也和我們一起撤走了。不久以前还是那么輕盈，靜謐，光閃閃的小白樺林現在正在燃烧，一股股飘忽不定的黑烟被风兒吹着直向我們扑来。这样倒也正好，我們毫不困难地便越过了村口正在互相射击的一段道路。現在，車上載得滿滿的，所以搖晃得不那么厉害了，但每次碰到凹凸不平的地方，汽車起伏震动的时候，都可以听到一陣呻吟声。我和巴尼雅忙着照料伤員，生怕他們的头碰到車厢上；我們可眞是累坏了。

这一天是九月八日，是德寇准备进行坚决冲击的一天，他們对列宁格勒第一次疯狂地轟炸起来。凄慘的火焰迎着汽車飞来。我們的汽車开上了国际大道，看見全城仿佛都籠罩在熊熊的烈火中。伤員們絮絮不休地說起話来。透过斜射到汽車里来的血紅的反光，我看見一个头上纏着綳带的肩膀寬闊的水兵，他一面撕着貼身的衬衣，一面伤心地哭着。

10 生活在前进

商店橱窗前的木板已經陈旧不堪，有了裂縫，油漆也剝落了；花园和公园的壕沟里早已杂草丛生；由于警报频繁，百叶窗刚打开又要关起来实在沒有意思，所以家家戶戶的屋子里一清早就是黑沉沉的不見阳光。七月間我曾經去过一次的战壕早就变成了設有临时火力点的坚固防御工事，这些防御工事的鋼骨架都是在工厂里澆制成的。

在我的一生中，好象从来还沒有象在列宁格勒的这个秋季里这样紧张地工作过。我一面在俄罗斯紅十字会講习班学习，一面还經常上前綫。我因为冒着强烈的炮火从前綫上搶救伤員，甚至还受到通令表揚。

信始終也沒有，我只好愈来愈經常地从口袋里掏出小白熊来安慰自己。沒收到他的信，所以我只好徒劳无益地常常在那些因空袭柏林、肯尼斯柏格、布罗叶什基而受勛的飞行員中寻找薩尼亚的名字。

但我是在"加快速度地"工作着，象是一列疯狂的火車不顧信号灯地在向前飞馳，只有秋夜的寒风呼嘯着，閃到一旁去了！

这一天終于来到了，列車从身旁馳过，只剩下我一个人躺在路堤下面，孤零零的，渾身无力，悲慟欲絕。

不知道为什么，我从小就羞于叙述梦里的情景。我好象是把內心的秘密托付給了自己，如果我把全世界只有我自己才知道的事情都講了出来，那就等于我自己揭露了这一秘密。但是，

这个梦我还是要把它說出来。

下班以后我在医院里睡了十来分鐘，梦見自己坐在窗前学习西班牙文。我們住在克里米亚的时候，薩尼亚就曾因为我荒废了外文的学习生气过，所以我現在又重新学起西班牙文来。可是，难道窗外是克里米亚嗎？又仿佛是在天堂，結滿了毛絨絨的深青色果实的沉甸甸的李树枝低垂着，透亮的、黃橙橙的桃子光澤閃閃，好象要被太阳光融化了似的，遍地开滿了鮮花：烟草花，紫罗兰、玫瑰花，眞是百花齐放。此时万籟俱寂，突然一声震耳的鳥鳴，一陣翅膀的揮舞，好不叫人心慌！我抛下書本，跨过桌子，越过窗戶，直向花园里奔去。这是怎么回事？不知道是一只鷂鷹还是烏鴉，只見一只生着鉤嘴的大鳥蹲在梧桐树上伸展着利刃般的翅膀。这只大鳥嘴里銜着一只似乎是小鷹的鳥兒，它銜着小鷹的腿，这只小鷹已經不能叫了，只是用一双象人一般的眼睛瞪着我。我感到我的心都要沉下去了，我放声喊叫，想找根棍棒之类的东西，可是鷂鷹已經慢慢地騰空飞去了。它的头扭到另一边去不看我，展开翅膀，一动也不动地平伸着翱翔。

“就是这样，卢凱里亚·伊里尼希娜，請您把这个梦解說一下吧，”我向我們的办事員，一位使我常常想起达莎阿姨来的上了年紀的旧式妇女說道。

“您的丈夫要回来。”

“那为什么呢？鷂鷹不是飞走了，而且还把小鷹銜去了嗎？”

她想了想。

“反正是要回来的。”

我这一整天都摆脫不开这个可怕的，荒謬的梦給我的影响，晚上我約瓦丽亚到我家住宿。

空袭警报和往常一样，七点半鐘便开始了。发第一次警报

时，尽管罗莎莉·納烏莫芙娜打电話来，以自卫小組的名义命令我們下防空洞去，可是我們还是坐在家里沒有动。第二次警报我們仍然是在家里坐过了。我在防空洞里总是感到心煩，所以我早已决定，万一我要遭遇“不幸”的話，也讓它发生在清新的空气里，发生在列宁格勒的晴空下也痛快一些。我們留在家里并不是老老实实坐着，还要煮咖啡。这是一件重要的事，因为这不止是咖啡，如果在渣滓里加上一点面粉的話，还可以作成烤餅呢。

可是第三次警报又发了，炸弹落在很近的地方，房子搖晃了一下，就仿佛是一前一后地迈了一步似的。厨房柜架上的鍋子都震落到了地上。瓦丽亚不顧我怎样极力反对，拽住我的手就把我拖了下去。許多妇女站在漆黑的洞口，急促而惊慌地談論着。我听出了看門人妻子的熟悉的音調，她的名字叫居里·伊日柏尔捷耶娃，是一个韃靼人，可是不知为什么，全房子里的人都叫她瑪莎。

“九号被炸了，”她說道。“炸得很厉害。管理員吩咐拿鉄鍬掘去。”

她所說的九号是指第九食品商店的房子。

“拿鉄鍬掘去，大家都去！誰沒有鍬就去領。快拿去，妇女們，快拿去！要是将来把你炸死了，别人也要来掘你的。”

在黑暗中，她把鉄鍬弄得叮叮当当地响着。她塞了一把鉄鍬給我，又把一把給了瓦丽亚。可怕，多么不願意去啊！軍医学院外科神經医院被炸毁时，我可已經“掘”过一次了。但站在洞口的那群妇女嘀咕了一陣之后还是去了。所以我們也跟着她們走了。

这是一个美好的夜晚，象列宁格勒人所說的，最“适于空袭的”晴朗的夜晚。一輪圓月象黃色气球似的高悬在城市上空，

霜冻刚刚开始，空气清新而凛冽。在这样的夜晚散散步，和亲密的朋友共拥一件斗篷坐在河边，傾听脚下波浪冲击着石岸的声音該多么好啊！

可是我們却扛着鉄鍬，拖着疲憊的身躯，一声不响，憤憤地走着，到房屋的废墟里去掘活人，或者掘死人。

“九号”房被劈成了两半，炸弹把五层楼全打穿了，在烏黑的横七竖八倒塌的地方，露出一所狹窄的列宁格勒式的院落，地面上映着一些怪异的支离破碎的影子。房屋是向前倒下的，瓦砾把街道都堵塞住了，在这碎砖、家具、鋼架堆里，高高地竪着一块鋼琴的翼板。三楼上歪歪地挂着一个食橱，可以清楚地看到墙壁上还挂着一件大衣和一頂女帽。

象上一次在病院的瓦砾場上一样，周围死一般的寂靜，人們不慌不忙，鎮定得出奇地走近这所房屋，連說話的声音也是那么不慌不忙，謹愼小心。一个女人尖叫了一声，扑倒在地上，大家把她抬到一旁，一切重又归于寂靜。一个被炸死了的老头兒，穿了件白色的大衣，身上落滿了石灰和碎石，躺在人行道上，人們走过的时候，看了看他的脸，又慢慢地从他身旁繞过去了。

地下室浸滿了水。首先得想个排水的办法，一位負責救护工作的，清瘦俐落的警士把我和瓦丽亚指派到水泵上去抽水。

脚下的地面动了一下，又靜止下来了。在我們的头頂上，曳光弹象一道道黃色的弧光一个跟着一个向天空竄去。探照灯光神奇地忽而縮短，忽而伸长地交叉着；我似乎看見在一个灯光的交叉点上閃过了一架小飞机。

高射炮开始射击了。刚才声音还很远，可是一忽兒便越来越近，仿佛是一个巨人大踏步迈过市区，一面用几千支手枪向天空射击似的。我一面不停地工作，一面抬起头来朝天空张望了

一下，心里不禁大吃一惊：一面是探照灯疯狂的探索，另一面是漠視着人間一切的渾黃的圓月，和那明凈的黑夜的恬靜，这是多么罕見的对照啊！机枪短促的噠噠声，五光十色的信号弹在晴空中急速飞馳，这幅战爭的图画多么可怕，又是多么美丽啊！

救护車停在民警用来把被炸房屋圈起来的繩子旁边。各种工作正以全力进行，喧嚣声，嗡嗡的人声从地下室不断传来。人們从下面走出来时，一个个脸色慘白，水湿到了腰部，看来牺牲的人并不多。

瓦丽亚脸色紅紅的，显得十分漂亮。她不断地从破碎的家具堆中撿出一些褥垫、被盖和枕头来，安排着受伤的人，給別人作人工呼吸，叫喚卫生員。随救护車来的两位医生象小孩子一样跑来跑去听从她的每一句話。

她把裙子提高一些，走到地下室去，把一个渾身透湿的人架了出来。瘦小的警士連忙跑过来协助她，卫生員也把担架抬过来。

“放上去，”她以命令的口吻說道。

这是一个紅軍战士，或者是一个軍官。他穿着一件因为被水浸湿，顏色变黑了的軍大衣，沒有戴帽子。大家把他抬上担架。他的头垂在胸前。瓦丽亚捧着他的下顎，他的头就象玩偶似的輕輕仰到后面去了。在这张被深黃色的乱发遮住了前額的脸上，一个熟悉的形象閃了一下；在几分鐘之內，我一面工作，一边竭力回想，我曾經在哪兒看見过这个人。

“这就行了，現在他能活了，”瓦丽亚用低沉的，气忿忿的声調說道。

她撬开他的牙关，把手指塞进口里去。他的头在她手上搖动了一下，哆嗦起来，嘴里呼嚕呼嚕地，急剧地往里吸气。

“啊哈，还咬人呢，好宝貝！”瓦丽亚又說道。

水泵的把手一上一下地动着，我断断續續地看到瓦丽亚給他进行的工作。他現在已經坐起来，紧閉着眼睛在艰难地喘息。他的脸孔在月光的照耀下显得很白，簡直白得可怕，再加上他那个扁鼻子和他那好象是用粉笔勾画出来的方下巴，这张脸我曾經看見过千百次，可是現在我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沒有認出……

我到今天也还不明白，为什么我当时沒有讓他們把罗馬紹夫——这个人是他——送到医院里去。他穿着軍大衣，敞着怀坐在地上。他抬起眼睛，眼光里还充滿着恐怖，恍惚的神情，模模糊糊地看見了我，有气无力地叫了一声：“卡佳”。說来也难以令人相信，不过我听見他能說話时眞是高兴。当他确信是我站在他的面前，手里拿着瓦丽亚吩咐給他嗅的瓶子时，他并沒显露出惊訝的神色。可是，当我拿起他的手检查脉搏时，他紧咬着牙关，打着寒战，声音稍微大了一些，又說了一次：“卡佳，卡佳”。

快天明的时候，我們回到了家里。我們踉踉蹌蹌地走着——炸弹虽然不是在我們头頂上炸开了五层楼，虽然沒有把我們埋在灌进了水的地下室里，可是我和瓦丽亚这时的感覚也并不比罗馬紹夫好多少。我們在前面走，瑪莎和另外一个妇女架着罗馬紹夫跟在后面。他总是不放心，怕背包丢了，最后瑪莎气冲冲地把背包送到他的面前說道：

“你别光顧了想背包，你多想想上帝吧。傻瓜，你这是撿了一条命，你該多做点祷告，念点可兰經！”

我們好容易走到家里时，咖啡这会兒是最受欢迎的东西。我們几个脏得象魔鬼一般，蓬头垢面的人，把罗馬紹夫交給了罗莎莉·納烏莫芙娜之后，便躺倒在厨房的床上了。

"总而言之，我始終还不明白，他究竟是怎样一位大爷，"瓦丽亚說道。

"他是世界上最坏的人，"我疲憊不堪地回答道。

"傻瓜，那你干嗎还把他弄来呢？"

"老朋友啦，有什么法子呢。"

我喝咖啡喝得热起来了，开始脫下連衣裙，脑子里忽然一陣发迷，最后在我眼前出現了一张大白脸，梦中我无可如何地揮动着手想撵开它。

11　晚餐。不是說我

罗莎莉·納烏莫芙娜把他的床位舖設在餐室里。等我們出来时，他还在酣睡。被子滑在一边，他穿着一身干干净净的內衣；瓦丽亚用她那习慣的动作順便把被子掖了掖，整理了一下，他紧咬着牙关在呼吸，眼瞼間露出一綫眼珠，——現在，这个罗馬紹夫和世界上其它的罗馬紹夫决不可能混淆了！

"眞是最坏的人嗎？"瓦丽亚悄声問道。

"是的。"

"不过我看也沒有什么嘛。"

"你发疯啦！"

"老实說——沒有什么。你想想看，他为什么这样睡？因为他的眼瞼太短了。"

……为什么我会以为罗馬紹夫到傍晚就应該象那已逝的黑夜的幻影一般消失呢？事实上他并沒有消失。我給家里挂电話，接电話的人不是罗莎莉·納烏莫芙娜，而是他。

"卡佳，我需要和您談談，"他用一种尊敬而强硬的口吻說道。"您什么时候回来？要不然我到您那兒去，怎么样？"

"您来吧。"

"不过我怕医院里不太方便。"

"那倒也是。不过我得过几天才能回家。"

他沉默了一会兒。

"我知道，您沒有絲毫想看見我的願望。不过事情已經很久了……您不願意遇見我的原因……"

"不，并不很久……"

"您指的是我請巴甫洛夫医生带的那封信嗎？"他赶忙說道。"您收到这封信了嗎？"

我沒有回答。

"請原諒我。"

又是一陣沉默。

"我們这次見面不是偶然的，我是来找您。因为听見有人喊叫，說有些小孩还在地下室里，所以我就向地下室奔去。但这都不相干。我們必須見見面，因为事情和您有关系。"

"什么事？"

"很重要的事。我要把所有的情况全告訴您。"

我的心跳了一下，就好象是不知道誰在和我談話似的。

"您講吧。"

現在他又不說話了，沉默了那样久，我几乎都要把听筒挂上了。

"好吧，那么說来不需要罗。我这就走，以后您再也見不到我了。我敢发誓……"

他还嘟囔了几句什么話；我仿佛看到了他怎样站在那兒，紧

咬着牙关，閉着眼睛对着听筒沉重地喘息。可是他这一陣沉默和决絕的态度突然使我相信了他。于是我告訴他，說我就去，然后便把听筒挂上了。

我用自己的鑰匙开了房門，走到餐厅門口停下，我看見餐桌上放着奶酪和牛油。这眞是令人难以相信的，居然有眞正的奶酪，通紅的荷兰奶酪，牛油也是眞正的牛油，說不定还是奶油，装在一只大搪瓷杯里。一个很少見过的，不是列宁格勒做的面包大大方方地被切成了几大块。当我走进来时，罗馬紹夫正用厨房的菜刀在开罐头。放在桌上的背包里翘着一只瓶子……

罗莎莉·納烏莫芙娜蓬散着头发，一脸幸福的样子从臥室里走出来。

“卡佳，您看，貝尔塔怎么办呢？”她悄声問道。“我可以請她来嗎？”

“我不知道。”

“我的天哪，您生气了嗎？我只不过是想問問……”

“米沙，”我大声說道，“罗莎莉·納烏莫芙娜求我問一問，可不可以把她的姐姐貝尔塔請来一块兒吃飯。”

“这有什么問題！她在哪兒？我自己去請她。”

“她也許会害怕您。”

他很不自然地强笑了笑。

“請吧，請吧！”

这是一次十分欢乐的晚餐。可怜的罗莎莉·納烏莫芙娜往面包上抹牛油或奶酪的时候双手都在发抖。带着一种宗教式的虔誠的表情吃着。貝尔塔这位小矮个兒，白头发，尖鼻子，眼光流散的老太婆，每吃一块面包都要嘟囔上几句。罗馬紹夫刺刺不休地只管嘮叨，一面磨牙，一面喝酒。

这时我才把他好好地端詳了一番!

我們已經好儿年沒有見面了。他过去相当肥胖。在他的脸上,在他那略微挺起的身躯上,那种发福的人所特有的派头正在开始形成。他和所有相貌极端丑陋的人一样,穿戴总是百般講究,甚而浮华炫耀。

他現在消瘦了,骨头都露出来了,穿着領章上有两道横杠的軍服上衣,衣服外面紧紧地扎着吱軋作响的新皮带;难道他当了少校嗎?脑壳上的骨头也显出来了。在他那一眨也不眨,睜得溜圓的眼睛里,好象有什么新的东西——是劳累嗎?

"我变样兒了,是嗎?"他发現我在打量他时,这样問道。"战爭把我改变了。灵魂、身体,一切都变了样。"

如果一切眞是变了样的話,那他一定不会拿来向我表白的。

"米沙,您从哪兒弄来这么多的好东西?是偷的嗎?"

显然,他沒有听清楚最后的一句話。

"吃吧,吃吧!我还可以弄得到的。这兒什么东西都可以弄到。您們只不过是不知道門路。"

"眞的嗎?"

"当然,当然。有人就行。"

我不知道,他說这些話是什么意思,但我不由得把抹了牛油的面包片放在盘子上。

"您早就在列宁格勒了嗎?"

"今天是第三天了。我是从莫斯科調到軍人商店来的。我以前在南方战綫。有一次落进了包围圈中,侥幸才突围跑出来了。"

这是事实,是我最害怕的事实。我漫不經心地,怀着一种久已忘怀的,覚得他是听从我駕馭的感情听着他講。

“我們向基輔撤退。当时我們并不知道基輔已經被切断了，”他說道。“我們心想，鬼才知道德寇在哪兒，哪知他們就在赫里斯金洛夫卡附近，距前綫二百公里的地方和我們遭遇上了。眞是慘不忍睹，”他笑着补充了一句說，“不过，关于这件事，留待以后再說吧。現在我想告訴您，就是我在莫斯科看見了尼古拉·安东內奇。眞也奇怪，他哪兒也沒有去。”

“眞的嗎？”我毫不在意地說道。

我們沉默了一会兒。

“米沙，您似乎是打算談什么事情吧？那么到我屋子里去吧。”

他站起来，伸了伸腰。嘘了一口气，把皮带整理了一下。

“好，走吧，可以讓我把酒带着嗎？”

“請便。”

“哪一种？”

“随您便，反正我不喝。”

他从桌上拿起酒瓶，杯子，謝过了罗莎莉·納烏莫芙娜，便跟着我走了。我們坐下来，我坐在沙发上，他坐在桌旁。这是过去薩沙的桌子，桌上放着一只高脚杯，她的画笔放在里面，从来沒有人去触动过。

“說来話长。”

他很激动。我却很鎮靜。

“太长了……您抽烟嗎？”

“不抽。”

“許多妇女在战争期間都抽起烟来了。”

“不錯，有許多。医院里还在等我哩。給您整二十分鐘的时間。”

“好的，”罗馬紹夫沉思着，一字一頓地說道。“你知道，我是八月里离开列宁格勒前綫的。我本来不想走，实指望見您一面。但命令总是命令。”

薩尼亚常爱重复这句話，所以我听到罗馬紹夫說出来心里就感到不舒服。

“我不准备叙述我是怎样到南方去的。我們原来在基輔一带苦战，后来被击潰了。”

他說的是“我們”。

“我在赫里斯金洛夫卡碰上了一列繞道基輔的軍用卫生車，就搭乘这列火車到烏曼去。这是几节最普通的暖車，里面躺着伤員，……其中有很多重伤号。車在酷热，气悶和滚滚风尘中行駛。”

貝尔塔正在隔壁房間里祷告。

他站起来，不耐煩地关上了門。

“我在上車的前两天受了內伤，伤的确很輕，只不过身体的左側有时感到刺痛。这块地方已經变成褐色的了，”罗馬紹夫勉强笑了笑說道。“現在还这样。”

那天晚上是瓦丽亚替罗馬紹夫換的衣服，她說他身体的左側受了灼伤，大概这就是他所說的“变成了褐色”的那块地方。

“我只好担負起我們列車上的事务工作。首先要把伙食搞好。我可以驕傲地說，在这一个礼拜之內——我們总共走了两个礼拜，——沒有餓死一个人。不过現在的問題不是說我。”

“那是說誰呢？”

“和我們同行的有两个姑娘，她們是斯坦尼斯拉夫师范学院的女大学生。她們給伤員送飯、換綳带，凡是她們能够作到的事都作。有一次，她們之中的一个叫我到一位飞行員那兒去——

这位受伤的飞行員躺在一节暖車厢里。”

罗馬紹夫斟上酒。

“我問姑娘发生了什么事。‘您和他談談吧？’——‘談什么呢？’——‘他不想活了，説要自杀，总是不停地哭。’于是我們就走到他那兒去了，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兒，我以前一次也沒有到这节車厢里去过。他脸向下趴着，腿上纏着綳带，不过实在是纏得太馬虎，太不象話了。姑娘們坐到他身旁，招呼了一声……”

罗馬紹夫停頓了一会兒。

“卡佳，您怎么不喝呀？”他的声音有点兒嘶哑地問道。“总是我一个人喝，要是我喝醉了，您怎么办呢？”

“我就把您赶出去，把您的故事講完吧。”

他把酒一飲而尽，来回走了一圈兒，坐了下来。我也啜了两口。世界上的飞行員多着哩！

12 我相信

下面就是罗馬紹夫所叙述的故事。

薩尼亚的脸部和腿上都受了伤，脸上的伤口已經在合縫。关于这件事，罗馬紹夫是从一张报导了薩尼亚的內部刊物“紅鷹”报上偶然看来的，所以他沒有說薩尼亚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負伤的。他带着这一期报紙准备給我看。毫无疑問，要是沒有这次搶救兒童，差点兒淹死在地下室里的荒唐事情的話，那么这份报紙一定会送到我手中的，不过这并沒有关系，他已經把这篇报导背熟了：

“格利高里耶夫大尉駕駛着飞机，执行战斗任务后返航时，

被敌人的四架歼击机追上。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激战中，格利高里耶夫击落敌机一架，其余三架未敢应战，仓惶遁去。格利高里耶夫的飞机虽被击伤，但仍坚持飞行。在距战綫不远的地方，他又遭到两架'容克'飞机的攻击，格利高里耶夫駕駛着被火焰包围了的飞机，成功地撞下了一架'容克'飞机。某部全体飞行員将永远紀念这些斯大林之鷹——为祖国战斗至生命最后一刻的共产党員格利高里耶夫大尉，領航員卢利，射击报务員卡尔宾科和空中射击員叶尔紹夫。"

全文可能不够准确，詞句可能有些顚倒，可是，罗馬紹夫以自己的头顱来担保这篇报导的內容的眞实。他把这份报紙連同其它一些非常重要的文件一起放在图囊里。图囊掉进水里去了，所以报紙湿成了一团，等他把这张报紙烘乾以后，又恰好不見了登載着这篇报导的那一部份。不过这也沒有什么关系。

因此，薩尼亚就算是牺牲了。但事实上他并沒有死，只是脸上和腿上受了伤。脸上的伤很輕，可是腿上的伤看样子是相当严重的，至少自己不能行动了。

"他是怎样到軍用列車上来的呢？"——"我不知道，"罗馬紹夫說道，"我們沒有談到这件事"。——"为什么？"——"因为我們見面之后过了一小时，距赫里斯金洛夫卡二十公里的地方，德国鬼子的坦克对列車进行了一次扫射。"他就是这样說的："扫射"。

这是意想不到的事——在我們的后方居然遭遇上了德寇的坦克。头一发炮弹就打坏了机車，列車停下来了。伤員們跳到路基下面四散奔逃，德寇隔着列車用榴霰弹向他們轟击。

罗馬紹夫首先向薩尼亚奔去。要冒着炮火把他从暖車里拖出来是很不容易的，但罗馬紹夫还是把他救出来了；他們躺在車

輪后面。車厢里的重伤号在叫喊："弟兄們，帮一帮忙吧！"可是德寇不停地射击，而且已經打得很近，打在邻近的車厢上了。这时躲在車輪后面再也不成了，于是薩尼亚說道："你快跑吧，我身上有手枪，我不会讓他們活捉的。"但是罗馬紹夫沒有丢下他，尽管薩尼亚打他的手，詈罵他，他还是从壕沟里，踏着沒膝的泥水把薩尼亚拖到一边去了。后来一位灼伤了脸的中尉协助罗馬紹夫把他背过了沼地，他們两个人便留在了一个潮湿的，小白楊树林里了。

这一次眞是可怕极了：一支十分庞大的德国登陆部队侵占了距离最近的一个車站，四周圍都在进行战斗，德国鬼子随时都可能在这个小树林里出現，因为在这片沒有遮拦的地区，这兒是唯一的一个便于防御的地方。必須刻不容緩地走远一些。可是薩尼亚脸上的伤口露出来了，体温升高了，他不住地对罗馬紹夫說道："扔下我吧，不然你也要完蛋了！"有一次他还說："我認为处在我的地位，我应該为你耽心。"当他把腿放下来时，血液就往伤口流去，使他感到难以忍受的痛楚。罗馬紹夫給他作了一根拐棍：劈开树枝，綁上一頂飞行帽，就作成一根拐棍了。但他还是不能行走，罗馬紹夫只好一个人走了，不过他不是向前走，而是往回走，回到軍用列車那兒去；他希望能找到刚才那两位斯坦尼斯拉夫来的姑娘。因为沼地那边的敌人向他开火射击，所以他沒有走到列車那兒，又折回来了。

"我回来的时候已經过了一个鐘头，也可能更久一些，"罗馬紹夫說道，"就沒有找見他了。树林很小，我里里外外都走遍了。我又怕大声喊叫，不过我終究还是喊了几声，結果一点回声也沒有。我通夜都在寻找他，最后倒下来便睡着了。第二天早上，我找到了我們分手的地方；地上的青苔有的地方被擦去了，有的地

方被揉烂了，自制的拐棍竖在白楊树下面……”

罗馬紹夫后来落在包围圈中，但他和德涅泊尔区艦队的一小队水兵共同突围，回到了自己的队伍里。这以后他就再也沒有听見过关于薩尼亚的消息了……

我曾經千百次地假設过得到这个消息时的情形。也許是一封普普通通的信，只是沒有貼郵票，我拆开一看——立刻一切都不存在了，我一句話沒有說便暈倒在地上。也許是那曾經被我安慰过多少次的瓦丽亚走来，她开始說起他来，起初十分謹愼地，拐弯抹角地說，后来就問道：“假若他是眞的牺牲了，那你怎么办呢？”我便回答說：“我受不了这样的痛苦。”也許是在軍事委員会，我和其他的一些女人站在一起，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大家有一个共同的思想：“今天将会对誰說——你的丈夫牺牲了呢？”所有这一切的情景我都想遍了，只是沒有想到这件事情会由罗馬紹夫来告訴我。

自然，这全是扯淡，是他瞎編的，要不然就是从杂志上看来的。最可能的还是他瞎編的，因为在他每一句話里都透露出他特有的打算。但是，这次不明不白的，愚弄人的鬼把戏偏偏落在了我的头上，这是多么不公道，多么使人难过啊！这个人为什么要到列宁格勒来，——这兒就是沒有他已經够苦的了，——到这兒来无耻地欺騙我！我不应受到这样的报应！

“米沙，”我非常鎮靜地說道，“您在信里对我說：‘你是我的幸福和生命’。这話是眞的嗎？”

他一声不响地望着我。脸色慘白，耳朵却是赤紅的。現在当我問他：“这話是眞的嗎？”他的两只耳朵愈发紅了。

“那么您为什么要想尽方法来折磨我呢？我应該承認，有时候我也有点可怜您。一个女人对于一个热爱自己很久的人从不

产生一点怜悯的感情，这样的事是不会有的。但您这个不通事体的人怎么就不明白，假如薩尼亚真要是牺牲了的話——但願上帝保佑不是这样——我一定会痛恨你的。米沙，您应該承認这些都是謊話，而且請求我的原諒，不然我就要把您当作一个坏蛋赶出去。您講的这些事是在什么时候发生的？”

“九月里。”

“九月里，您看，我十月十号还收到他一封信。薩尼亚在这封信里說，他生活得很好，而且如果上級批准的話，可能还要飞到列宁格勒来玩一两天呢。米沙，您說这是怎么一回事兒呢？”

我不知道自己是从哪兒来的力量遇到这样的事情还能編出一套謊話！我在十月十号那天什么信也沒有收到。已經三个月沒有收到薩尼亚的片紙只字了。

罗馬紹夫冷笑了一声。

“您不相信我的話，这太好了，”他說道。“我怕的是另外一种情况。但願一切都能轉向好的一方面。”

“那就是說，刚才你所說的都是謊話娄？”

“对，”罗馬紹夫說道，“都是謊話。”

他本来是应該对我进行說服，应該向我証明，应該生气的，就象那次在义夫广場时那样，应該站在我面前气得嘴唇发顫才对。但他只是冷冷地說道：

“对，都是謊話。”

我的心不禁跳起来，又墜落下去，变空虛了。

他大概覚察出了这点，他走过来，大胆地，毫不拘束地拉起我的手，我把手掙脫开。

“如果我想要欺騙您的話，我只消把那张报紙給您看看，白

紙上印着黑字，說薩尼亚已經犧牲了。可是我却对您敘述了一件全世界再沒有別人知道的事。这真可笑，"他很傲慢地說道，"就好象我这样作是出于一种卑鄙的个人打算似的。或者說我会以为类似这样的消息能博得您对我的好感？但是我不敢对您隐瞞事实。"

我們仍和刚才一样端正地，一动也不动地坐着，可是周围的一切——薩沙那张上面放着高脚杯，杯里装着画笔的桌子，和在桌边坐着的那个人，我忘記了他姓什么的紅褐色头发的軍人，都开始慢慢地离开了我。我什么話也沒有說，我什么也不需要，可是这个軍人却不知为什么竟急急忙忙地走开，随后又带着一位白头发的文文雅雅的矮小女人回来了。她一看見我，便抱着头說道：

"卡佳，我的天哪！快拿点水来，水！您是怎么啦，卡佳？"

13 希　　望

"瓦琳加，我怎么啦？我病了嗎？"

"一点病也沒有——挺好的。"

她摆了摆手，接着便有一个人小心翼翼，皮鞋嘎吱嘎吱地响着走了出去，輕声問道：

"清醒了嗎？"

"他是誰？"

"还不就是那个人，你的那位紅头发，"瓦丽亚气恼地对我說道。

我沉默了一会兒。

“瓦琳加，你知道嗎？”

“我的天呀，还沒有出什么事嘛。噢，受了伤，这算什么了不起的事！我的亲爱的，”她貼近我，拥抱着我。“难道能这样作嗎？那我該怎么办哩——寻死嗎？你長得多么标致啊！我本来也不想談这类的話。你以前就很难过嗎？还是他不当心說錯了話呢？”

“不，他很当心，一会兒就过去了。”

“当然会过去的，而且已經过去了。你喝咖啡嗎？”

我又沉默了一会兒。

“瓦琳加！”

“什么事，亲爱的？”

“我抱着希望。”

“当然，哪能不抱希望啊！而且，也应該抱希望！你記住我对你說的話吧。你的薩尼亚万无一失，一定会回来的。”

在列宁格勒很难弄到刊載着报导薩尼亚消息的那份“紅鷹”报，我起初竭力找，并且已經从一个軍事記者口里打听到这种报是哪个部队发行的了。可是，后来我不再找了，因为彼加写信告訴我，說他亲眼看到了这篇报导，他写道：“我想来想去，总是在想着您，亲爱的卡佳。薩尼亚死得英勇，死得伟大！对我說来，他是我在世界上最亲近的人，自小就在一起的亲爱的兄弟。他的灵魂里总有一种什么东西，发出嘹亮的响声，每当听到这种青春的音响时，你就会感到生活得更加輕快。这就是我們的童年，我們的理想，他終生念念不忘的我們的誓言。我多么渴望着見到您，分担你的悲慟。”

我在回信中把罗馬紹夫所講的事情詳細地叙述了一遍，并且还附带說，我并沒有失去希望……

我回家的次数愈来愈少了。我就要在俄罗斯紅十字会講习班毕业，开始进医院工作，今后再不是“社会工作者”，而要成为一个“专职护士”了。飢餓給我造成的困难并不久，可是，象外表上比我結实得多的瓦丽亚这样的人就苦了很久。这个痛苦的消息在这样艰苦的日子里，在列宁格勒这个地方临到我的头上，对我說来反而觉得輕松一些。現在，在列宁格勒，哪怕是躺在床上，炮弹也可能从天上落下来。街道上初雪已經封地，可是，窗戶却大开着，因为还在天气暖和的时候，許多列宁格勒的居民就轉入露营状态，一直就沒有回过家。

感到輕松一些，这是因为当我在抵抗因封鎖而带来的一切灾难的同时，不知不觉地也抵抗了个人的悲慟。說也奇怪，罗馬紹夫却是理解我这种心情的。难怪他絕口不再劝我离开列宁格勒……

他又重述了一遍他的故事，我現在知道了許多新的細节，这些細节他在第一次談話中一字也沒有提到过。罗馬紹夫和中尉抬着薩尼亚过沼地的方法是把手交叉成十字，讓薩尼亚摟着他們脖子。两个姑娘中有一个名叫卡佳，所以薩尼亚非常欢喜，后来只管喊着她：“卡佳，卡佳！”当薩尼亚說“我認为，我应該为你耽心”的时候，罗馬紹夫只是笑了一笑作为回答。这也的确可笑——每一分鐘德寇都可能在小树林里出現。

这是实話，他为什么要撒謊呢？如果他眞想欺騙我的話，他只要把报紙給我看看就行了。白紙上面印着黑字，明明說薩尼亚犧牲了嘛。他这样說也是合情合理的。“可是他毕竟是罗馬紹夫，”我对自己說道，“是生着一双一眨也不眨的眼睛的罗馬紹夫。是薩尼亚称他为猫头鷹的罗馬紹夫”。

“战爭会把人改变过来的，”我用这样的話来回答自己。“他

見过死亡，他現在在那过去是他賴以为生的虛伪和欺騙的世界里感到了苦悶。他为薩尼亚作了自己所能作的事。他之所以这样作，也正是因为别人不可能設想到他会作出这种事。”

有一次我略微对他提了一下，說我很願意看見彼加。

“办妥了，”过了几天他对我說道，“明天就来。”

罗馬紹夫虽然一再說，是他通过美术学院的院长要彼加来的，这也可能純粹是一种偶合。但过了几天，彼加眞的来了。

我已經三个半月沒有看見他了。在送他走的时候，我还对他那种漫不經心的样子，詩人的派头和只顧埋头作自己的事情的作风感到十分耽心。因为这些特点在战場上对他都是很沒有好处的。可是这回走进屋里来的却是一个身体結实，皮肤晒黑了的汉子，再不象过去那样弯腰駝背，而是腰杆笔挺，双目前視，充滿着信心的人了。

我們拥抱在一起。

“卡佳，現在我也認为薩尼亚是一定会回来的，”他开头第一句話就說道，“当大家都認为他已經牺牲了的时候，而他却复活了。現在一切都結束了。他会活着的，这是我們前綫的一种預兆。他們部队里都知道他还活着。要不然，通知書早就寄来了，这是十分明显的！”

其实这件事远不是那么明显，但我还是听他講下去，我沒有力量不相信……

彼加在一清早五点多鐘就到我这兒来了。我們等候着罗馬紹夫，一直等到中午。彼加只顧在講，我听着，感覚得这好象不是彼加，而是他的小弟弟，一个皮肤紅潤楞头楞脑的小伙子在講。他穿着一件短皮袄，散发着强烈的羊膻味。他用焦黃的手

指熟練地卷着一根粗大的卷烟，他叙述了自己的情况，叙述了一个性格演变的过程。象他这样一位美术家，艺术人士上战場，最初的日子里他所看到的不是战爭，而是战爭的风景画。他自己是一回事，战爭又是另一回事。可是就这样过了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他杀死了第一个德国鬼子。

“这是怎么一回事兒？我，美术家司考伏罗得尼可夫居然杀了人？但是我杀死的是沒有权利称自己为人的人。我杀他就是为了保卫这一权利。”

他就是这样成了一枚“战爭原子”。他再不是以美术家的身份来观察战爭。他现在是一个兵士，能作的事他都作，爭取成为一个眞正的兵士。

“我在旧日的世界里有什么可作的呢？”他略微环顧了一下，感慨地說道。

我們沒有等着罗馬紹夫，我看出彼加是想在这个“旧日的世界”里独坐一会兒，所以我便先走了。我走到門口回过头，正看見他从自己那些卷成了筒状的油画中取出一张，用他那突然抖顫了起来的，变得粗笨了的手指小心翼翼地把它攤开来。

我从医院里給罗馬紹夫打了一个电話。

“来了嗎？”他兴高彩烈地說道。“您看，您还怀疑呢！”

“是的，他来了。您晚上来吧，他想見見您。”

“晚上?!很遺憾，我不能去——有件紧急的事情要办。”

“不，您一定要来。”

“我实在不能去。”

“一定要来。米沙，您听見了嗎？”

我放下了听筒。

晚上他果然来了。我們正坐在餐厅里，他一进門，便立刻伸着手向彼加走过去。

“很高兴，很高兴，”他說道，“非常高兴。說实話，应該承認，我根本沒有料到这事能成功，您原来是一位名人啊。如果您不是一位名人，那也許是毫无办法的。”

“非常感謝您，少校同志，”彼加用一种官腔答道。

“得啦，什么少校不少校！还不只是个二級軍需官！我也不准备再加豆兒了，当个少校算了。”

彼加看了看他，然后又往旁边的角落里看。显然，罗馬紹夫認为加豆兒，使人再不敢把他这位二級軍需官当成少校看待是一件輕而易举的事。

“喂，前綫的情况怎么样，听到什么消息了嗎？刚才有人对我說里高沃已經拿下来了。”

“据我所知，还沒有拿下来，”彼加說道。

“哦，还沒有拿下来！我刚才还在想：嘿，这下子可成啦，几天之內就能坐上国际列車直趋莫斯科了。这么一来只好再等一等了，是不是？”

在列宁格勒还沒有人用“直趋”这样的話来談論过这件事。我感到很不自然。可是，彼加似乎絲毫也沒有覚察到什么。

我們沉默了一会兒。

“那么，”罗馬紹夫說道，“首要的，也是唯一的一个問題，就是薩尼亚的問題！”

他为什么表現得这样鬼鬼祟祟，这样奇怪呢？他为什么笑的时候一会兒畏畏縮縮，一会兒又高傲自大呢？他为什么罗罗嗦嗦地老是講那些穿着伪装外衣，在炮火下挖土豆的消防队員的故事呢？我不知道。这些事情和我毫不相干，我心里想的只

是薩尼亚……

“只有一条路，”最后，罗馬紹夫带着一种神秘的，洋洋得意的神气說道。“問題在于基輔一带现在掌握在游击队的手里。毫无疑問，游击队和前綫指揮部是保持着联系的。应該打通这层关系，也就是說委托一个人搜集有关薩尼亚的一切情报。”

彼加架着腿，一只手捏成拳头支着下巴，目不轉睛地瞧着他。

“这里面存在着两重困难，”罗馬紹夫繼續說道。“第一：因为我們在列宁格勒，第二：这样一道要求寻找薩尼亚，或者搜集他的消息的命令只有一个很高的領导机关才可以发布，要打通这个机关的关系是非常困难的。不过天下无难事。我在这兒，在游击队駐列宁格勒司令部里有一些熟人。讓我来負責办这件事，”他的脸色轉白了，又补充說了这么一句。“自然，这也要沒有其它意外的情况来阻碍才行。”

“意外的情况”随时都有，生活本身就是一种“意外的情况”。拉多牙湖的彼岸早已被称为“大陆”①，即使用普通电报来联絡也一天比一天更困难了。

“彼加，您怎么不說話？”

“我在听呢，”彼加仿佛从梦中醒来似的說道，“沒有什么，說得很对。我很难說依靠这种联系的可能性有多大，特别是在目前。但总应該立刻开始进行。罗馬紹夫同志在这方面說得很对。卡佳，要是我处在您的地位，我就給那个部队写封信去。”

---

① 因为列宁格勒被封鎖得愈来愈紧，有如孤島一般。——譯者注。

“亲爱的，”罗馬紹夫走后，他对我說道，“我对您說什么好呢？我非常非常討厌他，不过这又算得什么呢，对不对？这是无所謂的。他身上有一种討厌的，冷酷的，隐晦的东西，在他的一言一动之中，这些感情流露得多么明显！我当时甚至想把他画下来，脑袋瓜那么方方的！不过这都是些小事情，小事情！依我看，最主要的他是一个干实事兒的人。”

“是这样！”

“而且老纏着您。”

“这是毫无疑問的。”

“您能不能同他一起到游击队司令部去一趟呢？”

“当然可以。”

“那您还是去吧。但一定要写信，要打听，这是很重要的。这样您自己的心境也会好一些。瞧您瘦成什么样兒，熬煎成什么样兒了！”他拉起我的手說道。“可怜的，亲爱的！您大概根本不睡觉吧？”

“不，我睡的。”

“薩尼亚一定会回来的，会回来的，”我紧閉着眼睛，极力控制住顫抖的嘴唇听着他說。“一切又会很美滿的，因为你們的爱情是那样的深厚，就是最可怕的痛苦在你們的爱情面前也要退却，打一个照面就退却了。除了您和薩尼亚之外，似乎再沒有人能够这样地相爱，爱得这么强烈，这么固执，終生不渝。如果有人这样地爱着您，哪兒还能談得到死呢？不能这样子下去，誰也不允許您，首先就是我不允許！还有薩尼亚呢，难道您能讓他死掉嗎？”

我一面听着他說，心里逐漸松快一些。一个模模糊糊的，遙远的回忆突然閃現在我的眼前：薩尼亚非常疲倦的样子和衣睡

着了。这时虽然是夜間，但屋子里很亮。一个瘦弱的男孩在隔壁演奏："苦尽甘来，久别重逢。一切都会美滿如意，因为我們所相信的神話还存在在这世界上……"

到前綫去可以乘电車，彼加所在的师現在駐扎在斯拉維揚克。他要求我不要去送他；这样作很冒险，沒有通行証很可能在雷巴茨克被扣留起来，但我还是去了。

"嘿，扣留，是你这样想！卫戍司令已經認識我了。"

电車里很拥挤，吵鬧得厉害，但我还是匆匆地又看了一遍姥姥来的信。彼加在最近一次就收到姥姥寄来的四封信和十二张明信片。列宁格勒在这些日子的情况就是如此：两三个礼拜誰也收不到从大陆寄来的片紙只字，可是突然一来就是一大捆邮件。我刚才在家里只来得及讀完了明信片。其中一张明信片上，小彼加用粗大的四方字母附上了一句："爸爸，我們养了一只小兎子"。他那偏着头，揚着眉梢，带着使我特别喜欢的，酷似他媽媽的那种可爱的神情写信的样子，立刻活生生地呈現在我的眼前。他現在很安全，吃得飽，身体好，姥姥也是一样。在这么艰苦的时期还能有什么更多的希求呢？

"彼加，是这样嗎？"

"当然是这样的，"他很忧伤地說道。"您不知道，我是多么想念他！"

电車已經在雷巴茨克街行駛了。有人說，到終点站要检查証件，一个人一个人地放行。彼加替我耽心，所以我就决定回去了。

"亲爱的，祝您健康。"

"好，好，我一定会健康，"他乐哈哈地回答道。小彼加也常这样回答。

車上的人都怀着心事，忙着自己的事情，我們从这些陌生人的头頂上向对方伸出手，这时我有些后悔起来，因为我对于他的情形几乎还一点兒也沒有了解到。"但这又不是最后的一次見面，我們还要見面的，"我安慰自己道。"他的部队駐得这么近，只要在医院里請一次假就去了。"

我哪里知道，到我們再相逢时，需要經过多少苦难的，惊惶不安的日子啊！

14 失　望

貝尔塔在十二月中旬空袭最頻繁的一天死去了。在这段时期，轟炸从一清早便开始，或者，更确切一点說，从夜里就沒有間断。她不是餓死的——可怜的罗莎莉·納烏莫芙娜重复了几十次，說飢餓不是原因。

她一定要把她的姐姐按規定的日子安葬，但这是不可能的。她因此請了一个細长个子，愁眉苦脸的犹太人来为死者念了一夜經。死者还按仪式穿着由两幅未縫的被单作成的寿衣，躺在地板上。炸弹在很近的地方爆炸，这天晚上，馬克西姆·高尔基大街上沒有剩下一块完整的玻璃，火光和映成玫瑰色的积雪照耀得街上通亮，十分怕人，可是这个愁眉苦脸的人却坐在那里嘰哩咕嚕地念經，过了沒多久，他便异常安靜地睡着了。天刚亮的时候，我走进屋子里去，发現他头下枕着經書，安安稳稳地在死者身旁睡大觉。

罗馬紹夫弄来了一口棺材；这时是十二月里，找棺材还是可能的。当这个乾癟的老太婆躺进了这口寬大的，馬馬虎虎釘起

来的匣子的时候，我仿佛觉得她是吓得蜷縮在棺材的一个角落里。

照罗馬紹夫的說法，掘墓工人是在“漫天”要价，所以只好自己动手掘坑。他雇来几个小孩子，也就是罗莎莉·納烏莫芙娜教他們抹漆的那些小孩。

他兴致很高地跑到楼下院子里去了十几次，和管理員嘁嘁嚓嚓不知講了些什么，又拍拍罗莎莉·納烏莫芙娜的肩膀，最后竟对她发起脾气来了，因为她坚持要把貝尔塔就这样穿着未縫的被单作成的寿衣埋葬。

“被单可以換一換，”他大声喊道，“她根本用不着这些东西。頂多过两天就会被人从身上剝掉的。”

我赶走了他，并向罗莎莉·納烏莫芙娜說，一切都按她的要求办。

一大清早，碎小坚硬的雪花旋卷飞舞着，仿佛是着急似的突然落在地上。罗馬紹夫和几个孩子在墻壁間拥拥撞撞，在楼梯間拙笨地轉弯，好歹把棺材抬出来放在院子里的雪車上。我本来想給孩子們一点錢，可是罗馬紹夫說，他和他們講定是用面包来支付的。

“孩子們，每人先借支一百公分，好不好？”他很开心地說道。

孩子們看也沒有看他，都同意了。

“卡佳，您要上楼嗎？”他繼續說道。“劳駕，面包在軍大衣里，請您拿下来。”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把面包放在大衣里，大概，是害怕罗莎莉·納烏莫芙娜或者刚才那个犹太人看見。軍大衣挂在前厅，他已經穿了很久的短皮袄了。

我走上楼，記得在楼梯上还考虑了一下，是不是应該加点

兒衣服。从昨天晚上起，我就感到身上有点兒发冷。也許最好还是不要到墓地上去，因为到那兒足有七公里。但我怕如果我不去，罗莎莉·納烏莫芙娜会倒在路上。

軍大衣口袋里放着一块用紙包着的面包，我伸手去取面包时，发現口袋里还有一个柔軟的小包。小包掉在地上，前厅里光綫很暗，我打开通楼梯的房門，想把它撿起来。这是一个黃色的鹿皮烟袋；我們寄到前綫去的慰問品中就有这种烟袋。我躊躇了一下，便把它打开了；里面裝着一张对折的画片，还有几个戒指。我嫌恶地想道："又不知是从什么地方"搞来的。画片原来是一张照片，已經非常破旧，揉搓得很不平整，反面的題字因为褪了色，变得十分模糊，所以很难辨認。我本打算把这张相片放回烟袋里去了，但一种奇怪的感覺阻止了我。我好象覺得我曾經見过这张相片。

楼梯口比較明亮。我走出去站在那兒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辨認着："永远作……"一道白色的强烈的光綫在我眼前一閃，直射在我的心上。照片上写的是："永远作一个出类拔萃的人"。

我不知道自己后来怎么样了。我喊叫了一声，后来便发現我坐在楼梯口上，用手摸来摸去到处寻找这张相片。我透过眼前的黑霧，念完了相片上面的題字，認出了这是戴着一頂飞行帽，使得他酷似一个女人的契同志，这是生着一张寬大的山鷹般的脸膛，在低垂的眉毛下面有一双善良，忧郁的眼睛的契同志。这是薩尼亚无时无刻不带在身上的契同志的相片。尽管我多少次对他說，相片放在口袋里会揉搓坏的，应該用玻璃框鑲起来摆在桌子上，可是他仍然把这张相片和文件一同放在皮夹子里带在身上。

我发疯似的奔回前厅，从衣架上把軍大衣扯下来，扔到楼梯

口上，把所有的口袋都翻了一遍。薩尼亚死了，被害死了。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在找什么东西。罗馬紹夫杀死了他。另外一个口袋里放着一些錢，我把它揉成一团从楼梯縫里扔了下去。他害死了他，拿走了这张相片。我沒有哭。他偸走了証件和相片，偸走了所有的文件，也許还偸走了奖章，为的是不讓任何人認出树林中的死人，这具尸首是薩尼亚。我心里面好象听見有人在說“是同其他一些非常重要的文件一起放在图囊里”，并且好象有人在罗馬紹夫說的每一个字前面都点上了一盞灯，照得通亮。

这张相片是放在图囊里的。其它的文件和“紅鷹”报也放在图囊里，不过这些文件都湿透了，丢掉了；本来罗馬紹夫自己就說过：“报紙湿成了一团”。可是相片却保存下来了，也可能是因为薩尼亚总是用描图紙包着带在身上的关系吧。

楼下传来了人声，这是罗莎莉·納烏莫芙娜在喊我。我把相片藏在怀里，把烟袋放回軍大衣口袋里去，将軍大衣挂回原来的地方，便走下楼来，把面包交給罗馬紹夫。

他問道：

“您怎么啦？不舒服嗎？”

我回答說：

“不，我很好。”

什么也不存在了。人們仿佛是在一个可怕的，迟緩的噩梦中慢慢地往前迈着脚步，在那空蕩蕩的，一点声息也沒有的街道上默默地走着，这些街道不存在了。結滿了冰的电車陷在街道中間，車頂就好象乡村房舍的屋頂一般，挂着厚厚的雪檐，这些电車不存在了。一个矮小的，象嬰兒般用襁布包裹着身体的人躺在雪車上，窄窄的車轍并沒有离我們越去越远；直到这时，我才想起罗馬紹夫吩咐过不用棺材，因为雪車上擱不下。

“沒关系，我們以后把它卖了，”他說道。

罗莎莉·納烏莫芙娜大概也是发疯了，因为她也說什么照規矩就应該这样不要棺材的。我刚一想这些事，立刻又忘了。沿普式卡尔斯卡婭大街修的一条小路非常狹窄，两个人都轉不开身，一个脸盘很小，但长相很大的女孩子退到雪地里，給我們讓路。还有一个用細繩拴着皮包挂在肩上的男人，穿着一件寬大的外套怪里怪气地晃晃蕩蕩着走了过去。我看过他們，也立刻忘記了。我什么都看見了：寂然无声，被大雪盖起来的街道；用布裹着躺在雪車上的尸体；路那一边还有一个女人在运送尸体，她走不多远便停一会兒，終于落在后面了。白茫茫的沉沒在雪海中的冰冻了的城市在我的眼前晃来晃去，就象是一些影子无声无息，不留痕迹地在玻璃上滑过似的。

我还看到了另外一幅痛心的景象：薩尼亚伸着两腿，腿上纏着污脏的、被血染黃了的繃带，脸朝下趴在地上，凶手站在他身旁。在潮湿的小白楊树林里就只有他們两个人！

15 願我的爱情拯救你

犹太教的墓地离得太远，沒法子去，所以罗莎莉·納烏莫芙娜决定把她的姐姐安葬在斯摩棱斯克公墓。替貝尔塔念經祈祷的那个愁眉苦脸的犹太人收了六百公分面包之后，便同意护送他的“被保护人”到正教墓地，照他說这也是按規矩办事的。

十二月里天黑得很早，送葬的事从清晨忙到傍晚，忙了整整一天；我現在已經不大記得当时的情形了。我的眼前仿佛是在放映一部无声影片。一种如梦的感覚随着影片忽而到来，忽而

又隐沒在华西列夫島的雪地里。

我們走着，除了寒冷、疲劳和对那僵硬的尸体的嫌恶之外，什么也沒有感覚到。孩子們两个人一班輪流拖着貝尔塔往山上爬。到下坡的地方，尸体自己慌慌忙忙滚了下去，仿佛想赶快使我們摆脫这些并非出自她本意給我們带来的煩人的劳頓。

綁在尸体上的鉄鍬在阳光下閃閃发光。不知道为什么，我看到这种閃光竟想起了克里米亚和海洋的风光。我們在克里米亚生活得多么惬意！薩尼亚总是在五点鐘起床。如果我知道他要作高空飞行时，就給他作一餐清淡的早点。我們买了一个“标准”牌的淋浴器；我把洗澡的一切事情都調理好，安排妥当，薩尼亚洗了淋浴以后，穿着一件黄条紋的睡衣坐在桌边。有一次，我們到塞瓦斯托波尔去，海上的风浪很大，天气阴沉沉的；飞行員总是在天气最不宜人的时候休假。我感到十分扫兴，可是薩尼亚說道：“沒关系，我給你安排好天气。”果然，汽船刚一离岸，天气立刻就变得好极了。

我穿着一件白色的連衣裙，和他一起站在洁白、华丽的甲板上，边談边笑，竭力使自己显得更漂亮，因为我知道他喜欢看見别人贊美我！这时我是多么快乐，多么輕松啊！不管你把眼光投到哪兒去，投到船长室的銅栏杆上去，投到被风吹得向后仰的浪峰上去，投到戏水的海鷗湿潤的翅膀上去，——在所有的地方，太阳都閃耀着夺目的光芒。

……我蜷縮着身子，脸上冻得发青，用手搀扶着步履艰难的罗莎莉·納烏莫芙娜，——她穿得实在太厚了，——一步一顛地跟在雪車后面。雪車时而距我們很远，时而又因孩子們停下来抽烟，距离我們很近。我和她完全一样，我們两个人都是同样可怜的老太婆了。罗馬紹夫大概也有同样的感覚，所以他追上了

我們时，很生气地說道：

“卡佳，您为什么要来？您会感冒，病倒的。赶快回家去吧。”

我看了他一眼：这个人好好的什么事也沒有嘛，那他为什么說这种混賬話。他身上穿着一件結实的白色短皮袄，皮带交叉扎着，腰上挂着枪套。这是个活人！我张着嘴呼吸。这是个健康的人！我弯下腰抓了一点兒雪放在口里。綁在尸体上的鉄鍬一直在閃閃发光，我对着这催眠的閃光，始終不停地看了又看。

墓地到了。我們在一間狹小污穢的办公室里等候了很久。在一道道用麻屑塡过的墙縫里挂滿了霜。一个臃肿的女办事員坐在小鉄爐旁边，将两只纏滿了破布的肥脚凑到爐火跟前。罗馬紹夫为了一点什么事情正在斥責她。后来有人来喊我們，說坟墓挖好了。孩子們拄着鉄鍬，站在一个混有雪块的土堆上。他們本来就沒有打算把可怜的貝尔塔往深里埋葬！罗馬紹夫打发他們去抬尸体，尸体已运来了。高个子的，愁眉苦脸的犹太人走在雪車后面，不断地命令停下来念一遍短短的祷告文。罗馬紹夫在雪地上摆好繩子，很俐落地提起死尸，一脚把雪車蹬开。現在貝尔塔躺在繩索上了。罗莎莉·納烏莫芙娜最后一次吻别了她的姐姐。犹太人象一只衰老忧伤的鳥兒忽而用令人意想不到的重音高声吟唱，忽而又低声叨念……

我們回到办公室里去烤火，我們是指的我和罗馬紹夫。他拍拍口袋，向我作了一个暗示，等大家向門口走去的时候，我們便走进办公室里去烤火。

“喝点嗎？”

啊！我的心开始燃燒起来了，急速地跳动，一股股的热流通过了四肢！我感到一陣燥热，解开衣扣，摘去了头巾；我拖着两条腿飘飘然，悠悠然在办公室里走来走去。

“还来一杯嗎？”

那个皮肉松弛的女人貪婪地瞧着我們，我讓罗馬紹夫也給她斟一杯。他倒酒的时候，心里大概在想：“他媽的，豁出来了！”他兴致勃勃，脸色蒼白，耳朵通紅，遮耳帽很神气地推在后脑勺上。我也很高兴，我从桌子上拿起一块黑漆墓牌递給罗馬紹夫，跟他开玩笑說：

“这是給您准备的。”

他笑嘻嘻地說：

“您現在又变成从前那个卡佳了！”

“总之不是您的！”

他湊到我跟前，拉起我的双手。他的嘴巴开始顫抖，露出了两排細小得象孩子的牙齿。說也奇怪，我以前从沒有发現他的牙齿这样尖利，細小。

“不，是我的，”他声音嘶啞地說道。

我把右手从他手中掙脫出来。这时我看見窗台上放着一把錘子，——大概是用来釘十字架上的牌子的。我不慌不忙地拿起了窗台上的这把虽不很大，但却相当沉重的鉄柄錘子……

要是击中太阳穴的話，我这一下子可能就把罗馬紹夫砸死了。但是他往后一閃，錘子从旁边擦了过去，只把顴骨砸伤了一点兒。屋子里的那个女人吓得跳了起来，尖叫着向門厅奔去。罗馬紹夫追上她，把她拉了回来，砰地一声关上了門。然后就向我走过来。

“放开我！”我厌恶地拚命喊道。“您是杀人的凶手，您杀害了薩尼亚。”

他一句話不說。顴骨被砍伤了的地方不断地流着血，他用手擦掉，甩在地板上，但血仍然不住地流，滴在肩上，胸膛上，整

个短皮袄都沾滿了粘湿的殷紅的血迹。

“应該把血止住，”他沒有看我，自己嘟囔道。“卡佳，您能不能找到一条干凈手絹？”

“好吧，就算是我害死了他，那么我为什么还要保存这张相片呢？我們本来想把那些文件埋起来，当时薩尼亚手里捏着这些文件，大概相片已經丢掉了。我恐怕您不相信我，所以沒敢对您說找到了这张相片。我的天哪，您簡直不知道战爭是怎么回事！我竟能杀死一个自己人，这簡直是一种神經錯乱的想法！不管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不管我和他的关系如何！杀死一个受伤的人，卡佳！这是梦話，是誰也不会相信的！”

“誰也不会相信的”，罗馬紹夫把这句話反来复去說了好几遍。他害怕我把自己的怀疑写信給軍事法庭或检查长控告他，他把身上的錢和面包統統都給了墓地的女办事員。我听見他对她說：“不准对任何人說出一个字。”他沒有去医院，罗莎莉·納烏莫芙娜帮他止住了血，用一张膏藥貼住了他顴骨上那块很大的伤口。

“是的，我不喜欢他，这是事实，我也不想隐瞞，”罗馬紹夫繼續說道，“可是当我在肮脏的暖車里发現了他，看見他的腿打坏了，看見他头边放着一支手枪时，我想到的不是他，而是您。他看到我以后那样高兴不是沒有原因的，因为他知道我就是他的救星。当我去找人来抬他时，他就不知到哪兒去了，这并不是我的过失！”

他在小厨房里跑来跑去，一面跑，一面說……他用手抱着头，此时，墙上那个随着他东奔西窜的影子无声无息地长成了两个大鼻子的怪物。我回忆起了久已忘怀的，兒时的景象，似

乎隐約听見了媽媽的声音："看，一只老牛"。我睡在小床上，媽媽坐在我身边把手擎在墙壁前面，她笑我不去看墙上的影子，只顧看她的手。"看，一只长鬍子的山羊"……我的眼湿潤了，但我并沒有擦眼泪，因为从这一大堆被子，大衣，老狐皮套筒中把手伸出来实在是太冷了。

"眞是命該如此，会在列車上碰見他！我可以杀死他，从暖車里每天都要抬出几个死尸去。如果这个已經被人宣告失踪的，想要自杀的飞行員第二天被人发現他的脑袋已經打碎了的話，誰也不会感到惊訝的！但我不能杀死他，"罗馬紹夫大声喊叫了起来，"因为这样作的話，那么被打碎了脑袋躺在那兒的人第二天就可能是您！在他問那个姑娘叫什么名字，姑娘回答說叫'卡佳'的时候，他頓时喜笑顏开。从这次事情上我明白了这个道理。我認識到自己盼望他死的思想，用他的生命来换取幸福的想法在他的面前显得多么卑鄙，多么渺小。所以我决定为了您尽一切力量来救他。而現在，您居然敢咬定說我杀死了他！沒有，"罗馬紹夫郑重地說道，"我用把我生到这不幸与痛苦的世界中的母亲来起誓！用我最神圣的东西——我对您的爱情来起誓！假如他眞是牺牲了的話，那我无論在哪一方面，对他的死亡都是絲毫沒有过錯的！"

他想要扣上短皮袄，可是手在发抖，总扣不到扣孔里去。

如果我能够，如果我还敢再一次地相信他的話那該多好啊！但我无动于衷地望着他那张憔悴的，眼睛不自然地深深陷下去的面孔，望着他那披散在前額上的乱蓬蓬的黄头发，望着那块使得他的腮頰变歪了，变得紧綳綳的难看的膏藥。

"滚出去。"

"您身体不舒服，还是讓我留在这兒吧。"

“滚出去。”

我不知道他以前哭过沒有。但当他跪下，把头埋在床上不肯起来，渾身抽动着，神經質地抽泣时，他的脸上淌滿了眼泪。“薩尼亚还活着，”我忽然产生了这样的想法。幸福的感覚使得我的心突地跳了起来，又突地停止了跳动。“跪在我面前的这个家伙也許不是人，而是一个恶魔？不，不，要假装成这付模样是不可能的，是难以想象的”。

“滚出去！”

我不知道要赶他到哪兒去，他住在我們这兒已經快一个月了。不知道为什么，罗莎莉·納烏莫芙娜还替他报了戶口。这时正是夜間，而且是有警报的时候。但他还是走了，屋子里只剩下了我一个人。

微时計“滴—嗒”地响着。記得有人对我說过，只有在列宁格勒发警报的时候才广播微时計的敲击声。玻璃抖动的时候，桌上放着的那盞无罩小煤油灯的黃色火苗也随着抖动。在潮湿的小白楊树林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

我蜷縮在皮大衣、被子、老狐皮套筒里，沒有听見解除警报的声音。警报解除了，但又开始发了。“滴—嗒，滴—嗒，”微时計的声音响了起来。“相信他呢，还是不相信呢。”

冬夜，在飢餓的城市里，在一間寒冷的屋子里，在一盞光綫很弱，正在同来自屋角落的暗影作斗爭的，小煤油灯的黃色灯光微微照亮的小厨房里，这是心兒在叩击，这是心兒在祈祷。願我的爱情拯救你！願我的希望保佑你！讓爱情和希望飞到你的身旁，看看你的眼睛，把生命呼入你那僵硬的嘴唇里！把脸紧貼在你腿上沾滿了血污的綳带上。告訴你：这是我，是你的卡佳！无論你是在天涯，还是在海角，我都要来到你身旁。不論你发生了

什么意外，我都要和你相守在一起。誰要是帮助了你，支持过你，給你水喝，喂你飯吃，那她也就是我——是你的卡佳。如果死神降临到你的头上，你再沒有力量来和死神搏斗，这时在你的心中哪怕只有最后的一滴点兒最微小的力量——那也就是我，我一定要把你救活。

16 再見吧，列宁格勒！

一九四二年一月，我被送出了列宁格勒。我的身体极度衰弱，医生不准我乘坐軍用列車，所以瓦丽亚便設法讓我坐飞机走了。

临行前的头一天，分組病院給我来了一个电話，說司考伏罗得尼可夫中尉負伤了，托他們向我問好。

“您是他的妹妹嗎？”

“是的，”我声音顫抖地回答道。“伤很重嗎？”

“不怎么样。他希望能見到您。”

我本来想去一趟，但瓦丽亚不讓我去。她这次作得很对，要不然我一定会死在路上的。在我身上，生命的呼吸是那样的微弱，勉强可以听到它跃动的声音，而医院又是那么遙远，远在华西列夫斯基島上，仿佛是在世界的另一端！瓦丽亚希图能把彼加轉到軍医学院来，当然不是轉到“口腔医院”，——他的伤在胸部和左臂上，——而是到外科去。但这兒离口腔医院很近。她答应我，她要每天去看望他，总而言之，要关心他的健康。毫无疑問，她当时并沒料想到，使这个諾言兌現，不仅对于彼加，就是对她自己說来也是很重要的。

仿佛是在一个易于惊觉的，飘然远逝的梦中。我模模糊糊記得一幢高大的木結构建筑物。是机庫嗎？我夹在許多和我一样包裹得紧紧的，默不作声的人們中間，在这幢建筑物的地板上坐了許久。后来，我們被人領着經过一片洁净的雪地，穿过一条狹窄的小径到一个什么地方去。路旁有許多很深很深的炮弹坑，坑里乱七八糟堆着被毁坏的飞机残骸。路旁还有一些沒有被积雪完全掩盖起来的粉紅色的小丘，我当时沒有立即猜想到这是用飞机运到列宁格勒来的牛肉。后来我們便扶着那搖搖晃晃的鉄梯子登上了飞机。飞机里空空的，冷清清的，两边各放着一排光禿禿的条凳，一挺揭开了透明的枪罩的机关枪支在枪架上。

一切經过的情形就是如此。一位滿脸怒气，穿着飞行皮靴的小矮个兒飞行員走进了机艙。发动机嗡嗡地吼叫起来，对世事漠不关心的，光輝灿烂的田野晃动了一下，忽左忽右地在两旁閃現。这时我清醒过来了。再見吧，列宁格勒！

我現在飞行在拉多牙湖上空。再过几天，第一批車輛就将載着列宁格勒的难民經过这里向“大陆”駛去，然后又滿載着面包和面粉回到列宁格勒。这一带到处豎立着标杆，标帜着“生命的道路”，人們在深可沒胸的雪地里工作着。

我飞翔在一場伟大战争的地图上，在我的飞机駕駛盘前坐着的已不是那个滿面怒容，穿毛皮靴的小个兒飞行員，而是“时間之神”亲自坐在那里駕駛飞机。

时間总是往前看的。在它的眼前展开着一付雄伟惊人的画面。許多被拆卸成零散部分的大工厂的車間，沿着連綿不断的交通干綫絡繹不絕地向东开去。披复了一层雪的車床不断地往前运送着，要运完它們似乎需要好多年。积雪虽然还沒有开始融化，冬天的太阳还十分吝啬自己的热量。可是在那荒无人烟的

草原上，在那过去只有带棚馬車慢騰騰走过了一个帐幕又一个帐幕的地方，在那牛羊群曾經徘徊过，哥薩克的老牧人弹过自制的冬布拉的地方，如今聳立着高楼大厦，并且一天比一天修得更高。我們的祖国被人向后推了一步，現在正屏住气息，鼓足劲兒准备跃向前去……

我被送到雅罗斯拉夫的“列宁格勒”病房时已經奄奄一息了。这兒住着一些非常文静的人，他們竭力不想吃飯的問題。医生囑咐不要耽心吃飯問題；他們把那些不相信的人带到食品仓庫里去看。仓庫里装得滿滿的！

姥姥在医院里找到了我，也可以說沒有找到我。她犹豫不决地站在門口，用眼睛扫視着病房，她看着我，却沒有認出是我。我覚得好笑，招呼了她一声，心里感到又是高兴，又是辛酸……

前进，前进！过了白天是黑夜，过了黑夜又是白天。然而白天和黑夜早已混合在一起，連太阳自己似乎也不知道它应該在什么时候，在几点鐘，在这动蕩的大地上升起来。

一个德国兵士趴在雪地上，两条殭硬的大腿伸在雪堆外面。他用手拚命抓着异邦的泥土，嘴里塡滿了异邦的泥土，他仿佛是想把泥土吞下去因而窒息死了。

一个俄罗斯兵士跃起往前冲鋒，举起了手榴弹，就在这頃刻間，一顆致命的子弹打中了他的心房。他靠在一棵松树上，就这样冻僵在零下四十度的严寒里了。他驕傲地仰着头，充滿了因战斗的鼓舞而掀起的忘我的激情，站在那兒儼若是一座冰雕的塑象。

这是一九四一年的冬天。

但这是一个举世难忘的冬天。在苏維埃联盟辽闊无边的土

地上，新的力量开始呼吸了，象一陣风吹进了“列宁格勒”病房。心兒又重新燃烧起来，生命在輕敲，在呼喚，不由使人产生了恼恨自己，恼恨自己的沒有作为和身体的虚弱，这种恼恨的心情煎磨和激动着我們的灵魂……

三月里我便出院了。姥姥領着我上車站去。路旁融雪汇成小溪在太阳光下奔流閃耀，清新的空气，街上的人群和車輛来来往往地閃过，所有这一切都使我感到头暈。我們到膿谷村去。

我过去还以为孩子們在一个村名这样不吉利的地方生活得不会很好，現在看来我的这种顧虑是多余的！孩子們在这兒生活得很好。小彼加长大了，长結实了，完全成了一个农村里的孩子，鼻子上被太阳晒掉了一层皮，晒得油黑油黑的小腿上已长出了細細的金黃色的汗毛。

我当着别的孩子面前吻他时，他已經会不好意思了。他現在正在集郵。他已經知道輕視那个好哭的，动不动就“告”媽媽的維其加·柯杰尔可夫。他和爸爸經常通信，說也奇怪，爸爸总是代一位名叫瓦丽亚的阿姨向他問好。

“她年紀很大嗎？”

“不，很年輕。”

“她問好干什么？想和我交朋友嗎？”

“大概是吧……”

村里的墓地在一片高高的山坡上，天气晴朗的日子里，从老远就可以看見墓場上的十字架和五角星。我們在墓地和道路間的洼地上游玩。洼地后面，是一望无际的，顏色深浅不一的綠油油的田野。我們站在一片野生的复盆子丛蔭里。

“媽媽死的时候，不是也很年輕嗎？”

“是很年輕。”

他在揪嫩草，一只金龟子正在草莖上爬，忽然一下飞去了。他在想什么心事呢？

“薩尼亚舅舅象媽媽嗎？”

“象极啦！”

他怯生生地望着我，撫摸着，亲吻着我的手。我哭了，眼泪落在他那被太阳晒爆了皮的鼻子上。我們俩偎抱着，默默地坐在野生复盆子丛里，那攫走了薩尼亚生命的，可恶的，冷酷无情的死神斜吊着眼坐在不远的地方。

前进，前进！既不回顧，也不緬怀过去……

一九四二年夏天，艺术珍品收藏所的兒童营轉移到新西伯利亚去了。我回到黯淡凄惨的莫斯科，屋頂上架着高射炮，广場上画着假屋頂。

經过一年的战爭，地下鉄道仍然是那么干凈，那么新，絲毫也沒有变样。在果戈理林蔭道上，仍然有一群群的孩子和保姆在散步。在西夫切夫·符拉什克胡同里，虽說是新修了两座房子，居高临下俯視着它們周围那些脫落了油漆、又老又旧的邻居，但这仍然是先前那条弯弯曲曲的，狹窄的，可亲的胡同。一道熟悉的肮脏的楼梯出現在眼前。門口的銅牌上写着：“瓦連金·尼古拉耶維奇·朱可夫教授”。啊，成了教授了！这倒是件新鮮事兒！我按了按电鈴，敲了敲門！門开了。一位戴着眼鏡，留有髯子的軍人站在門口。

自然我立刻就認出了他。除了他还有誰会带着这样犹疑不定，客客气气的神情注視着我呢？我問他：

“瓦連金·尼古拉耶維奇·朱可夫教授住在这兒嗎？”

除了他还有誰会这样可笑地歪着头，眨着眼睛呢？除了他还有誰能这样震破人耳朵地狂叫，向我扑过来，笨拙地在我耳朵上乱吻呢？并且还踩了我的脚，痛得我忍不住叫喊起来。

"卡佳，亲爱的，我太高兴了！眞想不到你找到了我！"

他接过我的箱子，我們便自然而然地向那曾經是書房，同时又是餐厅兼兒童臥室的"外厨房"走去。我的天哪，这間古老舒适的厨房現在弄成什么样子了！桌上放着籃子，籃子里面盛稀粥，地板沒有打扫，窗戶上挂着破破烂烂的蓝紙片……

瓦里亚握住了我的手。

"我全都知道，全都知道了。"他脸上的肌肉顫动了一下，眼鏡下的眼睛深深眯縫了起来。"亲爱的薩尼亚，亲爱的朋友……不过还有希望。伊万·巴甫雷奇把你的信讀給我听了，我們和一位上校商量过，他也說有很多，很多的人都回来了。"

我說："是呀，很多人。"接着他又把我拥抱起来。

"我哪兒也不放你去，"他决然說道。"房子完全空着。你在这兒会很舒服的。伊万·巴甫雷奇說你要来，我已經稍微收拾了一下。还需要刷洗刷洗，对不对？"他躊躇不决地問道。

我忍不住笑了，他坐在床上，也笑了起来。

"說老实話，現在的确沒有时間。我差不多沒有在这兒住，全部时間都在前綫上。不过冬天这里很不錯。因为研究所里太冷，所以一到冬天，我就把动物都搬到自己家里来。"

自然，他不可能把所有的动物都搬来，他拿来的只是一些貴重的品种。这眞是一个好主意，因为有只罕見的外国种家鼠以前怎么样也不肯生小老鼠，可是到了瓦里亚家里却生育了；由此可見家庭环境对于家鼠有多大的影响。屋子里的家具都被瓦里亚烧光了。其实这倒也好，要不然，讓琪拉看見这些"貴重品种"

把家具糟踏成那个样子，毫无疑問，她一定会很生气的。

"不过必需的家具中，我只燒了一张厨房里用的桌子，"瓦里亚有点顧虑地說道，"所以說，最主要的东西还是保存着的。你看，这是椅子，这是琪拉最心爱的小柜，还有門帘等等。"

这些野兽到春天就回到研究所去了，这时，瓦里亚也取得了大尉軍銜，开始在軍医部工作。我問他，前綫有誰需要他和他的那些嚙齿动物。他一本正經地說道：

"这可是軍事秘密。"

总而言之，一切都很好。唯一不如意的是他去年冬天用电超过了"該死的限度"，电灯公司干脆派了人来把电綫割断了，因此現在就沒有亮了。不过幸好現在白天长了，瓦里亚夜里工作就靠着一盞酒精灯，这可眞是一件好东西！

"可以在这个灯上燒水嗎？"

瓦里亚不知所措地看了看我。

"天哪，我眞是个傻瓜！"他叫道。"你远道来了，我連茶都沒有請你喝。"

"不，我要多用些水，"我說道，"需要很多水。你有桶嗎？"

当我脫去鞋袜，撩起裙子，拿着湿抹布开始打扫卫生时，他只是在一旁自怨自艾地唉声叹气。

他用手指揉擦着鼻子，惊訝地看着我从床底下掏出許多馬鈴薯皮，看着我撕去窗戶上的脏紙，看着地板上堆成了小山的发霉的面包。

我光着脚，撩着裙子站在桌上，用綁在箒把上的湿抹布正在扫墻上的蜘蛛网。这时，有人在外面敲門，瓦里亚提起滿盛污水的水桶向前厅跑去。

我听見他对一个人低声地說："还好，很能控制自己。好样

的，太好了。”再就什么也沒有听見了。

一个碩长的身影在敞开着的門外閃了一下。他摘掉帽子，放下手杖，掏出梳子站在鏡子前梳了梳花白鬍子。这个人从門外走进来了，他停下脚步，惊訝地凝視着我。

“伊万·巴甫雷奇，亲爱的！”

我們一直保持着通信关系，所以他知道我最近要来，因此，他在瓦里亚家里碰見我并不是什么意外的事情；可是我还是感觉到这样的会見似乎只是在梦中才能有，只是在梦中才能扑在一起互相拥抱。我們忍不住地哭了起来；他也一陣心酸，欷歔起来，伸手往口袋里去掏手絹。

“为什么不到我那兒去呢？”他有点生气地問道，不住地擦着眼睛和鬍子。

“伊万·巴甫雷奇，我今天就准备去的！”

我站在敞开的衣柜門后面换衣服，我們談着，沒有止境地談着，談我坐飞机的情形，談我害病的情形，談列宁格勒的封鎖，談我們在莫斯科近郊的进攻……現在已經看得出伊万·巴甫雷奇是老多了，他那高大的前額上滿布着皺紋，脸上出現了上年紀的人所特有的不均匀的紅色。不过他的外表还是那样端正，文雅。

我們上一次見面是在一九四〇年。可是我的天哪，这象是多久以前的事了！有一次，我和薩尼亚突然想念起这个老头来了，于是便带了一个大蛋糕和法国葡萄酒，跑到公园凱旋路他那冷冷清清的单身寓所里去找他。那一回他是多么滿意啊！他津津有味地喝着葡萄酒，和薩尼亚回忆起格里沙·法伯尔，以及悲剧“时間到了”（在这个剧中，格里沙·法伯尔飾演主角——一个犹太人的养子），他們是多么开怀地暢笑啊！我們圍爐直坐到深夜。那时候眞是另外一个天地，另外一个时代！

“我老啦，对不对？”他发现我总是在看他，便問道。

“我們都老啦，伊万·巴甫雷奇，亲爱的，你看我呢？”

他半晌沒有說話。过了一会兒，感伤地說道：

“你呀，卡佳，你是越长越象你母亲了……”

这时已經入夜了。瓦里亚点上了他的酒精灯，可是我們馬上就把它吹灭了；柔和的黃昏残照从胡同里射进来，在沒有防空帘子遮拦的，大开着的窗戶前坐一会兒眞是再美也不过了！胡同里还是輕淡透亮的麻麻黑，而在瓦里亚家里，却完全是另一种室內独有的黑暗。黃昏不知不覺来临了，我看見的再不是伊万·巴甫雷奇，而是他那花白的鬍子，再不是瓦里亚，而是他那一轉脸时閃閃发亮的眼鏡。在这寂靜的頃刻間，我特别强烈地感覺到自己是生活在眞正的、忠实的、生死之交的朋友当中。我暗暗对自己說道：“最艰苦的时期也許已經过去了，要不然，怎么这些人会这样地爱我？要不然，他們怎么会永远和我在一起，使生活变得更輕松，更美好呢？要不然，怎么会这样的恬靜，在昏暗中，这些善良可亲的花白鬍子看上去又那样模糊不清呢？”



第八部　奋斗和探求

薩尼亚·格利高里耶夫述

1　晨

卡佳靠着尼娜·卡比丹諾芙娜坐在凉台上；我在睡梦中听見她們怕扰醒我而放低的談話声。昨晚的情景栩栩如生地呈現在我的面前。

因为尼娜·卡比丹諾芙娜来了，所以破例把餐桌搬到小花园里；我們等了她好半晌，最后她总算来了。她身上穿着一件一九〇八年式的带折边的新連衣裙，脚上穿着一双带鈕扣的长脸兒皮鞋，她的样子很庄重，严肃。

她叙述尼古拉·安东內奇的女管家把脏鞋放在爐板上的故事多么有意思！她叙述尼古拉·安东內奇在高尔基大街領到一

套有四个房間，带煤气和暖汽設备的新房子后，坐着自备小汽車去看房子的情形时，脸上的表情多么生动！她学着尼古拉·安东內奇的腔調說道："尼娜·卡比丹諾芙娜，請您随便选一間吧。"然后又用自己原来的声調，带着自傲的表情回答道："謝謝您，尼古拉·安东內奇，我是快入土的人了，誰的东西我也不要。"

我好象看到了一个老人坐在莫斯科一所精美的新住宅里，有电灯，新鮮空气，煤气和暖气設备供他享用，但他却写一些顚倒是非的东西，把白的說成黑的，把黑的硬說成白的。

六点一刻，应該起床了。可是象这样閉着眼睛躺着，听着卡佳在这座古老的別墅里走路的声音，和干燥的地板在她脚下发出来的輕微的軋軋声，实在是太愜意了。她在房門边站了一会兒，大概是听听我醒了沒有，后来大概又想了想，还是舍不得把我叫醒。她又到厨房去，对"科学保姆"說，今天用不着去市場了，反正我十点鐘就要走。

我的妻子啊！我們长年不在一起，我已經习慣了把她作为想象中的人物，即使她現在在我身边，我也要在脑子里想她：她穿着一件綢料条紋罩衫，头发已經梳过了，說得更正确一些，也許她还沒有梳头，只是仓促間草草地用发針把辮子綰住。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她这付样子，而这也正是我所喜欢的样子，正因为如此，所以那天早晨我非常高兴。我們經常分离，以致每次別后，一切仿佛又从头开始。

六点半了。她踮着脚尖走进来，吻了吻我。

"你都睡了一百年啦。去游泳嗎？"

"好不好啊？"

我是在問天气好不好。

"很好。"

“那就去吧。”

“到河里去？”

距山坡下不远的地方便有一条小河，可是我們却喜欢在湖边游泳，所以尽管时間不多，我們还是到湖边去了。

仅仅說天气很好还不够，整个夏天也沒有这样美丽的早晨！太阳好象急于要尽快地把万物变得又灿烂，又壮丽。看吧，它已經把那边湖上的景物变得輝煌壮丽了，現在正以造物主宰的气概发射着万丈光芒向我們袭来。凝聚在小松树中間的白色夜霧，匆匆忙忙惊惶失措地消失了。

上个星期天我和彼加在乳牛洼溪上架設了一道桥，現在这桥就剩下一条楊木了；我从这条独木桥上跑过去，卡佳却是涉水过去的。天啊，在这刹那間她的样子我記得多么清楚！她微微提着衬裙，小心愉快地用脚試探着沙底走着，搭在肩上的毛巾掉了下来，她敏捷地在水面上把它接住了。

我們上了山坡，便向着古老的瑞典墓园走去，繞过墓园就是万頃晶波。矮矮的湖岸上綠柳成蔭，一个冻得渾身发青的赤膊孩子順着湖岸在拉网捕虾。眞奇怪！哪有在七点多鐘就捕虾的呢？！

我把孩子連虾网一起从水里拉上来，向他簡短地講了一番捉虾的常識，特别是捉青虾的常識，告訴他这种虾最好用臭肉釣，卡佳听到笑了起来。这兒的虾一般都很小，恩斯克的虾那才眞大哩！

太阳透过柳枝，把有些地方的砂子都晒烫了，砂地上微微冒着热气。柳树丛下是一片浓蔭，而在距岸边几公尺的湖上却是阳光普照。我和卡佳同平日一样向着太阳游去，把手抱在脑后躺在水里“晒”太阳……

为什么我要从这天早晨开始叙述我的故事呢？它和其它任何一个星期天的早晨并沒有絲毫差别呀！那是因为旧日的生活在这一天結束了，代之而来的是驀然出現的，完全不同的一种生活，它按照自己的意志支配着我，支配着卡佳，支配着我們的全部思想，感情和印象……

这另外的一种生活就是战爭。若不是塔塔林諾夫船长和“圣·瑪丽亚”号的历史，和我在战爭中的遭遇又百般离奇地交織在一起，若不是这是完全不同的另外的一种生活，那么也許我就不会去写它了。

2 他

我注視着战爭开始的头几天，头几个礼拜中所发生的情景，怀着一种因为无法将自己所見到的事情轉述出来而产生的怪异的心情。

我看見的是一个寬大而黑暗的农村的房間，一支残烛黯然照耀着的桌子，一面用軍用雨衣遮着的窗子。門开了，一个穿夏季軍服的人敞着怀走了进来，他搗騰着爐子，狼吞虎咽地吃着东西，这人就是格利沙·特洛菲莫夫。从床上又站起来了一个人，和他并排坐在桌前，这人就是卢利。我听着他們低声的談話，我的心剧烈地，緩慢地跳动了起来。

“到过拉多牙嗎？”

格利沙一边吃着，默默地点了点头。

“喂，怎么样？”

“还不是那样。”

"茨万克呢?"

他沒有吭声,繼續吃东西。他到过茨万克。

两个列宁格勒人面面相觑地望着。这是列宁格勒被围后的第一个夜晚。

我看見我的飞机上竖着一根旗竿,机艙外飘揚着带字的旗子;我們就是用这种办法来支援那些誤以为自己被围得水泄不通的人們。

我看到了第一座坟墓;我們用炮弹的安定翼片和弹壳作成的鉄花来装飾它。每次战斗飞行返航时,我們都尽可能低地从它上空掠过。

湖泊重又出現在我的眼前。旧日的生活在早晨蒙蒙的湖光中投下了最后的一个幻影。現在这湖显得十分阴郁凄慘。和湖岸一般高的湖水慘淡地发着光,暗蓝色的烟雾在湖水迷迷蒙蒙的鏡面上游动,这是德寇縱火烧掉的树林在燃烧。

傍晚,我們从山坡上的地下掩蔽部出来。柳蔭下停着几艘快艇,我們在浪花泡沫和汩汩的濺水声中,在幽暗的水面上急馳。飞机仿佛大海鳥一般从林垣里冲着我們游来。这儿是我們的三号和四号基地列湖。

我看見了許多事物。不过我所見的一切仿佛是发生在一幅地图上,它每天都展現在我的机翼下,——图上东一条西一条的画着战綫,德寇进攻的黑浪蔓延得愈来愈广了。

每天都有新飞行員来到部队,从民航局来的人愈来愈多;我和有些人还在北方共过事,和有的人是在远东一起工作过。他們都是些有經驗的駕駛員,很多人是一、二級飞行員,甚至还有三位"百万富翁",意思就是飞行了一百万公里以上的飞行員;看到这些老百姓变成軍人,不断地出洋相时眞是有趣得很。我們

經常談这些事，在食堂里，在軍官之家，在我和卢利及机械师三人居住的窑洞里，到处都談。我們之所以經常地談这些事，是因为我們之間有了默契，不談“别的事”。因为“别的事”有报紙代我們談。

八月里，我和我的空勤組調到南方战綫空軍部队中工作。

这是一个漆黑的夜，正如卢利所說的，是拉明城特有的夜。霏霏細雨变成了鉛黑的浓霧，一动也不动地籠罩在水面上。哪怕你把眼睛鼓得掉出来，也还是漆黑一团，什么也看不見！要不是机械师猜到我迷失了方向，用手电筒給我照了一下，我一定找不到快艇了。

上校把我叫了过去，我們默默地站了一会兒；在黑暗中，我隐約地看到他那生着小翘鼻子，还十分年輕的，刚毅的面孔。这时实在是沒有什么話可說，不过他还是詢問我带了照明弹沒有，我回答說带了。他問照明弹的事是表示客气，因为我上次在飞行講評会上講过，使用照明弹可以大大提高夜間轟炸的准确性。

卢利的情緒显然不很好，否則他也不致于把波长調整到那座泄气的罗馬尼亚电台上去。我想起了在飞行前我叫醒他，他睜开眼睛，沒有認出是我时的那种样子。他当时的脸色显得非常疲劳，他平常爱引“您的翅膀”中的一句話：“如果你累了，最好先休息，再去飞行……”。今天他坐起来时，也沒有說这句他爱說的話。

岸边的探照灯射出了一道亮光，紧追在我們的后面；迷迷蒙蒙的灯光在我們头上乳白色的，无底的天空中忽兒出現，忽兒散失。这还不算十分倒楣。我們在大雪中飞行，雪花开始吹进了襟翼。

卢利現在找到“康士坦察”电台了，鬼才知道“康士坦察”广播一些什么玩意兒！在你吹吹口哨，想想心事的功夫，四周围已經升起了成团的黑压压的高山。等你再想一想心事，吹一吹口哨，又已經到了应該繞过山头的时候了。可是从云底下是鑽不过去的，因为在大雪中飞行，飞机上会結冰。吹吹口哨，又想想心事：“卡佳，瞧你还生气哩，埋怨我写信不把飞行的情况告訴你。”

云层正好在它不消沒便不行的时候沒有了。事实上云层并沒有消沒，而是向两旁分开。前面閃出了一条寬闊走廊，走廊上充滿了瑰丽的，珍珠色的晨曦的霞光，我們的影子投在下面的云层上，可是在头上也有一个影子。这眞奇怪，誰都知道宇宙間沒有一种东西能同时投下两个影子的。我有些惊訝，不过可能也沒有惊訝，因为我当时就猜到这第二个影子根本不是我們的，而是一架飞得比我們高得多的“密塞尔”飞机的影子。如果它眞是一架那倒也还好。可是在它后面，象太阳光下的魚兒似的，光閃閃地又出現了第二和第三架。

这时，无論按照什么規章条令来說，我們都应該尽快地避开它們。要不然我們也能逃掉，偏偏这时云层就象一座固定不动的暗蓝色的建筑物一般，远远地停在后面，使我們再沒有地方可以躲藏。噠噠噠的声音响了，宛如小石子打在机翼上，濺到了座艙上……

这是一次最平常的，一点也不出色的战斗，同时战斗結束得也很快，所以我不准备叙述它的經过了。我們一下子就击落了一架“密塞尔”飞机；这是在它轉弯的时候，它一直保持着轉弯的姿势栽到地面去了。另外两架作了个急跃上升，气势凶凶地企图竄到我們的机尾后面。当然这也是个聰明的办法，不过不算

頂聪明，因为我們并不是那种肯讓别人咬住自己尾巴的人。他們进入一次沒有成功，又来了第二次，这回差点沒有落在我們的弹道綫上。总而言之，我們尽自己力量在回击，敌机終于落到后面了。于是我駕着飞机保持直綫飞行，战綫已經不远了。

我駕着飞机保持直綫飞行。这句話說来很簡单，然而左机翼被削掉了四分之一，油箱打穿了，我的腿上和脸上都挂了花，殷紅的血不断地往眼睛里流。

……我全身感到一陣异样的虛弱。就在这当兒，我想起了童年时期常作的噩梦，有人要杀死我，淹死我，当我醒来时，却发現自己仍然活着，因此感到非常幸福。

“不过这一回，——这时的思想非常平靜，——这一回我可是再也不会醒了”。

我可能是失去了知覚，不过时間不久，因为还在知覚恢复以前，我似乎便已經开始說話，并且被自己的声音惊醒了。我命令空勤組跳伞。报务員和空中射击員跳下去了，可是卢利却滿心不願意地嘟囔着說道：“好吧，好吧！”仿佛是要他去作一次无聊的散步，他只是碍于我的情面才勉强答应似的。

……最困难的是和这弥天大霧作斗爭，它使你睜不开眼睛，使你累得不得不放下手。我好象一千年中也难得战胜一次这样的浓霧似的，这时我才明白，虽然沒有完全明白，但最重要的一点，也就是立即需要加以糾正的一点已經明白了。时間久得象过了一千年——我費了很大的力气把飞机脫出危险状态，蹬着左舵勉力地飞行。又过了一千年——我看見在我們的飞机下面有两架“容克”飞机，象两只笨重的大公牛似的，不慌不忙地朝我們飞来。不消說，这一下是眞完蛋了。可是，我一眼便看出他們甚至还不急于来結果我們。

卢利跳伞了，他們向他射击。他被打死了嗎？后来他們又掉轉头，占据了两翼的位置，和我并排着飞行。

……德国鬼子长着一张什么样的面孔，是俊还是丑，是年老还是年輕呢？这对我說来都不相干：在我身旁飞行的不是兵士，而是杀人犯，不是兵士，而是恶棍。他赶到我的前面去，閃在一旁，然后又凑过来，观望着，不慌不忙地飞着，陶醉在自己唾手可得的胜利里。

我不知道应該怎样来解释，不过我觉得这当兒我的确看見了自己和他的形状了。我滿脸鮮血，两手軟弱无力地把着駕駛盘，坐在正在往下墜落的飞机上。他把飞行眼鏡推到額头上，带着冷酷的欣賞的姿态，和絕对控制了我的神色瞧着我。我忘記了卢利已經跳伞，而且可能已被他們屠杀了，我似乎还对他說了几句話。德国鬼子准备从我的飞机下飞过去，塗着黃色十字架的机翼出現在左方。我猛一压杆，蹬舵，駕着飞机对准这片机翼冲去。

不知道是撞在什么地方，大概是座艙上，所以德国鬼子連降落伞也沒有来得及拉开。我杀死他了。多么幸福啊！

一个伟大壮烈的感觉支配着我。应該活下去！尽管刚才这个杀人的凶手回过头来，把眼鏡推到前額上，冷酷地等待着我死亡，可是我仍然战胜了他。我应該活下去！我在沒有碰見他之前倒是无所謂的，因为我負伤了，我知道他們会捉住我。可是現在却不一样了！我应該活下去！我看見地面了，田畴和飞揚着尘土的白色的道路，距地面已經很近了。

我身上的飞行服和皮靴烧着了，但我并不感到燙。說来也許是不可能的事，但不知道为什么我竟然能够在紧貼地面的高度上扭轉了这个危局。我解开了皮带——这就是我在这天，这

个礼拜，这个月，这四个月中間最后所能作到的事。我們暫时就說到这里！不要跑得太远了吧。

3 能作到的事

他們用車子把我拉到村子里。我口渴极了，一路上都在要水喝，在打听卢利的情況。村里的人給了我一桶水，我一头扎在桶里，什么也不看，什么也不听地喝起来。我眞不明白，为什么在周围看着我的妇女这时都放声哭起来了。我的脸燒坏了，头发粘在一起，一条腿折断了，背上有两条很寬很寬的伤口。我的样子可怕极了。

……我心里产生了一种幸福的感觉，它逐漸扩展，逐漸强烈。我躺在农村大院子里的一間草棚旁边的干草堆上，我覚得这种幸福是从切草的声音，从干草味中，从那保护我，使我不会被人杀死的土地上传来。我是被一匹老迈的白馬拉来的，它現在就拴在离我不远的木栅上；我一看見它，眼泪就随着幸福的感覚涌出来了。我們似乎已經作了自己所能够作到的一切。我并不担心报务員和空中射击員，我只要求在他們沒来之前不要将我送走。“卢利也活着，”我兴奋地想道，“既然我們这一仗打得这样漂亮，他就不可能不活着。他活着，我馬上就可以看到他了。”

我眞的看見他了。当他被运到时，老白馬打着响鼻，不住地蹦跳。一位严厉的老大娘——不知道为什么她是我所記得的唯一的一个人——走过去，一声不响地照准馬脸搗了一拳。

他的脸色很安詳，脸上也很完整，仅仅腮上有点兒擦伤，大

約是在着地时被降落伞拉伤的。他的眼睛睜着。我起初不明白为什么大家把他放到地上时都摘下帽子。刚才的那位老大娘坐到他身旁去，把他的手放好……

后来我就被放在一輛大車上，搖搖摆摆地送到卫生营去了。另外一位看样子不象是乡下的妇女，握住我的手摸脉，不住地招呼說：

“当心点，当心点。”

我感到納悶兒，心里想道：“干么当心点呢？难道我快死了嗎？”我大概是說出声来了，所以她才微笑着对我說道：

“您会活下去的。”

大車重又搖晃起来，不停地顚簸着，我的头靠在一个人的膝盖上。我看見卢利了，他躺在台阶上，两只僵硬的手交叉放着；我不顧一切地向他奔去，可是我被人阻止住了。

地面忽而在左机翼下，忽而在右机翼下升腾起来。在我的面前聚集着一些人，我在他們中間尋找我的卡佳。我呼喚她。可是从乱糟糟黑鴉鴉的人群中走出来的不是卡佳，不是在被我拥抱时表情变得严肃了的卡佳，这不是我的幸福，我的卡佳。这是他。他象一只怪鳥似的轉过头来，掀起眼鏡，以一种冷冷的聚精会神的样子凝視着我。

“喂，怎么样，”我对这个德国鬼子說道，“誰贏啦？你看，我現在还活着，我将要在森林上，在海洋上，原野上，在整个地球上飞翔！可是你这个凶手却已經报銷了！我战胜了你！”

4 “是你嗎，猫头鷹？”

我們乘坐的是暖車（安有火爐的貨車廂），只有前面两节才是客車厢。一位面貌聪慧，神色疲倦的小个子医生在第一次巡視之后，便吩咐把我迁到客車車厢里去；从这一点看来，我的情况大概是很不妙。我的头，胸，腿，全身都捆扎着綳带，象个白胖白胖的洋囡囡似的一动也不动地躺着。卫生員在我們車窗外的站台上談話：“到重伤号那兒去拿吧。”这么說来，我成了重伤号罗。可是不知是在什么地方，不知是在脑子里还是在心里有东西还在跳动着，我似乎覚得这是生命在跳动，在忙碌，并且用一双还是很軟弱，但却不肯放松的手在創造着什么东西。

我和邻近的人都熟識了。其中也有一名飞行員，他还很年輕，比我年輕得多。我不喜欢講自己是怎样負伤的，可是他却很願意講。我有好儿次听着这年輕人的不大清楚的說話声，不住地打瞌睡。

“我刚退出攻击，便看見一群加油車。‘干掉这些油車吧’我心里想，于是瞄准了目标，一按电紐便打响了。‘行啦，’我心里想道，‘再不拉起来就要一家伙撞上去了’。我刚拉开飞机，这时便覚得有一个东西重重地打了我一下。我离开了这个地方，等我蹬舵的时候，感覚得就象是沒有了脚似的。我暗想道：‘嘿，脚被打掉了。’可是我沒有往座艙里看，我害怕……”

他飞的是“海鷗”式飞机，在包魯尙一带挂的彩，我以为他的伤势比我重。后来我才知道正相反，我的伤比他重得多。

我的邻床名叫西瑪柯夫。我一面听着他講，一面望着車窗外

的秋天的原野，白色的土房，和鉄路工房旁菜圃里沉甸甸的向日葵花头徐徐掠过去；这是一些短暂的、和平的景象。車厢里一切好象都很有次序：卫生員到时候就把一桶滿滿的菜湯提来，乒里乓啷地将桶放在地板上，吊床搖蕩着，这就是說明我們在前进。尽管列車不时停下来，讓那些載着武器开往前綫的列車通过，因而走得很慢，但我們总是在前进。

不过也还有另外一些与此完全不同的景象！我們的列車并不只是軍用卫生列車，在暖車后面还挂着平台車，上面載着許多机床，——这是我看到一次令人痛心的景象时才知道的。車上的厨房坏了，要等着到站之后才能买到牛奶和西紅柿。小个子医生扯破喉嚨地在喊叫，用手枪恫吓一个什么人。在客車的門梯上，緩冲器上，到处都坐着从烏曼，温尼察逃出来的妇女，她們紧紧地抱着自己的包袱坐着。正象一位卫生員說的那样，要把这些受了很大刺激，失去了一切，被痛苦折磨得麻木了的妇女轟下車去，眞是“于心不忍”。

我們的軍用卫生列車駛进一个鉄路干綫交織的庞大的鉄路网之后，便再沒有按照自己的使命行駛，而是同老百姓一起在撤退。

……窗外不断地飞进許多硬得象小石块似的大綠头蝇来；当我又因悶热和煩躁醒来时，看見它們釘在三天都沒有換过一次的绷带上，无論怎样也赶不走它們。这时正是晌午时分，我們停在曠野里。从我的窗口望出去是一块四四方方的麦田，一个赤脚的小女孩提着一筐西紅柿，从这块被践踏过的麦田里走出来；几个輕伤号便一齐向她奔去，她停了一下，然后撒开腿便往回里跑，把西紅柿都丢掉了。

……仅仅几天以前，我还能从飞机上观看那些只在地面上

参加这次战争的人所不可能看到的場面，——我当时这样認为。那时候，我們撤退的情景在我的眼里就象是一列展开的代数公式。而現在，这些公式却成了有生命的东西，变成現实的事实了。

我現在再不是从六千公尺的高空来观看我們的撤退了！現在我自己也在撤退。我受着創伤，干渴，溽暑的熬煎，更加上一些不愉快的思想，就象是那些討人厌的，嗡嗡叫着落在綳带上的，坚硬的綠头蒼蝇一样，使人无法摆脫它們。

黃昏的时候，显然这时我們的列車已經开动了，因为我的“搖籃”很有节奏地随着車廂的运动在搖晃着。西下的太阳斜斜地照射在車窗上，在它那殷紅的光芒中，可以清楚地看見飞揚着尘埃，充滿了碘酒味的浓浊的空气在浮动。有人在呻吟，声音虽然不大，但是听了很使人心煩。这甚至不能說是呻吟，而是象一个蜂音器似的，从齿縫里发出单調的嗡嗡声音。我喊了邻床的人一声。不对，这不是他。我在什么地方听見过这种哭丧的声音呢？为什么我要这么尽力回想自己是在什么地方听見过这种声音呢？

突然，在我的眼前摆上了一排排的書桌，我清清楚楚地看到許多活泼的兒童的笑脸。这是很有趣的一堂課，講的是楚克奇人的风俗习惯。不过既然打了賭，既然那个两只眼睛隔得很寬的紅头发小孩子抓住我，狠心地用小刀割我的指头，那怎么还有心上課呢。

“罗馬什卡！”我高声喊道。

他大吃了一惊，不再哼哼了。

“是你嗎！猫头鷹？”

他在那些躺在地板上的伤員中間挤了很久，最后才从綁着綳带，翘在空中的人腿中間露出头来。

“怎么一回事？”他直冲着我看，沒有認出是誰，愼重地問道……

我覺得他虽然仍是达沙阿姨說的那样“不会吃漂亮的亏”，但他現在比过去是多少象个人样兒了。最低限度他从前那种矫揉做作的架子一点也不存在了。他現在形容憔悴，脸色惨白，耳朵象玩偶彼得魯什加的耳朵一样向上翘着，左眼睛鬼鬼祟祟地斜着看人。

“認不出来了嗎？”

“認不出来了。”

“那末想一想吧。”

他一向就不善于隐藏自己的感情，这一回也是如此。他的种种感情有秩序地，或者更确切一点說，毫无秩序地流露在我的面前。先是困惑，繼而惊愕，随后恐惧得牙齿打着哆嗦。又是困惑，最后是絕望。

“对不起，你不是已經被打死了嗎！”他喃喃地說道。

5 旧　　恨

在古俄罗斯的歌子里常常提到命运。我虽然不是一个宿命論者，可是当我讀到“紅鷹”报上关于我自己的死訊时，在我的脑子里不由得出現了这个字眼兒。我还能背出这篇报导。

> 格利高里耶夫大尉駕駛着飞机，在执行战斗任务后返航时，被敌人的四架歼击机追上。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激战中，格利高里耶夫击落敌机一架，其余三架未敢恋战，仓惶遁去。格利高里耶夫的飞机虽被击伤，但仍坚持飞行，在距战綫不远的地方，他又遭到两架

"容克"式飞机的攻击。格利高里耶夫駕駛着被火焰包围的飞机，成功地撞下了一架"容克"飞机。某部全体飞行員将永远紀念这些英勇的斯大林之鷹——为祖国战斗至生命最后一刻的共产党員格利高里耶夫大尉，領航員卢利，射击报务員卡尔宾科和空中射击員叶尔紹夫。

一直到一九四三年夏天，我才知道在我从列村刚被送走以后，便有一位軍事記者到了那兒。这位記者采訪了目击这次空战的农庄庄員，把飞机焚毁后的残骸拍了照。大家对他說我已經沒有救了。

为什么这篇报导会給我一种似乎是受了侮辱的感觉呢？是因为我这次死里逃生的确是一种奇迹，还是因为我生平第一遭讀到了自己的訃告呢。我的思想突然分散了。卡佳出現在我的面前，不是那个常常突然醒来在房間里走来走去思念着我的卡佳。而是另外一个心情忧伤，面容蒼老的卡佳。她讀完这篇报导后便把报紙往桌上一放，仿佛沒有发生什么事似的，脸部的神情木木的，还要找点兒什么事干，也許是編辮子，随后又把它解开，但突然間，她象个木偶似的倒在地上了……

"是的，"我說道。"这是常有的事。"

于是我把报紙捏成一团扔到窗外去了，罗馬紹夫惊叫了一声。火車这时正停着沒有动，在我們談話的时候，他不住地往窗外望。后来他又把这团报紙撿了回来；他現在已經亲眼看見我还活着，所以即便能看看报紙上說我已經死了的消息，显然也会給他一点快慰。

"这么說来，你还活着！亲爱的，我眞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他居然說什么"亲爱的"。

“鬼才知道，我多么高兴！这会是巧合嗎？会是同姓的人嗎？反正都一样！主要的是你活着。”

他开始問我伤在哪兒，伤势重不重，伤着骨头了沒有等等。在他听到我說伤势很輕，一位相識的医生把我安置在客車厢里之后，不禁又大失所望。

“不过我可以想象得到卡佳会怎样着急！”他說道。“因为她也可能看到这篇报导的。”

我說“是呀！很可能”，便开始問起他莫斯科的情形。罗馬紹夫在話里說到，他离开莫斯科还不到一个月。

和他談話的时候，不仅要用最和平的方式，而且从头一个字开始就要讓他明白我們之間的关系絲毫沒有改变；大概这就是我应該采取的态度。不过人是奇怪的动物，——这种說法已經不新鮮了。我望着他那张十分紧张的，白得很不自然的脸面，除了慣常的，甚而掺杂着某种幸灾乐祸的卑夷之外，我的心絲毫沒有动一动。在我的心目中，他过去是怎样一个坏蛋，自然現在还是怎样的一个坏蛋。不过这时他給我的感覚仿佛他是一个老早就熟悉了的，习惯了的，所謂“自己家里的”坏蛋。

他也明白，一切都明白！他談起柯拉布略夫，問我知道不知道，老头虽然六十三岁了，可是还报名参加了民兵队，“莫斯科晚报”因此还登載了一篇报导呢。他又用一种譏諷的口气談到尼古拉·安东內奇，說他不仅領到新住宅，而且还获得了学位。什么学位呢？地理学博士。照罗馬紹夫看来，不經过論文答辯要获得学位几乎是不可能的。

“你知道是誰使他飞黃騰达的嗎？”罗馬紹夫眼睛里放出光来，忿恨地說道。“就是你。”

“我？”

“对。他姓塔塔林諾夫，就是你使得这个姓出了名的。”

他想説我研究“圣·瑪丽亚”号探險队的工作最先引起了大家对塔塔林諾夫船长的注意，而尼古拉·安东內奇也就利用自己同姓这一点沾了光。罗馬紹夫的表达能力的确不錯，他把这一思想表达得再簡要，再明确不过了。

可是我偏不願意和他談这个問題。他明白到了这点之后，便又岔到别的話題上去了。

“你知道我在列宁格勒前綫碰見了誰嗎？”他説道。“遇見了巴甫洛夫中尉。”

“巴甫洛夫中尉是誰？”

“瞧你！他一再說，他从小就認識你。一个身材高大，肩膀寬闊的小伙子。”

可是我怎么也沒猜想到这个身材高大，肩膀寬闊的小伙子就是那个生着一双孩子气的蓝眼睛，喜欢写詩，曾經駕着卜西卡和托加两条狗拉的雪橇送过我的沃洛嘉。

“我的上帝，他的父亲是位老医生，曾經来看过他的！”

“伊万·伊万內奇！”

听到伊万·伊万內奇医生身体健康，并且还在艦队服务的消息，即使这个消息是从罗馬紹夫口里說出来的，我也感到高兴。他眞是个好样兒的！

罗馬紹夫屡次說他到过列宁格勒前綫。卡佳也是留在列宁格勒，我眞替她担心。不过要我向罗馬紹夫打听卡佳的消息，任憑怎样我也是不干的！

总而言之，現在，在他对我活着的这一事实已稍覚习慣了之后，就老想显示他自己。他似乎因为能在軍用卫生列車上遇見我，因为和我一样挂了彩等事而感到驕傲。

战爭爆发时，他在列宁格勒科学研究所任行政副所长。他本来可以緩役的，可是他沒有那样作；整个研究所沒有一个人不报名参加民兵队的。他在列宁格勒近郊負了伤，但仍然坚持留队。他的一个現在成了高級軍事首长的老上級把他調到了莫斯科。他接受了新的职务，还沒有到职，火車在温尼察就被炸毁了。爆炸波把他冲到一根电綫杆子上，所以他現在整个左半身經常感到“难以忍受的酸痛”。

“你刚才听到的是我梦中发出的呻吟声，”他解释道。“連医生都不知道該对我怎么办，根本不知道。”

“喂，你現在該老老实实承認，”我严厉地說道，“你所說的哪些是謊話，哪些是眞事？”

“全是眞事！”

“不見得！”

“一点不假！我們需要勾心斗角的时期早已經过去了。”

他竟然說什么“我們”。

“老弟！現在一切都結束了。我过的是一种生活，你过的又是一种生活。我們現在还有什么可爭的呢？說来你又不肯相信，不过說老实話，回想起那些引起我們发生冲突的事来，我有时感到惊异。它比起我們眼前所发生的惊天动地的事件来，那眞是太不足道了。”

“这还用說嗎！”

“那么关于这件事就算完結了吧！”

他带着一种詢問的神情看了看我，显然还不敢相信我究竟是否同意把“这件事”就此完結。

不过我倒是同意的。在这样的日子里，我哪兒还顧到这些旧恨呢？我受着痛苦的煎熬，时而想到那迫临我国的巨大的暗

影。现在它正紧紧地跟踪着我們，追赶着我們这列迷途的火車。象我这样一个断了腿的残废人在这个暗影面前是悲慘的，是无能为力的。我时而想到医院里的情形：日子过了一天又一天，多么单調，仿佛永远也沒个尽头了，穿着軟底鞋的护士走进来把鮮花放在小桌上。天啊，我打心眼兒里不願意享受这种淸福，不願意看見桌上的这些鮮花，不願意听見那种肃靜的，医院式的脚步声！

我心里产生了一个我能够想象到的最可怕的思想。这个思想就是：“我再不能飞行了”。我頓时感到渾身燥热，张大了嘴呼吸着，我的心飞得那么远，远得好象再也回不来了。

6 来自斯坦尼斯拉夫的姑娘

上面我說到伤員跑去撿西紅柿的事。这是使我感到最痛苦，最伤心的事。这时人群中突然出現了两个我先前沒有見过的穿便衣的姑娘。她們似乎并沒有費很大力气，只是对一个个伤員迅速地說了几句(她們說的是烏克兰話)，声音就象唱歌那样悅耳，伤員們就一声不响地散开，回到各个車厢里去了。

这是两个斯坦尼斯拉夫师范学院的学生——两个人都长得很丰滿，黑黑的皮肤，低低的眉毛，輕細的嗓音，虽然她們外表上看来很坚强果断，但却是两个异乎寻常的善于料理“家务”的姑娘。她們刚参加到我們这一伙里来，便設法弄到了水，珍惜地分給每位弟兄一杯。就連上帝也不知道她們是从哪兒弄来了一筐紅莓；吮吸着这微微有些苦澀的莓果多么舒服！这些莓果多么新鮮！

除了知道一位姑娘名叫卡佳之外，我对她們倆甚至一点也不了解，可是为什么我却从这些日子里所遇到的千百人中独独去談这两位姑娘呢？

因为……这一来我又要把話題扯到前面去了。

我背朝着列車运行的方向靠窗躺着。窗外的景物不断离我远去，所以等我們的車已經开过去之后，我才看到有三輛坦克。这是三輛沒有絲毫特色的中型坦克！坦克手敞开着进出口，向我們张望。他們沒有戴鋼盔，所以我們把他們当成自己人了。过了一会兒，艙門关上了。就在他們关艙門的最后一分鐘，也还不可能想象，一些身体健康的人会对着这列載有不下一千个伤号的卫生列車进行炮击。

但这样的事偏偏就发生了。

車厢发出了一陣鋼鉄互相碾軋的声音猛地一震，把我抛了起去，負了伤的一只腿被压在下面，我忍不住疼得呻吟起来。一个把拐杖拄得咚咚发响的小伙子叫喊着，滿車厢里奔跑，他被人推了一下，便一头栽倒在我旁边的角落里。我从窗口看見一些伤員带头跳下車去，跑的跑，跌倒的跌倒，因此坦克就用榴霰弹对他們射击。

我邻床的西瑪柯夫在我身旁向窗外观望。当我們同时掉轉头来，面面相覷地望着对方时，他的脸变得雪白了。

"应該跳出去！"

"也好，"我說道。"不过，要跳下去就得有一件最起碼的东西：腿。"

我們好歹总算爬开了我們的床位，伤員們把我們抬到了車厢口。

我克制着难以忍受的痛楚从車台阶上走下来，倒在車厢下

面，我永远也忘不掉这时候心头那种强烈的感情。我大概还是有生以来第一次体驗到这种蔑視，甚至是仇恨自己的感情。許多人奇奇怪怪地攤开手躺在我的周圍。这是一些尸体。其他的人有的在跑，有的叫喊着跌倒在地上。我被憤怒和痛楚折磨着，毫无办法地蹲在車厢下面。

我掏出手枪，——并不是想自杀，虽然在千百种此起彼伏的思想中这样的念头也可能閃了一下。我的手腕被人紧紧的抓住了……

这是刚才的一位姑娘，而且正巧是那位面孔更黑些，名叫卡佳的姑娘。我对她指了指西瑪柯夫，他脸貼着地趴在不远的地方。她瞥了他一眼，搖了搖头。西瑪柯夫被打死了。

"他媽的，我哪兒也不去了！"我对第二个姑娘說道。她不知从哪兒突然鑽了出来，在劈劈啪啪杂乱的枪林弹雨中，她一点也不慌张。"不要管我！我有手枪。我不能讓他們活捉了去。"

可是这两位姑娘抓住了我，我們三个人一起滚到路堤下面去了。这时罗馬紹夫在我們前面露了一下脸，他脸黃黃的，在地上爬着。鉄道旁有一条潮湿的臭泥沟，他和我們都在順着这条泥沟往前爬，沟的那边紧接着是一片沼地。

姑娘們拖着我感到很吃力，我几次三番求她們丢下我。卡佳似乎还招呼了一下罗馬紹夫，要他等一等，帮帮我們的忙，但他只是回过头来看了看，就又象个猴子似的用四肢撑着，不挨地面地爬走了。

当时的經过就是如此，不过比我現在叙述的要慢千万倍。

我們好歹穿过了沼地，潜伏在一个小白楊树林子里面了。我們是指两位姑娘，我，罗馬紹夫和两个在半路上加入到我們中間来的兩个战士。他們的伤势都很輕，一个伤了右手，另一

个伤了左手。

7　在小白楊树林里

我派这两个战士去偵察情况。他們回来报告說，周围停有近四十輛机关車，还有不知从哪里来的一些行軍灶。問題很明显，刚才炮击我們列車的坦克是屬于一支庞大的登陆部队的。

“当然，用腿走掉也可以。不过，旣然大尉不能独自行动，最好还是利用一下驗道車。”

这輛驗道車是他們在錯車站旁的路堤下面找到的。

我們正在討論是否可以将这輛驗道車抬起来放到路軌上去。罗馬紹夫就在这时躺在地上开始哼哼起来，嚷着痛得受不了。他的癲癇病可能是眞的发作了，因为两个姑娘解开他的制服时，看到他的左半边身子全都紅了。我以前从来沒有听說过象这样的內伤。不管怎样吧，在这种情况下，他自然不能跟着两个战士到錯車站去了。所以两个姑娘便跟去了；她們仍旧是那么不慌不忙，坚决果断的样子，用烏克兰話从容不迫地交談着，声音輕細而优雅。

在潮湿的小白楊树林里就剩下我和罗馬紹夫两个人了。

他是裝病呢，还是眞不舒服呢？也許不是裝病吧？

他象癲癇病人似的抽动了几下，随后嗚嗚的号叫了一陣便安靜下来了。我喊了他一声：

“罗馬紹夫！”

他一声不响地躺着，胸脯鼓得老高，鼻子白得完全象是一个

死人的。我又喊了他一声，他回答的声音那么微弱，就好象他已經到了幽冥世界，现在要回到处在德寇登陆部队活动地区的这个小树林里来，他感到十分勉强似的。

“发作得好厉害，”他勉强笑了笑，嚅嚅着說道。

他抬起眼皮，很吃力地站了起来，机械地拭着貼在脸上的白楊树叶……

虽然这天的情况很复杂，但是过得相当单調，特别是比起第二天早上所发生的事来，就更加枯燥无味，所以我很难說出这一天是怎样过去的。我們在等待着，沒有止境地等待着，我倚着木柴垛躺在去年的落叶堆中。罗馬紹夫象土耳其人似的盘着腿坐着，半閉着两只鳥眼，把双手擱在枯瘦如柴的膝盖上，誰知道他在想些什么。

树林里本来就很潮湿，再加上新雨初霽，树枝上，被压得顫动着的蜘蛛网上都閃耀着大顆大顆的水珠，啪嗒啪嗒地落在地上。这样一来我們就不怕口渴了。

太阳有两次照着我們，开始时是从我們的右边，后来好象划了个半圓，又从我們的左边照来。这样看来，战士和姑娘們去收拾驗道車已經有三个来鐘头了。

那位名叫卡佳的姑娘临走的时候，把她的背包塞在我的头下。当我用一只拳头去捶头下的背包，想把它弄高一点的时候，发现背包里面有什么东西咯吱咯吱作响；显然里面装的是面包干。罗馬紹夫又开始叫起苦来，說他要餓死了，我喝斥了他一声，他又不吭气了。

“他們不会回来了，”过了一会兒他神經質地說道。“他們把我們抛弃了。”

他的癲癇病已經过去了，现在他居然躍躂起来了，竟不顧小

白楊树林很稀疏，从这兒到路基那边又是片空曠地带，他这样作会暴露我們。

“这都是你的錯兒，”他轉回来，挨着我蹲下，說道。“你把他們都打发走了。应該留下一个姑娘。”

“作人質嗎？”

“对，作人質。現在算完蛋了！他們不会回来接我們了，这是驗道車，总共也只能装四个人。”

我这时情緒大概不很好，所以我掏出手枪对罗馬紹夫說道，假如他还要在那兒怨天尤人的話，我就打死他。他果然不吭声了，皺着一副嘴脸，大概費了好大的劲兒才忍住沒有哭出来。

总而言之，事情很不妙！暮色已經偷偷鑽进了树林，而姑娘們还沒有回来。我自然不会讓自己有象罗馬紹夫那样卑鄙的想法，以为他們会抛弃我們，自己坐着驗道車跑掉了。現在最好暫时不要去考虑他們回不回来的問題。

我躺在那兒望着天空，天空逐漸昏暗下来，在搖搖摆摆，湿漉漉的白楊树中間逐漸离我远去了。我沒有想卡佳，可是有一种东西温柔地，徐徐地从我心里爬过，我感覚到“卡佳”了。这是在作梦。要不是梦里有卡佳，我一定要驅散这个梦。虽然我还不知道为什么要驅散它，可是我覚得睡覚是不行的。我似乎覚得这是西班牙，或者是我从西班牙发出的一封信，——一种从未有过的錯乱感覚。不是打仗，而是在瓦倫西亚近郊的小果园中。果园的老太太知道我們是俄国人之后，簡直不知道要把我們放在哪兒和怎样对待我們才好。“总之要記住，”虽然我感覚到卡佳在我的身边，可是我仍旧这样写道，“你是完全自由的，不受任何义务的約束。”

虽然因为湿透的腿冻得发僵了，軍大衣从肩上完全滑下来，

被压成了一团，而我还是怕和梦境分别。我拉着卡佳的手，我不肯放走这个梦，可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发生了，需要使自己醒来。

我睜开眼睛，看見被初升的阳光照耀着的晓雾，緩緩地在林間浮游。我的脸和手都是湿的。罗馬紹夫保持着原来那种困倦的，冷漠的姿态坐在不远的地方。一切似乎仍和刚才的情景一样，其实一切已經完全两样了。

他沒有看我。过了一会兒，他斜着眼非常迅速地看了我一下，我恍然大悟，为什么我刚才会感到那么不舒服。他把我头下枕着的装着面包干的背包偷去了。此外他还偷去了装着伏特卡酒的水壶和手枪。

我感到血液直往脸上涌。他居然偷去了我的手枪！

"混蛋，赶快把手枪还回来！"我鎮静地說道。

他沒有吭声。

"喂！"

"你反正就要死了，"他急忙說道。"你用不着武器。"

"死不死是我自己的事。但是如果你不想受战地軍事法庭审判的話，那就赶快把手枪还給我，明白嗎？"

我开始急促地喘息着。

"有什么战地法庭！現在就是我們两个人，什么事情也沒有人知道。实际上你这个人早已經不存在了。根本沒人知道你还活着。"

現在他直楞楞地看着我，他的眼睛非常古怪，睜得滾圓，流露出一种躊躇滿志的样子。說不定他是发疯了吧？

"你先喝一口水壶里的酒，"我平静地說道。"讓你自己清醒清醒吧。然后我們再来看，究竟我是活还是死。"

可是罗馬紹夫幷沒有理会我。

“我留下来是为了告訴你，你无时无地不在妨碍我。每一天，每一小时都在妨碍我！我恨你恨透了，我恨你恨得发疯！我已經厌恶了你千年万世！”

他这时候无疑地已經神經失常了。我很相信他最后的一句話：“我已經厌恶了你千年万世”。

“不过現在一切都結束了，永远結束了！”罗馬紹夫忘其所以地繼續說道。“你得了坏疽病，反正是要死的。你現在很快就要死的，馬上就要死，就是这样。”

“就算是这样吧！”我們之間相隔不到三步，假如能够把拐杖擲得很准，我也許可以打昏他。但我还是平靜地說道。“可是你把紙夹拿去干什么呢？里面全是我的証件嘛。”

“干什么？好讓別人发現你的时候，只是光杆一个人。誰也不知道你是什么人。（他这时說漏了一个字。）地上横七竪八躺着的死尸多着哩。你就要变成死尸，”他傲慢地說道，“而且誰也不会知道是我把你杀死的。”

現在，这一幕情景浮現在我的眼前似乎有些荒誕无稽，可是我幷沒有更改和增加一个字。

8　誰也不会知道

我小的时候性情非常急躁，到現在还很清楚地記得自己那种只图一时痛快时的危险的快感。当我听到罗馬紹夫的話时也就有这样的感情，它使我的脑袋有些暈眩起来。應該命令自己要絕对鎮靜，我給自己下了这样的命令，然后悄悄地把手伸到背

后，握住了拐杖。

“你可要知道，我已經給部队里写了信了，”我居然能一开始就用一种十分平靜的声調說道。“所以你想利用这篇报导那是枉費心机的。”

“那么軍用列車被截的事呢？”

他带着一种愚蠢的，洋洋得意的神情看了我一眼。他想要說在軍用卫生列車被炮击之后，解释我失踪的原因，那是再容易不过的事了。这时我才明白，他很早以前，可能在小学念書的时候就盼望着我死掉了。

“就算是这样吧。不过，奇怪的是你在这件事情上是占不到便宜的，”我說了一些这类的話；反正說什么話都行，目的只在于延迟时間。

木柴垛妨碍着我擲他。必須悄悄地离开木柴垛一点兒，从旁边打去，才能更准确地打中他的太阳穴。

“我能不能占到便宜，这沒有什么关系！反正你是吃了亏。現在我就打死你。瞧着！”

他掏出了我的手枪。

如果我相信他眞会打死我，那他倒很可能采取这一着的。我从来还沒有看見他这样兴奋过。但是我冲着他的脸啐了一口，說道：

“开枪吧！”

我的上帝，他怎么能这样怪声怪气地号叫，他滿地乱轉，把牙齿咬得吱軋作响，甚至发出咯噔咯噔的声音！如果我不知道他的这些鬼把戏除了表示畏怯和无耻之外再沒有别的东西，那他也許会吓唬住我。他这种野人般张牙舞爪的动作說明他內心的自我斗爭——开枪呢，还是不开枪呢？手枪灼烧着他的手，他

一次又一次地举起枪向我瞄准，渾身打着哆嗦。最后我倒真的害起怕来，恐怕他一不小心会触动了枪机。

“死鬼！”他大声叫道。“你总是在折磨我！你知道多亏誰救了你的性命！賤种，下流东西！要是我能够，天哪！你究竟是为了什么，为了什么活着？你的腿反正是要鋸掉的。你以后再也不能飞行了。”

这是很可笑的，在他这些疯疯癲癲的謾罵当中，使我感到最受侮辱的，莫过于說我以后再也不能飞行的这句話了。

“这么說来，我是在空中最碍你的事了，”我感到自己說話的声音很可怕，但說的时候仍然竭力保持冷静。“那么我們在地上就該象奥勒斯特和庇拉得① 一般亲暱了吧。”

他現在正好側着身子站着，还用左手遮着眼睛，仿佛因为无法說服我赶快死去而感到絕望似的。这是一个最有利的时机，我将拐杖猛地向他擲去。本来擲拐杖应該象擲标枪那样，身体尽力往后一仰，然后全身向前送出，最后再撒手。我能作的都作到了，但是很可惜，拐仗沒有击中太阳穴，而是落到肩膀上了，并且打得似乎并不太重。

罗馬紹夫怔住了。象一只袋鼠似的笨拙地狠命地一蹦，然后轉过身子来向着我。

“好哇！”他罵道。“干得不錯啊！”

他不慌不忙地收拾好背包。为了拿着方便起見，他把背包捆起来，一只手拿一个，不慌不忙地从我身边走过。他弯下腰从地上撿起一根树枝，揮舞着向沼地那方面走去。五分鐘以后，他那佝僂的身影便一閃一閃地隐沒在远处的白楊从中了。我用两只

① 奥勒斯特和庇拉得是希腊史詩中两个最亲密的朋友。——譯者注。

手撑住地面坐着，口里干得象火燒一样，我竭力忍住不去喊"罗馬紹夫，你回来！"因为要叫我这样作自然是不可能的。

9 一个人

把孤零零的，飢寒交迫，手无寸鉄，身負重伤的我一个人留在树林里，留在距德寇登陆部队只有两步远的地方，我相信这个阴謀是他昨天晚上就考虑成熟了的。至于罗馬紹夫在冲动的时候所干的和所說的一切，显然也是为了要吓唬和侮辱我。可是他的算計落了空，所以他就离开我走了。他虽然沒有杀死我，但这一着和杀死我沒有两样，甚至更毒辣一些。

我不敢說我思想清醒之后，心里就感到輕松了一些。应該动身离开这兒，要不然就得同意罗馬紹夫的說法，永远留在这一小片白楊树林里。

我站起身来。拐杖好象是一高一低。我迈了一步。这不象是后脑勺被击中，立刻失去了知觉的痛法，而是象几千个小妖怪将我的伤腿撕成碎片，用鉄制的小刮刀在刮我背上刚要愈合的伤口。我走了第二步和第三步。

"怎么样，能不讓我走嗎？"我对小妖怪們說道。

又迈了第四步。

当我挣扎到树林边沿时候，太阳已經相当高了。林边露出了昨天見过的沼地，仅有的一长条被压伤了的潮湿的草地把沼地分割开来。沼地上到处是美丽碧綠的圓球一般的草堆，我回想起这些草堆昨天在姑娘們脚下滚来滚去的情形。

路堤上有人在走动——是自己人呢？还是德国鬼子呢？我

們的火車还在燃烧；太阳光下显得惨白的火焰正沿着烏黑的車厢板到处竄动。

不然就回到火車上去罢？回去干么呢？大炮轟击的声音传到我的耳朵里，声音沉重，遥远，象是从东方传来的。最近的一个車站是新謝里亚車站，距我还有二十来公里。那兒正在战斗，看来，那兒一定有我們的人。如果这种每走一步路都是一次莫大的痛苦也可以称为走路的話，那么我就算是向那个方向走去了。

树林走完了，前面是一丛丛結着蓝黑色的浆果的灌木。我不記得这种灌木叫什么名字了，它的果实形状很象欧洲越橘，只不过大一些。我已經一昼夜多沒有吃东西了，这眞是来得湊巧。灌木丛后的田野上躺着一个一动也不动的黑色的东西，大概是一个死人。每次我撑着拐杖探身去摘浆果时，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死人总使我感到心神不安。后来我忘記了它，但不一会兒又带着一种不愉快的感覺想起了它，甚至因此而感到毛骨悚然。几个浆果滚到草里去了。我小心翼翼地弯下腰想要把它們撿起来，这时我的心好象被一根針猛的刺了一下：这是一个女人。我現在尽可能快地向她走去。

她张开两臂，仰面朝天地躺着。她不是卡佳，是另外那位姑娘。子弹打中了她的脸，两道秀丽的黑眉带着痛楚的表情紧紧地蹙在一起。

似乎就是在这个时候，我覺察到我在自言自語，并且談的尽是一些十分离奇的事情。我想起了这种蓝黑色的，象欧洲越橘似的浆果叫什么名字了，它叫做篤斯越橘，或者又叫水越桔。虽然这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发現，但我却因此欢喜欲狂。我开始大声地編造一些話来叙述这位姑娘被打死的情形：她很可能是回来

接我，德国鬼子从土堤上用自动枪向她发射了一排子弹。我对她說了許多安慰的話，竭力鼓励她，就好象她并沒有死，好象这个痛苦地蹙着两道低垂的眉毛的姑娘不是一个死人，不是一个不能复生的死人。

我后来忘記了她。我在向什么地方走着，嘴里不住地說胡話；我对自己这样荒誕的胡言乱語感到討厌极了。这是譫語，它是在不知不觉中突然发作的。我这时已經顧不得和这种譫語作斗爭了，因为我現在需要和另一种不可抑制的願望作斗爭，这就是要抛掉这两根把我的胳肢窝磨起了水泡的拐杖，躺倒在宁靜和幸福的土地上的願望。

……在失去知觉以前，我大概很久就沒有看見自己周围的一切了，要不然我脑袋旁边的这一棵茂盛的淡綠色的大头白菜是从哪兒鑽出来的呢？我躺在果园地里，兴奋地瞅着这棵大头白菜。要是那个戴頂黑色破礼帽的稻草人不在我的头頂上緩緩地划圓弧的話，那一切实在太好了。一只烏鴉落在稻草人肩上，随着它一起打轉。我想，如果这个烏鴉不那么乏味地眨着一只眼睛的話，世界上的一切实在是太好了。我对它吆喝了一声。但我的声音是那样微弱，那样嘶哑，它只是看了看我，滿不在乎地拍了拍翅膀，仿佛是聳了聳肩膀似的。

的确，假如我能使这緩緩旋轉的世界靜止不动，那一切就太好了。这时我也許能够看清菜园后面的那座沒有刷过油漆的木头小房子，看到台阶和院子里水井边上高高的吊杆。我也許能看見那扇忽明忽暗的窗戶里有人在屋子里走动，并且惊惶地往窗外张望。

我站起身来。到門口約摸有四十来步；和我头一天所走过的路比較起来，这簡直是微不足道的。可是我付出了多大的代价才

走完这四十步啊！我一点兒力气也沒有了，倒在台阶上，拐杖啪嗒响了一声。

門微微开了一点兒。一个大約十二岁的孩子半跪在小方凳后面。屋子里的天花板很低，里面摆着寬大的双层板床，板床中間用印花布帐幔隔着。我躺在台阶上，一下子很难看清在黑洞洞的房間深处的小孩子的面貌。他举着枪对我瞄准，甚至用脸頰紧貼着枪托，眯縫着一只眼睛作出要发射的样子。

“喂，帮帮忙吧，”我說。我竭力使这个已經开始繞着我作該死的慢速运动的房間停止旋轉。“我是受伤的飞行員，从列車上逃出来的。”

“基里尔，不要动！”拿枪的小孩說道。“他是自己人。”

这时候，我觉得他好象分成了两个人；一个和他一模一样的孩子很小心地从帐幔后面探出头来，向外张望了一下，他手里拿着一把芬兰刀，紧张地一面眨眼睛，一面喘粗气。

10 孩子們

以后的事情我就不大記得了，在孩子們这兒度过的日子我觉得自己好象是在一团团水蒸汽中。水蒸汽是实实在在的，因为在俄国式爐子的一只三脚架上，从早到晚总放着大茶炊煮开水。不过另外还有一种看不見的，奇怪的蒸汽，它使我急促嘶哑地喘息，使我渾身淌汗。它有时变得很稀薄；这时我便能看見自己躺在床上，一条腿下面象小山般堆放着各种顏色的枕头。这是孩子們为了使血液不向伤口流而想出来的办法。我現在已經知道他們一个叫基拉，另一个叫沃瓦，是扳道員約那·彼得罗維

奇·列斯可夫的兒子。父亲昨天到站上去了，囑咐他們关起門来，什么人也不讓进来。他們两个是双生子，——这一点我很清楚，——但每次我看到他們在一块兒时，总不免吓一跳：他們长得完全一模一样，这又好象是我神志不清了。

……我的身上象是有两个人在决斗：一个是輕松愉快的人，他竭力在回忆并且生动地想象着生命中最美好的东西；而另一个却是阴郁沉悶的人，他忘不了身受的屈辱，怀着复仇的决心，因为无法报复而痛苦着。

有时，我似乎看見一个滿脸鬍鬚，身材高大的人走进我和妹妹所住的小木板房里，他冻得那么厉害，甚至連門也无力带上。但这不是伊万·伊万內奇医生。这是我自己。我无力地倒在台阶上，門敞开了，两个孩子用枪瞄准我，后来又說“他是自己人”。

我总覚得，他們之所以待我这样热心，那是因为多年前，我和妹妹曾經搭救过医生，那时我們俩还是孤苦伶仃，被抛弃在一个为积雪淹沒了的，荒僻的乡村中的孩子。

时而我看見自己在火車車厢下面，手里拿着手枪，恨得呲牙咧嘴。一些人奇奇怪怪地摊开手躺在我的周围，我作了什么事呢？我犯了什么錯誤呢？竟至使我放过了生命中最重要，最不可缺少的东西。鬼子怎么会跑到我們的領土上来，并且胆敢卑鄙地向受伤的人射击呢？难道世上就沒有公理，沒有良心，沒有我在学校里所学过的，我虔誠地信奉过的，从童年时候就习惯了对它尊崇和热爱的眞理了嗎？

我竭力想要回答这个問題，但是我回答不了，因为我的呼吸减弱了；孩子們焦灼不安的看着我，不住地說，如果父亲能回来的話，那他一定可以想些办法，我立刻就会好一点。

父亲真的回来了。毫无疑問这是他。因为他和两个孩子同样的笨拙，长着一副忧郁的面孔，一双閃閃发光的深蓝色的眼睛。当他垂着手，拱着腰站在床边的时候，他的眼睛閃亮了一下。

“登陆部队被打垮了，”他說道，“我們把他們围在新謝里亚車站附近，把他們全部歼灭了，一个也沒跑掉。”

后来他沉默了一会兒，皺着眉头看着我。我暗暗想，我的病况一定不妙，所以别人才用这样慈爱的眼睛看我，所以才問我的名字和父名，姓和軍銜，并且叹了一口气，用一张紙条記了下来釘在墻上，以免忘掉。但这也不要紧，讓他們去釘吧，反正我不去看这张紙条。我拉着扳道員的手，开始兴奋地向他叙述他的兒子怎样迎接我。我大概說得太久了，不少顚三倒四重复杂乱的地方，所以他才在我的額上放了一种清凉的东西，并且劝我一定要好好地睡一覺。

“睡吧，睡吧！”

我知道，如果我能够睡着，他一定会滿意的，所以我便閉上眼睛，假装睡着了的样子。但我向他描述的画面并沒有消失，它已不限于在这間房子里，而是存留在无穷尽的远景上。

我好象覺得有成千上万間象这样的小房子。千万个孩子跪在小方凳后面，每张小方凳后面都伸出一支枪来。千万个孩子手里拿着刀藏在印花布帐幔后面。在伟大的俄罗斯平原上，从地平綫的一边到另一边，在每家黑洞洞的房間深处，都有許多孩子在等待着敌人。只要敌人一走进去，便把他們消灭。

11 爱　情

假如象很多詩人那样把生命比作道路的話，那么，可以这样說，在这条道路上最险峻的轉弯地方，我总是遇到給我指出正确方向的交通警。这个轉弯和其他的轉弯所不同的地方，仅只在于搭救我的是一位扳道員，他的专职就是保障交通安全。

我在他家里睡了两天两夜，时而清醒，时而昏迷。每当我睜开眼睛时，总是看見这个愁眉不展的人，寸步不离地站在我的床前，就好象是不肯放我走到路那边的万丈深渊里去。有的时候，他又变成了一个眼睛同样亮得惊人的孩子。而孩子也坚守在自己的崗位上，把我看守在这兒，看守在这間有小窗和低矮的天花板的房間里，說什么也不放我到另一个世界里去，那兒(假如相信“紅鷹”报的話)，我已經去游历过一遭了。

无論在我清醒的时候，还是在神志昏迷的时候，我一次也沒有想到过罗馬紹夫，这实在是再好不过了。这是自卫的本能嗎？大概是的。因为回忆这些事情对我的身体是不会有好处的。

交通恢复以后，这家人用驗道車(无疑是两位斯坦尼斯拉夫的姑娘所沒能得到的驗道車)把我送到札奥节尔；三双碧蓝的眼睛同时閃耀着，羞怯地和我告别了。我又坐上了軍用卫生列車，这次是名符其实的卫生車，——有洗澡間，无綫电收音机，閱覽室。我洗过澡，换了繃带，吃得飽飽的，完全符合医疗科学的規定，将伤腿向上抬起，一覺睡过了整个中俄罗斯，醒来已在基洛夫城外的一个什么地方了。在这大后方的，仿佛是另外的一个世界里，首先使人感到奇怪的是窗戶可以不用黑窗帘遮住。这时，

我才想起，并在心中重温了一次我和罗馬紹夫之間所发生的事。

我想起了我們在德寇坦克炮击列車的头一天的談話。

“你应該承認，你一生作了許多无耻的事，”我說道，“这些事在你自己看来也是无耻的。”

“就算是这样吧，”他冷冷地回答道。“不过，什么叫无耻呢？我把生命看作兒戏。譬如說，現在就是这样。这次命运之神不是亲自把牌交到我們自己的手里了嗎？”

交这付牌的不是命运之神，而是战爭。不是战爭，而是撤退，因为若不是撤退，他无論如何也不敢偷去我的手枪和文件，并且把我一个人丢在树林里。

我象是在法庭上，从各个角度，同时也从軍法方面（虽然我对軍法科学的概念很模糊）来分析他的行为。

我回忆起我們之間关系的全部历史过程，这是一段极为复杂的历史，特别是想起他曾經認真地打算和卡佳結婚的事（現在看来，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了）。

他甘心永远失去她嗎？我不知道。他娶了个名叫阿列芙吉娜·謝尔盖耶芙娜的女人。尼娜·卡比丹諾芙娜說，他在結婚的时候喝得酩酊大醉，并且痛哭了一場。卡佳听到尼娜·卡比丹諾芙娜說这話的时候，似乎很难为情，脸都紅了。这是怎么回事呢？是她猜到罗馬紹夫还在爱着她嗎？

当他拿着手枪，对我咆哮說：“你知道多亏誰救了你的性命！”他这时无疑的已經忘其所以了。

可是究竟多亏誰呢？

是的，軍事法庭不难找出一条法律，来枪斃二級軍需官罗馬紹夫。

不过，世界上能不能再找到这样的法庭，它的判决是不憑良

心来預測的呢？在这个法庭上，被告会供認說：

“是的，我想杀死他。”

然后又說：

“可是我沒有杀死他，因为我所爱的那个女人受不住听到他的死訊的打击。”

沒有这样的法庭！他之所以沒有杀死我，不是出于对卡佳的爱，而是由于他自己的胆怯！我的天，这算是什么爱情！爱情使生命变得崇高而純洁，爱情使生命变得新穎而壮丽；爱情不需要人們請求，就会把人变得比过去更加可爱和善良。难道他的爱情是这样的嗎？

不，这不是爱情。天晓得这种錯綜复杂的感情算什么，在这种感情里面，情欲和受了損害的虛荣心摻杂在一起，甚至还可能有其它的打算，因为我相信这个坏蛋的心里无时无刻都在打着一些无聊的算盘。但我仍然想象着有这样一个实际上不可能存在的法庭。

我認为伊万·巴甫雷奇要来审判罗馬紹夫，因为不要我們这位严厉的老师，还能要誰来审判呢？我仿佛覺得我看見了一間装有壁爐的单人房間，伊万·巴甫雷奇穿着厚长毛呢的制服上衣。他那花白的髯子严峻地抖动着，眼睛忧伤而森严地注視着。他坐在桌子后面，罗馬紹夫漠不关心地，好象沒睡醒似地眯縫着眼睛站在他面前。他以为我早巳死掉了。我們的老师对他說什么他反正都不在乎！

但还有一个人在屋子里走来走去，她不时在壁爐旁边停下，手伸到爐前烤火。站在壁爐旁边的人就是女証人。她一面烤手，一面想着自己的心事……

我的女証人离开我多么遥远啊！誰知道她是不是还活着；

我已經两个月不知道她一点兒消息了。一九四一年秋的这两个月是多么艰苦困难的日子啊！

她住在一个四面八方都被包围了的城市里；我們曾經計划，如果将来有可能，我們就在这兒建立自己的小家庭。敌人現在正恣意地轟炸和炮击这座城市，竭尽全力迫使城內这些不甘屈膝的居民冻餒而死；敌人疯狂地鑄造重炮，把它們从迢迢千里之外拉来；不断从德国本土运来水泥，浇灌战壕和永久火力点的护壁；每天夜里都用信号弹把涅瓦河照得通亮，不讓載着面粉和面包的駁船从黑幽幽的水面上通过。他們残忍凶暴地在蛮干，目的是把我的卡佳置于死地。

12 在医院里

我一向总以为医院就是：夜間小桌子上的玫瑰花，光洁耀眼的病房，象仙子一般在病床間飘然来去的肃静的护士等等。我自己也不知道这个印象是从哪里得来的，大概是从一篇小說中看来的。实际医院要比这簡陋得多。

这是一座大楼，里面的病人已經装得不能再滿了，走廊上，甚至食堂里（虽然食堂是設在一間过堂屋里）都放着病床。以前这里是一所医学院，墙上还挂着表明神經分布状况的腊型。这些腊型的面孔象死人般的可怕，半个面孔是剝去了皮的。玻璃橱窗里还保存着課程表，和系主任发布的严厉的命令。

我住的地方是一間名符其实的礼堂，不过用来作病房未免太大了一些。我覺得这間屋子的那一头仿佛弥漫着雾气，远得看都看不清楚。实际上也真是如此，一道道斜射进来的，寬闊的

冬季里太阳光綫穿过礼堂的时候微微抖动着，眞象是在迷蒙大霧里一般。这兒躺着将近一百个人，几乎全是列兵。我身上沒有証明文件，所以，在部队沒有把証明書寄来，証明人世間还有我这么一个大尉之前，我便和列兵們躺在一起。不过唯一的差別仅仅在于发給我們的是馬合烟，发給軍官的是清淡的烟絲。

在我們这間大病房里，汇聚了从各个战綫上来的人。很多人是从列宁格勒战綫来的，在那年冬天，这些从列宁格勒战綫来的人是說不出什么能令人告慰的事情来的。

我在旅途中就給卡佳写过信，到医院里来了之后，又几乎每天都有信寄給她。我不是寄到彼得格勒大街柏林什登家里，就是通过軍邮寄給彼加，或者寄到軍医学院，因为卡佳在七月間曾写信告訴我，說她和瓦丽亚·特洛菲莫娃一起在軍医学院里工作。去列宁格勒的鉄路虽然不通，但信件还是可以用飞机运去的。我不明白为什么我的信就寄不到，这件事始終还是一个謎。我不知道艺术珍品收藏所的兒童营又疏散到新西伯利亚附近去了，所以我給姥姥的信还是往雅罗斯拉夫寄。我可以聊以自慰的只有一点，就是假如卡佳发生了什么不幸的話，那么一定有人会回我信的……

……一九四二年二月十一日，这不幸的一天永远銘刻在我的記忆里。一位女社会活动家（医院里都这样称呼那些不要任何报酬，自願来看护我們的妇女）跑来，对我叙述她們在車站上迎接一列車从列宁格勒来的技工学校和特种工艺学校学生的情形。这是一位严肃的妇女。她有一次說，她的丈夫和兒子都在前綫牺牲了，她說这話时态度那么平静，使我感到非常惊訝。可是当她說到从列車上往下抱孩子的时候，却忍不住哭起来了。

我这天費了很大的力气才勉强使自己吃了一頓飯。伤腿數

上石膏已經一个多月了，今天却突然疼得我簡直不知如何是好。医生决定給我进行爱克斯光透視，就象达莎阿姨爱說的那样，我这回又“背时”了。

第一，透視結果証明我的腿愈合的不对，所以必需拆除石膏，弄断几根骨头，总之一句話，要从头治疗。第二，把我放在冷得要命的外科手术室里候了一个半鐘头，大概我就此感冒了，所以到傍晚的时候，我便发現自己在說胡話，——这向来都是我体温增高的第一个征候。

簡短地說，我是患肺炎了。这一来就影响了第二次手术的进行，医生們十分担心，怕我成瘸子。

关于我的病情似乎写得太罗嗦了；这实在是一种枯燥无味的題材，特别是一想到自己在开战的第三个月便負了伤，还沒来得及作出什么成績来。

我沒来得及作出什么成績。可是这时候，正如外国报紙所說的，出現了“莫斯科城下的奇迹”，从莫斯科往西三百公里，雪堆中布滿了穿着代用品制成的笨大毡靴的，冻僵了的人腿！我沒来得及作出什么成績；可是組織最新式的远程海軍航空兵的工作却在加速进行，在这項工作里沒有我的份兒，仿佛我已經十五年沒有在海面上空各处飞翔了！我沒来得及作出什么成績，我甚至感到那种所謂的“战爭感”在我身上也日漸減少，而住院生活的种种无謂瑣事却愈来愈多了。

我在前面已經提到部队給我寄証明書的事。接到这份証明書以后，我又收到了米沙·戈洛布寄来的一封信。他是我的老朋友，我們过去曾在国防航空化学建設后援会航校里一起飞过“棺材”式飞机。当我一看見信尾的署名时，我眞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但这的确是米沙；他現在在我們的团里服务，是在报紙

上登出我的訃告后两天到团里来的。

“薩尼亚，你这次毕竟使我大吃了一惊，”他写道，“并且，你要知道，使我惊訝的不是在收到你的信，証实你还活着的时候，而是当别人对我說你着火牺牲了的时候。因为象你这种人是不会牺牲的。你想想看，現在无論誰，包括你在內，沒有不反对这一次报导錯誤的。大家都在炸弹上写着‘为格利高里耶夫复仇’，所以你就是死后也仍然繼續在战斗。上校講了話，說要为你申請紅旗勛章。讓我祝賀你，祝你幸福，永远幸福。”

初春的时候，我开始逐漸地走到，或者更确切一点說，是爬到医院的小花园里去玩。这时，我才看到我在这兒住了差不多半年的城市的面貌。我虽然只看到一条栽植着菩提树的林蔭大道，但从这条街道似乎也可以見到牟城的全貌。后来，当我被准許到城里去玩的时候，——起初是拄着拐杖，后来只带一根棍子，——我才相信自己过去設想的沒有錯。这是一座开闊，安靜的城市。所有較好的街道都象要飞升似的，向陡峻的加馬河岸伸去，这种爭騰奔跃的形势，使我想起了故乡恩斯克沙河和靜河岸上的小山坡。过去我仅仅由牟城上空飞过两三次，沒有机会在这兒住下。

列宁格勒歌剧和巴蕾舞剧团疏散到牟城来以后，我到剧院去看过演出。在帷幕拉开以后，我看到一些服装华丽的男女，步調平稳，不慌不忙地在舞台上走动，仿佛沒有发生什么战爭似的，我不禁产生了一种很奇怪的，时間倒流的感覚。

在这本書里本来不值得把我看戏的事也提出来。可是生活中的一些事，正如鐘表里的齿輪一样，一个扣着一个彼此牵連着。在看“天鵝湖”的时候，我遇見了一位曾在远东和我共事的同志的妻子安娘·伊林娜。我和卡佳都很喜欢伊林① 夫妇。他們

的性情很温和，待人很有礼貌，生活很愉快，爱好戏剧和运动，特别是喜欢打网球。我一直还記得安娘穿着白色的連衣裙，手里拿着网球拍的样子。可是也許正因为他們过分有礼貌，对誰都是四平八稳的，很象有本小說中所描写的一对美滿的夫妇那样，所以大家对他們都不十分信任，甚至对他們还相当不好。可是，我和卡佳总覚得他們是完全应該得到这样的地位和幸福的。大家都說伊林交了紅运。也的确，他什么事都碰得那末巧，那么順利。这种好运一直繼續到战爭期間。战爭开始的时候他还是中校，到一九四二年春天，他已經是少将了。

我和安娘在看戏的时候遇見，大家都很高兴，約定第二天在她家里再見面。她是本地人。战爭开始以后，她的丈夫就把她同小女兒一起送回牟城娘家来了。

这是一个沒有受过战爭灾害的家庭。在上前綫和住院以后，我还是第一次看見这样的家庭。我們坐在餐厅里。食橱的玻璃板上放着餐巾，墙上装釘着精工雕刻的擱板，上面放着些小玩意兒，沙发床上挂着一幅針織壁毯。这些东西，毫无疑問还是战前的东西，还保持着战前的放法。我望着坐在这間漂亮的房間里的这位华丽，温柔和藹的妇人，忍不住痛心地怜憫起我的卡佳来了。

“如果我能到列宁格勒去，哪怕是住两三天也好，我一定能找到她。我相信她一定在列宁格勒。可是他們就是不批准我走。德米特里在莫斯科吧？”

“唔。”

安娘立刻明白我問她丈夫的用意了。

“他会帮助您的，一定会帮助的！我馬上就給他写信。需要

---

① 伊林即伊林娜的丈夫。——譯者注。

他作些什么事呢？”

“把我調到莫斯科去吧，”我說道，“不然，体格检查委員会就要送我到后方去了。”

“体格检查委員会什么时候来？”

“五月里。”

“这好极了。我还来得及收到米加的回信。这件事他应該和誰交涉？”

“和海軍人民委員会航空兵干部部。”

安娘在小本上記下：“和干部部……”

“可惜您不能由牟城直接飞到列宁格勒去。这兒有‘道格拉斯’飞机往来。这一条航綫的班机实际上早已經沒有了，不过听說又快要来了。只要飞机場一乾，就可以通航。我一定給您想办法。”

我謝了謝她，說如果眞能这样作，自然再好不过了。不过世界上还有那么一本叫作“紀律条令”的書，上面规定不可以作这种飞行的①。

我沒有料到仅仅在几天之后，我就能够不受这本铁面无私的書的約束，随便飞到哪兒去都可以了。

13 判　决

对于我說来，体格检查委員会总是象一个法庭。我每次在这个法庭上都得承認自己犯了罪，因为先天沒有把我生成一个下

① 按規定，飞行員經过較长时間停飞后，需經过有关部門检查，批准，方可重新駕駛飞机。——譯者注。

颚方圓，肌肉发达，能力※四普特，肩膀寬闊，身材高大的汉子。当我渾身脫得精光，站在伞城体格检查委員会面前时，心里就有着这样不愉快的感覺。我蹲下来，闔上眼睛，把双手伸到前面，竭力不使它顫抖，然后試驗伤腿的活动能力，然后在距离很远的地方准确地辨認最小的字母。后来一位上了年紀的，花白头发的女医生听了听我的心脏，便开始用手指敲我的脊背和胸部。显然我的胸腔里有什么东西使她不够滿意，所以她停下来，皺起眉头，象弹音阶似的又敲了一遍。然后說道：

“呼吸。”

在我到体格检查委員会来的时候，使我耽心的完全不是肺的問題。当我精神紧张的时候，特别是当我想到在战斗飞行的情况下伤腿将要怎样动作时，不知为什么这条腿就瘸起来了，这眞叫人不愉快。虽然我在小孩子的时候患过西班牙流行性感冒，后来又害过严重的肋膜炎，但是我的肺一向是很好的。然而这次，不知为什么偏偏是我的肺給了这位气忿忿的，年老的女少校軍医一种不好的印象。她敲了一通，拨着我的身子轉来轉去，又敲了一通，命令我躺下来，仿佛是决心要証明我是病了，病了，病了……病了，而且以后再也不能飞行了。

我一直把这个不能飞行了的可怕的想法隐藏在很远的地方，隐藏在心灵的最深处已經将近半年了。我隐藏着，并且随便用一些事情把它掩盖起来。可是这个想法旣沒有死，也沒跑到什么地方去，它只是暗暗地和另外一件心事——想念卡佳的心事一同潜匿了下来。

可是现在，当我赤着身子站在体格检查委員会面前，露出腿上和背上累累的伤痕时，这个想法不論对自己还是对别人再也掩飾不住了。大概女医生从我的眼睛里看出了这个想法，所以

她虽然已經拿起了笔，但对于写結論却又迟疑不决，反而把我交給了委員会主席。戴着玳瑁眼鏡的矮胖医生便立即着手来敲听我的肋骨和肩胛骨，不过他不是用指头，而是用小捶子。小捶子敲出的声音时高时低，仿佛是在詢問：

“你眞的病了嗎？病了嗎？病了嗎？病了，而且再也不能飞行了嗎？”

“大尉，不要紧张，”医生說，他向我瞥了一眼，把橡皮管塞到他那两只毛茸茸的大耳朵里去。“只要略加治疗，一切都会好的。”

他听了听我心音，在病历表上作了一些符号。他样子很和藹地又說了一遍：

“一切都会好的。”

但是他却給了我半年的休假期。我很清楚，在一九四二年那样的年代，体格检查委員会在什么情况下才会給一个战斗部队的指揮員作这样的結論。

我回到医院的时候脸色似乎不太好。我的邻床是一位陆軍朋友，他的两条腿虽然沒有了，但他每次洗完澡被抬出浴室时，他那丰滿，紅潤的面孔总不免使人感到惊訝。这一回，他放下了書本，瞥了我一眼，什么也沒問。过了一会兒，他忍不住还是問了：

“喂，怎么样？”

虽然結論里一点兒也沒有說我是残废，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却要对他說，他們給我下了这样的結論。午飯端来了，我机械的吃完飯。虽然我这时很想躺下来，把头埋在枕头里，可是我仍然走出去了。結論里不是沒有写这个字嗎，反来复去地想它干什么呢？每次想起这件事都象是連脑袋一起鑽进了烂泥塘的汚水里那么难受！

也許当时应該説服他們，应該説服那个用骨节敲着我的肋骨，仿佛在奏丧礼进行曲的老巫婆吧？应該説服那个不肯説别的話，只会説我不能再飞行了的大胖子吧？也許我应該要求他們送我到駐防軍体格检查委員会去吧？

我沿着一条坡度很陡的通往加馬河的林蔭路走着，吹着口哨，但是声音很低，怕引起行人的注意。在这座全城最好的航空学校大楼的墙壁上，我又讀了一遍鐫刻在大理石上的銘文："天才的俄罗斯科学家，无綫电发明者，波波夫曾就学于此"。

我一瘸一跛地登上了陡高的河岸，春意犹酣的加馬河展現在我的眼前。这时正是落潮的时候，混浊的河水呈現着灰不灰，黄不黄的顏色。那兒是碼头，是拖着庞大的駁船的汽輪；汽笛的鳴叫声和人群的喧嚣声，在寬闊的水面上向远处散布开去……

"可惜您不能由本城直接飞到列宁格勒去。要不然，我一定給您想办法。"

沒有什么，現在一切都好了。坐上飞机走吧！什么批准的手續也不需要。您現在已經由駕駛艙里轉到乘客艙里了。座椅挺舒服，把身子往后一仰，躺下休息吧！

我大概失口説出声来了，因为站在河岸上的一群"工艺学生"，——他們穿着大得极不合身的制服，戴着大得极不合适的学生帽，——看見我都笑了起来，并且跟在我背后走了一段路。这不禁使我想起从西班牙归国后同卡佳回恩斯克去的情形。恩斯克的一群孩子跟在我后面，一举一动都跟着我学；我停下来，到小鋪里去买烟卷，他們也停下来，买同样的烟卷。我想游泳，卡佳留在教堂花园里，我下了坡走到靜河边上，脫去衣服，跳进了水中。他們也在不远的地方完全象我一样，脫去衣服，跳进了水中。我那时是一个在西班牙作过战的飞行員，是在胸前挂着

紅旗勛章，載譽归来的飞行員！可是現在呢？

我的手指有点兒发抖，不过我还是卷好了烟吸起来，在河岸上呆呆地站了一会兒，眺望着河上这种对我說来全然是陌生的，形形色色的生活。一艘灰色的客輪駛过去了。我看到了船的名字叫“列比捷夫斯基”，心里暗忖道：“我怎么沒有成为列比捷夫斯基那样的人呢。”过了一会兒，又有一艘不大的輪船駛过去，我看到了船名是“卡瑪宁”，心里想道：“老兄，你也沒有成为卡瑪宁那样的人啊！”远处的碼头旁停泊着“瑪茲魯克”号，我不由得笑了笑，心想，假如加馬輪船公司的船只都以著名飞行員的名字，而且还是以我所熟識的名字为名的話，那我恐怕要一直自怨自艾到深夜了。

不管怎样吧！現在沒有人阻挡我乘飞机到列宁格勒去找我的妻子，或者証实我已經永远失去了她。

我候了三个星期的飞机。是因为我对自己的病习惯了呢，还是因为希望偸偸潜入我的心中，对我低声耳語，要我相信一切都会順利过去呢？不过我已从这次意外的打击中逐漸清醒了过来，把自己的全部思想和感情整理了一番。

我現在想的不是自己，而是卡佳。我听到收音机广播她所喜爱的那支“尼娜幻想曲”时，要想念她。我看伤病員們演出的节目时，要想念她。我們过去到剧院的次数太少了！在寬大的病房里大家都已入睡，只有此起彼伏的呻吟声，或者是短促，嘶哑，說梦話的声音，这时我也要想念卡佳。

安娘·伊林娜終于給医院里打来了电話，說飞机已經到了。她介紹我和飞行員認識。这位身材高大，心地善良的少校是受列宁格勒战綫司令部的委托来到卆城的，他欣然同意把我带到列宁格勒去。

14 寻找卡佳

我在地面上已經呆了整整六个月了！怎样才能表达我終于离开了地面时的感情呢？一切都沒有改变，只不过当我想到自己有生以来，还是第一次以乘客的身份飞行时，心里反而感到更加难过。但在这些年的飞行工作中，我已經习慣在空中比在地面上舒服一些。我怀着愉快的心情望着窗外，仿佛是在检查由春天黑色田野，閃閃发光的曲折的河流，以及象深綠色天鵝絨般的森林所构成的这份巨大的家业有沒有发生什么不幸。我怀着欣慰的心情走进座艙，艙里虽然很狹窄，但我渾身仍然立刻产生了一种非常习慣的，处处都很合适的感覚。我怀着欣慰的心情等着看駕駛員怎样繞过雷暴；我們是在切列波維茨上空遇見这次雷暴的。这次雷暴非常瑰丽壮观，烏云仿佛巍峨的宫殿，閃电一次又一次地劈毁了这些宫殿的墻壁。我不禁回忆起了初期飞行的情形，那时候天空对于我說来，还不是一条簡簡单单的航綫。

……我无意中碰上了一輛到柏加尔多夫卡来运"眞理报"紙型的汽車，便搭了这輛車，来到利金大街。由此往前只能步行，或者等候在彼得格勒街上行駛的唯一的一輛电車——三号車。不过那些就象在自己家里一般安心在車站上等車的列宁格勒人說："一定要等的話，那很可能等上一个鐘头左右。"有一位少校也要到彼得格勒街去，他坚持留我等車，因为我身上还背着一个沉重的背包——我給卡佳捎了一些食物来。我这时只有一个想法，那便是我和卡佳終于在一个城里了。她現在怎么样，是在等

待着我呢，还是臥病在床，或者命在旦夕呢？我不知道。这些个想法压得我气都接不上来了，我哪里还能在这兒等車呢！

我不顧一切地沿着夏园旁的林蔭道飞也似的奔跑。我对自己这时所見到的心里都明白：那些在馬尔索夫广場上的菜园，其間架設着用伪装隐蔽着的高射炮連；那种不平常的一片葱綠的景象，这在列宁格勒从来还未曾有过；整个城市打扫得那么洁净，在我临来之前就曾看到报紙上說，在一九四二年春季，出动了三十万列宁格勒居民来打扫自己的城市。可是我現在看到的一切又回到一个問題上来了，那就是：卡佳在什么地方？我能找到她嗎？我覚得旣然家家戶戶的玻璃都被打碎了，所有的房屋都象是悲伤地低垂着眼帘，默默不語地站在那兒，那么我也就找不到卡佳了。旣然每一堵墙壁都被炮弹打上了无数洞眼和裂痕，那么我也就找不到卡佳了。但是我又覚得自己能够找到卡佳，因为連苏沃洛夫紀念塔的广場上都种滿了胡蘿卜和甜菜，而且菜苗长得那么茁壮，仿佛这兒的自然条件对它們来說是再好不过的了。我走到涅瓦河边，目光不由得落在海軍部大厦的尖頂上面。我不知道怎样才能形容我在这頃刻間的感覚，海軍部大厦的尖頂好象画在一幅旧版画上，已經失去光澤，然而这一切是和卡佳分不开的。这次战爭爆发的时候，我們是不辞而別的。但是另外一次別离，就是我出发去西班牙之前的一次別离我記得清清楚楚，我現在仿佛眞的看見了她，她站在柏林什登家里黑暗的前厅里，在皮袍和大衣之間。应該怎样作，一切才能重回到当时的那个样子呢？我才能重新拥抱她呢？她才能問我：

“薩尼亚，是你嗎？也許不是你吧？”

我老远便看見柏林什登家的那所房子了！房子还在原来的

地方，奇怪的是我覚得比以前更加漂亮了！窗戶都很完整，房子的正面富丽堂皇，新鮮的油漆在太阳光下尤其光彩夺目。但我愈往前走，这种神秘华丽的景象就愈使我感到不安。又走了十步，十五步，二十步，——象一个人猛力地抓住了我的心，然后把手一松，于是我的心卜登卜登地跳了起来……这座房子不見了。房子的正面景象原来是画在許多张大三合板上的图画。

在这漫长的夏日里，远方炮火轟击的声浪始終在我的耳朵里响着，时而冲来，时而退去，仿佛拖着一块噪声震耳的大圓石似的。

我整天寻找着卡佳。

我在一所破房子旁边遇見一位面色发青的三角脸的妇人，她指引我去見区苏維埃委員奥万涅桑医生。在过去“埃里特”电影院的办公室里（現在这兒駐着区防空、防化学司令部）坐着一位头发斑白，沒有刮脸的，善良的阿尔明尼亚老人。我問他知不知道叶卡杰琳娜·伊万諾芙娜·塔塔林諾娃-格利高里耶娃，他回答說当然知道，并且在战争开始的时候，他还曾請她在他那兒作护士。

“結果呢？”

“她沒有答应，后来便挖战壕去了，”医生說。“很遺憾，我再就沒有見到过她了。”

“您認不認識罗莎莉·納烏莫芙娜？”

他用慈祥的，老人的眼光看了看我，咬了咬嘴唇，把嘴唇噘了起来。

“您是罗莎莉·納烏莫芙娜的什么亲戚？”

"不是亲戚。只是熟人。"

"唔。"

他沉默了一会兒。

"她是一位优秀杰出的妇女，"他叹了口气說道。"我們把她送到医院，可是巳經迟了，她去世了……"

我轉身回到破房的院子里。房屋的正面虽然倒塌了，可是朝院子的这一边还保存得很好。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緣故，便順着盖滿了瓦砾木屑的楼梯走上了一楼的楼梯口。从这兒再往上去，有一些鋼筋，鉄条在楼梯的空架子上竪着，直到三楼以上，才开始又露出梯阶来。

我心爱的妹妹曾經在这所房子里住过。我們曾經在这里庆祝过她的婚礼。当时我还是个穿蓝工作服的飞行学員，幻想着伟大发現的幸福，每逢假日都要到这里来。我和卡佳每次到列宁格勒都住在这兒，而且不論什么时候来，我們在这間屋子里都被当作是最亲近，最要好的朋友。我在西班牙作战的时候，卡佳曾經在这間屋子里住过一年多。这次列宁格勒被封鎖的期間，她又在这里住过，她忍受着飢餓和寒冷，坚持工作，帮助别人，她把自己的純洁，和内心力量的光輝散播給大家。她現在在哪兒呢？恐怖包围了我。我紧咬着牙齿，忍住不要打战。

正在这时候，我听到了孩子的声音，一个十二岁上下，肤色亮黑，顴骨寬大的孩子在我头上断墙空隙間出現了。

"指揮員同志，您找誰呀？"

"你住在这兒嗎？"

"是的。"

"一个人。"

"怎么会一个人呢！和媽媽在一起。"

“你媽媽在家嗎？”

“在家。”

他指点我怎样走，——有个地方塌陷了，上面搭了一块窄木板，——几分鐘以后，我便和他的母亲，一位眼皮浮肿，精神困頓的妇人攀談起来了。她一說話，我便听出她是韃靼人。她原来是七十九号房的清扫工人，自然她是很熟悉罗莎莉·納烏莫芙娜和卡佳的。

“九号被炸坏了的时候，她挖土去哥，”她說的是卡佳。說一口純正俄国話的孩子在一旁解释說，“九号”就是第九食品商店的那座房子。“挖出了一个熟人来，是一个紅头发的。后来他就住在她家里了。”

“挖出一个紅头发的熟人，”孩子迅速地翻譯道，“他后来就住在她的家里了。”

“第二个老婆子死了。哈金木去埋的。”

“第二个老婆子指的是罗莎莉·納烏莫芙娜的姐姐，”孩子解释說，“哈金木就是我。她死了以后，我們就把她拉去埋葬了。拉到斯摩棱斯克公墓。紅头发的人也在那兒。就是他雇用我們的。他也是軍人，是个少校。”

現在，应該問卡佳的情况了。我覺得很可怕，但我最后还是問了。清扫女工生气地搖着头，說她自己“在医院里躺了三个多月，叫过阿訇，可是列宁格勒一个阿訇也沒有，所有的阿訇都死絕了”。等她回来时，罗莎莉·納烏莫芙娜的房子里已經空空的了。

“应該向住宅租賃合作社去打听一下，”她沉思了一会兒，說道，“住宅租賃合作社也沒有人了，死了。也許她是走了？她挖出的那个紅头发带着面包。装了一大口袋，总是自己背着，不肯給

我拿。我对他說：‘你这个貪婪的傻瓜。我們救了你的命。你不应該只顧想着面包，您应該祈祷，应該念可兰經。’”

我所了解到的全部情况就是这些，罗莎莉·納烏莫芙娜的房子被炸时，卡佳已經不住在她家里了。我还和其他一些妇女談过話，当她們說起卡佳当时怎样帮助过她們时，都激动地哭了起来。哈金木把他的小朋友們带了来，他們都抱怨那个紅头发少校，說他答应給他們每人三百公分面包的“埋葬”費，可是他后来却“賴賬”，每人只給了二百公分。

天曉得这个紅头发少校是誰。是彼加嗎？可是彼加不是少校，而且不可能想象彼加会吞沒这些受飢挨餓的兒童一百公分面包。算啦，管他是誰呢！反正他帮助罗莎莉·納烏莫芙娜埋葬了她的姐姐。說不定在那些艰苦的日子里，他还帮助过卡佳呢？送殯的时候她还和他在一起，要是能从彼得格勒走到斯摩棱斯克公墓，可見她的身体还不是怎么坏的。然而自此以后，就沒有人看見她是死是活了。

現在已經五点多鐘了，我拖着疲憊的身子，熬着难忍的头痛前往軍医学院。学校撤退了，可是，从战爭发生的第一天起便成了后方医院的原医学院附屬医院却留在这里。卡佳曾經工作过的口腔医院也留下来了。我被指引到一个办公室。一位有点象达莎阿姨的年老的女打字員說，卡佳当时的情形很不好，所以特洛菲莫娃医生帮助她离开了列宁格勒。

“到哪兒去了呢？”

“这我可沒法說，不知道。”

“特洛菲莫娃医生本人还在列宁格勒嗎？”

“她送走尊夫人后，便立刻上前方了，”女打字員回答說，“从此以后，再也沒有听到过她們两个人的任何消息。”

15 同水道測量家尔同志的会面

我現在才明白自己过去的想法未免太天眞了。我这半年一直在給卡佳写信，从未收到片紙只字，但我始終抱着希望，以为只要一来到列宁格勒，她就会站在門口，伸出双手来迎接我。仿佛一九四一年那可怕的冬季，那許多滿載着奄奄一息的兒童的列車，那分布在全国許多城市中，专为列宁格勒市民設立的特种医院都不曾存在了。仿佛那許多睁着一双双肿得变了原形的，水汪汪的眼睛的面孔我不曾看見过。仿佛那些忽而从东，忽而从西传来的隆隆大炮声我不曾听見过。

我坐在口腔医院的办公室里思索着这些事，一面傾听着女打字員的叙述。她說，那时她餓得連起床的气力都沒有了，一个酷肖她的牺牲了的兒子，和她兒子的面貌就象是两滴水珠一般相似的紅海軍战士突然跑来，給了她三百公分面包。

“卡杰琳娜·伊万諾芙娜是能找着的，”她說道。“她作过一个梦，梦見一只大鷹飞来了。我說是她的丈夫，她还不相信。您瞧，我的話果然应驗了。現在我也对您說——她是能找着的！”

是的，可能找着。我呆呆地望着老太婆，心里想：“我在牟城的生活实在是太好了，而她那时却挣扎在死亡綫上。”老太婆不住地劝慰我，說卡佳一定能找着，一定会回来的。“我受到大家的关怀，我的病有人医治。而她呢？孩子們帮她埋葬了貝尔塔，她却連給孩子的一百公分面包都付不起。”我发疯般，拚命地想着，我应該在一月間就飞到列宁格勒来，应該坚持自己的意見，

要求讓我出院，这样說不定我还可能比現在更健壮一些，說不定我还能找到卡佳，救出我的卡佳。

但对于已經不可挽回的事情懊悔也晚了。卡佳从列宁格勒給我的信中說过："我和所有的人一样"。現在我才明白她說这句簡单的話的用意。

老太婆比我經历的痛苦自然要多得多，她不住地安慰我。我向她要了点开水喝，拿出腊肉和葱头来招待她；在当时的列宁格勒，这还是很希罕的东西呢。

从这时起，我心里象是有了一股寒气。我无論做什么，无論想什么，总联系着一个問題："卡佳呢？"

还在卆城的时候，憑着記忆，我差不多把所有我在列宁格勒認識的朋友的电話号碼都回想起来了。可是現在，我从医院里不管給誰挂电話，总沒有人接，仿佛所有的电話都落到列宁格勒一个神秘空虛的境界中去了。最后我拨了仅余的一个电話号碼，这是我唯一不敢肯定的一个电話号碼。我握着听筒听了很久，傾听着远处沙沙的声音，在这种声音之后，又听到了更为遙远的一个很不耐煩的人声：

"喂，什么事？"一个低沉的男人声音突然响道。

"請問……"

我說出了一个人的姓。

"就是我。"

"我是飞行員格利高里耶夫。"

沉默了一会兒。

"这簡直不可能！您是亚历山大·伊万內奇嗎？"

"是的。"

"这能不相信命运嗎！亲爱的亚历山大·伊万內奇，这是第

三天了，我总在想，怎样才能找到你。”

六年前，在决定成立搜索塔塔林諾夫船长的探险队以后，我在列宁格勒負責組織这支探险队的时候，符教授介紹我認識了一位海軍，他是伏龙芝軍事学校的教員，是一位水道測量学家。

我們只在一起过了一个晚上，可是我后来却常常想起他；——他那时曾經十分清楚地为我描繪了未来世界大战的情景。

他那一次来得很晚。卡佳已經蜷着腿，在安乐椅上睡着了。我本想叫醒她，可是他沒有讓我叫，我們弄了点东西喝着，一面嚼着橄欖，——卡佳总是儲存一些橄欖的。

他对北方有着深厚的感情。他深信北方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战略原料，在未来的战争中将会起重大的作用。他把北方的海路看作是战爭的道路，并且断定說，日俄战爭中，俄国失敗的原因就是因为不懂門德烈也夫曾經发表过的这一思想的結果，他要求在所有商船队行駛的航綫上都修建軍事基地。

記得当时这种观点使我很惊异。可是到了一九四二年六月十四日，在我来到列宁格勒的前几天，有一次坐在加馬河畔，听播音員十分庄严地宣讀苏英条約的遙远的声音时，我重新估价了这个观点。不难猜到这次条約中所提到的是哪些路綫，因此，我回想起了和这位后来被卡佳称为“深夜的客人”的水道測量家会見的情形。

一九三六年到一九四〇年間，我曾經不只一次地和他見过面，讀过他的論文，和一本叫做“苏維埃北极的海洋”的書。这本書后来轟动一时，譯成了欧洲各国的文字。我一直对他抱着好感，注視着他的命运，如同他注視着我的命运一样。我知道他离

开了伏龙芝軍事学校，曾經指揮过一只測量船，在海軍人民委員会的水道測量局工作过。战事爆发前不久，他进行了博士論文答辯，这个消息我是从莫斯科晚报上看来的。

我以后就称他为尔同志。

……我这次在他家里找着了他，正如尔同志所說的，是一件“千載难逢”的稀罕事。他的房子已經上了封条，只是因为他这次要离开列宁格勒，而且一去很久，所以又把房子启开了，进門才不过两分鐘。

“上哪兒去？”

“到很远的地方去。您来了以后我再告訴您。您住在哪兒？”

“暫时还沒有地方。”

“那太好了。我等着您。”

他住在利金桥旁一座新楼房里的一套寬敞住宅里。战爭爆发后一年以来，屋子自然疏于整理，不过还叫人感覺出里面有着一种詩意，彷彿是一个演員的住房似的。这也許是因为鋼琴上玻璃罩里的几个縫制得很艺术的玩偶，也可能是因为地板上和書架上的这許多的書籍，也可能是因为主人自己。他只穿了一件衬衣，領口敞着，露出丰滿多毛的胸膛，很随便地接待我，所以才使我产生了这样的感覺。我曾經在什么地方看到过一张类似他这个样子的謝甫琴科的画象。不过尔同志可不是詩人，而是一位海軍少将；只要看一下挂在安乐椅背上的他的軍服上衣，就不难証实这一点。不論在什么地方，不論在什么时候，只要我們一見面，他从第一句話开始，便是叙述現在他認为最主要的事情。这毫无疑問，是因为我們的兴趣总是在“最主要的”事情上，很少涉及到私人的或日常瑣碎工作方面的問題。

但这次他却首先問我战后这一年都在什么地方，作了些什么事。

"是的，运气不好，"在我对他訴說了自己不幸的遭遇以后，他說道。"不过，您还可以迎头赶上。您是怎么搞的，一会兒在波罗的海，一会兒又在黑海艦队，'背叛'北方了嗎？我还把你当作一个永远忠实于北方的人哩。"

要叙述我"背叛"北方的原因实在太复杂。所以我只是辯解說，我是在完全失去了回到北方的希望以后，才离开民用航空局的。

尔同志沒有应声。他眯縫着一双烏黑灵活的眼睛，一面揪着他那已經斑白稀疏的哥薩克式的額发。我不知道他这时在想什么。我們靠窗坐在安乐椅上，这扇窗子当然也和所有房屋的窗戶一样被震碎了。从这兒可以看見利金桥，桥那边停泊着許多船舶，油漆得奇奇怪怪鮮艳夺目，使人很难分辨出从哪兒开始是岸上的房屋，从哪兒开始又是軍艦。街上空蕩蕩的，——我心里暗想，这"好象早晨五点鐘"。后来，我回忆起卡佳有一次对我說，就她个人說来，她沒有生在列宁格勒城是一个錯誤。

我想得正入神，尔同志招呼了我一声，我不禁吓了一跳。

"喂，您躺下睡觉吧，"他說道。"您累了。我們明天再談。"

他不容分辯地拿来枕头，取下了长沙发上的靠墊，强迫我睡下。我一眯眼就睡着了。象是有人踮着脚走近前来，他沉吟了一会兒，便将一块黑黑的，厚实的舖盖抛在这一天中所发生的全部事情上了。

我睜开眼睛的时候，天色还很早，大約是四点鐘左右。可是尔同志已經起床了，他正在用旧报紙遮盖書架。我想到他今天

就要走了，不由得引起一陣莫名的悲凄。他靠着我坐下来，不讓我起床，便开始講了起来。毫无疑問，他所講的是"最主要"的事，如果我不是那么疲憊的話，他昨天就会告訴我了。

……在我們今天，即便是一个小学生，对于在一九四二年夏季，从英国和美国通到苏联的广闊的海路上所发生的事件，至少也有一个一般的概念。可是那时候，我虽然对北方的兴趣从未中断过，并且經常从报刊上搜集有关北方艦队航空兵活动的每一項消息，但尔同志当时对我講述的一九四二年夏天所发生的事对我說来，却还是一件新鮮事兒。

他摊开了自已写的一本書里所附的地图，但沒有立刻找到那张他能够从上面指出战区界限的地图来，据他說，海軍和空軍經常活动的这一个大战区就是这样的。他把巴倫支海上当时发生的一場大战对我描繪了一番，他講得很簡要，然而也比我后来在一些专門論著中所讀到的要詳尽得多。我专心一意傾听着他講关于袖珍潜水艦冲入敌人的主要海軍基地——彼得薩莫湾的英勇的航行故事，关于在海洋上空击落二十五架敌机的薩富諾夫的故事，关于那些在雪幕的掩护下，——我現在还忘不了雪幕是怎么一回兒事，——攻击运輸艦的飞行員們。我在听他講的时候，一种不幸的感覚在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这么深切地刺痛了我。尔同志所講的正是我向往的北方啊。

我从他那兒第一次知道了什么叫"运輸队"。他把可能的"会合"点指給我看，这也就是秘密議定的英美軍艦会合的地点，他并且还給我解释，这些軍艦怎样在我国旗帜的保护下进行交接工作。

"你看，这就是它們航行的地方，"当然，他指的仅仅是个大概的輪廓。因为在一九四二年，关于这条航路的情况还是不許

到处宣揚的。“这是由一、二百艘船只組成的縱队。您猜猜看，这些船只在哪些地方最困难？”接着，他大致地指了一个地方。“不过我們且不去操心西方的航路，何况这兒（他指了一个地方）有极其精明强干的人坐鎮。讓我們来談談其它一些重要性不亚于此的事情吧……这就是德寇力图要封閉的大門，”他急促地說道，把一只手盖在从巴倫支海通往喀拉海的出口处，“因为他們非常清楚这一着的作用，最低限度，他們是了解某些矿区对航空发动机制造业的意义的。当然，北方海路的运輸作用也是他們很不喜欢的，何况这年春天他們就已經希图……”

他沒有把話說完，可是我領会了他的意思。我曾經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知道德寇在春天曾經严重地破坏了对西方航路有极其重大意义的一个港口。

“你想想看，战火蔓延到什么地方来了，”尔同志繼續說道，“德寇的潜水艦甚至不久以前，还在新地島附近扫射过我們的飞机。然而事情还不仅如此。我今天就要坐北方艦队軍事委員会派来接我的飞机到莫斯科去。飞行員卡良庚少校对我說，他狩猎德国鬼子的一只袭击艦已經两个礼拜了，您猜猜看，在什么地方？在……”

他說了一个非常偏远的地方。

“簡单地說，战火已經燃燒在过去只有水道測量学家和白熊出沒的地方。所以他們也就想起我来了，”尔同志微笑道。“不仅想起了，而且还……”他脸上显得十分和善和愉快，“而且还委托我作一件极有趣，极重要的工作。当然，关于这件工作我什么也不能对您說，因为这实在是軍事秘密。我只准备說一点，当时我首先想到的是您。正好您这时就来了电話，这眞巧极了。亚历山大·伊万內奇，”他認眞地，甚至是郑重其事地說道，“我建

議您和我一起乘飞机到北方去。”

16 决　定

他走了，就剩下我一个人留在这空虛的，仿佛是沒有主人的消夏的住宅里。所有这三間寬敞的房間都归我支配，我可以在里面轉圈，可以随随便便地思想。尔同志准备十五点鐘回来，那时我就应該向他說一个簡短的字：

“行。”

或者，稍微复杂一点的：

“不行。”

在这两者之間，摆着一条多么遙远，多么艰苦的道路啊。我沿着这条道路走着，走着，休息休息又走，总看不見头，看不見边！

德国鬼子正在炮击这一带。第一顆試射的榴霰弹已經爆炸很久了，烟霧虽然在緩緩地消散，却还籠罩在利金桥上空。刚才远处的爆炸声突然迫近了，粗魯地从右向左往城区里迈着大步，直向着这座房子，向着我徘徊在彼此相距无穷远的“行”与“不行”之間的空房子。

……这一間大約是兒童室。独眼的小黑熊玩具悲伤地，垂头丧气地蹲在厨柜上，一只兒童玩的双輪滑板車扔在墻角里，在一张矮圓桌上放着积木和玩具；我脑子里不禁浮現出一个小尔同志的形象，他也是那样劲头十足，克制着一股热情，长着哥薩克式的有趣的額发，和一张圓脸蛋兒。我在这間房子里暫时摆脫了“行”与“不行”的糾纏，舒了一口气。甚而还可以在这里寻味

一下我和卡佳曾經計划建立在列宁格勒的家庭。哪兒有家，哪兒也就有孩子。

炮弹的爆炸声愈来愈近。有一顆炮弹就在附近爆炸了。房門忽地震开了，什么地方的玻璃带着悦耳的声音撒落在地上。在随之而来的一陣寂靜中，街上传来脚步聲，我往窗外一看，見到两个男孩朝这座房子跑来，我覚得他們臉上的样子很可怕。眼看着他們两人跑在一起了，第一个男孩子在另外一个的背上拍了一下，哈哈大笑着往回跑，他們是在玩捉迷藏的游戏。

……尔同志在十五点鐘就要回来，我一定对他說：

"行。"

对于战爭期間的每一个苏联人說来，游手好閑的生活都是最难熬和最可耻的！就当我沒有过这半年折磨人的，无所事事的生活吧！我一定要到北方去。这几年来，北方离我愈远，我就愈感到它亲切，愈有誘惑力。难道我在西方和南方沒有竭尽全力战斗嗎？然而我应該到北方去，去保卫我所了解和热爱的边疆。

这时我突然停下脚步，自言自語地說道：

"可是卡佳呢！"

离开这兒，丢下她不管？长年累月地在外远游？也不先找一找彼加，說不定只是他的軍邮代号变动了一下呢？为什么不在列宁格勒这兒，以及在列宁格勒战綫采取其它的办法来寻找一下再說呢？无論卡佳疏散到哪里，她在任何情况下，一定会爭取和尼娜·卡比丹諾芙娜以及小彼加取得联系的。难道要失去这条綫索嗎？这条綫索虽然渺茫，虽然不明显，但却很可能通到她所在的地方；她現在正受着痛苦的折磨，因为那篇該死的报导不可能不被她看到。

决定了，我决定在列宁格勒再留几天。等我找到卡佳后再去北方。

尔同志到十五点鐘便回来了。我把自己的决定告訴了他。他听完了我的話說道，假如他处在我的地位，也要这样做。

“不过，我們应該一块兒去莫斯科。我給您在部里办好手續，然后，司列普式庚再給您两礼拜的假期，讓您去处理家庭問題。妻子，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呀！更何况是那么一位好妻子呢！我还記得叶卡杰琳娜·伊万諾芙娜。她是一个聪明，善良的女人，总之一句話，是一个世上少有的十全十美的人！”

我第二天回到彼得格勒街，又訪問了七十五号房的許多房客；我到过美术学院，想了解彼加的地址，可是我只了解到彼加負了伤，曾在华西列夫島上的分組医院里住过。雕刻家科斯托其庚曾經去探望过他。可是这位雕刻家后来餓死了，而彼加（听人說）又回前綫去了。我往艺术珍品收藏所兒童营寄的信件都沒有寄到，原来兒童营又疏散到新西伯利亚去了。奧万涅桑医生陪我到区苏維埃去了一趟，他对一个漠不关心的胖家伙大发了一頓脾气，因为他拒絕調查卡佳的消息。所有这样一些事情，我都不准备再一一叙述了。

在雅罗斯拉夫专为列宁格勒人設立了一些医院，一月份有許多列車是开往那兒去的。这是我能够断定的，惟一无可爭辯的事实，而且許多和我談过話的列宁格勒人都認为应該到雅罗斯拉夫去寻找卡佳。

有两个情况使我深信这样作是对的。第一，艺术珍品收藏所兒童营在第二次疏散前，是在雅罗斯拉夫脈谷村。第二，露凱里亚·伊里尼希娜——那位口腔医院女打字員的名字——突然

对我説，她想起了一件事：特洛菲莫娃医生正是把卡佳送到雅罗斯拉夫去的。

“我的上帝呀！”她恼恨地説道。“这样的事还能憑着想象瞎説嗎？我忘記了，我的記忆力不行啦，这是缺糖的原因，我現在一点糖都吃不到。不过这回我虽然沒有吃糖，可是想起来了！我告訴您，去雅罗斯拉夫就能够找到她。”

尔同志的飞机在半夜里飞走了。我先用电話联系了一下，在起飞前十分鐘赶到了机場。

17 不在家的朋友

假如把我从飞机着陆后，到火車出发前的几小时內所走的路綫标在莫斯科地图上，那很可能使人以为我是在想尽办法，故意迴避那些我早就渴望着要和他們見面的人。尽管我想要看到他們的原因各不一样，可是我説“渴望”看見的心情却是一点兒不假的。他們当时都在莫斯科。如果我們再看看地图，就可以看到，他們那一天所走的路綫，或者和我所走的并行，或者晚那么两分鐘就通过我走的地方，再不然就是在邻街上，仅隔了一道狹窄的建筑物，对面錯过。説来説去，我这一天是不走运，除了一个例外的情况，我什么人也沒碰見。

我从飞机場一直就奔公园路領子巷去找柯拉布略夫，好在我的全部行李只有一个小手提箱。

……老朽的木头釘起來的厢房已經傾斜，湮沒在許多改建的高大楼房中間，很象一座带百叶窗和露台的乡村别墅。伊万·巴甫雷奇已不象从前那样独自占用着底楼的一半房間。虽

然我乍一看到莫斯科时，觉得它空虛得令人不惯，可是在这所小小的房子里，几乎每一个窗戶里都有人探出头来张望。台阶上有几个妇女在織毛綫，我刚一露面，就象是在恩斯克我們院子里的那次一样，至少有二十只眼睛带着好奇的神情迎接我。

“您找誰？”

“找柯拉布略夫。”

“是伊万·巴甫雷奇嗎？走廊左边第二个門就是。”

“我知道，”我說，一面往台阶上走去，“他在家嗎？”

“您敲敲門看，好象是在家。”

我最后一次和伊万·巴甫雷奇見面是在战爭爆发前。我和卡佳事先沒有通知老头，便带着大蛋糕和法国葡萄酒到他那兒去了。他在隔壁房間里一面慢騰騰地刮着鬍子，一面和我們談話，我們就在翻看学校里的旧相片。最后伊万·巴甫雷奇出来了——穿着一套新衣服，領子浆得挺硬，唇上的鬍髭照青年人的式样向上卷着。今天，在这阴暗的走廊上，他的样子也一定会和那个值得紀念的、美妙的晚上一样。他馬上就会走出来，并且一眼就会認出我：

“薩尼亚，是你嗎？”

我在一扇熟悉的，釘着絨毡的門上敲了两三下。里面靜靜的一点兒声音也沒有。伊万·巴甫雷奇不在家。

“亲爱的伊万·巴甫雷奇！”妇女們都在瞅着我，我不願意讓她們发現我很着急，所以便躲在一边，給他写了一张便条。“我不知道是否还能再到您这兒来。卡佳一月間疏散到雅罗斯拉夫去了，我今天就要上那兒去。可能我还要到更远的地方，一直到找着她为止。我无法在这样一小张紙条上說明我遭遇的事情，和我們彼此失掉联系的原委。假如您或者瓦里亚（我希

望今天能够見着他）知道她的消息，請您立即写信到北极城，政治部海軍少将尔同志轉我收。亲爱的伊万·巴甫雷奇，我的死耗可能也传到您耳朵里来了，不过这张便条的确是我，是您的薩尼亚亲笔写的。”

至少有十只手同时向我伸过来拿这封信……

地下电車站变得似乎比以前更美丽，更雄壮了。我乘車到了苏維埃宫，果戈理林蔭道上坐着一些老年人，他們拄着专为上了年紀的人預备的粗手杖，脸上那付神气，就好象战爭老早老早就已經結束了。孩子們在街头游戏，——就在这一刹那，被焦急和忧慮占据了的我，才初次感覺到这兒到底是莫斯科呀！

瓦里亚家的門上挂着一块銅牌：“瓦連金·尼古拉耶維奇·朱可夫教授”。嗬！成了教授！我按了按門鈴，敲了敲門，随后又踢了一脚。

在一九四二年夏天，儿乎所有的莫斯科人都在工作单位住宿的时期，我在白天，在工作时間內，沒有在家里找着朱可夫教授可以說是毫不奇怪的。但是瓦尔加，我的瓦尔加，总是在我极端需要他的时候，跑到别的什么地方游蕩，这种印象使我非常憤慨。我对准門又踢了一脚。它象懂人事似的突然讓步了，訴苦般地吱軋响了一声。我拉了一下門把手，門就开了。

自然，房間里是空空的沒有一个人，我原先以为瓦尔加可能睡着的一綫微弱的希望刹那間也落空了。我走进那間曾經既是餐厅，同时又是兒童室的“外厨房”。眞也奇怪，这間“外厨房”怎么收拾得这么干淨！桌上鋪着桌布，擱板上吊着各种花样的白色剪紙。从这儿面扫得十分清洁的墙壁，以及摆着新鮮鈴兰花和夜来香的窗戶上，可以想見这是經过女人的手布置的。嗬，瓦尔加居然买起花来了！——只有伟大的艺术家才能設想瓦尔加

荞花的画面。

我走进了"内厨房"。墙边放着一张窄窄的鉄床，床头放着一件叠得整整齐齐的連衣裙；卡佳从前也有过这么一件带白豌豆花的天青色連衣裙。住在瓦里亚的这間"空房"里的女人究竟是誰呢？我从卡佳的头几封信中，就知道琪拉在战争一开始时便带着孩子走了。"我的宝貝兒，究竟誰把你纏上了？"我不由得想起了卡佳的一封信。她在这封信里嘲笑琪拉，說她为自己那埋头研究玄狐混合种的丈夫和一个"两只眼睛不一般大的姑娘任卡·柯尔巴克察"相好而吃醋。这位任卡·柯尔巴克察虽說两个眼睛不一样大，但却不肯放过机会呀！

說来說去，我还是沒有找着瓦里亚。

"我亲爱的瓦列其卡，"我給他写道，"我現在要到雅罗斯拉夫去，希望能在那里找到卡佳，即使能了解到她的情况也好。我在途中順便来看望您，非常遺憾，沒有在家里碰見你。我沒得到卡佳的任何消息已經半年了。她在列宁格勒时曾經和琪拉通过信，也許琪拉或者您能知道一点她的情况吧？我受伤后便在牟城住院，曾經給你写过信，但沒有收到回信。我历尽了千辛万苦，但是，如果我們彼此能知道对方都还健在的話，哪怕不見面，心里也会感到輕松一些。来信請寄北方艦队，地址是北极城政治部海軍少将尔同志轉。这是我惟一可靠的地址，我暫时沒有其它的通信地址了。亲爱的朋友，祝你健康。門是自己开的。你現在只好把它打坏才能进去，——这样总比讓房門敞着要好些。我也許在离开此地之前再到你这兒来一趟。"

我把条子放在"外厨房"的桌子上。然后把門上的鎖拾掇了一下，好讓它能够自己掉到鎖眼里去，于是用力把門一带，便很巧妙地鎖上了。

我在这兒还有一件重要的事。距离瓦里亚不远的地方住着一个人，我一定要去拜訪他。至于主人是否欢迎我这个客人，我却并不十分在乎。

我早就要去拜訪他了！

在医院里，每当夜間不能成眠，輾轉呻吟在梦魘之中的时候，我就想着这次的会見。我是这样的需要他，甚至在我沒有見到他之前，似乎死了也是不甘心的。

我不止一次地給自己描繪着这次見面的情景。有时，我想在他生活中最輕松愉快的一刻，譬如在戏院里，当他根本沒有想到我的时候出現在他的面前。有时，我又想在旅館里，我把門反鎖上，盯着他微笑。有的时候，我会在黎明前朦朧的晨光中看見他盘着腿，就坐在邻床上，他那扁平的眼睛半睜半閉着，眼光显得冷酷怕人。

18 老相識。卡佳的相片

卡佳有一次同我走过义犬广場时，說：

“罗馬紹夫就住在这兒。”

她指着一座暗綠色的，与左右两边的房子似乎毫无区别的房子給我看。无論是那个时候，或是現在，我似乎都覺得在这些剝落的墻壁里，有那么一个捉摸不定的卑鄙的东西存在。

旅客表已經不象战前那样挂在門上了，我只好到房管会去了解他的住所号碼。

在房管会里的經过是这样的。公民証登記員是位一臉火气的旧式太太。她戴着夹鼻眼鏡，当我問起她罗馬紹夫的时候，

她突然打了一个哆嗦，把眼睛睁得滚圆。在这間小木板房里有許多人，有的坐着，有的站着，胸前都扎着围裙，看样子都是一些清扫工人，他們之間似乎也发生了一点骚动。

“您应該先給他挂一个电話，”登記員好心地建議道。“他家里刚好昨天装了电話机。”

“不用，这样更好一些，用不着先打电話，”我笑着說道。“这样会更突然一些。因为我是他的老朋友，一个他認为早已报銷了的老朋友。”

我的这一番話里似乎并沒有什么特别的意思，但是登記員却很不自然地笑了笑。从隔壁一間也是板壁的屋子里，走出一个动作迟緩的，非常沉靜的年輕人，他戴着一頂頗为高級的鴨舌帽，仔細地打量了我一番。

从正門进屋需要从大街上繞道才行。我在正門前稍微放慢了一下脚步。我身上沒有带着武器，也許应該对那位站在拐角处的民警先打个招呼。后来我反复地想了想，又改变了主意：“他跑不了”。

我从不怀疑他是住在莫斯科的。他可能不在部队里工作了，不过即使在部队里的話，那他也还是会在自己家里住宿的，再不就是在别墅里住宿。他早晨总是爱穿睡衣。我仿佛看到了一个逼真的罗馬紹夫的形象，他洗完了澡以后，穿着睡衣，一团湿淋淋的，乱七八糟的黃头发竖在头上。这是一种錯覚，使得我眼前冒起了許多淡紫色的光圈兒。应該鎮定一下，也就是說应該想点别的事情才对。于是我想起了十七点鐘，尔同志将在水道測量局等我。

“誰呀？”

“可以見罗馬紹夫同志嗎？”

“过一个鐘头再来吧。”

“請您讓我在这兒等一等米哈依尔·华西里耶維奇好嗎？”我很客气地說道。“很抱歉，我沒法再跑一趟。恐怕他会因为我們沒有見着面而感到遺憾的。”

鎖鏈子嘩啦响了一声。但是并沒有取下来，相反地却挂上了，为的是把門稍稍打开一点兒好看一看我。接着鎖鏈子又响了一声，这回才算是眞取下来了。不过还在下門閂，接着是鉄的磨擦声，鑰匙的启动声。一个穿着寬大的衬褲，系着吊带，敞着內衣的老人把我讓进了門厅里去。他哈着腰，狐疑地盯着我打量。在他这张长着一个鷹鼻子的干巴脸上，透露出貴族式的傲慢和可怜相。一綹斑白的黃头发翘在禿头頂上，脖子上喉結地方垂着一块长长的皺皮，好象鐘乳石一般。

“您是維什米尔斯基爵士嗎？”我疑訝地問道。他打了一个寒战。“就算不是‘爵士’吧，但反正一样，是維什米尔斯基·尼古拉·伊万內奇，是嗎。”

“什么？”

“可敬的尼古拉·伊万內奇，您不記得我了吧？”我显得很愉快地継續說道。“我到过您家里。”

他抽送了一下鼻孔。

“到我家来过的人多着哩，成千上万，”他苦丧着脸說道。“一张桌子上曾經坐到四十个人。”

“您从前在莫斯科剧院里工作过，还穿过那种扣子雪亮的号衣。在我的朋友格里沙·法伯尔扮演紅头发医生的那一次，伊万·巴甫雷奇·柯拉布略夫在他的化粧室里介紹我們認識的。”

我为什么这样高兴呢？我象是主人一样地站在罗馬紹夫的住宅里。再过一个鐘头他就要回来了。我半张着口在微微呼

吸。我将怎样对付他呢？

“不知道，不知道！您貴姓呀？”

“我是格利高里耶夫大尉，我很愿意为您效劳。您現在就住在这兒嗎？住在罗馬紹夫家里？”

維什米尔斯基猜疑地看了看我。

“我的戶口在哪兒，就住在哪兒，”他說道，“不是住在这里。管理員知道我住在哪兒，不是这里。”

“明白了。”

我掏出烟盒，高高兴兴，啪的一下打开盖子，請他抽烟。他把烟接了过去。隔壁房間的門大开着，屋里所有的东西——墙壁，沙发，和沙发前的一张小圓桌都非常洁净，呈現出淡灰和深灰色。就連沙发上方挂着的一张什么人的大相片也是用光洁的，淡灰色相框嵌着的。“一切都很协調，”我还是很高兴地想道。

“哪一位伊万·巴甫雷奇呀？是作教員的嗎？”維什米尔斯基突然发問道。

“是教員。”

“不錯，是柯拉布略夫。他是位很好的人，杰出的人。瓦列其卡跟他学习过。紐达沒有，她是柏尔若佐夫斯卡雅女中毕业的。不过瓦列其卡是跟他学习的。那还有錯嗎！他不断地帮助……”在他那长着大鬍子的老脸上，閃露出一种只有鬼才知道的感情，然而是一种善良的感情。

老头兒装作恍然大悟的样子，急忙把我讓进屋子里，——我們这时还站在前厅里，——并且問我是不是刚下車的。

“如果是刚到的話，”他說道，“那么可以到軍人食堂去，根据出差規定，花不了几个錢就可以买到一份挺不錯的，有面包的午

餐。”

他还在刺刺不休地唠叨着，可是我这时已經沒在听他說話了。我大吃一惊地站在門口，原来在沙发上方淡灰色相框里嵌着卡佳的相片，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这样漂亮的相片。这是她穿着战争前夕自己刚縫好的，一件十分合身的灰鼠皮大衣拍的全身象。为了这件衣服，她那时曾费了很大的劲兒，专門找一位名叫曼蕾的名裁縫作的，并且还因为我不懂得帽子和暖手筒也要用同样的皮子而嗔怪我。我的天哪，这张相片說明什么問題呢？

这时在我脑子里至少有十种不同的想法互相推拽着，其中也有使我直到現在一想起来就感到慚愧的，荒謬的想法。我什么都想遍了，只是沒有想到眞实的情况，原来眞实的情况比我这些荒謬的思想更荒謬！

“尼古拉·伊万內奇，說实話，我眞沒料到在这兒碰見您，”我說道。这时老头不断向我介紹自己的情况，說他离开剧院后怎么进了精神病院，也是在衣帽間工作，因为“疯人不断向事务长彙报，說他每天偷菜湯，留着晚上喝”。

“这么說来，您是在罗馬紹夫这兒工作罗？或者只是因为朋友的关系？”

“对，是朋友关系。他請我帮忙，我也就答应了。我过去跟大主教伊西多尔当过秘書，我并不隐瞞这回事，相反地，我把它填写在履历表內了。这是一件巨大的工作，是一种巨大的劳动。光信件当时我們一天就要收到一千五百封左右。現在这兒也差不多。不过，我在这兒工作是因为情面关系。我也領了工作証，米哈依尔·华西里耶維奇把我安插在他的机关里了。机关內部也都知道我在这里工作。”

“难道米哈依尔·华西里耶維奇現在已經不在軍队工作了嗎？我們分手的时候，他还穿着軍装呀。”

“对，他現在不在軍队里了。他是一个有特殊需要的人。詳細情形我不知道。他緩役到战爭結束时为止。”

“您每天收到的都是些什么信呢？”

“这都是极其重要的文件，”維什米尔斯基說道，“非常重要，因为我們有任务。我們目前的任务就是寻找一位妇女，一位夫人。不过，我疑心这不是任务，是私事，也可以說是愛情吧。”

“她是位什么妇女？”

“是一位历史人物的女兒，这个历史人物我很熟悉，”維什米尔斯基带着驕傲的神情說道。“您大概也听到过有位姓塔塔林諾夫的人吧？我們現在就是寻找他的女兒。要不我們早就把她找着了，但头緒太乱。她早已出嫁，所以她有两个姓氏。”

19 “你杀不死我”

生活似乎是在奔馳着的时候突然停頓下来，我因为沒有估計到运动的慣性，所以前額在一堵臆想的墙壁上狠狠地撞了一下。我看着面前这个一般說来还算正常的老人，这时我心中的感覺就是这样。是他站在这間明亮，也还正常的房間里，告訴我說，罗馬紹夫也在寻找卡佳，也就是說，他也在作我所作的事。

但是我們的談話仍然象什么事情也沒有发生似的繼續下去。維什米尔斯基从卡佳的問題又扯到了某个地方委員身上，

說他沒有权利称他为“旧职員”，因为他有“五十年的工龄”。后来他又沉溺在回忆中，他叙述一九〇八年自己每次从戏院走出来时，驗票員就吆喝：“維什米尔斯基老爷的車！”馬車就拉到他跟前来。那时他戴的是大礼帽，穿的是斗篷，这些东西現在都不时髦了，他感到“很可惜，因为这种穿戴很漂亮”。

“他什么时候去世的？”他突然冒出这样一个問題，把他那鐘乳石般的皮肤使劲地往下拉了一下。

“誰？”

“柯拉布略夫。”

“怎么去世了呢？他不是好好活着嗎？尼古拉·伊万內奇！”我用开玩笑的口吻說，可是心里却在发抖，想道：現在一切都要見分晓了，可得当心点兒，“您說这是私事，对嗎，关于那位夫人呢？”

“是呀，是私事。但却是非常紧要的私事。塔塔林諾夫船长是一位历史人物。米哈依尔·华西里耶維奇到过列宁格勒。在封鎖期間他餓得連墻紙上的浆糊都吃了。他把墻上裱糊的紙撕下来煮着吃了。后来他出差去收購肉类，可是等他回来时一个人也沒有了。都被送走了。”

“哪兒去了呢？”

“問題就在这里，”維什米尔斯基郑重其事地說道。“您知道，这次是怎么撤退的嗎？您去找找試試！主要的問題是，如果她是用火車送走的，那只消了解那是哪个单位的列車就行了。假定說是冷藏联合企业的专車，这趟列車到哪兒去了呢？到西伯利亚去了，那么她也就在西伯利亚。但她是用飞机送走的。”

“怎么，用飞机？”

“是哇，显然她是优先被送走的。所以她就下落不明了。看你怎么去找吧。只知道飞机通过了赫沃依那雅站，也正就是从米哈依尔·华西里耶維奇去取肉的那个車站上空飞过。”

这时候我大概本能地感觉到什么时候应該不說話，什么时候应該說上两三句話。一切都处理得很好。一位軍人嘛，大概是才从医院里出来的，又瘦又黑，前来訪問一位在前綫分手的朋友，問他現在干什么，生活怎么样。“現在一切都要見分晓了，可得当心点兒”。

“喂，怎么样？找着了嗎？”

“还沒有。不过根据我的方案，是会找着的。”維什米尔斯基說道。

“我写信給布古魯斯兰中央問事处，不过，結果簡直是扯淡，他們給我們寄来了十来个姓塔塔林諾娃，成百个姓格利高里耶娃的女人的材料，可是我們不知道应該首先从哪个着手找起。因此我就亲自找到各省城的执行委員会主席。这眞是一种巨大的劳动，一个重大的任务。不过，塔塔林諾夫是我的朋友，所以为了寻找他的女兒，我三个月来一直在写这些千篇一律的詢問信——求您指示，疏散站，历史人物，等候回音等等。这样一来，我們就收到了这些东西。”

响起了一陣刺耳的門鈴声。維什米尔斯基說道：

“这是他。”

他的脸显出了惊恐的顏色，头上那一撮尖細的白发哆嗦起来，八字髫也垂下来了。他走到門厅里去，我慢吞吞地在靠門的墙边站了起来，为的是讓罗馬紹夫不致于一进門立刻发觉我。

他完全来得及跳到楼梯口去，因为維什米尔斯基在門厅里便对他說：

“有人在等您。”

他急忙問道：

“是誰？”

老头兒回答道：

“一个姓格利高里耶夫的人。”

他并沒有竄出去，虽然他完全来得及这样作，——我这时的动作仍是不慌不忙的。他站在衣橱和墙壁之間黑暗的角落里，他看見我以后，先是惊叫了一声，然后象小孩子一样举起拳头遮住了脸。外面一道門上插着鑰匙，我把它在鎖眼里轉了一下，取出来放进口袋里去了。維什米尔斯基停在我們中間，我不小心碰了他一下，順手象抱玩偶似地把他換了个位置。后来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又碰了他一下，他机械地倒在安乐椅上了。

“喂，我們談談去，”我向罗馬紹夫說道。

他沒有吭声。他把手里的鴨舌帽放到嘴上，用牙紧紧地咬住。我又說道：

“喂！”

他疯狂地搖了搖头。

“你不去嗎？”

他喊道：

“不去！”

但是他乍看到我时那种絕望的神情，这时已經快沒有了。我拉住他的手，他把腰杆挺得笔直，我們走进房間。这时，除了一个眼睛稍稍有些歪斜外，他的脸色已經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付样子，变得平静，麻木了。

“看見了吧，我还活着啦，”我小声地說道。

“唔，看到啦！”

我这时可以仔細地看一看他了。他穿着一身灰色的单西服，上身翻領上佩着黃色的綬带，这是受过重伤的記号，可是事实上，他只受了一点极輕微的震伤。綬带下面有一顆扣子在暗中閃閃发光。他现在长胖了。要是沒有他那对向上竖着的，可以和扣子媲美，能在暗中发亮的紅耳朵的話，可以說，他从来还沒有这样的象一个体面的紳士呢。

“手枪拿来。”

我以为他会撒謊，說在复員的时候已經上繳了。不过我的手枪上刻着名字，这是我轟炸納罗瓦河的桥梁后，团长奖給我的。如果罗馬紹夫把枪上繳，那他一定会暴露自己。这就是为什么他会一声不响地拉开書桌抽屜，取出了手枪来。枪里沒有压子弹。

“文件呢。”

他不吭声。

“喂！”

“弄湿了，丢掉了，”他慌忙說道。“在列宁格勒防空洞被水淹了。我当时失掉了知觉。只有契同志的相片保全下来了，我已經把它交給卡佳。她是我救活的。”

“眞的嗎？”

“是的，是我把她救活的。所以我不駭怕。反正你不能把我杀死。”

“走着瞧吧。畜生，你把一切經过都說出来吧，”我一把抓住他的領口，他頓时呼吸微弱起来了，所以我連忙又把手松开。

“在她只剩一口气的时候，我把所有的东西都給了她。唉，你

不相信我，"他从旁边歪过身子，想要看一看我的眼睛，一面拚命的喊道。"但你会相信我，我要把一切都告訴你。你什么也不知道。我不喜欢你。"

"眞的嗎？"

"我为什么要喜欢你？你把人生最美好的东西都从我手里夺走了。我可以干出許許多多的事情，"他傲慢地說道。"我的运气一直很好，因为周围都是些笨蛋。我本来可以飞黃騰达，可是我不在乎这些！"

"我不在乎这些"，——这話說得未免太响亮了。据我所知道的，罗馬紹夫不仅在乎这些，相反的却是一貫拚命追求名利。并且他在这些方面是一帆风順的，特别是想到他在小学的时候就是一个笨到极点的蠢物，那么更可以說，他是十分走运的。

"你好好听我說嘛，"罗馬紹夫說，他的脸色更加慘白，虽然看来已經是不可能再白了。"你要相信我，我把一切都告訴你。关于寻找塔塔林諾夫船长探险队的事是我破坏的！起初，我帮着卡佳搞这件事，因为我相信你会一个人去的。可是后来，她决定同你一块兒走，所以我就把探险队搞垮了。我写了一份报告書，这是一份很冒险的报告書；如果我不能証明这份报告書的眞实性的話，那我自己就要栽斤斗。但是我成功了。"

在印着金字"米·华"的灰色皮文件夹里放着一叠紙片。我抽出了一张，罗馬紹夫怔住了，他睜圓了眼睛，向我头上的什么地方望着。他彷彿是努力想要看到时間的前面去，想要看到自己的将来，企图知道和猜出我从公文夹中抽出一张紙，把它放在面前的这一簡单动作对他有什么威胁。

"也好，你写吧，"他說道，"出头阻止探险队的这个人后来被流放，死掉了。沒关系，如果你認为这些事还有价值的話，那你

就写吧。"

"一点价值也沒有，"我冷冷地說道。

"我說你是神經病，滿脑子就是要找一个不知在什么地方失踪了二十年的塔塔林諾夫船长。我說，我从小学讀書时就認識你，知道你向来就是个神經病。不过，在你这些活动里面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你娶了塔塔林諾夫船长的女兒作妻子，你为了达到自己往上爬的目的，所以就借着船长的名字大作文章。这份材料不是我一个人写的。"

"当然啦！"

"你还記得'保卫学者'那篇文章吧？那是尼古拉·安东內奇发表的。我們在报告書中也引証过这篇文章。"

"也就是在誣告中，是不是？"

我这时已經开始記录他的話，并且尽可能地記得快些。

"对，就算是在誣告中罢。我們确切地証明了一切都是真实的！我把这张紙塞給尼娜·卡比丹諾芙娜，騙她也签了个名。我的主啊，后来要設法使他們不传她去作証是多么困难喲！真是困难极了！你甚至还不知道这一着害得你有多苦！你在民航局，以及在参軍之后一定都受到了影响，一定的！"

怎样才能表达出我在听完他这篇供状后心中所产生的感觉呢？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說出这件事实的真象，不过，他这次不算很复杂的花招很快便揭穿了。从前我不論在什么地方，不論发生了什么事，总要有意无意地想到的一些事，这时，仿佛是在一道迴光反照下，变得昭然若揭了。

20 暗　　影

"起因說来很早，还是在小学的时候便开始了，"罗馬紹夫繼續說道。"我那时要天天开夜車，才能在課堂上回答問題象你那样流利；我希望自己不去想錢，因为我看到金錢引不起你的兴趣；我幻想能成为象你那样的人，幻想自己能成为你。我感到痛苦，因为你在各方面永远都比我高出一头，比我强。"

他的手打着哆嗦，从桌上的玻璃盒里抽出一支烟来，到处找引火。我燃着了打火机。他吸着了烟，深深地吸了一口，便扔掉了。

"有的时候，我在大街上遇見你；我常常在一些路口上躲躲藏藏，象一个影子似的尾随着你。在戏院里，我就坐在你的背后。天哪！我究竟和你有什么不同呢？然而我知道，我看到的舞台和你們看到的不同，因为我看一切問題的眼光和你完全不一样。是的，不仅卡佳是我們爭夺的焦点，甚至我感觉到的一切随时随地都和你感覚到的在作斗爭。这就是为什么我对你的情况很了解的原因。你曾經在伏尔加河农业航空队工作，后来又在远东工作。当你再次申請去北方，沒有被批准时，你就到西班牙去了；天哪，我长年累月，梦寐以求的事情这次仿佛是蓦然間不請自来了。但后来你又回来了，"罗馬紹夫憎恶地喊道，"并且自此以后，你的一切反而順利了。你和卡佳一块兒回到恩斯克去；——你看，甚至連你自己早已忘記了的事，我却都知道。你自然可以忘記，因为你是幸福的，可是我却不能，因为我是不幸的。"

他神經質地叹了一口气，閉上了眼睛，后来他又把眼睛睜开。在他那迅速的一瞥中，有一个清醒的、銳敏的、和这番热情的自白截然不同的思想倏然閃过，我默不作声地听着他講下去。

“不錯，我想把你們拆散。因为愛情是你毕生最大的幸福。我嫉妒得要死，我想你之所以愛她純粹是由于愛她；而我呢，却还因为要想把她从你手里夺过来。我現在居然和你談起恋愛的事情来，这似乎有点可笑！但爭夺的結果是我失敗了。对我說来，这种耻辱比起你依然活着以及命运又欺騙了我这两件事更为难堪。”

門厅里响起了电話鈴声。是維什米尔斯基在回話：

“对，他回来了。您是哪兒呀？”

但不知道为什么他沒有来叫罗馬紹夫接电話。

“这时战爭爆发了。我自己也报名參了軍。我本来可以緩役的，可是我拒絕了。如果我被打死的話，那就太好了！不过，我心里暗暗地希望你死掉，希望你！有一次我正躺在溫尼察一間庫房里，一个飞行員走过来，他站在門口讀报。‘眞是好样的！’他嚷道。‘可惜燒死了。’——‘誰呀？’——‘格利高里耶夫大尉和他的机組。’我把这篇报导讀了千百次，把它背得滾瓜烂熟。几天之后，我在軍用列車上就遇見了你。”

这实在是天大的怪事，仿佛因为我沒有滿足他的希望，居然还敢活着，所以他現在就可以要求我同情他似的。但他談得那么起劲兒，一点也不去注意自己处境的尷尬。

“后来的事情你都知道了。这簡直是一場噩梦，我想起来就感到慚愧！还在火車上的时候，使我感到十分吃惊的是你似乎并沒有在想卡佳。我看到你所痛心的是当时那种混乱局面。这些都是你的作风，你为了不再撤退，甚至願意付出自己的生命。

对于我說来，这只不过是再一次地說明了你比我高出一头，比我强。”

他住口不說了。他坐在我的面前，穿一身灰色单西服，滿象一个仪表堂堂的紳士。仿佛在这世界上，从来就沒有过小白楊树林，沒有过一堆堆的潮濕的落叶，和妨碍了掄拐杖的木柴垛。仿佛我沒有用肘撑在地上躺着，竭力忍住不去喊他：“罗馬紹夫，你回来吧！”我这时甚至把手都捏疼了，恨不得用手枪揍死他。

“不錯，眞可算得用尽心思了，”我說道。“請你順便在这张紙上签个字吧。”

在他刚才忏悔的时候，我写好了一分“供状”，也就是破坏搜寻探险队的簡单經过。我不会写公文，对我說来这是一件伤脑筋的事。不过“米·华·罗馬紹夫的供状”似乎写得还可以，因为我是照直笔录的：“卑鄙地欺騙了北方航务总局的領导”等等。

罗馬紹夫迅速地把这份文件閱讀了一遍。

“好，”他低声說道，“不过我首先应当向你解释……”

“你先签字，然后再解释。”

“然而你不知道……”

“签字吧，卑鄙的家伙！”我当时說話的那种腔調吓得他倒退了一步。他的牙齿慢騰騰地，象是很勉强似的抖动得格格地响起来。

“签吧。”

他签了字，恶狠狠地扔掉了鋼笔。

“你应該感謝我，可是你現在却想利用我的坦白来捉弄我。好哇！”

“不錯，想捉弄一下。”

他看了看我，这时他大概在后悔没有在小白楊树林里結果了我的性命。

“我回到了莫斯科，”他繼續說道，“立刻就积极設法到列宁格勒去。我是經由剌多牙湖去的，德国鬼子在这里击沉了許多船只，但是我却到达了目的地，并且是准时到达的。謝天謝地，”他急忙加上了一句說，“只要再晚一天，那可就不知道要怎么样了，說不定我只能赶去給她送葬了。”

这件事可能是眞的。当維什米尔斯基說到他去过列宁格勒时，我就想起了女清扫工和孩子們所談的那个紅头发少校。“她挖出一个紅头发的人，他带着面包。有一大口袋，总是自己背着，不肯給我。”但使我不安的是另外一种情况。罗馬紹夫会說服卡佳，使她相信我已經牺牲了，当然，說我是在战斗中，而不是在小白楊树林里牺牲的。

“我就这样来到了列宁格勒。你想象不到那时的情况。我領三百公分面包，一半送給卡佳。到了十二月底，我又搞到了一点兒葡萄糖。当我把葡萄糖給卡佳送去时，我把自己的手指都咬坏了。我倒在她的床前，她叫了一声：‘米沙’，但我連站起来的力气都沒有了。我救了她。”他伤心地又說了一遍，好象是因为我可能不相信他，使他又产生了一种恐怖的思想，“至于我自己为什么沒有死掉，那只是因为我确实認識到她和你都需要我。”

“我也需要你？”

“是的，你也需要。司考伏罗得尼可夫写信給她，說你被打死了。等我去的时候，她由于过度的悲慟已經命在旦夕了。当我告訴她，說我看見你还活着的时候，她那一会兒的神情，——唉，要是你看到就好了！就在这一刻功夫我明白了自己是可耻

的，"他放开喉嚨大声說道。他的声音那么响，使得門厅里也咕冬响了一声，仿佛是維什米尔斯基惊得从椅子上滚了下来。"在这样的愛情面前我是可耻的。这时候，我痛苦得象被絞割一般，后悔自己有过要杀害你的想法。我是鬼迷了心窍。你的死亡不会給我带来幸福的。"

"說完了嗎？"

"对，說完了。我在正月間被派去赫沃依那雅出差。我离开了两个星期，等我把肉运回来时，房子已經空了。你大概也知道瓦丽亚·特洛菲莫娃吧，她送卡佳坐飞机走了。"

"送到哪兒去了？"

"我打听得很清楚，送到沃洛格达，后来，又到雅罗斯拉夫去了。"

"你問过雅罗斯拉夫的什么人嗎？"

"問过疏散站。站长和我熟識。"

"收到回信了嗎？"

"收到了，不过信上只說她經过疏散站，又被送到专为列宁格勒难民开办的医院里去了。"

"把信拿来看看。"

他从書桌抽屜里找出这封信递給我。"弗斯波里叶站，"我讀道，"关于您所詢問的問題……"

"怎么是弗斯波里叶呢？"

"疏散站在那兒。距雅罗斯拉夫两公里。"

"現在都說完了嗎？"

"說完了。"

"那就听我的吧，"我竭力使自己不要激动，对罗馬紹夫說道。"无論你怎样看待过卡佳，可是关于饒不饒恕你的問題，我都

不能决定。因为在你对我作出了那样的事情之后，这就已經不是我們私人間的爭执了。当你想要杀死我，杀死一个身負重伤的人，盗窃了我的东西，将我一人抛在树林里的时候，你不是在和我斗意气。这是屬于軍事性質的犯罪行为。你已經犯下了这样的罪，所以，首先应将你作为一个违背了軍人誓詞的坏分子来审判。”

我正冲着他的脸看了一眼，我感到很惊奇，他这时并沒有在听我說話。有两三个人正朝楼上走来，脚步声在楼梯上咚咚地响。罗馬紹夫不安地向周围看了一下，站起身来。外面先是敲門，接着又按門鈴。

“开不开？”維什米尔斯基在隔壁問道。

“不开！”罗馬紹夫喝道。“先問清他是誰，”他彷佛是若有所悟，又小声地添了这么一句話，然后放輕脚步，差不多象跳舞似地在房間里走了一轉。

“誰呀？”

“开門吧，房管会来的。”

罗馬紹夫从紧閉的牙縫里吁了一口气。

“告訴他們，就說我不在家。”

“刚才来电話的时候，我不知道，已經告訴人家，說您在家。”

“当然在家啦，”我高声說道。

罗馬紹夫朝着我扑过来，抓住我的手。我推开了他。他尖声地叫喊起来，后来便跟着我走到門厅里去，象刚才一样，站在墙壁和柜厨的中間。

“請等一会兒，”我說道，“我馬上就开。”

門外走进来两个人——一个中年男子，从他那阴沉的，当家

人般的表情上看来，显然是房产管理員；另一个就是我在房管会見过的那个年輕人，他戴着一頂頗为高級的鴨舌帽，动作总是慢騰騰的。这个年輕人首先看了看我，然后不慌不忙地看了看罗馬紹夫。

“您是罗馬紹夫公民嗎？”

“是的。”

維什米尔斯基吓得牙巴直打战，声音那么响，使得大家不禁都轉过头来看他。

“有武器嗎？”

“沒有，”罗馬紹夫几乎是不动声色地回答道，只是在他那呆呆的面孔上有一条青筋不安地跳动着。

“好吧，把东西收拾一下。不用带多了：带点換洗衣服就够了。管理員，請您把犯人带走。大尉同志，請您把証件拿出来看看……”

“尼古拉·伊万諾維奇，这眞是扯淡，眞是乱弹琴，”罗馬紹夫在另外一个房間里大声嚷道，他正在那兒往背包里收拾自己的东西。“我过几天就回来。老是为那件牛羊下水的混帐事。您总該記得我对您說过从赫沃依那雅运回来的下水的事吧。”

維什米尔斯基的牙巴又打起架来了。从各方面都可看出，他根本沒听說过关于什么下水的事。

“薩尼亚，希望你能在雅罗斯拉夫找着她，”罗馬紹夫說这句話的声音更高，“請你代我問她……”

我从門厅里看見他把背包掉在地上，閉着眼睛又站了一会兒。

“行啊，沒什么大不了的，”他自言自語地說道。

“对不起，您能給弄杯水喝嗎？”戴鴨舌帽的人問維什米尔斯

基道。

維什米尔斯基送給了他一杯水。这会兒大家都站在門厅里了；罗馬紹夫背着背包，管理員仍然一句話也沒有說，惊惶失措的維什米尔斯基手里擎着空杯子。大家沉悶了一会兒。后来便衣偵察員推开了門。

“再見。对不起，打扰了。”

然后，偵察員便很客气地把罗馬紹夫請走了。

命运之神这次通过莫斯科民警局的代表来到了罗馬紹夫的住所，断然地打断了我們的談話。如果当时我有空閑时間的話，我也許要設法探听一下其中原委，可是去雅罗斯拉夫的火車在二十点二十分开，而我还要作下面这几件事：

一、去見司列普式庚。不仅是去，而且还要办手續，这可能要占一个半小时；

二、去奖励局。还在N城的时候，我就接到通知，說我的第二枚紅旗勛章已經批准，可以到人民委員会去領証明書；

三、准备路上吃的东西。我从N城带来的食物都留給一个过去列宁格勒的同团战友，現在波罗的海工作的飞行員了；

四、买票。不过这个問題我并不着急，因为即使沒有票我也要走。

此外，我还要給軍事法院检察长写罗馬紹夫的材料。

这些事我全要办，也就是說，在上車前的四、五个小时里面，我的生活內容应該包括这几項工作。不过，事实上我当时只需要再回瓦里亚·朱可夫那兒去一趟。到他家需要走五分鐘，这样，說不定我就会利用这点时間，来考虑一下罗馬紹夫刚才在我面前企图开脫自己的那一番眞眞假假的話了。

我甚至在阿尔巴茨卡广場上还停留了一会兒。"是不是再到瓦里亚家去看一下呢?"可是我沒有去瓦里亚家,而是去理了一次发;去水道測量局应該先刮脸,換一条干淨的領子才行,因为一位海軍少将打算在那里介紹我和另外一位将軍認識。

我在正十七点鐘的时候到了司列普式庚那兒,十八点鐘的时候,在水道測量局干部部办好登記手續,領到了去北极出差的証明,在尔同志領导下工作。若是两三年前,哪怕能看到这样几句干巴巴的公事話,我眼前定会立刻出現一抹荒凉的远山,被北极初升的太阳微弱的光芒照射着的情景。可是現在,我滿怀着心思和激情,只是机械地把証明書塞进了口袋,心里想着:唉,我干嗎不請尔同志用軍用电报和雅罗斯拉夫联系一下呢,一边想着,一边走出了測量局。

我不准备叙述在奖励局耗費了一个半小时这些事情了。可是应該叙述在莫斯科和一个人值得紀念的最后一次会晤。

我是在"猎行"車站进入地下鉄道的。这时我已經非常疲倦,一只手拿着背包,一只手提着皮箱。正是下班的时候,虽然一九四二年夏天的地下鉄道还很松快,可是在自动升降梯前还是站着一大群人。梯带迎着我在往上升,我注視着这些莫斯科人的面孔,心里忽然想到自己在这忙碌,劳累的一天中,还沒能好好地看一看莫斯科的市容。这时候,我远远地看見一个十分臃肿的人,戴着一頂厚厚的鴨舌帽,穿着寬大的垫肩大衣。他不是在往上走,而是在游动,身体漸漸增长,落落大方地等待着这架强大的机器把他送上来。

这人就是尼古拉·安东內奇。

他認出我来了嗎?不見得。即使他認出来了,可是象我这样一个小小大尉,穿一件破軍衣,提着一个露出面包头的,难看

的破背包的人和他有什么相干呢？

他用迷迷糊糊的，威严的眼光漠不关心地在我脸上扫了一眼。



第九部　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薩尼亚·格利高里耶夫述

1　妻

弗斯波里叶这陌生的，夜色籠罩着的車站象是被照明弹照亮了一般，充滿了战爭带来的忧慮、忙碌和騷动的气氛。在这耀眼的、反常的亮光下什么事都可以看到！領队的人一边叫駡着，一边在集合队伍，一些沒有睡醒的、愁眉苦脸的人跟着在排队，——战爭！站台上的小卖店憑护照和証明配售食物，一双双当兵的手珍惜地捧着黑面包，——战爭！一个五岁左右的小女孩走丢了，沒有赶上火車，广播器里正在呼叫找她的媽媽；找呀找呀，可就是找不到，——战爭！从莫斯科来的火車上走下一个飞行員，他一只手拿着背包，另一只手提着箱子，到处向人打听

疏散站在哪兒。他走进一間又小又脏的房間，房間里滿滿地挤着一群人，有的坐着，有的站着，有的躺着，后来，他也挤进了等候謁見站长的行列，——战爭！

我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記在心上。战爭的巨大的照明弹巳經燃起来了，高悬在人們的思想意識之上，可是思想意識在亮光和暗影之中却不能很快地寻找着道路。

深夜的田野上籠罩着夏日特有的寂靜，我沿着夜間的田野一步一步地走进城去。探照灯的光綫在繁星閃閃的，温順的天空中逡巡。城市到了。每一条街上都会碰上卫戍司令部的糾察队，他們拦住我检查証件。这就是专为列宁格勒人开設的医院。值班护士郑重其事地对我解释說，她們医院里巳經三个月沒有收容过一个列宁格勒人了。

“办公室九点开始工作，”她說道，“可是現在才夜里三点半。”

我躺在一张矮矮的漆布沙发上，似睡非睡。我的卡佳在什么地方呢？

第二天早晨，主任医生把我領进他的办公室里；里面的东西全是白色的，白色的桌子，乳白色的窗子，白色的臥榻上舖着新換的白罩单。我沉湎在遙远的回忆里。那时我是一个十七岁的少年，靜坐在候診室里，在那微微开着的門里面，一张矮矮的白色的臥榻上躺着瑪丽亚·瓦西里耶芙娜，她的脸色慘白，仿佛是用象牙雕刻的一般。

“她叫什么名字，父称是什么，姓什么，多大年龄？”主任医生問道。

我說出了她的名字，父名，姓和年龄。这时有一位护士一边扣着白罩衣走进来，医生托她去把卡佳的卡片和病历找来。

我們抽抽烟，談談話，談談話又抽抽烟。最近又有一千多架

英国飞机袭击不莱梅。据說莫斯科的面包供应标准提高了，这話是眞的嗎？現在旣然我們和美、英之間已經签訂了协定，我是不是也認为第二战場很快就会开辟呢？

这时护士同志正在隔壁房間里翻寻卡片：生的卡片，死亡卡片。

电話鈴响了，主任医生将总务主任駡了好半晌。我在一旁默默地等着。护士将給我带来什么消息呢？是卡佳的死耗，还是卡佳的生訊呢？象这样默默地等待着究竟又能使人輕松多少呢！

护士終于回来了。主任医生还沒有駡完，她把卡片拿在她那小得几乎象兒童的手里。

“嘿，沒有什么，一切都很正常，”他說道。“情况良好。一九四二年三月出院了。”

我这时的脸色大概比在这种情况下应該有的更白了一些，所以他站起身，从桌子那边繞过来，将一只手放在我的肩上，重复說道，“情况良好，一九四二年三月出院了。”

他看見我一听說二月間卡佳的血紅素总共只剩下了百分之四十二时那付着急的样子，不禁衷心地笑了。

現在已經十分淸楚，她是随兒童营到新西伯利亚去了。若果眞是到这个城市里去那倒也好，然而不是！野营还在距新西伯利亚二百公里的一个集体农庄里。

我到雅罗斯拉夫区执行委員会抄下了它的准确地址：上雅多站，大魯宾村邱根区，邱根村苏維埃等等。在給卡佳的这封短短的二十五个字的电报里，她的地址就占了十七个字，再加上我的地址，因此，剩下来表达我全部感情和思想的話只有四个字了。

除了这封电报之外，我在雅罗斯拉夫还发了三封电报。一封給恩斯克的达莎阿姨，告訴她卡佳还活着，我希望很快就能見到她。一封給在莫斯科的瓦里亚·朱可夫，說我沒有找到卡佳，她大概是随营到新西伯利亚去了。再一封也是拍到莫斯科去的，是給司列普式庚，請求他按照我們在个別談話中議定的，允許我繼續寻找妻子。

我是多么想独自一个人休息休息，独自一人考虑一些問題啊！可惜我沒有租到单人房間。不过我的同屋是一位中年的陆軍少校，他之需要休息无疑間也不亚于我，所以刚到八点鐘，他就躺下了，而且睡得那么熟。不管我一夜怎样在床上翻来复去，把床舖弄得吱吱呀呀作响，不管值班女工两次来检查熄灯沒有时，在走廊上走动的脚步声，这些声音都不能吵醒他。

半夜里，他醒来吸烟，象一个土耳其佬似的盘着腿，一声不响地坐了好久。我也吸起了烟来。我对他一点也不了解，他对我也是一点不了解。可是，我們都在看着手里的烟卷在黑暗中发出的那一点兒紅光，默默地想着同一件事情。战爭使我們两个素不相識的人聚在一起，聚在这个房間里。我們这时共同想着的問題就是战爭。經过了二百五十天英勇的保卫战之后，我們的部队已經在昨天从塞瓦斯托波尔撤退了。

同屋的伙伴抽完了烟又睡了，我也跟着睡下。不过，大約睡得并不太久，我听見走廊里有人在高声說話：

"一点半啦。"

塞瓦斯托波尔的情景浮現在我的眼前。它不是一九四一年九月間我所見到的那座宛若要擺脫一切，冲向前去迎接它那伟大命运的城市，那座森严的、飞揚着灼热的灰尘的城市，而是从

前那座充满着欢笑和青春的声音的城市。那时我和卡佳每星期都到塞瓦斯托波尔来。小汽艇停泊在碼头旁边，水兵們同一些披着薄紗巾，穿着白色連衣裙的姑娘在伊斯多利亚林蔭道上散步，他們一直走到眼睛所能看得到的最远的地方。我們两个人都很喜欢作一个游戏，这个游戏是卡佳想出来的：假定她是我心爱的姑娘，我們刚刚認識，就如同这些青年男女一样，我們現在应当約定幽会，写情書，很客气地称呼对方为“您”。那时候的一切多么美好啊！我每天五点鐘起床，这时卡佳已經把早餐准备好了；如果我今天要作高空飞行的話，那她就把早餐作得清淡一些。随后便是快活有趣的一天。不仅是因为飞行有趣，而且因为我知道，过一会兒又将是“我們的时間”，我們又可以到幽深的、仿佛是把天空翻轉了过来的海水中游泳，又会看到哈拉克斯的灯塔緩緩地一明一灭了。

作我的妻子大概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可是，卡佳却說，她只有在不知道我在哪兒，不知道我会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才感觉到难受。

我又特别清楚地回想起我們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口角。那是一九三六年在列宁格勒的时候，組織搜索探险队的問題已經决定，我們眼看就要出发到北方去了。我的妹妹薩尼亚拋下了嗷嗷待哺的嬰兒，去世还不到一个月。我們都很着急，不知道留下嬰兒該怎么办，最后，已故的罗莎莉·納烏莫芙娜找到了“科学保姆”，我們才作了决定。决定之后，就赶紧准备动身。可是小彼加突然病了。

……卡佳脸色蒼白，精神恍惚，坐在装衣服的籃子傍边，籃子里躺着伸张着四肢的患病的孩子。我刚跨进門，卡佳就伤心地痛哭起来。我把她抱在怀里。

“你是怎么啦，不要这样，”我撫摸着她淚湿了的脸腮說道。“你还是去。到阿尔汗格尔斯克就可以追上我們了，就这样吧。”

我还能对她說什么呢？其实搜索探险队在阿尔汗格尔斯克停留的时間頂多不超过一昼夜。

“唉，我眞不願意再离开你了！”

“一切都会慢慢解决的。”

“什么也不能解决，我为了成立这支探险队，奔跑了一个冬天。我为了使你能够去，尽了自己的力量，可是現在你就要走了，我甚至連你在什么地方，你会发生些什么事情都不知道。”

“卡佳！卡佳！”

“我什么也不需要。不需要这支探险队，反正你也不会探索出什么来的。天哪，难道我眞的就沒有福份享受这种其它女人从来也不追求的幸福嗎！而且你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的！”

她看到我开始生气了。但她深深地陷于悲慟絕望的境地，难过到了极点，她站起来，把两只手紧紧地压在胸前来回地走着。

“我知道，你不願意我和你一道走！你說，对不对？”

“唉，不要这样了！”

“好吧，”她似乎也为自己說話时的这种沉靜得不顧一切的情緒吃了一惊，“讓我們結束这次爭吵吧。我要去。我知道你不願意讓我去，因为你不爱我。”

我們一直談到天亮。小彼加的身体到第二天就好了些，又过了一天，他就完全恢复健康了。

这就是我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談到这个使她一生都为之苦恼，都感到忧虑的問題时的情形。每当她想到自己永远也不能够滲入到我的这个世界，滲入到这个使我常常忘記了她，抛

弃了她的世界里来，总是感到万分难过！可是要她不去想这个問題，那她就会更加难过。

她每次給我送行时，就象她送我到西班牙去的那次，在她的內心里需要多大的抑制力？我在薩拉布斯第一次率領我的中队作完了夜間飞行以后，无意中从我的領航員的妻子那兒得知，卡佳等我整整等了一夜都沒有睡覚。

卡佳，你究竟在哪兒？我們的生命，我們的愛情已經联成了一体，卡佳，你快回到我的身边来吧！战爭还只是开始，摆在我們前面的还有許多事情要作，还有許多事情要操心。卡佳，不要抛弃我！我知道，你和我一起生活很困难，你为我担惊受怕，我們一生总是在别人家里团聚；难道我就不懂得，对于一个作妇女的說来，家庭是多么必需，多么重要嗎？我也許不够愛你，不够想念你……卡佳，請你原諒我吧！

……我不知道是在醒着，还是在梦中，我恳求她不要抛弃我，恳求她即使能来梦中相見也好，恳求她不要去相信那些說我永远不会回来的胡話！

2　事情还沒有結束

深夜里，不知道这时有四点鐘沒有，我睜开眼睛看見在走廊上值班的女工，她的面孔蒼白，带着一付还沒有睡醒的样子站在我的床边。

"您是格利高里耶夫嗎？"

"是。"

"有您的电报。需要签字。同志，請进吧，"她說道，接着有

一双紅軍战士皮鞋小心地踏着地板走了进来，停在門旁。“他是从軍用电台来的。”

我签了字，拆开电报。电报上写的是：“即去阿尔汗格尔斯克，并告抵达日期。罗巴金”。

这封电报无疑問是測量局发来的。但复我电的为什么不是司列普式庚，而是一个姓什么罗巴金的人呢？不是已經和司列普式庚講好了，如果我在雅罗斯拉夫沒有找到卡佳，应該怎样进行下一步的寻找工作嗎？为什么“即去”呢？为什么去阿尔汗格尔斯克呢？不錯，每一次在北海航路进行水道測量工作都是以阿尔汗格尔斯克为主要基地。可是尔同志不是說过我們到北极城会面，北海艦队司令要在那兒批准他的計划嗎？所有这些疑竇不久以后便都消释了。可是，在当时，在雅罗斯拉夫那間狹小齷齪的房間里，我却把蓝紙窗帘掀起了一点来，一遍又一遍地讀这封电报。那种威胁着卡佳，毁灭了我即将看見她的希望的，混乱，模糊，懊丧的感覚愈来愈激动着我。

我什么办法也沒有想出来，就跑到电台去，又拍了一封电报往大魯宾村，邱根区，邱根村苏維埃去，这次发的是加急电。昨天我发的是一封平电，因为我当时只剩下了七百卢布，而要走的路还很远。现在摆在我前面的路可不远了，从卡佳那兒到北方只有一千公里……

自从我在牟城坐了飞机的客艙到现在一共才过了八天。可是在这八天当中，我所見到的事物是那样的多，以至于我的心里仿佛已經拒絕收容这些印象，而只肯收下那些与我的命运息息相关的东西。半年多以来，我所看到的老是一种景色：病房的墻壁，以及墻外加馬河上陌生的烏拉尔城市。可是現在，天晓得这

些景象跑到什么地方去了，跑得无影无踪，幻灭在一縷青烟里了。而向我迎面飞来的是列宁格勒，莫斯科，雅罗斯拉夫这些城市的轉瞬即逝的影象。虽然我説它是轉瞬即逝的，但也仿佛是拍在相紙上的，永志不忘的影象。特别使我永远不能忘掉的是那严以求全的列宁格勒。在它那一扇扇被封閉了的窗眼里潛藏着曠古未有的毅力。还有那座弗斯波里叶車站的夜景，这兒沒有睡眠和休息，只有劳累和战爭的污秽……

我下了火車，便直接到白海区艦队司令部。这才明白：被我埋怨了一路的罗巴金原来是水道測量局的干部处长。这时候我才想起在人民委員会曾經听到过这个姓。他的电报一点也沒有错。在我离开莫斯科之后，北方边境上发生了重大的事件，因此，海軍少将尔同志不得不立刻乘飞机前往任所。因为艦队司令亲自到阿尔汗格尔斯克視察基地，所以他和我在北极城都沒什么事情可作了。尔同志在第三天晋見了司令員。显然那件“极有趣的工作”計划已經被批准了，所以尔同志在晋見首长以后，便立刻乘飞机到迪克逊去了。毫无疑問，他去得很仓促，或者他这次不用我也行，否則，关于我的問題，一定会有指示給区艦队司令部的……

“大尉同志，您来迟了，”这位头发斑白，面貌慈祥的干部处长説道。他留着两撇髭子，很象第一次塞瓦斯托波尔保卫战爭时期的老水兵。“我也想不出現在对你的問題該怎么办好。我們不准备讓你去追赶他們了。”

他于是命令我过几天再来……

我沒有租到旅館，只好在庫斯涅契哈街一位会計的小房子里租了一个房間。我把我的一部分口粮交給了房东作为租金。老会計为了表示感謝起見，一連好几天地对我講会計工作中那些永远講不完的故事。这行工作也有它自己的乐趣和激动人的

地方，主要是表現在准时，定期，和精确得使托拉斯的經理都为之吃惊这些方面。

阿尔汗格尔斯克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虽然它仍然还叫阿尔汗格尔斯克，可是变得完全不象它了！

美国水兵在大街上游蕩。他們戴着有帽纓的帽子，穿着寬脚褲，任意露在褲子外面的羊毛衬衣紧箍在腰上。英国水兵戴着綉有 HMS（皇家海軍）字母的无檐帽，态度比較严肃一些，但是他們那种逍遙自在的样子也和我国水兵迥然不同，这使我感到奇怪。到处都可以碰到黑人，他們的皮肤有的漆黑，有的橄欖黑色；后者大概是黑人和白人的混血兒。在北德維納河上，河堤下面紧临着水的地方，有几个中国人在洗衣服，嘰哩咕嚕地高声說着他們喉音很重、音調低沉的話，一面把衣服舖开，晾在太阳光下的大石头上。

象这般浩浩瀚瀚，充滿着俄罗斯情調的德維納河在世界上似乎还沒有第二条，它自由自在地伸展开自己的軀体，携带着丰滿的河水往前奔流。

小快艇象是一把利刃，割开閃閃的波涛，一直往商港那一边駛去……

这几天，虽然表面上我是怀着强烈的好奇心在观看这些外国人，可是占据着我思想的却并不是他們。阿尔汗格尔斯克曾經是塞多夫·布魯西洛夫居住过的城市。我在梭罗姆巴拉公墓里一个“航海队之墓”前站了很久。这个航海队是由“曾任陆軍中尉，并得过奖章的彼得·庫茨米其·巴赫图索夫領导的。巴赫图索夫因航行中过于劳累和忧虑致疾去世，享年三十六岁”。塔塔林諾夫就是从这兒开始，率領着自己那只帆船走上了遙远的征途。航海长克里莫夫是参加过这次探险，又回到大陆上来的唯

一的人，他就是死在这兒市立医院里的。当地的博物館专門为“圣·瑪丽亚”号探险队开辟了一間陈列室。在許多熟識的展覽物中，我发見了塞多夫的一位朋友，一个姓列的画家所写的回忆录。这些材料都极有意思，而且对我說来，完全是新穎的，其中談到在弗罗拉海岬发現克里莫夫航海长的情形。

早上，我照例写了一封信寄往大魯宾村。后来自己也不知道还应該做点什么事，便信步走下庫斯湼契哈街来。河上弥漫着松树林特有的刺鼻的气味。桥已經拉开了，一只小火輪繞着那望不到尽头的木排，将乘客从桥口这边載运到碼头那边去。不論你朝哪兒看去，到处都是树木。靠近那片矮矮的尼古拉时代的房子的几座窄狹的小桥是用木头架起来的。在这些房子里現在开办了医院和学校。街道是用树木舖成的，河岸上一片富有神話色采的房屋也是用新劈的木板釘成的。这块地方就是梭罗姆巴拉。我終于在这里找到了塔塔林諾夫船长在一九一三年装备“圣·瑪丽亚”号时所住过的屋子。

我設想着这个肩膀寬闊，身材高大，穿着一件白軍服，留着两撇旧式的，往上翘的八字髯的人，他怎样从这座木头小房的台阶上走下来，穿过花园往前走去。他执拗的低着头在听一个姓杰米多夫的商人講話。这人是向他要醬牛肉錢的，要不就是討“成衣費”的。在商港那边，在許多舷側装置着推进輪的笨重的貨船中間，隐隐地可以看到一只輕巧秀丽的帆船。——从阿尔汗格尔斯克沿西伯利亚的海岸到海参崴去，这样一只船未免过于輕巧秀丽了。

一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但对我說来却是十分重要的事情，可怪地使得这些模模糊糊的情景变清楚了。

……昨天到了一支护航运輸队，我跑到布港去看外国船只

怎样卸貨。

啊，这座古老的港口成长得多么迅速！变得多么寬闊，牢固和壮观啊！无数的起重机正在往高高的方垛上面堆放軍用的和非軍用的物資。我沿着碼头走了約摸二公里，可是还沒有走到这些起重机的尽头。港口的修建沒有竣工，还在进行延展工程。我走到尽头停了下来，想好好地看一下这个象一条抛物綫似的，很柔和地圈了一个弯的碼头全景。正在这时，一艘小火輪很起劲地噴着气，繞过一艘船头上写着“哈立克”字样的美国大輪船，开始靠岸。我看了一下船名是“天鵝”；記得当时脑子里还轉了一个念头，覺得这个漂亮的詞兒显然已經成了北方海洋中传統习用的船名了。当年也有过一条同名的船，塔塔林諾夫的朋友和亲人就是乘坐这条船到他的帆船上，和他最后一次拥抱，預祝他“航行幸福和成功”的。这可不可能就是某一篇文章里把它称作“俄国第一艘破冰船”的那个“天鵝”号呢？当然，这不可能是！

一个水手沿着踏板在推一只装着汽油的油桶，我請他把船长請来。过了一会兒，一个二十五岁左右，脸色紅潤，穿着一身朴素的蓝工作服的小伙子走到甲板上来，一面用抹布擦着手上的油污。

“船长同志，我有一个历史問題請教您，”我說道。“您的这只拖輪在革命前也叫‘天鵝’号嗎？”

“是的。”

“它是什么时候下水的？”

“一九〇七年。”

“一直叫这个名字嗎？”

“一直是。”

我向他解释了事情的原委。他以一种含蓄的驕傲神情，把

自己这条船仔細地端詳了一番，彷彿他从来就沒有怀疑过它将在俄罗斯的艦船史上占有自己的位置。說来这似乎有点可笑，不过碰見“天鵝”号这件事的确使我高兴，使我特別振奋。我虽然已經熟悉了塔塔林諾夫船长的生活，可是它的最后一頁始終还沒有揭开。

“事情还沒有結束，”脸色紅潤的青年船长的这艘老拖船彷彿对我說道。“說不定有那么一天，你能够揭开最后的一頁，并且把它讀完呢？”

我第三次来到了干部处长这兒，請求他把我派到团里去，如果不可能的話，那就讓我到北方艦队航空兵首长那兒去听候調遣。

毫无疑問，他已經知道了我的一些公私情况，所以他沉默了一会兒，以温和贊許的神情問道：

“那么你的身体怎么样？”

我回答說身体完全正常。这是实話，或者說基本上是实話。因为我在北方比在南方，比在西方和东方都感到要好一些。

“好吧，在这种时刻，与其沒事閑着游蕩，倒不如讓他們去設法安排使用，”干部处长的話虽說是模棱两可，但却很有道理。

当然他指的是在地面上使用。我眼看着他那只蒼老的，但却很結实的手在活頁的日历記事栏里記下了我的姓，又在下面重重的划了两道綫。我心里立即想：“管他娘的，反正我要飞行。”

3 自由巡猎

一切都非常理想。大尉来到团里，团长介紹他和同志們，和机組都一一認識。領航員銜着一个烟斗，穿着一条寬大的褲子，是一个喜欢沉思，对什么事情都不大在乎的拉脱維亚人。他能頂替已牺牲的亲爱的卢利嗎？

在飞行員当中，大尉看到好些过去他在巴拉紹夫航校时的学員。他和自己的机組一起，住在新造的木头房子的一間寬敞的房間里，墙壁还散发着树脂的气息。窗外的景色使他不由得回忆起在北极圈外一个小城市里度过的青年时代。

他十分惊异地发現許多飞行員都知道他，甚至認为他沒有得到四枚勛章是不公允的（这当然是毫无根据的）。就这样，一切都理想极了。不过实际問題远非第一眼看上去的那么好。比如这位大尉每天晚上都不睡觉，一遍又一遍地讀一封从大魯宾村别雷什金院长給他寄来的信。院长在信上說，据他了解，卡杰琳娜·伊万諾芙娜·塔塔林諾娃-格利高里耶娃在五月間也就是在兒童营到达新西伯利亚之前，便已离营他去了。此外，关于姥姥和小彼加的情形，不知道别雷什金院长为什么却一字沒有提。

另一个实际問題，就是航空兵司令派这位大尉去工作的单位是一个魚雷轟炸团，因此大尉必須从头学习新的技术。

还有一个实际的情况，就是他的信心現在大大地动搖了。他在第一次飞行中就感到自己对北方已經不习慣了，生疏得甚至忘記了这兒和别的地方一向不太相同的“地面感覚”了。

不过，这都不算什么倒楣的事。凡事都有个定数。除了那些不請自来，逃避不开的，无法挽回的事情以外，一切都是可以补救的。

虽然在北方所进行的空中战爭很有趣味，可是我不准备一一細述。在北方飞行，除了一般的困难和危险之外，更加上恶劣的天气，和此地延續达半年之久的北极夜。所以，再沒有比北方更适宜于俄罗斯飞行員显露他們卓越本領的地方了。一位不列顚的軍官当着我的面說过："只有俄国人才能在这兒飞行。"当然，这話未免过誉，不过我們是完全当之无愧的。

在北方作战所遇到的情况，比这次大战中其他空战区复杂得多。德寇的运輸船总是紧貼着高陡的海岸，靠岸极近，在水深刚够的地方航行。要击沉它們是非常困难的，不只是因为击沉运輸船一般都很困难，更主要是因为不可能，或者几乎是不可能从陡峭的海岸进入运輸艦上空。将近一半的向位（一百八十度）我們都无法利用。不信您也可以試試看，只用一半向位去冲击艦艇，同时又要尽可能地低空通过艦艇上空，使投入水中的魚雷能够准确地命中目标，您就知道这样做是多么困难了！加上这些艦船不是坐以待毙，而是和护航的艦只一起，用高射炮、机关枪和主炮的火力全力向飞机射击。在熾热的战斗中，一切早已置之度外，只有紧咬着牙关，向着这座鬧声震天，五光十色的地獄冲去！

如果把我們在恩城生活一絲不漏，逐日逐时叙述出来的話，那么一定会給人一种千篇一律的感覚。老是飞行，講評和演习；其实演习也是飞行。吃飯是在一間很长的木棚里。吃飯的时候，談話也离不了飞行。到了晚上，大家都到軍官俱乐部去，这个俱乐部是我亲眼看見它开幕的。年輕人对俱乐部特别感到兴趣。

刚才他們还冒着生命危险进行魚雷冲击，而現在又来和姑娘們尽情跳舞，娓娓傾談了，轉眼間变得这样輕松愉快，实在是令人羡慕。在这种晚会上，下級女軍官是允許穿便服的。

生活中的这些变化，正說明了它本身并不是单調无味，或者象我們假象中那样千篇一律，相反，它是极不平凡，极为丰富多彩的。我們这时的生活事实上也正充满了种种不平凡的，神話般的奇迹。空战虽然結束了，但是战斗的余音还在漸漸冷下来的身躯里轟鳴，冒着旋卷的风雪在黑暗中飞行，駕着被打伤了的，象篩子一样的飞机在汪洋大海上空飞行。两个鐘头以后，又出現在軍官俱乐部明亮华丽的房間里，一面喝着葡萄酒，一面扯些无足輕重的事——应該怎样看待死亡，才不至于觉察出生与死之間的差异，或者至少是可以不想这种差异呢？不过，关于这个問題，我还只是在头几天里才考虑过。

我上面已經提到，青年人对俱乐部特别感兴趣。可是我們全团除了三、四个象我这样三十岁开外的“老头”之外，几乎全部都是青年小伙子。指揮我們这个团的是一位脸色紅潤的鷹鼻子青年，两只眼睛热情地鼓着。他是苏联英雄，大概刚刚才滿二十四周岁。大家都很随便地称呼他为彼加，不这样也沒法称呼他别的。

我来到北方以后，碰到了許多意想不到的問題。这个耐人寻味的問題也是其中之一。在这次战爭中，新的一代飞行員成长起来了，甚至于有些东西我們还得向他們学习。不知道为什么，一般人总認为在“父子两代”之間一定有一道鴻沟。自然，在我們两代之間不是什么鴻沟的問題，可是多少还是有些差别。比如，我在恩城表現得就不如过去那么小心謹慎，对于各种冒险的事情也总是坦然去干，这不是沒有原因的。

也許正是因为我"年輕"了許多，所以在战爭初期曾經严厉对待过我的命运之神，这次在恩城待我的态度却完全两样了。

我在七月間还經常带着炸弹去轟炸基尔金涅斯；从照片上看来，結果还相当成功。到了八月初，我請求团长批准作"自由巡猎"。这种活动的意思，就是在沒有掌握情报的情况下，到易于碰上德寇护航运輸队的地方飞行。有一次，我和一位中尉双机出动，击沉了一艘四千吨的运輸船。严格說来，这艘运輸船是中尉击沉的。因为我投的一条魚雷距离太近，从船的龙骨下面鑽过，然后偏到左边去了。不过在这次战斗中一切都經受了考驗，其中也包括我那条負伤的腿，这条腿在这次战斗中表現得好极了。尽管大队长（从前在巴拉紹夫航校时，因为他轉弯的动作老是作不好，我差一点把他开除了）在飞行講評会上，以毋容爭辯的明确态度証明，說我正因为这样，所以"才沒有击沉运輸船"。可是，我自己还是感到很滿意的，过了两三天，他又不得不重复一次他的那套論据，因为我这次通过运輸船上空时，飞得更低，甚至将一段天綫卡在飞机的机翼上带回机場来了。不过运輸船这次却被击沉了，这是我的第一次战果。因此，他的那些論据虽然并未失掉自己的完整性，但也只具有一些理論上的价值了。

更簡单一点說，我在八月中旬又击沉了一艘运輸船，这是在一艘护卫艦和一艘驅逐艦掩护下，排水量达六千吨的运輸船。我这一次是和大队长双机出动的，使我大为高兴的是我发現他在冲击的时候，比我飞得还低。不消說，他并沒有因此給自己以警告处分。

我的生活就是如此，总的說来，是很不坏的。到了十月底，艦队航空兵司令授予我以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勛章。

我在恩城已經結識了不少朋友。如口里总是銜着烟斗，穿着肥大的褲子，不爱活动，沉默寡言的領航員就是一个。他是一个聪明、博学的人。不錯，他說話很少，在飞行时更是根本不說話，可是对于“我們現在在什么地方”这个問題，总是回答得极其准确，准确得使我吃惊。他作的进入目标的方法我很喜欢。我們虽然性格不同，但是这不会影响到你去爱一个与你朝夕相处，在飞行和魚雷冲击中共同从事艰苦而冒险劳动的人。假若死神在等待着我們，那么我們也是在同日，同时而死。凡是可能死在一起的人，他們也就有共同的生命。

在恩城和我往来密切的不仅是領航員一人。但这終究还不是我念念不忘的那种友誼。由这个时期开始，我保存了一大堆未发出的信件，这样作不是沒有原因的，我希望战后能和卡佳一起閱讀这些信。

可是就在这时，我的一位朋友，我最眞摯的朋友就住在附近，近得只要坐上快艇，二十分鐘以后，就能拥抱他，对他尽情傾吐我在未发出的信件中想要对卡佳所叙述的一切。

4　医生在北极城服务

……我整夜都在做梦。仿佛又負了伤，伊万·伊万內奇医生弯着腰站在我的面前。我想对他說“阿不拉姆，暴风雪，喝酒”，但是我說不出話来，我又变成哑吧了。虽然我經常作这样的梦，但是那早已忘記的哑巴感覚在梦中能够这样眞实，这还是第一次。

这一天我沒到起床的时間便醒了。在迷迷糊糊的状态中，

对什么都能感觉到，都能知道，但又强使自己什么都感觉不到，什么都不知道。我开始想医生，回想起罗馬紹夫所說的医生去前綫探望兒子的事。我不知道該怎样解释这种現象，但我觉得在这次回忆中，有一种模模糊糊，似乎很久以前就使我不能安宁的事情存在。我逐字地回味他所說的話，于是恍然大悟：罗馬紹夫是說医生在北极城服务。

那次在列車上，我还以为这不过是胡扯罢了。試想，医生能离开那个連牡鹿碰見他都要轉过头来，向他表示好感的城市嗎？他能离开以他的名字为名的那条街道上的家园嗎！他能离开那些称他为"驅虫大师"，远道来向他求教汽爐子在家庭中的作用的涅涅茨人嗎！罗馬紹夫錯了，医生不是在北极城，而是在北地城。

可是这天早上在恩城，連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想："万一他沒有錯呢？"

北地城远在天边，难道一九四一年夏天医生眞的会从北地城跑到列宁格勒去嗎？不过話又說回来了，如果眞是在北极城工作，那我岂不是和亲爱的老朋友比邻居住已經三个月了嗎？……

值班員走进屋来，低声說道：

"同志們，起床吧。"

他看到我一只手在匆匆忙忙地系褲子，另一只手去取椅背上的制服的那付样子，忍不住直眨眼。

妙极了。医生恰好也在这天，在同一个时辰想起了我；他后来認眞地要我相信这一点。他昨天已經看到关于我受勛的命令，起初还沒有想到这就是我，因为"世界上姓格利高里耶夫的人有的是"。可是，第二天快天亮的时候，还躺在床上，他便觉得毫无疑問，这一定是我，所以也和我一样，立刻奔到电話

机前。

“伊万·伊万内奇，亲爱的。”我喊道。这时有一种嘶哑的，令人难以相信这是伊万·伊万内奇的声音，似乎很吃力地穿过这天早上盘旋在科拉湾上空的秋风的呼啸声，传到了我的耳朵里。“我是薩尼亚·格利高里耶夫。您听出是我嗎？我是薩尼亚！”

嘶哑的說話声变成了很有旋律的呼嘯，医生是否听出是我的問題的下文不明了。我疯狂地喊叫着，女电話員体会到我的努力，便轉告我說：“二級軍医巴甫洛夫向您报告。”

“报什么告呀，請您告訴他，說我是薩尼亚。”

“馬上就告訴，”女电話員說道。“他問您今天去不去飞行。”

我感到很惊訝。

“与飞行有什么相干？你对他說，我是薩尼亚。”

“我对他說了你是薩尼亚，”女电話員有点惱怒地說道。“你今天晚上去不去恩城，在哪兒能够找到你？”

“我去！”我喊道。“請他到軍官俱乐部里来。明白了嗎？”

女电話員什么話也沒有說，随后听到听筒里有挪动东西的声音，似乎已經不是她，而是另外一个人在嘟囔說：

“他来。”

我本来还想請医生去政治部看看有沒有我的信件，我已經十天沒有打听来信的事了，而我給柯拉布略夫和瓦里亚留的地址都是北极城政治部。可是后来便沒有听見任何声音了。

知道医生在北极城，知道今天如果不刮暴风的話，我馬上就要見到他，这时心里当然高兴极了。不过，有一件事对我說来始終还是个謎：为什么我到軍官俱乐部先喝白酒，繼而喝紅酒，后来又喝白酒等等。自然沒有喝出什么乱子，特别是艦队航空兵司

令和一位軍事記者在隔壁房間里进晚餐。但几个素日相識的姑娘在每次狐步舞間歇的当兒，不时坐到我的桌旁来，我对她們解释說，假如我会跳舞的話，那我的生活一定和現在完全两样，一定是异常丰富多采的，她們听了这話都笑得直不起腰来了。产生这一切不幸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我生平不会跳舞。

实际上，这話并沒有什么可笑的地方。譬如我的領航員吧，他坐在我的对面，若有所思地吧噠着烟斗，就說我講得很对。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姑娘們都要笑。

我坐在軍官俱乐部里，虽然多少有点伤感，但心情还是很好的。这时門口出現了一位袖口上鑲着銀道，身材高大，上了年紀的海軍，他很小心地从桌子中間穿过来。据我看，这就是伊万·伊万內奇医生。

我可能这样想过：他眞是老多了，背也駝了，鬍鬚也白了！但这一切想法，自然仅仅是一种幻想，实际上他仍然是我童年时代的那位神秘莫測的医生。他把眼鏡推到額头上，向着我走过来，似乎就要拽住我的舌头，或者检查我的耳朵了。

"医生，我想請你去瞧一个病人，"我一本正經地說道。"实在是一个有趣的病例！这人只会說六个詞：母鷄、馬鞍、箱子、暴风雪、喝酒、和阿布拉姆。"

"薩尼亚！"

我們拥抱在一起，你瞧瞧我，我瞧瞧你，又拥抱了起来。

"亲爱的伊万·伊万內奇，我有点醉了，是嗎？"我說。我发現，在他慈爱可笑的脸上掠过了一絲悲伤的暗影。"我們在机場上冻坏了，所以就……讓我介紹一下吧，这位是奥佐林少校。"

"薩尼亚，你到这兒很久了嗎？"医生問道。这时領航員怕妨

碍我們的会晤，随便説了两句話，便告辞出去了。“薩尼亚，我們怎么会这么长的时間都沒碰見呢？”

“三个月了。当然是我的过錯。”

“难道你不知道我在北极嗎？我不是把地址留給卡杰琳娜·伊万諾芙娜了嗎！”

“留給誰？”

大概我脸上的肌肉抽搐了一下，所以他弄了弄眼鏡，带着一种不安的神情瞧着我。

“留給你的妻子呀，薩尼亚，”他十分愼重地說道。“我想她会很健康的吧？我在列宁格勒去过她那兒。”

“什么时候？”

“去年八月。她現在在哪兒，在哪兒？”他移过身来紧靠在我的旁边，不安地眨着眼睛問道。

“我不知道。給你斟点酒嗎？”

我沒等他回答便拿起了酒瓶。

“得啦，薩尼亚，”医生温和地說道。先将他自己的杯子推开，然后又把我的杯子推开。“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訴我吧。你記得沃洛嘉嗎？他牺牲了，”他突然說出这样一句話来，好象为了要証明我現在可以把什么事情都对他傾訴似的。这时他的眼睛在眼鏡下已經泪珠閃閃了。

我們低着头坐在灯光輝煌，人声嘈杂的軍官俱乐部里。乐队演奏着狐步舞和华尔滋舞曲，銅管乐器过分震耳地在这些不大的木結构的大厅里响着。

年輕的飞行員們在客厅和飯厅之間的走廊里高声談笑。这个二十来岁，肩膀寬闊，生着两道浓眉的飞行員也許就在今天夜里，在寒冷平静的海上，在迷蒙的大雾里会撞見死神。死神象主

子似的迈进他的飞机座艙……仿佛有一块巨大的，石头般的，使人感到很不舒服的东西，塞进了我們曾經生活得很美滿的家园里。現在要想不考虑这块石头般的使人不舒服的东西，而能暢快地交談，跳舞和欢笑，那就需要象沃洛嘉那样英勇地死去。

他曾經写过詩，一直到現在，我还記得那四行“通古斯人乔加尔从学校回到家里”的詩。他常常引以自豪的，是莫斯科艺术剧团到北地城的时候，他曾向演員們献花表示欢迎。医生有这么一个兒子，对他說来这实在是幸福，可是現在，老人家垂着头，竭力克制着眼泪，坐在我的面前。

“卡佳到底在哪兒，她怎么样了？”

我把我們失掉联系的情形向他講了一遍。

“天哪，是你的下落不明，不是她呀！”医生惊訝地說道。“是你輾轉在三个海上作战，受了伤，躺在医院里，而不是她呀。她还是活蹦乱跳的一个人！”他郑重其事地說道。“她白天黑夜地在寻找你。她一定能找着你，否則我可就不了解什么是恋爱中的女人了。現在正式斟酒吧，讓我們为她的健康而干杯……”

現在，这些最主要的問題已經談开了。我們已經痛苦地認識到，虽然我沒有找到妻子，又不知道她的生死存亡，虽然医生失去了爱子，可是生活仍要繼續下去，但我們还是始終不能摆脫这些悲慟的思想。最近几年来亲身經受的事情实在太多了，多得連以前沟通我們之間的桥梁，現在也显得脆弱，遙远了。但是，我們有一个共同的浓厚的兴趣，当痛苦的幻影稍一退避，这个共同的兴趣便擠进我們的談話里来了。

当然，这个兴趣指的是北方，我們象两个經驗丰富的老医生，站在病人的床边，談論着如何保卫北方，爱护北方，如何使它

成为世界上最美好，最欢乐，最好客的地方。我对医生談了我的同团战友，談了年輕的一代。虽然他們作战很出色，可是他們很少去考虑北方的未来，至于北方的过去，那他們想得就更少了。

“他們沒有考虑，那是沒有时間，”医生說道。“也許不考虑是对的，”他沉默了一会兒，又加了一句說。

但他不仅沒有証明为什么不考虑是对的，反而大談“那些考虑北方問題的人”，也就是談那些北方本地人的事。

他談到安娜·斯切潘諾芙娜的兄弟。他們过去在运輸船上服务，現在却在猎潛艦上那么奋勇地作战，好象他們从来就是海軍似的。

“不，任何努力沒有白費的，”他归結道。“至于北方的問題，就象門德列也夫所說的那样，是我們房屋的正面；对我来說，这一点从来还沒有象現在战爭期間这么明确！”

应該走了。餐厅里就剩下了我們两个人。医生还沒有睡覚的地方。因而需要早一点兒回到团里去給他搭一个舖。

总而言之，黃昏已經逝去了，这一点是沒有絲毫可以怀疑的。但是天哪，我們多么不干心承認黃昏已經逝去，因为这时我們想要說的話，連十分之一都还沒有来得及向对方說出！但是又有什么办法呢！我們走下楼来，披上軍大衣，那温暖、明亮、微含醉意的世界便抛在背后了，展現在眼前的是象皮鞋油一般墨黑的思城，使人不舒服的，粗野的、凄苦的北风在城里游逛着。

5 为海上的人們干杯

这一带的主要人物是潜水艦的艦員。不仅因为他們在战爭初期比北方艦队所有的单位作的事情几乎都多，而且还因为他們在生活方式上，彼此間的关系上，紧张的战斗活动等各方面的典型特征，給全城的生活盖上了他們独有的烙印。任何地方都不可能有象潜水艦艦員之間那种在死神面前絕对平等的关系；或者一齐牺牲，或者是共同取得胜利。每次的軍事劳动都是艰苦的，但是潜水艦員，特别是“袖珍艦”艦員的劳动更其如此。如果誰想用十次最危险的飞行，来和我换一次“袖珍艦”的航行，那我也不肯干。当我还在童年的时候，就認为在那些潜入深水中的人們之間一定有着某种秘密的默契，就如同我和彼加之間互相立下的誓言一般。

一九四二年八月底，我和一位大尉合力击沉了第三艘运輸船。大名鼎鼎的弗同志的“袖珍艦”在我的协助下，击沉了第四艘。关于这次战斗經过本来是不值得提起的；我当时的炸弹艙已經空了，唯一能办到的只不过是把德寇艦船的座标位置报告司令部。可是弗同志却一定要邀我去共享这只烤乳猪，值得叙述一下的事也是由这只烤乳猪引起的。

誰都知道，海軍里有一个出名的传統，就是每次击沉敌人艦船之后，要举行一次盛大的宴会，在这次宴会上，首长总是用一只烤乳猪来招待胜利的英雄。昨天一艘运輸船，一艘护卫艦和一艘驅逐艦被送到海底見龙王去了。因此，热心的，戴着白帽子

的炊事員端进餐厅来的烤乳猪不是一只，而是整整三只。軒敞的軍官食堂里，桌子摆設成П字形，在П字形横档正中坐着海軍上将——北方艦队司令員。

盘子里盛着令人饞涎欲滴的，烤得嫩嫩的，玫瑰色的乳猪，蒼白的猪嘴脸象是很难过的样子，三位指揮員手握刀叉，站在盘子前面。这是一个传統——胜利者必須亲手将乳猪割成小块。多大的块哇！一大块塡满了蕎麦粥的猪肉，上面撒着一层很别致的芥菜末送到我的面前！必須将它对付掉，才不致得罪主人。

海軍上将举杯站起来。第一次干杯是为了庆祝取得胜利的指揮員以及他們的艦員和空勤組。我看着他，——他曾經来过我們团里，——不由得回想起他昂着头，站着听取团长报告时那种生气勃勃的，青年人的动作。他很年輕，只比我大四岁。我还是在西班牙的时候就知道他了。

为在海上航行的人們……第二次干杯，立刻响起了一片清脆的碰杯声，海軍同志們站在那里，为在北极茫茫黑夜中建立功勋的弟兄們干杯。为了軍事上的順利，为了每一顆心能在危急的，决定性的时刻保持鎮靜而干杯！

这时桌子对面的海軍上将正望着我。我坐在他的右手一群特邀記者的中間。弗同志正在用刀子叉子比划那艘驅逐艦被击沉的情形。海軍上将目不轉睛地望着我，向邻座說了几句什么話。于是，他的邻座，一位艦艇大队的大队长站起来，宣布第三次干杯。他建議为格利高里耶夫大尉干杯，因为他“巧妙地将我們的潜水艦引导到德寇商船队的地区”。于是海軍上将作了一个动作，表示为我干杯……

这天晚上喝了許多酒，我不准备一一列举干杯的次数，何况那些我前面提到过的記者們，已經在期刊上报导了这次“三只烤

乳猪”的盛况。我要談的只有一件事，便是海軍上将令人完全想不到地突然站起来，向門外走去。当他走到我身后时，沒有讓我站起来，他弯下腰对我低声說道：

“大尉同志，請您今天到我那兒去一趟。”

6　遙远的距离

飞机起飞了。霪雨攙合着浓雾，在地面上我們是不把它当作回事的，可是再过几分鐘，它就要成为飞行中的一个重要組成部分了。这次的飞行和所有的飞行一样，分成两部分：第一，是任务；第二，是一切妨碍完成任务的因素。

我們以很小的傾斜度轉了一个弯，便进入航向。

这次的任务，或者象海軍上将所說的“特殊任务”，就是：德国鬼子的一艘袭击艦（显然是艘輔助巡洋艦）窜入我喀拉海，轟击了特港，現正在东部某处騷扰，我的任务就是找到并且击沉它，而且越快越好。因为一支載有軍用物資的我商船队正沿北方海道航行，而且距特港已經相当近了。总而言之，象这样一条大型軍艦，在和平的水区可能造成多大的危害，这一点是不难想到的！

尽管飞机懶洋洋地不肯向上爬，但仍旧不得不爬到五千五百公尺的高空上去。可是在这样的高度上，除了一片仿佛上帝老爷用一把大勺子攪拌过的，混得象鍋稀粥似的，使人泄气的云海之外，仍然是什么也沒有。

問題就是这样——把它找到，并且击沉！前一任务比后一任务复杂得簡直不能相比！后来，等我把海軍上将的地图上的

諾登塞尔特群島东部島屿几乎全部都更正了时，上将感到多么惊异呵！

"你从前到过那兒嗎？"

"沒有。"

他不知道我旣可以說到过，也可說沒到过那个地方。諾登塞尔特群島的地图是战爭前夕由"諾登"探险队更正的。我虽然并沒有到过那个地方，可是塔塔林諾夫船长曾經走过这些地方。所以我在思想上也就成千次地跟随着他周游了这些地方。

伊万·伊万內奇医生說得很对：任何努力沒有白費的！生活就象地底下的暗流，在黑暗中，在漫漫无期的长夜的寂靜中穿行，时而向东，时而向西，时而一泻直下，时而又象我的飞机現在鑽出云团一样，突然进入晴空，奔向太阳和光明，等到冲出来之后，才感到原来力气并沒有白費！

我經常这样想：如果找到了卡佳，如果我們一起住在恩城，那么我在北方的生活又将怎样呢？

那么这天当我飞行前在夜間三点多鐘到家里去一趟的时候，她一定会醒来。她一定是紅暈滿面，暖意袭人，睡眼惺忪的样子。大概我走进来吻她也和往常不一样，她立刻就会明白，这次海軍上将交給我的任务对我說来是多么重要，多么有趣。

这样的想法有过不下千百次了，可是这样的事情有沒有再来的时候呢？

就象从前在薩拉布斯，列宁格勒，海参崴居住的时候一样，我夜里叫醒了她以后，我們就坐在一起喝咖啡。她穿着一件衬裙，为了睡觉方便，头发扎成了辮子。她正默默地看着我，突然又跑到什么地方去了一趟，原来她想起了給我准备的一点好吃的东西——我們两人都爱吃的醉樱桃或者洋橄欖。后来，在

飞行中整个机組都夸奖我的妻子，都吃着洋橄欖和醉樱桃。

这就是我的卡佳。她有着瀟洒不羈和高傲的性格，她有着一种使我至死也将永远迷恋的爱情。可是現在，关于她的情况我除了知道她不在我的身边之外，再就什么也不知道了。哪怕是为了这个原因，也必須把这艘袭击艦找着，必須把它消灭。

“領航員，航向！”

駕駛員的航向和領航員的航行差了三度。等我們把口袋里的烟盒，手电筒，打火机扔掉了以后，航向就很理想地一致了。

我刚才在想些什么呢？我在想卡佳。我在想我現在飞的地方，那兒是我和她曾經准备要去，可是許久也沒有讓我去成的地方。

我当初不也是意識到，毫无問題总有那么一天，我是会坐着飞机到这些地方来的嗎？我不是也曾极其精确地，精确到差不了半度地繪制过这条航綫嗎？这条航綫不就是象我在童年时代一次耀眼的梦中梦到的那样，“圣·瑪丽亚”号的船員們沉重地喘着气，为怕光綫刺伤而紧閉着眼睛所行經的路綫嗎？他們走着，在他們的前面是一个身材高大，穿着毛皮长統靴的巨人……

然而这都是梦中的幻景。我驅散了这个梦。新地島已經不远了。

如果把我們寻找袭击艦的全部过程詳詳細細地叙述一遍，大家一定会感到枯燥乏味。北极海洋的水面处处一样，要在这茫茫无边的海面上寻找一艘經过伪装的，极不显眼的軍艦是十分困难的。我們从一个基地轉到另一个基地，整整飞了两个礼拜。有一次連續飞了七个鐘头。如果飞行的时間短一些也好一点，因为我們这次在喀拉海上飞了两个航向之后，轉航回到新地

島，便差一点沒有找到它，仿佛这些巨大的島屿以前只是被人錯誤地标在地图上似的。后来，我們趁着燃料还够，在新地島上空黑沉沉的浓霧中不断轉圈飞行。总算我們走运，若不是一陣风将这层浓霧刮开了一条不大的亮縫，恐怕我也就不能将这本書写完了。我們赶忙搶到这块空白地方去，迅即关閉油門，便順利地着陆了。

沒有疑問，这都是上帝在生我們的气。有这样的一次，从我們这方面来說是一点兒不对的地方也沒有的，可是上帝讓我們看見的不是一个或两个，而是整整五个太阳。这都是些“假太阳”，是文学中所描述的海市蜃楼。不过，当我們看見这个在我們头頂上悬挂了好长时間的，火紅的十字以后，我們恍然悟解了好些古代宗教方面的故事。

另外还有一次，我們乘着舢板划到鳥市前。只見岩石上落着千百万只羽色黑白相間的北极海鷗，这些海鷗多得竟使将近两海里的海岸上仿佛厚厚地撒上了一层盐粉。海鷗呼喚着，拍打着翅膀，尖声鳴叫。有的失足滑下来，又推开邻近的海鷗落在陡峭的岩石上。在这震耳欲聋的一片喧囂声中，还可以听出个别的叫喚声，这也正如同一个市場，在这个市場上有一些好吵架的婆娘坐在貨車上叫罵。这种恶臭，这种奇异的現象自然只能稍微看一下，最好就赶快走开。可是，偏偏我們的射击报务員不知从哪兒讀到过关于海鷗市长的故事，而且更倒霉的是他发現了两个这样的大鳥单独蹲在一般海鷗之上，以一种煞有介事的神情注視着鬧市的秩序。他放了一枪，打死了一只海鷗市长。我的天哪，为这倒霉的一枪，我們受了多大的报应啊！天也好，地也好，一切全都看不見了！千千万万只鳥兒形成了一股黑白斑駁的暴风，离开了海岸，叫嘯着，冲上了云霄，向我們的小船扑来。

一陣鳥翼搧动的声音，好象强大的瀑布从空中泻到我們头上(如果仅只声音聒噪刺耳也好)。事后，我們費了一天一夜的时間，忙着刷洗舢板和洗澡，甚至在上衣一个扣得很好的口袋里，我都发現落进去了鳥粪。

总之，在新地島的两个星期是十分艰苦的。虽然我心里明白应該到东边更远的地区去搜索这艘袭击艦，可是每次起飞还是抱着极大的希望，总覚得这次或許能找到它。我們在海上不断地飞来飞去，直飞到油料眼看就要用完和領航員冷冷地問我：

"回家嗎?"

我們这才返航"回家"——家就是东一座，西一座险恶的大荒山，和一道道宛若滑入了无底的雪谷中的青幽幽的冰川。

我們結束"新地島的生活"的时辰終于来到了。关于这个美妙的时刻是值得略微詳尽一点講述的。

我当时正站在机庫旁。机庫頂上舖滿了被打死的鳥兒，四壁张挂着海豹皮。两个涅涅茨孩子穿着他們慣穿的闊袖皮衣在海边游戏，活象两只企鵝。孩子的母亲小得象一个小姑娘，爸爸也象媽媽那么瘦小，一顆棕色的脑袋露在鹿皮上衣的外面，我和他們随意地交談着，記得当时談的是国际問題。尽管我分析德寇无可挽救的局势所引用的材料还是从一张很老的"真理报"上看来的，可是，这位涅涅茨人还把它当作新聞，准备今天就去告訴住得比較"近"——总共不过二百公里——的朋友听。他那瘦小的妻子虽然不見得懂得什么政治，却也頻頻地点着她那头发烏黑油亮，剪成了新月形的小脑袋，不断地說道：

"豪，豪。"

"你願意上前綫嗎?"我問男涅涅茨人。

"願意，願意。"

“不害怕嗎?”

“有斯么可怕的,有斯么可怕的?”

就在这个当兒,我看見領航員朝我跑过来。他不是走,的确是从后面放着飞机的小海岬那兒順着海岸跑来。

“轉移基地了!”

“哪兒去?”

“到北地城去!”

他是說到“北地城”去。虽然把我們調到北地城,也就是說,調到我認为应該到那兒去寻找袭击艦的地方,并不是什么不可能的事,可是我这时仍不免大吃一惊!因为这是“我的”北地城!

“这不可能!”

領航員又作出了他平日那种冷冷的,不慌不忙的,地道拉脫維亚人的神情。

“您命令大家检查飞机嗎?”

“不用了。”

“我們什么时候起飞?”

“三十分鐘以后。”

7 重游北地城

从机場去市区的路不是一条普通的道路,而是一条滿栽着杉松的林蔭路。当我看見这一片茂密的,喧嚣的杉树时,不由得想起我的确已經很久沒有到这座城市,到这座象征着我的青年时代,和我一生中对它怀着最大胆的希望的城市中来了。

我沒能立刻找到巴甫洛夫医生所居住的街道,因为在“我

的"那个时期，这条街仅有一所房子，也就是医生的房子。那时候，其他的房子还只在区执行委員会的一紙計划中存在。可是現在，那所我曾經在里面閱讀过克里莫夫航海长的日記，度过了多少个傍晚的小房子，已經隐沒在它周围的高邻之中了。青春时代的傍晚是多么可爱啊！隔壁屋子里的地板被沃洛嘉輕微的脚步踩着，发出了謹慎的咯吱咯吱的声音。医生突然学着鴨子叫了几下，用力地搓着手，高声朗讀他所欣賞的一段書，随后就开始吆喝那只不知道为什么专爱啃他的拖鞋的小刺猬。这时安娜·斯切潘諾芙娜向我走来了。她是一位什么事都可以向她講，都可以信托她的女人。她身材高大，处事果断，待人公允。她默默地将一大块盛在盘子里的点心放在我的面前。

……就是現在她也沒有駝背，沒有向悲痛屈服，只是头发有些白了，下垂的嘴角上挂着两道深深的皺紋。在她的体态和面部表情上，同那些身体健壮的，上了年紀的妇女一样，有着一种男人的气概。

"現在怎么称呼您呢？"她很犹疑地問道。我們在屋前的小花园中碰見后，一同走进餐厅里去。这間屋子和过去似乎完全一样，地板是黃色的，非常洁靜，上面舖着乡下地毡。"那时候您还是个孩子。过了多少年啦？十五年？二十年？"

"才九年，安娜·斯切潘諾芙娜。您还是叫我薩尼亚罢。对您說来，我永远是薩尼亚。"

她一眼就看出我已經知道沃洛嘉的事了，可是她很久都沒有談到他。我觉得她这种用心完全是出于一种善意，免得一見之下，馬上就要我和她共同分担痛苦。我刚要談到一点兒，但她把話岔开了，赶忙說"以后再談吧！"

"您到我們这兒来有什么事嗎？住很久嗎？我看見您身体

很好，心里多高兴！”

“住不了多久，安娜·斯切潘諾芙娜。我們今天就要飞走。”

“哈，成了海軍飞行員，还得过勛章，”因为我是得了勛章的海軍飞行員，她仿佛也和我一起感到自豪地說道。“这次是从哪兒来的？从哪个战綫？”

“这次是从新地島，上次是由北极城来的。就是从伊万·伊万內奇那兒来的！”

“我不信！”

“是实話。”

安娜·斯切潘諾芙娜沉默了一会兒。

“那么，您看見他罗？”

“岂止看見，我們是經常見面的。难道他給您写信沒有提到过这件事嗎？”

“提到过，”安娜·斯切潘諾芙娜說道，我这时才明白，她还知道卡佳的事。

可是，我不需要阻止她的話，就象刚才我一談到沃洛嘉时她阻止我那样。誰能比她更深刻，更强烈地感受到我的忧愁和激动，感受到我无法向任何人道出的一切隐忧呢？她沒有用話来安慰我，沒有拿自己的痛苦来和我的痛苦相比較，她只是拥抱我，吻了吻我的头，我也吻了吻她底手。

“喂，我的那个老头子呢？他身体好嗎？”

“很健壯。”

“現在服役已經老啦，”安娜·斯切潘諾芙娜若有所思地說道。“他在这兒和乡亲們很处得来，不受拘束。六十一岁服兵役，这可不是一件开玩笑的事。我可以把您飞到这兒来的消息告訴这兒的朋友嗎？您的时間怎么样？”

我說，时間可以到晚上。于是她把面包，魚和一杯家釀的葡萄酒（北地城作的葡萄酒味道都很好）放在我的面前，便披上头巾，說了声对不起，就走出去了。

从我这方面来看，答应安娜·斯切潘諾芙娜把我来了的消息告訴朋友們，这确实有点欠考慮。沒有过一个半鐘头，一輛小轎車开来停在小花园旁边，我惊訝地看到我的整个机組都坐在这輛車里。射击員和报务員不知为什么在高声大笑，領航員穿着他那以肥大馳名全北方艦队的礼服褲，和司机幷排坐着，漠不关心地向空中吐着一个个极大的烟圈。

“薩尼亚，列德可夫同志派車来接我們啦，”当我走出来的时候，他說道。“赶快上車去他那兒。我們在他那兒吃点早飯，然后……”

“哪一位列德可夫同志呀？”

“我不知道。一位披着头巾的高个子妇女跑到机場来，說列德可夫同志派車来接我們。她是从区执行委員会出来的。”

“列德可夫？等等……啊，我記起来啦！嘿，一定是列德可夫！”

他就是从前腿上負过重伤，躺在万龙坎屯，由我和伊万·伊万內奇医生駕着飞机去接的那位区执行委員会的委員。他在北方涅涅茨人中的声望，不亚于著名的伊里亚·維尔卡之在新地島。順便还可以說一下，不久前在北极城的时候，医生还談到过列德可夫，說他现在是一个十分果断，干劲冲天的工作干部，他上任几个星期，就能够使一个四处分散的，广大的牧民区全部生活服从战爭的需要。

“同时，”医生說道，“他还关心你找到塔塔林諾夫船长了沒有。你还記得嗎，我們曾經等待着你带着搜索队来，他甚至还到

一些游牧屯去問过涅涅茨人。根据他的了解，有一个氏族还流传着关于‘圣·瑪丽亚’号的故事。”

不难想象到列德可夫是很高兴在北地城这兒接待我們的。我还隐約記得他当时的样子，可是当我看到他远不是一个什么上了年紀的人时，不禁大吃一惊。他那結实的面庞，象是用一块块鵝卵石造成的，唇上留着向前直竖着的中国式的小胡子。他站在区执行委員会門前的台阶上迎接我們。进餐的时候，我把伊万·伊万內奇医生和他在北方艦队的战斗活动講了很久。飯后我們到了木材加工工厂，然后又到新成立的診疗所等地方去了一趟。到处都招待我們吃喝，我也是到处都談伊万·伊万內奇的情況。以至于最后，我自己甚至覚得，如果沒有伊万·伊万內奇参加我們北方航路的保卫战，我們的保卫战就可能会受到挫折似的。

我怀着浓厚的兴趣游覽了北地城。当我离开此地的时候，这座县城刚六岁，如今它已經滿十五岁了。使人一眼就可以断定，它沒有讓这段时間白費，特别是其中还有三年最宝貴的时光献給了战爭。

如果深入观察一下的話，你就能在这距前綫远达二千五百公里的地方，从很多事物中感覚到战爭的气息。港口中虽然仍旧和往年一样，有人在准备出航去喀拉海，但是碼头旁边再沒有那些巨大的外国商船停泊了，再看不到那些乐乐哈哈，大惊小怪的黑人滿城乱逛了。从叶尼塞河，安加拉河，下通古斯河的上游虽然照旧有許多木排向木材市場漂来，木排上依然有烟囱里冒着青烟的小房子，繩索上晾着衣服，給普罗托克的水上村落造成一种和平的气氛。但是，有經驗的人用眼睛一看，就很容易断定，构成这种水上村落的木材根本不是用于和平的。

可是当傍晚我們到达熊谷时，一种絕然不同的情景使我大为震惊。过去，这兒仅有我的一位通古斯族朋友烏达格尔的一所窝棚，可是現在却扩展成了两个大大方方，寬寬敞敞，全是二层楼房的住宅区。我覚得在这些地方，“战前”和“战后”之間似乎搭上了一座桥。我們的生活不仅反映了进攻的活动，而且用和过去同样严峻頑强的干劲兒，在建設北方的伟大事业中，变得更加巩固和坚强了。

起飞前还有一些工作要作，所以我就讓領航員和射击員先回机場，自己同列德可夫留在区执行委員会他的办公室里。

安娜·斯切潘諾芙娜走了。不过我們約好在起飞之前一定到她家里去告辞。

“喂，您坦白地說，”列德可夫說道，“我們那位老头子在那兒怎么样？呃，要知道我們沒有他就象是沒有了手一般。”

“您这說的是什么意思？”

“調回来，讓他复員。他已經超龄了。”

“那可不成，他不肯留在这兒的，”我說，因为我想起了有一次大队长不讓他参加潜水艦的冒险航行时，伊万·伊万內奇多么生气的样兒。“要不就讓他回来休假一次？要他完全脫离部队，特别是在現在这种时候，他是不会願意的。”

我說“現在”是指目前战爭快要結束了的意思，可是列德可夫却把我的意思誤解了，以为“現在”是沃洛嘉牺牲了以后的“現在”。

“是啊，眞可惜沃洛嘉，”他說道。“是一个多么忠厚，純朴的孩子！他还写了許多好詩。你知道，医生曾經偷偷地把他的詩寄給高尔基看过，后来沃洛嘉还和高尔基通过信。我們从高尔基給沃洛嘉的信里选了一句話，作为学校里的标語。”

他把这条标語指給我看，上面写的是："世界上再沒有哪兒的兒童能比你們更苦的了。但是，你們应該用自己未来的工作，使全世界的兒童都成为象你們一样值得驕傲的勇士。"在这句确实是出色的标語上面，画着一个有点象涅涅茨人的高尔基象。

我們坐在一扇寬大的窗口旁边的安乐椅上，从这兒望出去，只見一条条新修的道路，从河畔伸展到大森林地带。木材加工厂噴吐着烟霧，电动拖車在市場附近的一垛垛木材中間穿梭来往。远处是一片深蓝色的处女林……

在我們一句話也不說沉默着的时候，窗外也在进行一种庄严的，无声的談話；这种无声的談話就是从苏維埃人初次进入叶尼塞河这片被人忘記了的土地那一刹那間开始的。

我斜着眼看了看列德可夫。他站起来一跛一跛地(他配了假腿)走到窗前。在他那严肃的兵士的脸上，在微微显得有点兒浮肿的蒙古人式的眼瞼中間，长着一双睿智的眼睛，一陣激动的情緒从他的脸上掠过。我明白了，他是在对这短暫的时刻作一次估价。

"您們作了很多工作，"我向他說道。

"不，刚刚才搞起来，这只是第一步，"他回答道。"战前我們自以为已經作了很多事了，可是現在，我才看見我們在成千上万的任务中仅仅只不过是作了两三項……"

告辞的时候，我問起他不久前出发到涅涅茨人屯子里去的事情，似乎那兒还流传着一些关于"圣·瑪丽亚"号的故事。他是不是真的到那里去过，問过涅涅茨人？

"当然去过啦。这是雅东加族的一个屯子。"

"結果呢？"

"找着啦。"

我这时就象一个十七岁的少年，心里突然咕咚跳了一下。

“都是些什么？”我强作鎮靜地問道。

“不仅找到，而且把那些情节也記下来了。我現在一时想不起来这些笔記放到哪兒去了。”环形的書架上放着許許多多的文件夹和一卷卷的紙，他瞧了書架一眼說道。“总之，大致的情形是这样：很久以前，还在我‘父亲的父亲’的时候，一个自称水手的人来到雅东加族，他是从喀拉海上被冰块撞毁了的一艘猎船上来的。这个水手說，他們获救的人有十名，在泰麦尔北边的一个島上度过了冬季。后来他們就向着大陆走去，但途中他們‘开始大量地死亡’。可是他‘不願意死在一个地方’，所以又繼續往前走。他就是这样掙扎到雅东加人的屯子里来的。”

“他的名字沒有留下来嗎？”

“沒有，他很快就死了。我这兒是这样記着的：‘他来了，說他要活下去。話一說完，就死了。’”

列德可夫的房間里挂着一幀带一角喀拉海的涅涅茨区的地图。我找到了这条熟悉的航綫；——到俄罗斯群島，斯捷尔列果夫海岬，皮亚辛河口……

“雅东加族在哪个区域游牧？”

列德可夫指了一指。其实在他沒有指給我看之前，我已經用眼睛准确地画出这个地区北面的边界来了。

“他是‘圣·瑪丽亚’号的水手。”

“你这样想嗎？”

“讓我們計算一下吧。根据他說的話看来，离船得救的一共十个人。”

“不錯，十个人。”

“克里莫夫航海长带走了十三个人。船上还剩下十二个人。

其中輪机員提斯和水手司卡其可夫二人在第一年漂流的时候犧牲了，所以剩下十个人。但問題还不仅在这里。我甚至以前就能够指出他們所走的道路，而且精确得差不到半度。不过，我那时候还有一个問題不清楚，就是他們到达皮亚辛河了沒有。"

"現在呢？"

"現在清楚了。"

我于是指在一个点上；假如地球上还有塔塔林諾夫船长的探险队的遺迹的話，那么这些遺迹就是在这个地方……

"亲爱的安娜·斯切潘諾芙娜，这实在太不象話了，我在列德可夫那里竟坐了这么久。"夜里，我来到安娜·斯切潘諾芙娜家里，发現她还坐在摆得好好的餐桌前等候我的时候，我連忙对她道歉說。"可是現在又該走了。讓我好好地吻吻您再走吧。"

我們拥抱了起来。

"您什么时候回来呢？"

"誰知道呢？也許明天，也許永远也不会回来了。"

"'永远'，我知道这是一个很可怕的字眼兒，"她叹了一口气說，并且給我划了个十字。"您不要这么說吧。您还是会回来的，而且您会十分幸福的，連我們这些老人也还要托您的福哩。"

……深夜，——只有看了表以后才能猜到这已是深夜，我們从北地城起飞了。鮮紅的太阳高高地挂在天上。鵝毛般的白云象从一个巨大的火車头里噴出来的煤烟，奔馳着，迅速地增长起来。

我这时是不是在想我毕生所期待的一天总算来临了呢？沒有！我刚才沒有参加机組检查发动机的工作，我这时是在耽心，不知道这次检查工作是不是作得彻底。

8 胜　利

我們在深夜两点鐘起飞，四点半的时候，便击沉了那艘袭击艦。不錯，我們并沒有亲眼看到它沉沒的情形。但是它被我們的魚雷击中之后，正如海軍同志們常說的那样，就开始"騰云駕霧"了，也就是說它失去了速度，被云霧般的蒸汽籠罩了。

总的說来，这件事情发生的經过大致是这样的。袭击艦航行时那种泰然自若的姿态，使我和領航員之間发生了一場短暫的爭执（这場爭执最好是不要写在这本書里），我們爭的是这条軍艦是不是北方艦队的。当我們肯定了它不是的时候，于是我們就象我的这位領航員所要干的那样，首先离开它。然后一个急轉弯，进入目标航向。

可惜我不能把我为了把魚雷发射得尽可能准确起見所作的，相当复杂的飞行綫路描繪出来。这是一个相当完整的8字。同时，我还在交叉点进行了两次冲击；第一次冲击沒有成功。然后我們开始"爬"开，这样說一点也不假，因为德国鬼子并不是坐以待斃的，这一点很快就得到了說明。

在第一次进入时，射击員就嚷道：

"座艙里冒烟很厉害！"

在我第二次进入时，又听見三下强烈的打击声。可是这时我正咬紧了牙，向着袭击艦猛扑，所以根本沒有时間来考虑这些事情。而現在，我可是有足够的时間来証明飞机被打坏了。汽油在漏，潤滑油也在漏。若不是領航員及时地使用了一件新鮮玩意兒，恐怕我早已烧焦了。右边的一台发动机在目标上空便

已經从低距轉为高距①，后来进入极高的——簡直可以說是巨大的高距。

当然，我們带有救生船，可以命令机組跳伞。但是，我們曾經在阿尔汗格尔斯克近郊一个平靜的內湖中試驗过这些救生船。就那样，我們从水里鑽出来的时候，还冻得象落水狗似地直打哆嗦。可是在这兒，在我們身下的却是盖着一层碎冰碴子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冰海！

我不准备把我的机組成員关于飞机状况所作的簡单报告一一列举了，因为这些报告很多，比我所願意听的多得多。在我听了其中一次痛心的报告之后，領航員問道：

“薩尼亚，我們还要坚持嗎？”

不坚持能行嗎！我們鑽入云层，我看見我們的飞机投在下面彩虹的双环中的清晰的投影。遺憾的是飞机正在下降。从我这方面可以說是沒有絲毫过失。飞机猛然疾速地往翼側傾斜，如果世上眞有死神的話，那么无疑問地，我們能在这垂向大海中去的机翼上看到死神的面貌。

……我自己也不知道怎么作的，但我終于使飞机脫离了险境。为了减輕飞机的負荷，我命令射击員扔掉机关炮的托盘。十分鐘之后，机关炮也翻着斤斗落到茫茫的大海中去了。

“薩尼亚，我們还坚持嗎？”

当然要坚持！我問領航員距海岸还有多远。他回答說不很远，再飞二十六分鐘左右就到了。自然，这是撒謊，他不过是为了鼓舞我罢了；到海岸至少还要飞三十分鐘。

在我的一生中，象这样一分一分地数时間并不是第一次了。

① 低距，高距均为发动机的工作状态，决定于螺旋桨叶的位置。——譯者注。

有时我遏制住恐怖，絕望而憤恨地数着一分一分的时間。有时它們象是沉重滚圓的大石头横亘在心里，我焦虑地等待着，等待着什么时候又有一块难熬的石头——一分鐘——落下去！

这一次，我并沒有靜坐等待。我象发了疯一般，兴奋地鞭策着时間老人，推动它赶快前进，由于这种疯狂和激动，我的心中甚至产生了一种可怕的幸灾乐祸的快感。

“薩尼亚，我們能支持着飞回去嗎？”

“当然，我們能飞回去的！”

我們眞的飞到了。在距海岸一公里半的地方，我們連看一看海岸也来不及，便一头栽到水里去了。說来也奇怪，我們这一下子并沒有沉底，正好落在浅滩上。然而祸不单行，这时又涌来一陣冰浪，頓时把我們从头到脚浇了一頓。新聞局下一期的战訊里将会报导說“我机一架未返基地”。但这陣陣的冰浪，和我們掙扎到海岸上来以前飞机所受的整整一个鐘头的折騰，以及千万种新的劳累和忧虑与这个短短的句子比較起来，該有多少丰富的內容啊！

为什么我断定这是米登多尔法湾，并据此推断，我們降落在离人烟很远的地方了呢？我自己也不知道。当我們在海上飞行时，領航員已經沒有心思去进行各种計算，唯一使他感到兴趣的只有航向，那就是飞到海岸上去的航向。

現在，因为我命令先把飞机固定起来，所以他仍旧沒有功夫去进行計算。我們不停地工作，直到一个个都累倒在干燥的海岸上，倒在被太阳晒热了的一些石头之間了。我們靜靜地躺着仰視天空，天空洁净，辽闊，沒有一点云影，也沒有一点雾絮。我們每个人都在想着自己的心事，而每个人的心事又决定于一个

共同的感覺："胜利"。

我們躺着，一点兒力气也沒有了，就連弹去脸上的沙粒都感到吃力，听任它在太阳底下晒干，一块一块地自己掉下去。胜利了。擱在領航員胸脯上的烟斗早已灭了，他突然大声打起鼾来，烟斗滑落到了地上。胜利了。除了仰望着充滿了蔚蓝色的，无限威力的天空，感受着手掌下面温暖的鹅卵石之外，再也不需要什么了。胜利了。

一切都是胜利，甚至想吃东西也是胜利。安娜·斯切潘諾芙娜塞給我在路上吃的夹餡面包放在飞机上，可是我实在沒法子命令自己站起来去取它……

我們检查飞机的經过是不值得多談的。射击員报告的发烟原因，显然是由于一顆炮弹在座艙里爆炸所造成的。如果不算这一、二百个弹孔的話，比起我有时駕駛回来着陆的一堆烂鉄来，这駕飞机的外表还是挺不錯的。可是它有一个缺陷，那就是再不能飞行了，并且以我們現有的器材，是不可能把发动机修理好的。

我們吃了一頓丰盛的午餐：第一道菜是奶粉，巧克力糖和奶油作成的湯，第二道菜还是湯，只不过是干湯而已。在吃飯的时候，大家决定：

一、将飞机在原地固定起来。因为飞机深深地栽进了沙"錨"地，反正我們是无力把它弄到又陡又高的海岸上去；

二、射击員留下看守飞机；

三、出发找人援助。

我还忘了說一件事：当我們在海上掙扎飞行时，似乎是无綫电員发現岸上有一个又象是房子，又象是一座高高的木架子般的东西。可是，等我們把飞机滑近岸边时，这件东西便隐蔽在拐

角的后面，看不見了。可能这是一个航海标志，也就是一座很少有船只来光顧的濱海建筑物。所以，我們离开这兒是沒有什么好处的，不过万一不是呢？

不过，也可以哪兒都不去。吃罢飯以后，选择一块背风的，舒适的地方，重又躺在石头中間休息休息，一面观賞着漂浮过去的淡靑色冰块，海水閃閃发着光，潺潺有声地从冰块上淌下来。可惜收音机坏了；頑强的无綫电員无論怎样摆弄它，它还是象块頑石般的哑不作声。

总之一句話，不管怎样都应該走。走到哪兒去呢？很明显，应該朝那个航海标志走，因为它可能是电汽灯塔，也可能是防霧报警台，或者是其它类似的东西。

"但首先应該弄淸楚，我們現在是在什么地方？"我向領航員說道。

过了至少有一刻鐘，他方才答复了这个問題！誠然，他說的座标位置，并不是列德可夫問我塔塔林諾夫船长探险队的遺迹在什么地方时，我所指的那一点的座标。

可是領航員所說的座标和我在列德可夫的地图上所指的那一点相距是那样近，使我不由得向周围观看了一下，会不会就在这咫尺之內，就在那块大石头的后面看見船长呀……



第十部　最后一頁

薩尼亚·格利高里耶夫述

1　謎　底

如要詳述找到塔塔林諾夫船长的探险队的經过，恐怕还得写一本書。說实在的，我掌握的材料很多。大家知道，从前有一位名叫居蒙-居維勒①的法国航海家，当他还小的时候，便以惊人的精确度指出了他将在什么地方找到拉彼魯茲②的探险队。但我現在掌握的材料比他多得多。比起他来，这件事对我甚至更容易一些。因为塔塔林諾夫船长的一生和我的生活紧相交錯，

① 居蒙-居維勒（1790—1842），法国航海家，环游世界两次，到过南极。——譯者注。

② 讓·法朗涉·拉彼魯兹（1741—1788），法国航海家，因船舶遇險遭难。——譯者注。

根据这些材料所得出来的結論最終是旣关系着他，又干連着我。

假如关于塔塔林諾夫船长回到了被他命名为“瑪丽亚島”的新地島这一点再沒有什么异議的話，那么，他所走的道路便是这样的：在86和87子午綫之間，从緯度79°35′出发，向俄罗斯群島和諾登塞尔特群島前进。后来，大約經历多次漂泊，便从司捷尔列果夫海岬向皮亚辛河口走去；那位涅涅茨的老人就是在皮亚辛河口发現了一个放在雪橇上的小船。然后他們又朝叶尼塞河行进，因为叶尼塞河是可能遇到人和得到拯救的唯一有希望的地方。他从濱岸島屿的外側，可能是保持直綫前进的……

我們找到了这支探险队，也就是說，这支探险队所遺留下来的东西被我們找着了。我們的飞机曾經多次在这个地区上空飞行过，将旅客和邮件送到迪克遜，把机器和貨物运到諾尔德維克，不断往返地运送那些寻找煤矿，石油和鉄矿的地質勘探队。如果塔塔林諾夫船长現在能够到叶尼塞河口去看一看的話，那他定能遇到几十艘巨大的海船。在他曾經从旁边走过的島屿上，他現在可以見到許多电气灯塔和无綫电灯塔，大雾弥天的时候，他还可以听到为船舶指路的电动霧笛的响声。如果他沿叶尼塞河溯流而上，經三、四百公里，他还可以看到那联結着杜金卡和諾里斯克的极地鉄路。在那油田的周围，在矿山和伐木厂的周围，他将看見許許多多新近涌現的城市。

我在前面已經談到过，我一来到北方后，便开始給卡佳写信。放在恩城的这些未发出的信件有一大捆，我怀着一个希望，准备在战后我們一齐来讀这些信。这些信成了一种不是給自己，而是为了給卡佳看的类似日記的材料。我現在仅把日記中有关发現駐营地的几处摘录下来。

一，“……意識到生活已經十分接近从前我認为是无限遙远的地

方时，我感到万分的訝异。这个地方距一条极大的海路只有咫尺之遙。你說你的'父亲之所以没有被找到，唯一的原因只是因为没有人寻找过'，这个說法完全正确。在灯塔和无綫电台之間，用木头杆架設了一条电話綫，而且不是临时的，是一条永久性的电話綫。南面十来里的地方正在开矿。所以，这块宿营地即使不为我們发現的話，再隔一段时期，矿工們也会撞到这兒来的。

"……領航員第一个从地上撿起一小块帆布。这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呢！海边可以撿到的东西多着呢！不过，这是一条用来套車拉雪橇的帆布纜繩。后来，射击員又找着了一个鋁制鍋盖，一个压扁了的白鉄盒，里面装着几卷麻繩。于是，我們把从小丘到山脊之間这块洼地分成几个方块，每人在自己的方块內……

"我在一本什么書上讀到过，說科学家能够依据石头上所刻的銘文，推断出在我們紀元前便已經湮没了的国度的全部生活。現在，这块地方就是这样逐漸在我們眼前复活起来了。我最先看到这兒有一只用防水布作成的小船；說得更正确一些，当我們看見一个压得扁扁的，象张薄餅似的东西歪歪地翘在被冲刷过的地面时，我最先認出它是一只船，而且是放在雪橇上的一只船。船里放着两支枪，一张皮子，一个六分仪和一具野外望远鏡。所有这些东西都已經生銹霉烂，长滿了苔癬植物。野营倚着山岬，屏挡住海水，我們在山岬附近找到了許多各式各样的衣服，以及一个摊开的牡鹿皮作成的睡眠套。很明显，这兒曾經有人搭过帐篷，因为搭帐篷的木头和峭岩正好形成一个封閉的四方形。我們在这間'帐篷'里找到一只装食物的小簍子，代替門鎖用的帆布碎片，几只羊毛袜子，和一床带淡青色的白被子的碎片。我們还发現了一柄斧头和一根'釣竿'，——在細繩的一端系了一个用別針作成的釣鈎。'帐篷'的附近零乱地散置了一些东西——酒精灯，湯匙，和一只木箱子。箱子里装了許多杂七杂八的东西，和几根粗壮的，也是自制的帆布針。在某些物件上还可以辨認出'圣·瑪丽亚'号猎船的圓图章，或者'圣·瑪丽亚'号的字样。可是，这个营地却完全是空的——既没有活人，又没有死人。"

二,"……这是一台自制的行軍厨房，是在白鉄罩里放一个带盖的水桶作成的。通常在这样的桶下面装一个爐底，燃烧狗熊或者牡鹿的脂肪。可是，在这个洋鉄罩里安装的却不是爐底，而是一只常見的汽爐子；我摇晃了一下，发現里面居然还有煤油。我試着打了打气，煤油竟細細地噴散出来。我們在旁边还撿着一盒罐头，上面写着'小俄罗斯菜湯。一九一二年圣·彼得堡維霍列夫工厂制'。誰要願意的話，滿可以启开这盒菜湯，用这只在地里躺了将近三十年的汽爐子把湯烧热。"

三,"……經过多次毫无結果的探寻之后，我們便順着去加尔契赫的方向回到营地。我們这次是从东南走来的。所以，过去一直被我們認为是单調的波涛起伏般的山巒，現在完全变成了另外一种意想不到的形状。这是一个巨大的斜坡，往前漸漸轉成了石質的冻土带，被許許多多宛如人手掘成的极深的狭谷所分割开。我們沿着一个这样的狭谷走着，起初，誰也沒有注意那两块大圓石之間的一堆已半倒塌了的浮木。木头并不很多，約摸有六根左右，可是其中有一根是鋸过的木头。木头用鋸鋸过，这一点使我們感到万分惊詫！我們以前一直認为营地是設在陡峭的山岬和丘陵之間的。然而营地是可以迁移的，我們很快就証实了这一点。

"要把在这个狭谷里所找到的东西一件件地数出来，即使是大致地数出来都是很困难的。我們撿到了手表，猎刀，几根滑雪棍，两支'列明东'牌的单銃猎枪，一件皮坎肩，装着一种粘粘糊糊东西的烟斗。我們找到了一个快要霉烂了的，装有胶片的袋子。最后，在一个最深的狭谷內，我們发見一座帐篷。为了不致被暴风刮跑，帐篷下的边緣上压有浮木和鯨魚骨头。就在这座需要用斧头才能把它从冰块里砍掘出来的帐篷下面，我們找到了我們所要找的人……

"还可以推測出他临死时的姿态——他的右手摊在一边，直挺着身子，仿佛是在側耳聆听。他俯臥在地上，我們从他身下的一个小皮

包里找到了几封他的訣別書。他无疑是希望这几封訣別書能在自己躯体的庇护之下更好地保存下来。”

四，“……关于我們能否看到他的这一点，过去本来是不会有，也不可能有希望的。可是，在死亡还没有被証实，在我没有亲眼看到他的死亡之前，这一天眞的想法却一直在我的心里閃耀着。現在，这思想熄灭了。可是另外一个思想又灼灼生光地燃燒起来：我寻找他并非偶然，也不是徒劳无功的；他并没有死，他也不可能死。一个鐘头以前，有一艘輪船开到电气灯塔旁边。海員們摘下帽子，将一具被霉烂的帐篷残屑罩着的棺材抬到船上。礼炮响起来了，輪船上降了半旗志哀。只有我一人还在这空漠的‘圣·瑪丽亚’号的宿营地上徘徊，在給你——我的朋友，我至亲的卡佳写这封信。我現在多么想和你在一起啊！这場英勇的爭取生存的斗爭結束快三十年了，可是我知道，对于你說来，他只是在今天才故去的。我現在仿佛是在火綫上給你写信，所写的是战斗中牺牲了的朋友和父亲。一陣陣悲慟和为他而驕傲的感情激动着我，面临着这永垂不朽的景象，我的心几乎要停止了跳动……。”

2　一件最不可思議的事

“我現在多么想和你在一起啊”，——我一遍又一遍地反复咀嚼这几个字。我覺得这些話是那样寒冷，那样空虛，就仿佛是在一間空虛而又冰冷的房間里和自己的影子在說話似的。我所需要的不是这部日記，而是卡佳，是活泼，聪明，温柔可爱的卡佳，是那相信我，热爱我的卡佳。在安葬瑪丽亚·瓦西里耶芙娜的时候，她扭轉身去不理睬我的态度使我受了很大的刺激，我曾

經幻想着要象牛虻那样回来見她，把所有証明我沒有錯的物証抛在她的脚前。然后，我又使她的父亲揚名天下，使他成为民族英雄。不过对卡佳說来，他仍然是父亲。除了她，还能是誰应該第一个知道我找到了她父亲的消息？除了她，还能有誰会对我說，假若我們所相信的神話还存在在世界上，那么一切都会美滿如意呢？我遍尝了战爭的忧虑，劳累和变乱，終于找着了他。迷迷蒙蒙的北极的幻景曾經照耀过我在不会說話时期的，茅塞半开的天地，可是我現在已經不是那个为北极的幻景所激动的孩子，也不是一个象年輕人慣有的那样固执己見的少年，而是一个飽經滄桑的成年人了。我站在那必将載入俄罗斯科学史中去的自己的新发現面前，感到驕傲和幸福。可是，我却无法抑制住心头的哀痛，因为所有这一切本来完全都可以不至于这样的！

我在一月底方才回到团里。第二天，北方艦队司令召見了我。

……我永远忘不了这天早晨，倒不是因为这天早晨的那种魚肚白色，同时又是气象万千的霞光使我感到它似乎是宇宙間第一个早晨的原故。在边疆的北极一带說来，这是一种特有的感覚。可是，当我抽罢烟，和艇长閑談了一会兒之后走到甲板上，佇立在沉甸甸的，被撕得稀碎的迷霧中时，我的胸腔仿佛是被一种期待着某种奇迹出現的感覚压迫着。霧靄忽而飄上甲板，忽而逸去。就在那极不規則的霧絮中，一輪圓月带着垂直发射出来的毫光，在群山之上慢慢探出它的脸来。后来，它变得愈发皎洁，好象是战胜了周围的一切，但却因此而疲憊，蒼白了。这时大家才发現，原来我們是面临着黎明前的玫瑰色的天空在行进。又过了几分鐘，月亮在飄浮的，正在溶散的霧气中最后一次地閃露了一下。于是，在科拉湾的上空便开始了一个青幽幽的，粉紅色的，披雪的黎明。

我們駛入了港湾。一座同黎明一般洁白的，粉紅色的，披雪的城市便展現在我的眼前。

小城象是被故意擺設在銀灰色的高坡上，为人一覽无余，山坡上閃露着花崗石美丽的光芒。一幢幢白净的小楼房成直綫地排列着，一排比一排高，石級从楼房两側的台阶向各方伸出去。在紧临港湾的地方，是一些修建成半圓形的高大的石砌房屋。后来，我才知道这些房子就叫做环形屋。它們仿佛是用巨大的圓規画在叶卡杰琳娜湾上的一个半圓。

我登上了一节由横跨在这些房子之間的拱門下通过的高梯阶，从港湾的一岸看到了对岸。清晨那种曾在我心中时而翻騰，时而平靜的，莫名的激动情緒，又极其銳利地向我袭来。港湾沉浸在一片暗綠色中，它是那样幽深难透，只有晴空的光芒使得它稍稍在顫抖。在为海岸密封着的天地里，有着一种极其遙远的南国的情調，令人想到了高加索从山环抱中的湖泊。可是，对面却是向远方迤邐开去的，被冰雪封鎖着的小火山，在这一片雪山耀眼的背景上，只有个别地方显露出几株不大的树木的細长黑影。

我是一个不迷信預感的人。可是，当我站在环形房屋旁，陶醉于北极城和叶卡杰琳娜湾这般明媚的风景时，我的脑海里不禁油然浮現出了"預感"这个詞。这座城市給我的印象就仿佛它是我的故乡，是我梦寐以求，寻訪多年未遇的故乡似的。我怀着欢欣的心情暗自思量，这兒一定会发生一件对我非常有利，甚而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事。

司令部里一个人也沒有，我是在上班之前来到的。夜間值班員告訴我，据他了解，上級是命令我十点鐘之前到达，可是現在才七点半鐘。

仿佛是因为現在才七点半，这反而更好似的，我无緣无故

地松了一口气又走出来，仍旧从环形房屋的拱門內眺望港湾的景色。

在我去司令部这一会兒工夫，一切全都变了：在灰暗，森严的海岸中，港湾現在也变得灰暗森严了。在极远的地方，有一艘扁平的小火輪慢騰騰地向着北极城移动。我很想仔細地瞧一瞧它怎样靠岸，所以便轉到了另一条梯阶上去，这条梯阶拐了一个弯，联通着一个寬闊的平台。

这是往来于穆尔曼斯克和北极城之間的两条客輪之一。船上的旅客已經在甲板上排好了队，等待检查員检驗証件。在走上岸来的几个海員中，夹杂着几个老百姓模样兒的人，甚至还有三、四个携籃提包的妇女……

从前有一个时期，我为了躲避卡耶尔·庫里，便跑到沙河和静河汇流处的碼头上，长时間地观看碼头上的生活。輪船駛近了，船上飞起一根纜索，水手熟練地将纜繩一圈一圈地盘卷在歪斜的柱子上。碼头上顿时涌現出許許多多的人，把碼头压得似乎都显著地往水中下沉了。在这群熙熙攘攘，衣冠講究的快乐的人群中，我和誰也沒有关系。后来我无論在什么时候，看到旅客到站那种欢乐的，忙碌的情景时，必然就有一陣被弃的，孤独的感覚回到我的心头。这些印象无疑也就是从那令人伤心的年代留下来的。

可是这一次，可能因为船到的时候是在冬季，情况完全另一样，而且上岸的人也是另一类人，是一些滿怀心事的軍人，所以我沒有产生这种感覚。

說来也奇怪，同这天我在北极城中所看到的一切景物一样，这条老旧的輪船，挤滿了甲板的，不慌不忙的旅客行列，以及那些沿着海岸走到一座小屋子里去登記出差的三三两两零星的人

影，都給我一种愉快的感覚。所有这些事物都和我所期待的，生命中最美好的事关联着，至于它們怎样关联，和为什么关联，我却无法解释清楚了。

現在去司令部还未免太早，所以我就信步去找医生，不过不是到医院，而是到城里他寓所里去找他。

当然，他也是住在这些排列成直綫，一排比一排高的，白净的屋子里的。从海上看去，我覚得这些屋子更精致，更漂亮了。这兒是第一排，而我所要找的是第五排，第七座房屋。

我象涅涅茨人一样，一边走，一边想着眼里所看到的一切。英国佬們戴着一种很滑稽的，象我們的馬車夫所戴的冬帽，穿着保护色的大披衫，他們赶到我的前面。我暗自想道，从他們穿的这些大披衫可以看出，他們对我們的冬天是不会有好感的。一个一本正經，胖呼呼的男孩穿着毛茸茸的白皮袄，肩上扛着鉄鍬，一位滿面鬍鬚的海員抱起他走了几步。我心里暗想道，这可能是因为北极城兒童很少的緣故。

第五排的第七間屋子和它的左右两边任何一間屋都沒有絲毫区别，只不过这兒的阶梯已冻成一块眞正的冰場，冰层下面隐約地可以看出一坎一坎的梯級。我一气蹦上台阶。这当兒，从里面走出几个海員，我和他們正撞了个滿怀。他們中的一个人小心翼翼地滑过冰場，一边說，“不会在北极的黑夜中辨明情况，那就說明是缺乏維他命”。这些人都是医生。所以毫无疑問，伊万·伊万內奇也一定是住在这間屋子里。

我走进門厅，推开一扇門，接着又推开一扇門。两个房間里都空空的沒有一个人，屋子里充滿了旱烟味，床上的被子被人睡过以后还沒有叠，东西到处乱扔着，十足表現出男人居住的作风。同时，在两間屋子里都带着某种好客的情調，仿佛是主人故

意将門敞开的。

“有人嗎？”

根本沒有必要問这一声。我又走了出来。

旁边站着一个女人，她撩起裙緣正在用雪揉擦她那双光脚；我向她打听这間屋子是不是七号。

“您找誰呀？”

“找巴甫洛夫医生。”

“他大概还在睡覚吧，”女人說道。“您繞到后边去，那就是他的窗戶。多敲一敲！”

敲医生家的門当然要比敲窗戶容易一些，但是，不知为什么我却听了她的話，走到窗前去了。这座房子修筑在斜坡上，所以，屋后的这扇窗戶离地相当低。窗戶冻上了一层霜花，可是在我輕輕地叩了两下之后，用一只手将眼睛略微遮着，往里面仔細观望时，我隐約看到了一个女人的身影。这个女人似乎是弯腰在翻弄一只提籃，或者是一只箱子。当我叩窗戶时，她直起腰，走到窗戶边来了。她也和我一样用一只手打起眼遮向外看。透过霜花的碎屑，我在模糊的玻璃中看見一张象霜花一般零碎不全的脸孔。

妇人的嘴唇顫动了一下。她什么也沒作，只是顫动了一下嘴唇。凝滿了雪花，暗淡无光的玻璃挡住了她，使人很难看清她的样子。可是我却認出了她。她就是卡佳。

3 她就是卡佳

怎样才能表达出我們相逢时最初一刹那的，那种如醉如狂

的情景呢？我仔細看着她的脸，狂吻了一陣，又仔細地看着。刚問她两句話，又打断了自己的問話，因为我所要問她的事情仿佛已經是很早很早以前，一千年前的往事了。她虽然在列宁格勒受尽千辛万苦，挣扎在飢餓綫上，并且失去了重見我的希望，这些事情不管多么令人寒心吧，但是这一切究竟已成为过去了。而現在，她又站在我的面前，我可以拥抱她。天啦，这簡直令人不敢相信啊！

她的面色蒼白，淸瘦，在她那失去了昔日严峻的神情的脸上，显露出了一种新的东西。

“卡其加，你剪了头发了！”

“早就剪了，还在雅罗斯拉夫生病的时候就剪了。”

她不仅剪短了头发，而且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不过現在我不願去想这些事，周围的一切，包括我們，也包括这間屋子，都象飞起来了一般，向一个地方飞去。这間屋子和刚才那間就象两个近邻似的完全一样，里面乱放着一些东西，当我敲窗戶的时候，卡佳弯腰从里面取东西的她的那只箱子敞着盖。屋子里还有医生，原来他一直就站在屋角里，用手巾抹着鬍鬚，后来，他輕手輕脚地正要往外走，可是我沒放他走掉。不过这时主要的，最主要的事情（我怎么老爱忘掉它！）就是卡佳現在是在北极城！卡佳出現在北极城，这是怎么搞的呀？

“天哪，我还每天給你写信哩！我們在莫斯科前后就差了一个鐘头。你到瓦里亚·朱可夫家去的时候，我正巧在阿尔巴特排队买面包。”

“这簡直是不可能！”

“你給他留下了一封信，我当时就跑出来找你，可是到哪兒去找呢？誰能想到你会跑去找罗馬紹夫啊！”

"你从哪兒知道我到罗馬紹夫那兒去了呢?"

"我什么都知道,全知道! 我的亲爱的!"

她吻着我。

"我把一切的經过全都告訴你。"

她于是叙述了吓得半死的維什米尔斯基怎样到处寻找伊万·巴甫雷奇,对他說是我把罗馬紹夫逮捕了。

"不过,这位海軍少将尔同志又是誰呢? 我写了一封信請他轉給你,后来又給他本人写了一封信,可是什么回信也沒有收到!你那时还不知道自己会到这兒来嗎?为什么一定要我写信請他轉給你呢?"

"因为我沒有自己的通信地址……我离开莫斯科后便寻找你去了。"

"哪兒去了?"

"去雅罗斯拉夫。我到了雅罗斯拉夫。接到任命的时候,我都准备要去新西伯利亚了。"

"你到这兒后,为什么不給柯拉布略夫去一封信呢?"

"我不知道。我的天哪,难道这真的是你嗎? 你真是卡佳嗎?"

我們依偎在一起走来走去,不断地碰着地上的东西,我們总是一个接一个提問为什么,为什么。这些个"为什么"是那么多,就如同那将我們在列宁格勒拆散,使我們在莫斯科两条邻近的街道上錯过,而現在又在我还是初次刚刚来到的北极城中,甚至在半小时前还不能設想到我的卡佳是在什么地方,使我們碰到一起的那些原因一样的多。

关于我找到探险队的消息,她是从中央机关报紙上塔斯社的通訊中看到的。她和医生联系了一下,他便协助她領到了来

北极城的护照。然而，当时他們幷不知道往哪兒給我写信。不过，即使知道的話，他們的电报和信件也未必能够寄到塔塔林諾夫船长的宿營地来吧！

医生出去轉了一趟，然后带回一壶热茶来。他的这一举动虽說沒有把一切向前飞去的那种速度終止，但好歹总算使我們幷排坐到沙发上了。他端出一些硬得象生鉄一般的面包干来請我們吃。后来他又拏来一罐炼乳，說了一些关于食具不好的客气話，将炼乳放在桌子上。

然后他便走出去了。我也就沒有再挽留他。現在就剩下我們倆在这所寒意侵人的屋子里。这座房子的厨房里乱七八糟地堆积着罐头盒和肮脏的食具，門厅里冷得連积雪都融化不了。为什么会在这間屋子里呢？从这个屋的窗戶里，往外可以看到連綿的小火山，看到浓重的雪水在复盖着白雪的悬崖峭壁間庄严地流过。不过，这仍然是一个我不准备追求解答的“为什么”。

医生临出門的时候，塞給了我一个电气玩意兒，我一接过手就把它忘掉了。后来經过一陣痛快的談笑之后，我发現自己就象馬兒在严寒中一般，嘴里冒出的浓厚的热气漸漸在融化，这时，我才想起这个玩意兒来。这是个电壁爐，看样兒是本地造的，从它这一夜劲头十足，声嘶力竭的喊叫看来，它还是一个挺好使喚的玩意兒。房間里很快就暖和了。卡佳本来想将房間收拾一下，可是我沒讓她动手。我看着她，紧紧地握住她的手，仿佛是怕她会象刚才出現那样突然又不見了……

我在来医生家的路上，便发現天气在变化。現在差一刻都十点了，我走出屋子一看，刚才那陣呼嘯着的寒风已經平息，空气也混浊起来了，松軟的雪花沉重而迅速地降落着——这是暴

风雪即将到临的可靠的象征。

使我惊异的是司令部的同志居然已經知道卡佳到来的消息。司令員也知道了，否則他怎么会和往常不一样，笑嘻嘻地接待我呢？我很簡略地向他报告了击沉袭击艦的經过，他对这件事幷沒有詳細追問，只說要我今晚在軍事会議上好好講一講。而"圣·瑪丽亚"号探险队才是他現在眞正感到兴趣的！

我开始叙述时有些拘束，有些难为情，虽然对于一个熟知我一生行径的人說来，对于我这次在执行战斗任务时找着了探险队这种巧遇不会感到奇怪。可是怎样才能象軍队中要求那样，用三言两語簡洁地把这思想向艦队司令員表达出来呢？他是那样聚精会神地，带着年輕人特有的眞摯的表情，和对这事发生很大兴趣的样子傾听着，所以最后我就豁出来，不顧那些"三言两語"的要求，开始随随便便地講起来了，因此一切頓时也就講得和实际的經过完全一样了。

最后，只因为将軍想起了卡佳，我們这才分别了……

我不知道自己在他那兒消磨了多少时間，大概有一个多鐘头吧。可是等我走出門时，再也找不見北极城了，城市隐沒在飞舞着刺人眼睛的，呼嘯着的大雪里了。

我这天幸好穿了毡靴，就这样还不得不把靴筒拉到膝盖上面来。这哪兒还有什么一排排的房屋，連想也想不到这兒曾經有过房子！只有幻想才能想到在这漆黑一团，左冲右突的大雪里还有房屋，而且在其中的一間房子，第五排第七号里，卡佳按照我的意見，正在把硬得象生鉄般的餅干放到火爐上烘烤。当然，我最后还是掙扎到这所房屋了。这时最困难的是認出它就是我要找的屋子；在一个半鐘头內，它变成了一座神話中的小茅屋，向一边傾斜着，积雪淹沒了它的窗口。我象是暴风雪之神似

的，一头扎进了門厅里。在我的肩上堆积着厚厚的凝結了的冰凌，卡佳只好用扫帚把我渾身上下清扫了一番。

……似乎把話都講完了，我們已經两次接触到船长的訣別信。我这次把信带到北极城来了，准备給医生看的，探险队的其它材料都留在团里。但是我們避开这些信以及和信有关的事情不談，我們就象是下意識地感到在我們相逢的幸福中，暫时还不能談这件事似的。

卡佳又談到小彼加現在的情况，——他現在长得黑呼呼的，眼睛稍稍有点兒斜視，整个脸型很象我已故的妹妹。我們商量了应該怎样对待姥姥的問題。她和別雷什金院长吵了一架，在集体农庄里租了一个“单間寓所”。我也知道了大彼加的情况。他又負了伤，得了勛章，重回前綫去了。他的营长是苏联英雄，卡佳在莫斯科时无意中認識了他。那人对她說，彼加根本“沒把死亡当回事”，这話使得卡佳大有感触。我还知道了瓦丽亚·特洛菲莫娃的情况，“如果一切眞象卡佳想象的那样，那么，对他們倆說来就太幸福了”。屋子里已經有了点变化。东西的摆法变样了，变得使人悅目一些，它們象是在感謝她，感謝她把医生这間充滿男人气息的，冰冻的屋子温暖过来了。我們的小家庭生活在抛弃我們整整一个半可怖的年头之后，經过这样久之后，現在終于又回来了。这样一个在我說来是无比重要的，奇迹般的变化发生已經五、六个鐘头了，可是，我对于卡佳現在是在我身边的这一事实始終还不习慣。

“你知道，我常常在想什么嗎？我覚得自己爱你太不够了，忽略了你和我在一起生活是多么困难。”

“可是我想的却是你和我在一起生活才困难哩。每次当你出发的时候，我总是替你担心，充滿了慌乱，忧虑和恐怖，不过这

也是一种幸福。”

我們一面談着話，她一面繼續在收拾东西。无論在什么地方，在旅館里，在火車上，只要我們俩在一起，她总是这个样子。这就是那些經常跟着丈夫走南闖北的妇女的习惯。我看到卡佳这种使人伤感的习惯，心里充滿了爱怜，体貼和悔恨的感覺。

后来，我們的邻居回来了，他就是說我不善于在北极的黑夜中辨明情况的那位海員。这是一个面孔通紅的矮胖子，呆了不一会兒，我們又了解到了他是一位惊人的饕餮客。

他走进来和我們互相認識，头一句話便声明他是伊万·伊万內奇的同事，来北极城是准备在潜水艦上試驗某种救护仪器的。他今天晚上本来准备去穆尔曼斯克，可是該死的暴风雪打乱了他的全盘計划。

“不批准哪，”他叹了一口气，說道，“所以除了吃吃喝喝之外，再沒有什么可作的了。”

伊万·伊万內奇的家里旣有葡萄酒，又有罐头食物，可是他还說这些东西都不够味，所以又去把自己的葡萄酒和罐头拿来。他呼哧呼哧地喘着气，打开了罐头，不知为什么还卷起了袖子来，把罐头放在爐子上热了一热。我和卡佳这一整天都在吃东西，所以我們謝絕了他的酒会，不过他也并沒有因此敗兴，独自迅速地，狼吞虎咽地把所有的东西都吃得一干二淨。他从医生口中已經知道我們失散和重逢的事，所以向我們祝賀。后来他又說，象这类的事情他知道的不下千百件了。

“这还算好的，您和尊夫人都能毫无怨艾地坚守独居生活，”他用教誨式的口吻說道。“是的，天下什么样的事都有啊！”

我不記得还談了些什么事。我只記得自己更加銳敏地感到幸福，因为除了我們之外，还有其它的人和我們在一起。

后来他走了。整个晚上他都在向港口打电話，詢問有沒有批准。而这时暴风雪刚刚开始到巴倫支海上游蕩，哪里能談到什么批准不批准呢！甚至連屋子里的窗戶都会突然抖动起来，象是有人在外面搖撼，时而是畏怯的輕敲，时而是大胆的猛击。

这时，就剩下我們俩了。我怎么也看不够卡佳。我的天哪，我是多么怀念她呵！我什么也不記得！就象她夜里挽起头发——把发辮盘起来睡覚的习惯我也忘記了。她現在头发长得还不多，所以短短的辮子扎起来很可笑。可是，她仍然卷起辮子，露出两只我也已經忘記了的紅紅的小耳朵。

我們又开始談話了，現在是低声絮語。經过一段长久的沉默之后，話題完全轉到了另外一件事情上。这另外的一件事就是罗馬紹夫。

我記不清在那兒讀过一篇关于古抄本，也就是羊皮紙抄本的故事。后代的抄写員擦去了紙上的原文，写上一些帐目和字据。可是經过若干年以后，学者們又能发現原来的文字，这些文字有时甚至是天才詩人的手笔。

这件事情就好比是古抄本，卡佳照罗馬紹夫的話把在松林里所发生的事情对我叙述了一遍，然后我就象是一块橡皮，擦去这番謊言，在謊言下面显露出了眞理。我自己明白，同时也对卡佳說明了他的鬼把戏里面这复杂卑鄙的一着。他的这个鬼把戏前后玩了两次：头一次是向卡佳証明，說他救了我的性命；后来又向我証明，說他救过卡佳。

我把我們在义犬广場最后的一次談話一字不移地告訴了她，他的自白使卡佳感到万分惊駭；他的招供說明了我一切不幸的根源，揭开了那一直苦恼着卡佳的謎。

“你把这些話都記下来了嗎？”

“是的。象作記录那样記的，并且强迫他签了字。”

我把他的談話重新叙述了一遍。从在小学念書时开始，嫉妒的感情就一直嚙噬着他那空虚不安的灵魂，他終生都为这种嫉妒的感情折磨着，始終在注意我。不过关于他靠桌子的墻壁上挂着一张卡佳的漂亮相片这件事，我什么話也沒說。我沒有說的原因，是覚得他这种爱法对她說来簡直是侮辱。

她在听我講話的时候，脸色很阴沉，但是一双眼睛却在燃烧着……她抓起我的手，紧貼在自己的胸上。她的脸因为激动变得蒼白。她憎恨罗馬紹夫，也許正是因为那些我所不願談的事情，她更是百倍地憎恨他。可是他对于我說来是遙远无关，微不足道的，我想到自己战胜了他，不禁感到高兴……

胖医生还在詢問批准不批准的事。因为暴风雪一直不甘罢休，大肆猖獗，抛射雪弹，所以仍然还不能批准。暴风雪光顧了我們的漁村，也光顧了德国人那边，它卷起汹涌的波涛，冲击着隐蔽到挪威峽湾中的船只。不准出港，港口封閉了，刮着九級大风。

我的妻把手掌枕在脸頰下面睡着了。她是多么美丽，多么聪明，我眞不知道她因为什么会永远爱我。她睡着了，我可以长久不移地观察她，同时想着，現在就只有我們俩人了。虽然这短暫的幸福之夜即将結束，可是我們終究从这場馳騁在世界上的暴戾的风雪中夺得了这一夜。

我需要在六点鐘前起床，我要卡佳答应我不把她叫醒；甚至在头一天晚上，我們就把告别的話都說过了。可是等我睜开眼时，她穿着衬裙已經在洗抹食具，并且把湿淋淋的盘子斜放在爐子旁边了。她知道我在什么部队工作，可是，我們并沒有談过这

方面的問題。只是在我匆匆忙忙将沒有喝完的杯子放下，刚刚站起来时，她又象过去那样問我带不带降落伞。

我和胖医生一起走出来。暴风雪平息了，整个城市湮沒在一条长长的，顺着道路迤邐开去，象被刀子一切两断似的雪丘里。

4　訣别信

我临走的时候，把船长的訣别信交給了卡佳。从前，我在恩斯克教堂公园里，也曾把我和达莎阿姨从被淹死的郵递員身上撿到的信留給了她，讓她独自一个人去讀。我那次守候在馬尔登长老炮楼下，我的思想随着卡佳在一行又一行地讀着，我感到渾身都冷起来。

而这一次，我却要几天之后才能看到她。可是反正一样，我們宛如仍然在一起讀信，我知道卡佳能感到在她的肩后有我在呼吸着。

下面就是这些信。

一

圣彼得堡，水道測量总局
彼·塞·索柯洛夫海軍上校

我亲爱的彼得·塞尔盖耶維奇！

我这封信是在我們旅行将近終点时写成的，遺憾的只是这次旅行将由我孤单一人来結束。但願这封信能到达您的手中。我覺得世界上大概再不会有什么人能够忍受我們所身受的一切痛苦了。同伴們一个接一个地相繼牺牲，而被我派往加尔其哈的偵察队又是一去

不返。

我抛下瑪莎和您的教女，将她們遺留在困苦的环境中。如果我知道她們的生活得到了保障，那我虽死也可以稍覺寬心，因为我認为我們的祖国是不会因我們而慚愧。我們这次探险很不成功，不过，我們在返回我們发現的陆地，并对它进行了研究之后，已經尽我們的力量将这次失敗弥补过来了。

縈繞在我脑中最后的思想是我的妻女。但願我的女兒一生順利。請您象过去帮助我那样帮助她們吧。在我临死之际，我怀着无比深厚的感激心情想到您，想到我在您的領导之下工作的时期——我青年时代最美好的岁月。

讓我拥抱您

伊万·塔塔林諾夫

二

水道測量总局

局长閣下

"圣·瑪丽亚"号探险队

队长　伊·李·塔塔林諾夫寄

报　告

謹以万分荣幸，报告水道測量总局下列事項：

公元一九一五年三月十六日，測得"圣·瑪丽亚"号所在位置为緯度79°08′30″，以格林威治为准，經度89°55′00″，在能見度良好，天气晴朗的情况下，从漂浮的"圣·瑪丽亚"号船上发現船东有一片无名的、广袤的土地，上有无数高山和冰河。在这块土地所在的地区，过去也曾經发現过若干迹象：如一九一二年八月，我們看見成群大雁从北北东——南南西的方向由北飞来。一九一三年四月初，我們在东北方向的地平綫上看見一条清晰的，銀白色的地带，被一层形

状极为古怪的云朵，仿佛是远山中的霧气一般籠罩着。

这块土地与子午綫的方向相齐，它的发現使我們产生了一个希望：一旦有好机会时，便立刻离开船，踏上陆地，沿着海岸朝泰麦尔半島方向往前行进，再根据具体情况，直达哈丹加或者叶尼塞河口的，最先被发現的西伯利亚村落。在这个时候，我們漂流的方向是絲毫沒有怀疑的。我船随着浮冰以北偏东七度的主航向流动。即便这个航向再往西一点，也就是和当年南生的“佛兰姆”号浮动的方向相平行的話，我們也不可能在一九一六年秋季以前摆脫冰层的包围，而我們的粮食却只够吃到一九一五年的夏天。

我們經历了无数的艰难困苦（这些事情和本文的实質无关），直到一九一五年五月二十一日，我們才在緯度81°09′，經度58°36′的地方登上这块再次被我們所开拓的土地的海岸。这是一个被冰雪封沒了的島屿，它的位置标在本报告附图A上。五天之后，我們才抵达組成新发現的这块陆地的三、四个島屿中的第二个島上。这个小島編号为Γ。我在小島一个突出的海岬上选定了一个天文观测所，求得該观测所的座标为80°26′30″和92°08′00″。

沿这块陌生土地的海岸南行，我又勘察了北緯八十一度与七十九度之間的海岸。滨海北部是一块相当低的洼地，部分地区并且被一条寬闊的冰川淹沒。靠南的海岸逐漸升高，漸漸掙脫了冰层的束縛。我們就在这兒找到了一些漂浮的原木。在緯度80°的地方，发現了一个寬闊的海岬（或海湾），由C点順西南西方向伸入。

自Φ点开始，海岸驟然轉向南南西方向。我原拟勘察这块新开拓的陆地的南岸，可是，这时我們已經决定沿哈里东·拉普捷夫海岸向叶尼塞河前进。

在向总局彙报关于个人所作的各項发現的时候，我認为有必要指出，因为船上的天文鐘两年来始終沒有校正过时間，所以尽管天文鐘的保养如何精心，个人認为經度的計算还不可能完全可靠。

伊万·塔塔林諾夫

附：

1.“圣·瑪丽亚”号値更日志(簽字)付本一份。

2.天文鐘簿付本一份。

3.載有各种計算数字及摄影数据的布紋紙練习本一个。

4.实地拍摄的地图一张。

公元一九一五年于俄罗斯群島四号島营地。

三

亲爱的瑪莎：

恐怕我們的关系就要結束了，我甚至不敢希望你能够有那么一天会看到这几行絕笔的信。我們再也走不动了，走着路也要冻僵了。我們只有休息，甚至吃了东西之后身体也不暖和。我的两条腿，特别是右腿的状况很恶劣，連我自己都不知道这条腿是在什么时候冻坏了的。我在写信的时候，仍习惯用“我們”两个字，其实可怜的柯尔巴可夫死去已經三天了。多可怕的暴风雪啊，我甚至无法将他掩埋起来！暴风雪一連刮了四天四夜，——对我們說来，这实在是太久了。

很快就輪到我的末日了，不过我一点也不害怕死。显然我为了生存所作的努力已远远超过我所能作到的了。

我很对不起你，虽然别的思想負担也很沉重，不过，这个想法却是最最沉重的。

这些年来，你耽受了多少忧虑，尝尽了多少痛苦，而現在，又是一次最大的痛苦。不过請你不要認为自己的終身受着束縛，如果碰上你認为和他在一起能够幸福的人，請你記住，这也就是我对你的希望。請你把这話也告訴尼娜·卡比丹諾芙娜吧。讓我拥抱她，請她尽力多帮助你，特别是关于卡佳的問題多帮助你。

我們旅途非常艰苦。不过，我們表現得都很好，如果装备工作沒有延誤，如果装备的物資不是这样糟糕的話，我們說不定还能完成我們的任务呢。

亲爱的瑪申卡，我眞不知道你們沒有我之后將怎样生活！还有卡佳，我的卡佳喲！我知道誰会来帮助你們，不过在我生命即将消逝的最后一刻，我不願意說出这个人来。我无法将这些年来郁积在心中的一切，毫不掩飾地向他傾吐。他就是那一向束縛着我的手脚的勢力的化身。其实，只要他不妨碍我，即使不来"帮助"我，那我也能完成許多工作。想起这些事来，不禁感到万分痛心。可又有什么办法呢？唯一能引以自慰的，是我以自己的劳动为俄罗斯开拓和增添了一块辽闊的，新的土地。亲爱的瑪莎，我实在不願終止这封信，終止这最后一次和你的談話。請你爱护我們的女兒，要注意不使她养成懶惰的习慣。这是我的形象，我这人从来就很懶，而且过于輕信别人。

卡佳，我的乖女兒！你将来会不会知道我曾經多么想念你，甚至在我临死之前还想瞧你一眼！

够啦。手都冻僵了，我还在写个不停。拥抱你們。你們永久的亲人。

5　最后的一頁

我不願意讓卡佳留在医生的房間里，更主要是因为这間房子还不是医生的，而是一位犧牲的指揮員的，屋子里的东西和家具都是他的。墙壁上对称地挂着几幀不十分成熟的，尙未完成的水彩画，描繪着北极城的风景，屋子里整整齐齐地堆放着一叠专业書。此外，还有很多相片，全都是一个穿着烏克兰衣裳，留着长辮的姑娘，以及在她长大一些之后，抱着一个光屁股的胖娃娃所照的相片。这間房子里所有的东西，使人突然看到了旧主那已經停息了的生活。

呆在这样的房間里，許許多多各不相同的，完全不必要的想法都会自然而然产生的。对于一个丈夫在空軍服务的妇女說来，往往不易摆脫开这些思想。可是，卡佳还是决定要留下来。

“这有什么！”她說道。“这是最普通的事情了。”

我沒有坚持自己的意見，同时，我能来北极城的次数也相当少，我只要知道她是在伊万·伊万內奇医生身旁，她每天都能看見他，那我的心里就感到愉快了。她很快就参加了工作，起初在医院里当护士，后来在医生門診的旧北极城工作。两星期后，我再次来到这个地方时，她已經对自己的新生活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她鑽到这个生活里去的速度眞是快得惊人。

这些地方常常有艦船出航，到远近的海道上和盟軍会合，去歼灭德国鬼子的护航运輸队。因此，这座小城里所发生的一切事情，都或多或少地和这一斗爭有着联系。被大众热爱的指揮員的名字在这兒可以說是家喻戶晓的。其中有很多人的名字甚至全苏联的人都早已知道了。

我在恩城时，深感前綫和后方之間距离的短近。而在这兒，这种罕有的，近得仿佛是一家人的前后院一般的关系显得就更加突出了，因为北极城的生活本身就比在恩城更复杂，更加丰富多采。这样的生活不是从天而降，而是循序漸进的。从各方面都可以看得出：我們的人，上自司令員，下至任何一个紅海軍战士，都在这蛮荒的峭壁中牢固地扎下了根，决心战斗到最后胜利。正因为这是一种强度很均匀的紧张，所以它才会这样深深地貫穿到日常生活中的每件小事上去的。

回忆起一九四二到四三年間的那个冬天来，我覺得这恐怕要算是我們一生中最幸福的，充滿了家庭乐趣的冬季了。我当时每隔一天便要出动轟炸德寇的艦船一次，想起这些情况，很可

能会使人感到惊奇。不过，当你不知道卡佳的情况时，飞行时是一种滋味，而在你很清楚地知道她是安全地住在北极城，身体健康，再过几天，我又可以看見她在飯桌前倒茶的情景时，飞行完全又是另一种滋味。飯桌上方挂着一个翠綠的綢灯罩，伊万·伊万內奇用厚紙很艺术地剪了許多小妖精釘在灯罩上。在我的想象中构成了一幅图画：这个值得紀念的冬天里，曾經使得我和卡佳欢欣鼓舞的人和事都落在綠灯罩的亮圈內，而那些曾經使我們煩恼和伤心的人和事却躲藏在遙远的，阴暗的角落里去了。

我还記得我們在傍晚的一些集会。有一次，为了和医生取得联系，經过了长久的，劳而无功的一些尝試之后，我終于搞到一艘小艇，来到了北极城；尽管这时天色已經很晚，可是我們几个朋友还是团聚在这个光亮的圈子里。夜深有什么关系，如果不在一起，那么白天还不等于就是黑夜嗎！

胖胖的，好吃的医生穿了一件肥大无比的皮大氅，从他房間里蹒跚地走出来，在桌旁占据了一个即使不是最显著，但至少也是最热鬧的位子。他那种迫不及待的样子，好象是在期待着一件好事，或者，即使不是期待好事，那么最低限度也是在期待一件快乐事；憑他这付样子就够人热鬧一陣的了，即使他不說話，也能听得見他呼哧呼哧的喘气声，咀嚼声，或者平常呼吸时所发出的响亮的声音。

如果根据吵鬧声来分的話，仅次于他的自然就要数我了。說实在的，我从来沒有談过这么多的話，喝过这么多的酒，这样痛快地欢笑过！在我看見卡佳时的那种感觉，仿佛一直还留在我的灵魂里——一切都在向前飞去，往一个地方飞……往哪兒飞呢？誰知道！我相信是往幸福的乐土飞。伊万·伊万內奇医生在爱子牺牲之后，觉得自己完全成了病人，可是在这些傍晚的集会

上，連他也活跃了，愈加爱引用——主要在国际問題方面——他所喜欢的作者柯茲瑪·普魯特可夫的名言。

最后，如果以鬧声的程度来分的話，末席应該屬于我的領航員。他向来不講一句話，只是間或沉思地动一动眉头，从口中取出烟斗，一个接一个地往外吐烟圈。我上面似乎已經說过我很喜欢他，因为他是一个卓越的領航圣手，并且对我也很好，——我素来就喜欢象他这样的性情。

卡佳这时忙着自己女主人的工作。我不知道她怎样把这所房子变成了我們的家，使我們能够在这里招待客人，从心眼里設法要使客人們都能酒足飯飽。但这些事都作到了。

当然，若不是无綫电广播每天晚上都带来关于我軍获胜的消息，那么也不可能有这些傍晚的聚会，不可能享受到和卡佳見面的幸福。第二天清早，当她送别我的时候，那好象兒童玩的大气球一般的太阳，羞人答答的、青春洋溢的太阳，那象征着北极一天开端的太阳，仿佛是特意为了我們而升起在一綫綿綿的群山之上……要不是无綫电每天晚上带来胜利的消息，那么也就不可能有这种高涨的情緒，即使有的話，那也是完全另外一种高涨情緒。这种高涨情緒是具有普遍性的，它不仅在北方这兒——战綫右翼的前沿，在这兒一个被茫茫大海所削断的荒凉的峭壁上，我們陆上战綫最后一个兵士守卫的地方，——而且在战綫任何一个地段中，都同样有这种高涨的情緒。

斯大林格勒的最后几响枪炮声已經消失，渾身被尘烟熏黑的战士从下水道孔中爬出来，受到强烈的阳光和雪輝的刺激，他們眯縫着眼睛，观察这座已成为一片废墟的、曾經奋力苦战过的城市。这一伟大的胜利的迴音嘹亮地縈廻在北极城花崗岩質的层巒叠嶂間。我們似乎已經作到了一切所能作的事，为的是使

胜利的迴音沿着挪威海岸传得更远。德国鬼子的商船队正偷偷摸摸地从一个国家流窜到另一个国家，讓胜利的迴音响到他們流窜的地方去。德国鬼子在卸載他人的武器，把搶来的鉄矿向自己的船上搬运，在巴倫支海上那充滿神秘的喧鬧声的、高度警觉的黑夜里运送鉄矿，讓胜利的迴音响到他們正在干罪恶勾当的这些地方去吧……

我們——医生，卡佳和我，把所有的閑暇时間都耗費在研究和挑选“圣·瑪丽亚”号探险队的材料的工作上。

不知道冲印探险队的胶片和辨認文件这两項工作究竟那件更复杂。大家都知道，年代愈久，相片的色澤愈淡，或者模糊不清。所以包装的封皮上总是注有保险期限，过了限期后，工厂即不再保証物象清晰。“圣·瑪丽亚”号胶片的保险期到一九一四年二月結束。不仅如此，因为金屬包皮內灌滿了水，所以胶片已經湿透了，而且胶片在这样的状况下显然又經历了不少岁月。連北方艦队最好的冲洗員都說，这簡直是“异想天开”，即使他們是神灵的后裔，碰到这种情况，对于冲洗这些胶片也是束手无策的。可是我毕竟說服了他們。在一百二十张小心又小心地經过晾干的底片中，約摸有五十张是被認为可以“进一步加以处理”的。經过了多次的复制之后，得到二十二张完全清楚的相片。

我曾經讀过克里莫夫航海长的日記。他的字虽然写得小，字迹也很潦草难認，加之又被海豹油浸过，但这終归是两本經过装訂的練习簿上的一些互不相联的单頁紙张。可是这次所发現的塔塔林諾夫的文件呢，除了訣别信比其它紙片保存得比較完好之外，其它的都成为粘在一起的紙团了。要靠我們自己的力量把这样一团废紙再恢复成天文鐘簿或者值更日志，变成地图

或者照片資料，这当然是不成的。所以这項工作也是在一位有經驗的人領导之下，在专門的实驗室里完成的。在塔塔林諾夫船长开列的附件中，提到了一本布紋練习簿，其中所記录的一切，本書因篇幅关系，所以不准备詳細地叙述。我要說的是他根据自己观察的結果，已經作出一些結論，根据他所提出的公式，可以計算北冰洋任何地区的浮冰运动的速度和方向。乍一看来，这几乎是难以令人相信的成就，因为从“圣·瑪丽亚”号以很短的漂流期間所經过的地方看来，似乎不可能得到面这样广的总結資料。不过，天生的明哲往往并不需要很多的事实。

“你虽然讀完了塔塔林諾夫一生的事迹，”我曾經这样对自己說过，“可是最后的一頁仍然还沒有揭开啊。”

“問題还沒有結束嘛，”我这样回答道。“說不定有那么一天，我能够揭开，并且讀到这一頁呢。”

这一天来到了。我讀完了他一生的不朽[illegible]。

6 归 来

一九四四年夏季，我获得一次休假机会。我和卡佳决定在莫斯科盘桓三个星期，然后第四周到恩斯克去拜訪老人。

我們是七月十七号到达的，——这是一个多么可紀念的日子啊！这一天，正好德寇俘虏被带出来經过莫斯科游街示众。

我們携带的箱子都很輕，所以决定先乘地下电車到市区中心。可是，当我們走出航空站后，我們整整等候了两个鐘头都不能穿过街道。我們起先站着看，可是后来实在是疲乏不堪，便坐在箱子上，后来又站起来。俘虏群还在不停地走。前面走的是

挺胸凸肚的将軍，其中有好几个是著名的虐待狂和劊子手，他們戴着高筒帽，穿着制服，脸上刮得光溜溜的，带着一付无可奈何的傲慢神情。将軍們大概都快到克里姆大桥了，而后面的兵士还一跛一瘸不停地走着；有的衣衫襤褸赤着脚，有的穿着軍大衣，却敞着怀。

我怀着极大的兴趣和无比的憎恨瞧着他們。我和大部分的轟炸机飞行員一样，整个战爭中根本沒有見过一次敌人的眞面貌，至于在空中向目标俯冲的时候，从这样的位置怎么能看清楚什么东西呢！現在，可說是走运了，一下子五万七千六百个敌人，二十人一行地在我面前走过。在这个光輝灿烂的日子里，莫斯科显得特别瑰丽，他們惊訝地看着莫斯科，有的人垂头丧气，无精打采地瞧着脚下。

他們虽然是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命运；但是有一点却是共同的，就是他們的一举一动和我們都是全然不相同，隔我們十分遙远的。

我望了望卡佳。她把手提包紧压在胸前，站在那里激动得很厉害。后来，她突然重重地亲吻了我一下。我問道：

“是感激嗎？”

她很严肃地回答說：

“是的。”

我們带的錢很寬裕。我們在“莫斯科”大旅館租了一套最高級的房間。共有五个房間，陈設华丽，有穿衣鏡，画片和三脚鋼琴。

起先我們感到有点兒惶惶不安。不过后来終于覺得这些穿衣鏡，地毯，上面画着花草和爱神的天花板并不难于习惯。我們在这間旅館里感到很惬意，寬敞，而且十分舒适。

柯拉布略夫不用說是在我們到达的当天就来了。他的八字髯整整齐齐地卷着，衣装十分考究，穿着一件寬大的綉花衬衣。这件衬衣很合他的身，使得他酷象一位伟大的俄国画家，不过，我和卡佳都想不起究竟是象誰。

一九四二年夏天，当我去叩他家那扇釘滿了毛毡的毛茸茸的門时，他在莫斯科。上一次，当他回家发現我的信，知道我要去雅罗斯拉夫找卡佳，他急得差点沒有发疯，那时他在莫斯科。

"您怎么想要到那兒去！去找卡佳！这是因为他們不肯給卡佳在西夫切夫·符拉什克胡同登記戶口，所以我头天晚上带她到民警局去了，而你却要到那么远的地方去找她！"

"伊万·巴甫雷奇，这不算倒楣，"我說道，"万事但求結局好。我在那年夏天不很走运，所以，我甚至覚得等到現在，等到事情有了美滿結局的时候，我們才見面反而更好一些。那时候，我是又黑又瘦，象个野人似的，而現在，您看，我不是一个很正常，很愉快的人了嗎。您还是講講自己的情况吧！您都在作什么？生活好嗎？"

伊万·巴甫雷奇从来就不善于談自己的事，不过我們还是了解到許多关于公园凱旋路小学的有趣的消息。就是在这所学校里，我和卡佳生活中曾經发生过十分重大的事件。我們念完小学后，学校生活从此便逐年地和我們生疏了。想起那些热情的，把人生想象得过分复杂化了的孩子就是我們时，不免感到有些惊异。可是对于伊万·巴甫雷奇說来，学校生活依然在繼續着。他每天都要站在穿衣鏡前，不慌不忙地梳他的八字髯，拿着教鞭去上課，一批一批新的学童象是在探照灯的照耀下似的，在他那严峻，爱撫和关切的目光下通过。啊，他的目光多么厉害！我想起了格里沙·法伯尔所說的"眼光是无价之宝"，如果他能

有这样的目光，那他“在戏剧事业上只要稍下点功夫便可以青云直上了”。

“伊万·巴甫雷奇，他在哪兒呢？”

“格里沙在省里，”伊万·巴甫雷奇說道，“在薩拉托夫。我很久都沒有見到他了。他大概已經成为优秀演員了。”

“他过去就不錯哇。我一向很欣賞他的演技。就是嗓門大了一点，不过，这也不是什么坏处！同时，这样吐字也清楚一些。”

我們挨个兒把全班同学都談到了。回忆这些被生活分散在全国各地的老朋友眞是又是伤感，又是高兴。丹娘·薇莉琪柯現在在斯大林格勒修建房屋。舒拉·柯乞涅夫現在是炮兵上校，不久前，在一項命令中还見到过他的名字。可是，有很多人的情况甚至連伊万·巴甫雷奇也一点不了解。时間仿佛是由他們的身旁閃过，他們在别人的記忆里永远是十七、八岁的孩子。

我們一直坐着在閑談。瓦連金·尼古拉耶維奇·朱可夫教授已經来了三次电話，挨了大家一頓痛駡，說他枉自作了个教授，居然又拿研究蛇或玄狐杂种的玩意兒作借口，連来都不肯来一趟。

后来他总算是来了，呆呆地站在門边，凝思地将一个手指头放在鼻子上。你瞧，他大概还以为自己走錯了房間哩！

“喂，教授，請进，請进，”我向他說道。

他打着哈哈，向我奔来。跟在他后面走进門来的是一位高大，丰滿的淡发夫人，假如我沒有弄錯的話，她从前就叫琪玲。

当然首先我又被盘問了一通，而且是交叉盘問：左边瓦里亚，右边琪玲，交相发問。問我为什么，根据什么和怎样擅自撞入别人的住宅，把所有的房間都串一遍，发現了卡佳是住在瓦·尼·朱可夫家里，好的办法不想，却偏留下一张旣沒有注明到哪

兒可以找到我，又沒有注明我准备在莫斯科住多久的毫无意义的条子。

"木头，那就是她的床位呀，"瓦里亚說道，"床头上就是她的連衣裙！我的天哪，你怎么就沒有猜到只有女人的手才可能把我家里弄得那么有条有理呢？"

"沒有猜着，"我說道，"不过，关于女人的手这一点，我倒是絲毫也不怀疑的。"

琪拉哈哈大笑起来，并且这里面似乎也还是善意的，可是瓦里亚却睜大眼睛瞪了我一眼。显然，那个两只眼睛不一样大小的，神秘的任卡·柯尔巴克察的暗影还残留在他們家中。

妇女們到隔壁屋子去了。琪玲要喂她的第四个孩子，所以可以断定她們是有話要談的。

我們談的是关于战爭的事。从很多方面都可以看出战爭即将結束的征兆。瓦里亚和伊万·巴甫雷奇听我講話时的那种神情，就仿佛即将向司令員作最后一次报告，說我軍攻占柏林的那个人就是我似的。

瓦里亚問我，为什么我們还不强渡維斯拉河。我回答說不知道，他不禁深深表示遺憾。关于北方的情况，若是从他所提的問題来看，似乎我所指揮的不是一个飞行大队，而是整个方面軍。

后来伊万·巴甫雷奇談起了塔塔林諾夫船长的事。为了怕卡佳听見，我将說話声音稍稍压低一些，把未曾发表过的細节对他講了一些。在距船长的帳篷不远的一个狹窄的峽谷里，发現了几个水手的坟墓——尸首暴露在地面上，压在大石头底下。尸骨都被熊和狼狗拖散了，也分不清是誰的尸骨；有一个头盖骨是在距营地三公里的洼地中发現的。船长在最后的几天里，显然是和一个比他早犧牲的炊事員柯尔巴可夫一起在睡眠袋里度

过的。給瑪丽亚·瓦西里耶芙娜的信上，本来写的是“給我的妻”，可是，后来又改为“給我的寡妻”。在船长的左手下面发現一个訂婚戒指，指环的內側鐫有“瑪·塔”两个字母。

我从箱子里取出一顆心形的金首飾給大家看。首飾的一面鐫着瑪丽亚·瓦西里耶芙娜的工笔画象，另外一面裝有一綹黑发。伊万·巴甫雷奇走到窗戶跟前，戴上眼鏡，对着这顆首飾看了很久。他用手絹擦擦鬍子，然后又仔細地看。他看了那么久，直到最后我和瓦里亚連忙走过去，从两边摟抱着他，把他扶过来，讓他坐到安乐椅上。

“咳，我的上帝，卡佳多么象她！”他吐了一口气，說道。“到今年十二月就十七周年了。眞是难以令人相信呀。”

他請我去把卡佳叫来，并說他在春季去过墓地一次，栽了些花草，并且还雇了一个工人把栏干油漆了一番。

朋友們在我們家里一直坐到深夜，琪拉还回到西夫切夫·符拉什克去喂了一次最小的孩子，回来的时候又把最大的姑娘带了来。这就是希望将来成为著名演員的那个孩子。总而言之，照琪拉母亲的說法，已故的瓦尔瓦拉·拉宾諾維奇，連同她那所素有声名的学校加在一起的价值也赶不上这个小女孩。她还在吃奶的时期，就能很出色地“模仿声音”了，而現在她朗誦普希金的作品甚至不逊于大名鼎鼎的斯切潘良。

瓦里亚还是象往常一样，講了許多关于他的野兽的事，同时講得也还不很枯燥，此外，他还講了些关于在战壕里和嚙齿动物作斗爭的故事。我問他究竟証明了蛇的血液随年龄而变化的这个規律沒有，或者这个問題还是科学中的一个謎。他笑了笑，說証实了。

今天是莫斯科的美妙的一天，一开始便是我們因为俘虏要

通过而等候两个鐘头，——沒有比这样的开端更美好的了！在这天，一个鮮明的，意識到胜利的感覚忽然在心底里亮堂了一下，永远地留存下来了。当胜利的消息还沒有在报紙上用黑字印出来，为了取得胜利还需要許多人献出生命，可是从那洋溢在各处的，不可捉摸的"归来的感覚"中，已經可以清楚地看出胜利的迹象。生活重又回到昔日的位置上，战爭把它們完全变了样，一九四四年夏日的莫斯科充滿新旧冲突的，奇怪而又新鮮的感覚。

这天晚上响起了礼炮。九点三刻鐘传出了"重要新聞"的呼喊声。瓦里亚說，应該赶快到十二楼去。这时乘电梯的人多得很，我們索性走上楼去；我們在半路上才知道去十二层楼是非坐电梯不行，所以我們原来准备走上去的打算完全落空了。

可是，我們最后还是設法上去了。現在在我的眼下便是在黄昏中的，瑰丽的莫斯科了。我和卡佳按捺着心上火热的，迫切的激情，会心地微笑着，相互看了一眼。我們手牵着手，站在一道垣墙旁。宁静的天空被紫紅色的烟火不疾不徐地照耀得通紅，后来在我們的头頂上疾速地飞起一道道絢烂夺目，五光十色的火苗，然后又緩緩地落了下来。

7　两个談話

我在莫斯科需要办两件事。第一是在地理学会作报告，說明我們怎样找到"圣·瑪丽亚"号探险队的；第二是和罗馬紹夫的預审員談話。說来也奇怪，这两桩事情竟是互相关联着的，因为我在恩城的时候，便把我和罗馬紹夫在义犬广場談話的記录抄录了一份給检察长。

我現在从第二件事开始説起。

一九四三年秋季，罗馬紹夫被判处了十年徒刑。这个消息，我是从恩城特刑处一位工作人員口中听来的；他过去在莫斯科办理这件案子时曾审訊过我。不知道怎么搞的，現在又把这件案子轉到地方法院去了，而且更令人不解的是轉去复审了。在我离开恩城前不久，我接到通知，説是莫斯科审訊工作組要求我提供一些补充材料。

这一切都是些討厌无味的事情。一路上，我想起自己又要再次卷入这件案子的令人厌倦的，复杂的气氛中去时，心中不免有些窩囊，要是沒有这件事休假該多么好哇！

下車后第二天我去报到，他們当时就請我去見負責审理罗馬紹夫案件的审查員……

这是一間公用的会客室，客厅里光綫不很亮堂，中間用木栅栏隔开。墙边摆放着許多寬大老旧的板凳，坐着一些形形色色絕不相同的人，有老头，有姑娘，还有沒戴肩章的軍人，大家都在等候着传訊。

我找到我的审查員的办公室——門上标着他那个希奇的姓：卫雪拉戈。因为时間还很早，所以我就把会客室里的地图上的小旗重新插了一下。这是一幅挺不錯的地图，只不过小旗落在战綫后面太远了。

一个熟悉的声音打断了我的工作。这个声音是那样的熟悉，圓潤，庄严，使我在一刹那間感到自己仿佛又成了一个衣衫襤褸，身上肮脏，褲子上还有着大补釘的孩子似的。

这个声音問道：

“可以嗎？”

就好象現在还不能进来似的，尼古拉·安东內奇輕輕将审

查員的房門推开了一点之后，便又关上門，带着一付受了委屈的神情坐到凳子上。我最后一次看見他是一九四二年的夏天在地下电車站上。他現在的样子和那时候一样：道貌岸然而又带有一种含蓄的矜持神气。

我一面吹着口哨，一面更換着波罗的海第二战綫上小旗的位置。从我对他說"我一定能找到探险队，到那时我們再来看誰是誰非吧"这句話之后到現在，已經过了十七年。他知道我找着探险队了嗎？这一点毫无疑問。不过他并不知道在塔塔林諾夫船长的文書中，发現了許多无法爭辯的，駁不倒的鉄証，証明我的認識是正确的；关于这些事，报刊上沒有透露过一点消息。

他双手撑着手杖，垂着头坐着。后来他瞟了我一眼，在他那灰白的大脸上掠过了一个情不自禁的，迅疾的动作。我快乐地想道："認出来了。"他認出了我，連忙把眼光避开了。

……这是他絞尽脑汁在考虑如何应付我的一刹那。一个多么复杂的难題啊！看样子，他已經順利地解开了这一难題。他突然站起来，手举到帽沿上比划了一下，勇敢地向我走过来。

"如果我沒有認錯的話，您就是格利高里耶夫同志吧？"

"是的。"

我有生以来，似乎还是第一次这样吃力地吐出这两个短短的字。不过这也是我在考虑应該如何对付他的一刹那。

"时間对您說来可眞是沒有白白过去哇，"他瞅着我的肩带，繼續說道。"您这次是从哪兒来？您是在哪个战綫上捍卫我們这些渺小的后方工作者呢？"

"在最北方。"

"准备在莫斯科住很久嗎？"

"来休假，待三个星期。"

"您也是被迫到这間会客室来浪費許多宝貴光阴的吧？不过話又說回来了，这也是我們做公民的应尽的义务呀，"他以一种道貌岸然的神气添了这么一句話。"我想，您大概也和我一样，是为罗馬紹夫的案子被传吧？"

"不錯。"

他沉默了片刻。啊，我是多么熟悉他的这种沉默，我从小就多么痛恨他这种虛伪的，煞有介事的沉默！

"他不是人，是祸害精，"他終于說道。"我覚得应該，而且应該尽快地把他这种人从社会上清除掉。"

假如我是一个艺术家的話，我这时一定要尽情地欣賞一下这个老牌伪善者的这番杰作。但是我是一个普通的人，我只是想对他說，如果及时把尼古拉·安东內奇从社会上除掉的話，那么它(就是社会)也就不致于花費力量来管罗馬紹夫的事了。

我忍住沒有作声。

关于"圣·瑪丽亚"号探险队的事情一句話也沒有談。不过我对尼古拉·安东內奇是很了解的，他刚才之所以向我走过来，那是因为他畏惧我。

"我听說，"他謹愼地揭开話題，"您已經完成了自己所开始的事业，您为这件事业付出了許多劳动，我願意衷心地向您表示感激。同时，我还准备公开地这样作一下。"

这句話的意思就是說他要来听我的报告，作出一付似乎我們一向是好朋友的姿态。他向我求和，这实在太妙了！应該装作我接受他求和的建議才行。

"不錯，好象完成了那么一点。"

我再就一句話沒有多說。可是，他竟然那样地兴奋，在他那丰滿多肉，沒有血色的脸上甚而泛起了一抹淡淡的紅暈。一切

事情都过去了，被人忘記了，他現在已經成为一位权威人士，我怎么会不去跟他搞好关系呢?!我大約也变成另外一个人了吧!說实在的，生活不是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嗎?我变成一个象他那样的人，我有勛章，凡事順利，所以他可能是根据自己，根据自己的成功之路在推断我。

"……要是換个别的时候，这还不是一件哄动世界的大事嗎，"他繼續說道，"以舍弟的功績而論，他是不愧称为民族英雄的，他的遺体也将隆重地运到京城，在川流不絕的人流瞻仰下殯葬。"

我回答說，塔塔林諾夫船长的遺体已經在叶尼塞湾的海濱安葬，而且他本人恐怕也不会希望給自己找到比这更好的墓地了。

"这是毫无疑問的。不过我說的是另外一件事——說他命运的乖舛。他总是被人遺忘，假如不是我們（他居然好意思說'我們'），恐怕地球上不会有人知道他是誰，知道他为祖国和科学都作了些什么貢献。"

这話說得未免太放肆了，我差点沒对他說出最难堪的話来。可是这当兒，房門开了，从审查員那兒出来一位姑娘，請我到他那兒去。

我一直这样想，如果这位审查員，或者說这位女审查員（因为这次是一位妇女）不是那么年輕，不是那么漂亮的話，她一定不会这样特别做作地严格审訊我。不过，后来我的故事吸引了她，所以她就完全放弃了她的那种官腔了。

"格利高里耶夫同志，"我向她报告了自己的年龄、职业、曾否犯过法等問題之后，她开口說道。"您知道我传訊您是为了什

么嗎?”

我回答說，知道。

“您过去曾經有过一次口供，”显然，她指的是在恩城审訊的那一次。“其中有些不很明确的地方，所以我必須首先和您談談。”

我說：

“願意效劳。”

“譬如說……”

她念了几段。这是我把在义犬广場和罗馬紹夫的談話逐字照述的。

“照这样看来，在罗馬紹夫发表这篇声明攻击您的时候，他似乎只是另外一个人手中利用的工具。”

“这另外的一个人已經說过了，”我說道。“他就是在您的会客室里等候您的尼古拉·安东內奇·塔塔林諾夫。至于他們两个人誰是工具，誰是利用这工具的手的問題我却沒法說。不过，我覺得解决这样的問題不是我的，而是您的任务。”

可能是因为她把罗馬紹夫的誣告竟然恭敬地說成什么声明，所以惹得我这时的火气那么大。

“因而这里面有一个不很明确的問題：塔塔林諾夫教授力图破坏搜索队的目的何在？他自己不就是一位研究北极的学者嗎？寻找他失踪的堂弟的工作看来应該得到他最热烈的同情才对。”

我回答說，塔塔林諾夫教授的目的可能有好几个。首先，他害怕找到“圣·瑪丽亚”号探险队的遺迹会进一步証明我所控告的是事实。其次，他根本不是什么研究北极的学者，而是一个以几本有关“圣·瑪丽亚”号探险队的書起家的典型的伪学者。因

此，任何竞爭也就自然而然地触及他的切身利益。

“您过去是否掌握有切实可靠的根据，認为搜索工作能够証实您控告的正确呢？”

我回答說有。現在，这个問題已經根本不需要討論了，因为我已經找到了探险队的遺物，而且，其中有一些是我打算要当众宣讀的直接証据。

就在这个答話之后，我的这位女审查員才很快地放弃了她那种官腔。

“怎么找到了？”她流露出一种眞誠的惊訝，問道。“这是很早以前的事呀。二十几年了吧？”

“二十九年。”

“那么，隔了二十九年还会留下些什么东西呢？”

“很多东西，”我回答道。

“連船长也找到了嗎？”

“是的。”

“他还活着？”

“嗳，您是怎么啦，当然不会罗！不过可以說出他是在什么时候牺牲的……他是在一九一五年六月十八至二十二日之間。”

“呃，您詳細講講吧。”

当然，我一下子不可能把所有的事都对她講一遍。不过，就这样，塔塔林諾夫教授为了等候接見也等得够久了，在他来到这位美貌而好問的女人桌旁，坐上我刚才坐过的位子之前，恐怕已經想了許多事，独自和自己說了許多話了。

我把那些使他应該受到法律制裁的事，以及那些因为犯罪的时間已經过去很久，而可以免去法律制裁的事都对她講了。这是过去的事情了！不过，过去的事往往比起乍一看来所認为

的那样要存在得久远得多。

她傾听着，虽然她和刚才一样还是一位审查員，但是这位审查員現在是和我一起在辨認那些被春潮漂到院子里来的信件，和我一起将北极旅行中的見聞作成劄記，和我一起把教員、医生、党的工作干部运送到偏僻的涅涅茨区。克里莫夫航海长的日記已經讀完了，那支老銅矛鈎也找着了（在一系列証物的調諧的构图中，我当时还以为这支銅矛就是最后的一根綫索哩）。接着，我又講到战爭期間，这时我住嘴了。我們亲身經历的往事完全展現在我的眼前，在这幅图景的深处，微微閃爍着那終身激动着我的思想。要向一个陌生人把这些事情解释清楚是很困难的。不过，我終究还是說清楚了。

“塔塔林諾夫船长深深理解到北方海路对于俄国的全部意义，”我說道，“所以，德寇竭力要截断这条航路也是不无道理的。在我飞到‘圣·瑪丽亚’号探险队罹难的地方去的时候，我是一个战爭中的人；后来我又找到了这支探险队，也因为我是个战爭中的人。”

8 报　告

这次我并沒有去爭取到地理学会作报告的荣誉，可也沒有接到要我将报告用書面形式送呈的殷勤的邀請。因为关于“圣·瑪丽亚”号的科学遺产問題，符教授已經发表了一篇极为出色的論文，而这篇文章刚发表了还沒有一个月，因此我一再謝絕作什么演講报告。可是他亲自給我挂来电話，因此我終于同意了。

……大家都来听我的报告，甚至琪拉的媽媽也来了。她碰

見我时，引經据典地对我說了几句短短的祝賀話，可惜我沒有記住。祝賀話說得稍嫌長了一些，我看到瓦里亚听她說时的那付順从的，莫可奈何的神情，不禁暗自覚得好笑。

我把柯拉布略夫請到第一排正对講坛的地方坐下，因为我已經习慣了在講話的时候瞅着他的动作。

“喂，薩尼亚，”他高高兴兴地說道，“这样吧，我們約好。我把手这样放在桌上，手心向下，那你就放心地講下去。同时要时时看着我的手！如果我用手輕輕拍桌子，那就是說你太激动了。如果不动，就是沒有激动。”

“伊万·巴甫雷奇，亲爱的！”

总的說来，虽然这一次相当可怕，但是，显然我是一点也沒有激动。我所耽心的只是不知道尼古拉·安东內奇究竟会不会来听我的报告。

他来了。当我正在悬挂地图的时候，我轉身一看，瞧見他坐在第一排距柯拉布略夫不远的地方。他蹺着腿坐着，带着一种木然的神情笔直地望着前面。我下意識地感到他在这几天里有了一些变化：他的脸上显露出一种落水狗的神情，腮上的皮肉也松弛地垂下来了，衣領上面高高地露出一截滿布着皺紋的瘦长的脖子。

主席是一位著名的老地理工作者。他在請我发言之前，首先将我簡略地介紹了一番，我对他这样作法当然是高兴的，我甚至还有点抱怨他的声音太低了一些。他說，我是“和布尔什維克征服北极的历史有着密切关系的一个人”。后来，他又說苏維埃北极科学应該在最有意义的篇幅中辟出一頁，来紀录我的“天才的頑强的劳动”；我当然也沒有反对他这样說。同时，因为大厅里这时充滿了掌声，其中拍得最响的就是琪拉的媽媽，所以也

沒法子反駁。

虽然关于北方海路的历史部份很有趣味，不过这次似乎还是不該把这个題目講得那么多。

我講得相当不好，常常停頓住，把一些最普通的字眼都忘掉了。总而言之，就象琪拉的媽媽后来所談的那样，我是“矇头”了。

我的发言轉到我們現在这个时期来了。我概括地描繪了一下北方問題的軍事意义，講到伟大的斯大林奠定北方艦队基础的那具有历史意义的日子。

就在这当兒，我的卡佳在很远的地方，在过道阴暗的尽头閃現了一下便不見了。她有些不舒服（感冒了），所以答应我留在家里。不过她現在旣然来了也是很好的，簡直可說是好极了！我心头頓时感到特别輕快，所以我的談話也就更有把握，更明确了。

“諸位也許会感到奇怪，”我說道，“在战爭期間，我却打算向大家彙报一个已經完結了将近三十年的老探险队的故事。这的确是一件历史。但是我們并沒有忘掉我們的历史，我們的根本力量，很可能也正是在于战爭不可能改变和中止那些使我們国家的面貌为之煥然一新的伟大思想。苏联人民开拓北方的思想就是这种伟大思想之一。”

我打了一个頓，我本来很想談談我和列德可夫参观北地城的情况，不过因为这事和报告的本題距离太远，所以我又勉强把話題拉回塔塔林諾夫的历史上。

我談到他的时候心情眞是玄妙极了！仿佛我就是那出生在亚速海畔一个貧苦漁家的小孩，而不是他。仿佛我从小就在运油船上当水手，行駛于巴土姆和新俄罗斯城之間，而不是他。仿佛是我胜利地通过了“海軍准尉的考試”，之后便在水道测量局

工作，是我掌握着既要有骨气，又要宽仁为怀的原則来对待軍官們那种目空一切的态度，而不是他。仿佛在南生書中加批注的人也是我，而不是他。“讓冰原去解答这个問題吧”这一杰出的思想也是我的手写成的。仿佛他的一生不是以失敗和杳无音訊的死亡告終的，而是以胜利和幸福結束的。虽然現在的生活中也有朋友、有仇人、有愛人，但是生活本身已經变了样，获得胜利的不是仇人，而是朋友和愛人。

我越講便越强烈地体驗到一种感情，除了用亢奋的感情来形容它之外，我沒法用别的話来称呼它。仿佛是在辽远的銀幕上，我看見开闊的晴空下有一艘沒有生命的帆船被积雪封盖着。是眞的沒有生命了嗎？不，人們还在敲啊捶啊，忙个不停，忙着用木板封閉有亮光的艙口，用柏油紙和毛氈将頂棚遮好，准备着过冬……

当卡佳走向她的座位去时，站在过道上的海員們都往两边閃开。我心里暗想，他們尊敬地給塔塔林諾夫船长的女兒讓路，这一举动是很公允的。同时她显得比所有的人都要美好，特别是她穿上这件朴素的英吉利服的时候。她比所有的人都要美好，在不知不覺中，她也卷入了我在叙述“圣·瑪丽亚”号的航行情况时那种狂欢，那种兴奋的情緒中了。

这时，应該講漂流的科学史实了。我首先肯定，塔塔林諾夫船长探险队所确定的事实，直到現在也沒有失去它的价值。所以著名的北极科学家符教授研究这次漂流結果，才断定在第七十八至第八十平行圈之間，有一座无人知晓的島屿存在。到一九三五年，这个島屿終于被发現了，而且正是在符教授計算的地方。塔塔林諾夫船长这次旅行証实了：南生所得出的恒漂流路綫，計算冰和风的相对运动的公式，給俄国科学带来了一个巨大的貢献。

当我講到怎样洗印探险队在地下埋了几近三十年的胶片的情形时，講堂里的听众都显出一种津津有味的姿态。

灯灭了，銀幕上映現出一个身材高大的人。他戴着毛茸茸的帽子，靴統用皮带拉在膝盖下面，他倚着猎枪站在那里，执拗地低着头。一头死了的黑熊象小猫似的蜷縮着脚爪，躺在他的脚边。这是一个坚强的，大无畏的神人，是一个很少个人打算的人。現在，他仿佛就要大踏步地迈进我們的大厅中来了！

当他出現在銀幕上的时候，大家都站了起来。大厅里鴉雀无声，充滿着一种肃穆的靜寂，不用說是講話，甚至誰也不敢大声出一口气。

在肃穆的寂靜气氛中，我宣讀了船长的报告和訣别信：

"'……其实，只要他不妨碍我，即使不来"帮助"我，那我也能完成許多工作。想起这些事来，不禁感到万分痛心。可又有什么办法呢？唯一能引以自慰的，是我以自己的劳动为俄罗斯开拓和增添了一块辽闊的，新的土地……'"

"不过，在这封信里，"等大家坐好后，我繼續講道，"我想請大家还注意一个地方。那就是：'我知道誰会来帮助你們，不过在我生命即将消逝的最后一刻，我不願意說出这个人来。我无法将这些年来郁积在心中的一切，毫不掩飾地向他傾吐。他就是那一向束縛着我的手脚的势力的化身……'船长在临死前不願指出名字来的人究竟是誰呢？关于这个人，他在另外一封信中是这样写的：'可以大胆这样說，我們的一切失敗都应归咎于他'。关于他，船长曾經这样写过：'我們这次去冒险，知道一定会遇到危险，但是我們并沒有料到会有这样的打击'。他曾經写过：'最倒楣的就是我錯把探险队的給养装备工作委托了尼古拉，現在不得不每小时，每分鐘为此付出极大的代

价……’”

尼古拉！世界上名叫尼古拉的人多得很呀！

不錯，世界上名字是尼古拉的人很多，甚至就在这間講堂內也有很多。可是，当我說出这个名字时，只有一个人驟然把身板一直，东张西望，撑着的手杖也落到了地上。旁边的人撿起手杖还給了他。

“我今天要把他的全名講出来，并不是想要借此解决我和这个人之間存在多年的爭执。我們的爭吵早已經解决，为生活本身所解决了。但是，他在自己写的文章中，竟然繼續在强調，說自己一向就是塔塔林諾夫船长的恩人，并且象他自己所写的那样，甚至‘踏着諾登塞尔特的足迹前进’这个思想都是他想出来的似的。他非常自信，甚至还敢来听我的报告，这个人現在就在这間大厅里。”

听众中間传出一陣惊訝的私語声，然后静了一会兒，过了不大功夫，又响起一陣乱哄哄的声音。主席搖了搖鈴。

“命运眞是奇怪呀！在这以前，他的名字、父名、姓氏的确一次都沒有連在一起提到过，可是我們在船长的訣別信中找到几份文件。这里有一份債务書的付本。上面規定：一，回到大陆后，全部营利归尼古拉·安东內奇·塔塔林諾夫（名字，父名，姓氏俱全）；二，船长預先表示态度，不接受任何奖賞；三，如果船只損毀，船长应以全部家财償付尼古拉·安东內奇·塔塔林諾夫（名字，父名，姓氏俱全）；四，船只和保险費归尼古拉·安东內奇·塔塔林諾夫（名字，父名，姓氏俱全）所有。这个人曾經对我說过，說他只承認一个証人：那就是船长本人。希望他現在能当着我們大家面前收回自己这句話，因为現在船长① 指出了他——把他的名字、父名和姓氏都指出来了！”

我刚一講完話，大厅里掀起一陣可怕的騷动。前排許多人站了起来，后面的人就大声喊叫，要前面的人坐下，因为后面看不見。他則举起手杖，口里嚷着：

“我請求发言，我請求发言！”

他被准許发言了，可是大家不讓他开口講話。我一生从来沒有听見过象他刚要张口說話时那样可怕的鼓噪声。不过他还是說了一些話（誰也沒听清楚），然后便沉重地敲着手杖，离开講坛，順着大厅边上走出去了。他現在是在高度的空虛里；在他所走过的地方，許久都还空着，大家仿佛都不願意迈进他拄着手杖，刚刚走过的地方。

9 最后一章

这节車厢是开到恩斯克去的。車厢里异常拥挤，光綫又很暗，地板上，架子上，到处都是人，这些人自然也是去恩斯克的。要是在过去，这节車里的人足足可以使县城的人口增加一倍。

我們和邻座的旅客，或者說得更正确一些，是和邻座的女客互相認識了。她們是莫斯科高等学校的学生，据她們說是去恩斯克工作的。

“干什么工作呢？”

“还不太清楚。到矿井工作。”

如果除开彼其加在教堂公园里所說的那条河床下的，里面到处是骷髏的坑道不算的話，那么，恩斯克从来还沒有过什么类

---

① 俄文中船长和大尉同为 капитан，因为薩尼亚的軍銜是大尉，此处有双关意义。——譯者注。

似矿井的东西了。可是，这些姑娘却肯定説她們是去矿井的。

每个包厢經过三、四个鐘头之后，总会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和旁边包厢不同风格的生活。仿佛那横隔在包厢間的一道道薄薄的半截板壁所分割的不是車厢，而是人們的感情和思想。有的包厢里吵吵鬧鬧，兴高采烈，而另外一些包厢里却是冷冷清清。我們的包厢里充滿了欢乐的气氛。姑娘們虽然因为自己沒能留在莫斯科进行暑期实习，可是她們的懊丧情緒并沒有持續多久。她們把一个在这个問題上遂了心願的叫瑪莎的姑娘奚落了一通之后，便尽情地唱起歌来了。我和卡佳整个晚上都在欣賞这些新鮮的，战爭期間流行起来的抒情歌曲，其中有几首很有意思。总的説来，姑娘們一直唱到恩斯克才停止，甚至夜間也唱（不知她們为什么会决定不睡觉）。这次不算十分长的路程（三十四小时）在姑娘們的歌声里，在时而欢乐，时而哀伤的青春的歌声催眠下昏昏沉沉地过去了。

火車从前是在黎明时分到站，而現在却是在傍晚，所以当我們下車时，这座小車站在暮色蒼茫中使我感到分外可爱，給人一种古老情調的，舒适的感觉。在車站建筑物前是一块滿栽着菩提树的寬闊的入口广場，旧日的恩斯克也就在广場边上終止了。我們走到林蔭路上，便看到远处有着一排排黑压压的房子，屋頂上迅速地飄过一团团被下面射来的光綫照耀得通紅的烟云。在恩斯克看見这样的景色是十分令人惊异的，我甚至对姑娘們解释說，这大約是河对面某个地方失火了。因为我一路上吹嘘了很久，說自己是恩斯克土生土长的，这兒的每一块石头我都熟悉，所以她們也就眞地相信是失火了。可是，結果却并不是火灾，而是恩斯克在战爭期間建成的火炮工厂。

我虽然也看到我国的許多城市（譬如牟城）在战爭期間发生

了多么惊人的变化，不过，我童年的时候并不熟悉这些城市。而現在，当我和卡佳走在城墙根大街，果戈理大街上时，暮靄疾剧地浓厚了。我覺得过去这些沿着碉堡围墙懶洋洋地伸展开去的街道也仿佛是在急促地奔跑，准备卷进繚繞在厂房上空那永无休止的，噴吐着烟火的云团的运动中去。我們眼前看到的是一座武装良好的金城湯池；这虽然是我們的第一个印象，但却是一个眞实的印象。对于我說来，它自然仍旧是从前那个象亲人般可爱的恩斯克，不过現在我又見到它时，就好象是会見了老朋友。当你仔細地注視着这张熟悉的，有了变化的脸孔时，由于心中那千万种柔情和激动使你不自覺地要发笑，不知道該从哪兒談起的好。

我們在北极城就写信告訴彼加，說我們要来看望老人，所以他也在筹画把早已批准的休假期凑到这个时間来。

虽然我从莫斯科发了电报来，可是并沒有人来車站接我們，所以我們斷定彼加沒有回来。但是当我們走出車站，在站前广場旁馬尔庫兹宫前那儿座气势汹汹的獅象間，我們碰見的第一个人就是彼加。他从前是一个恍恍惚惚，喜欢凝思冥想的人，脸上总挂着疑問的神情。尽管他現在晒黑了，变成了雄赳赳的軍官，可是我仍然一眼便認出是他。

“哦哈，原来他們在这兒！”就象他已經找了很久，現在終于找到了似的。

我們互相拥抱，他然后走到卡佳跟前，把她的手握在自己手中。他們之間有着在列宁格勒共患难的遭遇，虽然在世界上我可說是他們最亲近的人了，可是，当他們彼此捏着手站在那里的时候，甚至我和他們之間的距离似乎也很远。

我們撞进达莎阿姨的房間时，她已經睡覺了。她用肘撑着，

斜着身坐起来，沉思地瞅了我們許久，她大概还以为自己是在梦中看見了我們。我們失声笑了出来，她这才恍然醒悟了。

"上帝呀，是薩尼其卡！"她喊道。"卡佳也来了！可是他自己却出去了！"

"他自己"是指法官，"又出去了"的意思是說我和卡佳五年前回恩斯克时，他也是出发到区里某个地方去参加巡迴法庭了。

达莎阿姨忙碌着安置我們。因为餡兒餅用的是黑面，而且又是用进口油煎成的，所以她心里总觉得不安。所有这些都是瑣事，不值得多說。最后，我們只好用强力把她劝止住坐下来，讓卡佳去张罗家务事，我和彼加来帮助她。彼加象他自己所說那样，为了使餡兒"味道鮮美"，往餡里撒了些精料，而我又把去污粉当成了食盐，差点沒有放进餡里去，急得达莎阿姨在旁直叫。然而，說也奇怪，餡兒的味道竟很好，达莎阿姨放了一小块到口里尝尝，虽然她說"佐料"少了一点，不过，在战时說来，餡兒餅能作成这样也就不錯了。

午飯的时候，达莎阿姨一定要我从五年前，我們在恩城車站和她分别的那一天，那个时刻之后的全部經过，絲毫不漏地講給她听。不过我說服了她，等法官回来后再作这样的总結。然而，我們却趁这时讓彼加把他的情形講了一番。

我怀着激动的心情听着他講。为什么怀着激动的心情呢？因为我認識他已經二十五年多了，現在的他給我的感觉并不是象卡佳所描写的那样变成了完全另外一个人。至于我一向認为使彼加与众不同的，那种对我說来是神秘的"艺术家的作风"，現在变得更为定型，更为明确了。

他拿出自己的画册給我們看。彼加在战争的最后一年沒有在部队，而是在前綫剧团里担任美术师。画册中都是些关于战斗

生活的写生画，大多是草草仓促画成的。但是那种为我們部队每个成員，哪怕是只呆过几天的人所熟知的精神力量，却在这些速写中表現得极其深刻。

我往往留恋战争时期那些令人难忘的画面，它們一个接一个地相互更替，不留一絲痕迹，我本能地为此深感惋惜。現在，在这些虽說是輕描淡写的，但意境深长，甚而可以說是天才的表現手法中，我又看見它們了。

“罗，就是这样呀，”当我向他祝賀时，彼加善良地微笑着說道，“法官說画得不好。英雄主义表現不够。我的兒子現在也爱繪画，”他又添了这样一句，象他平时在感到滿意的时候那样，嘟着下嘴唇。“不錯，他似乎也还有点才能。”

卡佳从箱子里取出尼娜·卡比丹諾芙娜的信。她現在还带着小彼加住在新西伯利亚。达莎阿姨一向就很关心姥姥，所以她定要别人讀几封信給她听。

姥姥还和过去一样不在营里，单独住着，尽管别雷什金院长亲自来向她道歉，請她回到营里去。可是姥姥就象她自己在信中所說的那样，从小就不会对人低三下四，所以她仍然謝絕了他的請求。在她拒絕院长的請求之后，使全区的人大吃一惊的，是她突然参加了当地文化宫的群众性文化工作。

“我在学裁縫，”她信上簡略地說道，“祝賀你和薩尼亚。我从他小的时候就了解他，还作过荞麦飯給他吃，希望他能长高点。他是个可爱的人……你可不要欺負他，你的性情不怎么好。”

这是我們告訴她，說我們已經找着之后，她給卡佳的回信。

“我一夜都沒有睡着，”在她听說探险队的遺迹已經找到之后，在信中写道，“我老是在想可怜的瑪莎。我心想，她不知道

你父亲的悲惨的命运这倒也好。”

小彼加身体十分健壮，从相片上看来，他已經长得很高了，并且越长越象他的母亲。我們回忆起薩尼亚，大家静默了很久，仿佛我們又怀着哀悼的心情站在麻木不仁的死神面前。

卡佳打从春天便着手为姥姥和小彼加設法搞一张去莫斯科的通行証，她滿心希望在我們回去的时候能見到她們。

在这天晚上，我的，或者說是卡佳的一个宿願——全家住到列宁格勒去的想法，不断地在脑海里重复。带着全家——带着姥姥和大小两个彼加一起。在我們的想象中，未来的住宅已經找到了，而且不是在别的地方，就在基洛夫大街上。我們在未来的住宅里选了一間較僻静的屋子給大彼加作繪图室，免得别人妨碍他。其实，他倒是很欢迎一位給卡佳的印象很好的女人偶尔去“妨碍妨碍”他。不过这天晚上，大家自然心照不宣，一句話都沒有談到她……

法官回来的时候，全屋子里的人都还在睡覚。达莎阿姨本来想叫醒我們，可是引起他大发脾气，所以我們只好装着沒有醒，又繼續躺了半个鐘头。和五年前完全一样，他在厨房里又是噴鼻子，又是呼哧呼哧地搞了好半晌（他在洗澡）。然后，又传来他在过道中走路，和水珠从他身上滴下来的沉重的声音。

卡佳又入睡了。我悄悄地穿好衣服，走进厨房。他赤着脚，穿一件干淨的衬衣，刚洗过的头发和胡鬚还是湿淋淋的，坐在那里喝茶。

“到底还是把你吵醒了！”他迎面走过来，紧紧地把我抱住。

不論什么时候，我只要回到故乡，回到我生长的家中，“喂，講講吧”这个严峻的命令总是在等待着我。老头很知道，在我們离别后的几年里我都作了些什么，我的生活是否正当。他的眉

毛很浓密，和又粗又长的头发联接着，他就象眞正的法官那样，严厉地盯着我，审問我。而我也知道，在世界上沒有比从他口中能听到更为公允的判决……不过这一回却是有生以来第一次，法官并沒要求我作彙报。

"全明白啦，"他带着满意的神情用手抹抹上唇，眼睛盯住我的勛章。"四顆嗎？"

"是的。"

"还有第五顆，为了塔塔林諾夫船长，"法官严肃地說道。"要把这件事情說淸楚有些困难，不过你会領到的。"

要把这件事情說淸楚有些困难。但是老人显然办得很認眞，所以当傍晚我們重新围聚在桌边时，他講了一篇話，企图把我所作的事情作一个总結。

"生活在前进，"他說道。"轉瞬間，你們已經是成熟的，有所作为的人回到故乡，你們說家乡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簡直不認識它了。的确，它不仅变了，而且成熟了，就象你們一样，为了斗爭和胜利放出了內在的力量。亲爱的薩尼亚，当我看到你的时候，我脑子里还产生了另外一些想法。你已經找到塔塔林諾夫船长的探险队，理想实現了，那些在想象中似乎是幼稚的神話的事都成为現实了。他在訣别信中不正是向你，向那能够繼承他的伟大事业的人求助嗎。他所指的就是你，我認为你可以当之无愧地和他并坐，因为人类和科学就是被象他和你这样的船长和大尉推动着前进的。"

他举起酒杯，为我的健康一口将酒飲尽。

我們一直坐到深夜。后来达莎阿姨宣布該去睡覚了，可是我們都不同意，便跑到沙河边去散步。

噴吐着烟火的云团依然一个接一个地在工厂上空急促地奔

馳。我們走到河边，走到当年一个穿大棉褲的黑瘦的男孩用烂肉釣青虾的大缺口。时間仿佛停滞在河岸上，停滞在沙河与静河汇流处的两个古老的炮楼間，耐心地在等待着我；現在我又回到这兒，我們面面相覷地瞧着。可是前面等待着我的将是什么呢？是新的考驗，新的劳动，新的幻想。是幸福还是灾祸？誰能知道呵……但是在这次众目睽睽的注視下，我并沒有低下自己的眼光。

应該回去了。卡佳开始感到发冷。于是，我們沿着堆滿了木材的河岸走了一段路后，便折回家里去了。

城里静悄悄的，充滿了一种神秘的气氛。我們互相偎抱着，默默地走了很久。我回忆起从恩斯克出走的情形。那一次城里也是这样阴森森，静悄悄的。我們的年龄还很小，有着不幸的遭遇，但都很勇敢，而未来却是可怕的，不可知的生活……

我的眼睛潤湿了，可是我并沒擦去这欢乐的眼泪，也不因自己流泪而羞愧。

尾　声

在一座巍峨险峻的峭壁下，从石縫中掙扎着长出了許多北极野生的罂粟花，由这兒前眺，眼前展开了一幅瑰丽的画景。岸边虽还是明鏡般浩瀚的海水，而远处却是滿目冰穴，和伸入到神秘的远方去的淡紫色的冰原。北极的空气在这兒也显得异乎寻常的明淨。多么寂靜，多么开闊。在这孤零零的坟墓上空，只有蒼鷹偶尔打从这里飞过。

浮冰互撞着，打着旋兒，由墓傍漂过；有的冰块漂得快，有的漂得慢。

这象是一顆戴着閃閃放光的銀盔的巨人头顱漂过去了，他的面目很清楚——乱蓬蓬的发綠的胡子对着大海，鼻子扁扁的，一双眼睛在花白的箭眉下微微地眯縫着。

一座冰屋漂近了，海水象无数的小鈴鐺清脆地响着由房屋上淌下来。这象是一些舖着洁淨桌布的节日的大餐桌。

海水无边，漂流不断！

儿艘駛进叶尼塞湾来的艦船从老远的地方便发現了这座孤坟。艦船降半旗从墓旁緩緩地駛过，发出了致哀的礼炮，迴音縈繞在空中經久不絕。

坟墓是用一色的白色大理石筑成的，在北极不落的太阳的霞光中放射出夺目的光輝。在齐人高的地方鐫刻着墓銘：

“伊·李·塔塔林諾夫船长遺体安葬于此。船长生前曾經完成了一次极其英勇的航行，一九一五年七月发現北地島后，于归国途中不幸牺牲。”

奋斗，探求，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 船长与大尉 （上册）
SS号＝ 10497261
页数＝ 856
地址＝ http://book4.5read.com/300-36/diskaae/aae97/08